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法国通史简编

BOOK
网络资源 非同寻常

前 言

《法国通史简编》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而编写的高等学校历史专业教材之一，亦可供世界史研究生、法国历史爱好者和外事工作者参考使用。

法国是西欧的古国之一，有着灿烂的文化、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国际事务中历来起着重要作用。因此，要编写出一部具有一定特色的法国史，决非易事。编写此书，是教学急需的一种尝试。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力图展现法国历史的全貌，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思想文化的发展、同时注意法国对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

本书共分 18 章进行叙述。第 1—4 章，主要叙述法国的由来，法国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兴衰及其典型性。第 5—11 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 1789—1914 年法国历史的演变，突出法国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确立、民主制度的发展、工业化的过程和法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特点。第 12—17 章，比较全面地叙述了 1914—1988 年的法国，突出国家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现代化，以及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第 18 章，系统介绍了中法关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我们设专章叙述中法关系，不仅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形势，更重要的是因为中法交往源远流长、有丰富的实际内容，而在我们史籍中又很少涉及。因此，系统叙述这一领域，希望有助于加强和增进中法之间的交流和友谊。此外，考虑到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历来叙述太略，我们认为有加强的必要，所以叙述较详。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多方关心、支持和帮助。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巴黎第八大学的克洛德·维拉尔（Claude Willaru）教授，来我校讲学期间，花了大量时间审阅本书的编写大纲，并和撰稿人一起对大纲逐章逐节进行讨论、修改。还有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主任研究员、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副主任莫里斯·埃马尔（Maurice Aymard）和法国国立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国当代史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贝达里达（Francois Bédarida）两位先生，在访华期间，就如何编好本书也与我们进行专题座谈，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上述专家和许多法国同行，还给我们寄来了不少法文史书和资料。对本书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促进作用。

本书完稿后，我们特约请了我国著名史学家王养冲教授以及陶松云、金重远教授担任了本书的主审工作。齐世荣教授在我系讲学期间也审阅了部分书稿，他们对本书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及会长张芝联教授以及端木正教授、王荣堂教授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下列人员参加编写：第 1 章詹天祥，第 2、3 章王渊明，第 4 章王渊明、楼均信，第 5 章尤天然，第 6 章楼均信，第 7 章沈坚，第 8 章楼均信，第 9 章郑德弟，第 10 章郑德弟、楼均信，第 11 章楼均信、沈坚，第 12、13 章戴成钧，第 14 章吕一民，第 15 章戴成钧，第 16、17 章吕一民，第 18 章沈坚。最后，由沈炼之、楼均信负责统稿、定稿。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仓促，书中错误定然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主编者
1988.12.30

第一章 古代高卢

第一节 远古居民及其文化

一、原始先民

[人类在法兰西的出现] 法国地处欧洲大陆西部，北、西、南三面临海，分别为英吉利海峡、大西洋和地中海。陆上与卢森堡、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接壤。面积 55.1 万多平方公里。境内气候适宜，土壤肥沃，资源丰富。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在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留下众多的考古遗迹和文物。透过这些文化遗存，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原始居民在法兰西土地上的活动及其发展过程。

从大量的考古发掘中可以证明，今天的法兰西是人类在欧洲最早驻足、生活过的地区之一。

大约 100 万年以前的遗址在法国的中央高原，就有瑟纳泽（160 万年）、希拉斯（160 万年）、拉罗舍·拉姆贝特以及森泽勒（100 万年）等四处，都残存有人工打制的石器。在瑟纳泽和希拉斯遗址内还发现一些砾石工具。在拉罗舍·拉姆贝特遗址，与破碎的动物骨骸一起被发现的还有燧石和石英石片。这些石片不是由当地材料制成，显然是人从其它地方带来的。森泽勒遗址内发现的动物骨头上有人工造成的划痕和裂缝。这无疑是人类在法国大地上最早留下的遗存。

早于 50 万年以前的遗址，除上述四处外，还有瓦隆纳、厄斯泰弗·热松和拉·罗米厄等三处，发现有石器或人工用火的遗迹，但没有发现人类的化石。这些遗址的存在表明，50~150 多万年前，人类已在法国出现和活动。

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 100 万年以上的人类遗存，大多位于南北纬 35 度至赤道的地带。这些地区内一年中最短的白昼，每天也有 10 小时，这有利于原始人的采集、狩猎活动。随着纬度的增高，因冬季白昼过短，获取食物的季节性矛盾扩大。加之气候因素，妨碍了原始人向中、高纬度地区的迁徙。虽然人类在 140 万年前已懂得用火，但只有较普遍地掌握使用和保存火的技术后，才有可能在远离热带的地区生活。法国地处中纬度，加上大海的阻隔，在早期猿人和晚期猿人阶段，人类虽曾多次在此居住，并留下他们的踪迹，但还没有能力定居下来。

[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的化石] 根据现有材料，大约从中更新世的后期起，人类开始在欧洲作永久性的居住。法国东南部和西南部是旧石器时代原始人生活的地区，那里发现不少人类化石。较早的有比利牛斯山多达维附近阿拉戈洞穴中的多达维化石人，包括一些颅骨和二块下颌骨，约距今 20 万年。拉·捷斯洞穴中的化石人约距今 15 万年前。从体质进化角度划分，这两种化石人都属于从晚期猿人向早期智人过渡的类型。较晚的化石有勒·拉扎勒特人、蒙特穆兰人、丰特舍瓦德人，以及苏阿特岩棚遗址化石人。这几种化石人的时代，都属 7—10 万年前。他们是尼安德特人的祖先。

从更新世晚期最后一次间冰期结束至维尔姆冰期开始，即大约 7.5 万年

人类最早用火的遗迹发现于东非肯尼亚的切萨瓦尼亚。

前起，属于早期智人阶段的典型尼安德特人在法国各地出现。尼人的前额低而倾斜，眉脊粗厚形成一线，下巴颏不明显，脑容量已达 1100—1600 毫升，但脑形及褶皱不及现代人发达，身高较现代人为矮。尼人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大多居于洞穴或岩棚内。法国西南部，尤其是多尔多涅地区，发现许多尼人化石。较著名的有沙朗特的拉基诺人。这是在一岩棚遗址内发现的妇女和小孩；西南部拉沙佩勒——欧赛恩茨（圣沙拜尔）洞穴的拉沙佩勒人，这具近于完整的男性骨架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完好的一个尼人化石；多尔多涅地区拉法拉西岩棚遗址内发现的拉法拉西人，包括一成年男性、一成年女性和一些较年幼的个体，以及多尔多涅河畔多梅附近的康贝格伦诺人。

大约 4 万年前，尼安德特人逐渐为晚期智人所取代。晚期智人的体质结构和形态与现代人已没有多大区别，他们的额骨变直，出现下巴颏，平均脑容量达到 1400 毫升。晚期智人在法国分布较广，他们创造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奥瑞纳、梭鲁特、佩里戈尔、沙泰勒佩龙、马格德林等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晚期智人是克罗马农人，最初发现于多尔多涅省莱塞济附近的克罗马农岩棚。克罗马农人下颌有颏隆突，前额饱满，个体高大，肌肉发达。

法国大地上的原始先民，不仅是欧洲最早的居民之一，而且是欧洲旧石器时代一系列原始文化的创造者，他们的活动在欧洲乃至世界史前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可见，法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古老的文明。

二、旧石器时代的经济和文化

[狩猎采集经济和生活]人类开始在法国生息后，面临着恶劣自然环境的挑战。在欧洲，更新世共出现过 5 次冰期和 4 次间冰期。几次冰期来临时，法国许多地区都被冰冻，呈现多雨潮湿的寒冷气候。间冰期中，气温普遍回暖。原始居民利用石头、木头为材料制造工具和武器，以狩猎采集为生，与各种猛兽搏斗，适应气候、地理环境的变化并克服由此引起的食物资源变异等困难，缓慢而不断地发展着生产力。

早期的原始人，或采集野生植物的根、茎、叶、果充饥，或捕捉小动物为食。通常结成小群，过着流动的生活，任何个人如果脱离群体就会成为猛兽的牺牲品。他们使用“万能”工具——手斧。手斧既可用于加工木棒，切割东西，也可打击野兽。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即早期智人出现时，由于生产工具的发展，狩猎业比以前发展了，捕杀动物的主要方法是近距离刺杀以及追赶围捕，将野兽逼上悬崖坠死。这些都要依靠集体进行。狩猎活动加强了群体内的协作，促进了个人智力的发展及彼此间的信息交流。

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即晚期智人出现时，除石器外，以骨、象牙、鹿角等材料制成的工具广泛使用。还出现各类复合工具和复合武器，即用两种不同质地材料制成的工具。如以骨或象牙的矛头安装在矛杆上，制成投矛、鱼叉等。这种工具比木制的矛头具有更大的穿刺力，使捕杀动物的距离增大，约达 75—100 米，从而使狩猎方式比以前有效，也较安全。这一时期人们还学会设陷阱捕获动物。与采集、狩猎经济相适应的是当时人们过着流动的生活，寻找附近具有食物资源、水源的地方为住处。为了抵御寒冷和动物的侵袭，他们大多在洞穴和岩棚中居住，有时也构筑窝棚。坐落于尼斯的台拉·阿马塔遗址是法国最早的窝棚遗址之一，距今 24 万年。这一窝棚呈椭圆形，长 8—15 米、宽 4—6 米，一头有一入口。许多根直径约 7 厘米的柱子构成倾斜的墙体，另有一根中央柱子支撑屋顶。地面上堆放石块作屋基，屋中央置放一灶坑。为了追赶野兽或采集食物，旧石器时代的居民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居址，分别在不同季节居住。台拉·阿马塔遗址只是在春末夏初才住人。原始人出于狩猎需要，还建立一些露天营地作为屠宰场和工具制造场。随着狩猎方式和工具的改进，从旧石器时代晚期起，人们不仅能在冬季捕猎动物，而且懂得晒干和烟熏肉类的方法，使食物保存得更久，从而帮助他们克服季节性食物短缺的问题。烹饪方法也有进步。西南部巴朵岩棚遗址和拉里拉洞穴遗址内发现的大鹅卵石建成的炉子表明，当时原始人已会把炉火保持得较久，并能控制炉温。掌握了比较有效的煮烧方法，使食物更可口，易于消化，有利于身体的吸收和人类体质的进化。一些遗址中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牙齿缩小反映了这一情况。这一时期，原始人学会以兽皮制造冬衣御寒。梭鲁特遗址内发现大约 2 万年前带有针孔的针，是欧洲最早的缝衣工具。

大约 1.8 万年前，欧洲的冰期达到最高峰，气候干冷，冰川范围扩大。原始人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以及狩猎、饮食、保存食物方式的改善，使他们能适应自然环境的急剧变化。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已学会穿兽皮衣、构筑御寒的窝棚、减少冬季活动等方法，来降低人体能量的消耗，使自己能在严寒气温下长期生活。

也有人估计为 38 万年前。

[石器技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约公元前 1.9 万—1 万年前），法国的原始居民创造了丰富的石器文化。法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分期序列，是世界上不少地区考古文化分期的参照尺度，法国旧石器时代文化可分为阿布维利、阿舍利、勒瓦娄哇、莫斯特、奥瑞纳、梭鲁特和马格德林等阶段。前二个文化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勒瓦娄哇文化和莫斯特文化为中期，后三个文化为晚期。

阿布维利文化因发现于北部索姆河畔阿布维尔附近而得名。存在时代为中更新世的贡兹——明德间冰期，气候较温暖。代表性器物是用大石结核从两面打制成的粗糙型手斧。它的特点是器身厚，刃缘曲折、形状不定。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与阿布维利文化伴生的人类化石。

阿舍利文化是法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另一考古文化。最初发现于北部亚眠市郊的圣阿舍尔。这一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是手斧。这类手斧用骨棒或木棒在火石结核上交互打制而成，特点是器身薄、刃缘平直、石片疤较浅，器形有扁桃形、卵圆形等。这类手斧制作虽然粗糙，但可用于削尖木棒、切劈东西、挖掘块根和打击野兽，是一种“万能工具”。此外，还有砍斫器和石片。阿舍利文化的石器，在法国以外的欧洲地区以及非洲都有发现。

旧石器时代中期，出现勒瓦娄哇文化和莫斯特文化。前者因其标准地点在巴黎近郊的勒瓦娄瓦——佩雷而得名。后者因最初发现于多尔多涅省莱塞济附近的勒穆斯捷岩棚中而取名。勒瓦娄哇文化以一种预制石核为特点，就是先将石核加工成倒置的龟甲形，然后从这石核上打下石片作为工具。石片一般都较薄，刃缘锐利，很象一把石刀。原始人运用这一技术，不仅能制造对称的石片，还可制造、加工较大尺寸的石核。莫斯特文化的石器大多数为石片工具，用石片精心制作的边刮削器和三角形尖状器是这一文化的特征性器物。刮削器主要用作切刀，裁割兽皮，制作衣服。尖状器是狩猎工具，可作矛头。莫斯特文化的分布地域较广，欧洲以外地区也有发现。在法国，以莫斯特、拉法拉西和拉沙佩勒—欧赛恩茨（圣沙拜尔）几个遗址的文物最为典型。以奥瑞纳、梭鲁特和马格德林为代表的法国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标志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已达到一个新高度。奥瑞纳文化最初发现于南部加龙河上游图卢兹附近的奥瑞纳克山洞。存在时间为距今 3.5 万—2.5 万年前。奥瑞纳石器主要以石叶制作而成。这种石叶不同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前的石片，是用间接法产生的，然后加工成各种新的切削器、尖状器、刮削器和雕刻器。除石器外，还有全部分叉的骨制尖状器、穿孔器、可衔接在木棒上成为长矛的尾部分叉骨制尖状器。这说明复合工具已普遍制造和使用。

梭鲁特文化得名于里昂附近的梭鲁特雷山洞。这一文化主要分布于中部，以精致的压制石片技术著称。石器压制得很薄，形状比较整齐。典型器物是桂叶形尖状器和舌形尖状器。梭鲁特文化的石器制作技术，达到了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顶峰。

马格德林文化最初发现于多尔多涅河流域蒂尔萨克附近的拉马德莱纳岩棚中。存在时间约为 1.6 万—1 万年前。马格德林的石器很实用，种类也多。小巧的几何形石器可以嵌入骨柄和鹿角柄中使用。还有各种雕刻器、刮削器、石钻和琢背石刀等。骨器有矛头、鱼叉、带孔针等。其中一种骨鱼叉带有单

阿布维利文化在性质上与时代稍晚的阿舍利文化相近，因而，许多学者也把它看作早期的阿舍利文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 356 页。

排倒刺或双排倒刺，叉头可以和柄分开，既可用于狩猎，也可捕大鱼。

法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这三个考古文化，虽然在时间上有先后，但并不具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如梭鲁特文化在时间上比奥瑞纳文化晚，但它并非源于奥瑞纳文化，而是在莫斯特文化影响下产生的。马格德林文化则是直接从奥瑞纳文化发展来的。这反映出当时已存在一个以上的文化因素。工具制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法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各考古文化所包含的石、骨、角、木多种材料的工具，以及工具制作技术的改进和多样化，表明制造这些工具的克罗马农人等已具有较高的劳动技巧和活动能力。

[艺术和宗教的萌芽]法国的原始居民，在漫长旧石器时代不仅创造了具有特色的物质文化，而且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法国的原始艺术尤以洞穴中的绘画和各种雕刻著称。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艺术遗址大多分布于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北部。仅法国的佩里戈尔地区就有 127 个，其中 69 个遗址又集中在勒斯·厄伊泽埃地区。

法国史前时代的洞穴艺术包括雕刻和绘画两种形式。雕刻艺术品的数量很多，按表现手段可分两类。一类是用雕刻器，在石板、工具、饰物上刻画线条状符号或图案，西南部拉法拉西遗址和勒斯·厄伊泽埃地区一些遗址内刻画于石灰石板上的图案和符号，属奥瑞纳文化初期，是已知最早的艺术作品。线雕作品有深线刻、浅线刻和轮廓线刻等不同类型。线雕的绘幅极大，描写的动物有野牛、驯鹿、马、猛犸象、洞熊等。拉穆特·科姆巴勒莱等洞穴遗址以巨幅线雕作品著作。另一类雕刻艺术包括浮雕、立雕和透雕，尤以石头或象牙刻成的妇女小雕象最为著名。雕象突出女性特征，有特别肥大的乳房、臀部和腹部，面目不清，不刻眼睛和口鼻。妇女偶象的出现，说明女子在当时社会的特殊地位。此外还有动物小雕象。勒斯·厄伊泽埃附近洛萨尔岩棚内发现的手持羊角的女性小雕象和西南部比利牛斯山梯克达杜贝遗址内的泥塑鬃犁，是代表性的雕塑艺术遗物。

绘画是法国旧石器时代晚期另一种重要艺术形式，大多绘制在洞穴的壁或顶上。主要题材是日常狩猎的各种野兽，如猛犸象、野牛、马、野猪、披毛犀等。这些绘画，不仅刻划出动物的静止状态，也表现各种野兽的动态，神态逼真，反映出作画者对这些动物十分熟悉，以敏锐的观察力和高度的兴趣去创造这些艺术形象。许多绘画染有红、黄、褐、黑等多种颜色，表明原始艺术家已懂得利用矿物颜料作着色材料。

绘画风格也经历由简到繁的发展过程。较早的单色画（奥瑞纳文化期）多用手指或手绘成，只有形象的轮廓。如佩什·梅勒洞穴内以黑色线条勾画的马、猛犸象。以后发展为具有明暗色调的单色画和彩画。多尔多涅地区的拉斯科是最著名的壁画洞穴。壁画上的动物形象有赤鹿、野牛、马等。这些动物画尺幅巨大，线条粗健，飞动奔走的神态鲜明有力，大多以红、黑两颜色绘成。洞穴大厅内的雄牛画象，大小如同真牛一样，体现出真实地描绘对象的现实主义风格。勒斯·厄伊泽埃附近的丰德高姆洞穴，多尔多涅地区的鲁菲尼亚洞穴都是重要的史前壁画遗址。

原始艺术是从原始人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产生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原始人的狩猎生活和观念。许多壁画中，野兽身上画有长矛、箭头以及棍子

克罗马农人是奥瑞纳文化的创造者。

有人认为，雕象上肥硕丰满的女性体态，表现了原始人对自身后代繁衍的祈望。

击伤的痕迹，或画有陷阱。如诺克斯洞穴内的野牛壁画，在野牛躯体侧面画着刺入的矛头。丰德高姆洞穴内的一幅画描绘一头猛犸象正闯入陷阱。不少壁画作于洞穴深处的岩壁或洞顶上。尼奥洞穴中著名的“黑厅”壁画位于洞穴内约 777 米深的地方。丰德高姆洞的犀牛画作在洞穴深处岩石的隙缝上，人只有平躺在地上方能观察到。拉斯科洞内一处壁画曾经重叠画过 3 次。这些表明，原始人作画的动机很可能与施行巫术有关，具有进行某种巫术仪式的目的。

宗教大约萌芽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法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洞穴和岩棚遗址中发现最早的墓葬。尼安德特人把一些动物、小饰物、工具与死者一起埋葬。勒穆斯捷遗址中发现一具年轻人骨骸，其头部枕在一堆燧石碎片上，手旁有一把手斧。拉沙佩勒——欧赛恩茨遗址的埋葬中曾发现许多贝壳、莫斯特文化的燧石工具和各种动物骨骸。这不仅表现了生者对死者的关切，而且说明尼安德特人可能已产生关于人死后另一世界生活的观念。随葬品大约是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使用的。除出现葬俗，尼安德特人的一些洞穴内还发现成堆熊骨。在一洞穴的壁龛中，发现 5 具熊的骨骸被一圈石块围住，有些骨骸周围有小石头，另一些则散在石板上。这可能是为了狩猎目的进行仪式而置放的。

三、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

[中石器时代]约公元前1万—8千年左右，冰川在西欧逐渐消失，冰期结束。这时，欧洲大陆的自然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大地回暖，气温逐渐升高，出现类似今日的气候。动物群和植被也发生变化。猛犸、野牛、野马等寒冷气候条件下生活的动物，要么随之北移，要么最终绝灭。大地上树木繁殖，苔原变成森林地带，西欧和中欧普遍出现以橡树为主的阔叶林，适合温暖气候的林间动物，如赤鹿、麋鹿和鸟类等大批繁殖。生态环境的改变，使原始人的经济生活从旧石器时代猎取草原大动物群，转变为在林间猎取单个的小动物。生产工具相应有了改进，出现弓矢和细石器。这是中石器时代的标志。中石器时代是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在法国，以阿齐尔文化和塔登诺文化为代表。阿齐尔文化因南部的阿齐尔洞穴得名，时代约为公元前8千年至公元前6千年。阿齐尔文化人既在山地洞穴中生活，也在低地营造木构茅棚作季节性居留。他们的石器以几何形细石器为主，用作箭头或嵌入骨、木工具的凹槽中作刃口。还有石刀、石斧、鱼叉等。经济生活以狩猎鹿类为主，渔猎和采集也占有重要地位。塔登诺文化以北部的塔登诺遗址命名，约存在于公元前6千年代至5千年代。石器与阿齐尔文化的相似，但尺寸更为细小，形状更合乎几何形。塔登诺文化人多居于滨海或大河旁，从事狩猎、采集和捕鱼。阿齐尔和塔登诺文化的遗址中都发现彩绘砾石，大多为红线组成的几何图样，也有图案化的人类和兽类形象。根据民族学的材料，这种图案与当时人的灵魂崇拜观念有关。

巴黎盆地以北地区，大约自1.3万年前冰川消失后才有人类作长期居住。在中石器时代属北欧马格尔莫斯文化范围。当地居民广泛使用木材建屋、制造弓矢。从事狩猎、采集软体动物和贝类、捕捉鱼禽。

[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和畜牧]约公元前9000年起，西亚出现了最早的农耕和畜牧，开始了从旧石器时代食物采集转变为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的过程，即发生所谓新石器革命，或曰农业革命。传统的观点认为，欧洲农业起源于西亚，是西亚的农耕者在一次又一次的移民浪潮中，把农耕和畜牧的技术传播到整个欧洲大陆。近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有些作物和牲畜的驯养是在欧洲独立地发展的。早在公元前7千年，希腊的铁撒利亚已开始驯养牛。法国南部沙托纳夫·莱·莫蒂盖洞穴内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发现比野生绵羊体型为小的绵羊骨。全新世初，法国南部还出现豆科作物。欧洲中石器时代居民，于原先半定居的狩猎、采集经济基础上，在利用传统食物资源的同时，吸收新的生产技术，接受了新的食物资源，从而逐渐完成向农耕、畜牧经济的变化。法国南部是西欧最早的农耕畜牧地区之一。约公元前6千年，法国的地中海沿岸地区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但狩猎、采集经济仍占重要地位。到公元前5千年以后，当地居民已懂得栽培红小麦、野生小麦、斯佩尔特小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猪。狩猎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已降低，他们还能用粗陶土控制陶器或以贝壳压印后烧成圆形陶器。逐渐从原先的洞穴岩棚或贝丘迁往露天营地或住进圆形的和狭窄的茅屋。公元前5千年后巴黎盆地以北地区受中欧新石器时代线陶文化的影响。这一文化以带有线条图案(曲线、斑马线、波形线)的刻纹陶为特点。在法国南部，约公元前4千年以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却塞文化取代了早期的印纹陶文化。它以圆形底座的深色磨光陶器为特征。公元前3千年，这一文化逐渐扩展至法国中部和北部。

[巨石建筑]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中期，西欧、北欧出现以巨大石料构成的建筑物。考古学界称之为巨石建筑。巨石建筑是史前时代重要的文化遗迹，世界各地都有发现，但尤以西、北欧沿海地区分布较为集中。法国新石器时代居民在大西洋沿岸地区，特别是布列塔尼半岛，建造了大量巨石崇拜物。这些巨石建筑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立石和列石。立石为单独的整块巨石，尖端插入地中竖立，一般不作雕琢加工。列石则是由许多较小石块排成一行、数列，或排列成环状。一般认为立石和列石都是宗教崇拜物。莫尔比昂省的埃尔德旺列石由 1129 块石头组成，分成 10 行，长达 2105 米。大西洋沿岸卡尔纳克平原上的列石分 3 群，共有 2700 多块，长达 3 公里。另一类是石棚，大多用作坟墓。简单的为数块大石立地，上面覆盖一块大石板，石壁上刻有花纹或人物。较复杂的石棚又有通道墓和长墓两种。通道墓由一巨石墓室和长而窄的入口通道两部分构成。墓室形状各异，有圆形、方形、长方形或多边形。通道由两列并行的竖立石块组成，上面铺以平坦的石板，通道顶端即为墓室。墓室内琢有几何图案。长墓无通道与墓室之分。巨石墓室内所葬个体，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

传统的观点认为，巨石建筑起源于西亚，经地中海传播至西欧。近年研究证实，欧洲的巨石建筑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布列塔尼地区的巨石通道墓，早在公元前 4500 年就已竖立于大西洋之滨，比西亚和埃及的石头建筑还要古老，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巨石建筑。

[青铜时代与原始凯尔特人]约公元前 3 千年至 1 千年，法国进入了青铜时代。人们把铜和少量锡混合起来炼成青铜，制成各种工具和饰物。在青铜时代欧亚大陆曾出现几次部落群团迁徙的浪潮。新石器时代生活在俄罗斯南部到东欧一带的原始印欧语系人，这时开始了一波接一波持续的迁徙过程。其中尤以公元前 8 千年代末和 2 千年代末的 2 次迁徙浪潮规模为最大。有的往西进入中、西欧，有的向东进入亚洲。欧亚大陆诸部落群团大迁徙促使各地居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接触、交流和新民族的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中，法国早期青铜时代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五光十色的局面。新石器时代末和铜石并用时代已出现的各考古文化，有的为青铜文化所取代，有的继续存在，有的受新出现的西欧青铜时代文化影响或与之相结合，形成一些新的地区性文化。西欧和中欧早期青铜时代的代表文化是钟杯战斧文化，它以钟形杯状陶器和用于战斗的穿孔石斧为特征。罗纳河流域处于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内。在巴黎盆地，新石器时代末的珀—里卡德文化仍继续存在。在东部，受中欧乌涅提茨文化的影响较大。地中海地区则受意大利北部青铜时代文化影响。这一时期，原始农业经济逐渐发展为农牧混合经济，居民流动性较大，留下的村落遗址较以前为少。墓葬中发现的大量金属武器和装饰品表明，氏族、部落的首领已拥有特权地位，社会分化已较明显。青铜时代中期，法国大部分地区属古墓文化的范围。至青铜时代晚期，大约公元前 2 千年，起源于多瑙河流域的骨灰瓮文化诸部落，经莱茵河进入法国内地，后又抵达大西洋沿岸。骨灰瓮文化的居民住在村落或山堡中。山堡是四周围用墙垣或栅栏圈围起来的设防居民点，大多建立在山丘或沟崖顶上。这是欧洲最早出现的山堡。骨灰瓮文化居民在父系氏族制度下生活，经济以农耕为主。他们与青

石棚又称桌石、支石，音译为多尔门。

有的学者认为印欧语系人的发源地为小亚细亚半岛。

铜时代中期的古墓文化诸部落以及其他部落混合，形成新的居民群团——原始凯尔特人，即后来铁器时代凯尔特人的祖先。

第二节 凯尔特人的高卢

一、凯尔特人的兴起与铁器时代文化

[凯尔特人的起源、分布和迁徙]公元前1千年代初，欧洲出现铁器工具。约公元前8世纪，法国进入铁器时代。凯尔特人是欧洲最早懂得冶炼铁、制造铁器工具的居民，是在语言、物质文化和宗教等方面具有共同特点的一些部落群团的总称。他们都属印欧语系的凯尔特语族，创造了欧洲铁器时代的哈尔施塔特文化和拉登文化，宗教方面都信仰多神的特罗依德教。法国东部塞纳河、罗亚尔河上游、德国西南部莱茵河、多瑙河上游地区是凯尔特人的发源地。约公元前1千年代初，他们首次在这些地区出现。随后的几世纪中，凯尔特人武装的部落联盟为单位，向周围地区扩散、迁徙，进行军事移民。他们凭借铁制武器战胜了尚处于青铜时代的部落，公元前7世纪已在法国东部、中部各地定居。公元前5世纪末凯尔特人抵达法国南部和比利牛斯山，并与当地的利古尔人及伊比利亚人融合。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凯尔特人的一支——具有日耳曼人血统的比尔及人越过莱茵河进入法国东北部，在塞纳河以北，阿尔登山区以西和以南的地区定居。公元前500年以后，法国已成为凯尔特人主要的居住地区。古罗马人把居住在今天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德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凯尔特人统称为高卢人，把高卢人居住的地区称为高卢，面积约60余万平方公里。高卢人生性坦率、狂热和轻浮，胜时盛气凌人，败时垂头丧气。

[哈尔施塔特文化和拉登文化]凯尔特人的物质文化分为哈尔施塔特文化和拉登文化两个前后相连的时期。作为凯尔特人主要居住地区的法国，约在公元前750年进入早期铁器时代——哈尔施塔特文化期。这一时期，流行带有铃状把柄的铁剑和带有向上弯曲弧形把柄的铁剑，以及各种斧、刀、箭镞、矛头等铁器，此外，还生产青铜器皿、各类衿针和以玻璃、琥珀、象牙制成的小饰物。墓葬既有火葬高冢墓，又有直肢土葬。酋长、首领和氏族上层人物，死后常伴以四轮战车葬，尸体放于木槨墓室内的战车上。随葬品有武器、马具、饰物等。

公元前5世纪中，西欧进入凯尔特人铁器文化的第二阶段，即拉登文化期。这一文化因瑞士西部纳沙泰尔湖畔的拉登遗址而得名。分布于奥地利、法、英等国。拉登文化以独具一格的装饰艺术著称，它从哈尔施塔特文化朴素无华的几何图案发展而来，又受到东欧草原斯基泰文化的怪异动物形象和希腊古典艺术写实风格的影响，成为以曲线螺旋和圆圈图案为主，伴以希腊式花草和斯基泰动物纹样的装饰风格。这种装饰艺术主要表现于盔甲、盾牌、铜镜等金属器物上。墓俗从哈尔施塔特时期的四轮战车葬转变为两轮战车葬。

拉登文化时期，凯尔特人的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出现

传统的分期法认为哈尔施塔特文化起于公元前1100年，止于公元前450年。公元前1100年至前750年为前期，后期为公元前750年至前450年。前期包括骨灰瓮文化，青铜器和铁器同时存在，实际上是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晚近研究中的哈尔施塔特文化，仅指传统分期法中的后期而言。

拉登为法文中浅滩之意。因遗址坐落于湖畔的浅滩上，故名。

具有特色的铁犁铧、铁镰刀和带有精致镂花剑鞘的短剑。洛林、中央高原和勃艮第是主要的产铁区。

二、凯尔特人的经济

[农业]凯尔特人的经济以农耕和牧畜为基础。早在进行军事远征和迁徙期间，凯尔特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征服新的土地后，集体占有宜于垦殖的田地，并在各部落间进行分配。他们善役马，会使用铁犁，懂得在当时可谓较先进的耕作方法。高卢北部的凯尔特人以灰泥作肥料施于农田。有的地方使用带犁刃和犁壁（拔土刀）的轮式犁翻耕草地。这种犁需由8头牛牵引，耕地深度比当时意大利人和希腊人所用的轻犁要大，宜于开垦多石和难以耕作的土壤。依靠铁器工具和较先进的耕作技术，加以凯尔特人懂得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选择不同作物进行种植，所以在正常年景下，高卢的农业收成是相当好的。凯尔特人主要种植大麦和小麦，辅以黑麦和燕麦，还栽培甜菜、芜菁、亚麻、大麻、洋葱、蒜等作物。较为充裕的粮食产量，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客观条件，据估计，高卢的人口从公元前1000年的70万人增加到公元前400年的300万人。

畜牧业是仅次于农耕的经济部门。饲养的动物有马、羊、牛、猪等。养马和养羊尤为普遍。有的部落联盟仅饲养单一的某种牲畜，将森林和林间开阔地作为养猪的场所。有的地区流行将半驯化的猪在橡树林中放牧的饲养方法。

从公元前5世纪起，高卢大部分地区的居民过着以农耕或农牧混合经济为生的定居生活。他们用木材和粘土建屋，室内无家具，仅在地面铺上干草或麦秆，覆以兽皮。住房旁的院子内大多挖有储藏谷物的地窖。

[手工业]根据考古材料，哈尔施塔特文化的晚期，凯尔特人的手工业已有萌芽，它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从简单的家庭生产中分离出来。金属开采、冶炼和加工是手工业中最重要的部门。在哈尔施塔特文化期，凯尔特人主要是利用沼铁矿和露天铁矿。进入拉登文化期后，开始寻找含铁丰富又易于挖掘的铁矿进行开采，并在矿藏附近进行冶炼，他们通常以木炭为燃料，在立式炉内冶炼铁矿石，炼出的铁块呈长方形，两端较尖，这种条形铁锭每块重约6—7公斤。有的地区人们进行贸易时，以这种铁锭作为一般等价交换物使用。高卢各地都发现拉登文化时代的矿址和冶炼加工制造铁器的手工工场遗址。当时生产的铁器中，数量最多的是各种类型的武器，如短剑、匕首等；其次为各种生产工具，如犁、镰、锉、钳、凿、锯、斧、钻头、剪刀、剃刀等。

凯尔特手工工匠加工青铜、金、银等金属的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生产的带有装饰图案和雕刻花纹的手镯、别针、腰牌等驰名中欧和西欧。他们懂得镶嵌、镀金和镀银的方法。凯尔特人冶炼金属、加工、制造铁器和其它金属器的技术，在当时欧洲处于先进的水平。

除了金属冶炼和加工，凯尔特人的手工业还有皮革、陶器、玻璃、搪瓷、车辆制造等不同种类。公元前2世纪，高卢地区的陶器制造趋于完善，制陶作坊中不仅使用陶轮，还拥有结构较良好的陶窑。高卢人生产的陶器以高超的手工技巧和雅致的风格而著称。皮革除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外，广泛用于制造战士的皮上衣、佩剑的腰带、马鞍、马具、盾牌蒙皮和头盔等。

手工业的发展还反映在生产技术水平上。哈尔施塔特时代的四轮战车演变到拉登时代的二轮战车葬，不仅是葬俗的变化，而且反映了手工业制作技术的进步。二轮战车的车轮带有铁轮缘。在欧洲，凯尔特人最先懂得利用

铁热胀冷缩的原理。发明把烧红的铁箍套在带辐条的木轮上，使箍冷却时紧紧固住木轮的技术。二轮战车是木匠、铁匠、制车匠熟练配合制造的产物，质量在欧洲堪称上乘。

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为某些产品不再是零星、断续的生产，而是成批地生产。由于铁器普遍使用后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对铁制工具、武器以及其它铁制品的需求大大增加。同时，那些氏族贵族攫取越来越多的财富后为了享受的需要，不仅从地中海地区意大利、希腊等地输入青铜器皿、饰物等，也要求本地区生产更多的奢侈品。项圈是凯尔特人喜爱的饰物。在拉登早期大多为氏族贵族和贵妇人佩戴，到中期便广泛流行。已有专事项圈生产的工场，产品远销至中欧各地。

[商业]从哈尔施塔特文化晚期起，凯尔特人开始从事以交换为目的的手工业生产。凯尔特人各部族之间，凯尔特人与地中海沿岸及欧洲其它地区的贸易往来也随之发展起来。公元前7世纪末，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沿岸，出现一些希腊移民地。马西利亚（今马赛）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最初，希腊商人和手工业者通过居住在法国南部的利古尔人与内地的凯尔特人建立了交换关系，进而与中欧的凯尔特人从事贸易往来。从地中海沿岸运往内地的主要有珊瑚、象牙、玻璃、酒、青铜器皿等物品，从高卢向外输出的商品是金、银、锡等金属原料及牲畜、皮革制品等。凯尔特人早期与外部的商品交换主要是为了满足氏族贵族奢华生活的需要。

从拉登文化中后期起，高卢不同地区间的交换变得活跃，交换的物品日益增多。凯尔特人与其他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和贸易已具有经常的性质。他们在高卢建立了一个道路网，不少水陆路的交叉口有易马换货的设置。索恩河上的沙龙、马孔，卢瓦尔河上的奥尔良、罗昂，塞纳河上的巴黎、梅龙等都是水陆贸易的商品转口点。沙龙是当时南北高卢商业线路上的重要关卡。凯尔特语中的马古斯（magus）为商场、市场的意思。名字以马古斯结尾的地点大多坐落于渡口或桥边，是当时的贸易集散地。长距离的物品交换也随着商路和贸易集散地的建立而出现。

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活动的加强，从公元前2世纪起，凯尔特人开始铸造钱币，最初在高卢西部地区出现仿造马其顿腓力二世金币式样的钱币。后来，北部、南部和中部各部落群团都相继铸造钱币。钱币的式样和图案或模仿希腊，或铸造各种人物和几何图形。如布列塔尼流行的钱币，正面为戴月桂冠的头像，反面是拿着矛和盾的战士形象。

货币是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商品生产和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凯尔特人的货币活动尚处于原始阶段。这是因为，首先，大多数货币没有度量单位，重量也不相同。几乎在所有凯尔特人的寨堡中都发现用来称钱币的磅称，他们按重量使用钱币。由于不存在货币单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货币职能的发挥。其次，当时高卢地区还未出现国家，没有形成政治上的统一体，钱币的铸造和流通具有分散、局部的性质。许多部落群团拥有自己的铸币工场，每一种货币的使用范围大约在直径80—160公里的区域内。再次，各种物品在部落群团间的交换中仍作为等价交换物在广泛使用。

[城市的萌芽——寨堡]公元前7世纪末、6世纪初，高卢东部地区陆续出现许多较大的设防居住地——寨堡。最初，寨堡仅是部落的聚居地，在与其他部落发生战争时作为避难所。古罗马人把凯尔特人的设防寨堡叫作“奥必达”（oppida）。考古学家使用了这个术语，以与欧洲青铜时代较为简单

的山堡相区别。

公元前 5 世纪后，寨堡的数量逐渐增多，在凯尔特人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寨堡大多建造于人们不易到达的高地上或河流的拐弯处，占地辽阔，四周有城墙或深沟围住。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多数寨堡能贮藏较多的粮食，围栏大批牲畜，生产的武器、工具和饰物往往供应周围地区的需要。它们从最初单纯防御性质的避难地点，发展为带有手工业生产性质的部落聚居中心，其中有些成为部落联盟和部族的行政中心，或成为一个地区内的宗教和商业中心。

高卢中部艾杜依人的聚居中心毕布拉克德（今伯夫雷山）是高卢最大的寨堡之一。筑于 4 座山上，面积 135 公顷，周围城墙长 7 公里，内部包括居住区和手工工场区，有炼铁、炼铜、制搪瓷、制陶等工场。

寨堡在当地的经济活动中起着中心作用，在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起到保持经济活动继续发展的作用。虽然寨堡还不是真正的城市，但象毕布拉克德这样的寨堡经过多次规划后翻造重建，还设有下水道，可以说已经是城市的雏形。凯尔特人选择的寨堡地点往往具有经济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后来罗马人在原有寨堡基础上建立的许多新城镇，不少发展为今天的都市，如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贝藏松等著名城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凯尔特人是创立今天法国城市的先驱者。

三、凯尔特人的社会组织和文化

[高卢社会的分化] 早在哈尔施塔特文化时期，凯尔特人氏族中已存在上层分子与一般成员、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别，出现财富分化。马恩河地区和中部一些地方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氏族贵族墓葬，建筑考究宏大，有丰富的随葬品，显示墓主与一般氏族成员之间不同的地位。随葬品中珍贵的饰物和酒器表现了氏族显贵的奢华生活。1953年，在塞纳河上游的维克斯发现一座氏族贵族墓，坟墩直径达42米，高为9米。墓主是位妇女，头戴金冠，身着满是金片的衣服，躺在华丽的四轮葬车上。四周铺满手镯、胸针、琥珀项链，以及希腊、伊特拉里亚生产的青铜器皿等丰富随葬品。而在埋葬一般氏族成员的公共墓地里，随葬品很少，完全没有金、银饰物以及从地中海地区输入的物品。

公元前一千年代中开始，高卢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日俱增，至公元前1世纪已很明显。在部落内部形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相互对立。自由民由贵族、特罗依德僧侣和平民三种人组成。贵族包括氏族部落酋长、军事首领以及他们的后裔。他们利用显贵的地位和特权，占有较多较好的耕地、成群的牲畜，或把开采出的矿产与其它地区进行交换时攫取财富，从而增加家业，成为拥有极大势力的人。他们用各种手段对氏族一般成员巧取豪夺。特罗依德僧侣是氏族祭司，他们既主持公私祀典又裁判一切公私纠纷，垄断了氏族的宗教和司法事务，不但享有政治权力，而且免除了服兵役和一切义务。平民是氏族部落的普通成员，大多数是农民，也有部分手工业者。他们常被势力较大的人欺凌，或受债务和租赋的压迫，有的处境与奴隶差不多。贵族和特罗依德僧侣构成氏族部落内的特权阶层，与他们相对立的是无特权的平民。

高卢氏族社会的分化，还表现为出现了拥有显赫势力的军事首长和一大批依附于军事首长的亲兵，开始有了奴隶。公元前2世纪以后，军事贵族中间出身最高贵、最富有的，往往拥有人数众多的扈从和门客，有的还用自已的钱常年豢养一批亲兵。他们对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事务具有很大的支配力，个别贵族还图谋倚仗势力夺取部落联盟的领导权。

[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 公元前一千年代，高卢的凯尔特人生活在以家族、氏族、部落为单位的父系氏族社会中。部落是最高的社会组织。有的部落人少势弱，有的则人口众多，占地广阔，势力雄厚。公元前1世纪中约有数百个部落，他们结成60多个邦。由于社会内部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和阶级矛盾、阶级对立的发展，到公元前2世纪末，凯尔特人的氏族正逐渐走向解体，整个高卢社会处于原始社会晚期军事民主制由盛及衰的阶段。在高卢中部和南部，凯尔特人的社会已达到“文明时代门槛”，正在向阶级社会过渡。

高卢北部地区各部落内，议事会、人民大会和军事首长等军事民主制下的氏族社会各机关，存在并继续发挥着作用。有关决定战争、结盟等重大事情时，仍按传统召集有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人民大会，氏族普通成员在人民大会上的决定还能作数。军事首长虽拥有一定的个人权力，但主要是发生战争时的指挥权，并受人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制约。

高卢中部、南部地区的一些部落内，由于氏族成员的贫富分化越来越显著，贵族和平民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以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为前提的原始民主制已难以维持。在这些部落内，军事民主制已经过它的全盛时期，开

始走向衰落。氏族显贵、特罗依德僧侣以及由显贵组成的氏族议事会日趋拥有更大权力。军事首领大多出身于氏族显贵，他们利用权势和地位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族内的重大问题都由他们决定。普通氏族成员已无发言权，人民大会的作用日益萎缩，甚至形同虚设。军事民主制正逐渐改变它原来作为氏族制度机关的性质。

伴随着社会的阶级分化，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穷人和富人，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发展为公开的冲突。至公元前1世纪中，在一些部落内部不断发生普通氏族成员群起杀死氏族显贵的暴力斗争。那种从没有任何内部对立的社会中生长出来的氏族制度，面对存在压迫、剥削、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情况，已无能为力。同时，在氏族制度内部慢慢产生与人民对抗的公共权力。恩格斯说，国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他们，并且最后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在国家形成以前，存在着国家机关逐步取代氏族制度机关的过程。公元前1世纪初以后，高卢中部爱杜依等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部族正处于这样的过程中。这些部族中，已经萌发出政府机关、法庭、武装队伍等公共权力。除正式转变为统治机构的氏族议事会，还普遍存在由贵族组成、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特殊武装力量骑兵；存在由社会供养的特罗依德僧侣所组成的法庭。尽管这些公共权力还不成熟、不完善，带有萌芽性质，但它和除了舆论以外，没有任何强制手段的氏族制度显然不同。为了维持公共权力，平民都要交纳氏族社会中完全没有的捐税，有权势的贵族承包税额，征集税款后交给公共权力机关。

公元前1世纪初以后，高卢中部的许多部族内，氏族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氏族制度的机关正在转变为不稳定的国家机关，一种萌芽形式的国家正在形成确立之中。

[特罗依德教] 超部落的宗教——特罗依德教在凯尔特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罗依德教是充分发展的原始宗教，具有明显的自然崇拜色彩，是崇拜自然神的多神教。除崇拜森林、山、河、小溪等自然物以及绵羊、蛇、猪、鹿、马等动物外，还崇拜太阳、雷电、月亮等。雌马神爱帕娜是全高卢广泛受到崇拜的神，它的造型物是马和马驹。

特罗依德教的主要教义是灵魂不死，认为人死后其灵魂会转移到另一个躯体上继续生活，所以人无需畏惧死亡。在神灵的崇拜、仪式和节令名称等方面，在各部族中不尽相同，也不存在为高卢所有凯尔特人共同信奉的神。有时，同一神在不同地区或部族内具有不同的特征和意义。有时，不同的神又具有共同的特征和意义。特罗依德教僧侣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行使宗教祭祀的职能，而且承担传授部落风俗、神话、仪式，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凯尔特人没有自己的文字，部落的一切传统习俗全靠僧侣背诵一代代传授下去，这样，特罗依德僧侣成为唯一精通习俗法律并有权加以解释的人，从而垄断了所有知识和司法裁判权。僧侣在物质上拥有免纳赋税、不服兵役和不受一切义务约束的特权。上层僧侣与氏族、部落显贵一起，构成高居于平民之上，与平民对立的特权阶级。

特罗依德教还具有超部落的政治影响。全高卢的特罗依德僧侣，每年于一个固定的日子集中在卡尔弩德斯的一处圣地举行会议，以调解、裁决部族

间的争执。

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氏族制度的原则在特罗依德宗教中得到充分反映，并以宗教习俗的形式固定下来，当特罗依德僧侣为巩固自己的特权并力图攫取更多世俗权力，干预政治事务时，这一浸透氏族原则的宗教对社会发展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它使僧侣在社会中拥有特殊地位和世俗权力，破坏了原始平等。另一方面，僧侣又利用宗教观念和习俗维护对他们有利的氏族传统。凯尔特人对战利品的公共占有，是以宗教禁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很少有人敢于蔑视这一禁律，随意把一件掠来的战利品藏在家中。原始社会中杀戮俘虏的习惯，被凯尔特人当作宗教信条保持。这一习惯阻碍了将战俘当作奴隶用于生产劳动。

在全高卢统一国家没有形成的条件下，特罗依德教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全体凯尔特人的性质，但主要是为氏族社会服务的，起了维持氏族制度原则的作用。

第三节 罗马统治下的高卢

一、高卢战争

[罗马入侵前的高卢] 凯尔特人从公元前 7 世纪在今法国出现前，经过几个世纪与当地原有居民的融合、交流，至公元前 1 世纪中，在高卢共分为三支，即中部的高卢人、北部的比尔及人和西南部的阿基坦人。高卢人是体质上较为纯粹的凯尔特人，居住在加龙河以北至塞纳河的广大地区。比尔及人是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混合，他们于公元前 3 世纪从莱茵河以东迁来，定居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地区。阿基坦人在种族上具有凯尔特人与当地伊比利人混合的特征，分布于比利牛斯山与加龙河之间。这三支凯尔特人具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特征，相似的风俗习惯，但讲不同的方言，体质形态上也有差异，他们分别组成约 60 多个邦。这种邦从组织形式上讲，是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它们拥有的人口和所占土地的多寡很不相同，人口多的可达数十万。如北部比尔及人中的俾洛瓦契邦，据恺撒记载，人口总数约近 40 万。比利牛斯山中的邦则不过数万人而已。每个邦下面又有几个部落区。各邦的氏族部落都有一定的领土和疆界。较大、较强的邦有森农内斯、爱杜依、塞广尼、林恭内斯、阿浮尔尼、别都里及斯、桑东尼、雷穆维契斯、庇克东内斯等。

高卢辽阔的土地和丰饶的物产早就为古罗马人所睥视。公元前 2 世纪，罗马共和国经过 3 次布匿战争，打败北非的迦太基，同时，先后征服巴尔干半岛、西班牙的一部分，并染指凯尔特人居住的地区。第 2 次布匿战争结束后不久，罗马征服山内高卢。此后经过几十年时断时续的战争，于公元前 118 年占领法国地中海沿岸地区，建立那榜高卢行省，确立了罗马对山外高卢的部分统治，控制了凯尔特人居住地区与地中海地区联系的交通要道。罗马征服山南高卢和那榜高卢后，对凯尔特人的语言、习惯、文化有较多了解，军队中吸收凯尔特士兵，从而获得一个补充兵员和进攻的基地。

[恺撒远征高卢] 公元前 1 世纪中，罗马成为领有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大国。原先以城邦为基础的共和制度已不适应奴隶制在各地的发展，难以对付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奴隶起义。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在镇压奴隶起义的过程中找到了军事独裁这一新的统治形式。一些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为夺取最高统治地位，时而结盟联合，时而明争暗斗，出现从共和制向帝制转变的过渡统治——前后两次“三头政治”。

公元前 58 年，罗马政治家和著名军事统帅、“前三头”之一的恺撒出任山南高卢行省总督，后又兼理那榜高卢。他带着 4 个军团进驻山南高卢后，处心积虑地训练、培植、扩展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大部队，同时，伺机侵占尚未被罗马人征服的“蓬发”高卢广大地区。当时高卢原始社会各邦各部落内部的阶级对立、冲突已很尖锐，私有制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化正在不断破坏氏族公有制，瓦解氏族的血缘关系，“不仅……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地区，并且几乎每一个家族，都分成党派”。中部的一些部族甚至已产生萌芽状态的

“蓬发”高卢又名“长发”高卢，是罗马人对山外高卢的称呼，是与已罗马化的“托茄”高卢（即山南高卢）相对而言。

国家权力机构。为掠取土地和财富，各族间战争连绵不断。较大的邦则争雄夺霸，全高卢各邦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由爱杜依人领导，另一个由阿浮尼人掌握。高卢各邦内外矛盾激化、战事不断的动乱局面为恺撒插手他们的内部纷争，进而出兵入侵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公元前 58 年，居住在今瑞士境内凯尔特人的一支赫尔维特人出发向加龙河口迁徙。高卢中部的爱杜依邦面临赫尔维特人压境的局面，遂向罗马求援。恺撒率军进入山外高卢，在毕布拉克德附近击败赫尔维特人并迫使他们返回原地。接着他以高卢人的“同盟和友邦”的名义击败奥维斯都斯领导的一支日耳曼人，使其退回莱茵河东岸。恺撒借出征的机会，在战役结束后将自己的军团和冬令营留在高卢，以镇压高卢人的反抗并欲夺取更多的领土。这引起高卢人的不满，北部比尔及人的各邦首先起来行动，他们相互串联，试图结成联盟把罗马人赶过阿尔卑斯山去。恺撒获悉后，先发制人，率军至比尔及，利用比尔及人与高卢人的矛盾及比尔及人联军在指挥上的不协调和失策，各个击败了势力较强的俾洛瓦契邦和苏威西翁内斯邦，接着在萨比斯河大败以纳尔维邦为首的比尔及联军。此后又相继征服南部的阿基坦人和布列塔尼半岛的文内几等邦。

[高卢的失败]恺撒以军事手段征服了一些邦，又用许愿、结盟等方法笼络、分化瓦解了另一些邦，至公元前 53 年已占领高卢大部分地区。恺撒在各重镇和交通要冲驻军、建立冬令营，要求各邦提供人质、纳贡、听从军事调度和服从罗马的统治。

高卢人民并不甘心臣服罗马，公元前 52 年爆发了几乎席卷全高卢的反对罗马占领者的起义。起义领导者是阿浮尔尼邦的维钦及托列克斯，他曾在罗马军队中服役过，具有军事指挥能力和联合盟邦的外交能力。他组织起一支由各邦战士参加的军队，联合对罗马作战，采取坚壁清野和破坏敌人辎重、给养的策略，与恺撒部队周旋。恺撒倚仗自己军队的高度机动性和丰富作战经验，企图一举扑灭起义。双方军队在及尔哥维亚短兵相接，激烈交战。高卢联军战士作战勇敢又善利用地形，重创了罗马军队。恺撒损失 46 个百夫长和将近 700 名士兵。及尔哥维亚战役后，罗马在高卢的主要盟友爱杜依邦摆脱恺撒投向起义军方面。接着，除雷米人、林恭内斯人和德来维里人外的全高卢各邦，聚集于毕布拉克德，重申联合作战，摆脱罗马统治，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决心，共推维钦及托列克斯为高卢联军统帅。恺撒指挥军队步步为营，构筑大批工事、防堤和壁垒，把联军驻守的阿来西亚团团围住。阿德来巴得邦人康缪斯率军前去救援，两支部队奋勇作战，向罗马军队数次发起猛烈突击，战局几度成拉锯态势，但终因无法攻破恺撒的包围圈而没能会师。最后，联军主力为恺撒的骑兵所歼灭，维钦及托列克斯战败投降恺撒。一场声势浩大，几乎高卢各邦人民都参加的反罗马军事斗争，在不到 1 年的时间里，被恺撒的 10 多个军团镇压。至公元前 50 年，高卢境内反罗马武装斗争基本平息。

恺撒能在短短的几年间征服幅员比意大利半岛大，人口与罗马不相上下的高卢地区，有许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高卢各邦之间不团结，争战多年。当罗马军队压境，面临被征服的危机时，他们虽具有反侵略、反奴役的斗争性，能结成临时的同盟，共同对付罗马，但高卢各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

百夫长，罗马军队建制中基层军事单位百人队的指挥官。全军有 60 个百夫长。

政治单元，仍处于以氏族、部落、部族为单位的前国家发展阶段，氏族血缘关系纽带的影响仍深深存在。这种情况，不仅妨碍高卢各邦人民在反罗马斗争中的政治联合，也削弱了军事上集中指挥和协调行动的功能。从罗马方面讲，恺撒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政策，他并不单纯依靠武力，而是把军事征服和分化瓦解巧妙地结合起来，审时度势，抓住高卢人内部的矛盾，或收买、或许愿、或安抚，又择时进行军事打击。这是罗马能征服高卢的第二个原因。第三、恺撒在征战高卢的数年中，培养、训练出一支绝对服从于他，纪律严明，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部队。这支部队擅打攻坚战、防御战，有高度的机动性。加之恺撒是位卓越的军事指挥家，多谋善断，灵活多变，又具有与高卢人打交道的经验，几乎每次重大的军事行动，都有高卢人与之配合，所以罗马在军事上也处于优势。

高卢被罗马征服初期，各邦所受待遇不同，他们分为联盟邦，即罗马的同盟，在接受罗马统治、罗马宪法的前提下，享有内部自治权；自由邦，即悔过邦，享有一定内部权利；以及缴纳贡赋的雇佣邦。

二、高卢的罗马化

[行省的建立]恺撒在高卢征战9年，约100万高卢人被杀，近100万人沦为奴隶。他以罗马士兵和高卢人民的鲜血确立了罗马奴隶主统治阶级对高卢的统治基础。从此，高卢纳入罗马国家的版图，开始了高卢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罗马化时代。

恺撒征服高卢后，没来得及建立一套完整和有条件的政治行政制度，即被暗杀身死。公元前27年，他在政治上的继承人屋大维就任国家元首，成为没有君主称号的君主。这时罗马已是一个包括整个地中海地区，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为维护地中海地区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保障罗马和各行省奴隶制经济的发展，屋大维实行独裁政体，着手建立帝国官僚制度。当时，各行省以其丰饶的资源、源源不断的税收和众多的人口在罗马帝国内处于重要地位。帝国初期，3/4的人口居住在行省，岁收几乎全部来自海外。为此，屋大维整顿改革了行省统治制度，把行省分为元老院行省和元首行省。元老院行省由元老院任命执政官统治，元首行省直属屋大维统治。

高卢紧靠意大利半岛，濒临地中海和大西洋，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每年向罗马交纳巨额赋税。还在恺撒统治时，高卢的贡税达每年4000万塞斯提斯，财政经济上对罗马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27年，屋大维在那榜行省以外的高卢建立三个元首行省，即凯尔特行省、比尔及行省、阿基坦行省。元首任命的行政长官特使任总督，总督驻在地分别为卢格敦（今里昂）、兰斯和桑特（后为波尔多）。这三个行省连同受元老院治理的纳尔榜行省共辖90个左右的州，每州以一个中心城市为首府，包括几个城镇，一些村庄和庄园。地方政府仿照罗马的制度，选举任期一年的行政长官，或接受罗马派遣的官吏进行治理，向帝国交纳赋税，但在内部事务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罗马政府对高卢的上层人物实行拉拢收买的政策。高卢原有的氏族贵族在恺撒的征服战争期间发生变化，有的因反抗罗马而遭消灭，有的与罗马合作或投降而保持原来地位，并被罗马赐与土地和奴隶，成为新兴的奴隶主阶级。公元48年，克劳狄在位时授予高卢贵族以罗马公民权，以后又有选择地将一些贵族补充进罗马元老院。高卢爱杜依邦中某些上层分子是第一批成为罗马元老的外省人。罗马政府还培植高卢贵族，让他们担任行政机关的官员，在罗马的监督和帮助下管理地方事务，或担任由高卢人组成的罗马辅助部队的司令，高卢居民凡志愿加入罗马军团者，一入伍就取得罗马公民权，退役后能获得土地和养老金，成为当地显贵。公元73年，皇帝韦帕芻把高卢和西班牙的千余家显贵和奴隶主富户迁到罗马，将他们充实进元老院或列为骑士等级。允许他们在罗马正规部队中任军职和担任财务官、督察官等政府高级职务。

罗马在政治上对高卢进行统治的同时，还竭力从文化上推行拉丁化。由于高卢人始终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就为拉丁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拉丁文是官方使用的文字。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是全国的正式语言，政府官员、军人、商人都必须使用它，拉丁语也是与帝国境内其他各地通商、联系的用语。它先是被高卢上层人物接受，然后又变成一般人民的语言。高卢地区的拉丁语经过长期演变成为中世纪的罗曼语，后来逐渐发展为现代法语。

罗马在宗教方面也进行了渗透。征服高卢后不久，在鲁格敦建造豪华的

罗马女神祭坛，以罗马化的高卢贵族为祭司。高卢原有的多神自然崇拜与罗马的多神教逐渐混合，一些高卢神慢慢具有罗马神的性质。公元前12年，奥古斯都在里昂召集高卢三行省64个邦的代表成立行省大会，进行崇拜罗马和奥古斯都的仪式，规定每年8月1日举行同样的集会表达对罗马的忠诚。虽然行省大会并不是行省管理机构的组成部分，也无权干预行政事务，但它以宗教联盟和宗教活动的形式加强了帝国在高卢的统治体制，有助于调整各行省内部的关系，后来成为沟通行省与罗马政府、皇帝本人的联系渠道之一。

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和行省政策，在帝国初期曾受到包括一些贵族在内的高卢人的反抗。普通高卢人遭受本地贵族和罗马政府的双重压迫，不愿做被征服的“蛮族”，部分贵族也不甘屈从罗马的统治。他们常领导人民进行反罗马的斗争。公元21年，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高卢贵族朱利厄斯·弗洛勒斯和朱利厄斯·萨克罗弗分别带领德来维里邦和爱杜依邦起事，但起义很快为罗马所镇压。公元68年，担任行政长官和副将的高卢贵族尤利乌斯·文代克斯利用罗马皇帝尼禄统治不得人心，人民中普遍存在不堪忍受苛捐杂税的不满情绪，乘机聚集10万人的义勇队发动兵变，宣称要把国家从暴君手里解放出来，但不久即遭失败。公元1世纪高卢境内的反罗马斗争，具有被征服者与征服者矛盾的性质，有的兼有农民、城市贫民反抗新老贵族的性质，曾使罗马统治阶级惊慌失措。然而这些斗争在帝国境内毕竟只是局部的动乱，并没有动摇罗马对高卢的统治，却促使统治者更多采用怀柔绥抚手段，加速高卢贵族与罗马奴隶主阶级溶为一体的过程，以获取高卢奴隶主对帝国政权的支持。同时，罗马政府给高卢地方政府一些有限的自主权，授予全体高卢居民罗马公民权，以此缓和与高卢统治者的矛盾。通过这些措施，罗马扩大了在高卢的统治基础，在没有派遣大批驻军，没进行直接军事移民的条件下，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

[奴隶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高卢地区在被征服的过程中进入阶级社会，形成了奴隶制生产关系。纳入罗马帝国的统治网络后，部族间纷争不息、动乱的局面基本结束。同时，罗马废除了与奴隶制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城邦共和制度。将近200年里，在较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高卢经济和文化获得明显发展。

为了镇压高卢境内的反抗斗争，便于调动驻扎军队，后来为对付东北边境上日耳曼人的进逼，罗马在高卢人原有的基础上修筑了较为完备的道路系统。公元前39年至公元16年建成以鲁格敦为中心，贯穿全境的4条干线。并把内河运输联系起来，形成以罗讷河和索恩河为干道，连结大西洋和地中海的水路运输网。坐落于罗讷河和索恩河汇合处及几条大路交叉点上的鲁格敦是高卢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一些港口和位于水陆交通要冲的内地城市成为贸易集散地。纵横成网的河道和大路，为加速高卢各部的政治统一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罗马征服高卢后确立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其地产形式，既有大土地所有制，也有中小土地所有制。罗马皇帝是最大的土地所有者，皇室领地遍布高卢全境。臣服罗马的高卢原有部落贵族以及靠经营商业、手工业发财致富的外来移民也在高卢购置地产。大农庄一般由监工管理，役使整批奴隶劳动，或租给佃户（自由农、破产农民和被释奴隶）耕种。中小农庄主有退役老兵、致富后的小手工业者、商人。他们或自己经营，或由监工经营，役使奴隶和雇工劳动。农业生产从以前单一的种植谷物发展为多种经营。由于

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葡萄和橄榄树种植业迅速盛行起来。谷物、葡萄酒、橄榄油、火腿等农副产品远销至意大利各城市，甚至东方各行省。与农牧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的门类、产量也有很大发展，在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采矿、采石、冶金、制陶、毛纺织品等部门都处于当时领先地位。其它如木材、皮革、五金、服装、武器等生产也有较快发展。高卢有丰富的矿物资源，金、银、铜、铁、铅等种类矿藏皆具备。盛产花岗石、大理石、石灰、石膏、沙子等建筑材料。帝国时期，大量开采矿藏和建筑石料。石头建筑逐步取代高卢原有的泥皮草房。矿山和石坑大多属于皇帝和政府，由皇室奴隶和被释奴隶进行开采，或租给承包人经营开采。传统的金属冶炼业，尤其是冶铁和青铜冶炼在罗马统治期间成为手工业中最活跃的部门。大小铁匠作坊遍布全高卢，生产各种武器和工具，高卢制造的刀剑闻名意大利。制陶是仅次于金属冶炼的重要手工业部门。2至3世纪，高卢的制陶业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有惊人发展。陶瓷产品在帝国市场上取代了意大利康帕尼亚的陶器，远销多瑙河下游。陶器大多饰以造型图案或几何图案，偶尔饰以绘画。高卢还是罗马最主要的毛麻织品制造地区。黑色毛外套、羊毛毯子和毛被等产品深受当时意大利居民欢迎。

公元初几个世纪中，高卢的手工业生产以小型作坊为主，带有家庭工业的性质，规模较小，设备简陋。作坊主使用一两个奴隶或雇少量自由劳动者进行生产。仅制陶和纺织业中有少数使用数百奴隶和被释奴隶从事生产的大工场。丰富的天然资源、方便的交通网和广阔市场所提供的良好条件，使高卢进入奴隶社会后取代意大利成为罗马帝国西方诸行省中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

罗马征服高卢后，凯尔特人原有的寨堡部分已毁于战火，另一些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为城市。同时，陆续出现一批由外来移民建立的新城镇。高卢城镇在布局和建筑风格上吸收了罗马城市的特点。街道笔直、整齐，呈南北、东西走向。市中心为一大广场和包括政府机关、神庙、竞技场、大浴室在内的一批公共建筑。周围是店铺、作坊、民房和富有者的住宅。城市筑有围墙，城门坚固宏伟。至5世纪，全高卢有100多座城镇，为当地的行政中心或手工业生产中心。这些城市和建筑是古罗马和古高卢文化的结晶，炫耀着高卢——罗马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许多遗迹，如尼姆和阿尔的圆形竞技场、奥朗日的凯旋门、奥顿和特里夫斯的拱门等，都成为今日法国的文化名胜。

三、罗马帝国晚期的高卢

[罗马统治的危机]从2世纪末到3世纪末，罗马帝国出现了政治经济的全面混乱。城乡经济衰落、国库空虚、政局动荡、内战不断发生。罗马帝国这段时期的危机称为“三世纪危机”。产生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奴隶制经济的衰退。从2世纪中叶起，罗马帝国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战争来掠夺奴隶，而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压迫，又造成大量奴隶死亡。2世纪后叶，罗马奴隶人数减少奴隶价格上涨，广泛利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矿山和手工作坊已无利可图，难以维持下去。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枷锁。

到3世纪，罗马社会经济急剧衰退。经济的倒退使赋税收入减少，加之宫廷奢侈糜费、官吏贪污成风、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大量铸造不足值的劣币，这又促成物价上涨，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社会经济全面衰退的情况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化、政权不稳定。中央政府的力量越来越削弱，地方势力割据称雄。192年，康茂德皇帝被杀后，近卫军和各行省的统帅纷纷拥兵自立为皇帝，相互间展开内战。253—268年，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权几乎全部瘫痪。名义上虽然还有皇帝，但各行省的军队统帅都拥兵割据，成为地方上的实际统治者。

258年，高卢驻军司令官波斯特模率军脱离罗马，自立为皇帝，建立独立的“高卢帝国”，自设行政机关，自铸货币，统治范围除高卢外，还包括日耳曼、不列颠和西班牙。268年，波斯特模为士兵所杀，高卢分裂。南部拥立维克托里努斯为皇帝，北部以玛里乌斯为皇帝。不久维克托里努斯击败玛里乌斯，成为全高卢的统治者。高卢帝国是指挥官军事割据的产物，它并无牢固的社会阶级基础，从一开始就面临罗马皇帝的讨伐，驻扎在莱茵河畔长期效忠于中央政权的军团的敌视，与其它军事割据者斗争及内部各级指挥官的争权夺利。这一局面持续到273年，高卢皇帝泰特里克为镇压国内起义，向罗马求援，答应交出军队，高卢才重新归并罗马帝国。

[巴高达运动]罗马帝国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使人民遭受莫大的苦难。小农在重税、暴政、战乱的重压下，往往沦为隶农，处境和地位与奴隶越来越相近。城市的中下层也日益贫困、没落。高卢地区的经济自2世纪末起呈现停滞，手工业生产出现衰落，商品行销范围缩小。破产的农民中间不满情绪加剧，被压迫者同压迫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更加尖锐。终于在269年爆发了奴隶、隶农的大起义——巴高达运动（高卢语巴高达是战斗者的意思）。起义者乘高卢脱离罗马，统治阶级力量薄弱之机，建立以农民为步兵、牧人为骑兵的军队。占领大片农村地区，夺取大庄园，杀死或赶跑庄园奴隶主，攻陷城镇，打击豪富贵族，剥夺其财产。攻占奥古斯托登城后许多同情起义的手工业者、国家武器工场的雇工及其他城市贫民加入义军。巴高达运动声势浩大，斗争席卷全高卢。在高卢皇帝泰特里克与罗马的联合镇压下，起义一度转入低潮，283年，斗争再度爆发，义军推举埃里安和阿芒德为皇帝，自铸钱币，管理地方事务。285年，罗马攻克马恩河与塞纳河汇合处巴高达运动的主要基地，以血腥的屠杀暂时平息了起义，在全高卢重建罗马的统治。

巴高达运动是罗马帝国政治经济危机的产物，是高卢境内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与同时发生在埃及、西西里、阿非利加等行省的起义一样，反映出帝国政府竭力维护、加强的奴隶制度已开始走向衰落。远离帝国政治中枢，

充满着激烈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地区，成为罗马帝国奴隶制统治锁链上最薄弱的环节。这些地区奴隶、隶农和人民的斗争成为冲击、打碎西罗马帝国政权，促使西欧奴隶制度崩溃的催化剂。

[民族融合和罗马统治的终结] 高卢从原始社会起，就是各民族交汇、融合，不同文化互相影响、渗透较为明显的地区。公元前1千年代前半期，凯尔特人在法国出现并同化当地居民，是高卢原始社会晚期最大的一次民族融合。这一持续数世纪的融合是通过凯尔特人诸部落联盟的迁徙、征战，与当地原有居民杂居而实现的。这一融合在文化上表现为凯尔特人的拉登铁器文化传遍全高卢，在体质形态上表现为形成凯尔特人与当地居民混合的高卢人、比尔及人、阿基坦人。

高卢被征服并纳入罗马帝国版图后，开始了高卢历史上第二次较大的民族融合。这次融合是在政治统一的基础上，通过高卢人的原始文化与罗马奴隶制文化的撞击、相互吸收而实现的。它表现为在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讲拉丁语的高卢——罗马人。尽管在广大农村，民间拉丁语和高卢语曾长期并用，但拉丁语以其使用者的文明优势逐渐融合了高卢语，同时，具有相当文明程度的高卢人在接受拉丁语时，也以自己的语言对拉丁语施加影响，使高卢拉丁语不同于意大利语族中其它古代方言。

3至4世纪游牧世界中的民族大迁徙，引起高卢境内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帝国初期，日耳曼诸部落是高卢境外最大的一支“蛮族”。公元1世纪，日耳曼人的社会和经济还处于原始发展阶段。他们中有的部落住在高卢东部边境地区，作为罗马的盟友向罗马交纳贡税，为辅助部队提供兵员。有的则敌视罗马。罗马三大军事集团之一，大多由高卢人组成的莱茵军8个军团主要驻屯在莱茵河边界上防御日耳曼人。公元83年，罗马皇帝图密善曾亲征莱茵地区，在长约300公里的边境上构筑工事，封闭日耳曼人可能侵入高卢的通路。3世纪时，日耳曼人的原始公社制度进一步解体，在向外征战中形成法兰克、勃艮第、阿勒曼等强大的部落联盟。在欧亚大陆民族迁徙的影响下，日耳曼人诸部落相继掀起一阵又一阵入侵罗马的浪潮。3世纪危机爆发后边境上驻军逐渐减少，大批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阿勒曼人，乘机从莱茵河右岸进入高卢东北部，占领农村地区。罗马无力防御，只得让他们以罗马同盟者的身份定居。不少人深入内地，有的被招至军中，罗马军队中的日耳曼雇佣军，尤其是骑兵越来越多；有的沦为奴隶和隶农。5世纪初，罗马为对付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半岛，调莱茵驻军保卫罗马城，高卢东北部已无兵可守，边界洞开，日耳曼人各支再次涌入高卢。早已在高卢定居的“蛮族”因处处受压迫，随时可能被变卖为奴而乐意投靠入侵的同族人。与此同时，巴高达运动余焰重燃，斗争遍及全高卢。这种形势下，入侵的“蛮族”相继站稳脚跟，摧毁罗马的统治，在高卢的土地上建立起几个王国。419年，西哥特人以图卢兹为中心建立第一个蛮族国家。457年，勃艮第人在罗讷河和索恩河流域以里昂为中心建立勃艮第王国。486年，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击溃残存的罗马帝国军事政治势力，建立法兰克王国，并于5世纪末征服高卢全境。

罗马对高卢500年左右的统治，在奴隶、隶农和人民的暴动起义及蛮族侵入的打击下被摧毁。高卢的奴隶制随之瓦解，日耳曼人解体的公社制因素与高卢内部萌芽的封建因素结合，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基督教开始传播]高卢并入罗马以后，罗马政府对产生于原始社会的特罗依德教，并没有打击或取缔，而是采取利用的方针，把特罗依德教崇拜的神祇搬到罗马神庙中，使其从属于罗马的大神，并奉罗马皇帝为最高祭司。罗马宗教中虽已有主神丘必特，但多神自然崇拜的观念仍长期存在，各地各行业都有自己的守护神。因此，特罗依德的多神崇拜与罗马泛神的一神宗教具有某些共同的信仰特点，在高卢罗马化的过程中，这两种宗教很自然地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宗教形态。它既保留了特罗依德教对自然力量崇拜的观念以及在葬俗等方面的宗教仪式，又吸收了罗马宗教中的因素。特罗依德教崇拜的神灵，其造型原先往往为某种动物，与罗马宗教结合后，神灵都具有人的性质，造型也采取拟人的形象。特罗依德教的神庙原先多为木结构方形、圆形或多边形的小型建筑，后来则采用罗马的万神殿作为供奉神祇的庙堂。无论特罗依德教还是罗马宗教都脱胎于原始社会，带有浓重的原始宗教色彩，信仰基础都还没完全摆脱一城一邦，或某一行业的狭隘范围。罗马进入阶级社会的历史只有几百年，其宗教还没有来得及吸收奴隶社会中哲学、文化意识等方面的精华。特罗依德教是由口传下来的实践和信仰构成的，无完整教义，无宗教典籍，也无宗教教育。与罗马统治以前相比，高卢的特罗依德教除崇拜罗马帝国和罗马君主外，其宗教形态并无实质性变化。当罗马征服高卢和地中海沿岸各国后，摧毁了旧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产生古代宗教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也随之消失。这时，需要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需要。这一新的宗教就是基督教。

公元1世纪初，基督教产生在西亚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中间。这一地区长时期中饱受战祸和民族动乱。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者、奴隶、下层人民的宗教，在它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通过犹太民族文化和希腊文化的交流，吸收了希腊文化和哲学的内容。基督教信仰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宣称上帝对各民族信徒同等看待，宣扬“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这些教义对于当时在政治、经济、法律上都处于无权地位，只能追求精神寄托来摆脱绝望处境的下层人民，具有很大吸引力。加之简化的宗教仪式，使基督教在下层民众和失意的上层分子中迅速传播并战胜其它宗教。

早期基督教认为崇拜上帝与效忠皇帝难以调和，不敬罗马的神，不承认罗马皇帝是神，因而罗马帝国政府视基督徒为“叛逆”，进行迫害。对基督教实行一面打击、镇压，一面争取的政策。基督教在传播中，随着中上层人士入教并取得领导权，政治上早期反罗马的态度转为力求与统治者妥协，罗马政府对基督教也从迫害改为宽容、怀柔、利用。

基督教约在2世纪后期传入高卢，由基督教的一支孟他努派从西亚传至高卢。土耳其出生的教士伊里奈乌于公元160年到里昂传教，177—178年任里昂主教。与罗马帝国其它行省情况不同，基督教被奉为罗马国教以前，高卢的基督徒大多是讲希腊语的外来移民，教士多来自东方，传播范围局限于一些城市内。长期以来，罗马皇帝残酷迫害基督教徒，高卢地区大批教徒被处死。直到4世纪初，才停止迫害。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标志着帝国从迫害改为利用基督教的开始。接着，帝国政权大力扶持基督教会，发还教会产业，允许教会经营工商业，享受免税特权。375年，罗马政府禁止向罗马传统崇拜的神庙献祭，皇帝不再是这些神庙的大祭司。392年进而命令关闭一切非基督教的神庙，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国教，从此基督教成为

罗马帝国唯一的宗教，教会势力迅速增长。罗马政府在扶植基督教的同时，又对教会加以控制，各种特权只给皇帝支持的正统教会，使教会成为维护罗马奴隶制帝国的精神支柱。在高卢，政府强迫人民信奉基督教，停止信奉其它宗教。同时建立正式的基督教会组织，教徒从早期的移民扩至统治阶级上层人士。公元 300 年至 400 年，高卢的教区从 26 个增加为 70 个，主教通常由高卢——罗马贵族担任。皇帝、贵族和社会上层人士捐赠的大量土地、房产、财宝，使教会财富急剧增加。在帝国晚期动荡不定的形势中，中下层居民宁肯以自己有限的产业献给教会，托庇求靠教会特权，以期保障生活。5 世纪时，基督教已把城市异教根除，其势力由城市伸入农村。教会凭借拥有许多庄园、领地，以及众多的奴隶和隶农，与信奉基督教的世俗大庄园主勾结，依赖统治阶级的暴力在农村传播基督教。基督教最终取代罗马化的特罗依德教成为高卢唯一的宗教。

第二章 法兰克人与法兰西人 (5—11 世纪)

第一节 法兰克人国家

一、法兰克王国

[民族迁徙与高卢居民的变化] 罗马帝国从 3 世纪出现危机后，原住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地带的日耳曼人，加快了向罗马帝国境内侵徙的步伐。4 至 5 世纪，西哥特人、勃艮第人、法兰克人等部族举族入侵，分据高卢。

武装殖民的开路先锋是西哥特人。他们原居罗马帝国东北部，4 世纪下半叶，受到来自中亚的匈奴人的威胁，开始向西迁徙。公元 378 年安德里诺堡战役，西哥特人打败了罗马帝国的军队，410 年西哥特人又洗劫了罗马城，随后占领了高卢南部阿基坦地区，以图卢兹作为首都，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其疆域包括卢瓦尔河以南的西南高卢和比利牛斯半岛的大片土地。在西哥特人统治下的阿基坦，罗马高卢贵族的地产大多未受损害，他们依然按罗马帝国时的方式生活，罗马文化所受到的冲击不大。507 年图卢兹被北部的法兰克王国所占，西哥特人大多迁至西班牙，阿基坦地区转归法兰克王国，但法兰克人从未在此建立过直接统治，因而阿基坦人的罗马传统也未曾中断。6—7 世纪，瓦斯孔人徙入阿基坦，后来集中居住在加斯孔尼地区，较多地保存了自己的传统。因此，高卢南部地区逐渐形成了不同于北部的独特文化。

5 世纪初，当西哥特人盘踞高卢西南部时，高卢东南部为勃艮第人占领。勃艮第人以里昂为首都，建立了勃艮第王国。6 世纪初，勃艮第王国被法兰克王国吞并，但勃艮第人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却长期保留下来。

在北方，法兰克人是最强大的部族。在法兰克人和罗马高卢人之外，还有其他部族。公元 5~7 世纪，凯尔特人一支布列顿人从不列颠岛迁居高卢西部的阿莫里克半岛，聚族而居，这里后来称为布列塔尼。布列顿人几乎完整地保留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习俗。在高卢东部，阿勒曼人定居在阿尔萨斯。9—10 世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诺曼人入侵法国，又在诺曼底等地定居下来。至此，构成近代法兰西民族的部族已基本齐全。这些不同的种族和部族入居高卢后，大都保持着自己的法律、语言和风俗习惯，形成了不同特点的文化传统，并被长期保存下来。

“蛮族”徙居高卢，是法兰西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奠定了法兰西民族的种族基础，对法兰西民族的人种构成，文化和政治传统的多样性，具有深刻的影响。

[法兰克人征服高卢和克洛维的统治] 法兰克人是日耳曼人一支，居住在莱茵河右岸。公元 241、242 年，曾与罗马军队发生战争。从 3 世纪中叶到 6 世纪，法兰克人越过莱茵河向罗马帝国侵袭、移民，逐渐占领了卢瓦尔河以北高卢的大部分地区。5 世纪下半叶，法兰克诸部落中以萨利安法兰克人和利普利安法兰克人两支最为强大。481 年萨利安法兰克人的一个首领契尔德利克亡故，15 岁的儿子克洛维成为萨利安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之一，这时对法兰克人威胁最大的是苏瓦松地区的“罗马人的国王”西格里乌斯。西格里乌斯的父亲艾吉第乌斯原是罗马帝国驻高卢的将军。462 年他宣布拒绝承认

罗马皇帝的权力，以苏瓦松城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国家，其疆域包括法兰西岛和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486年克洛维联合利普利安法兰克人和住在康布雷的法兰克人攻打苏瓦松，打垮了西格里乌斯，夺取法兰西岛，并从都尔内移都巴黎，向南扩张。

公元496年，克洛维率三千亲兵在兰斯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这一举动得到了教会和高卢罗马贵族的热烈称颂。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基督教会和罗马贵族失去了靠山，他们急于在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中寻找自己新的政治支柱。但是当时帝国境内的日耳曼各族都信奉阿里乌派异端。宗教对立使他们敌视这些蛮族国家。克洛维率法兰克亲兵皈依天主教，自然使基督教会和罗马贵族为之振奋。维也纳主教阿维图斯写信绘克洛维说：“你的信仰是我们的胜利，……神圣的天意已赋予你作为我们时代的主宰者”。罗马教皇阿那塔秀斯二世致书克洛维希望他成为支撑基督教会的“铁廊柱”，为此基督教会也“将赋予你对你所有敌人的胜利”。克洛维不失时机地将教会和罗马贵族的支持变为自己征服扩张的工具，把自己扮作天主教会的保护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公元500年，克洛维征服了勃艮第王国，507年又将西哥特人赶出了高卢，508年东罗马皇帝授予他执政官的称号。在克洛维去世前，高卢大部分地区已被统一起来。克洛维成为高卢的最高统治者。

克洛维一生除开土扩疆和皈依基督教外，还一直致力于清除法兰克人内部的竞争势力，加强自己的权威。当克洛维成为一支法兰克人的军事首领时，法兰克人并不统一，而是分为若干不同的部落，各个部落都是独立的，各有自己的国王（首领）。在数十年之内，克洛维努力剪除竞争对手，统一法兰克各部。他设计杀害了利普利安法兰克人和法兰克其它部落的首领，甚至将自己的亲属也残杀殆尽。晚年，克洛维不得不承认：“我现在就象一个孤独的香客生活在陌生人中间，我已没有任何亲属活下来，在我遇到灾难威胁时没人能帮助我了”。正是在其它部落首领和自己亲属的血泊上，克洛维完成了法兰克人各部落的统一，完成了由军事首领向国王权力的转变。

[墨洛温王朝]511年克洛维去世，法兰克王国遗留给他的子孙去统治，被称为墨洛温王朝（481—752）。墨洛温王朝历时241年，其间有28位国王当政，平均每人任期只有8年零7个月。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每代国王死后，都由其儿子平分国土，因而在28位国王中，仅有5位国王取得过国家的表面统一，而真有实权的仅克罗泰尔一世（558—561），克罗泰尔二世（615—629）和达戈贝尔特（629—639）三人，总共统一的时间不到30年。可见，分裂多于统一。墨洛温王朝政治黑暗，手段残忍，秽行昭著。克洛维死后，他的4个儿子蒂埃利、克洛多米尔、西尔德贝尔特和克罗泰尔瓜分了国土，后来克洛多米尔在攻打勃艮第人时战死，他弟弟克罗泰尔霸占了他的遗孀，克罗泰尔和西尔德贝尔特瓜分了国土，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克洛多米尔的两个儿子，以绝后患。558年克罗泰尔合并了其他弟兄的领地，取得了国家的统一，但561年他的4个儿子又重新瓜分了他的领土，567年占据巴黎地区的长兄死后无嗣，其他弟兄三分其领土，渐渐形成了东部的奥斯特拉西亚、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及勃艮第第三个王国。此外，还有阿基坦公爵领地，处于三国共管之下。6世纪下半叶，纽斯特里亚王国和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实权分别授于两国王后弗蕾代贡德和布吕娜奥手里，两国互相争夺领

据传克洛维的祖父叫墨洛温（Meroveus），故称。

轧，阴谋频频，杀伐迭起，政治极其黑暗。达戈贝尔特在位时(629~639年)，国土一度统一，政治稍显清明，局势也较为稳定。在他之后，墨洛温王朝的12位国王懒散成性，不视政事，被史家称为“懒王”。

[“懒王”和宫相]为取得封建贵族的支持，墨洛温王朝历代国王把大量土地赏赐贵族，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培植了贵族势力。王室成员勾心斗角，各植朋党，互相倾轧、残杀，也使国王权威跌落，贵族力量趁机发展。某些当政国王或童稚登基，或愚昧无能，难理朝政，又往往为封建贵族参政篡权打开方便之门。639年国王达戈尔贝特死后，继位的10多位国王大多手无实权，有的干脆为大贵族作为傀儡拥立，他们每日乘舆服辇，奔走领地之间，置身狗马声色之内，国家大权完全落入宫相之手。

宫相最初是王宫的管家，只是国王的一个仆人。但因其地位显要，渐渐执掌机要，不仅控制内政，也成为军队的最高首领。大多数宫相由国王亲自任命，但也有一些由贵族推举产生。宫相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有些宫相积极支持国王反对贵族，也有些宫相率领贵族对抗国王。纽斯特里亚受罗马影响较深，罗马皇权至高无上的原则仍在流行，这里的宫相大多数支持国王。奥斯特拉西亚则是日耳曼人集中的地方，它的宫相往往成为封建贵族的代表。墨洛温王朝晚年，奥斯特拉西亚和纽斯特里亚两国不断争斗，实际上是两国宫相之间的斗争。在7世纪中叶，纽斯特里亚宫相艾布罗因居优势，他作出种种努力，反对贵族，巩固王室权力。681年艾布罗因被刺身亡，687年他的后继者被奥斯特拉西亚宫相赫斯塔尔的丕平战败，丕平遂成为三国的实际统治者。

丕平家族是奥斯特拉西亚最富有、最有权势的大贵族家族之一。自从其祖父“莱登的丕平”(639年卒)起，这个家族世袭担任奥斯特拉西亚宫相。赫斯塔尔的丕平取得整个法兰克王国实权之后，做了三件事：一是征服莱茵河右岸的萨克森人、图林根人、巴伐利亚人等日耳曼人部族；二是在奥斯特拉西亚恢复已废弃的五月校场游行等法兰克人的古老传统，以笼络法兰克人的民心；三是积极支持基督教传教士在莱茵河右岸日耳曼人各族中传教，以此取得教会对自己的支持。这些活动增加了丕平家族的声威，巩固了丕平家族的地位。

[查理·马特]715年，丕平的私生子查理·马特继任宫相。他拥立了墨洛温家族的克罗泰尔四世作为傀儡，自己以宫相和奥斯特拉西亚公爵的身份掌握实权。执政以后，他率军打败了萨克森人从北部，阿拉伯人从南部对高卢的入侵。715~718年，他又率军抵御莱茵河右岸佛里松人和萨克森人的进攻，并深入腹地，征服了萨克森人，迫其称臣纳贡。此时，占据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也大举北侵，占领郎基多克，夺占那旁内作为中心，并继续北侵。732年，在普瓦蒂埃，查理·马特的军队击败了阿拉伯骑兵。从732到739年，他除了继续镇压北部萨克森人的反叛外，在高卢南部多次与阿拉伯人交手，将阿拉伯侵略军赶出了高卢。

查理·马特还致力于高卢法兰克人的统一。掌握实权后，他依靠贵族的支持，同对手纽斯特里亚王国宫相展开角逐。719年在苏瓦松战役中，他击败了纽斯特里亚及其盟友阿基坦公爵的军队，此后又迫使阿基坦公爵向他宣誓效忠。734、736年他最后用武力统一勃艮第。在抵抗阿拉伯军队取胜后，查理又把南部普罗旺斯的许多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到741年去世时，查理·马特实际上已是整个高卢唯一的统治者。

查理·马特积极推行采邑制度，给卡洛林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为抵御外侵，实现法兰克各国的统一，查理亟需建立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强大军队。为此，他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从政敌手中没收的土地以及从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教会和修道院手中夺取的大量土地，作为采邑分授给他的属下，属下以向查理效忠，服兵役为条件占有和使用这些土地，此即采邑制。采邑制在查理以前早见记载，但只是在查理统治时期才大规模推行。对王室和大封建主说来，采邑制比无条件的土地封授更为有利，不少封建大贵族也仿效查理，向部属封授采邑。采邑制的推行，一度加强了卡洛林家族对贵族的控制。

为推行采邑制，查理曾侵害了某些教会贵族的利益，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危害他与教会的关系。查理积极支持和庇护圣·波尼法斯等人为首的基督教传教士在萨克森人和其它日耳曼部族中的传教活动，取得了教会的赞誉。查理也尽力谋求罗马教皇的好感，741年查理答应帮助教皇解除伦巴底人对他的威胁，只是由于查理早逝，未能履行诺言。

二、查理曼帝国

[“矮子”丕平与卡洛林王朝的建立]741年查理·马特亡故，两个儿子卡洛曼和“矮子”丕平继承官相职位，平分国土。丕平据有纽斯特里亚、勃艮第、普罗旺斯，并享有阿基坦的宗主权。卡洛曼则据有奥斯特拉西亚、图林吉亚和阿勒曼。北部的萨克森人、巴伐利亚人、南部的阿基坦人趁机叛，以求独立，被赶出高卢的阿拉伯贵族也想乘机入侵。内部，查理·马特的私生子格利普积极网络党羽，策划阴谋，反对两位兄长，要求继承权。在内患外忧之下，丕平与卡洛曼通力合作，平定了内患，战胜了外寇。746年，丕平威逼克洛曼遁入修道院，他的领地尽归“矮子”丕平，丕平成为高卢的唯一统治者。751年丕平得到教皇的支持，在苏瓦松称王，卡洛林王朝正式建立。

丕平是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取得王位的，联合教会是他的一贯政策。他对其父查理·马特征用教会地产而封授的采邑，作了新的规定：俗人持有教会地产作为采邑，应与教会共享地产的收入，持有教会地产作为采邑的骑士死后，其采邑应归还教会；因被剥夺地产而导致贫困的教会，其土地应予归还，旨在保护教会利益。登基称王之后，丕平更是竭力谋求同教会和教皇的友好关系。753年，罗马教皇受到伦巴底国王的威胁，派人向丕平求救。754、756年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了伦巴底人，将从伦巴底王国夺来的意大利中部地区赠给罗马教皇。这一赠礼，奠定了世俗教皇国的基础，史称“丕平献土”。由丕平巩固起来的这种政教合作关系，在他的儿子查理曼手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查理曼与查理曼帝国]丕平死后，按照法兰克人的惯例，他的两个儿子查理与卡洛曼平分国土。771年卡洛曼早逝，查理合并其弟的领土，成为高卢的唯一统治者。历史上也称查理为查理曼，意为“查理大帝”（742—814年）。

查理曼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他一生共进行了53次扩张战争。查理曼即位之初，首先遇到阿基坦人的再次反叛，他发动3次战争，平息叛乱，后来立其三子路易为阿基坦国王。773—774年，查理曼应罗马教皇请求出兵意大利，讨伐威胁教皇的伦巴底王国，经过5次重大战斗，打败了伦巴底人，俘其国王，并其领土，将其儿子丕平立为意大利国王。778—811年查理曼率军向占领西班牙的阿拉伯人进军，经过12次战斗，夺取了大片土地，在此建立了“西班牙边区”。自772年开始，查理曼发动了征服萨克森人的战争，受到了自由的萨克森人坚决抵抗，他将军事征服、强制改信基督教以及军事殖民等手法并用，化了30多年时间，经过18次战争，才得以征服。此外，他还对多瑙河流域的巴伐利亚人、阿瓦尔人、莱茵河北岸的弗里松、斯拉文人等部族发动战争，扩疆掠土，扩大统治范围。经过这一系列战争，查理曼建立起一个西起大西洋，东止多瑙河，南到地中海，北抵波罗的海，其地域囊括今之法国、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及匈牙利、西班牙和意大利2/3以上土地的庞大帝国，史称查理曼帝国。

查理曼继续推行联合教会的政策。他对非基督教地区进行军事征服的同时，往往伴以本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他打垮了侵扰教皇的伦巴底王国，归还

这项法令是否执行过，有争议。不少史家认为只是一纸空文，未予实行。

了为伦巴底人侵占的教皇领地。为报答他，在 800 年圣诞节，当查理曼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作祈祷时，教皇利奥三世突然把一顶罗马皇帝的金冠戴到了他的头上，集合在教堂内的群众马上高呼“最虔诚的奥古斯都、伟大的创立和平的罗马人的皇帝查理万岁！永远胜利！”经过这戏剧性的一幕，在西欧历史上又出现了皇帝，又一次出现了所谓的“罗马帝国”。

与墨洛温国王和查理曼的祖先相比，查理曼有更大的抱负，也有更多的精力和才能。他不仅仅是一个置身马背上的军事统帅，也是一位封建主阶级的政治家，对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查理曼帝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与墨洛温王朝差别不大，地方上设伯爵区，由伯爵统辖。地方伯爵中有不少是查理曼的亲信，但大部分人是原来此地的地方大贵族。他们往往拥有大量地产，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和势力。有的世袭据有伯爵官职。作为伯爵，他们拥有政治、军事、司法和经济上的各种权力，具有很强的分离倾向。查理曼为有效地控制地方的伯爵作了种种努力。首先，他试图在政治体制上加强对伯爵的监督，禁止一个伯爵兼职几个伯爵辖区，规定伯爵们要经常向皇帝参觐交待，在边界地区，任命亲信担任边地侯，统领伯爵区。查理曼还定期向各伯爵区派出巡按使，监察地方，这些巡按使被称为“皇帝的眼睛”。其次，查理曼为保证伯爵们对自己的忠诚，与他们建立人身从属联系。他向伯爵们授予采地，伯爵们则向他宣誓效忠，建立起领主与附庸的依附关系。第三，除伯爵外，查理曼还向大量地方封建贵族授予采地，建立领主与附庸关系，这些人被称作“国王的附庸”，不受地方伯爵的管辖，自己享有司法、征税等权力，并对地方伯爵起监督和钳制作用。

为巩固帝国的统一，查理曼投身于频繁的立法工作之中，试图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订出可行之全国的法规，不论那个种族，都必须遵守。有人统计，查理曼制定的敕令共有 65 个，包括 1151 项条款，其中 293 项是有关政治的，130 项是关于刑法的，305 项是有关教会法规的，110 项是关于民事的，87 项是关于道德问题的，85 项是关于宗教的，73 项是关于家内事务的。可见，查理曼的立法活动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查理曼通过行政上对地方的有力控制和制定统一可行的法规等手段，将具有不同的语言、法律、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的许多种族暂时联系在一块，组成了庞大的帝国。

查理曼整肃教会，奖掖文化。他严格帝国内教会的纪律，清除不称职的教士，加强对教士的文化教育，关注文化教育的发展。他举办宫廷学校，招揽当时西欧一些著名的文人学者担任宫廷学校的教师，教授文化。查理曼本人带头向他们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还责成教士在乡村发展教育事业。

查理曼还采取措施鼓励和保护工商业，修辟道路，维护交通，建立庙会，以利工商。

查理曼为建立和巩固庞大帝国做了不少事情。其功业，比他的前人超之甚远，比他的子孙也高出一筹。查理曼堪称是新兴封建主阶级的英雄人物。尽管如此，他仍然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分散落后的社会状况。随着查理曼的去逝，帝国也很快分裂和瓦解。

[查理曼帝国的分裂]查理曼帝国的分裂和瓦解是必然的。因为：第一，查理曼帝国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在帝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意大利和高卢是古罗马奴隶制影响较深的地区，在这里封建化过程已有了很大的进展，而萨克森等德意志地区却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原始社

会的残余还很浓。在当时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各地区之间缺乏经常的经济联系，维系一个庞大帝国的经济条件尚不存在。除去经济的分离外，还有种族的分离。查理曼帝国的臣民由若干不同种族、部族的人们组成，各个种族、部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法律和自己的风俗习惯，缺乏一个统一国家存在所必需的社会和文化基础。

第二，从墨洛温王朝到卡洛林王朝，历代国王为了取得封建贵族的支持，都大量向贵族封授土地，或为封土，或为采邑，有时还赋予他们对土地上农民的政治统治权力。这种旨在加强王权的措施，本身便培养了贵族的分裂势力。查理曼也难脱旧俗。他向手下的贵族广泛封授采地，虽然暂时取得了贵族的效忠，却埋下了分裂的隐患。在查理曼生前封建贵族已开始将采地视为己有。早在 806 年，查理曼已发出抱怨：“那些从我们手中得到采地的伯爵和其他采地持有者已将采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了！”查理曼死后，各地的贵族逐渐发展成无法驾驭的封建分裂势力。

第三，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亦使国家统一不可能长期维持。法兰克人的继承制度是诸子平分土地，这一制度曾使墨洛温王朝长期陷于分裂，它同样威胁着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在世时，他的几个儿子已被封授为意大利、阿基坦等地的国王。多亏两个儿子早死，查理曼帝国才得以完整的遗传给了“虔诚者”路易。但在路易统治时（814—840 年），为了继承问题，常常与他的子侄发生内讧。路易死后，他的三个儿子终于在 843 年签订了“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条约规定：些耳德河和莱茵河以西地区归秃头查理，称西法兰克王国，即后来的法兰西，莱茵河以东地区归日耳曼路易，称东法兰克王国，即后来的德意志，介于两国之间的地区，北起北海，南抵意大利中部，归长兄罗退耳，称意大利王国。罗退耳称袭帝号。查理曼帝国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法兰克人的国家制度

[国王和皇帝的权力]征服高卢之前，法兰克人尚处在军事民主制阶段。征服扩大了军事首领的权力，使克洛维从一个军事首领转变为国王。

墨洛温王朝是罗马文化与日耳曼文化并存并迅速融合的时期。因而，这时的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无不具有双重特点。罗马与日耳曼二元因素的并存和结合，也使社会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具有不稳定性。

国王是国家的统治者。王位由墨洛温家族世袭占有。象罗马皇帝一样，法兰克国王的权力在理论上不受任何限制，是最高立法者，也是最高司法者，是最高军事领袖，也是最高行政官。对臣民，国王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臣民除了公开反叛或谋杀君王外，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抗国王意志。但实际上，法兰克国王的权力是受很大限制的。在当时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情况下，法兰克王国只是在名义上才存在。这时，没有固定的疆域范围，没有系统的国家官僚机构，没有完整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央没有集权的官僚机器，地方上多由伯爵等地方贵族执掌权柄，他们往往各自为政，不受国王驾驭。在墨洛温王朝后期，大权旁落宫相手中，国王仅是傀儡和点缀品而已。

到卡洛林王朝，国王的实际权力依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查理曼是卡洛林王朝最有实权的皇帝，他当政时期，法律政令皆出他一人之手，他把政治统属关系与主从人身臣属关系并举，加上巡安使的监察，一度较为有效地控制了统治地方的封建贵族，使政令行之四方。查理曼头戴罗马皇帝的皇冠，也妄想建立一个象罗马帝国那样庞大而统一的国家。但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这却是一个“徒劳的梦幻”。查理曼靠他的强硬手段和超凡的精力控制了封建贵族，在表面上维持了皇权的强大。但当查理曼死后，皇权又一落千丈，最终化为乌有。

[国家政府机构]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的国家政府机构都很不完备。在墨洛温王朝时国王的宫室既是最高行政机构，又是最高司法机构，也是国王的家室。在王宫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官职，如马官、司厨官、王室总管等等，这些人原来只是负责国王生活的奴仆，后来也兼为王国的军事大臣、财政大臣，总揽一切的宫相等重要官吏。

墨洛温王朝的地方管理体制承袭罗马旧制，全国分为若干个区，与先前罗马的区以及当时的主教区基本相应，每个这样的区都以一个城市为中心，区的最高统治者伯爵，由国王任命，许多伯爵原是国王的亲兵和近侍，甚至国王的某些贴身奴隶也有幸被任命为伯爵。在高卢南部，伯爵职位大多由原来罗马高卢的旧贵族担任。伯爵和教会的主教通常共住中心城市内，分掌政、教权力。伯爵在自己的辖区负责维持治安，开庭审理诉讼案件、征收赋税和统帅军队，原则上是国王在地方上的代理人，但实际上他们常常不听国王调遣，是辖区内的独立统治者。伯爵通常任命一些副伯爵作为自己的助手，后来副伯爵（即子爵）统治一定区域，成为伯爵之下的独立区域。子爵之下，百户是最基本的行政单位。子爵和百户长都层层行使着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的职权。

在遇有战事等情况下，国王还在伯爵之上任命一个公爵，管辖几个伯爵区。通常，公爵的主要职能在军事方面，统帅几个伯爵区的军队打仗。在大多数情况下公爵并没有形成永久的区域建制，它应急而生，势缓人去。但在某些地方，公爵也成为伯爵之上的一级地方长官。

墨洛温王朝的政府机构，从形式上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制，互相统属，但实际上往往层层独立，政令不畅。卡洛林王朝，的行政区划变化甚小，只是在查理曼统治时期，才采取措施，增强中央权力，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查理曼时期的中央机构，除王宫以外，秘书部的作用也十分重要。秘书部的成员大多是教士，他们主要负责为皇帝草拟法令、文书，颁发文告，管理档案，就其职能看，他们主要是皇帝个人的御用秘书。虽然地位不高，但其作用很大。此外，皇帝还经常不定期地召集一些教士、学者、宫廷学校教师、侍从人员和进宫参观的地方官吏及贵族开会，讨论国事。查理曼时期地位最高的中央机构当数公民大会。它源自征服高卢之前日耳曼人的部落会议，但在墨洛温王朝前期，渐被废弃。只是到了墨洛温王朝后期，才被恢复。公民大会原来通常在三月举行，贵族和部分能够自备武器从军的自由民武装到会，称为“三月校场”。到7世纪中叶改在五月举行，称作“五月校场”。在查理曼统治时期，公民大会主要由僧侣和世俗贵族参加，实际上变成了贵族议事会。770—813年查理曼共召开了35次公民大会。会议的召开和讨论的议题都取决于查理曼的个人意志，在会议上教俗贵族们向皇帝汇报地方政务，也审议和表决查理曼草拟的敕令。出席会议的贵族们大都仰承皇帝鼻息，很少听到反对意见。公民会议的作用是给查理曼的个人统治披上集体意志的外衣，也是一种控制地方贵族的手段。

为了严格地控制地方，查理曼还定期向地方派遣“巡按使”。巡按使在墨洛温朝已间或有之，但主要是为了完成军事、司法、财政等特殊任务偶而派遣。查理曼把巡按使的派遣变为定制。他将帝国分为若干巡按区，每年都向各巡按区派出数批巡按使。巡按使通常每次二人，一教一俗，他们传达皇帝旨意，仲裁重大案件，矫正地方弊政。巡按使的定制化一度有效地克制了地方贵族的分离倾向，巩固了帝国的统一。

[法律、财政和军事制度]迁徙高卢之前，日耳曼名族都有自己的习惯法，占领高卢之后，他们开始编订法典，将其习惯法变为成文法。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都编制了自己的法典。大约编纂于克洛维晚年的《撒利克法典》，是研究5、6世纪法兰克社会的重要文献。在墨洛温和卡洛林时期，通行的司法原则是“法随人定”，罗马高卢人使用罗马法，日耳曼各部族实施他们自己部族的法规。卡洛林王朝，皇帝们制订了一些新的法令，不拘种族，行之全国，是统一法律的一种尝试。此外，基督教会使用教会法。12世纪后，“法随人定”的原则让位于“法随地定”，即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法规，反映了种族融合的发展。但法律不统一的现象，在法国一直持续到封建社会完结之时。

墨洛温王朝和卡洛林王朝的司法制度差别不大，皇帝或国王的法庭是最高法庭，伯爵、子爵也都享有司法职权。子爵之下是百户区法庭。在卡洛林王朝，封建贵族的庄园法庭有了很大发展，许多贵族从王室手中取得了私人审判权，行之于庄园上的居民。这一时期，在日耳曼人中主要的司法手段是落后的“神命裁判法”。

墨洛温王朝继承了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向民众征收人头税、土地税和各种间接税，并在道路、桥梁等关隘设卡征税，但捐税负担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加上征税机构不健全，税收制度不久被废止。此后，王室财源主要来自王室领地的收入。因此从墨洛温王朝后期开始，国王们只得乘坐牛车，辗转各王室领地，消费各领地的产品。对于官吏的服役，也不能酬以薪金，只

好封给土地。在自然经济之下，采地是对官吏最便利的报酬方式。

日耳曼各族的军事首领主要是靠了亲兵队的力量征服高卢的。但在日耳曼人中，每一个自由人都有自备武装、参军打仗的义务。一个自由的法兰克人首先是一个战士，战士是他们自由人身份的标志。在墨洛温王朝，军队的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除法兰克人外，一些罗马高卢的自由人也有参军打仗的义务。然而，随着封建化的发展，愈来愈多的自由民开始丧失土地，难以自备武装从军。根据这种情况，8世纪时查理·马特进行改革，将封授采邑和提供军事义务结合起来，法兰克自由民的军事作用和地位更为下降。查理曼统治时期，对军事组织再次进行了改革。查理曼的军事敕令将军役义务基于经济条件之上，将自由民按财产状况分为不同等级，负担不同的军事义务。此后，一般自由人步兵在军队中的作用渐渐削弱，由封建贵族组成的骑兵成为军队中的主要成份，军事制度日益同采地的封授制度密切地结合起来。

第二节 封建制度的确立

一、封建制度的形成

[封建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在高卢统治的崩溃和日耳曼人诸王国的建立，标志着高卢地区进入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在蛮族国家、尤其在法兰克人国家内形成和发展起来，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它适宜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决定的。

首先，在高卢既有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罗马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没落和日耳曼人原始社会的瓦解两种历史发展趋势在封建制度上找到了接合点。

罗马奴隶制生产关系固有的内在矛盾使奴隶制度走向危机。3世纪危机以后，奴隶在生产中的地位日趋下降，而隶农制却得到迅速发展，到罗马帝国灭亡之时，在高卢、意大利等地，隶农制生产已居主要地位。与奴隶不同，隶农在身份上是自由人或半自由人，他们向地产主租佃土地，支付货币或劳役地租。在奴隶制危机的情况下，不少奴隶主也授给奴隶小块土地，让其组织家庭，独立从事生产，主人向他收取货币或实物租，征发劳役。在罗马帝国晚年，主要依靠奴隶劳动的大地产主也还存在，但不多见，绝大多数地产主把大部分土地租佃出去，仅留一小部分自营地，用少量奴隶在隶农、授产奴隶劳役的配合下耕种。这时，最为广泛的生产形式是隶农和授产奴隶的小生产。隶农对地产主有依附关系，但他本身并不为地产主所有，他与地产主的关系主要是基于土地的依附。授产奴隶的经济地位接近于隶农。隶农制生产关系具有封建生产关系的性质。此外，在罗马帝国晚期的高卢还存在着不少拥有土地的个体小农，他们独立地从事小生产。从总的发展看，在罗马帝国晚年以强迫奴隶集约劳动为基础的奴隶大地产正在让位于更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小生产，奴隶让位于各种依附农民，罗马奴隶制社会正在逐渐沿着封建化的方向演变。

征服高卢前的日耳曼人已经发展到原始社会解体的军事民主制阶段。在日耳曼人之中已有了部落贵族、军事贵族与一般平民群众的阶级分化，奴隶制度也已产生。日耳曼人的奴隶大都被授予一定的土地，拥有自己的家室，独立耕作，向主人交纳一定的地租，这种“温和的隶属形式”与罗马帝国晚期的授产奴隶有些相似之处。日耳曼人的基层组织形式是农村公社，土地为公社公有，但分给各家使用。私有成份正在增长。日耳曼人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前夜，小生产已经是他们熟悉的生产形式。罗马高卢和日耳曼人的社会发展都要求采取小生产的生产形式，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是它们的共同归宿。

其次，自然经济的统治，也为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5至10世纪，在高卢地区工商业活动并没有消失，但退居次要地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失去土地，要不流浪，只得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租佃土地，从而与大土地所有者产生土地上和人身上的依附关系，沦为农奴和依附农民。小生产的经营方式、自然经济的主导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是封建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

最后，罗马帝国的崩溃和日耳曼人的建国，打碎了奴隶制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封建政权。封建上层建筑保护和促进封建关系，加速了封建制的

形成和发展。

罗马帝国晚年，虽然在经济关系上封建制已渐占主要地位，但反映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罗马帝国和帝国的法权制度，却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阻碍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帝国晚期的法令，不是根据新的经济发展现实去肯定封建的生产关系，而是坚持用奴隶制的法规去规定人们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在法权上极力把隶农变为奴隶，从而延缓了奴隶制瓦解的过程。新建立的蛮族王国却不同。蛮族国王们将从征服中得来的土地大批赏给亲兵和贵族，创造了一个新的大土地所有者阶层，这些人采用高卢地区流行的封建方式经营土地，是新兴的封建主，他们与原来罗马高卢的封建性大地主共同构成封建主阶级。蛮族王国从本质上讲，是封建主阶级的政权，它们没有奴隶制法权的约束，蛮族国家的法令承认和保护封建生产关系，并努力促进它的发展。蛮族国家、尤其法兰克人国家连绵不断的对外征服战争，实际上也是一种加速封建生产关系形成和发展的手段。因为，法兰克诸王每征服一地，通常要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从而创造出一批批新的封建主和依附农民，扩大了封建生产关系存在的地盘。同时，这些战争也使法兰克国家内部封建主势力发展，自由民不堪军役赋税压榨，走向破产而沦为农奴和依附农民。新兴封建政权对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保护和推进作用。

[封建制度的确立]封建制形成、确立的过程一般称为封建化过程。封建化是指在封建生产关系主导下，各种非封建因素向封建关系的转化。

蛮族征服高卢后，经济成份十分复杂。5世纪时，在土地占有关系上，有贵族的大、中型地产，包括原来罗马高卢大地主的土地和通过赏赐、侵吞而形成的日耳曼人大地产主的地产，也有自由农民小土地所有制，小土地所有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原罗马高卢的小土地所有者。蛮族的侵占，使自耕农民的数量有所减少，不少人土地被剥夺，变成了四处流浪的移民。另一部分是日耳曼人的自由小农，定居高卢之后从“马克”农村公社分得份地，6世纪后这些份地成为私有地。

大地产上的劳动力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奴隶，蛮族的征服一度使奴隶的数量增加，奴隶集约劳动也有所发展。在5—10世纪的高卢，奴隶制度一直存在。853年特里尔地区一个贵族将一块土地，连同96个奴隶，一起赠给教会。也有部分奴隶被授予小块土地，自己经营，向地产主交纳地租并服劳役。二是雇工。这些雇工大都是单凭份地不足谋生的农民，通过受雇而得到一些食物和货币，作为经济补充。三是佃农的劳役。这时佃农形式复杂，呈现出过渡形态，有的是农奴，人身不自由，必须向地产主服劳役，有的虽非农奴，但对地产主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亦须为领主服每周三天的劳役，还有一些佃农保留自由人身份，他们向大地主租佃一块土地，签订租约，然后每年向地主交纳定量的货币或实物地租，不服劳役。也有的是分成制佃农，与地产主对分租地的收入。在这些大地产上，封建性质的人身依附和租佃关系已经深深扎根，但非封建的成份依然大量存在。这些地产的基本性质属封建地产，但很不纯粹。

5—10世纪，这些经济关系尚不稳定，处在变化之中。其变化的基本趋势大致可以从土地关系和人身关系两个方面理解。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上，封建大中型地产侵吞自由小农的土地而发展。侵吞的主要手段一是购买。土地买卖的契约在这时已屡见不鲜，往往是强制购买。802年查理曼曾对某些贵族强制购买贫穷自由人的土地表示不满。814至827年“虔诚者”路易则颁

布敕令，要求保护贫弱者的地产，斥责那些“阴谋强迫弱者向其出卖土地，或者干脆强夺其土地”的权贵。二是所谓“投托”制。软弱的小农或因经受不住强者的侵夺，或承受不了国家的税收和军役负担，或苦于战乱灾疫难以自立，往往将其土地“献给”附近的大封建主，然后再以租佃的形式领回耕种，土地所有权由此而归封建主。

在人身关系上，5—10世纪存在着两种相反的发展倾向。一是奴隶劳动的意义日益减小，奴隶愈来愈多地被授予土地，单独耕作，久而久之，奴隶的法律地位也逐渐上升，接近于不自由的佃农。在卡洛林时期的大地产上，依附佃农的劳役劳动逐渐取代奴隶劳动，一种封建主自营地和依附农民份地相结合的土地经营制度慢慢形成，封建庄园制产生。10世纪后，奴隶逐渐消失，汇入依附农民之中。二是大量自由农民逐渐丧失人身自由，变成农奴等依附农民。各种农民租地形式向以劳役和实物租结合的依附农民份地转化，农民在身份地位上的差异也在逐渐泯灭。这两种相反倾向发展的结果，使蛮族征服高卢时复杂的社会阶级成份逐渐趋向简单化。

在高卢封建化过程中，封建王朝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世纪，查理·马特推行采邑改革，将无条件的封土变成了采地，使土地附着了领主与附庸的各种权利与义务，以采邑为纽带，封建主之间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从采邑改革开始，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具有等级土地所有制的特征。再者，在墨洛温王朝，国王们开始封授“豁免权”。此时，豁免权主要封授教会地产，内容主要是禁止王室官吏进入教会领地实施司法，征收赋税。在卡洛林王朝，国王或皇帝们也大量向世俗贵族封授豁免权，接受豁免权的贵族领地成为不受国家权力影响的独立王国。而且，卡洛林王朝还常常把伯爵等官职作为采邑封授附庸，877年伯爵等官职开始可以合法世袭，伯爵们也将辖区变成了世袭领地，辖区内的居民则变成他们自己的依附农民。到10世纪，一些小的封建贵族也取得领地内政治统治权，将土地占有权与对其领地上农民的政治统治权结合起来。至此，作为封建制度初级形态的领主制最终确立。

二、封建领主制经济和社会关系

[封建领主制]封建经济是一种封建所有者占有生产资料、并用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超经济强制手段，剥削在不同程度上依附于封建所有者的直接生产者的经济形态。法国封建经济的初级阶段是领主制经济。领主制下，封建土地所有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下级封建主以采地形式从上级封建主领受土地，他同样再把土地转授给更下级的封建主。通过土地的层层封授，同一块土地上凝聚了不同的封建主对土地的层层权利与义务，封建主之间身份地位上的等级制也在土地上表现出来。土地的封授有各种条件限制，为接受采地，封臣必须向封主履行一定的义务。采地一般不得转让、出卖。二是土地占有权与政治统治权相结合，公权和私权合一。封建主占有了土地，同时也享有了对土地上农民的行政管辖权和司法审判权。封建主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和种种政治权力，剥削农民。

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典型组织形式是封建庄园。庄园是封建主在经济上剥削、政治上统治农民的基层单位。庄园的规模不等，大的庄园常常包括若干村庄，小的庄园通常为一个村庄。在封建庄园上，土地一般被分为领主自营地与农民份地两大部分。耕作领主自营地的主要劳动力是庄园上的农奴等依附农民，在农忙季节，庄园主还常常雇佣短工劳作。通常，庄园主派管家主持生产，监督劳动。农民份地的土地所有权归庄园主，农民享有使用权。起初，庄园上的农民份地还有法律等级，即自由人份地和不自由人份地，后来两者界限渐渐消失，都成为不自由的份地。庄园上能生产大部分生活必需品。也有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少数工匠，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

法国封建制度形成后，除庄园外尚有其它形式的地产。例如在高卢南部，有些地产没有劳役，封建主与农民的关系主要是租佃关系。也有一些封建主的土地不是领地，而是私有地。此外，封建化完成之后法国仍有一些自由小农的土地。

农奴及依附农民是法国封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其中，农奴地位最低，受压迫和剥削最重。农奴有自己的份地、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因而具有奴隶所没有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农奴仍然是不自由的人，在人身依附于领主，不得随意离开主人，领主可以将农奴连同土地一起转让，赠送和出卖。作为人身不自由的标志，农奴必须向领主交纳人头税；农奴结婚，新娘子在新婚之夜须先陪领主过夜，称作“初夜权”，如同其它庄园的农奴结婚，须向领主交纳“结婚税”；农奴死后儿子继承份地时必须向领主交纳继承税，称“死手权”。在法律上，农奴不得控告主人，不能向国家法庭上诉，农奴的诉讼案件由领主法庭审判。农奴不得参军，亦不得担任教职。

农奴份地的所有权属于封建主，作为土地上的依附关系，农奴要象其它身份的佃农一样，承受封建地租剥削。农奴的地租主要是劳役租，通常每周拿出三天时间为领主耕种自营地，在农忙季节还必须为领主帮忙，提供车马运输等方面的劳役。劳役之外，通常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租。在个别地方没有劳役，征收实物或货币租。在这样的地区，农奴制一般植根不深，瓦解也快。

农奴还要承受领主的禁用权剥削。禁用权最初是一种国王行使的主权权力。由于政治分裂，封建领主也擅自行使这种权力，称作领主禁用权。禁用权的内容非常广泛，例如，可以霸占公共牧场，可征收关卡税，可以攫夺辖

区内农民的各种财产。它实施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农奴，包括辖区内的所有人。这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受到村社农民的强烈抵制，后来禁用权剥削的主要内容固定为强迫农民使用领主的磨房磨面、面包房做面包、榨酒器制酒等等，为此，农民要承受领主的收费和敲诈。此外，基督教会封建主对农民的剥削也很重，这类剥削名目很多，最重要的是什一税。即农民须将总收入的 1/10 交给教会。

农奴之外，还有其它形式的依附农民。而且封建化完成后，不少地区还保留着一些自由农民。在物质生活上，农奴最苦，但其它类型的农民的生活水平也是很低的。尽管如此，这对于一些由奴隶转化成的农奴说来，其经济地位仍有所好转，而且封建领主还维护和保持了封建领地内农奴和依附农民生产与生活的正常进行。毋庸置疑，封建制度在当时具有明显的历史进步性。

[封建等级制度]与土地的封建等级占有制相应，在政治上也形成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

封建等级制是以土地的层层受封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中最高的一级是国王，国王将土地分封给公爵、伯爵、侯爵、大主教、主教等高级封建主，这些封建领主将土地转封给男爵、子爵等下属，男爵、子爵再依次封给最低一级的骑士。土地封受之后，封主与封臣在人身上结成领主与附庸的主从关系。整个封建主阶级就这样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体系，而处在这座金字塔之下的则是以农奴为主的广大依附农民。

封建主之间结成领主和附庸关系，首先要行臣服礼。附庸摘帽、下跪，将双手置于领主掌中，表示愿意成为他的附庸并忠于他。领主则授以树枝或一把泥土，作为封地的象征。如果受封者是主教或修道院长，则授以指环和权杖。行完臣服礼后，通常还要举行宣誓效忠仪式，附庸站立，将手放到圣经或圣像上，宣誓忠诚于自己的领主。

领主与附庸之间，互有权利和义务。其中主要是：附庸必须带领一定数量的骑士奉召为领主服军役，后来固定为每年 40 天；在某些场合，必须给予领主金钱援助（主要是在领主被俘交纳赎金、领主长子受封为骑士、领主长女出嫁时）；领主必须奉召出席领主法庭陪审。附庸履行了自己的臣服礼和义务，领主不得剥夺其封土。领主对附庸也有义务，最重要的义务是领主要保护他的附庸。领主与附庸双方如果任何一方未履行其义务，这种臣属关系都可能破裂，或领主将采地没收，或附庸将土地转归更上级领主，也可将采地变为私有地。初时，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原则上一世而终，但随采邑变为封土，领主附庸关系也世代相传。

实际上，领主附庸关系并非如此简单划一，井然有序。由于采地的不断争夺、继承和分裂，领主与附庸的关系也往往变得错综复杂，加上法国封建主奉行“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隔层封建主之间没有臣属关系，封建等级关系愈加混乱。有时，一个封建主有若干个领主，封建主乙是甲的附庸，但可能又是甲的领主丙的领主。这些复杂的关系，在封建主之间“造成一团乱麻般的权利和义务”，使封建主之间的争夺乃至混战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

[农民的反抗斗争]同奴隶制度一样，封建制度是建立在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基础之上的。封建化本身意味着大量自由农民被剥夺土地和人身自由，

沦为农奴和依附农民，因而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充满着尖锐的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农民为了维护经济独立和人身自由，多次掀起抗税斗争。在卡洛林王朝，农民反封建斗争更为激烈。805年查理曼颁布敕令，禁止一切形式的秘密结社。但农民斗争的烈火却难以熄灭。997年在诺曼底公爵领地上，各伯爵区内的农民秘密集合，控诉领主“尽对我们施虐行”，“我们有苦处、有冤情，忍受新旧敲诈、忍受无休无止的索求：货币索求、市场索求、道路索求、森林索求、磨房索求。各种敲诈和警卫索求”。他们提出责问：“为什么这些邪恶事情都落到我们头上？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困境？难道我们不是象他们一样的人吗？……我们需要的是勇敢”！他们决心联合起来斗争，按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法律去生活。为此，他们决定制订新的使用森林和水源的法律。各伯爵区内的农民分别派出两名代表，共同集会商讨制定法律。但农民的活动为诺曼底公爵探知，立即派军队残酷镇压了起义。1204年，布列塔尼地区也爆发了类似的起义。

除公开武装斗争外，农民还采用其它多种形式进行斗争。他们常常以残留的村社组织来抵制封建领主的侵害和敲诈。农民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政权和封建领主的贪婪，迫使领主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惯例化，多少减轻了封建剥削的残酷性，有利于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

三、基督教会与封建制度

[教会在封建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在西欧封建化过程中，基督教会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基督教会摆脱了帝国的控制，也失去了世俗政权的支持和依托。基督教会及作为其信徒的罗马大地地产主，都需要在新兴的蛮族诸王国中寻找新的靠山。而新建立的蛮族王国也需要教会和罗马地产主的支持，因为日耳曼人总数不过占总人口的 5% 左右，如果没有基督教和罗马贵族的支持，难以在罗马帝国土地上扎下根。496 年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 3000 亲兵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和罗马大地地产主找到了靠山，也为法兰克王国赢得了罗马大地地产主的广泛支持。法兰克贵族和罗马大地地产主在共同的基督教信仰下结合起来。基督教会成为促进西欧古罗马因素和日耳曼因素结合、迅速封建化的催化剂。

基督教会也是在经济上积极推动封建化的力量。教会本身是大地主，它“采用捐献、勒索、欺骗、诈骗、假造证据以及其它带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勾当而巧取豪夺”自由农民的土地，迫其变为农奴等依附农民。在封建化过程中曾广为流行的“投托”、“委身”、“豁免权”等形式也是首先行之于教会地产，然后再为世俗封建主所效法的。基督教会并不反对奴隶制，但它反对把基督教徒变为奴隶，在理论上鼓励释放奴隶，有助于奴隶向农奴的转化。

教会还促进了新生封建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基督教的支持是法兰克王国发展强盛的重要原因。教会用“神总是把克洛维的敌人送到他的手中”来颂扬法兰克人的征服。751 年，“矮子”丕平废黜墨洛温朝国王、自立为王，罗马教皇派兰斯大主教卜尼法斯为他行涂油礼，使王权神圣化。800 年罗马教皇又亲自为查理曼戴上皇帝的金冠。在法兰克时代，新建立的封建政权还很不完备，需要教会作为补充，封建国家的文职官吏通常都是由高级教士充任。查理曼在位时，世俗贵族和高级教士是封建政权官吏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封建化的深入发展使封建国家政权分崩离析，使封建统治手段不健全，领域不完备。基督教会又作了补充，它利用教会组织系统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而且，基督教会的教义、理论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给封建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灵光”，它宣扬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宣扬逆来顺受，谴责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支持了封建贵族政权、维护了封建制度。

此外，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还是封建制度向外扩张的工具。在莱茵河以东地区的封建化过程中，法兰克封建主的侵略占领、对自由农民的奴役同时伴随教会的传教活动。查理曼支持在这里建修道院，设主教区，并严令萨克森人皈依基督教，否则处死。在这里，封建化与基督教化是同一个过程。

[基督教会的发展]5 至 11 世纪，是教会力量全面发展的时期。这时，教会统治的势力范围大大扩大了。首先，它的信徒不仅包括原来的罗马人、高卢人，还包括了原来的异教徒——日耳曼各族及来自斯堪的那维亚的北方人。尽管此时基督教义对一般日耳曼人影响还十分微弱，但他们在名义上却是基督教徒。其次，在罗马帝国，基督教主要是城市居民的宗教，它的基本地盘在城市。蛮族征服以后，基督教从城市走向乡村，走向社会基层，在大多数村庄和庄园上都兴建了教堂、基督教会控制的地域范围也扩大了。

5 至 11 世纪，也是西欧基督教会地产和财富膨胀的时代。在罗马帝国晚

期，基督教已拥有不少地产。在封建化过程中，由于国王和贵族们的慷慨捐赠，教会向自由农民的疯狂侵夺，教会地产迅速增加。到7世纪末，高卢教会拥有的土地已占全高卢土地总数的1/3。在高卢各地，教会往往都是当地最大的地产主。在810年的阿亨宗教会议上，依据财产多少教士和神职人员被划分三级：拥有3000—8000处领地者为第一级，拥有1000—3000处领地者为第二级，不满1000处者为第三级。地产之外，教会还积累了大量的金银珠宝。9至10世纪北方人入侵法国时，不少教堂和修道院因此而成为他们劫掠的主要对象。

在这一时期，基督教会的政治权力也扩大了。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基督教会摆脱了帝国的控制。当蛮族征服时，不少城市主教又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城市免遭侵劫，他们的威望迅速提高。墨洛温朝的国王希尔佩利克曾经惊呼：“看，我的国库变得多少空虚！看，我们所有的财物全部送给教会了！主教之外没人享有任何权力，已没有人把我作为国王而尊崇，所有的尊敬全给予了他们城市的主教了”。5至10世纪，在高卢曾有三个王朝粉墨登场，每一王朝都竭力谋求教会的支持，推行与教会联盟的政策。王朝不断变换，但教会却是不倒翁。

然而与封建化发展的同时，教会却走向世俗化。主教等神职人员大多拥有地产，娶妻生子，带兵打仗，放弃了神职人员的职责。在高卢地区，4世纪时有54个神职人员被推为“圣”人，其中有52人是主教，5世纪有175个“圣”人，123位是主教，6世纪的293个“圣人”中，仅有148人是主教。高级教职和教会地产都成了世俗封建贵族逐鹿的对象，很大部分已为世俗贵族控制，影响了教会的地位和声望。10世纪，在勃艮第地区的克吕尼修道院首倡改革，主张僧侣严守戒律，摒弃世俗生活，强调教会和修道院直属教皇领导，不受世俗权力控制。罗马教皇利用了克吕尼改革运动，整肃教会纪律，摆脱世俗控制，提高教皇权威，逐渐建立了罗马教皇对西欧教会的绝对统治，使教廷逐渐发展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使教皇成为欧洲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第三节 法兰西独立国家的产生

一、卡佩王朝的建立

[卡洛林王朝的衰落]凡尔登条约后“秃头”查理领有西法兰克王国。西法兰克王国是独立的法兰西王国的开端。从840到987年，西法兰克王国的卡洛林家族先后共有8人继承王位，但他们大多有名无实，权力不大。“秃头”查理在位时外窥帝位、疆土，内求统一，但却无力驾驭封建贵族，开始丧失对伯爵的任命权，对外又无力抵御北方人的侵掠，王室的权威大大跌落。查理之后的三位国王“结巴”路易（877—879年）、路易三世（879—882年）、卡洛曼（882—884年）都平庸短命。884年“天真汉”查理继位，因年幼无能，由东法兰克皇帝监理国政。888年西法兰克的贵族们把最有实力的大贵族、法兰西公爵“强人”罗伯尔的后裔厄德推上王位。厄德死后，两个家族争夺王位，虽有几位卡洛林后裔取得过王冠，但他们的统治权力和统治疆域都大大缩小。与王权衰落同时，封建领主们的分离倾向日益发展。有人统计，在9世纪末，大约有29个封建公爵、伯爵或子爵取得了独立统治地位，到10世纪末，封建领主的独立王国更发展到55个。实际上，远不止此。这自然促使卡洛林王朝衰落。

[诺曼人的入侵]9至10世纪法国多次遭受外族入侵。诺曼人从北部、西部沿海岸河流侵掠，南部萨拉逊人（阿拉伯人）以撒丁、西西里、科西嘉等岛为中心，溯罗讷河北上频频骚扰。东部马扎尔人（匈牙利人）在侵掠东法兰克南部之后，10世纪更向西侵掠洛林、勃艮第和米底以至侵入到图卢兹。而其中诺曼人入侵持续时间最长，破坏严重，影响也最大。

诺曼人意为“北方人”，是9至10世纪侵掠法国的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和爱尔兰人海盗的总称。诺曼人是北欧沿岸居民，他们习水性、善舟楫。他们的侵掠最初是小股海盗掠夺（8世纪），9世纪40年代后发展为武装侵袭，9至10世纪，诺曼人各支对法兰西的大举入侵达47次之多。他们不仅侵扰沿海地区，而且还沿些耳德河、卢瓦尔河、加隆河等河流侵入内地。842年他们溯塞纳河而上占领鲁昂，843年顺卢瓦尔河洗劫了南特，845年一支诺曼人舰队溯塞纳河而上，围攻了巴黎。“秃头”查理出高价才买其退兵。848年诺曼人又洗劫了波尔多。此后，他们继续沿这些河流占领和破坏了大批城乡，奥尔良、图尔、图卢兹、亚眠、康布雷等都遭到过诺曼人的侵占和洗劫。诺曼人的入侵持续到10世纪初，此时，大多数诺曼人放弃了武装侵劫，转而寻求土地定居下来。911年法王“天真汉”查理与一支诺曼人的首领罗洛签订条约，允准这些诺曼人定居于塞纳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因此而得名诺曼底，到10世纪，萨拉逊人和马扎尔人的入侵也被击退，至此，9至10世纪的外侵浪潮基本上被平息。

外族，尤其诺曼人的入侵，使不少农民流离失所，使大量耕地息耕荒芜，给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破坏。外族的入侵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诺曼人入侵之中，王室无力保疆卫国，卡洛林王朝威望日益跌落，而各地封建贵族却纷纷建堡筑坞，扩充势力，在抵御外敌入侵中扩大了实力，加速了法国政治分权局面的形成。

[卡佩王朝的建立]987年5月22日，卡洛林家族的国王路易五世死后无

嗣，贵族法兰西公爵休·卡佩和先王的叔父卡洛林公爵、卡洛林家族的查理竞争王位。6月30日，法国大部分大贵族在桑利斯集会以决定主位继承人。会上，兰斯大主教率先发言，他批评了王位的世袭继承制度，主张要按是否有利于公共福利而取舍国王，他对贵族们说：“假如你们宁愿有损于公共利益，那么使查理成为君主，如果你们希望公共利益兴盛，请为休这位卓越的公爵加冕吧！”话毕，众贵族推举休·卡佩继承王位。7月3日兰斯大主教和其它几个主教为休加冕。贵族法兰西公爵休·卡佩正式取得了王位，称卡佩王朝（987—1328）。

卡佩王朝的建立决非偶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卡佩先人一直是法兰西最有实力的大贵族。早在9世纪中叶，面对诺曼人的入侵，“秃头”查理已把保卫法兰西的任务交给卡佩家族先人、巴黎伯爵“强者”罗伯尔。885年，诺曼军队集结巴黎城下，罗伯尔之子厄德率众抵抗，解了巴黎之围。在贵族拥戴之下，厄德于888年登上王位。此后便开始了卡洛林家族与罗伯尔家族争夺王位的斗争，从888到987年，卡洛林家族出了四位国王，而罗伯尔家族也有三人登过王位。10世纪中叶，休·卡佩之父“伟大的”休曾一身兼任法兰西公爵和勃艮第公爵，卡洛林朝国王路易实际上处于休的控制之下。“伟大的”休之后，休·卡佩继承了法兰西公爵，仍是国内最强的贵族。985年，兰斯的一个教士写信给他的两个德意志密友说：“罗退耳（指卡洛林朝国王）仅仅在名义上是法兰西国王；休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的国王”。987年的事变只是最终将王位从卡洛林家族转到休·卡佩及其后裔手中。此后，卡洛林家族的后裔们曾多次与卡佩家族展开争夺王位的斗争，但始终未能把王冠抢回自己手中。

墨洛温家族是以其特殊的血统为资本世代为王的，蓄留长发是他们特殊地位的标志。卡洛林家族则是在教皇支持下登上王位的，涂油礼是他们拥有神圣权利的象征。休·卡佩通过贵族的选举而戴上了王冠。卡佩王朝除不断谋求教会的支持外，还长期保留选举制作为他们合法统治的点缀品。

二、法国的分裂与割据

[法兰西岛的国王]卡佩王朝的建立并没有抑制国王权力的跌落。卡佩继位后，打败了卡洛林家族的王位竞争者洛林的查理，平息了佛芒都瓦伯爵等人的叛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987年卡佩通过贵族会议建立他的嗣子罗伯尔为王，使9年之后，当卡佩驾崩时罗伯尔顺利地登上了王位。罗伯尔当政35年（996—1031）后由其子亨利一世（1031—1060）、其孙腓力一世（1060—1108）连续当政。这些国王才疏学浅，治政平平，在他们统治下，国王权威仍日趋下落。但这些国王都效法祖先休·卡佩，当自己在位时便使儿子选举为王，使王位世袭继承制逐渐战胜了选举制，为一个绵延久远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然而，法兰西仍处于诸侯割据四分五裂之中，卡佩王朝初期，国王们的实际统治区域是以法兰西岛为中心，从塞纳河到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面积不到3万平方公里，而这时在名义上法兰西领土有45万平方公里，王室领地仅占总面积的1/15。即使在这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卡佩王室也未取得过有效统治。11世纪全国到处城堡林立，各地封建小贵族占堡称雄，不受节制。在王室领地内，单单从巴黎到奥尔良就要经过许多个这样的城堡主的领地，关卡重重。对于这种状况，当时的编年史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生动逼真的记载。蒙特赫利的城堡主曾困扰几代国王，腓力一世对他的儿子路易说，蒙特赫利城堡使他提前衰老了。至于在王室领地以外的贵族，有的仅仅承认卡佩国王是他们名义上的宗主，而实际上对自己领地保持着独立的统治。法国南部的大贵族自889年后不再远涉至北方参加国王召开的同侪会议。过去他们曾与国王保持着名义上的宗主与附庸关系，现在，对卡佩国王连名义上的臣属关系也不予承认。封建领主各自为政，谁也不听国王的命令。国家既没有系统的行政管理机构，也没有固定的首都，更没有固定的税收制度，王室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王室领地和所辖教会的收入。

但是，法王毕竟还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国王，这个法兰西国王的头衔，有时却成为一切向心力的归向所在，使其在事实上拥有国内最强大的诸侯所不能比拟的威望和权力。

[大诸侯与城堡主]卡佩王朝初期封建割据不断加强。法国领土上存在着数十个大的封建公国和伯国，卡佩国王对他们除至多保留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外，没有任何其它控制权，他们在其领地内行使着完全独立的统治权利。这些封建公、伯国主要是诺曼底公国、勃艮第公国、阿基坦公国、布列塔尼公国、加斯孔公国以及法兰德尔伯国、图卢兹伯国、巴赛洛那伯国、布卢瓦—香槟伯国、皮卡尔迪伯国、安茹伯国、吉恩伯国，等等。

然而，在10—11世纪，这些公爵、伯爵对其领地的统治权也很快丧失，更小的封建领主即城堡主开始兴起，从中攫取了独立的统治权。到11世纪上半叶大批地方小城堡主割据横行。除在诺曼底公国、佛兰德尔伯国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权力的分解过程有所抑制，不甚彻底外，其它地方概莫能外。勃艮第的马康内伯爵领地十分典型。在这里，到980年勃艮第公爵属下的马康内伯爵取得完全独立。接着，伯爵之下一个个更小的封建主又攫取了独立统治权，到11世纪中叶，一个个小的城堡主纷纷割据称雄，进行独立统治，不再把伯爵放在眼里。

城堡始建于卡洛林王朝，为抵御北方入侵者而修筑，城堡通常建设在高

地上，是两层的矩形塔，低层分为若干室用以储存物品及用作马厩、鸡圈、囚室、厨房等，上层作居住、哨塔或战时隐退和防御场所。有许多城堡四周挖有壕沟，设有吊桥，甚至多达三层壕沟、三层吊桥，以作防御。随着封建割据的发展，封建贵族把修筑城堡看作自己的私事，随心所欲，城堡成为子爵等封建主居所和统治的中心。城堡主整日闲在城堡内，无所事事、空虚无聊，将城堡作为防御和侵略的据点，时常外出打家劫舍，拦路抢劫。视战事为荣耀，把通过战争而掠得的财富看作是最为正当、最为名誉的东西。因此，城堡林立之日，也是封建贵族之间私战最为猖獗之时。

[骑士制度]最低层封建主称为骑士。在职业上，骑士是一个骑兵，要自备马匹、盔甲和其它装备打仗，因此需要拥有相当的财产，所以，骑士通常都出身贵族。骑士的兴起主要归因于军事技术的变化。公元 378 年安德里诺堡战役已显示出骑兵的优越性，公元 732 年普瓦蒂埃战役中，查理·马特虽仍能用一支步兵击败阿拉伯人的骑兵队，但用步兵迎战骑兵的各种不利已暴露无遗。8 世纪下半叶，在查理曼征服伦巴底人的战争中，正式运用骑兵。自此，骑兵发展起来，到 10 世纪，在法国的封建武装中，骑兵已成为核心力量，步兵退居附属和次要地位。

骑兵装备昂贵，尤其当时马匹奇缺，非一般农民所能企及，而且骑士是职业军人，专擅征杀，不事稼穡，且需粮丰衣足，钱财不乏，这些条件决定了骑士非封建贵族地主莫任。后来骑士成为贵族的一种荣誉身份，贵族子弟弱冠之年要受封为骑士，由上级领主授封刀剑，承认骑士身份。在城堡林立的封建战乱中，骑士以厮杀、抢劫为业，是导致社会混乱的一支主要力量。11 世纪起，基督教的教义和道德逐渐影响骑士，骑士走向制度化。这时，受封为骑士要经过复杂的仪式，通常受封者首先要淋沐更衣，斋戒一昼夜，然后在教堂内通宵祈祷。此日，他再行忏悔，用圣餐、做弥撒，弥撒之后受封者要庄重宣誓，履行骑士职责，从事新的生活。誓言的主要内容有：维护信仰、保护教会；服从领主、尊约守信；匡扶正义、扶弱济贫等等。誓毕，授封人将刀剑和盔甲授给他。成为骑士后，封建主要按骑士生活方式生活，他们鄙视劳动、鄙视经济活动，以狩猎、比武和各种冒险活动为乐，以慷慨大方、奢侈浪费为荣。后来，还出现了所谓骑士道德，以勇敢、忠诚、慷慨和对贵妇人的所谓情爱为主要内容。

骑士制度在 12 世纪达到繁荣，到 14 世纪由于军事技术的变化。火药等新式武器的使用，迅速走向衰落。骑士的誓言和职责，与当时社会现实、与骑士的实际状况相殊甚远，往往只是空话，但它们成为骑士的规范，有助于减弱封建骑士的破坏性，有利于社会安定。

[“上帝的和平”运动]对封建贵族混战更大的抵制，是 11 世纪席卷全法国的和平运动。封建贵族的混乱，不仅给农民、新兴的工商业者等社会下层民众带来了灾难，而且也损害了教会的利益、危害了大封建贵族的统治。在王权跌落的情况下，11 世纪教会首倡和平运动。和平运动于 11 世纪初产生于法国南部，形式多样，一是由国王或大诸侯号召维持和平、限制私战、保护贫弱，但效果甚微；二是由几个主教或大贵族签订条约，维持其辖区和平。例如 1203 年博韦和苏瓦松的主教签订条约，两个主教的附庸都到会宣誓，维持和平，如有违者，开除教籍。但影响最大的和平运动是“上帝的和平”，它大约开始于 11 世纪 20 年代，由各地的大主教、主教发起，他们宣称，上帝最初将维持和平和正义的权力交给了国王，现在国王已不能胜任其职责，

上帝将权力收回，而另授予作为其仆人的大主教和主教。“上帝的和平”运动的内容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比较共同的内容有：在基督教的节日和周末日（后扩充为星期三晚上至星期一早晨）禁止私战，在教堂和某些规定的贫弱避难场所不准私战，等等。“上帝的和平”运动并没有铲除私战，但缩小了它的范围，减缓了它的残酷性。例如，到 1054 年，纳尔榜地区每年中有 285 天被划为休战期，仅 80 天为合法私战期。和平运动有益于社会的安定，有益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第三章 从诸侯割据到国家统一 (11—16 世纪)

第一节 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的复兴

一、农业生产的进步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 5—9 世纪的高卢，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铁制工具很少，农民使用的工具大部分是木制的。9 世纪安那贝王室领地的财产清册记载，一个耕种 100 多公顷土地的庄园，全部铁制工具仅有 2 把铁锹、2 把长柄镰刀、2 把普通镰刀，其余工具全是木制的。在科尔比修道院，仅有 2 把铁铲、6 把铁锄、2 把普通镰刀和 1 把长柄镰刀。重犁虽已见到，但由于牵引动力缺乏，制造需较多的铁，价格昂贵，很少使用。耕地时大多使用不能深翻土地的轻犁。三圃制大约在 8 世纪卡洛林朝时已采用，但并未得到推广。而且，当时不少劳动者仍处在奴隶枷锁之下，既损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妨害了人口的增长。这时，人烟稀少，田地荒芜，有人估计，在 6 世纪的高卢，大约每平方公里仅有 5.5 个居民，耕地仅占全部土地总面积的 3.4—4%。

约从 9 世纪起，生产力才有明显的发展，首先，劳动者的积极性得到提高。在领主大地产上，奴隶集约劳动逐渐消失，昔日的奴隶成为农奴，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人口也有所增长。从 11 世纪下半叶到 14 世纪中叶，法国人口大约增长了 3 倍。其次，生产工具得到明显的改良。卡洛林朝以后，许多新的铁矿被开采，铁制工具迅速增加，新的生产工具不断涌现，尤其重要的是一种带轮重犁的推广、采用，使北部淤积地得到深耕，发挥了地力，较之轻犁大大节省了耕作时间。马具的改良和马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也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8 世纪后，马具渐得改良，即在马蹄上钉铁掌和使用新挽具，使马逐渐成为农业生产上的主要牵引动力。挽具的改良也使耕牛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10 世纪后，马拉重犁在法国成为普遍现象，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第三，生产技术水平也有了提高，首先是三圃制得到推广，11 世纪后，在某些地区又出现了四圃制耕作方法，既扩大了土地利用面积，也丰富了作物品种。并且开始注意施肥和保护地力。社会生产力的这些进步，推动了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

[土地垦殖运动]人口的增长增加了对耕地的需要量，要求开辟新的耕地。劳动力的增加和生产工具的改良，又为土地垦殖准备了条件。大约从 1050 年前后起，在法国开始了土地垦殖运动。在法国北部进展较早，南部稍晚，到大约 1300 年前后暂停，持续了约两个多世纪。

法国的土地垦殖活动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深入森林地带，辟林造田，建立村庄。到 11 世纪末，在法兰西岛、安茹、波亚图等地森林地带已出现了不少农业定居点。12、13 世纪更多的森林受到袭击，虽然大多数森林并未完全毁灭，但森林复盖面积却大大减少了。二是开拓沼泽荒草地，尤其发生在佛兰德尔及其它海滨、河滨地带。以上两种方式主要是召集移民垦殖。第三种形式是农民就地开辟未被耕种的森林荒草地，扩大耕地面积。最后一种形式是土地垦殖运动的主要形式。

土地垦殖运动的主要劳动力无疑是农民，但封建领主和教会组织对垦殖运动也起了很大作用，封建主为了扩大土地面积，开辟新的财源，常常积极组织移民垦荒，并提供一定的资金。在朗基多克地区，有的封建主委派传令官，沿街敲锣鸣号，召集农民移民垦田。许多基督教修道院也积极参与了垦殖活动。

土地垦殖运动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改变了乡村的自然面貌，增加了耕地数量，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导致了封建生产关系的某些变化。为招徕劳动力，封建主往往同移民订立契约，给移民提供更为优越的条件，如在新垦的土地上免除劳役、减轻剥削量及赋予移民一定的人身自由等。农民纷纷参加垦殖活动，又给旧的封建庄园经济以巨大冲击，迫使封建主改变庄园经营方式。在 12 世纪的巴黎地区，对农民的劳役制剥削逐渐衰落，固定地租数量的桑斯租地和分成制租地产生和发展起来，逐渐取代庄园劳役制。

[农业产量的提高和农民地位的改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11 世纪后法国农业生产显示出明显的进步。在农业产量上，9 世纪时安那贝王室地产上种子与收获量之比，小麦为 1 : 1.8，大麦为 1 : 1.6，黑麦为 1 : 1，而到 11—13 世纪，不少地区种子与收获量之比已达 1 : 4，1 : 5 或 1 : 6。13—14 世纪农业产量有了新的增长。在巴黎以北平原上，小麦种子与产量之比达 1 : 8，在冉纳维里埃，谷物为 1 : 8—9，燕麦为 1 : 10。南方稍低，在朗基多克，小麦仅 1 : 4—5，普罗旺斯一些地区，一般为 1 : 3—4。就全国总体看，种子与产量之比在 1 : 2—10 之间。14 世纪 30 年代起，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影响农业生产，产量曾大幅度降低。1340—1450 年在巴黎盆地谷物产量降低了 50—60%，在法兰西岛降低了 60%以上，在康布雷齐，15 世纪中叶较之 1320 年，小麦产量降低了 60%。

11—13 世纪，随着农业产量的提高和封建剥削走向固定化、习惯化，农民的物质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相当多的人在维持生产和生活之外尚有一定剩余。13 世纪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饮食成份都有好转，大部分人包括农民，不再只食用谷物、面包以充饥，肉、蛋之类的消费也有增长。在社会地位上，农民开始摆脱农奴制枷锁，争取人身自由。

但在 13—14 世纪，由于封建剥削的加重，农民深受地租、什一税和国家赋税等项剥削之苦，总收入中的一半以上被封建主拿走。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农民占地面积缩小，经济状况趋向恶化。根据粮食产量、消费量和封建剥削量等因素，西方史家对此时法国农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土地面积作过估算，比较一致的标准为 5 公顷左右。而此时法国大多数农民占地数量低于这一水平。例如，在法兰西岛，66%的农民份地少于 5—6 公顷，康布雷齐地区有 3/4 或 4/5 的农民份地不到 5 公顷。1330 年左右法国大约有 1700 万人，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90%以上，即 1530 万以上，耕地面积约有 800—900 万公顷，人均占地不过稍稍高于 0.5 公顷。可见，此时大多数农民单凭份地难以谋生，必须兼做短工或兼营家庭副业方能糊口。

14 世纪中叶到 15 世纪中叶正值黑死病流行、英法进行百年战争时期，战乱和灾疫使大批农民死亡，人口锐减。幸存者经常流徙，生活没有保障，生产也难以正常进行。在诺曼底的一个小地区，1347—1397 年仍在耕种的土地占总耕地面积的 85—90%，到 1424 年跌落到 58%，1447 年更降至 33%，1474 年增至 49%，直到 1526 年才恢复，达 90—95%。灾害和战乱使生产凋蔽，广

大农民处境艰难，生活异常困苦。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

二、城市的兴起和工商业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复兴]罗马帝国灭亡后，帝国后期的城市和城市生活并没有立即消失。在墨洛温王朝，城市依然是政治中心，是伯爵和主教们的驻节地，同时也是经济生活的中心，进行一定的工商业活动。但从总趋势看，城市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地位却在减弱，人们在城墙内种植庄稼、驯养家畜，城市与农村的界限渐渐模糊起来。

9世纪以后，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活动开始有了生气。在罗马旧城、封建贵族城堡、大教堂、修道院外以及山隘路口、港湾要津附近出现了新的居民点，这些居民点被称为“市”，市的居民大多从事工商业活动。1007年的一个文献首次将市的居民称作市民。一些旧城也恢复了活力。城市的普遍复兴发生在11—13世纪。1000年左右克吕尼修道院外建立的新市，到12世纪已发展到2000多居民。9世纪时巴黎仅仅限于西奈岛，到11世纪，一个初具规模的新工商业居民区在塞纳河右岸崛起，称作“城”。后来巴黎大学又兴起于塞纳河右岸，出现了巴黎的第三个部分——拉丁区，奠定了后来巴黎城市发展的基础。

法国城市之迅速复兴，是与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分不开的。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封建主扩大了对市场的需求，增进了农民与市场经济的联系，为城市工商业提供了原料和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使一些农民加入了工商业者行列，转变成为市民。例如在亚眠，所有市民都几乎全部来自城市周围32公里地区的农村，在12世纪的图卢兹，55%的市民都来自方圆50公里以内的农村。14世纪的博韦有89%的市民来自周围50公里以内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工商业者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

城市的普遍复兴，还与社会环境趋于安定有关。11世纪中叶后，卡佩王室和一些大封建诸侯开始镇服独立的城堡主，结束了城堡主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了区域性的政治统一，逐渐出现了安定的社会环境，这对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复兴起了保证作用。城市大都坐落在封建领主领地之内，使领主能够获得税收，扩大财源，对领主大有好处，因此，不少领主纷纷建设新城，保护旧城，在一定时期内也起了促进城市复兴的积极作用。

[城市自治运动]城市大都兴起于封建教俗领主的领地上，因而处于领主的直接统治之下。不少市民在身份上仍是领主的农奴，受着农奴制的压迫。在香槟和勃艮第地区，12、13世纪时农奴制在城市市民中十分流行，在朗城到1178年时不少市民仍要向领主交纳作为农奴标志的“死手权”和人头税。封建领主往往用对待庄园农奴的手段，剥削和敲诈市民，对市民利益构成了严重侵害。市民们联合起来，同封建领主斗争，以争取人身自由，争取城市的自治权利。

在法国，个别城市在10世纪末、11世纪已取得自治权，但从整体看，城市自治运动主要发生在1100—1400年间。市民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方式很多，最激烈的方式是武装起义。在朗城、兰斯、勒芒、蒙彼利埃、里昂等城市，市民都是经过一次或数次武装起义才取得自治权利的。城市取得自治的另一种手段是金钱赎买，例如，莫城、特鲁瓦、普罗万等城市的自治权都是用货币买来的。在香槟、勃艮第及法国南部一些地区，金钱赎买是最常见的手段。还有一些城市则利用封建领主之间的矛盾和混战取得了自治权利，也有一些城市是在公社运动的推动下，城市领主防止市民起义，而自动授予市

民人身自由和某些特权的。城市争取自治的斗争方式不同，城市自治的程度和形式也不相同。城市自治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城市“公社”。主要流行于北部，城市公社是市民通过誓言而组成的一个共同体，以公社作为一个法人。绝大部分公社都取得了一定的自治权利。例如圣康坦、亚眠及佛兰德尔地区的城市公社得到几乎完全的自治权，鲁昂等城市也取得大部分自治权利。第二、执政官管辖的城市。主要流行于南方的普罗旺斯、朗基多克、加斯科尼、吉恩等地区，自治程度一般胜过北方的公社，这类城市在行政、司法、财政方面都取得了自治权，而且有的在立法、军事等方面也取得独立地位。马赛、蒙彼利埃等城市曾一度成为实际上完全独立的城市共和国。第三、“市民城”。这种城市各地都有，但在中部、尤其是王室领地上最为流行。这类城市没有自治权，但市民在身份地位、经济活动、司法事务等方面都享有不少特权。巴黎、奥尔良都属这类城市。在王室领地上，还有不少“洛里斯”型城市，其特点是没有任何自治权利，但市民人身自由，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方面享有优惠和特权。另外，在洛林、勃艮第地区的一些城市中，城市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摆脱农奴制度，抵制领主敲诈。

方兴未艾的城市自治运动打击了封建领主统治势力，使市民争得了人身自由和各种自治权利，一度保护和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但自治运动的果实却渐渐为由一些富商大贾，房地产主及高利贷者等组成的城市贵族寡头所攫取，他们利用城市政权搜刮一般市民和城市平民，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仍很尖锐。在不少城市，自治成为市民的负担，渐渐失去原来的意义，日益增强的王室权力也对自治城市虎视眈眈，利用一切机会取消自治权，把城市纳于自己管辖之下。13世纪以后，一些城市渐渐丧失自治权利，到15世纪，尚存自治的城市已寥寥无几，城市自治运动也接近尾声。

[城市的性质和影响]城市不断发展，城市居民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分化也日益加剧，从城市居民内部渐渐分化出市民与城市平民两个阶级。市民以工商业者为主体，包括手工业者、商人、高利贷者等。而帮工、学徒、短工及失业居民等阶层构成城市平民或贫民。在城市中，市民在政治上据统治地位，在经济上也十分富庶，到14、15世纪，一些富裕的市民在经济上甚至可以跟大的封建公侯争娇斗妍。

城市一般都是经济中心（不少城市同时也是政治或宗教中心），城市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手工业和商业，在城市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市民往往还兼营一定的农业和畜牧业，这时，城市规模一般不大，大多数城市仅有数千至万余居民，13世纪的巴黎拥有10万居民，成为西欧最大的城市之一。

城市工商业通常以手工业行会和商人公会作为组织形式。行会组织开始出现于11、12世纪。13世纪末，巴黎大约有300多个行会。在15世纪以前行会组织尚不普遍，但在一些没有行会组织的城市 and 行业中，往往由城市政府代行行会管理职责，因此，行会手工业仍是法国城市手工业的基本特征。

15世纪前，法国的城市工商业经济还是一种简单商品经济，城市手工业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小手工作坊，由行会师傅带着少数学徒、帮工从事劳动，生产是个体性的，程序简单，技术落后。城市政府和行会组织还对手工业生产的规模、程序、产品的质量、价格、原料供应、产品销售、劳动时间、帮工和学徒的数量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规定和严格的控制。城市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是保护消费者，保护全体市民的利益，限制市民内部的相互竞争，以维持大多数市民生产和生活的持续进行，具有很强的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色

彩。这种生产的目的地主要方面还不是追求剩余价值，而是追求变相的使用价值，尚带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点。在手工业生产中，手工业者自己参加劳动，但并不完全依靠自身劳动，通常还剥削少量帮工、学徒、短工的剩余劳动。随着经济的逐渐发展，其剥削量也逐渐增大。市民手工业者的剥削是通过掌握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垄断本行业的经营权和运用其它多种封建特权而实现的，与资本主义剥削不同。城市手工业生产基本上是一种封建性生产。城市商业资本主要用于中介贸易，为农村的封建经济，为城市手工业生产服务，也具有封建性质。除从事工商业活动外，13世纪后不少城市的市民还在农村购买土地，成为工商业者兼封建地产主。政治上，自治城市作为一个集体通常是国王或大封建主的附庸，它象封建贵族一样，要向其领主履行义务，提供金钱帮助，还要组织军队为领主服军役。不论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城市都还是封建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城市及其商品经济却是此时法国封建社会内部一个新的发展因素，对法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上，商品货币经济渗入农村，使乡村的封建领主制渐次为封建地主制取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地区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推进了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经济关系的变化为政治统一创造了条件，城市市民阶级成长为促进法国君权强化的一支重要阶级力量，加速了政治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进程。伴随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法国的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三、农村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

[封建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12世纪后，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逐渐从封建领主制转变为封建地主制。这种变化首先起因于封建领主制生产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领主制以庄园制为基础，而庄园制却给领主带来了两大不便：一是庄园上的剩余产品需要出卖，增添了运输、记帐等方面的麻烦，尤其是在当时文化落后的状况下，记帐对领主是件很伤脑筋的事，二是庄园生产需要派管家管理，而管家常常凭其职务之便，侵吞领地产品，甚至慢慢将领主的土地变为己有。在这种矛盾之下，领主更愿意将庄园自营地划成小块出租给农民，收取实物或货币地租。

城市及城市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有力地推进了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城市自治斗争是对封建领主权力的首次有力冲击。在12、13世纪，许多地方的农民向市民学习，通过斗争取得了人身自由，并建立了自治的农村公社。而且，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封建领主的贪欲，促使领主将劳役租折算为货币租或货币实物混合租，到13世纪末，在某些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折算过程已接近完成。货币的欲求还驱使领主向农奴出卖解放证书，废除农奴义务。农奴解放运动的发展主要在13—16世纪中叶。农奴的解放，使领主丧失了对农民人身上和政治上的直接统治权利。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把封建领地卷入了交换领域，使领地的等级性、义务性都黯然失色，封建等级土地占有制走向瓦解，领主制削弱。

法国政治的统一和君权的加强，是通过取消封建领主的政治独立而实现的，它从政治上冲击了封建领主制。此外，农民阶级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和土地垦殖运动、十字军东侵等历史事变，也推动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化。

[封建地主制的产生]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领主制的衰落和被取代，大致开始于12世纪，最终完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在法兰西岛等先进地区，到13世纪末和14世纪，领主制已不再占主要地位。土地占有和使用方式已发生了明显变化。许多领主以固定期限的租地形式将土地出租。在13世纪下半叶之后，这已成为流行的形式。固定期限租地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固定地租，在租佃期内租地者向出租人交纳固定数量的货币或实物租。此种租地形式最初主要流行于法国北部。另一种是分成制地租，租地者每年须将收获的农副产品按规定的成数上交出租人，上交的成数有1/4、1/3、1/2不等，最常见的情况是对分制，这种租地形式尤其流行于南部及勃艮第等地区，到14世纪后逐渐发展为原来封建领主自营地的主要租佃形式。随着领主自营地的减少，农民份地所负担的主要义务不再是劳役，而是代役租，农民须每年按规定的数量向地主交纳货币代役租，从而获得对其份地的使用权。而且，在向封建主交纳土地转移税的情况下，农民有权遗赠或出卖份地。土地占有和使用形式上的这些变化，正在破坏着封建领地的等级性和义务性，昔日的领主与农奴正在变为地主与佃农。农奴制走向衰落。在诺曼底，12世纪时农奴制已经消失。在巴黎地区，从13世纪40年代起解放农奴的活动迅速发展，到14世纪20年代，农奴制也几乎消失。到15世纪下半叶，在全国范围内自由农民占农村人口的大多数。

随着领主制向地主制转变，王权也开始强化起来，大多数封建主丧失了独立的统治权利，被置于王室统治之下，到1328年，王室领地面积已达30万平方公里，占当时法国领土总面积（41.45万平方公里）的5/7。土地频繁买

卖和使用方式的变化，使土地占有的封建等级性受到破坏。封建主之间身份地位上的等级制依然存在，但以土地等级占有为基础、上下级具有权利义务、在行政上起作用的封建等级制却瓦解了。固定在采地上的权利义务也大多失去了意义，采地成为实际的私有地。这时，农民的“桑斯”地（份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农民私有地的数量也有了很大增长。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变化的同时，农奴制也基本废除。除在法国中部、东部某些偏僻落后地区还存在农奴制外，15世纪末，人身自由的农民占法国农村居民的4/5。

[阶级斗争的发展]在农村，农奴制的衰落并没有使农民与封建主的矛盾终结。相反，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劳役租的折算和农奴解放许可证的购得，往往都伴随着封建主的敲诈勒索。不少农民开始陷入新的高利贷者的魔掌。尚未取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则继续忍受着非人的耻辱和封建剥削的重负。此外，14世纪后，国家赋税制度开始建立，日益成为农民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这一时期法国农村的阶级矛盾仍然非常尖锐。农民采用多种形式反抗斗争。

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使法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产生了新的阶级矛盾。市民与城市平民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发展起来。在14、15世纪，法国大多数城市中都爆发过城市平民反对富裕市民和王室官吏的武装斗争。1382年巴黎爆发“铅锤党”起义，平民群众以铅锤作为武器，攻击王室收税官吏和富裕市民。同年，鲁昂城也爆发平民起义，主要由纺织业短工等组成的起义群众，打开监狱，抢救出在押民众，袭击王室官吏和富裕市民。但这些起义都在王室与富裕市民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城市平民还常常与农民斗争互相配合、互相渗透、携手合作共同反对封建势力。

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市民阶级与封建领主、封建地主，封建领主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不过，农村的农民与封建主阶级、城市的平民与市民阶级之间的矛盾则构成了法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

第二节 政治形势的变化和王权的增强

一、王权强化的社会背景

[王权强化的有利条件]11世纪下半叶以后，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增强王权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地主制经济下，不论地主还是农民，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市场。12世纪后，一个以地方城镇为中心、方圆数十里或更大的地区性市场开始形成。随之，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分工也得到发展。例如，法国北部以谷物生产和放牧业为主，城市中毛织业生产占重要地位。西南部的加斯科尼等地则尤以葡萄的生产和加工著名，图卢兹等地的松蓝、勒芒和布列塔尼的大麻、罗讷河北部地区的橄榄，里昂地区的蚕桑等也是地方性特产。在地区性经济分工基础上，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增强。15世纪后，以巴黎为中心的统一国内市场开始形成。经济发展和经济交往关系的扩大在客观上要求结束政治分权的局面，实行政治和领土的统一。

社会关系的变化进一步瓦解了封建分权政治存在的社会条件。在封建领主制上升时期，领主在领地内执行着一些不可缺少的社会职能。如，他们是领地内社会秩序的维持者，是调解纠纷、仲裁诉讼的法官、更是军事力量的垄断者。这些原都是国家政权的职能。这些职能由领主行使，自然意味着国家权力的式微。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交往超出了领地范围，封建领主不再能履行这些职能。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使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复杂化，使法律成文化、细密化，法律诉讼日益复杂，使原来以神命裁判和决斗作为主要司法手段的封建领主不再胜任司法职能。封建贵族在军事上也不再是唯一的垄断者了。城市兴起后，市民组成自己的城市武装。贵族的军事义务不能满足战争需求，13世纪后法国国王开始招募雇佣军。所有这些社会变化，使领主贵族日益成为一个“多余并阻碍着发展的阶级”，他们在政治、经济、司法及军事上保持独立统治的历史正在消失，这就为加强王权准备了社会条件。

封建地主制的形成和城市的兴起，还为封建王权的加强提供了依靠的阶级力量——封建地主阶级和城市市民。封建地主没有独立政治统治权，缺乏对农民的直接人身控制权，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以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维持他们对广大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市民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活动，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在城市内的统治地位，更需要国家的统一和王权的强大。这两个阶级成为王权在农村和城市中的基本依靠力量。

[封建大诸侯领地的统一]大封建诸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开始镇服割地称雄的封建城堡主，统一自己的领地，建立了一些强大的封建公国、伯国。

封建诸侯权力的加强，应当首推诺曼底公爵。在这里，公爵权力一直比较强大，封建城堡主分离的趋势受到有效的抑制，诺曼征服（1066）后，诺曼底公爵常常由英王兼领。公爵不断改进领地治理，他们把整个公爵领划分为若干个“拜宜”（bailli）辖区，辖区长官“拜宜”由公爵亲自任免。在政治趋向安定的同时，公爵还注意扶植城市、奖励工商、发展经济。在领地内建立起统一税收制度。到12世纪，诺曼底公爵领在封建诸侯领地中是政治最为统一、管理最为有序的领地。除诺曼底外，12世纪后佛兰德尔伯爵领、

布卢瓦——香槟伯爵领、布列塔尼伯爵领、安茹伯爵领、阿基坦公爵领、图卢兹伯爵领和勃艮第公爵领等诸侯领地，也逐步实现了统一。至此，无数城堡主割地称雄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王室和为数不多的封建诸侯分地而治的局面。在这些大封建诸侯领地内，不同的法制、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也发展起来。一般说来，南方采用受罗马法影响较深的成文法，北方是习惯法地区，在文化上，南方受古典文化影响较重，在许多方面仍维持着古罗马文化的某些特点。在北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甚深。但是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又各有不同，这种状况在法国领土统一后仍长期存在，形成法国民族文化多元化的特点。

封建诸侯权利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国王权力的强化。封建诸侯在其领地内卓有成效地镇服了小贵族分裂势力，建立了有效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一旦这些诸侯领地并入王室领地，国王可以现成地接受这些已经实现了统一的地区，省却了镇服封建城堡主的任务。而且，为迫使自己领地内的小贵族履行附庸义务，封建诸侯们自己也理应承认国王的宗主权力，履行自己作为国王附庸的义务，这显然有利于国王实现其封建宗主权。

二、王权的逐渐增强

[王权发展的道路]王权的强化，是通过两条途径实现的。

一是通过王室领地的扩张消除割据势力，以增强王权。国王利用联姻、外交、战争、购买等手段，千方百计扩张王室领地。到卡佩王朝结束时，王室领地面积已达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0%，人口已达全国总人口的70—80%。

二是提高国王的威望，不断扩充国王的实权。国王所拥有的权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因国王在封建领主制政治秩序中的宗主地位而拥有的宗主权。这种权利，为封建领主制的政治法规所确定。它具有私权的特征，用以制约国王与封建贵族附庸间的私人关系。宗主权的主要内容是在国王保护其附庸的前提下，附庸须对国王效忠，须在一定时期内率一定数量的军队随国王打仗、须应召出席国王法庭陪审，以及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向国王提供经济援助。此外，作为宗主，国王还有权调解其附庸与附庸的附庸之间的纠纷，受理后者的上诉案件等等。但是附庸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和效忠，作为领主的国王不得剥夺他的领地，不能干涉他在领地内享有的独立统治权。国王的宗主权范围是有限的，在宗主权范围内尚不能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和权利集中。

第二种权力是君主权，是君主代表国家行使的权力，是公权。它不容许在自己与臣民之间有任何居间权力存在。君主权的发展是伴随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的转变而进行的，罗马法研究的复兴也推进了这种发展。这时君主权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国王在整个王室领地内建立了直接统治，建立地方区划，由自己任免地方官吏，治理地方政务，在中央，发展健全各种政府官僚机构，健全国家政权，同时在王室领地内，建立统一税收制度，逐渐建立国王统率的常备军，等等。

在王权的发展中，这两类权力都起了作用。首先，国王要利用自己的宗主权，加强对各地封建贵族的控制。宗主权的充分实现也为君主权的实施开辟了道路。但王权强化的主要内容是发展它的君主权力，克服分权局面，实现政治统一，使宗主权发展为君主权。

[王权的逐渐增强]王权的增强始自路易六世（1108—1137）。路易六世致力于王室领地内部的治理，平毁了大量封建主的城堡，制服了王室领地内不顺从的城堡主，改变了分权独立的局面。腓力二世（1180—1223）开始扩张王室领地，扩大王权。腓力二世努力削弱英国国王兼安茹伯爵普兰他日奈家族在法国的领地。他先是挑动和利用英王亨利二世与其儿子“狮心”理查、“无地王”约翰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坐收渔翁之利，后又借口英王约翰拒绝出席法国王室法庭受审，违犯附庸义务，于1202年宣布剥夺他在法国大陆的领地，并陆续派兵占领了诺曼底、曼因、突伦、安茹和布列塔尼等地。约翰联合德意志皇帝鄂图和佛兰德尔伯爵及布伦伯爵共同向法王进攻。1214年7月21日，法国军队与英国联军在布汶遭遇，法国军队和2万市民武装英勇善战，大败敌军，并生擒佛兰德尔伯爵。布汶战役是决定法国王权、法国民族存亡攸关的重大战役。布汶战役的胜利巩固了法国王权的地位，使腓力二世的王室领地扩大了3倍，因此而被誉为“奥古斯都”。

腓力二世在王室领地内努力加强和改善管理。他推行“拜宜”制，地方官由国王随意任免、支付薪金，直接对国王负责。这是一种新型的王室官吏，“拜宜”主要推行于北部，南方仍承“塞内夏尔”（Senechal）旧制，但“塞内夏尔”的职权、任免均仿“拜宜”。腓力二世还开始吸收一些法学界人士

和市民为中央官吏和地方官，这些人各有擅长，或司法，或财政，相互之间有职能分工。腓力二世任用的上述官吏，尽职责，重政绩，是为国王效劳的忠实奴仆。

此外，腓力二世还继续和发展了路易六世以来支持城市自治运动、保护工商业经济的政策。他颁布的城市公社特许状和有关法规达 76 项之多，得到城市市民的有力支持。在军事上，腓力二世开始使用雇佣军，减少了对封建附庸武装的依赖性，通过这些措施，王权远远超出宗主权的限制，向着君主权大步迈进。

腓力二世死后，其子路易八世（1223—1226）继位。路易八世政治平平，但他坐收征讨阿尔比异端运动之利，将南部的朗基多克地区并入王室领地。阿尔比异端是 12 世纪下半叶以南部阿尔比城为中心流行的宗教派别，又分华尔多派和纯洁派两派。华尔多派反对教会积累财产、斥责神职人员奢侈腐化，提倡平均财富，过简朴的生活。纯洁派吸收了摩尼教的某些教义，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封建秩序和基督教会都是恶势力的化身，教皇是魔鬼的代表，主张教徒要以自身的纯洁同罪恶世界划清界限。阿尔比派反对基督教会、反对封建制度，南部不少城市的市民、平民和某些地区的农民都纷纷入教。包括图卢兹伯爵等封建贵族也为自己的利益，庇护或信奉阿尔比派，阿尔比派的发展引起封建势力的恐惧。1209 年罗马教皇发动法国北部的封建贵族对阿尔比异端进行军事征讨。在封建贵族的刀剑之下，阿尔比派信徒受到残酷镇压，南方富庶和繁荣的城市生活遭到极大的破坏。腓力二世对军事征讨尚持观望态度，路易八世则积极介入，并不失时机地宣布将没收自异端的土地收归国王，从而扩大了王室领地。

路易八世在位三年而崩，王位传给年仅 12 岁的路易九世（1226—1270）。路易九世亲政后，为提高国王的权威，进行了两项重大改革。一是司法改革，将司法权控制在国王手里。1257—1261 年他多次颁布敕令，在王室领地内禁止司法决斗，并将叛逆、铸伪币、伪造王室法令、非法携带武器等案件均收归王室法庭审理。为加强地方司法管理，从 1247 年起路易每年都向地方派出巡回法庭，审查处理上诉案件，惩治贪赃枉法。1258 年路易还颁布敕令，在王室领地内严禁私战，王室领地之外实行“国王四十日”，即法国任何诸侯受到侵害后，在 40 天内不得实施报复，可以向国王法庭上诉，请求仲裁。血亲复仇亦被禁止。二是币制改革。王室开铸新的标准化金、银货币，流通全国。1263 年国王颁令，在王室领地内仅仅王室铸币可以采用，在贵族领地上，王室铸币和该贵族（须是有铸币权者）的铸币可以并用。此后，王室铸币图尔里佛尔和巴黎里佛尔（两者比值大约为 5 : 4）逐渐取代了封建贵族的铸币。

此外，路易九世对内还保护教会、扶助贫弱孤寡，发展慈善事业。对外维持了与教皇和西欧各国的睦邻关系，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提高了法国王权的威望。路易九世被后人尊为“圣路易”。

法国王权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1285—1314）又有了新的发展。腓力四世通过联姻合并了香槟伯爵领地。政治上，他依靠一批法学家出身的大臣理政。这些人以罗马法的原则宣传王权至上，努力提高王权的地位。腓力四世尝试建立税收制度，在王室领地上征收“炉灶税”等直接税和盐税等间接税。他还向法国教会财产征收什一税。他变本加厉地进行经济搜刮，引起了下层人民的反抗，也引起部分封建贵族的不满，一度激化了社会矛盾。

腓力四世当政前后，中央权力机构已完善起来。在几个世纪中，原来的国王御前会议内部逐渐分工，形成了不同的职权部门。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负责司法事务的高等法院和负责财政事务的审计院等机构已有相当的独立性，封建国家机器日臻完备。

[封建等级君主制的形成]早在11世纪，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封建社会等级制的理论。他们将社会的全体成员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其职责是为人类的拯救而祈祷，第二等级是贵族，职责是用刀剑保护其它社会成员；第三等级是普通民众，职责是劳动，从事物质生产及养活前面两个等级。根据这种理论，政治活动是第一、二等级的事情，与第三等级无涉。这是封建社会初期政治格局的理论反映。

然而，随着第三等级中市民阶级的迅速发展和壮大，市民经济力量和政治影响的增长，从13世纪末开始，国王注意吸收少数市民为官，但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市民的政治地位仍然未得承认。国王“御前会议”的成员中依然没有市民代表，随着领土的逐渐统一和封建国家机器的发展，财政问题日益成为封建政权存亡悠关的大事，王权对市民的依赖日趋严重。社会现实需要赋予市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一定的席位。

1302年，为解决征收新税问题，腓力四世召开了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与会者除教会贵族和世俗贵族的代表外，还有市民代表，由王室领地内主要城市中各派两名代表组成。这三个等级的代表名额由国王决定。开会时各等级分别讨论，各等级只有一票表决权。三级会议的召开表明了市民力量的上升，国王和市民这种固定的联盟形式，无疑有利于法国统一。从此，君主与等级代表会议的这种政权形式开始形成，被称为封建等级君主制。腓力四世的后继者使三级会议逐渐制度化。三级会议讨论表决的议题主要限制在税收和财政问题上。由于法国各地区的差异性和地方分离性，除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外，王室领地内各个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三级会议。仍旧独立的封建贵族也效法王室，在自己的领地内建立了三级会议。

封建等级君主制建立后，国王常常借等级代表会议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一度促进了王权的发展。但在某些时候，三级会议也反对国王的暴戾肆虐，限制王权。在不同历史时期，三级会议起着不同的作用。

三、百年战争和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

[百年战争的开始]腓力四世死后，先后由他的三个儿子路易十世（1314—1316）、腓力五世（1316—1322）和查理四世（1322—1328）继承王位。1328年查理四世死。卡佩家族绝嗣。英王爱德华三世的母亲是查理四世的妹妹，爱德华以法王外甥的资格要求继承王位。但是，1328年的法国三级会议，以萨利克法典中女子没有王位继承权为由，拒绝了英王的要求，并推举查理四世的堂弟、瓦洛亚家族的腓力继承王位，为腓力六世（1328—1350），开始了瓦洛亚王朝（1328—1589）。爱德华三世不甘心失败，继续坚持对法国王位的要求。以法国王位继承纠纷为导火线，终于引发了英法“百年战争”。

然而，除王位继承纠纷外，百年战争的爆发还有其它更深刻的原因。首先是领土纠纷，英国的两个统治王朝[诺曼底王朝（1066—1154）和安茹王朝（1154—1399）]都是来自法国的封建主，因而在法国大陆拥有大批领地。腓力二世统治时期剥夺了英王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但英王仍占领着法国西南部的不少土地。只要领地没有被完全剥夺，英国王室就仍抱有在法国大陆扩张势力的野心。法英冲突的另一个问题是佛兰德尔问题。佛兰德尔地区城市发达，各城市的毛织业当时名列欧洲之首。毛织业的主要原料羊毛，大部分来自英国，城市与英国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但是，在政治上，佛兰德尔伯爵是法国国王的附庸。14世纪上半叶，佛兰德尔伯爵极力从经济上搜刮城市，政治上压制城市自由，双方矛盾非常尖锐，伯爵求助于法国国王镇压城市反抗，城市市民则在政治上倾向于英王。

所有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英法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场战争前后持续一百多年（1337—1453年），史称百年战争。

1337年，英王、法王相互向对方宣战。同年英国向佛兰德尔进军，英王爱德华三世派舰队占领加桑德堡垒，百年战争正式爆发。1340年英国海军打败法国海军，控制了英吉利海峡，1346年在克勒西战役中主要由英国自由农民组成的弓箭手，在少量炮火的配合下，打败了素称“法兰西之骄傲和花朵”的法国骑士。在军事史上，这次战役标志着骑士制度开始走向没落。1347年英军占领法国海滨重镇加莱。1356年，普瓦蒂埃战役爆发，由英王长子“黑太子”（因其披甲黑颜色而得名）统率的8000英国军队，打败了4万余法国骑士，法王约翰二世（1356-1364）及其幼子和大批法国贵族被俘。1360年两国签订《不列提尼和约》，法国承认英王以国王而非法王附庸的身份占有法国的大片领土，英王则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并规定法国须交300万克朗以赎回法国国王及被俘贵族。

[巴黎市民起义和北法农民起义]百年战争开始后，法国骑士贵族的连连败北，引起市民、农民等各阶层对贵族的强烈不满和仇恨。1356年国王被俘后，19岁的太子查理监国。为了筹集战费和国王赎金，1356年10月召集北法三级会议。许多教士和贵族没有出席会议，城市代表达总代表人数的半数。代表们要求惩治以财政大臣罗伯尔为首的失职官吏，由三级会议选出28名代表与太子共掌大权。查理下令解散三级会议，市民更为不满。查理被迫于1357年2月再度召集三级会议。3月，代表们制定了“三月大敕令”，共计61条，针砭弊政，规划改革，主要精神是限制王权和贵族，并要求在三级会议休会期间，选出36人委员会（各等级12人），监理国政，王太子被迫签署了三月大敕令。但不久反悔，拒绝执行三月敕令。1358年2月，在巴黎商会会长

艾田·马赛领导下巴黎市民举行武装起义，22日，3000多名起义者冲进王宫，当着王太子的面杀死了为太子宠信的3名贵族，太子查理由于马赛的保护才免于死。3月，查理逃出巴黎，巴黎掌握在以马赛为首的起义市民手中。

1348年，黑死病相继在法国各地泛滥，大约有1/3的人口死于瘟疫，个别地区死亡人数竟达半数。瘟疫之外，战乱也给农民带来灾难，战费和贵族赎金榨尽了农民的血汗。但使农民更难忍受的是英国侵略军和法国骑士、雇佣军的烧杀劫掠。例如，一个叫做格利费特的贵族率军四处抢掠，使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地区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起义。1358年5月，北部博韦地区农民起义，推举吉约姆·卡尔为首领。史称“扎克雷（意为“乡下佬”）起义”，起义队伍达5000多人。其它地方农民也纷起响应，毁城堡、杀贵族，以“消灭一切贵族，一个不留”作为起义口号，但他们认为国王是人民的保护者，旗帜上仍绘有王徽百合花。为了利用农民起义，艾田·马赛一度支持起义，并两次派出共800人的军队援助农民军。封建贵族们推举法王约翰的女婿、西班牙的那瓦尔国王“恶人”查理率军进入博韦地区镇压起义。“恶人”查理以谈判为名，诱捕并杀害了义军首领卡尔，起义军失去指挥，内部混乱，最后为封建贵族武装残酷镇压。

扎克雷起义是中世纪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起义打击了封建贵族势力。农民起义失败后，封建贵族集中全力围攻巴黎。1358年7月31日巴黎街头发生巷战，艾田·马赛被杀死。8月2日太子查理率军进占巴黎，市民政权被推翻，大批市民被镇压，巴黎市民起义也最终失败。

[贞德与百年战争的结束]1364年被俘的法王约翰病死，太子查理继位，称查理五世（1364—1380）。查理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财政上，他整顿税收，征收户口税、关税和盐税，增强财政实力。在军事上，重建城堡，加强雇佣军，发展炮兵，建立海军。他起用了著名将领杜·盖斯克林为统帅，把全国各级贵族列入军役名册，加强训练，并率军英勇抗战。经过十余年的奋战，除加莱等少数沿海城市外，绝大部分土地皆被法国收复。

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年仅12岁的儿子查理六世（1380—1422）继位。成年后查理六世又成为间歇发作的精神病人，封建贵族乘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形成了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勃艮第派和以奥尔良公爵为首的阿曼雅克派。两派倾轧，政治黑暗，英王亨利五世趁机于1415年恢复了侵法战争。勃艮第派投降英国，其他贵族仓促应战，在阿金库尔两军相遇，法军惨败。英军很快占领了首都巴黎和法国北部地区。1420年英法双方签订特鲁瓦条约，规定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嫁给英王亨利五世，查理六世死后，由亨利五世及其后裔继承法国王位。1422年查理六世与亨利五世先后死去，英方宣布将亨利五世与查理六世之女所生不满周岁的婴儿立为法国和英国国王，为亨利六世（1422—1461），由亨利五世的兄弟贝特福公爵任法国摄政，统治法国北部的半壁河山。查理六世的太子查理拒绝承认亨利六世，带一部分贵族退居南方，以布尔日城为据点，与英军对抗，但兵缺钱乏，信心不足。1428年，英军围攻奥尔良。奥尔良扼卢瓦尔河咽喉，是通往法国南方的门户，一旦失守，法国很快将全部沦陷。城内法国戍军奋起抵抗，因兵力悬殊，形势危急。

沉重的苦难唤起了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民族英雄贞德脱颖

奥尔良公爵岳父为阿曼雅克（Armagnacs）伯爵，故称。

而出。贞德（1412—1431）出生于香槟与洛林交界处的农庄，是一位农家姑娘。英军的烧杀抢掠，激起了她强烈的报国之情。贞德从法国东北部赶到中部，声称上帝派她来拯救法兰西。1429年3月的一个晚上，贞德在什农城晋见了王太子查理，向太子表明：她从上帝那里接受了支持太子的使命。并向太子请纓，打败入侵者，解救奥尔良。绝望中的查理赐予贞德一匹战马，一副盔甲，让其率数千人的军队开赴奥尔良。4月29日夜贞德率援军数千冲破敌军包围圈，进入奥尔良城，把粮食武器送给了受困的法国军民。她还致书英军，劝他们返回自己的国家，否则就决战到底。在英军拒绝后，她鼓励战友，指挥突围，英勇冲杀，虽中箭受伤，仍镇定自若。奥尔良的守卫将士在贞德带领下，经过激烈奋战，于5月8日击退英军，奥尔良城终得解围。这是法国转败为胜的关键性一仗，为法国人民增添了胜利的信心。贞德的爱国精神和英勇业绩被人们广为传颂，称她为“奥尔良姑娘”。

此后，贞德劝说太子查理在兰斯大教堂加冕称王，称查理七世（1422—1461）。但是，在1430年5月的贡比涅战役中贞德撤退回城时，却被贡比涅守城法军拒之门外，结果被勃艮第派所俘。半年后，勃艮第公爵以1万金市的代价将她出卖给英国人。查理七世和法国贵族见死不救。1431年5月30日，贞德被英国人组织的宗教法庭以“女巫”的罪名，判处火刑，活活烧死在鲁昂广场上。

贞德虽死，但她忠勇爱国的献身精神却更加燃旺了法国人民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烈焰。民众踏着贞德的脚印，奋勇杀敌，光复国土，节节取胜。1453年英法签订条约，英国除继续保留加莱港以外，全部退出法国。百年战争最终以法国失地的收复和领土的初步统一而胜利结束。后来，贞德被誉为民族英雄，成为爱国的榜样。

[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形成]百年战争胜利结束后，法王收复了加莱港之外所有英王室在法国的领地。此时，部分法国贵族仍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路易十一统治时期（1461—1483）以勃艮第公爵为首的封建贵族结成“公益同盟”，反抗国王。路易十一狡猾险诈，战争与外交手段并用，摧垮了贵族同盟。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战死后，1482年路易十一通过谈判从其女继承人手中收回了勃艮第公爵领和皮卡尔迪。此外，他还收回了阿朗松公爵领，阿曼雅克伯爵领、普罗旺斯伯爵领等贵族领地。1491年，路易十一的继承人查理八世（1484—1498）又通过联姻合并了布列塔尼。至此，法国领土基本统一，近代法国版图轮廓初步确立。

15世纪下半叶16世纪初，在法国封建地主制取代了封建领主制。随着地主制的确立，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有了增强，经济关系上的差异性渐渐缩小。百年战争后期法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已经觉醒。法国的民族文化也在发展，近代法兰西民族逐渐形成。

在领土统一和经济变化的同时，王权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百年战争中为抵抗英国侵略的需要，查理七世建立了常备的雇佣军，由15个雇佣兵队组成，主要部分是骑兵，也有步兵，外加炮兵和海军。法国的炮兵在当时欧洲是首屈一指的武装。为了支撑抗英战争，14世纪下半叶查理五世曾建立对交易税、盐税及户口税等捐税的征收权，但死后遂止。1436年三级会议批准永久征收交易税、盐税等间接税，征收的数量由中央政府决定。1439年北法三级会议同意按同样原则对平民征收基于财产的直接税，主要是

达依税。自此，国王取得不经三级会议同意而自行征税的权力。常备军和固定税的建立，为法国君权的强大创造了条件，进而为法国统一奠定了基础。路易十一当政时期，军权财权在握，独揽一切，他疏远大贵族，注意从社会下层选拔有才有识的贤能之士为官，以强化王权。他批准在图卢兹、波尔多、第戎、鲁昂、蒙彼利埃等地设立行省高等法院，强化了统治体系。在路易十一统治下，三级会议仍然召开，但一切都仰承他的意志，实际上是他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路易十一开始了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时代。

达依税，Taille 的音译。在法国南部为地方税，北部为按人口全部收入计税。

第三节 11—15 世纪的思想文化

一、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5 至 11 世纪文化的停滞]5—11 世纪是西欧文化发展停滞的时期。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而连续数世纪蛮族的征服混战对古典文化的破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新建立的蛮族国家，大部分日耳曼贵族和一般民众多是文盲。教士才是社会上唯一的知识分子，而教会又垄断着思想文化，教会既保存了文化的火种，却仇视、排斥世俗文化，教皇格利哥里一世曾说：“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之母”，对世俗文化采取扼杀政策，也加速了世俗文化的衰落。

公元 4 世纪，古典文化开始衰落，懂古典拉丁文的人愈来愈少，7、8 世纪的拉丁文较之古典拉丁文已面目全非，研究古典世俗文化的人已无处寻觅。这时，教士们也写过不少东西，但全然一律都是祈祷文、宗教颂词和道德训诫一类宗教文章。图尔主教格雷戈利的《法兰克人史》可以看作世俗文化作品，它记述 5、6 世纪高卢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内容丰富，是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然而，这部著作中仍然充斥着上帝创世的理论和神意及宗教奇迹等荒诞不经的故事。

教育同样在衰落。4、5 世纪时高卢还存在着一些贵族兴办的世俗学校，由俗人教师教授世俗文化、普瓦蒂埃、波尔多等城市都有这样的学校，但 6 世纪后，这类学校踪迹全无，唯独教会主办的学校存留下来。教会学校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由主教兴办的大教堂学校，一些重要的主教区都设有这类学校，普瓦蒂埃、巴黎、勒曼、布尔日、阿立斯等教堂学校，当时都享有盛名。第二种学校是修道院开设的学校，或为教授修道院内部的僧侣，或为教育附近村庄的儿童。这两类学校仍承罗马帝国旧制，教授“自由七艺”，语法、修辞、逻辑为基础课程，称“小三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为提高课程，称为“大四科”。但实际上，这时不少学校课程不全，有的学校只是反来复去讲授语法。而且，“自由七艺”课程的内容也通常充斥着宗教神学。

从 8 世纪下半叶查理曼统治开始，文化生活才有所恢复。查理曼招揽文人，庇护学者，奖掖学术，推广教育，文化生活渐有生气，后人称为“卡洛林文艺复兴”。当时欧洲一些最有名的文人，如英格兰的阿尔昆，意大利的僧正保罗等大都云集查理曼的宫廷中整理典籍，编写课本，有时也写一些宗教之外的有关哲学、历史、语言学和书法方面的文章。查理曼以身作则，带头学习拉丁语，他还颁布敕令，责成教士在乡村推广教育。“卡洛林文艺复兴”的主要成绩是整理了部分典籍，拉丁语得到一定纯化，更合文法。书法也有所改进，一种清晰易读的新字体——“卡洛林小写字体”得到推广。

[法国文化发展的原因]从 12 世纪开始，法国文化迅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11 世纪前后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城市工商业的复兴，为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政局的逐渐走向安定，为法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自 11 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逐渐走向安定，贵族们开始把较多的精力放到生活享受上，他们建造府邸，装饰园宅，追逐风雅，被迫注意自己的形象、礼节，昔日粗野的习惯有所改变。

不少大贵族的府邸注意招揽文人、骚客，以为点缀。在安定的政治局面下，社会下层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也有提高。

第二，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也是推进思想文化进步的重要因素。各个阶级、阶层都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文化，作为阶级斗争的武器。12世纪后，各种异端理论的蓬勃发展，市民文化的涌现，都是阶级矛盾复杂化的反映。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封建的官方意识形态——基督教思想文化也在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中发展。

第三，外来文化的影响也促进了法国文化的发展，11世纪前，法国文化曾学习吸收了爱尔兰文化，12世纪后，则更多地受到意大利文化的影响。法国的大学里有来自欧洲各国的师生，法国学者也常到其它国家留学、任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共同提高。除受到欧洲邻国文化影响外，作为西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12世纪后法国文化还受到西欧之外地区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受阿拉伯文化和拜占廷文化的影响。阿拉伯人翻译保存了大量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其水平远高于西欧。西欧的文人首先是通过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才了解到亚里士多德等古典作家作品的。12、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传入西欧，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时，有不少法国学者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大学学习了古典作家和阿拉伯作家的作品。阿拉伯学者阿维森那和阿威罗伊的著作曾引起西欧经院哲学家的极大兴趣，法国的抒情诗、爱情传奇文学等著作也可能受到阿拉伯文学的某些影响。东欧的拜占廷帝国是古典文化的发祥地，通过十字军东侵等渠道，拜占廷文化逐渐向西欧渗透，对法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教育与哲学

[教育的发展、大学]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市民主要从事工商业活动，需要一定的文化知识，城市生活中也需要大量书记员、公证人、律师等具有文化的自由职业者。原有的教会学校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文化教育的需求。12世纪开始，除教会学校外，又出现了许多城市学校。城市里出现了一个新的职业塾师阶层。著名思想家、神学家阿伯拉尔和伦巴德等人即属第一代职业塾师。他们以教育为业，取食束修为生。大量职业塾师的存在，促进了教会学校和城市学校的发展。12世纪后，夏特尔、巴黎、朗城、兰斯、图尔、奥尔良等城市都是驰名法国的教育中心。城市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一批中世纪的大学。

中世纪西欧大学的典范是巴黎大学。12世纪下半叶，巴黎聚集了大批教师和学生。教师结成同业公会。1174年罗马教皇予以承认，并授予它某些特权。1200年国王腓力二世颁发特许状，巴黎大学正式诞生。1208年以后称为“大学”。巴黎大学形成后仍处在巴黎地方当局和主教权力之下，但师生不断斗争，要求自治权。1229年，大学的师生为此宣布举行6年的罢课。1231年在罗马教皇的干预下，大学最终得到了行政上和司法上的独立管辖权。根据学科的不同，1219年后巴黎大学开始分“系”，主要有神学、法学、文艺和医学四个学科。文艺学科是普通科，教师和学生最多，主要学习七艺，都用拉丁文讲授，通过公开答辩，学生毕业时得学士学位，然后经两年的辅助学习，取得从事教育的资格，得到硕士学位。神学、法学、医学学科的学生通常是在文学学科毕业后再行深造，毕业后得博士学位。大学的教学方法主要是教师讲课和学生记笔记、举行辩论会，提倡自由讨论。当时，书籍誊写在羊皮上，价格昂贵，学生买不起，只有靠心记、背诵和讨论。巴黎大学的师生来自西欧各国。开始学生或住在小客栈里，或租用教师的房子，有的夜宿在教堂屋檐下。随着学生数量增多，1180年后开始建立供学生膳宿的住所，同时也是读书、讲学的地方，称为“学院”。路易九世的宠臣索邦为神学院的学生建立一处寓所，命名为“索邦”，成为后来神学院的中心。13世纪，在法国其它不少城市也兴起了大学。其中著名的图卢兹大学以神学见长，蒙彼利埃和奥尔良两所大学则主要研习法律，他们采纳意大利的学研究方法，主要对法学文献作注释和评论。13—14世纪，在法国共有十几所大学，都成为文化发展的中心。

[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西欧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在本质上是基督教神学，它论述的内容和论证依据都是《圣经》和基督教教义。论证的方法是首先从《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引经据典，再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作概念分析来证明自己，反驳对方。经院哲学讨论的内容脱离实际，研究方法流于形式主义，空洞烦琐，故也称“烦琐哲学”。

经院哲学内部分为唯名论和唯实论两派。10至14世纪这两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和斗争。“一般”与“个别”哪个是实在的问题，是两派理论斗争的主要问题。唯实论者认为，“一般”是唯一的实在，“个别”或“特殊”

罗马法研究在法国南部兴起是有原因的。这时法国所行法律分为两类。法国北部地区实施日耳曼人的习惯法，称“习惯法地区”，约占全国地域的2/3，南部地区实施罗马成文法，为“成文法地区”。现实需要是罗马法研究兴起于南方的重要原因。

只是幻影。在他们看来，愈普遍的东西愈实在，上帝作为最普遍的存在，具有最完全的实在性。而唯名论者却相反，认为“个别”是唯一的实在，“一般”或“共相”只是个名词。在这两派争论中，涌现出不少法国籍的著名经院哲学家，如唯名论的思想家洛色林、阿伯拉尔、普瓦蒂埃的吉尔伯特、萨利斯堡的约翰及唯实论者圣·伯纳德等人。而且，其他一些经院哲学大师如托马斯·阿奎那、罗哲尔·培根、邓司·司各脱等人都曾在巴黎求学或任教，接受了法国思想家的影响，因此，法国对于西欧经院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洛色林和阿伯拉尔是法国最著名的经院哲学家。洛色林（约 1050—1112），生于康边，曾在布列塔尼等地讲学。后因发表异端理论而屡遭迫害，被迫逃往英国和罗马等地避难。在与唯实论者论战中，洛色林指出，只有“个别的事物”才具有实在性，“一般”概念或“共相”只是“名词”，甚至只是在发生声音时才存在的声音的颤动，没有实在性。从唯名论观点出发，洛色林对“三位一体”等宗教教义进行了猛烈抨击。他认为，既然“一般”只是嗓子的响声，那么教会、教义都不过是这类响声或名词，不是真实的存在。他特别指出，“三位一体”也是个名词，三位是“三”，不可能是一体，只有圣父、圣子、圣灵的个别存在才是实在的，实质上否定了基督教的一神论，他的理论被称作“三神论”。在 1092 年的兰斯宗教会议上，洛色林的理论被控为异端，他的著作也大部分被烧毁，留至现在的仅有一封他给阿伯拉尔论三位一体的信件。

阿伯拉尔（1079—1142），是洛色林的学生，是 12 世纪西欧最有名的学者。在哲学上，他是唯名论者。他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的，但个别事物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些相似之处经过理智的抽象而形成共相，共相是人们心中的概念，因此阿伯拉尔的唯名论又称“概念论”。

与唯实物者“先相信而后理解”的理论相反，阿伯拉尔提出“先理解而后信仰”、“信仰必须建立在人类理智上”。他的有名著作《是与否》搜集了在 158 个重大神学问题上不同观点的争论，以启迪人们的思想。他提倡怀疑精神，认为“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和经常的怀疑”。“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他的怀疑精神首先对准了教会权威，公开提出，“教父们会有错误是毫无疑问的”，对于他们的著作，“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否则一切研究的道路都要被阻塞”。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过阿伯拉尔反神学的精神，指出：“他的主要的东西——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对教会权威的抵抗，……对盲目信仰进行永不松懈的斗争。阿伯拉尔的怀疑论对后世法国思想文化有很深的影响。阿伯拉尔的学说触犯了教会权威。1122 年苏瓦松宗教会议宣判焚其著作，1140 年教会又判处阿伯拉尔死刑，1142 年阿伯拉尔死于流放中。”

[从罗曼语到法语]日耳曼人征服了高卢，但他们的文化发展水平低于高卢人。最终他们不得不接受高卢的文化，包括高卢人的语言。当然，日耳曼人在语言上也有自己的贡献，为高卢语言增添了许多日耳曼语词汇。

在日耳曼人征服时，高卢居民的语言是民间使用的俗拉丁，它是下层民众的语言，与古典拉丁语相比，更简便，不太受文法的严格限制。而后俗拉丁语逐渐蜕化，掺杂了一些日耳曼语词汇，这种文字被称为罗曼语。到 8 世

纪时，罗曼语成为大众语言，842 年秃头查理与日耳曼路易联盟，对抗长兄罗退耳，在斯特拉斯堡宣誓，秃头查理军队的誓词便是用罗曼语写成的。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均源自罗曼语，属罗曼语系。

法语是法兰西岛的语言，它发展成为法国民族语言是 15、16 世纪之后的事情，在此之前，它只是法国各地方言中的一种。法国幅员广阔，各地居民种族构成和文化源流不同，在当时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情况下，各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就全国看，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系统，即南方的朗格多克语和北方的朗格多依语，朗格多克语之中包括普罗旺斯语、朗格多克语、多菲内语、奥弗涅语、里摩日语等等，朗格多依语中主要有皮卡尔迪语，勃艮第语、诺曼底语、普瓦图语和法兰西岛语。此外，尚有非罗曼语系的巴斯克语、加斯孔语等等。14、15 世纪，随着王权的增强，王室领地的扩大，法兰西岛逐渐成为整个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随之，法兰西岛的语言——法语，也具有了愈来愈重要的地位，它行于愈来愈多的地区，逐渐成为民族语言。各地的语言或被淘汰，或慢慢降到方言的地位。但语言的多样性仍是很长时期内法国文化的一个特征，直到 19 世纪中叶，在法国仍有 1/4 的人不讲法语，而另有 1/4 人口把它当作第二语言。

三、文学与艺术

[骑士文学和市民文学]除用拉丁文表述的基督教思想文化外,11世纪前后也开始产生了用罗曼语著述的世俗文学作品。11世纪前后,在法国产生了不少行吟诗人。他们居无定处,四处游荡、吟诗。北方的行吟诗人吟唱功业诗、英雄传奇,南方诗人多吟抒情诗。在此基础上,11世纪后兴起了骑士文学。它主要包括北方的功业诗、故事诗和南方的抒情诗。功业诗兴起较早,以《罗兰之歌》最为著名。内容是讲查理大帝花了七年功夫征服西班牙后,班师回国。他派重臣罗兰率师断后。途中,遇到阿拉伯人的埋伏,罗兰英勇战死。功业诗主要歌颂封建骑士的“美德”,即慷慨、忠诚、勇敢,为保卫信仰而战的精神。功业诗之后,北法又出现了一种故事诗,或称骑士传奇。故事诗主要有不列颠故事诗和上古故事诗两类。不列颠故事诗的主要内容是凯尔特人的古代传奇。如古代传说的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故事。上古故事诗一般模仿古希腊、罗马的作品,如《亚历山大传奇》、《特洛伊传奇》。故事诗写古代的故事,但具有中世纪骑士的思想情趣。

法国南部的骑士文学主要是抒情诗。其主要内容是表现爱情,但并非夫妻之爱。法国封建社会中贵族的婚姻主要是一种政治和领土的交易,缺乏爱情,所以贵族大多都有外遇。骑士抒情诗的主题是歌颂骑士与贵妇人之间的偷情和爱恋。这类作品以《破晓歌》最为著名,它描述了骑士和贵妇人在破晓时光情意缠绵,难离难分的情景。

骑士文学具有较为丰富的想象力,它反映了骑士的情操和风尚,具有强烈的贵族性。

随着城市的兴起发展和市民经济政治地位的提高,12世纪后又兴起了市民文学。市民文学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情调。这类作品多数由民间创作,有较强的现实性和乐观精神,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尖刻的讽刺性。

法国最重要的城市文学作品是《列那狐传奇》。列那狐的故事在中世纪法国流传甚广,在11—14世纪根据列那狐事迹写成的诗,不下10万余行,保存下来的也有27组诗,共3万多行。《列那狐传奇》是一部讽刺诗,它以兽寓人,用列那狐比喻市民,依桑格兰狼和布伦熊暗指封建贵族和廷臣,诺布勒狮代表国王,把贝拿尔主教比作一头笨驴,把教皇代表比作骆驼,而以鸡、兔、蜗牛等小动物代表社会下层民众,故事主要讲列那狐与依桑格兰狼反复斗争。列那狐施展其机智和狡猾,最终取胜,歌颂了市民的智慧,抨击了封建贵族和教会势力。同时,列那狐也欺压弱小动物,激起它们的反抗。反映了市民同社会下层民众的矛盾,勾画出了市民既反对封建贵族、又压迫平民百姓的双重面目。

《玫瑰传奇》也是一部重要的市民文学作品。它分上、下两篇。这是一首隐寓诗,写诗人梦游花园、爱上一朵玫瑰,他在爱情、直爽、慷慨、怜悯、欢迎等支持下,战胜了嫉妒、危险、谣言等多方阻拦,终于得到了玫瑰。下篇的作者批判了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嘲笑了不劳而获,放纵于声色犬马的贵族,诅咒伪善的托钵僧人,认为根据自然,僧侣和贵族的特权都是不合理的,反映了市民的思想感情。

此外,《布吕南》、《农民医生》等“韵文故事”亦属市民文学之类。这类作品寓意深刻、讽刺辛辣,揭露贵族和僧侣的贪婪腐败,也暴露了市民唯利是图的处世哲学。

[罗马式建筑与哥特式建筑]在经济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同时，建筑艺术也有了进步。经济的发展，使一批脱离农业生产的民间艺人出现，从事建筑艺术创作。10—12世纪，罗马式建筑艺术十分流行。这种建筑艺术主要用于教堂的建筑和装饰。

罗马式建筑是以古代罗马式建筑为基础，综合日耳曼和东方建筑艺术的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建筑形式。罗马式建筑的特点是门窗上部都用半圆形拱顶，坚厚的石墙，圆屋顶、粗大的柱子，窗户窄小，因而室内光线暗淡。室内广阔的墙壁上，饰以大量宗教题材的壁画，并广泛使用雕塑装饰。罗马式建筑外形类似封建城堡，建筑物前后往往配置碉堡似的塔楼，以防外敌入侵和农民起义的攻击。这类建筑多为教堂，主要以其坚厚、敦实的形体显示教会的威力，使人望而生畏，以微弱的光线，使信徒产生隔世之感，增强虔诚心。罗马式建筑艺术以法国为中心，影响西欧各国，这类建筑以安高莱姆教堂、康边三圣教堂为代表。

12世纪末叶开始，在法国北部各城市兴起了哥特式建筑艺术，并流行于西欧各地。哥特式建筑艺术主要集中于城市内。由于城墙的防护哥特式教堂不需要砌建坚厚的墙。同时，由于教堂社会意义的加强，常常需在里面举行城市典礼等公众活动，不少教堂还附设有学校、图书馆，因而要求能容纳较多的人，要求内部高大、宽敞、明亮。而随着教会神秘主义倾向的发展，也要求在光线、颜色、高度上改进，以衬托宗教的神秘感。因此，哥特式建筑在改进罗马式建筑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建筑风格。它的特点是尖形拱门，高耸的尖塔式屋顶，薄墙壁、细圆柱、大门窗、光线充足。在哥特式教堂内，一切暗示重量、厚度等物质世界的成分都尽量被压缩，它高耸的尖塔，直升的线条、奇突的空间推移，透过门窗彩色玻璃的明暗光线交错，加之各式各样轻巧玲珑的雕像、雕花，都有助于使人感到崇高，觉得神权的至高无上，使人产生惊奇和神秘的心情，产生对彼岸世界——天堂的向往。

哥特式教堂是文艺复兴前法国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著名的巴黎圣母院、夏特尔教堂、兰斯大教堂和亚眠教堂都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第四章 封建君主专制时代 (16—18 世纪)

第一节 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经济发展的条件与特点

15 世纪下半叶之后，法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手工业中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开始涌现，在农业中也萌发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农场。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资本主义的幼芽正在不断成长起来。

法国资本主义生产的萌发、成长与当时的经济、社会条件是分不开的。从经济条件看，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农村中封建地主制已经取代了封建领主制。封建地主制本身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在地主制下，农民人身自由，经济上相对独立，与商品货币经济有一定的联系。人身自由、但逐渐丧失土地的农民提供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封建地主则大部分收取货币地租，然后在市场上购买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封建地主制与资本主义经济有着广泛的适应性。

开始于 15 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对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某些国家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促进。法国南临地中海，西靠大西洋，内部河流畅达，良港密布。这种欧洲商业中心地带的地理位置和内部优良的商业条件，刺激了商业、尤其对外商业和殖民活动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使法国成为早期殖民大国之一。

政治上，以封建地主制为经济基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于 15 世纪下半叶初步建立。封建专制国家政权致力于铲除贵族反叛势力，取缔或削减贵族私设的路卡、关税，加强领土和政治的统一，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还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和扶植法国的工商业，鼓励殖民贸易活动，在一定时期内给新兴资本主义经济以强有力的支持。

封建国家、封建贵族都需要商品经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但是，作为一个封建国家，又在多方面严重地压抑和束缚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经济生活中的封建束缚主要表现在农业上的封建小农经济和城市中的行会制度。16 世纪后，农民占地数量愈来愈少，土地占有愈来愈零碎化。法国这时也有过圈地，但主要内容是圈占公有地，改变强制性开放田地制，并没有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封建的小农经济仍带有严重的自给自足性，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原料、市场和劳动力都是很大限制。在工商业中，封建国家为了加强对城市的控制和管理，从 15 世纪下半叶起推广行会制度，又使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

封建的社会等级结构尤其是贵族的种种特权，严重地压抑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封建意识又鄙视工商。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得不到承认和尊重，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得不到保障，他们致富后往往另谋出路，用高价购买官职、贵族爵位，摇身变为贵族，以享荣耀。即使仍然进行经济活动的资产阶级分

在开放田地制下，种植什么作物，采用什么耕作方法，都由习惯决定、强制执行，个人无力改变。

子，为了避免人们的鄙视，也大多不愿经营工商，而将资本投入较为荣誉的包税和购买国债，使法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

封建国家日益增长的捐税负担也极大地危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成长。为维持王室和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支撑封建国家的内外战争（在不到 300 年中有近 150 年的时间法国是在内外战争中度过的），封建国家征收的捐税总额从 1482 年的 510 万里弗尔增长到 1757 年的 28300 万里弗尔，到 1789 年更增至 47600 万里弗尔。无数财富被纳入封建开支，使城乡人民贫困交加，也危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和市场条件。

天主教的严密统治对资本主义经济亦是一种严重摧残。法国宗教改革以失败告终，天主教仍被奉为国教，有害于资本主义的教义、仪式完好无损。信奉新教的资产阶级分子受到无情迫害。这种种束缚，使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时代英国。

二、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业的恢复与发展]16至18世纪，法国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工具和耕作制度方面并无根本性变化。从种植的作物品种看，谷物仍是全国各地最主要的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始有所发展，葡萄种植在不少地区推广，北部某些地区还种植松蓝，南部的橄榄、桑蚕等业生产也有进步，出现了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分工。粮食产量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很小，16、17世纪在北部地区，种子与产量之比一般为1：4—8，南部地区一般为：1：3—6，到18世纪才有所增长。

从16—18世纪的近三百年中，由于政局的变更，人口的增减、气候的变化等等原因，法国的农业生产经历了几次起伏：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上半叶，是从百年战争的废墟上经济恢复和增长的时期，这时社会逐渐走向安定，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人口增长，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有所提高。16世纪初，是农民殷富、农村丰裕的时期。到16世纪中叶，由于封建剥削加重，人口增长加速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均占地面积的减少，农业生产渐呈退势。16世纪下半叶的胡格诺战争，使农业生产迅速衰落。到17世纪上半叶，政局趋向稳定，亨利四世和黎世留采取招抚流民，减免赋税，保护农业生产等措施，农业生产又逐渐走上恢复和发展的轨道。这种发展势头在不少地区一直持续到70、80年代；1680年到1720年前，由于社会的不安定和连年歉收及繁重的赋税搜刮，农业生产再次开始走下坡路。这时在各地都出现农民破产、生产萧条的景象。18世纪20年代——70年代，农业生产又开始恢复和发展。这时，农业技术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农民将自己的土地用篱笆、壕沟圈围起来，采用比较先进的耕作方法经营土地，半个世纪中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增长。据史家估计，从18世纪初到80年代，农业生产的增长幅度达25—40%，最高率达60%。

[封建地主制的发展]封建地主制在全国范围逐步取得主导地位后，在克服领主制残余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旧有封建主的政治和司法统治权力更为削弱。15至16世纪，一部分封建主尚不甘心其独立政治统治权力的丧失，少数大贵族蓄谋叛乱，一些中、小贵族则以昔日的等级体系为基础，与大贵族建立了层层庇护制，结党营私，左右地方政治，侵害农民。胡格诺战争以后，这种庇护网瓦解，亨利四世和黎世留都致力于打击分裂的封建贵族。此后，贵族转而仰承国王鼻息以求得到特权和俸禄，大量贵族到王宫、军队和教会里面任职，对政治的统一不再具有威慑作用。16世纪后，封建主的司法权力迅速没落。大量封建贵族离开乡村，或云集王宫，或寓居城市，专心享乐，很少光顾乡间，通常由管家代收租税。封建贵族的构成要素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人统计，在17世纪的贵族中，95%的家族是15世纪后方得贵族身份的。贵族们大多不愿住在乡间，封建地主制向着“不在地主制”发展，领主司法形同乌有。

其次，土地所有权、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土地私有的面积有了增长。在奥弗涅的平原地上，到18世纪完全私有的农民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25—30%。农民的桑斯地的永佃权得到巩固，农民有权将桑斯地继承、转让、馈赠、出卖，近似私有地。村社公有地也遭到了不断的侵占，封建地主、租地农不断圈占公有地，村社也常常分配公有地，使其变成私有。普罗旺斯和诺曼底最早开始了这种圈地过程，其它地区相继仿效，到18世纪，封建国家颁令认

可，土地私有倾向更为发展。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同时伴以租佃关系的发展。租佃制是此期最基本的土地经营方式。租地农不仅承租封建主的领地，往往还同时承租领地上领主权利的征收权。如果承租教会地产，同时承租什一税的征收权。封建领主权利成为一项地租，不再具有政治上和人身上统治权利的性质。而且，在不少封建地产上，领主权利干脆被废弃。

[农民的分化和经济地位] 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从 16 世纪起，农民中一个新的租地农阶层开始兴起。他们拥有较多的牲畜、工具和资本，向封建贵族承租大片土地，将其生产活动跟市场联系起来，以雇佣的长工和临时性短工为主要劳动力，以盈利为目的。租地农的租地面积在不同地区有所不同。在 17 世纪巴黎盆地和法国大部分地区，大的地产可达 200 公顷以上，一般地产通常在 80—130 公顷之间。在布列塔尼、勃艮第、里昂内、多菲内、奥弗涅等地区，租地农的地产面积小一些，一般在 20—30 公顷，在南部地区，又稍低于这一水平，大多在 15 公顷左右。在这一时期，大中型土地经营者除租地农外，还有买官者及城市的市民和资产阶级分子，虽然租地农的地产上使用的劳动力大多是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小农，还不是纯粹的雇佣工人，但应当承认，这些地产上的生产关系、生产目的已具有某些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初级形态。

少数大农占地愈来愈多，而绝大多数农民的占地面积却不断缩小，土地日趋零碎。16 世纪下半叶，在法兰西岛的休尔布瓦的 7 个教区，94% 的农民每人占地不到 5 公顷。到 17 世纪，大多数地区农民占地只有 1—3 公顷。约 75% 的农民单凭份地已无法度日。到 18 世纪革命前，全国 2300 万农民占地仅占总土地面积的 35%，其中，60—70% 的农民占地不到 5 公顷。这些农民为了谋生还必须出卖一定的劳动力。无地的农民，有的被迫沦为雇农，到 18 世纪，雇农占各村人口的 10% 左右。有的流浪乡间或涌入城市。沦为乞丐。

尽管农民缺田少地，封建剥削却与日俱增，除地租外，还有不堪负担的直接税。在短短 300 年中，封建国家的税收增长近百倍。据统计，15—17 世纪，各种封建剥削拿走了农民毛收入的一半。到 18 世纪，农民所受剥削更加繁重，各种剥削约劫走农民总收入的 81.71%。在生存艰难的情况下，农民经常揭竿起义。有人统计，仅普罗旺斯某地，1596—1635 年间爆发的农民起义有 108 次，1635—1660 年间有 156 次，1661—1715 年间 110 次。在一个不足 6 万人口的地区，在 119 年中竟发生了 374 次起义！起义矛头直指封建贵族和封建国家，反抗封建租税压迫。

三、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变化

[资本主义萌芽和资本原始积累]15 世纪下半叶、16 世纪初，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在手工业生产内部技术水平、专业分工程度都有了发展。封建地主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城乡之间、各地区之间大都建立了商品流通网络，市场迅速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加快了市民和农民内部的经济分化，一大批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走向贫困破产，沦为雇佣劳动力。而少数富商、手工作坊师傅利用种种手段积累起资本，适应正在扩大的市场需求，扩大生产，建立起以包买制为基本形式的分散型手工工场和拥有较多雇工的集中型手工工场，资本主义生产随之诞生。

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少数资本家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二是存在着大量人身自由、并被剥夺了生产资料、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力。以暴力等手段加速这两个条件形成的历史过程称为“资本原始积累”。

法国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是通过下述途径实现的，第一，象其它国家一样，法国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加强了对广大帮工、小手工业者的剥削，使后者渐渐沦为雇工。主要由帮工和破产手工业者组成的熟练工人的年收入占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等作坊师傅年收入的百分比迅速降低，在大城市中 15 世纪中叶为 36%，16 世纪中叶下降到 12—14%，在中等城市则从 54%下降至 33.6%，在小城市中由 60%下降到 25.7%，如果与少数富商、银行家的巨量收入相比，工人收入则更显得微不足道。

15 世纪末开始的“价格革命”，有力地促进了这种分化。新航路开辟后，大量贵金属涌入西班牙和葡萄牙，法国通过与西、葡的商业贸易和劳力输出，也流进了大量金银。16 世纪中叶同 16 世纪初年相比，法国金银流量增长了十多倍，从 15 世纪下半叶到 16 世纪，法国物价上涨约 3—4 倍，而同期工人工资的增长却远远低于这一水平，这种价格运动使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多收少支，大获其利。

第二、殖民掠夺也是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法国的殖民活动开始于 16 世纪中叶，但它的迅速发展主要在 17 世纪。路易十四时期，法国的殖民地主要有美洲的加拿大、阿卡地、纽芬兰、密西西比河流域、路易斯安那、安的列斯群岛和圭亚那，非洲的塞内加尔、波旁岛、马达加斯加；印度的本地治里、昌德纳戈尔等等。为了有效地掠夺这里的财富，资产阶级、富商、官吏等阶层还组建了许多殖民贸易公司。1604 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此后又建立了西印度公司（1664 年）、北非公司（1665 年）、北方公司（1669 年）、列凡特公司（1670 年）、塞内加尔公司（1673 年）、哈德逊湾公司（1682 年）、中国公司（1698 年）、几内亚公司（1701 年）等等。法国的殖民者、商人也参预了罪恶的黑奴贸易，从非洲掳掠黑人，运到美洲大陆卖为奴隶。通过殖民地和殖民公司，资产阶级掠夺了大量财富，加速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

第三、资本原始积累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包税和国债制度。这一时期，捐税征收大都实行包税制，包税人通常是市民资产阶级。这些人还经常将其资本用作政府借贷，购买政府公债，通过借贷获得高额利息，或取得各种特权作为报酬。包税和国债制度使劳动人民的无数血汗流入商人、资本家的腰包，使其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但另一面，包税和国债制度的发展对资本主义

发展也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由于包税和国债比从事工商业获利大，担风险小，也更为体面，因而吸引了大量资本，减少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投资，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由于包税和国债制度，法国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始就存在着庞大的不劳而获的食利者阶层，商业金融资本的发展远高于资本主义工业资本，对近代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不利影响。

[资本主义手工工场]16—18 世纪法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主要可分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种是分散型的手工工场。特点是包买制。商人涉足生产领域，向城市小手工业者和乡村农民提供原料，有时还提供生产工具，向他们收取成品和半成品，包买商付给一定报酬。这种包买制在纺织业中尤为流行，例如 16 世纪时在普瓦图、皮卡尔迪、奥尔良附近地区、贝利地区、朗格多克等地区的毛织业中，在布列塔尼、诺曼底、下曼因、勃艮第等地的棉纺织业中都很流行。17 世纪时，一个包买商往往控制几百名乃至上千名农村和城市包买工人。17 世纪下半叶成立的一家羊毛长袜公司拥有 3 万多名雇工，分布在十几个城市，进行生产。

第二种是混合型手工工场，在纺织业中较为常见。包买商往往拥有集中的手工工场。包买制农民、手工业者主要从事纺纱、洗毛、织布等初步工艺，而染色等完成工艺则在包买商的手工工场中进行。包买商的手工工场有时设在城里，但更多情况是在乡村，因为乡村没有行会束缚，劳动力价格也便宜。18 世纪阿贝维尔的冯·罗培在其集中的手工工场中雇佣了 1500 多雇工，而同时受他剥削的包买制农民达 1 万多人。

第三种是集体的手工工场。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在法国大多数手工行业中都兴起了集体的手工工场，而且集体的程度愈来愈高，这种手工工场流行于冶金、军火、造船、肥皂、印刷、造纸、制镜、玻璃、制革、纺织等各个行业。为满足贵族的需要和输出换汇，这时期也兴起了一些奢侈品工业，在这些行业里大都产生了集体的手工工场。例如路易十四时驰名国内外的高伯林地毯工场拥有 8000 多名雇工，生产各种豪华的地毯和挂毯。17、18 世纪，一些手工工场的规模已相当可观，雇工数量往往以千百计。在 18 世纪，里尔城一个毛织业资本家的手工工场里使用了 3000 多雇工，在马赛等城的某些造船工场，也常常拥有上千名雇工。

法国的手工工场在所有权上，可分为两类。绝大多数手工工场都是民营企业，手工工场归资本家私人所有。但也有一些是官办手工工场，分直接官办和间接官办两类。直接官办是一切所有权属王室的手工工场，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开始，封建国家兴办了不少王家手工工场。这类工场主要从事军需品和奢侈品生产。路易十四统治前期，王室手工工场数量达百余家。这类工场虽所有权归封建国家或国王，生产品也有一部分不进入市场交换，但工场的基本劳动力依然是雇佣工人。这类企业有浓厚的封建成份，但劳资雇佣关系仍是主导关系。间接官办是指封建国家向一些企业家提供补助金、贷款、免税或授予各种特权作为条件，企业的生产、产品质量受到国家监督，企业需向国家上交一定数量的产品。在这类手工工场中，国家干预并没有改变企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使生产集中、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都有了提高，为机器的使用准备了条件。18 世纪中叶后，机器开始在法国采用。18 世纪 40 年代，在某些地方的纺织业中已开始使用纺纱机，1751 年一个名叫奥尔克的人将织布机从英国引进法国，1756 年亚眠已开始应

用印染机。在其它某些行业也逐渐使用机器。此后，法国开始了从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逐渐过渡。

[重商主义及其影响]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受到国家重商主义政策的保护和促进。重商主义既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一种经济理论，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国家用以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政策。

作为一种经济学说，重商主义反映了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商业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状况。重商主义理论在欧洲不同国家、不同时间有所差异。在法国，孟奇里梯安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重商主义的理论，1615年他向国王亨利四世奉献了名为《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认为商业是国家活动的基础，国家应该保护商人的利益，商业尤其对外贸易是财富的源泉，因此，应保护关税，达到货币入超。他反对外国商人插手法国商业，主张国家应当保护法国商人的海外利益，应该增强法国的海上力量，发展殖民地。重商主义理论在黎世留和柯尔伯时又有所发展。一直到18世纪以后，才逐渐为重农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所取代。

重商主义也是法国封建专制君权长期推行的经济政策。15世纪下半叶，路易十一已开始推行一些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政策。重商主义政策在亨利四世、黎世留和柯尔伯执政时期日益发展完善。重商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关税，发展对外商业和殖民活动，组建和保护殖民贸易垄断公司，保护法国商人的利益；扶植手工业，引进能工巧匠，向手工工场主发放津贴、补助，授予某些特权和优惠。另外，封建国家撤销国内关卡、维护交通，保证工商业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的各种措施，也具有重商主义的特点。

封建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客观上保护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

[城市经济的封建关系和城市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经济虽有所发展，但步履滞缓。这是因为它身上缠着沉重的封建锁链。

除去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种种束缚，在工商业经济中也同样受到封建关系的严重束缚。尤其是法国的行会制度。封建君主为便于对城市的管理和控制，多次颁布法令，维护和推广行会制度。法王路易十一就颁布了60多项法令，以保护和发展行会制度，推广行会制度成为封建国家的一贯政策。

封建国家对工商业活动的频繁干预，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既有积极推动的一面，又有消极阻碍的一面。封建国家设立了多种管理机构，对手工业生产制定了琐细的规章，进行严格的监督，限制了生产自由。封建国家还通过管理手段，将工商业纳入为封建经济，封建政治服务的轨道，通过赏赐补贴和特权使为贵族、为国家服务的奢侈品工业、军火工业等片面发展，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成长。

而这一时期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也具有大量的封建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商业和金融资本占据支配地位，利用各种封建特权和专卖权压制工业资本，流通领域控制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组成部分都程度不同地与特权相联系。封建特权在一定时期内对促进资本原始积累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特权林立有害于自由竞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封建特权也愈来愈从内部抑制着资本主义的成长。

复杂的经济关系产生了复杂的阶级矛盾。这一时期城市中的阶级斗争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城市下层民众反对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集中在反对国家赋税剥削上。1514年7月在亚琛、1549年8月在拉罗舍尔、1630年2月

在第戎都发生过城市下层民众反抗国家赋税的起义。另一种是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1539年里昂印刷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1541年巴黎印刷工人也举行了类似的罢工。约自16世纪起，各行业的雇佣工人开始组织起秘密的“伙伴社”作为同资本家斗争的组织。阶级关系复杂化也使阶级矛盾更为尖锐，城市下层民众的武装斗争连绵不断。从1623到1647年24年内，法国城市下层民众起义达118次，仅1635年一年就爆发过20多次起义，足见阶级冲突之激烈。

第二节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

一、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

[君主专制政权发展的条件和道路] 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法国社会的客观要求。新发展起来的封建地主制成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发展的经济基础。因为在地主制下，封建贵族大都是地主而非领主。他们政治上已经丧失了在地主制下的独立统治权力，经济上只有对农民收取地租的权力，由于物价的高涨而常常入不敷出。所以，大都拥护君主专制制度，借此以维持对农民的经济剥削和政治统治，并从封建君主那里得到作官、免税、携带武器等种种特权及丰厚的年金、津贴和赏赐。

同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新兴资产阶级，更希望建立一个强大集权的政府，内保统一，外护商业殖民，以利工商。封建君主国家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努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并促进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封建君主专制政权也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和支持。

16世纪后，随着城乡阶级矛盾的发展，农民、城市平民反抗斗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从反面促进了君主政权的发展。

君主专制政权的发展首先是实现内政统一和中央集权，主要途径是扩大官僚队伍，强化官僚机器。而官僚队伍的扩大主要靠买官制度，大批资产阶级分子通过购买官职，成为“穿袍贵族”后，进入各级权力中枢，执掌要害，从而使各级官僚机构不断发展，日益完善。

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于16世纪，17世纪开始巩固，直到18世纪，在长达二个半世纪中历经了动摇、巩固、发展、鼎盛和衰落的全部历史过程。

随着集权的加强，封建君主也开始对外侵略扩张和争夺欧洲霸权。

[意大利战争]经济上繁荣富庶的意大利首先成了法国封建贵族掠夺的目标。1494年，法王查理八世宣称自己有权继承那不勒斯王位，率领3万军队入侵意大利，1495年占领了那不勒斯。法军的入侵激起了意大利各城邦的抵抗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恐惧，同年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罗马教皇以及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结成反法联盟，将法国军队赶出意大利。1498年查理八世去世，路易十二（1498—1515）继位。新任国王在内政方面减税免税、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在外交上，路易十二继承先王政策，再度出兵意大利，1499年占领米兰，两年后占领那不勒斯，结果遭到米兰等意大利城邦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和英国的联合进击而失败。

1515年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继位。他不仅使财政权直接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使全国的官僚机构和司法机关渐趋完备，还努力扩大常备军，坚持对外扩张。继位不久，他恢复了对意大利的侵略。使意大利战争演变为法国国王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争霸战争。1525年帕维亚战役中，法军惨败，法兰西斯一世竟成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俘虏。

1547年，亨利二世（1547—1559）即位后又重新挑起战争，夺取了法国边界的凡尔登、梅斯和土尔，并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加莱。1559年，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之后，法国与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西班牙签订了卡都—康布雷条约，法国继续持有法德边界的凡尔登等三个城市，但放弃对意大利

利领土的要求。意大利战争结束。

意大利战争是法国欧洲争霸的第一次尝试。战争消耗了大量资财，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社会矛盾，法国王权的威望跌落，少数不甘心丧失政治独立的大贵族趁机挑起内战，君主专制制度面临危机。

[宗教改革与胡格诺战争] 意大利战争时期，宗教改革运动已在法国展开。天主教是西欧封建制度的总代表，它的宗教教义、教阶制度和各种繁杂的宗教礼仪都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新的宗教。天主教会的腐败也引起其它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改革呼声日益高涨。16世纪初，法国人文主义文化兴起。许多人文主义者研究原始基督教。例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戴塔普尔将新旧约圣经从拉丁文译成法文，并宣传和平的宗教改革，对德意志的路德产生了很大影响。人文主义者对原始基督教的研究有助于认清当时教会的真面目，助长了改革的呼声。

最早传入法国的新教是路德教。16世纪20年代在法国已有不少路德教徒。但后来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信奉卡尔文教。卡尔文（1509—1564）早年曾在法国求学。1533年改宗新教。次年因法国政府迫害而从巴黎避居瑞士。之后在瑞士发动宗教改革。卡尔文提出了“前定论”理论，认为人的拯救与否不靠“圣功”，不靠教会；上帝把它的臣民分为“选民”与“弃民”，“选民”注定得救。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说明他是上帝的选民。卡尔文在瑞士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实行政教合一，建立了由长老和执事管理的共和制的教会组织。卡尔文教反映了激进资产阶级的要求，深得法国中下层资产阶级的拥护。法国卡尔文教也称“胡格诺派”，它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南部的少数大贵族也参加了胡格诺派，利用卡尔文教共和制的组织形式与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相对抗，他们入教纯粹是政治原因，故也称“政治上的胡格诺”。胡格诺派力量发展很快，到1562年新教徒团体约有2000多个，分布法国各地，其信徒约占全国人口的1/4。

法国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得到王权的支持。在法国，教会的统一也就是政治的统一。所以自法兰西斯一世起，历代国王都对新教采取镇压政策，尤其从30年代起，这种迫害愈益残酷。1547年亨利二世还在巴黎高等法院专门设立一个法庭，用以迫害新教徒，人称“火焰法庭”。围绕着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到16世纪中叶形成三大营垒：以大贵族介斯公爵法兰西斯等人为首的天主教阵营，主要集中于北部、东部；以那瓦尔王国王族波旁家族的安东尼和大贵族、元帅克利尼等人为首的新教阵营，其主要力量集中在西部、西南部；以宫廷首相洛比塔尔为首的一些宫廷贵族和不满于介斯家族的天主教贵族则主张双方妥协，宗教宽容，被称为“政治家派别”。天主教与新教的斗争此时已蜕变为封建贵族争权夺利的宗教战争。1562年3月，天主教集团首先发动攻击，屠杀新教徒，新教徒立即举行反抗，占领奥尔良，宗教战争爆发，被称为“胡格诺战争”（1562—1594）。

胡格诺战争时打时停，持续了30余年。战争中，新教徒极力谋求德国和英国新教的援助，而天主教阵营却得到了西班牙的支持。在1562—1570年的战争中，双方的主要领袖大都死于非命。1572年8月22日，新教领袖安东尼之子、那瓦尔王子亨利与公主玛格丽特结婚，大批新教徒奔赴巴黎。8月24日夜（圣巴托罗缪节），在王后喀特琳和国王查理九世纵容下，介斯家的

法文 Huguenots 或 Higuinaux，来自瑞士文 Eidgenossen，意为“同盟者”。

亨利率天主教徒在巴黎全城开始了对新教徒的大屠杀，一夜之间至少 2000 新教徒被杀害，史称圣巴托罗缪惨案。随后，全国不少城市竞相效尤，大约有 2 万新教徒死于屠刀之下。1574 年查理九世死去，其弟亨利三世（1574—1589）继位，不久开始了在亨利三世、介斯家的亨利、那瓦尔的亨利之间的“三亨利之战”。1588 年亨利三世派人将介斯家的亨利刺死。1589 年亨利三世又被人刺杀，瓦洛亚家族绝嗣。按继承顺序该由那瓦尔的亨利继承王位。为了取得王位，亨利于 1593 年宣布放弃新教，改信天主教，1594 年进入巴黎，继承王位，为亨利四世（1589—1610），开始了波旁王朝（1589—1792）的统治。胡格诺战争结束。胡格诺战争一度削弱了王权，动摇了君主专制制度，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许多地方都爆发农民起义，起义者高喊“克洛堪”（意为“打耗子”）的口号，向贵族进攻。封建地主阶级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集权政府。

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巩固

[亨利四世]亨利四世登基后，努力结束战乱，保持国内和平。1597年，亨利四世在亚眠打败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迫使西班牙于次年议和，同时着手调解宗教矛盾，1598年4月13日，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国教，恢复天主教的原有特权。同时承认新教的信仰自由，新教徒有权担任国家官吏和其他公职，并允许新教徒保留约75个军事堡垒，在巴黎和鲁昂等地的高等法院中还专门设立了负责新教司法事务的法庭，规定法官中必须有新教徒参加。南特敕令在欧洲历史上首次肯定了宗教宽容的原则，确认了125万新教徒的宗教和政治经济权益，使法国社会中的宗教矛盾得到缓和。

面对经济的凋敝，亨利四世任命有才干的知己苏利公爵担任财政总监，恢复和发展经济。苏利采取有力措施，整顿财政，改革税制。减免民众赋税，整治贪污、堵绝偷税漏税，废除摊派、勒索，使国库收入大为增加，财政状况迅速好转。苏利还复兴农业，招抚流散农民，安顿生产。并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修建道路，疏通运河，兴建堤坝，开辟荒田，引进新的作物和耕种技术，鼓励发展畜牧业。苏利曾说：“农业和畜牧业是哺育法国的双乳”。法国农牧业得到发展。亨利四世甚为注重扶植发展工商业和海外殖民活动。他起用新教徒拉弗玛管理工商业，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用免税、贷款、授予特权等手段扶植丝绸、亚麻、玻璃、陶瓷及某些奢侈品工业，支持建立商业贸易垄断公司，力求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法国政府还同汉撒同盟、英国、西班牙签订商业条件，保护和扩大法国商人海外的利益。殖民活动也有了很大进展，1608年在北美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增强了国家财力。据统计，亨利四世登基之前法国财政赤字达29600万里弗尔，亨利四世不仅清偿了债务，而且到他晚年国库中还有约1200—1300万里弗尔积蓄。

亨利四世采取果断措施，打击削弱封建分裂势力，加强中央集权。他一方面坚决打击叛乱的大贵族，另一方面又积极扶植在胡格诺战争中经济上走向贫困的中小贵族，使其效忠国王。亨利四世还整肃官僚机构，强化官僚体系。他清除了最高权力机构王室议政会中的反对派大贵族，提拔中小贵族进入决策机关，还从王室议政会中抽调5名亲信，组成秘书处，总揽大权。为恢复和提高国王的专制权力，亨利四世重视发挥穿袍贵族的作用。1604年国王颁布“布莱特”敕令，允许买官者在每年向国家交纳其官职价值1/60的年税之后可世袭继承官职，巩固了穿袍贵族的地位，削弱旧贵的割据势力。亨利四世统治晚年，法国经济恢复，国力强盛，一度动摇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

[黎世留执政]1610年亨利四世被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死，继位的路易十三年仅9岁，国家大权落到母后美第奇家的玛丽手中，政治日益腐败。1617年，路易十三（1610—1643）在亲信支持下从其母亲手中夺回权力，但他同母后一样缺乏才干，重用亲信，受制于人。封建分裂势力乘机抬头。1624年红衣主教黎世留担任了路易十三的首相，形势发生转机。贵族出身的黎世

亨利四世当政初年与晚年财政状况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国库积蓄为4000万里弗尔。本书采用拉维斯的数
据。

布莱特为财政大臣，是该项措施的提议者。故以其名命名。

留虽然身体病弱，但性情刚烈，具有铁的手腕。在 18 年之中，他是法国的实际统治者。黎世留上台后即着手对付胡格诺教徒的叛乱。胡格诺教徒凭其保留的军事据点，不服支持天主教的国王管辖。黎世留采取坚决手段，于 1628 年占领了他们的最后军事据点拉罗舍尔，1629 年颁布了“恩典敕令”，除维持新教徒礼拜自由，具有担任国家公职的资格之外，剥夺了南特敕令给他们的一切军事和政治特权，根除了他们在法国建立的“国中之国”，使法国进一步得到统一。

黎世留执政期间几乎一直处在封建贵族的阴谋和叛乱之中。他先后挫败了国王弟弟加斯冬为首的多次贵族叛乱，粉碎了王太后的颠覆阴谋，处死了阴谋叛乱的国王亲信桑迈斯及数十名公爵、伯爵等封建大贵族，还有许多贵族宠臣被捕入狱或被流放。1626 年他颁布敕令，命令平毁大贵族的所有城堡、禁止贵族决斗，粉碎了大贵族的反叛阴谋。

黎世留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中央集权。他把自 16 世纪以来向地方临时性派遣的钦差大臣变为定制，称为总督。总督由国王直接任免，通常出身低贱，但权在地方长官之上，监督地方的行政、司法、财政和军事工作，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束。为便于对地方的控制，黎世留还在全国各地建立驿站。在思想文化上，他开始建立出版检查制度，1630 年还创立了法国历史上最早的报刊《法兰西报》，作为集权政治的舆论工具。在黎世留执政时期，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和巩固。

黎世留继续推行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扶植工商业、海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为提高法国的国际地位，黎世留对海军建设甚为重视。在此之前，法国海军已经存在，但军舰甚少，且掌握在少数地方将领手中，用作沿海地区防卫。直到黎世留执政，沿海大多数港口还属地方贵族、城市、甚至大的修道院和村寨所有。1626 年后，黎世留下令扩建海军，他自任“航海和商业总监”。经过 10 年努力，法国的大西洋舰队已配备了 38 艘军舰，其中 12 艘吨位已达 500 吨以上，地中海舰队也拥有 25 艘舰艇。法国海军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他还积极扩充陆军，1626 年法国还只有 12000 人的陆军，到 1635 年陆军人数已达 13 万，成为欧洲屈指可数的强大武装。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黎世留继续奉行传统的外交政策，同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争夺欧洲霸权。由于宗教纠纷和国际矛盾的发展，欧洲三十年战争（1618—1648）已于黎世留掌权之前爆发。黎世留执政后积极联合欧洲各种政治力量对付哈布斯堡家族。他先是资助瑞典军队与之作战，1635 年又直接派军参战。此外，黎世留统治时期法国在周围边界地区还占领了不少地盘，扩大了疆土。但军费的开支，使国家入不敷出，国库重又空虚。

黎世留执政期间封建捐税成倍增长，人民负担日益加重。黎世留曾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人民太舒适了，就不可能安守本分，……应当把他们当作骡子，加以重负，安逸会把他们宠坏”。在黎世留重压之下，1630 年起农民和城市民众的起义斗争持续不断，1639 年在诺曼底爆发了“赤脚汉”起义，起义农民多达数万人。但这些起义都被残酷镇压。

〔马扎然执政和“福隆德”运动〕1642 年黎世留在弥留之际向路易十三推荐马扎然作为他的继承人，一年之后路易十三亡故，路易十四（1643—1715 年）继位。因国王年幼，王太后奥地利的安娜摄政，但大权交于马扎然。马扎然位居首相，权倾当朝。他基本上推行黎世留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致力于王权的增强和欧洲争霸事业。但是封建官僚机器的膨胀和连年不断的对外战

争，使国家财政日益恶化，债台高筑。加上马扎然为人贪婪，挥霍无度，程度不同地侵害了各个阶级的利益，很快成为社会各阶级的众矢之的，最终导致了“福隆德”运动（1648—1653）的爆发。

“福隆德”运动分两个部分，即巴黎高等法院的福隆德和贵族的福隆德。巴黎高等法院福隆德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并得到城市中富裕市民和资产阶级的支持。法院福隆德运动爆发于1648年，但巴黎高等法院与马扎然的摩擦却已非一日。高等法院法官们不仅对马扎然执政时封建专制王权侵犯穿袍贵族的利益不满，也反对绝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1648年5月巴黎高等法院要求取消地方总督、征收新税和颁布新的财政法令，必须经巴黎高等法院等法院登记才有效，废除政府与包税人签订的征税契约，达依税数量减少1/3，废除国王任意捕人的权力。马扎然严辞拒绝，并于8月26日命令逮捕高等法院的两名法官。巴黎市民立即筑起街垒，进行起义。其它几个行省的高等法院和兰斯、图尔、普瓦提埃等大城市的市民资产阶级也声援巴黎市民。王太后、马扎然和年幼的路易十四被迫逃出巴黎，高等法院一度控制了政权。1649年王宫派人与高等法院和巴黎市民媾和，双方签订和约，王太后保证赦免起义者，并调整某些财政政策，法院福隆德运动随之结束。

一些封建大贵族乘法院福隆德运动之机，举兵反叛国王，称贵族福隆德运动。这些封建大贵族以孔德亲王为核心，在1650—1653年间，起兵反对马扎然，企图削弱王权，谋求更高职位，瓜分权利。贵族武装一度占领巴黎，赶走国王，控制政权。但是，他们的要求只是反映了少数没落贵族的卑鄙私制，背离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更不符合其它广大社会阶层的愿望，贵族反叛终因孤立无援，以失败而告终。

福隆德运动的社会性质复杂。贵族福隆德反映了少数贵族企图恢复封建割据的愿望，性质是反动的。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和市民资产阶级主张有限君主制，要求削减赋税，废除部分专卖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某些愿望，试图减弱封建专制制度对资产阶级发展的阻碍作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他们与封建贵族混杂一起，易于为贵族利用。

三、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鼎盛和衰落

〔路易十四时代〕1661年马扎然去世，路易十四亲政，在此后55年，他不再委任首相，大权独揽，王权空前强化，开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鼎盛时代，即“路易十四时代”。1665年路易十四任命商人家庭出身的柯尔柏任财政总监，他积极推行财政改革，努力革除弊端，理顺财经体系，改变税收分配不均的现象，缩减免税者阶层的人数，强迫贵族交纳部分捐税，实行开源节流，增收节支，使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

柯尔柏大力推行重商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保护和扶植国内手工业。通过给工场主发放贷款，封赐特权，颁发补助金，由国家出资兴建王家手工工场，招徕国外能工巧匠提高技术，发展手工业生产。他先后颁发有关手工业生产的法令达190项。第二、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对内努力撤销封建关卡，建立了包括法兰西岛、诺曼底、皮卡尔迪、香槟、勃艮第等14个省的关税同盟，在同盟内部，撤销关卡，实行商品流通自由。第三、发展商业，尤其保护法国对外贸易，支持建立对外贸易公司，先后组建西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北非公司等，发展对外殖民贸易。并通过外交途径与土耳其、丹麦、瑞典、英国等国签订商约，保护法国商人利益。同时发展海上运输业，使法国商船总吨位从1664年的12.5—15万吨，增加到1688年的22万吨。总之，路易十四统治前期，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路易十四在政治上大权独揽，独断专行，自称“太阳王”，被看作神的化身。国王的意志就是法令，路易十四的名言是“朕即国家”。一切国事公文都由国王签署。取消高等法院对国王旨意的异议权。并强调臣民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只需绝对顺从。路易十四为使宫廷成为贵族国家的中心，还在巴黎郊外营建了豪华的凡尔赛宫，将大批贵族移居凡尔赛，给以丰厚的赏赐和俸禄，仰承国王鼻息，过着腐朽的寄生生活，从而丧失了对抗王权的能力。路易十四还极力加强对教会的控制。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天主教的“高卢主义”这时发展到了高峰，国王对高级教职有任命权，对教会财产有支配权。1682年路易十四召集法国的高级教士会议，会议起草了《四条款宣言》，重申高卢教会享有各种自由和权利。

路易十四前期也是法国思想文化发展繁荣的时代。宫廷成为文人学士荟萃之地。在王权庇护下，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化发展到欧洲最高水平，笛卡尔的哲学、莫里哀、高乃依、拉辛等人的文学作品都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瑰丽的宝藏。

路易十四前期，法国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繁荣是社会长期发展积累的结果，也是封建专制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具有多方面适应性的体现。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成长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之时，两者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方面具有利益的一致性，因而能够相互适应和促进。然而，专制政权毕竟是一个封建政权，随着封建政权的巩固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两者之间的潜在矛盾也萌发出来，封建专制制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逐渐从保护力量变为障碍乃至桎梏。路易十四的统治经历了这种转折。路易十四晚年为了封建专制君主的利益，不断侵害资产阶级。例如，为了实现宗教信仰的统一，1685年10月路易十四废除了南特敕令，并派龙骑兵进驻新教地区，迫害新教徒，强迫新教徒改宗天主教。南特敕令的废除使至少有8—10万工

商业者被迫流亡国外，带走了约 3000 万里弗尔资产。还有约 9000 名一流水手逃离法国，这对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沉重打击。

路易十四利用日益雄厚的财力，不断扩充军队，使陆军 1690 年达 30 万人，1703 年增至 40 万人，海军人数在 1677 年达 4 万人，还拥有近 200 艘战舰，7000 门大炮，在晚年他运用强大的军队为争霸欧洲，穷兵黩武，连年发动战争，其中较大的战争就有法国与荷兰的“解体战争”（1667—1678）、奥格斯堡联盟战争（1688—168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战争非但没有达到称霸的目的，反而耗费大量资财，加重了资产阶级和下层劳动人民的负担，破坏了社会经济，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强盛的法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始走向下坡路。

〔路易十五和封建专制制度的衰落〕1715 年 9 月 1 日，路易十四去世，年仅 5 岁的路易十五（1715—1774）继位。先王为保持政权的稳固曾留下遗嘱，命组成摄政会议，辅佐幼主。但巴黎高等法院否决了遗嘱，拥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腓力一人摄政。在腓力摄政期间（1715—1723），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政策多被摒弃，贵族跋扈、宫廷腐败，政治黑暗。1723 年腓力中风而死，两年后路易十五的太傅弗勒利掌握了政权。弗勒利执政 17 年，内政和外交上都谨慎从事，发展经济，与民休息，缓和社会矛盾，法国政局有了一定好转。但路易十五亲政后，法国政治腐败又趋加剧。路易十五平庸无才，且不视政事，在他统治时期，国家大权完全掌握在他的情妇手中，法国宫廷奢华糜烂，政府债务愈陷愈深，封建压迫剥削日益加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从 1750 年起，人民起义不断发生。路易十五的一个大臣描述说：“人们看到，在国王和他的臣民之间一种严重的对立正在增长”，“人民热衷于谈论立即革命的必要性”，专制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法国封建专制制度迅速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经济上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行会制度严重束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豢养一大批寄生的封建贵族，国家赋税不断加码，成为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难以承受的重负。政治上，在路易十五统治时期封建贵族反动，排斥资产阶级分子进入政权机构，国家政权渐成封建贵族独霸的领域，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国家政策中也不再得到体现。这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海外利益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在路易十五时期，法国参与了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1740—1748）和英法“七年战争”（1756—1763），法军连连败北，尤其是“七年战争”中法国的惨败，使它失去了在美洲、东印度等地的大部分殖民地和势

1665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去世，继位的查理二世体弱多病。路易十四以其王后是西班牙公主为由，要求享有一部分西班牙领土，并出兵侵占了佛兰德尔、勃艮第，与荷兰交兵。战争最终结果是西班牙割让勃艮第和佛兰德尔的许多地方给法国。

为阻止法国在东部莱茵河地区的扩张，奥地利、英国、荷兰、西班牙、瑞典于 1686 年缔结奥格斯堡联盟，1688 年双方交战。1697 年双方签订和约，法国放弃不少占领的领土，并承认荷兰奥兰治威廉英国国王的地位。

1700 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去世，提名路易十四的孙子安茹公爵作为西班牙王位继承人，以西班牙王位不得与法国王位合并作为条件。安茹公爵继承西班牙王位，为腓力四世。但后来路易十四却又赋予腓力五世法国王位继承权。西法合并的远景使欧洲各国震惊，荷兰、英国、奥地利和部分德意志诸侯结成联盟反对法国，随即战争爆发，历时 13 年。1713、1714 年双方分别在乌特勒支和拉斯塔特签订和约，腓力五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并对一些领土归属问题作出决定，战争结束。

力范围，法国从此丧失了欧洲强国的地位。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成为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酝酿一场革命。

第三节 16—17 世纪的法国文化

一、法国的文艺复兴

〔法国文艺复兴的产生和状况〕法国的文艺复兴是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的条件下兴起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与基督教会的神学及经院哲学格格不入。为着自身的利益，他们逐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号下发展自己的思想文化。文艺复兴运动包含了复杂的阶级内容，但主导方面说来它是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

法国的文艺复兴受到意大利和北欧人文主义文化的重大影响。北欧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和一些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都曾在法国游历、讲学，传播了人文主义文化。意大利战争中法国国王和贵族从意大利带回大量人文主义作品、艺术珍品和古代作家手稿，深深影响了法国文化艺术界。法国文艺复兴是在吸收和继承国内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法国的文艺复兴开始于 15 世纪末，繁荣于 16 世纪。15 世纪下半叶，法国已有不少人开始注意对古典文化的研究，16 世纪初出现了布戴·戴塔普尔·皮埃尔等法国第一代人文主义者，他们致力于古典作品的研究、考订、整理和编辑工作。在绘画、雕刻以及建筑等艺术领域中意大利对法国的影响几乎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在文学、思想领域则是在法国的民族传统文化基础上吸收了外来文化，形成了法国自己的人文主义文化。例如，法国人文主义学者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保持了博学的特点，在思想领域继承和发展了怀疑主义思想。在文学表现手法上擅长讽刺，等等。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基督教会及巴黎大学的仇视和扼杀，但由于人文主义文化在某些方面符合封建君主和地主贵族的需要，也得到了某些国王、公侯的支持和庇护。国王法兰西斯一世支持人文学者，1530 年成立了以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为主的法兰西学院，成为人文主义者同巴黎大学相对抗的基地。法兰西斯一世的妹妹，那瓦尔王后玛格丽特的宫廷则成为人文主义者的避难所。人文主义文化在同封建基督教文化的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

〔拉伯雷〕拉伯雷（1495—1553）是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最杰出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出身律师家庭，早年在修道院接受教育，后来以行医为业，16 世纪 30 年代开始转向文学创作。他通晓医学、天文、地理、数学、哲学、神学、音乐、植物、建筑、法律、教育等多种学科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等多种文字，堪称“人文主义巨人”。拉伯雷的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巨人传》。《巨人传》共分五卷，取材于法国民间传说故事，主要写格朗古杰·高康大·庞大固埃三代巨人的活动史。

《巨人传》是一部人文主义杰作。拉伯雷用夸张手法讴歌了“人”的伟大，表现了人类的巨大力量，颂扬人性。高康大一生下来便会说话，喝 17000 多头母牛的奶，他的衣服用 12000 多尺布制成。小说主人公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两代巨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体魄和力量，公正善良的品德和乐观主义的天性，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和人的创造力的充分肯定。

拉伯雷提倡人的解放和自由。约翰修士在高康大支持下建立的特来美修道院是人文主义的理想国，体现了拉伯雷政治、社会宗教和道德等方面的思

想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在这里，男女修士来去自由、交往自由、活动自由，而且“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自由的发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高康大把院规概括为“随心所欲、各行其是”，表达了对基督教禁欲主义的蔑视和反抗，体现了资产阶级争取经济政治自由的要求。

《巨人传》还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追求新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欲求。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小说中拉伯雷溶入了天文、地理、气象、航海、生物、人体生理、医药、法律、哲学、语言等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显示了作者的学识渊博，与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作品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拉伯雷把“使人的灵魂充满真理、知识和学问”作为作品的一贯思想，从开卷高康大降生时发出的“喝啊、喝啊、喝啊！”的喊声，到篇末神瓶发出的“喝”的谕示，首尾相应，表达了资产阶级冲破精神奴役、追求新思想、新知识的热切愿望。作品还鞭挞了封建的经院哲学教育，认为几十年的经院教育使高康大变得“呆头呆脑”、“糊里糊涂”了，只是在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后他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巨人”。

拉伯雷还以犀利的笔触针砭时弊，对基督教会、对教皇、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对教会的各种盘剥勒索和宗教裁判所的残暴，都一一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批判，嬉笑怒骂，入木三分。

拉伯雷是一位具有民主倾向的人文主义作家，他比较接近民众，他的作品继承了法国民间文学中讽刺和夸张的传统，大量运用民间语言和民间传说故事，为人民所喜闻乐见。拉伯雷在法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作家具有很大影响。

〔“七星诗社”〕在法国人文主义文化中拉伯雷代表了民主倾向，而七星诗社则代表了贵族倾向。七星诗社是七位人文主义作家的团体，其中以龙沙和杜·贝雷最为著名。1549年，杜·贝雷发表的《保卫和发扬法兰西语言》是七星诗社的宣言书。之后，杜·贝雷在《橄榄集》的序言、龙沙在《诗学概论》和《福朗西亚德》两书的序言中又分别对该派的理论和主张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七星诗社主张用法语进行文学创作，龙沙指出：“舍弃典丽的本国活文字而向死灰里发掘上古文字的余烬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他们肯定法语可以同拉丁语一样用来表达高深的学问和思想，主张通过吸收希腊语和拉丁语词汇创造新词汇等方法扩大法语词汇，推进法兰西语言的统一和发展。但是，他们歧视劳动人民的语言。在文学表现形式上，他们主张模仿希腊、罗马诗体文学及意大利十四行诗体，摒弃民间诗歌体裁，反映了他们脱离人民的贵族倾向。

〔蒙台涅〕蒙台涅（1533—1592）是法国文艺复兴后期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出身穿袍贵族家庭，曾任法院顾问，两度出任波尔多市长。后来，因厌倦仕宦生活，幽居乡间，埋头写作。蒙台涅的主要著作是三卷散文体的《随笔集》，由107篇长短不一的散文构成，内容五花八门，无所不包。

《随笔集》的主题是讨论“人”，通过研究自我而研究人类。他的书房里挂着古罗马作家泰伦修的箴言：“我是人，我认为人类的一切都与血肉相关。”蒙台涅不同于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他既不热衷于翻译、整理或研究古典作品，也不像拉伯雷那样热情讴歌人的伟大和力量，欢呼人的解放，而是冷静地反思与探索人和人生。蒙台涅肯定人生的价值，肯定人的欲望和享受，他说：“一个知道如何正当地享受生存之乐的人，是绝对的而且几乎是

神圣的完善之人。”在一篇文章中他告诉人们不要怕死，应尽情享受生活。只要能享受生活的乐趣，政治制度和宗教信仰都无关紧要。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崇尚古典，用古代的权威代替基督教会的权威。但作为后期人文主义者的蒙台涅却对任何权威都表示怀疑。怀疑主义是蒙台涅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蒙台涅的一句格言是“我懂得什么？”蒙台涅的怀疑是多方面的。他怀疑的主要锋芒是指向基督教会和封建制度。他怀疑基督教神学，认为“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我们自己获得的，它纯粹是别人恩赐的礼物”，“是由外来权威和命令取得的”，“无知是我们的宗教推荐给我们的，运用于信仰与服从”。蒙台涅强调人类见解的五花八门，“天下找不出那么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持完全一致的看法”，认为一切知识都不可靠。在蒙台涅面前，早期人文主义者顶礼膜拜的古典大师同样成为怀疑和鞭挞的对象。

漫漫三卷《随笔集》，信笔写来，似不着边际，但实际上几乎篇篇都是射向基督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利箭。蒙台涅的怀疑主义在当时也有助于打破对古典权威的崇拜，将科学和思想文化从古代作家的禁锢下解放出来，继续发展和进步。怀疑是科学和思想文化进步的先声。

〔博丹〕与蒙台涅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博丹（1530—1596）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当过律师和检查官，担任过省议会的代表，后来又成为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1577年，博丹发表了《论共和国》一书，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

博丹反对当时法国政治上的党派倾轧和宗教上的新旧教纷争，主张建立强有力的君权。为此他号召人们服从国王，在宗教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博丹是欧洲国家主权理论的首倡者。他认为，家庭和其它经济、宗教等组织源自人类交往的本能，但这些组织又不断斗争乃至战争，胜者为主，败者为奴。为了维持秩序，这些组织联合起来，组成国家。国家是最高和最后的组织形式。根据罗马法理，家长在家庭内拥有绝对权力，国家对臣民也拥有绝对权力。博丹对国家和政府作了区分，认为享有主权是国家的基本特征，行使主权的制度决定了政府的形式。君主制的、贵族寡头制的、抑或民主制的政体形式取决于国家主权是授予一人、少数公民或大多数公民。他认为，在这几种形式中，排除女性继承权的世袭君主制是最稳定、最令人满意的政体，表达了此时资产阶级对法国君主制的拥戴。

然而，博丹并不主张绝对君主专制。他认为，国家权力应受到“上帝法”和“自然法”的制约。自然法体现为道德法。博丹对司法管辖权与财产所有权作过区分，指出统治者无权干涉臣民的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他承认财产分配关系与政治权力分配有紧密联系，意识到公民财富太悬殊是危险的，但反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理论。他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主张自由贸易。这些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态度。

博丹关于国家主权的理论对法国和欧洲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此外，博丹对史学思想的发展也作出了贡献。1566年他发表的《理解历史的方法》是西欧第一部比较详备的史学理论著作。他反对当时流行的历史循环论，提出了历史进步的观念。他指出，历史学是一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特殊学科，他还提出了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决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条件下，这些思想不失为精辟见解。

二、17 世纪的思想和文化

〔笛卡尔和伽桑第〕17 世纪的法国是唯理论的发源地，这一新哲学流派的创始人是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笛卡尔哲学对欧洲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他出身“穿袍贵族”家庭，曾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过欧洲三十年战争，漫游过许多国家，1629 年后隐居荷兰，潜心著述。1649 年应瑞典女王之聘赴斯德哥尔摩，次年病逝。重要著作有《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

笛卡尔提倡理性，反对经院哲学的信仰主义，认为人人都有理性，应该运用理性对以往的各种知识进行大胆的、普遍的怀疑，用“理性”的尺度审查以往的一切知识。他提出的基本命题“我思，故我在”的基本点是怀疑，是对基督教及经院哲学的蔑视和反抗，是要求思想自由的呼声。笛卡尔用怀疑主义作为武器向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开战，以人类理性代替宗教信仰，具有反封建神学的进步意义。

笛卡尔把他的哲学分为两部分：“物理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世界观体系）。在“物理学”中他提出了许多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机械唯物论思想。他承认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性和物质运动的规律性。笛卡尔不仅是哲学家，还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在物理学上他是能量守恒定律的创立者，在数学方面他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在心理学、生理学等领域他也做出了重大建树。笛卡尔的思想在 17 世纪上半叶欧洲科学技术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

但笛卡尔的“形而上学”却走向唯心主义。在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时，他是一个二元论者。他认为精神与物质彼此独立、互不依赖、互不影响。在认识论上他是唯理论者，提倡理性，提倡演绎方法，但他把理性看作“天赋观念”，排斥感觉经验，滑向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笛卡尔的哲学反映了当时资产阶级既反对封建制度、又软弱动摇、同封建势力妥协的两面性。

对笛卡尔的唯心主义观点首先发起批判的是同时代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伽桑第（1592—1655）。伽桑第的主要著作有《对笛卡尔 沉思 的诘难》和《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等等。在政治上，伽桑第赞同社会契约论和自然权利说，认为社会和国家是通过社会契约而产生的，人民一旦把权力交给君主，就应该拥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如果君主专横暴虐，滥用法律，人民有权撤换他。在哲学方面，伽桑第基本上是一个唯物论者。他继承和发展了古代伊壁鸠鲁的原子唯物论，认为万物皆由原子构成，运动是万物之本性。在认识论上他是个经验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伊壁鸠鲁唯物的感觉论，坚持知识起源于对外物的感觉，感觉比理性认识可靠。在伦理思想上他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快乐论，认为人生的最高美德是追求幸福，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安宁才是真正的幸福，否定了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观。伽桑第的理论反映了资产阶级中比较激进阶层的利益。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伽桑第的唯物主义仍不彻底，他说：“我公开承认我相信有一个上帝，相信我们的灵魂是不灭的”，向宗教神学妥协和让步。

〔古典主义文学〕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为法国的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对 17 世纪的文学艺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 17 世纪法国文坛上，曾存在过三种不同的文学流派。除人文主义文学

继续流行外，还兴起了巴洛克文学，即流行于贵妇人沙龙里的沙龙文学。贵族们无所事事，精神空虚，往往在虚幻缥缈的想像中杜撰出一些悲欢离合的艳情故事和历史故事。这些作品语言矫揉造作，晦涩难懂，表现出作者自命风雅，但实际上俗不可耐的贵族情趣。最主要的流派则是古典主义文学，它很快统治了法国文坛。

古典主义文学是在君主专制制度的扶植和控制之下发展起来的。胡格诺战争后伴随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巩固，历代统治者都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1635年黎世留组织了法兰西学士院，负责制订语言规范，制订各种文学体裁的规格和格律，监督作家执行。1640年王家绘画、雕刻学院建立，起着相似作用。封建国家通过设奖金、赐年俸等手法笼络文人，扶植文化。当时，有名的文人学士大都趋聚首都，云集王宫，为王室服务。古典主义创始人、诗人马莱伯提出诗歌为王权服务，语言要明晰、合理，创作要有规律。

法国是欧洲古典主义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法国古典主义文化以理性作为基本内容。17世纪，古典主义文学大师下笔行文，都以理性作为标尺，严格以理性控制情欲。古典主义文学理论家布瓦洛曾说：“首先必须爱理性；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著名悲剧作家高乃依的许多作品是以理性和感情、意志和欲望、义务与激情的冲突为主题展开的，而胜利永远属于意志、理性和义务。喜剧作家莫里哀认为古典主义的规律是人人必须遵守的“健全的人的逻辑”，悲剧作家拉辛则坚持古典主义最重要的概念是“合情合理”和“健全的理性”。古典主义文化注重写实，提倡仿古，强调形式和格律。布瓦洛认为，“作家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不要离开常理去寻找文思”，“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主张文艺模仿自然，要求诗人们“好好地认识都市，好好地研究宫廷”，即描写市民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多种类型的人性。在文学形式上，他们主张模仿古代作品，从中得出规律和格律，用作指导。古典主义大师们提倡文字精炼、明确，合乎逻辑，形式严谨划一，遵从格律。例如，在戏剧创作上强调遵从法兰西学士院规定的“三一律”，等等。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三、四十年代是古典主义兴起发展时期；六、七十年代是繁荣阶段；八十年代末走向衰落。在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中涌现了大批蜚声欧洲、名垂史册的卓越古典主义作家，其中最著名的有：喜剧作家莫里哀、悲剧作家高乃依、悲剧作家拉辛、寓言诗人拉·封丹、文学批评家布瓦洛等。

同人文主义文化一样，古典主义文学本质上也是一种资产阶级文化。古典主义作家歌颂理性，是对基督教神学、尤其信仰主义的批判。古典主义作家的作品大都揭露批判了封建制度、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人文主义文化强调天才、个性，强调官能享受，注重抒发强烈的个人情感，在文学表现形式上也不拘一格，不受格律限制。而古典主义作家则强调理性，注重形式格律，讲求统一。这些变化反映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维护国家政治统一、害怕和反对社会动乱变革，以求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扶植下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愿望。可以说，古典主义文化是人文主义文化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巴洛克”源自葡萄牙语，意为“珍奇”“奇妙”。

“三一律”指时间、地点、情节三者的单一，即一出戏只演一个事件，剧情必须发生在同一地方，一昼夜内。

三、宗教改革后的法国教会

宗教改革后，法国主要存在三种教派，即天主教、新教和詹森教。天主教仍为国教，新教得到了信仰自由。直到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南特敕令，法国新教徒的信仰自由才被剥夺，大批新教徒流亡国外。法国境内还大约有50万左右新教徒，秘密维持着新教组织。封建国家在1715、1724、1750年数次颁布法令，重申迫害新教徒，新教徒常常用武装起义表示反抗。直至18世纪70年代，专制政府才被迫逐渐放松迫害，1787年路易十六颁布《凡尔赛敕令》，承认新教徒的信仰自由和政治权利。

17世纪法国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詹森教派。詹森教是根据西属尼德兰伊培斯主教詹森的理论建立的，主张人只有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得救，至于何人得到上帝的恩惠则是先定的，宗教活动不起任何作用。詹森教传入法国后，立即得到响应，信徒主要为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心设在巴黎郊外的王家港。在“福隆德”运动中，不少投石党人信奉詹森教，引起王权对詹森教的仇视和迫害。路易十四亲政后，下令迫害詹森教徒，1709年逐出詹森教派修女，封闭王家港修院。1713年罗马教皇颁布敕令，宣布詹森派为异端。法王随即囚禁了2000多名詹森教徒。詹森教徒在迫害中，坚持活动，积极参与反对法国专制制度的斗争。

法国天主教自15世纪以来，向着“高卢主义”发展，即将法国天主教会置于法国国王控制之下。“高卢主义”在路易十四时期发展到高峰。1682年法国宗教会议草拟“四条款宣言”，宣称王权独立于教权，教皇不得作出任何侵害法国教会自由和权利的事情，重申了法国国王对法国教会享有高级教职的任免权和财产支配权等权利。

由于法国天主教会愈来愈臣属于王权，成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所以受到王权和封建贵族的积极扶植，高级教职始终为封建贵族独占。有人估计，18世纪法国天主教会总资产约40亿里弗尔，占法国总财富的1/3，教会地产占全部土地总面积的1/5，教会从其地产和什一税中每年收入2亿里弗尔，相当于国家总收入的3/5。教会内部的腐败和丑闻十分惊人。教会贵族聚财斗富，沉醉在声色犬马之中。一些主教府邸中珠宝成堆，奴婢成群，美女云集。天主教已经成为一种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注定要首当其冲成为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进攻的目标。

第四节 法国的启蒙运动

一、启蒙运动的兴起

〔启蒙运动的兴起和发展〕随着资本主义与封建专制主义矛盾的不断深化，法国新兴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反对封建统治与教会特权的斗争也迅速展开，这就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后，在欧洲历史上出现的第二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就是启迪和开导人们的反封建意识，给尚处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光明与希望，反对蒙昧主义、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打破旧的传统观念，传播新思想，新观念。

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发展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启蒙思想涉及宗教、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艺术、史学、美学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出现了各种学说体系和大批著名人物，广及欧洲许多国家，其中有英国的阿迪生、斯蒂尔和波普，德国的门德尔松和莱辛，意大利的维科，俄国的别林斯基、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但启蒙运动的中心却在法国。在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影响下，比埃尔·贝尔（1647—1706）首先把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用于宗教和神学，相信理性之光照耀着每一个人，并同样以怀疑论为武器，提倡理性，怀疑宗教，对宗教神学发起攻击，指出教会的虚伪和欺骗，打破了对教会所宣扬的蒙昧主义盲从，贝尔成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到十八世纪中叶，启蒙运动进入高潮，群星灿烂人才辈出，大批思想界巨人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启蒙思想家有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和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及孔多塞。他们从各个方面向封建势力和教权势力发起勇敢的冲击，不辞辛劳地传播进步思想，开启人们的头脑，唤醒沉睡中的人们投入反封建反特权的斗争，启蒙运动作为成熟的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思潮登上了历史舞台，不仅为未来的政治革命制造了舆论，而且为法国创建了高度的精神文明。

法国为什么能够成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呢？这是由法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是法国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产物。具体地说，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法国是欧洲各国中封建统治最顽固、最反动的堡垒，是封建制度的最高典型，法国社会中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之间的矛盾特别尖锐，而封建制度的危机又空前严重，这就为启蒙运动的出现提供了社会基础；第二、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日益加强，形成了一批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文化教养的新兴阶级的代表，为启蒙运动的掀起提供了阶级基础；第三，教权势力的顽固和疯狂，迫使新兴阶级的思想家抛开宗教外衣，投向公开的理性宣传，而近代科学的兴起和英国革命的成功，则为启蒙运动的兴起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实践经验，从而使法国的启蒙运动成为欧洲之中心。

〔启蒙运动的特点〕声势浩大的法国启蒙运动一经兴起，就具有鲜明的特点。特点之一是目标明确。启蒙思想家的锋芒所向十分明确，即反对王权、神权和特权，努力改变旧制度，建立新体制，各个启蒙思想家之间虽然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只要涉及到封建专制统治与反动的教权势力，他们总是采取共同行动，而且每个启蒙学者都根据各自研究的领域，积极宣传“理性”与科学，始终把主攻目标对准专制王朝与天主教会。他们高唱“理性”的赞

歌，向往“理性的王国”，提倡用理性作为衡量一切、判断一切的尺度，把封建专制制度比作漫漫长夜，呼唤用理性的阳光驱逐现实的黑暗，消灭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强调只有科学才能使人正确认识自然，破除宗教迷信，从而增进人类的福利，实现美好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新社会。

特点之二是思想一致。启蒙思想家都有基本相同的哲学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就是怀疑论、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在启蒙思想家中，虽然多为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而哲学家只占少数，但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却在启蒙运动中起着主导作用，那些虽没有哲学著作的启蒙学者，也奉行着大体一致的哲学信仰，而且在启蒙运动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成为批判宗教神学的有力武器。怀疑论成为启蒙运动准备阶段的思想先导，而自然神论则成为启蒙运动发展阶段的思想家的标记，无神论则把启蒙运动推向更高的成熟阶段。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才使启蒙运动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哲学革命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并使启蒙运动具有明确的行动纲领。

特点之三是行动坚决。启蒙思想家都正视现实，认真思考，联系群众，不畏强暴。他们深入社会，细心观察，对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进行独立思考展开无情抨击，提出了理想社会的蓝图，为之进行不息的斗争。他们以人民自居，以宣传群众，启迪民智为己任，为使群众改变旧观念接受新思想，他们出版专门的学术、理论著作外，还出版了普及性的通俗读物，还运用小说、戏剧、诗歌等文艺作品让更多的下层群众了解新观念。因此，不少启蒙思想家都是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例如伏尔泰，不仅著有哲学著作，还发表了大量的史学著作、文艺小说、戏剧和诗歌，堪称为启蒙运动的导师和领袖。这些思想家，常常冒着上断头台、坐牢和流放的危险，为追求正义、向往光明而贡献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启蒙运动虽然有种种共同的特点，但在如何改变封建制度上，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别，反映出各派思想家的不同政治主张。

二、孟德斯鸠和伏尔泰

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从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针砭时尚，议论朝政，急切渴望通过改良，革除封建统治的弊端和教会势力的猖獗，使法国走上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道路。为此，他们提出了种种改革方案。

孟德斯鸠（1689—1755），原名夏尔·路易·德·塞孔达，出身于贵族家庭。父母早亡，他跟随伯父生活，受过法律教育，曾获法学学士学位。1716年伯父去世，他继承了伯父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务，同时接受伯父的男爵封号。在法院的长期供职，目睹封建制度的专横、残暴和腐朽，使他心中愤愤不平。1726年，孟德斯鸠卖掉了法院院长的职位。不久，开始周游欧洲各国，尤其对英国政治进行详细考察。回国后，潜心学术，研究哲学、法学、文学和自然科学，通过著述，寻求革新之路。一生著作甚丰，其中主要有：《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等。

孟德斯鸠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叛者。他猛烈攻击封建专制制度，抨击君主的暴虐、贵族的专横、宫廷的奢侈和官场的腐败。他说，在专制国家，“法律等于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荒唐的是“如果国王是在酒醉或是精神失常时做出这个决定的话，他的敕令仍然是要执行的”。君主一人集中了无限的权力，可以任意剥夺别人的生命。他气愤地指出，人民应该抵制国王为所欲为的暴政。

孟德斯鸠还对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天主教会发起进攻。他从自然神论出发咒骂教皇罪孽深重，非常幽默地称教皇是比国王更狡猾的魔法师。他主张把上帝和人分开，反对神人同形论，反对灵魂不灭说。他揭露了灵魂不灭说给人类带来的严重恶果：“毒害人们不去关心现世生活，不想为改善现世生活而奋斗，差不多在世界各方和在一切时代，都曾使妇女、奴隶、国民、朋友等自杀，希望这样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去为他们所敬爱的人们服役。”但是，他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无神论者，他只主张限制王权，改革宗教，使宗教教义符合当时资产阶级的利益。

孟德斯鸠最卓越的贡献是他对未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设想和法学理论的阐述。孟德斯鸠是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他把国家的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他说：“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经过遵照固定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因此，共和政体是“德行”，但做不到；专制政体是“恐怖”，必须坚决反对；只有君主政体是一种最理想的制度。只要有法可循，君主依法行事，就可以达到“政治自由”。他认为，要实现君主立宪政体，必须象英国那样，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

孟德斯鸠把国家权力分成三种：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他认为必须把这三种权力分开，把立法权交给议会，司法权交给法院，行政权归国王。三者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使它相互平衡、相互牵制。只有三权分立才能实现公民的政治自由，才能有效地防止君主滥用权力。如果不划分权力，国家必然会走向专制。可见，孟德斯鸠提倡“三权分立”的目的，就是要限制国王的无限权力，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参政的愿望，所以，三权分立说成了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奠定了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理论基础。

孟德斯鸠非常强调法的作用。他详细阐述了法律的本质、刑法、民法、婚姻法和家庭法、国际法等理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酷刑，主张置刑必须比例正确，刑罚必须有教育意义，舆论可作为反对犯罪的工具，等等。这些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残酷的封建刑法的批判，也为新兴资产阶级关于人身、财产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论据。成为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

伏尔泰（1694—1778）原名弗郎索瓦·玛丽·阿鲁埃。出身巴黎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法院公证人。少年就读于路易大王中学，他在这所等级森严的教会学校受到种种歧视而播下了反抗封建特权的种子。中学毕业后迫于父命，进入法律专科学校。而后却又违背父命，爱好文学与诗歌。因写诗讽刺朝廷，又与贵族发生冲突，于1717、1725年两次被投入巴士底狱，1726年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达3年之久，深受洛克、牛顿思想的影响，十分推崇英国的政治制度。回国后，以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和封建当局的腐败。他的书被查禁和当众焚毁，本人受到追捕。为躲避迫害，蛰居法国和瑞士边境的费尔内达15年之久，直到84岁高龄才回到巴黎。伏尔泰一生坎坷，却从未停止过用笔进行战斗，他用各种文体写作的作品达百卷之巨。其中，最著名的有：《哲学通讯》、《牛顿哲学原理》、《路易十四时代》、《论通史及各国习俗和精神》等。伏尔泰多才饱学、博大精深、文笔隽永、幽默，既是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又是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中最有影响的伟大人物之一，正如维克多·雨果所指出的，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是天主教会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从自然神论出发，对教会和宗教迷信进行无情的揭露、嘲讽和批判。他指出教会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话”之上的，是“最卑鄙的混蛋所作出的各种最卑劣的欺骗”的产物，是“分裂、内战和罪恶的根源”。在他看来，教皇、主教和神甫都不过是一群“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他还愤怒地抨击宗教裁判所，对教会镇压异端深恶痛绝，指出“小偷仅仅窃取你的财物，而宗教裁判官却剥夺你所有的一切，……思想……灵魂……躯体”。他以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圣经》的产生和基督教神学进行历史考察和批判。他常常在书信中写上这样的格言：“踩死败类”。这句话成为他号召人们起来向封建教会发动进攻的总口号。

伏尔泰在政治上初则赞成开明君主制，继则提倡君主立宪制。在他看来，封建专制主义下的等级制度和贵族特权，践踏了自由、平等。他认为“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因此破坏自由、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和贵族特权必须废除。他向往英国的政治制度，主张依靠开明君主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达到消灭等级和特权、限制王权进而建立英国式的政府。

伏尔泰坚决主张司法改革，严厉抨击法庭量刑不当。提倡有效地惩罚，反对无辜杀人，要允许被告人有顾问和律师，有权拒绝不合法的判决。伏尔泰曾以巨大的决心，坚定的行动，同各种枉法犯罪行为进行斗争，为一件件冤案平反、抗争，得到民众的信赖与支持。

但是，伏尔泰并不是革命论者，他对封建君王仍然抱有幻想，甚至把改革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他对待宗教的态度也是不彻底的，他反对天主教的残暴统治，却并不否认上帝，他认为，出于维护社会公德的考虑，承认神要比否认神好。所以他并没有达到无神论，只是一位自然神论者。

三、卢梭和百科全书派

随着启蒙运动高潮的到来，涌现出一批更加激进的思想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卢梭和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

[卢梭的民主思想]让·雅克·卢梭（1712—1778），祖籍法国，出身在日内瓦一个钟表匠的家庭。出生5天丧母，10岁时父亲因决斗而坐牢。由于家境贫寒，又失去双亲的慈爱，卢梭从小就浪迹天涯，先后做过仆人、学徒、商店伙计和抄写员。16岁时流浪到萨瓦投奔有钱的华伦夫人，一住就是10年。在华伦夫人身边，卢梭如饥似渴地读书，广泛地思考和深入地钻研，先后学习了音乐、数学、天文、地理、历史、哲学和文学。30岁以后，卢梭离开华伦夫人，辗转瑞士、意大利和法国，继续过着贫困和流浪的生活，他同情民众的疾苦，不满特权的专横，对人间的严重不平等极为愤慨，拿起笔与特权社会抗争，一生写下了许多不朽的名篇，主要有：《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新哀绿绮思》、《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和《忏悔录》等。他的著作发表后继续受到政府和教会的残酷迫害，再度被迫离开祖国，直到晚年受赦免后，才重返巴黎。

在启蒙思想家中，似乎没有谁有象卢梭那样大的影响，他是一位多方面作出贡献的学者，一生与教权势力特权等级誓不两立。卢梭在与天主教神学的不调和斗争中，在对封建特权统治的愤怒批判中，大胆地提出了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民主思想。他的革命思想象一阵狂暴的风，吹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法国封建专制的殿堂正是被这熊熊的火焰吞噬的。

卢梭探讨了社会正义问题，从分析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出发，提出了天赋人权的理论，论证了自由、平等的重要。他认为，人类的不平等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后来才产生的。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前，曾生活在“自然状态”中，那时人人过着自由、平等、幸福的生活。可见，“人生来是自由的”，“人与人之间本来都是平等的”。“人人共同的自由乃是人性的自然结果”，是“天赋人权”。但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人们进入政治社会，出现了贫富，人类就开始了不平等的文明社会。卢梭认为，人类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有财产的产生，出现了贫富的不平等。富人为维护财产就欺骗穷人订立契约，制订法律。第二阶段为确保富人的私有财产，设立强有力的政府权力机构，确认强者对弱者的统治。第三阶段，政府机构蜕化，变成为专制权力，出现封建暴君的专横统治，使不平等发展到顶点。是封建暴君的野蛮统治破坏了天赋人权，民众对剥夺自由、平等权的暴君，有权用暴力恢复天赋之人权，实现自由、平等。卢梭认为推翻专制暴君是天经地义的，他说：“以绞死或废黜一个暴君为目的的暴动，乃是一件与他昨天处置臣民生命财产的那些暴行同样合法的行为”。卢梭从阐述不平等的起源中引出了非常革命的结论：民众有权以暴力推翻暴政。

卢梭以契约论为武器，论证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他认为，人民推翻暴君之后，就有权废除不利的契约，重新建立符合人民利益的契约，组成新的国家。他强调，在民主共和国里，必须坚持“主权在民”的原则，主权是至高无尚的，不可分割的。国家的最高主权属于人民。卢梭认为作为主权具体体现的立法权也应属于人民，他说：“立法权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置于法律的约束之外，只能以法行事。领袖、官吏不是人民的主人，而是人民的执法人，人

民随时可以委托和撤换他们，而官吏则无权剥夺人民的决定权。卢梭十分强调法治，他认为法律不仅保障公民权利的平等，而且是个人自由的基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卢梭这种激进的民主思想，成为大革命的一面旗帜。

[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的出版，使启蒙运动推向高潮。《百科全书》全名为《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工艺详解辞典》，1751年出版第一卷，1780年全部出齐，共35卷。为该书撰稿的有：科学家、作家、工程师、医生、航海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等著名人士140余人，由狄德罗（1713—1784）任主编，其核心人物有达朗贝尔、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多塞等人，他们怀着共同的目的以《百科全书》为阵地，对国家和教会的反动势力发起猛烈的抨击，在反动派的疯狂迫害下，仍不屈不挠，团结奋斗，为真理而献身，故名“百科全书派”。

百科全书派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为奋斗目标，以“理性”为旗帜，以无神论和人性论为武器，对封建的国家制度、伦理道德及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宗教神学，进行严厉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他们大力宣传唯物主义观点，宣传物质是第一性的，它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毁灭，反对上帝造人说。并指出，一切存在物都是处于不断运动的物质，认识来源是感觉，是外界物质作用于感官的结果。“没有感官，就再没有什么东西能使我们去认识”。他们从战斗的无神论出发，勇敢地揭穿了教会的虚伪和反动，明确指出任何超自然的存在，都是虚幻的产物，上帝创造世界是一种妄想。宗教是神圣的瘟疫，宗教迷信是僧侣用来束缚人们的观念，压制人们智慧的工具。暴君则利用教会来欺骗，他们狼狈为奸，共同联合起来窒息天才、理性和自由，奴役和压榨人民，因此，人民必须无情地摧毁宗教迷信和打击暴君。

宗教宣扬人生是一种过渡，天堂才是人们真正的故乡。法国唯物论者则严厉驳斥了宗教神学宣扬的这种“来世说”，爱尔维修愤怒地指出，这是叫人放弃尘世的感情，做一名服服贴贴的奴仆，去追求虚幻的天国生活。他说：“如果人生不过是旅店又何必对世事如此关怀？一个旅客是不会叫人修理他只住一宿的客栈的墙壁的”。法国唯物论者大声疾呼，人们应该关心人间的幸福和现实的利益，禁欲苦行，弃绝享乐，是完全违反人的自然本性的。他们宣告：人类的事业不是安排彼岸来世的生命，而是依靠知识和理性，以科学的征服和人类无限进步的信念，在现实的土地上建立人类和普遍幸福。

百科全书派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比较保守，接近自由派贵族，主张开明君主制。可是他们的行动，却表明了他们是否定旧制度的宣传者，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言人。《百科全书》的出版，为法兰西民族建造了一座精神文明的纪念碑。

四、启蒙运动的历史地位

18 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在法国和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不朽的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启蒙思想家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通过学术论著、通俗读物、戏剧演出、诗歌朗诵、民歌小调，沙龙辩论和公开演讲等各种形式，向社会各界广泛传播天赋人权、自由平等、主权在民的新思想、新观念、新理论。他们冲破千年禁区，把封建主义的传统信条倒转过来，使得世代被禁锢在封建思想牢笼之中的人们为之耳目一新，开始了对社会对现实的反思，从而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觉悟，鼓起了荡涤封建意识、冲决封建专制的勇气，激发了广大群众反封建反教会争民主的革命热情。为大革命作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

启蒙思想的传播，还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诸如拉法耶特、米拉波、布里索、罗兰夫人、罗伯斯比尔、丹东等等。各派革命领导人无一不是在启蒙思想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启蒙运动，才使法国大革命“完全抛开了宗教外衣，并在毫不掩饰的政治战线上作战”。从而使反封建的大革命达到非常彻底的结局。

启蒙运动一经兴起，就越出国界，跨过时代，成为各国先进人士的思想理论武器。法国启蒙运动提出的新思想直接推动并深刻影响了俄国、德国等封建大国中民主思想的传播，促进了这些国家反封建的文学革命和哲学革命。在意大利，许多启蒙思想的宣传者，都自称是法国启蒙学者的信徒和学生。对美国独立战争的影响更是十分明显，北美《独立宣言》中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思想，就是卢梭思想的法律化。法国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思想起着指导作用，不同程度地推动了世界上不少国家和民族及其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法国启蒙思想家崇尚知识，提倡科学，他们所创立的全部学说，包括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政治的各个领域中提出的新思想新观念，是资产阶级精神文明的顶峰，同时也为人类精神文明建立了丰碑，为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启蒙思想家中的许多作品，已传遍世界，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强烈的革命气息，焕发出要革新、要前进的反封建迷信的精神力量，一直起着鼓舞人们奋勇上进的积极作用。

第五章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共和国

第一节 旧制度的危机和革命的爆发

一、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

[路易十六的统治政策]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他曾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1774年路易十五在民众的怨声载道中死去。他的孙子、王位继承人路易即位，称路易十六（1774—1792）。

路易十六喜爱狩猎和修锁，有“锁匠国王”之称。他并不专横独断，也不贪图享乐，但思维迟钝，行动笨拙，意志薄弱，容易为权臣左右。20岁即位后，左右国事的先是首相莫尔泊伯爵，继为王后奥地利公主玛丽·安托瓦内特。

面对祖父遗留下来的困难局面，尤其是财政危机，他一直尝试进行改革，先后起用四任主要的财政总监。1774—1776年任财政总监的是重农学派领袖人物杜尔哥，他上任后提出了庞大的改革计划：免除农民徭役，撤销国内关卡，取缔行会和商业公会，要求教士和贵族同第三等级一样纳税、实行开明君主政体。结果，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而下台。1777~1781年，著名的瑞士银行家内克尔被授权主管财政，因为是外国人和新教徒，所以没有“财政总监”的头衔。为了解救宫廷财政支出的燃眉之急和混乱，他取消了杜尔哥的改革，只采取了极为有限而温和的措施，即紧缩开支，削减显贵年金，根据税收和公债量入为出，并欲以公布财政收支情况而开放一点政治，但也被迫引退。1783—1787年任财政总监的卡隆却采用了与内克尔正好相反的办法。他以提倡奢华和挥霍来取媚王后，笼络权贵，蒙骗群众，造成政府拥有充分的债务偿付能力的假象。他寄希望于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会同意征收新税，但当政府每年巨额财政赤字的事实暴露出来后，他的垮台命运也就注定了。卡隆的职位空缺连同他所留下的烂摊子一起交给了图卢兹的大主教布里安，正是布里安把这场王家领导的改革引向了绝境。

[经济的发展]宫廷或政府的财政危机是一回事，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状况则是另一回事。马蒂埃正确地指出：“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

诚然，十八世纪后半期法国经济处在发展和转机阶段。在纺织业方面，手工工场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里昂的丝织业有6.5万名工人，雄踞欧洲同业之首。奥尔良的纺纱业中已出现珍妮纺纱机。兰斯地区的呢绒工场以大量产品供应军需。在采矿和冶金业方面，东北边境的昂赞煤矿拥有4000多名工人，并装备了12台蒸汽机。克勒佐冶金工厂以最新式的技术设备名闻遐迩。阿尔萨斯的炼铁工厂也有了英国式的熔炉。可见，在工矿业的先进部门中，在手工工场发展的基础上，近代性质的生产已经萌芽。

在对外贸易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1716—1789年间，出口的农产品增加1.5倍，工业品增加2倍，殖民地商品增加9倍，其中以对地中海东部诸国及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最为活跃。仅1774—1787年的13年间，对外贸易总额就增加近1亿里弗尔，1787年时达到11.55亿里弗尔。

贸易的发展促使沿海港口城市如马赛、波尔多、南特、鲁昂、勒阿弗尔等地的工商业和运输业趋向繁荣。

伴随工商业发展而来的是金融信贷的勃兴。银行数目快速增加，杜尔哥在 1776 年创办的巴黎贴现金库次年就发行纸币。为积集巨额资本而出现了股份公司，如印度公司、保险公司、自来水公司等。交易所中活跃着股票和债券的投机买卖。包税人通过替国王承包征收各种间接税、盐税、烟税、印花税等而大发横财。经纪人在商品流通领域大显身手，成为令人垂涎的职业。巴黎是当时金融业巨子汇聚之地。据内克尔说，当时法国几乎拥有欧洲近半数的现金。

在农业生产方面，在普遍的封建所有制和广泛的落后农耕方式之中，也冒出了一些新式农业的胚芽。在巴黎附近、法国西北部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区，出现了产量最高、最为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式农场，它们与工商业中心相伴生，构成农业革命的发源地。法国农业总产值从 1701—1710 年的 11.85 亿法郎增至 1781—1790 年的 26.01 亿法郎。1700—1790 年间，法国农业生产估计每年平均增长 0.6%，略高于人口每年平均增长率 0.3% 强。

由此可见，革命前法国的经济状况，即使称不上繁荣，至少也处在发展之中。

[社会的变化]如果说国家经济正在发展的话，那末，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和广大下层群众的贫困却是确实无疑的。

一般认为，革命前法国人口总数约为 2800 万。1789 年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农业占 59%，而农业人口却占 85%。法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因此，要进行社会阶级分析，首先要从土地所有制问题入手。

革命前法国的土地制度极为复杂。大体上包括耕作者的使用权、部分个体农民的占有权、资产者的不完全所有权、贵族的领有权、教会的拥有权等，而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国王又似乎具有最终的所有权，这些都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所有权。总之，它是一种普遍保留着村社共耕共有习俗基础上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是这种情况，使革命期间面临的土地问题分为三类，即废除封建权利和义务，拍卖教会和逃亡贵族的地产，处分村社的公有土地。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了封建的等级结构。根据革命前的旧制度，从法律角度可以把全体法国人分为三个等级，即作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以及包括其余所有人口的第三等级。但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等级在占有财富方面并非同其法律地位完全相符。

教士属于第一等级，约 12—13 万人，占总人口的 0.4—0.5%。天主教会拥有全国土地的 1/5—1/6。其收入除了教会地产所得（年平均在 1 亿里弗尔上下）以及接受教徒馈赠之外，主要还有什一税（每年超过 1 亿里弗尔）。高级教士由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长等组成，几乎都出身于宫廷贵族阶层，

在一般教科书中通常给人造成如下印象，似乎大革命前的法国农业生产处于绝对衰落状态。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实际。从纵向的长时期视角来看，尚未展开农业革命的法国封建式农业可以说是落后的；但从横向来看，即与同期欧洲各国相比较，除了远远走在前头的英国和尼德兰之外，法国农业并不逊于大陆其它国家。

当时法国币值的计算单位是里弗尔（livre）或法郎（franc）但实际流通的货币分金银铜三种：金币 1 路易（Louis）=24 里弗尔；银币 1 埃居（écu）=3 里弗尔；铜币 1 苏（sou）=1/20 里弗尔。1 里弗尔的币值略低于同期英国货币中的 1 先令（1 英镑的 1/20，等于 12 便士），约当 10

他们的平均年收入约数万里弗尔，高的可达数 10 万乃至上百万里弗尔。低级教士包括本堂神甫以下的所有神职人员，一般出身低下，平均年收入约数百里弗尔，其中少数人亦可达数千里弗尔。教士作为第一等级，享有免税特权，并且受到国家政权和教徒的尊重。天主教是法国专制王权的强大精神支柱。一般教士，特别是高级教士，是旧制度的支持者。但低级教士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要求革除教会的积弊，憎恶教会上层的腐化，同情被压迫群众的疾苦，故倾向于革命。

贵族为第二等级，约 30 多万人，占总人口的 1—1.5%。全国大约 1/5—1/6 的土地属于贵族。他们除了地产所得之外，还因担任官职和在宫廷服务而获得年俸和赏赐。以世家贵族出身为主的佩剑贵族分为宫廷贵族和乡居贵族，前者约 4000 户，聚集于凡尔赛宫廷，其中一部分担任政府和军队的高级职务；后者一般居住在外省，活跃于地方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界。以受封贵族出身为主的穿袍贵族和行政贵族，由通过买官晋爵的道路而跻身于贵族之列的富有资产者所构成，他们分别担任司法职务、地方行政官吏、军队官佐等。少数上层贵族（公爵等）年平均收入达百万里弗尔之巨，奥尔良公爵（即菲力浦平等）在革命前夕年收入竟高达 1000 万里弗尔，一般大臣的年俸也有 10—30 万里弗尔。也有许多贵族已破落不堪，甚至负债累累。据说布列塔尼地区某地有 1/3 的贵族已穷到几乎象乞丐。然而，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如免税、特殊司法审理权等）和荣耀的社会地位，仍是平民中野心勃勃者的追逐目标。贵族等级作为一个整体其利益是与旧制度休戚相关的，但由于同专制王权的矛盾，贵族等级内部各集团利益的冲突，以及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中也游离出一批倾向于革命的杰出人物。第三等级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占总人口的 98% 以上。第三等级职业构成极为多样，经济地位也相差悬殊，大致上可划分为资产者、城市平民、农民三类。他们的共同点是没有特权，处于被统治地位，几乎承担国家税务的全部重负。

资产者的人口约 25 万，又可区分为食利资产者和实业资产者。食利资产者依靠投资放债的利息或收取地租为生，属于他们的土地约占全国土地总数的 1/6。实业资产者由从事商业、工业和金融业的实业家构成，包税人是其中获利最多、最为富有的部分。大包税人富埒王侯，据统计，1751—1775 年间去世的包税人平均遗产达 390 万里弗尔。资产者的上层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作为一个新兴阶级，从根本上是同旧制度相对立的。他们的政治思想代表大多属于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公证人、教师、医生等，其经济收入一般不高，但他们有知识有能力，思想活跃，勇于进取，从中涌现出一批杰出的革命领袖人物。

城市平民包括小业主、小商贩、行会师傅、手工工场和手工业工人、帮工、学徒和雇工等，总人数大约 200 多万。他们一般没有文化，从事体力劳动，生活贫苦，但内部差异也不小。工人日工资为数十个苏，大部分收入用来购买面包。他们不仅收入低微、劳动条件恶劣，而且深受物价（特别是粮食和日用必需品）上涨之苦。城市下层劳动人民构成了革命期间无套裤汉运动的基本群众。

农民人数在 2000 万以上，占总人口 80% 左右，而所占有的土地却只占土地总数的 35% 左右。革命前法国农民基本上获得了人身自由，只是在东部和中部的若干地区还残留大约 100 万名农奴。自由农民，根据其对于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以及经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本身占有

足以维生的土地和农耕家畜的较富裕的有产农民，其中一部分由于租赁大片土地经营农场，牧场或葡萄园而成为资本主义式富农。这一类农民人数不多。人数最多的一类是租佃农民，他们从领主那里租种小块土地，或者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或货币地租，或者按土地收益分成。当时最盛行的土地租佃制度是收益分成制。第三类是无地或极少土地的农村无产者，他们或者在农村充当雇工、打零和干杂活，或者流向城镇，成为城市无产者的后备大军。这一类农民人数也不少，仅次于第二类。

农民所受的剥削最重。由于各地地区差异以及各类农民处境不同，所受剥削的轻重当然也有程度之别，但一般说来有三重负担，即对教会、对领主和对王家政府。每次收成之后，先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从七、八分之一到十几分之一不等，平均约十三分之一）。然后向领主交纳各种封建地租并尽各种封建义务，如不甚高的年贡、香巴尔耕种税或几乎占收成半数的分成制佃租等，还要交纳烘面包税、榨葡萄酒税、使用磨坊税、过桥税、市场税等杂税及服一定日期的劳役。领主的狩猎权和养鸽养兔特权又使农民的庄稼遭到蹂躏。王家政府征收直接税（人头税、所得税、念一税等）、间接税（盐税、靴鞋税、酒税、烟草税等）和王家劳役（筑路、军用运输等）。

革命前国家征收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如按人口平均分摊，大约每户年负担50—60里弗尔。但是，大约50万个家庭（教士、贵族、官员和许多城镇）享有不同程度的免税特权，而大约450万个下层穷苦家庭却几乎承受了全部税收负担。间接税重点不是征收奢侈品税，却对普通生活必需品征收重税，其中仅盐税一项每年即达5000万里弗尔。加上包税人的中间盘剥，就更加加剧了农民的苦难。据杜尔哥在1766年计算，在利穆赞这样的贫穷地区，一个家庭在各种税负之余，每年只剩下125—150里弗尔供生活消费，简直难以糊口。因此，在旧制度末期，流浪汉和乞丐的数目大大增加了。税负分担的极不合理，是农民抗议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不仅反对封建领主，也反对腐朽的天主教会和专制主权。

二、改革的失败和革命形势的成熟

[政治经济危机的尖锐化]1787年布里安继任财政总监时，法国发生的几件大事使政治经济状况更趋恶化。一是1786年签订的英法商约此时已显露出严重后果。法国政府出于封建主阶级利益的考虑，为使英国减低法国葡萄酒的进口税，以牺牲本国工商业利益为代价，同意减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此后，英国廉价工业品源源输入，冲击法国市场，使企业倒闭，工人大批失业，造成了工商业危机。二是1788年天气反常，夏季的干旱，继以带雹的暴雨，最后又是冬季的严寒，使农作物大幅度减产，葡萄园也遭受摧残，出现了粮食奇缺，物价飞涨，城乡下层居民饥寒交迫的局面。其间，工资下降20—30%，而面包价格却上涨50%。据估计，全国约有上百万人被迫到处流浪，以求谋生之路，其中仅巴黎一地即超过10万。

在这种情况下，城乡群众连续发生暴动。1788—1789年间，农民暴动几乎席卷全国各地，其中以诺曼底、布列塔尼、阿尔萨斯、弗朗什—孔泰等地区的暴动声势最为浩大。暴动农民攻打领主庄园、烧毁封建文契、强迫领主和商人以平价出售粮食等。在北起里尔、敦刻尔克、南至马赛、土伦、埃克斯的许多城市都发生了市民暴动。普遍要求降低食品特别是面包的价格。其中最有名的是1789年4月底巴黎的“雷维耶翁事件”，数千名工人冲上街头游行示威，焚烧声言“工人不配吃好面包”的手工业主雷维耶翁的模拟像，捣毁他的住宅和厂房仓库，并用石头和瓦片抵抗警察的镇压，双方死伤达数百人。

与此同时，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知识阶层倾向于社会变革，公众舆论对专制统治和贵族特权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沙龙、咖啡馆和俱乐部中，无论是窃窃私语或是高谈阔论，主题总离不开对现政权的抨击。抨击性的小册子在社会上到处流传，它们反映第三等级各个阶层的利益，把启蒙思想的基本理论通俗化。剧作家博马舍的著名讽刺剧《费加罗的婚礼》以平民费加罗反抗贵族企图对其未婚妻实行农奴式初夜权的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故事，来象征第三等级即将获得胜利。作者通过主人公费加罗的独白辛辣的嘲笑道：贵族们高傲自大，享尽荣华富贵，“但你们究竟作了些什么而值得享有这一切呢？只是在出娘胎时努力过一阵子！”该剧创作于1778年，直到1784年才冲破统治者的禁令开始上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由此可见，革命的危机已趋于成熟。不仅下层群众因生活所迫而暴动不息，知识阶层对现政权也失去了信心。而上层统治集团的分裂也以贵族抗税的形式表现出来。整个社会出现严重动荡。

[从显贵会议到三级会议]路易十六尽管不断试行改革，但财政危机反而日趋加剧。据1774年杜尔哥任财政总监时估计，当时年财政赤字约3700万里弗尔，债务总额为2.35亿里弗尔。到1787年时，年财政赤字上升到1.12亿里弗尔。由于参加美国独立战争而支出战费20亿里弗尔，再加上每年赤字的积累，到1789年时债务总额已增至45亿里弗尔。仅支付债务的开支每年即达3亿多里弗尔，占国家财政总支出6亿里弗尔的一半左右。国家财政已到了唯以为继的程度。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调整捐税政策，向特权等级开征捐税。

1787年2月22日召开的显贵会议迫使卡隆下了台，但新接任的布里安也别无良策，只有开征新税。显贵会议拒绝课征新税，不得不于5月25日草

草闭会。布里安转而想强迫巴黎高等法院同意注册征收印花税和土地税，又遭拒绝。显贵会议和高等法院中的世家贵族和受封贵族们同样坚决维护本等级的特权，不想随便作出让步。他们提出召开三级会议的要求，希望借助于这一中世纪机构的权威来抑制国王的专制权力。教士等级也持同样的态度。同时，自由派贵族和广大民众也都带着自己的希望，或者要推行君主立宪制，或者要实现较大程度的自由和平等，普遍要求召开三级会议。

这样，形势表明国王已别无出路。1788年8月，路易十六终于同意在1789年5月1日召开三级会议。同月，布里安倒台，内克尔又被起用。

三级会议自1614年最后一次召开以来，已经中断了175年。会议由教士、贵族和市民三个等级的代表组成，每一等级的所有代表合起来只投一票，因此结果总是有利于特权等级。时过境迁，此刻形势大变，第三等级已羽毛丰满，他们不愿再接受只占1/3的代表名额和按等级投票的方式。

1789年2—5月，举行了三级会议代表的选举。按照政府公布的选举法，贵族和高级教士的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而第三等级却实行复选制，并受财产资格和居住年限的限制。其间，第三等级的思想家政治家进行广泛的宣传。各个等级和各个阶层以陈情书的形式委托代表传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据估计，陈情书总数达5.5万份之多。在陈情书中，第三等级严厉谴责专制政治，要求制定一部宪法来限制国王和大臣的权力，根据宪法定期召开国会，由国会制定法律和决定税收。由于第三等级的积极活动，促使了革命形势的迅速成熟。

三、革命的开始

[从三级会议到制宪议会]1789年5月初，三级会议准备就绪。选举产生的代表名额共1139名：教士代表291名，其中高级教士代表约占1/3；贵族代表270名；第三等级代表578名，其中律师几乎占一半，还包括2名教士和12名贵族。教士西哀耶斯和贵族米拉波就因为分别遭到本等级的排斥而被第三等级推选为代表。第三等级代表不仅居有人数上的优势，而且具有新兴势力的勃勃生气。

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正式开幕。但是，无论是国王路易十六的开幕词，或是掌玺大臣巴朗登的致词和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讲话，都使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感到失望，他们只谈财政困难和税收，而闭口不谈政治改革。这表明，宫廷只把代表们当作纳税人而不当作立法者，当作专制君主的臣仆而不当作拥有主权的国民的代表。面对第三等级咄咄逼人的形势，宫廷希望保持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的分裂；而特权等级也感到只有依赖宫廷才足以对付第三等级。

接着，由于代表资格审查问题而引发了关于会议召开方式的争执，进而导致第三等级代表在议会斗争中的胜利。第三等级主张三个等级一起开会，共同进行资格审查，这无异于取消等级划分，以个人表决代替等级表决；特权等级则坚持三个等级分别进行。争执持续了一个多月而不能达成妥协。第三等级不得不单独审查自己代表的资格，然后，于6月17日宣布他们代表全体国民，组成国民议会。19日，教士等级以微弱多数（149：137票）通过决议，加入第三等级的国民议会。当晚，在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怂恿下，国王以整修内部为借口下令封闭议会会场，企图中断议会的召开。20日，国民议会的代表们发现会场被封闭，愤怒异常。于是，在议会主席巴伊的率领下，代表们排着队转移到附近的网球场开会。在这空荡荡的会场里，站立着开会的代表们满怀神圣的责任感，一致举手通过誓言：在没有制定出法兰西宪法之前议会决不解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网球场宣誓”。会后，网球场又被封闭。22日，国民议会迁移到圣路易教堂召开。这一天，大多数教士代表参加了会议。23日，会场周围警备森严，国王亲自驾临并主持三级会议，命令撤销国民议会及其一切决议，仍然保留三个等级并分别开会，否则将解散会议。讲话完毕后国王立即离开会场，并命令散会。这时，教士和贵族代表遵命退席，第三等级代表拒不服从。米拉波以他高亢宏亮的声音号召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信守不制定宪法决不散会的庄严誓言。他严词训斥前来督促会议遵从国王关于散会命令的大司礼官道：“去告诉你的主人，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受命于人民，只有用刺刀才能把我们赶走。”于是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维持国民议会的所有决议，并宣布议员有不受侵犯的权利。随后几天，许多教士和贵族陆续来参加会议。到了27日，国王被迫同意三个等级共同开会，三个等级之分就此消失了。代表们沉浸于这场议会斗争胜利的喜悦之中，决心要完成自己的职责，即制定宪法，创建一个新型的政治制度。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更名为制宪议会。

[攻占巴士底狱]在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进行议会斗争的同时，另外两支力量也行动起来了：一方面是巴黎人民支持议会中第三等级代表的自发活动，另一方面是宫廷企图集结军队，用武力扼杀议会。凡尔赛所进行的斗争引起了全国的关注，人民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巴黎尤其如此。报纸和传单迅速报

道最新消息。街头巷尾对时局议论纷纷。在林荫大道和广场上，特别是在罗亚尔宫院内，到处聚集着聆听演说和朗读报纸的人群。6月25日，巴黎的400名三级会议选举人自动集会，不久即移往市政厅，组成常设委员会，成为支持国民议会和对付贵族阴谋的重要力量。6月29日起，又着手组织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巴黎的驻军为群众的激情所感染，往往参与活动，甚至拒绝执行向群众开枪的命令。6月30日，发生了群众冲进监狱救出10名因抗命而被囚禁的士兵的事件。

第三等级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不断胜利，使宫廷十分震惊。宫廷贵族们敦促国王采取行动。6月26日，国王暗中下令调动军队集结巴黎和凡尔赛，决心实行暴力镇压。此时，大批军队陆续开到，特别是绝对服从国王的外籍军团的到达更加惹人注目。凡尔赛宛如一座大兵营，巴黎也被军队所包围。7月9日，国民议会上书国王要求撤走军队，遭到国王的坚决拒绝，反而以防止骚乱和保护议会为由，示意议会迁往外省。7月11日，国王下令驱逐内克尔，并撤换各部大臣，由老元帅布罗伊主持军务，着手调兵遣将，准备镇压。

7月12日（星期天）下午，内克尔罢官的消息传到巴黎，全城震动。此事被认为是国王的阴谋。年轻记者卡米尔·德穆兰在聚集着成千上万民众的罗亚尔宫院内登台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内克尔被免职是即将对爱国者实行大屠杀的信号，大家只有拿起武器才有生路。接着，人们抬着披上黑纱的内克尔半身雕像沿街游行，一路上队伍不断壮大。王家军队一度冲散队伍，但大部分士兵反而转向爱国群众一方。当晚，人群又涌向市政厅，要求敲响警钟，武装公民。巴黎的一些选举人也到市政厅去，企图掌握领导权。

7月13日晨，巴黎市政厅和各个教堂的警钟敲响了，人们涌向大街和广场，组成了民兵队伍，在“我们要武器！”的口号声中，冲向武器库和军械厂。当天，设在市政厅的常设委员会决定组织4.8万人的国民自卫军，号召公民报名参军，以便控制局面。国民自卫军没有薪饷，而且要自备武器和华丽制服，因此，它只能由有产者组成。

7月14日，巴黎人民已控制了市内各主要地区。他们又在荣誉军人院发现了一批枪支，于是就用枪支、刀剑和大炮把自己武装起来。当巴士底狱城堡上的大炮正对准圣安东街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被激怒了，全巴黎响起了“到巴士底去！”的呼声。巴士底狱这座中世纪的城堡、关押政治犯的森严监狱，不仅由于它居高临下的地位对巴黎人民构成直接的威胁，而且由于它是封建专制黑暗势力的象征而令人恐惧和憎恶。从上午9时起，武装的人民和士兵团团围住城堡。在城堡司令下令开火后，双方开始了激烈战斗。经过4个多小时的围攻，以近200人死伤的代价，终于攻克了城堡，处死了城堡司令。这时，愤怒的人民动手用铁铲夷平这座可憎的监狱。

7月15日，国王的一名近臣向国王报告了巴黎的消息，路易十六吃惊地问道：“是一场叛乱吗？”近臣回答说：“不，陛下，是一场革命。”于是，路易十六有点清醒了，他告诉议会，已命令军队撤离巴黎和凡尔赛，答应召回内克尔，并表示要去巴黎会见群众。

7月16日，议会委派由100人组成的代表团到达巴黎，受到巴黎群众的热烈欢迎。代表团成员巴伊由于长期担任议会主席、在网球场宣誓时表现突出而被常设委员会任命为巴黎市长，拉法耶特则由于在北美独立战争中的功勋以及在议会中作为自由派贵族的杰出代表而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

7月17日，路易十六来到巴黎市政厅，从新市长巴伊手里接受了蓝白红

色帽徽（红蓝二色代表巴黎市，白色代表波旁王室），表示批准新官吏的任命。这一行动象征他已承认了议会，承认了巴黎市新政权，承认了这场革命。

以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为标志的法国革命的第一个回合胜利了。因为议会与巴黎的革命民众表现出联合的迹象，因为国王屈服了，因为使王权受到限制的君主立宪制事实上存在了。但是，革命远远没有结束，新的斗争势必波澜迭起，因为国王并没有真正屈服，以王弟阿图瓦伯爵为首的封建贵族纷纷流亡国外，策划组织国内叛乱和欧洲反法联盟，因为新掌握政权的上层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与广大法国人民有着严重的分歧。

第二节 君主立宪派的统治

一、君主立宪政体的建立

[市政革命和农村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和以巴伊、拉法耶特为首的巴黎新市政机关的建立，迅即影响全国。许多城镇都以巴黎为榜样举行起义，捣毁当地的“巴士底狱”，建立新的市政机关和成立国民自卫军，从而使地方政权和武装力量都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国王委任的地方官吏，或者被驱逐，或者采取放任态度，有的甚至转而参与领导活动。各地情形大致相同，只不过行动方式和激烈程度略有差异。旧制度在城镇中的统治就这样几乎毫无抵抗地崩溃了。这场运动史称“市政革命”，它使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扩及全国范围。

农村革命的范围更广，持续的时间也较长。由于它带有更暴烈的色彩，使封建阶级连同其它有产阶级都感到惊惶不安，故史称“大惶恐”。农民手持猎枪、长矛、镰刀和棍棒，纵火焚烧领主的城堡，销毁封建契约和文书，甚至枪杀和绞死贵族领主。农村革命巩固了7月14日革命所获得的成果，说明这次革命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广泛的阶级基础。

必须指出，在这场农村革命中，农民反封建特权的斗争是同反一般所有权的自发斗争混合在一起的。在捣毁领主庄园和仓库时，农民们常常均分所获的牲口、粮食和其它财物；在打击封建领主的同时，他们也针对投机商、高利贷者和收税员。他们往往得到城市贫民的同情和支持。这就使城乡有产者，包括贵族和资产者都受到冲击。加上土匪出没无常、拦路打劫，更加剧了“惶恐”的气氛。于是，大资产阶级就利用他们新掌握的市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运动实行镇压，使革命之初的等级对立带有新的阶级对抗的性质。

[8月4日之夜]在农民运动激烈展开的情况下，制宪议会不得不首先把农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并作出适当的让步。8月3日，调查委员会向议会报告了农民暴动的情况，提议实行镇压。8月4日晚，制宪议会继续开会，讨论对策。会议认为，镇压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故倾向于让步。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提议，为使农民放下武器，应无偿废除人身劳役，允许赎买封建权利，取消一切免税特权。接着，贵族和教士的代表们纷纷登上讲坛，慷慨地表示要放弃自己的封建特权。他们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互相拥抱，涕泪俱下。这次会议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史称“8月4日之夜”。

8月5日至11日，制宪议会连续开会，具体讨论废除什一税和封建权利诸问题。法令规定：无偿废除农奴人身依附和徭役、教会什一税、贵族的狩猎特权；地租和贡赋将按规定价格予以赎偿；废除官职的资格限制和鬻卖制；取消第一、第二等级的免税特权等。但法令同时又加以限制：在政府还没有供养教士的经费之前，人民仍得缴纳什一税；拖延好久才定出来的贡赋赎偿比率，其数额之高也不是普通农民所能负担的。但是，不管怎样，这项法令终究开始冲破封建制度，并且以废除特权给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发展创造了

西方著作称“八月四日之夜”颁布的法令为“旧制度的死亡证书”，而称《人权宣言》为“新制度的诞生证书”。

条件，为大资产阶级同自由派贵族的联合统治奠定了基础。

[人权宣言]早在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更名为制宪议会，就有代表提出要在宪法之前加一个宣言，以说明制订宪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此议因7月间巴黎和各地的革命而搁置下来。8月12日起，又回头讨论宣言问题。8月26日，制宪议会正式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简称《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深受十八世纪自然权论和启蒙学说的影响，一定程度上也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为范本。

《人权宣言》宣布：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人民享有言论、信仰、著作和出版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权宣言》承认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国家组织采取代议制，实行三权分立原则。

《人权宣言》公开声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实行罪行法定主义和无罪推定原则。

《人权宣言》的作者们认为，宣言所宣布的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实际上它是当时历史条件的产物。它以法律面前的平等代替封建贵族的特权，以个人自由和法律统治代替君主制度下的司法专制，以人民主权和代议制政府代替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它在7月间城乡人民革命的背景下承认了群众使用武力反抗压迫的权利。它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强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所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封建阶级。因此，它具有无可否认的历史进步意义，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一面鲜明旗帜。

《人权宣言》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的原则，在当时起了难以估量的进步作用。它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鼓舞他们把革命不断推向前进；它成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锐利武器，它等于宣告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诞生。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人权宣言》也有其阶级局限性。它所宣布的“自由”和“平等”，在现实中都是受财产制约的，因此，它首先有利于资产阶级。随后，在确定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又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如果说全国范围的市政革命和农村革命在事实上推翻了旧政权的话，那末，《人权宣言》的发表则是新制度诞生的标志。

二、君主立宪派的统治

[政治俱乐部]制宪议会通过的 8 月法令和人权宣言，国王迟迟拒不批准，相反，却考虑出走梅斯，象英国国王查理一世于 1642 年出走一样，挑起内战。10 月 1 日和 3 日，国王为秘密调至凡尔赛的佛兰德尔旅团的军官举行盛大的宫廷宴会。此举使遭受饥饿胁迫而对宫廷阴谋深怀恐惧的巴黎人民更加无法忍受。10 月 5—6 日，巴黎群众自发前往凡尔赛，迫使国王全家迁至巴黎，制宪议会也随同迁移。这样，宫廷和议会的活动就处在巴黎人民的直接监督之下。10 月 5—6 日事件是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的又一次自发表现，再度破坏了宫廷镇压革命的阴谋。这次事件后，巴黎的政治局面一度安定下来，同时，政治俱乐部也迅速发展起来。

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俱乐部的活跃。它既脱胎于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传统，又在革命过程中得到发展。它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又是近代政党制度形成以前容纳党派分野的政治外壳。

最早出现的是布列塔尼俱乐部，它在三级会议期间由律师夏普利埃倡议成立，来自布列塔尼的代表们借此集会讨论问题。后来，其它地方的代表也都加入。

10 月 5—6 日事件后，布列塔尼俱乐部迁往首都，设在巴黎圣雅各修道院内，所以便通称为雅各宾俱乐部。这时，它的成员已越出制宪议会代表的范围，开始吸收非代表参加。它以推翻君主专制、实行宪法为宗旨，故又称“宪政之友社”。这一宗旨起初还能够容纳从自由派贵族直到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各种人物。后来，随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党派斗争的激化，该俱乐部屡次发生分裂。雅各宾俱乐部是当时最重要、最著名的俱乐部，在法国革命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革命中各派的著名领导人好多都曾是其成员。议会中的重大议题，往往都在那里进行公开辩论。它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影响深远。

另一个重要的俱乐部是 1790 年初成立的科德利埃俱乐部，因会址设在巴黎科德利埃修道院而得名。它的宗旨是对政府机关和官员实行监督以维护人权，故又称“人权之友社”。该俱乐部会费低廉，而且经常公开举行会议，对外敞开大门，因此，很容易吸引下层市民参加，并反映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要求。这里很少有制宪议会代表，但常常能听到年轻革命家激昂慷慨的演说。它的主要领导人有丹东、德穆兰、马拉、埃贝尔、肖梅特等。

到 1791 年，在巴黎各区和外省许多城市涌现了一批人民团体，它们在发挥群众的政治热情和主动精神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其中最有名的是 1790 年创立的社会俱乐部，在这里曾提出过抨击私有制，要求实行财产平均主义的激进社会主张。另一方面，保王派也曾成立过一些俱乐部，企图用以与平民的俱乐部相对抗，如“王政俱乐部”，它由于遭受群众反对和怀疑而被查封。

[制宪议会的反封建法令] 1789 年 8 月的人权宣言宣布了反封建的基本原则，但许多具体法令则是由制宪议会陆续制定、颁布和付诸实施的。

旧制度与它交叉重叠的地方区划有着密切的关联，各种封建等级特权和割据势力正是建立在旧省区、税区、司法区、军区、教区等等之上的。为了破坏旧制度的根基和奠立新制度的基础，必须统一全国的行政区划。1789 年 12 月 22 日，制宪议会通过了西哀耶斯拟订的方案，规定把全国分为面积和

人口都大致上相等的 83 个郡，郡以下分县、区和公社，公社为基层自治单元，郡则是介于王国政府与基层之间最重要的中间组织；公社行政官员由直接选举产生，郡县行政官员则由间接选举产生。司法体系与行政体系保持一致：郡设一刑事法院，县设一民事法院，区设一治安法院。在新的统一的行政区划的基础上，1790 年 10 月正式废除了国内关税和入市税。

与此同时，制宪议会又从财产和荣誉方面废除了贵族特权和封建等级。1790 年 3 月 15 日法令规定：废除财产继承和分配上的封建特权，如长子继承权、男权、门第特权等。1790 年 6 月 19 日法令又规定：废除世袭继承的贵族阶层，废除一切爵位（公侯伯子男等）、家族纹章、私人扈从徽章等；一切公民都使用家族姓氏。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权力、财产和荣誉都平民化了。

如果说以上法令是对贵族等级的沉重打击的话，那末，对教士等级来说，其打击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1789—1790 年间制宪议会的一系列法令就是如此。

首先是没收教会财产。制宪议会承袭了旧政权的紊乱财政和巨额国债，急于寻找解决办法。八月法令已规定，废除什一税，教士薪金由国家负担，这就为没收教产提供了前提。奥顿主教塔列朗建议，教士应为国家利益放弃这些财产，使国家用以维持宗教开支，并偿付国债。他认为这一措施并不与严格尊重私有制相矛盾，因为教士不是教产的主人，而仅仅是管理人；国家既然承担教会的开支，当然可以占有这些财产。许多教士代表激烈反对，但 1789 年 11 月 2 日，制宪议会仍以多数票（568—346）通过了没收教产的决议。

所没收的教会地产约值 30—40 亿里弗尔。为了使这笔财产得以兑现，制宪议会决定设立特种金库，先发行价值 4 亿里弗尔土地的“指券”，用以解财政的燃眉之急，1790 年 5—6 月间又颁令以分期付款的办法拍卖教会地产，使土地落入资产者和富裕农民手中。这项措施摧毁了天主教会的经济基础，削弱了封建势力；使革命政权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财政供给，从而立稳脚跟；而教产的出售又有利于加强和培养拥护革命的阶级基础。

接着是对全国的教会组织进行重建，一方面为了节省教会经费，加强教会行政系统，另一方面也为了使天主教会完全从属于国家。1790 年 7—8 月间，制宪议会通过了《教士公民组织法》，规定：废除旧主教区，大大削减教区数目，关闭修道院（负责教育和慈善事业的僧团除外）；主教区和行政区划一，即每郡设一主教区，共设 83 个；实行教职选举制，主教由郡选举人选出，教区神甫由县选举人选出，他们毋须罗马教皇授职，也不必向他交纳首岁教捐；教士薪俸由国家支付，按职务高低每年分别领取 0.12—5 万里弗尔不等。1790 年 11 月又通过《宣誓法令》，规定教士必须宣誓效忠新宪政。这些法

郡（department）的划分，其目的是扫除旧区划的积弊，确立全国统一和加强行政效能。各郡人口均在 30 万以上，每郡辖区内的居民都可以在一天内到达郡首府。公社（Commune）的大小相差悬殊，包括最大的城市直到最小的村镇。1790 年 2 月时，法国地方行政区划有 83 个郡，547 个县（distict），4732 个区（canton）以及 43360 个公社。

指券（assignat），原为以国有财产作抵押的国库债券，起初还附带利息，规定在教产陆续出售后，指券即可回收注销。随后指券不断增发，到 1791 年 4 月已达 24 亿里弗尔之巨，它变成革命时期（1789—1797）公认的纸币，与硬币同时流通，也不断贬值。

令取消了教会自成体系的独立组织，剥夺了教士旧日的职能，把天主教会变成从属于新国家政权的机构，因而引起了罗马教廷和法国国内大批教士的反对。

制宪议会还对赎买封建义务和废除行会制度作了具体规定。

1790年2—7月间，制宪议会颁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对于地主向农民征收的各种贡纳税金，农民如能提出证据说明其为非法，则可拒付；对于地主“合法”拥有的封建权力，农民则须支付相当于20年税金总额的款项方能赎偿。这些条件对于农民来说都是相当苛刻的，但终究还是沿着削弱封建权利和义务的方向发展的。

1791年3月，制宪议会正式取消行会制度和对工商业施加限制的各种法规，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这无疑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但同年6月又通过《夏普利埃法》，以防止行会制为理由，宣布禁止工人集会结社和举行罢工。

从制宪议会以上各项法令看来，可以认为它没有考虑城乡下层群众的利益，在某些方面甚至是压制和损害他们的利益。但是，它终究沉重打击了封建制度，对社会实行了较全面的改造，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较广阔的道路。

[联盟节]革命以及各种旧式行政区划的废除，使法国在政治和领土上都得以统一。无需再分所谓多菲内人、布列塔尼人或普罗旺斯人，各个地区旧有的特殊性被取消，大家都成了法国人，都服从同样的法律，同样纳税、同样不分等级头衔。人们为统一而欢欣鼓舞，先是个别省份之间自动结盟以示互助，继而要求全国结盟以庆统一。这个日期定在攻占巴士底狱的周年纪念日。

1790年7月14日，联盟节庆典在巴黎举行。清晨，来自全国各公社各县的代表，各郡的结盟军、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军队代表，排着整齐的队列从巴士底狱废墟出发，穿过城区，在礼炮声中进入马尔斯广场。宽阔广场的四周草坡上聚集着40—50万观众。广场中央筑起一座高高的祖国祭坛。祭坛周围观礼台上坐着国王、宫眷、议会和市政人员。军队和结盟军的军旗迎风飘扬。400名身穿白袍、佩带三色飘带的神甫站在祭坛四角，奥顿主教塔列朗登上祭坛，在军乐声中举行弥撒，尔后又为王旗和83面郡旗祝圣。接着，当天被任命为全国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的拉法耶特登上祭坛作公民宣誓：“永远忠于国民，忠于法律，忠于国王”。制宪议会的议员们也作了同样的宣誓。国王路易十六起立表示自己拥护宪法。此时，广场上欢呼声四起，旌旗飘拂，人民相信君主的诚意，君主相信人民的拥戴。人们快活地唱起了《前进曲》，联盟节就在这感恩的歌声中结束。这一天天气不好，大雨打湿了人们的衣衫，但并没有冲淡他们的热情。

联盟节是法兰西统一的象征。自此以后，法兰西民族统一的基础不再仅仅是对一个共同国王的服从，而是根据为各个地区所共同接受的原则建立起

据估计，全国的主教（除7人外）以及近半数的低级教士都拒绝宣誓，从而使法国教士分裂为宣誓派（宪政派）和反抗派。政府为了安抚反抗派，于1791年5月7日颁布了信仰自由法令，这又引起宣誓派的不满。其间，还形成了反宗教的势力。由是导致了法国革命时期复杂异常的宗教斗争。

“联盟节”一词法文为fete de la Fédération，其中“联盟”一词取自英文federation，实际上有仿效美国独立后各州联合组成联邦、实现统一的意思。

来的新制度。国家已高于国王，一切都不再冠以“国王的”形容词，而称作“国家的”了。

联盟节是法国革命中各等级各阶级各集团表面上和谐团结的高潮，也可以说是革命所度过的短暂蜜月。

[1791年宪法]《人权宣言》公布后，制宪议会一方面就宪法的具体内容进行长时间拖延难决的争论，另一方面又连续颁布了一些单项立法。这些立法损及贵族和教士的特权，使他们从不满意转向仇恨、敌视、逃亡和反抗。同时，欧洲其他封建君主的敏感神经也被触动，他们以警惕的目光注视法国局势的发展，伺机干涉，而首先是包庇和鼓励逃亡者。

经多次策划之后，1791年6月20日路易十六一家化装出逃。但21日在离边境不远的瓦伦镇被发现，于25日被押回巴黎。瓦伦事件激起了群众的普遍公愤，使人民的政治思想发生了一次突变，原来拥护国王的人，有许多转而赞成共和，主张废黜国王。科德利埃俱乐部成了共和运动的大本营。雅各宾俱乐部内部发生分裂。左派痛斥国王的叛变行为。而拉法耶特、西哀耶斯、巴纳夫等君主立宪派分子则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另组斐扬俱乐部。制宪议会顽固地为路易十六开脱，说他不是出逃，而是被劫持，并宣布恢复其国王职权。7月17日，在马尔斯广场对一份要求废黜国王、实行共和的请愿书进行讨论并签名的数千名群众，遭到巴伊、拉法耶特等率领的军队镇压，死伤50余人。马尔斯广场事件表明第三等级内部的分歧已趋激化，反封建的革命阵营已经在向左右两端分裂，预示法国革命将沿着更为严酷的路线发展。

制宪议会的各项制宪工作到此才告结束，8—9月间宪法文件汇总呈交国王批准。9月14日，国王到议会宣布接受宪法。由于这部宪是在1791年批准生效的，故称“1791年宪法”。

置于宪法之首的是《人权宣言》。

宪法宣布法国为君主立宪国，保留君主制，但君主得服从法律。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国王已不再是“上承天佑”的神权君主，而是来自民权的“法兰西人的国王”。

宪法在国家机构的设计方面，明显地体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思想。它按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进行设计。

立法权属于一院制立法议会。立法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只有它才有权提出法案并通过法律，有权支配国家军备、国家财产和决定税收，有权最后决定宣战、媾和、结盟和缔约，各部大臣受议会监督并须定期向其报告经费支配情况。

立法议会任期二年，议员由两级选举产生。拥有选举权的只有所谓“积极公民”，即年满25岁、有固定住所、不当佣工、缴纳一定数额直接税、被编入国民自卫军的男子，每100名积极公民选出1名复选人（其财产资格要比积极公民高些），再由复选人选举议员（其财产资格更高）。议员名额按地域、人口和直接税额等三种比率分配。当时全国人口2800万中约有430万人为拥有初级选举权的积极公民。

行政权属于世袭国王。国王有权任命各部大臣、驻外使节、高级将领和统帅军队。中央设置6个部，国王的一切政令须大臣副署方能生效。国王对议会通过的法案有搁延否决权。国王人身神圣不可侵犯，但若被废黜，则可交付法庭审判。规定王室经费为每年2500万里弗尔。

司法权属于选举产生的法官，实施陪审裁判制。

1791年宪法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它宣布人民主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王的行政权力。并且重申了前一阶段通过的许多反封建法律的原则，实际上确认了大资产阶级所建立的政权，因而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

宪法公布以后，制宪议会即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9月30日闭幕，让位给根据宪法产生的立法议会。

三、君主立宪政体的倾覆

[立法议会和君主立宪派的衰落]立法议会于1791年10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它的构成与制宪议会有很大差别，因为根据新宪法选出的代表大致上都是来自革命之初建立的各地市政机关中的有产者及知识分子，故拥护专制制度和特权的教士和贵族等级代表已被排除在外。立法议会内部分为三派。右派264席，为掌权的斐扬派，他们坚持君主立宪制。这一派起先还能够掌握议会，但由于内部分裂、行动软弱且过于依赖国王而很快失势。中间派345席，他们拥护新制度，但政治上摇摆不定，一般支持得势的派别。左派136席，为雅各宾派，包括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内，这一派主张实行共和制，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富有战斗力，常常能以气势压人的演说控制议会的局面。

斐扬派起初除了在议会中占优势之外，还掌握着巴黎市政机关和国民自卫军，并与以国王为首的内阁保持较紧密的联系。但国王却始终对斐扬派持疑虑态度。10月初，巴伊和拉法耶特分别辞去巴黎市长和国民自卫军司令职务。11月，拉法耶特竞选巴黎市长失败，后被派往前线。吉伦特派的佩蒂翁当选市长。这样，斐扬派就失去了对巴黎市军政的控制权。

这时，国内外的形势已呈恶化迹象。在国内，反抗派教士煽动迷信的农民发动叛乱。城市中食品供应的紧张和乡村中对仍保留着的封建权利的抗议，更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在国外，以王弟阿图瓦伯爵为首的逃亡贵族集结在边境的科布伦茨城，伺机反扑以复辟旧制度。奥地利、普鲁士、西班牙、俄国等封建君主都对法国革命事态的发展深感恐惧，企图进行武装干涉。8月间，奥普两国君主签署庇尔尼茨宣言，扬言欧洲诸国君主将以武力支持法国国王。

面对这一局势，吉伦特派领导人布里索等促使立法议会于11月9日和29日先后通过两个激烈的法令：一个法令宣布逃亡者有阴谋叛国嫌疑，如不在当年年底以前回国，即缺席判决死刑，剥夺其财产之收益；另一个法令规定反抗派教士必须于一周内宣誓效忠宪法，否则将取消其年金，如参加叛乱则予以扣押。这两个法令因国王拒绝批准而未能执行，国王因此更加被人民视作逃亡贵族的共谋者。

当时，战争问题是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问题。各个集团对战争问题的不同态度，形成了奇特的政治组合，给吉伦特派进入内阁创造了条件。吉伦特派主战最坚决，他们不仅相信法国能够抵抗侵略，而且相信可以通过战争把革命输出到国外。路易十六认为法国军队力量已经瓦解，在同欧洲列强的战争中势必一触即溃，那时就可以使专制王权复辟，因此也极力主战。斐扬派分裂为二：以拉法耶特为首的军人希望借战争重树君主立宪派的威望和权势，另一些人却担心战场上的失利将会危及新制度。以罗伯斯比尔为代表的山岳派坚决反对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战争胜利就会加强现行制度，如果战争失败则会导致专制复辟；真正的“科布伦茨”（指反革命）不在国外而在巴黎，首要问题是深入革命。

于是，吉伦特派对斐扬派内阁发起猛烈抨击。1792年3月，国王任命吉伦特派组成内阁，迪穆里埃任外交大臣，罗兰任内务大臣。这个内阁并不符合贵族们的心意，但却是国王借以引发战争的工具。至此，战争已如箭在弦。

[“祖国在危急中”]这时，奥地利和普鲁士已决心作战，而吉伦特派决定先发制人。1792年4月20日，路易十六由全体大臣陪同来到议会，提议

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王”（指奥皇弗兰茨二世）宣战。议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宣战决议。一场持续近 1/4 世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其结局出乎任何一个党派的意料之外。

战争一开始，由于吉伦特派内阁指挥失当和立宪派将领的消极抵制，法军节节败退。6 月 13 日内阁改组，罢免吉伦特派大臣，代之以斐扬派。

但战争形势更趋危急，普鲁士军队参战，开始越过国境入侵法国。以罗伯斯比尔、马拉、丹东为代表的雅各宾左翼呼吁，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惩治国内的叛徒，废黜国王。

7 月 11 日，立法议会正式宣布“祖国在危急中！”规定：一切行政机关都处于戒备状态，日夜办公；凡能够拿起武器的公民都须动员起来，领取武器，保卫祖国。数天之内，仅巴黎一地就有 15000 人志愿报名参加义勇军。全国各地也纷纷组成义勇军并陆续到达巴黎。其中来自马赛的义勇军，还高唱激昂雄壮的《莱茵军战歌》，步行 27 天进入巴黎。

[8 月 10 日起义] 爱国热情高涨的群众对君主立宪派的统治十分不满。他们决心推翻君主政体。7 月底 8 月初，巴黎 48 个区中有 47 个区通过了废黜国王的决议。

7 月 25 日，普奥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在从科布伦茨发动进攻时发布告法国人民的宣言，声称：必须恢复国王路易十六的自由和合法权利，保证王室安全；巴黎如敢反抗，将予彻底摧毁。消息传来，巴黎民众更加怒不可遏，于是加速行动。巴黎各区一方面向立法议会呈送请愿书，要求立即废黜国王，另一方面积极准备举行暴动。

8 月 8 日，在圣安东区成立了起义指挥部，雅各宾派左翼成员在其中起了骨干作用。8 月 9 日，起义队伍占领市政厅，改组市政机构，成立了新的巴黎公社，即 1792 年公社。同时，逮捕市长佩蒂翁，处死原国民自卫军司令芒达，把指挥权交给了雅各宾派的桑泰尔。

8 月 10 日清晨，起义队伍在巴黎公社领导人率领下包围王宫，歼灭瑞士近卫军，占领了王宫。在武装群众的压力下，立法议会通过决议：停止国王职权，撤换各部大臣，迅即召开国民公会。路易十六被巴黎公社当作囚犯押送到丹普尔狱监禁，等候审讯。

8 月 10 日起义得到了各郡的拥护。前线的将领们也承认了既成事实。拉法耶特因失望而脱逃，被奥军俘虏。从此以后，君主立宪派退出了革命舞台。

统治法国上千年之久的君主政体终于在 8 月 10 日人民起义的革命洪流中被冲垮。这次起义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统治，使法国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进入新阶段。它把吉伦特派推上了统治地位，但也表明，一支新的更激进的政治势力已经成长壮大。

此歌为莱茵方面军青年军官里尔（Rouget de Lisle，1760—1836）于 1792 年 4 月创作。后广为流传，改称《马赛曲》。1879 年正式定为法国国歌。

第三节 吉伦特派的统治共和国的建立

一、吉伦特派统治的开始

[巴黎公社与立法议会的对峙]8月10日起义之后出现了两个权力机关对峙的局面：一个是根据当天的决议即将解散的立法议会，另一个是未经选举产生的新巴黎公社。

这时的立法议会已经为吉伦特派所控制，新成立的政府（临时行政会议）成员也都由吉伦特派担任。吉伦特派对巴黎公社干预政权非常不满，指责它是非法机构，妨碍议会活动，扰乱社会秩序，力主解散公社。起义前夕成立的巴黎公社，在起义后扩大和整顿了自己的组织，由山岳派罗伯斯比尔、马拉、肖梅特等掌握领导权。他们认为此时的立法议会只不过是一个行将消失的政治残留物，而且对吉伦特派也极不信任，故主张发动巴黎群众直接行动，同时对立法议会施加强大压力。

巴黎公社采取了紧急的战备措施。它宣布征募志愿军，在短期内征集到3万多人；下令收集教堂的铜钟、铸像、金属栅栏改铸大炮，建立军械工场，构筑巴黎外围的防御；强制规定面包价格，封闭王党分子的报刊，对嫌疑分子实行监视；又迫使立法议会于8月17日通过法令，成立非常法庭。

立法议会在8月间也采取了几项重大行动。首先，决定实施以前被国王否决了的关于逃亡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法令；规定对富农征用粮食饲料以供军需；向军队派去拥有广泛权力的特派员。其次，取消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之分，规定凡年满21岁的男子都有选举权，8月下旬开始国民公会的选举活动。第三，颁布了若干较进步的土地法令。这些法令规定：在全体农民中间分配公有土地，领主必须把非法占有的公有土地交还给农民；宣布废除封建权利，除非领主能提供法律文件证据，否则不能拒绝赎买；被没收的逃亡贵族地产分成小块出售给农民，或供农民无限期租用，租金分期交纳。这些土地法令虽然未能完全兑现，但表明吉伦特派的土地政策比君主立宪派前进了一大步。

两个权力机关各自发号施令，虽然都是循着时局发展的方向行动，但由于政见分歧，时时发生冲突。8月30日立法议会通过了解散巴黎公社的决议。而巴黎公社则以逮捕吉伦特派领导人相威胁，使议会不得不撤回这项决议。斗争继续发展着。

[瓦尔米战役的胜利]8月间，前线形势告急。8月19日普奥联军越过国境。23日隆维要塞投降。9月2日凡尔登失陷。通向巴黎的大门已被敌军打开。同时，旺代以及其它一些郡叛乱扩大的消息也接踵传至巴黎。

9月2日，丹东在立法议会上发表著名的演说：“要战胜敌人，我们必须勇敢、勇敢、再勇敢，这样法国才能得救”。巴黎公社也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并下令征募6万名志愿兵，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其时，群众中流传一种激烈的看法：监狱中的反革命将要暴乱，在志愿军开赴前线之前，先要镇压反革命。于是，从当天下午起的几天内，一批武装人员涌进各个监狱，处死

临时行政会议是8月10日由立法议会选出的，罗兰任内政部长，克拉威埃任财政部长，塞尔旺任陆军部长，丹东任司法部长，蒙日任海军部长，勒希朗任外交部长。除丹东外，其余均为吉伦特派

了大约 1000 名被关押的嫌疑分子。这就是引起不同观点史学家褒贬不一的“9 月屠杀事件。”

普奥联军因得胜而骄傲异常，进兵迟缓，给迪穆里埃指挥下的法军造成会师的机会。9 月 20 日，两军在离凡尔登不远的瓦尔米高地交火，普鲁士军两次发动进攻均受到法军猛烈回击，被迫撤退。在这次战争中普军损失虽然并不严重，但影响很大，因为它是革命法国对入侵敌军的第一次胜利，大大鼓舞了法国人民的斗志。不久，法军即转入反攻。

[国民公会的召开和共和国的成立] 8—9 月间选举的结果，共选出代表 749 名。国民公会的派系构成比立法议会更左。其中坐在会议大厅右边的是吉伦特派，占 165 席，包括布里索、佩蒂翁、韦尼奥、罗兰、孔多塞、伊斯纳尔等；山岳派坐在会议大厅左边的最上方，约 100 多席，包括罗伯斯比尔、丹东、马拉、圣茹斯特、库东、德穆兰等；中间派称作“平原派”（或称“沼泽派”），因坐居会议大厅最低处而得名，约近 500 席，他们在政治上并无定见，视形势不同而摇摆于左右之间。9 月 20 日，国民公会成立时，以压倒多数票选举佩蒂翁担任第一任议会主席，并选出孔多塞、布里索、韦尼奥等担任秘书。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的前期居于支配地位。

瓦尔米战役胜利的次日，即 9 月 21 日，国民公会正式开幕。被赋与新的制宪职能的国民公会就其性质而言应代表全体国民，拥有一切权力，故巴黎公社也暂时表示服从。当时，丹东和布里索提议停止党争，因此会议在充满信任和合作的气氛中举行。

当天，国民公会一致热烈通过废除王政的议案。傍晚，在火炬照耀下，向巴黎市民隆重宣布这一决议，受到市民兴高采烈的欢迎。次日，国民公会采用了“共和国”的名称，宣布国民公会不是从自由四年开始，而是从法兰西共和元年开始。这一天标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诞生。后来制定的革命历法把 1792 年 9 月 22 日定为共和元年元旦。

如同参加革命的其它派别一样，吉伦特派起初也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特别是瓦伦事件以后，共和思想传播日广。吉伦特派是革命各派中主张实行共和最早并且最坚决的派别。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同吉伦特派占优势的国民公会同时成立，这并非偶然。应该把缔造共和列为吉伦特派的功绩之一，当然这并不排斥其它进步派别和群众的重大作用。

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有支配地位，也控制了中央行政机构，按理它应该推行自己的方针政策。但是，它的统治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在巴黎尤其如此。山岳派和巴黎公社一开始就对它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使它没有任何行动自由。可以认为，自 1792 年 8 月起到 1793 年 5 月止的 10 个月中，吉伦特派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

革命历法称作“共和历”，1793 年 10 月由国民公会通过采用。它被用来代替基督教历法。该历法规定一年分 12 个月，每月 30 天，外加 5 天称“无套裤汉日”；每月分三旬，一旬 10 天，第 10 天为休息日。从 1792 年 9 月 22 日元旦起算，12 个月依次为：葡月、雾月、霜月为秋季；雪月、雨月、风月为冬季；种月、花月、牧月为春季；获月热月、果月为夏季。此历法通行到 1805 年为止。

二、吉伦特派统治时期局势的发展

[战争的胜利和扩张] 吉伦特派因坚决主战而掌握了政权，掌权后又得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战争的胜利来维持权威。

瓦尔米战役之后，普奥两军因内部分歧、传染病流行等原因而不断后撤。法军乘胜追击，全线越出国境，迅速冲向所谓“自然边界”的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在东南方面，法军进入了萨瓦和尼斯，两地居民表示自愿归并法国。在东面，法国军队进入德意志境内攻占了莱茵河左岸的要塞美因兹，甚至占领了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北面，11月6日在热马普战役中重创奥军，随后相继占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列日、安特卫普和那慕尔。

法军所到之处都提出“给茅屋和平，对宫廷战争”的口号。赢得了当地平民的拥护。吉伦特派对占领区的方针是：保护当地的居民，并推行革命政策。这点在国民公会于11月19日和12月15日通过的两个法令中得到明显的反映。前一个法令宣布：凡欲恢复其自由的人民，均将予以友爱与救助，并命令法军将领援助这些人民并保护为自由而被压迫或可能被压迫的公民。后一个法令宣布：在占领区应视暴君和特权者为敌人，废除封建权利，取消什一税和一切旧税收，没收教会和世俗特权者的财产，组织新政权机关，并用武力推行上述法令。无疑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但也带有输出革命的扩张色彩。被占领区的人民终究是外国人，他们的民族意识本能地产生抵触情绪。同时，这些法令也使封建欧洲的君主们深为震动，害怕“法兰西瘟疫”的传播。

[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斗争] 吉伦特派在对外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初步胜利，在内部派别斗争中却不断失利。

出于对山岳派及巴黎公社权势的恐惧，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雅各宾俱乐部、巴黎公社等三个阵地同对手展开斗争。他们指控对方破坏和扰乱秩序、要夺取权力实行独裁，特别是要对“9月屠杀事件”负责。在国民公会中，他们对罗伯斯比尔和马拉提出控告，未获成功。还提议各郡派兵到巴黎组成议会卫队，以保卫议会不受巴黎激烈分子的威胁，此目的也未达到。他们提出政府迁南方的计划，又被否决，并认为这是违背“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原则的联邦主义。

在雅各宾俱乐部，吉伦特派本来人数并不少。但他们自视为拥护秩序的高贵者，越来越不喜欢参加嘈杂的公民集会，而宁愿躲到贵妇人主持招待的富家客厅里，在宁静的空气中从容聚谈。俱乐部要他们去参加辩论，布里索等采取不出席的轻视态度。10月10日，俱乐部几乎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布里索。自此以后，吉伦特派完全退出，雅各宾俱乐部成了山岳派的阵地。

吉伦特派原指望通过改选能够控制巴黎公社。10月当选为市长的佩蒂翁不肯就任，11月吉伦特派的尚邦又当选市长。但12月初选出的公社其他领导人却是坚定的山岳派，检察长为肖梅特，副检察长为埃贝尔，他们掌握了巴黎公社的实权。后来，市长一职也改由帕什担任。吉伦特派控制公社的指望落了空。

两派无止境的相互攻讦使国民公会多数议员感到厌倦，他们建议把议题转向有关共和国的大事上来。10月11日，成立了由吉伦特派占多数的制宪委员会。山岳派担心这个委员会只能制定出一部温和的共和制宪法，故极力要求把处置国王的问题立即提上日程。制宪问题因而耽搁下来。1793年5月

以前，吉伦特派宪法草案曾被提了出来，因山岳派反对而未能讨论通过。

[审判路易十六]8月10日起义时宣布废黜国王以来，吉伦特派一直没有为审判国王作任何准备工作，而且也毫不隐瞒要拯救路易十六生命的意图。每当问题提出来时，他们总是寻找借口予以拖延。山岳派则抓住此一弱点发起进攻，使处置国王的问题带上鲜明的党派斗争色彩。各郡以及巴黎各区要求审判国王的清愿书纷纷送到议会。11月，从王宫的一个秘密壁橱中发现了大量文件，证明国王有勾结逃亡贵族和外国君主，企图破坏革命，恢复旧制度的罪行。于是，巴黎群众群情激愤，势不可挡。

国民公会中就有关路易十六是否拥有不可侵犯权、国民公会是否有权变为法庭、判决路易十六对共和国有没有好处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等坚持认为，这不是一般的刑事审判，而是对待敌人一样的政治判决；这是拯救祖国的措施和保卫国民的行动，应该由国民公会宣布以革命的名义判处卖国贼路易死刑。但这一主张也没有被采纳。

一切营救路易十六的措施均告失败，最后决议由国民公会进行审判，由议员当场唱名表决决定。1793年1月14日—17日，表决分三次进行：关于“路易·卡佩是否有危害国家安全之罪”的问题，表决结果除少数弃权外，一致认为有罪；关于“国民公会对路易·卡佩之判决是否须人民批准”的问题，表决结果以424票对287票被否决；关于“路易·卡佩应受何种刑罚”的问题，表决结果是361票主张无条件判处死刑，26票主张判处死缓，334票主张监禁或放逐，5票弃权。投票结束后，吉伦特派的议长韦尼奥沉痛地说：“我以国民公会的名义宣布：国民公会判处路易·卡佩死刑”。

1793年1月21日（星期日）上午10时，在军鼓和“国民万岁”的呼声中，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置在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上的断头台。君主政体被推翻，昔日君王头上的神圣的光轮也从人民的心目中消散。但处决路易十六对于欧洲各国封建君主无异于一场惊魂夺魄的恶梦。

[忿激派的登场]战争给经济造成巨大的困难，战费和军队给养增加了政府开支和物资的消耗，海外贸易的萎缩造成某些原料的短缺和若干日用消费品的匮乏。建筑业、丝织业和奢侈品业陷于萧条和停顿，纸币的大量发行导致指券不断贬值，加上投机倒把、囤积居奇者的捣乱，使物价腾贵、粮食供应极为紧张。受损害最直接的首先是城乡下层群众。从1792年下半年起，巴黎和各郡就不断出现动乱，农民要求颁布平分土地的土地法，城市平民则要求限价。

在这种形势下，吉伦特派却奉行经济自由主义和维护私有财产的政策。1792年12月8日，国民公会通过法案，下令逮捕和审判“所有阻碍粮食自由流通的人”。1793年3月18日，又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凡宣传“土地法”者一律处以死刑。

这时，代表城乡下层群众利益的“忿激派”登场了，他们坚决要求限价、惩办投机者和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忿激派的领袖是科德利埃俱乐部成员、神甫雅克·卢。他愤怒地揭露自由、平等的虚伪，坚决要求平分土地，实行限价，严厉打击投机商。在忿激派的鼓动下，1793年2—3月间掀起了向国民

吉伦特派提出要把国民公会对路易十六的判决提交全民表决，希望借此挽救其生命，故后来被政敌指责为诉之于人民的“申诉派”。

1792年12月，国库收入仅3900万里弗尔，而单单战费一项的支出即达22800万里弗尔。

公会的请愿运动和反饥饿骚动，甚至企图号召举行起义，以推翻吉伦特派统治。

对于忿激派运动，以罗伯斯比尔为首的雅各宾派则持冷漠态度。直到1793年3—4月，才与忿激派结成联盟共同反对吉伦特派。

忿激派的登场，表明推动革命进一步向左转从而结束吉伦特派统治的又一支势力出现了。

[第一次反法联盟]如上所述，法国军队越出国境并在占领区推行革命政策，以及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引起欧洲君主们的惊恐。法军占领比利时并威胁荷兰，尤其令英国不能容忍。1793年1月底，英国以路易十六被杀为由把法国公使驱逐出境。作为报复，国民公会于2月1日对英国和荷兰宣战。于是，以英国为首的第一次反法联盟很快就组成了，除了原已开战的奥地利和普鲁士之外，参加联盟的还有西班牙、葡萄牙、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以及德意志诸邦，几乎整个欧洲都与革命的法国相对抗。

为了应付危急局面，国民公会于2月24日颁布征兵令，强制各郡按指定数额征募兵员，总数共30万。

法国面对严峻的战时形势，必须根据战争和革命的需要作出衡量。吉伦特派已无力控制局势。

三、吉伦特派统治的终结

[救国的紧急措施]1793年春天起，国内外形势急剧恶化。强制征兵令在反抗派教士和保王党势力强大的旺代和布列塔尼一带受到坚决抵制，于3月间酿成大规模的旺代叛乱。叛乱者按军队编制组成三个兵团，把派去平叛的部队和国民自卫军都打败了。英国也乘机煽动并给以金钱援助。在前线，曾因组织1792年秋冬战役大获胜利而闻名的迪穆里埃，此时采取冒险行动，率主力部队进军荷兰，3月18日在内文德战役中惨遭失败，结果法军于3月底退出了整个比利时，几天后又退出莱茵河左岸地带。不久前所征服的自然边界在短短几个星期中丧失殆尽，只剩下美因兹要塞处于被围状态。野心勃勃的迪穆里埃象拉法耶特一样，企图以武力解散议会，重建君主立宪制，在阴谋败露后于3月底4月初叛变投敌。反法联盟军队开始入侵法国。

在危急的形势下，国民公会采取了一系列救国的紧急措施。

1792年10月17日成立的治安委员会于1793年1月11日进行改组，雅各宾派占了绝对多数。它掌管全国的警务治安工作，有权逮捕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犯。

2月7日通过关于改组军队，实行义勇军和正规军混合编制的法案。

3月9日决定成立革命法庭，专门负责审理反革命犯。

3月19日通过法令，规定凡手持武器的叛乱者一律处以死刑，并没收其财产。

3月21日下令全国各公社建立监视委员会（或称革命委员会），负责监视嫌疑分子。

3月28日通过关于处决回国的逃亡者的法令。

4月6日，将1月1日成立的总防御委员会改组为以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史称“第一救国委员会”。它拥有广泛的权力，包括对政府实行监督。

4月11日通过法令，规定指券按票面值强制流通，禁止指券与铸币之买卖，一切交易均以指券为准。

4月30日，正式确定议会特派员拥有行使中央权力的职权，使得革命初期的地方分权制转向中央集权制。

5月4日，颁布谷物最高限价法令，囤有粮食者必须限期向地方政府申报，并限价出售，违者罚款直至处死。

5月20日，规定对富人摊派10亿里弗尔公债。

所有这些措施，显然带有战时应急的性质，它们既违背了吉伦特派的意愿，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符合雅各宾派的本意。后来在雅各宾派统治时期采取的各项专政措施几乎都在此时发端。吉伦特派对此犹豫畏缩、执行不力，必然要被更强硬的派别所取代。

[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之决战]迪穆里埃叛变事件再度引起党派斗争的激化，雅各宾派领导人罗伯斯比尔和马拉首先发起进攻。4月3日，罗伯斯比尔就迪穆里埃叛变事件发言说：“我以为要采取的第一条救国措施，就是决定审讯所有被指控为迪穆里埃的同谋犯，特别是布里索。”4月5日，马拉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的身份发出通告，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惩治在审判国王时企图以诉诸全民表决的办法挽救国王生命的吉伦特派分子。4月15日，巴黎公社向国民公会提出请愿书，点名指控22名吉伦特派领导人。

吉伦特派予以反击。4月12日，对马拉签发通告一事提出控告，国民公会于次日通过控告案。但雅各宾派所控制的革命法庭宣判无罪开释，马拉于24日凯旋式地回到议会。5月18日，吉伦特派指控巴黎公社是“无政府机关，同时追求金钱与权力的机关，”要求把它立即解散；为防止国民公会遭到巴黎暴力的摧毁，应在布尔日召集候补议会。国民公会没有批准此一提案，而是决定成立12人委员会（成员全是吉伦特派）对巴黎公社进行调查。5月24日，该委员会以阴谋叛乱嫌疑逮捕公社领导人埃贝尔等人。随后，吉伦特派议员伊斯纳尔对到议会来要求释放埃贝尔的公社人员发出恫吓：万一公社举行暴动，巴黎就可能被毁灭。“不久人们就会不知道巴黎曾经在塞纳河的哪一边岸上存在过了。”这是向雅各宾派发出决战的信号，被称为“新布伦瑞克宣言”。

[5月31日和6月2日起义]雅各宾派和巴黎公社决定诉诸暴力。5月26日，罗伯斯比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他说：“当人民遭受压迫时，当人民除了自己一无所有时，谁不号召他们起来，谁就是胆小鬼。”5月29日，巴黎33个区的代表在主教宫成立起义委员会。30日宣布起义，任命昂里奥为武装部队总司令。

6月2日早晨，警钟敲响。昂里奥率领8万武装群众包围国民公会，用大炮对准议会，以开炮相威胁。议会发现争论已毫无用处，无可奈何地听任马拉宣读逮捕者名单，包括2名部长和12人委员会成员在内的吉伦特派主要领导人共31人。他们分别被软禁在私宅中，由宪兵监视。

6月2日起义宣告了吉伦特派统治的终结，把法国革命推向了上升路线的最高阶段——雅各宾专政。

第四节 雅各宾专政时期的共和国

一、雅各宾专政的开始

[1793年宪法和土地法令]雅各宾派与吉伦特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为应付内忧外患的局面，愿意不惜任何代价来实现和维护第三等级的革命团结，甚至不惜为此作出让步和妥协。罗伯斯比尔曾在私人笔记中这样写过：“人民应该与国民公会团结一致；国民公会应该利用人民。”他还说：“要挑灯夜战制定一些好法律。”雅各宾派执政初期颁布的1793年宪法和土地法令就是此一意图的产物。

早在5月30日就成立了附属于救国委员会的塞舍尔等5人小组，负责起草新宪法。宪法草案于6月9日提出，10日经救国委员会批准，11日提交国民公会，24日通过。这部著名的1793年宪法又被称作“共和元年宪法”或“雅各宾宪法”。

1793年宪法包括新的《人权宣言》35条，宪法本文124条。它规定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并确认社会的目的是谋求公共福利，政府是为保障人们享受其自然和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设立的；公民享有劳动权、社会救济权和受教育权；主权属于人民，人民拥有反抗政府压迫的权利；成年男子享有普选权；最高立法权属于由直接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最高行政权属于从各郡候选人中选出的、由24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它对立法议会负责。

1793年宪法通常被认为是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宪法，是最终建立共和国的蓝图。

雅各宾派希望广大农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国民公会接连颁布了3个土地法令。6月3日法令规定，把逃亡者的土地分成小块出售，并允许贫农在10年内分期偿付地价。6月10日法令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农村公社的公有土地。7月17日法令宣布，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和义务，销毁一切封建契约，隐藏文契者将被判处监禁。这些法令是法国革命期间最激进的土地法令，也是雅各宾派为了同农民群众结成联盟而付出的代价。

雅各宾派通过上述民主措施，同广大城乡人民群众结成联盟，扩大了政权的社会基础，为走向专政准备了条件。

[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793年夏天，形势更趋恶化。5月底已在各地酝酿的联邦派叛乱，因6月2日被软禁的一部分吉伦特派领袖从巴黎出逃而迅速蔓延开来。西北部的冈城成了暴动的中心，布列塔尼和谱曼底地区随之响应，他们建立了一支以温普芬将军为统帅的军队，准备向巴黎进军。里昂是中部叛乱的中心，军队的指挥权落入王党分子普雷西和维里欧侯爵手中，他们与撒丁王国的入侵军取得了联系。在西部，得到英国支持的旺代叛乱继续扩大，卡特利诺等指挥下的旺代军攻下索缪尔和翁热，企图占领南特。到7月中旬，全国83个郡中大约有60个卷入了叛乱。

与此同时，前线也节节失利。英国直接参战，约克公爵指挥的汉诺威军在荷兰军的支援下包围了敦刻尔克。科堡亲王统率的奥地利军包围北部边境诸要塞，贡德和瓦朗西安相继陷落。布伦瑞克公爵率领的普鲁士军夺取了美因兹，进而包围兰道。撒丁王国军队进逼萨瓦。西班牙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向鲁西荣推进。英国舰队封锁了法国的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岸，科西嘉岛宣布

脱离法国。

英国的封锁和国内的叛乱使粮食供应更加困难，投机商人囤积居奇使物价飞涨，指券到7月份已降到票面值30%以下。7月13日，雅各宾派著名领袖马拉被吉伦特派分子夏洛蒂·科黛刺杀。巴黎的气氛更形紧张。忿激派要求实行恐怖，惩罚投机商，派革命军到农村征集粮食，逮捕一切嫌疑犯，清洗和改组军队等。9月4—5日，巴黎群众手持武器走上街头，提出“对暴君作战！对贵族作战！对囤积居奇者作战！”的口号。肖梅特率领代表团向国民公会坚决要求“把恐怖提上日程”。

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和下层群众的强大压力，终于把掌权的雅各宾派推上了革命专政的道路。7—8月间救国委员会的改组和宣布宪法暂停实施，标志着革命专政的建立。

4月6日成立的以丹东为首的救国委员会被认为过于软弱无能。7月10日进行了改组，丹东派分子落选，圣茹斯特、库东、圣安德烈等罗伯斯比尔派分子当选。7月27日，罗伯斯比尔本人进入救国委员会。经过8月和9月的调整，罗伯斯比尔派掌握了实权。这就是著名的“大救国委员会”，或称“第二救国委员会”。

8月12日，各地代表向国民公会提议延期实施宪法。23日，国民公会发出总动员令，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28日，巴雷尔代表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宣布：“在阴谋包围我们时不能够简单地实施和平时期使用的宪法法律。”

二、雅各宾派的集权和恐怖

[革命专政的纲领和机构]雅各宾派革命专政有其纲领、机构和中央集权的运转方式。

革命专政的理论纲领,在圣茹斯特 1793 年 10 月 10 日的演说及罗伯斯比尔 1793 年 12 月 25 日(共和二年雪月 5 日)和 1794 年 2 月 5 日(共和二年雨月 17 日)的演说中得到明确的表达。圣茹斯特指出,鉴于危急的形势,直到和平实现之前,宪法应当被搁置,政府应当是革命的机构。罗伯斯比尔指出,宪法政府只能在和平时发挥作用,战时就得暂停,否则将会导致自由的毁灭。宪法政府的目的是保存共和国,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创建共和国;革命本质上就是内战,因此革命政府必须采取非常措施以应付危急形势。和平时政府的生命力在于施行仁政,战争时期政府的生命力既在于施行仁政,也在于实行恐怖;没有仁政的恐怖会祸国殃民,没有恐怖的仁政会软弱无力。

革命政府的组织纲领是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和俾约—瓦伦的提议,先后于 1793 年 10 月 10 日和 12 月 4 日(霜月 14 日)通过的两个法令。它们具有临时宪法的性质,是革命政府的法律依据。这两个法令规定:最高权力属于国民公会,它同时兼有立法权和行政权;临时执行会议、各部部长、各军将领都受救国委员会监督;治安委员会负责国内的警察事务;被派遣到各军和各郡去的议会特派员拥有广泛的权力,受救国委员会监督和指导;设置由中央任命的国务专员,负责在各地实施中央的法律。这两个法令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全国的权力集中于巴黎,各行政机关的权力集中于救国委员会。

革命专政政府是由救国委员会、治安委员会、革命法庭以及地方革命委员会等组成的。

救国委员会是革命专政机器得以运转的主轴。它控制了临时执行会议各部(1794 年 4 月 1 日改组为 12 个委员会),有权颁发行政命令和逮捕令,直接负责外交事务、指挥作战、筹办军需,并通过粮食委员会(10 月 22 日设立,1794 年 4 月 20 日改为粮食和贸易委员会)指导经济。它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法案一般都获得通过。它是雅各宾专政的决策机关,起着责任内阁的作用。

治安委员会是革命政府的另一个重要机关,负责国内的警察和治安事务,被称为“恐怖部”。1793 年 9 月 13 日国民公会决定,此后治安委员会人员的名单由救国委员会提名。经改组后,成员保持为 12 人。

革命法庭负责审理一切有反革命企图和危及共和国安全的罪行。一经判决不得上诉或否定。1793 年 9 月 5 日进行改组,其成员由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联合提名。改组后,审判员由 5 人增至 16 人,陪审员由 12 人增至 60 人,检察长下设检事 5 人。法庭分成 4 组进行工作。

革命政府通过派遣到各郡各军的特派员、设在各县的国家专员以及各地方革命委员会,把中央的法律和政令推行到全国。

[革命专政的措施]雅各宾政府在军事、经济、政治诸方面实行了一系列严厉措施。

在军事方面,颁布总动员令,改组军队。1793 年 8 月 23 日的“全国总动员令”宣布:“从现在起到一切敌人被逐出共和国领土时为止,全法国人民始终处于征发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国家的一切物资都被用于战争; 18—25 岁的未婚男子为第一批应征对象。到 1794 年春,法国拥有

13 个军，兵员总额近百万。

1793 年 2 月原则上通过的关于把义勇军和正规军混合编制的法令在 1794 年春开始实行，两营义勇军和一营正规军合编成一个“半旅团”；废除了旧军队的白色军服，改行义勇军的蓝色制服；把大多数贵族军官清除出军队，同时从下层提拔高级将领；新军官们发挥主动性，克服旧军队的陈规陋习，创造适应于新军队的战略技术；军队特派员对指挥官进行严厉监督，任何无能和疏忽都被视为对共和国不忠；动员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为军需生产作出巨大努力。这些措施为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条件。勒费弗尔评论道：“一支真正全民族的军队奔赴战场，这是自古以来第一次；一个民族成功地装备和供应一支庞大的军队，这也是第一次——这就是共和二年大军的新特点。”

在经济方面实行统制政策，严禁囤积垄断和实行全面限价。1793 年 7 月 26 日通过的严禁囤积垄断的法令规定，囤积垄断是重大的犯罪；凡储藏有所列举的几十种日用必需品者必须于一星期内向当地政府申报，并于申报后 3 天之内分成小份出售；拒绝申报或申报不实者均处以死刑，其财产予以没收；国家官员如有滥用职权保护投机商而从中渔利者也以死刑论罪；刑事法庭根据此项法令所作的判决不得上诉。

1793 年 9 月 29 日又通过全面限价令，对凡属于 7 月 26 日法令中列举的日用必需品均规定最高限价。除谷物、面粉、饲料、烟、盐及肥皂的价格须全国统一外，其它必需品的价格由各县规定，其标准为当地 1790 年的市场售价再加 1/3。违者买卖双方均处以所售物品价格之加倍罚金，并列入嫌疑犯名单。同时规定工资的最高限额为 1790 年标准再增加 1/2。这些法令可以认作是雅各宾派同城市平民结成联盟而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

此外，为保证军需和城市的供应，政府还采用征发制、国营制和配售制来管理经济。全国的所有资源、农民的农副产品、手工业者的制造品，都在征发之列。对外贸易、邮政和军事运输、银行和股票交易，都受政府的严格监督。政府直接创建了一些工场，又以提供原料和劳动力的办法控制私营工场的生产，征发产品，限制价格。在巴黎和一些大城市曾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实行计划配售制。

1793 年 9 月 9 日正式成立了以隆森为司令的“革命军”。这支由 7200 名步兵和炮兵组成的队伍，带着断头机巡回全国，用恐怖手段推行上述政策。

在政治方面实行恐怖政策，颁布嫌疑犯令。1793 年 9 月 17 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条例》规定：凡行为、关系、言论及著作表现为拥护专制政治、联邦制及敌视自由者，未能按规定证明其生活方法及已履行公民义务者，被停职或撤职的官吏，前贵族及其亲属或亡命者的代理人而未经常表现热爱革命者，革命期间出走的亡命者，均被视为嫌疑犯；各地监视委员会或代理其职权的其它委员会应在其辖区内编制嫌疑犯名单，并将他们收押、监管到和平时为止。这项法令对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无疑是可怕的威胁，但由于条文内容含糊和执行中的偏差，而使嫌疑对象不仅及于已犯罪者，且及于可能犯罪者；不仅有贵族，还包括经济、宗教政策的反对者。据估计，到 1794 年 5 月，全国被逮捕的嫌疑犯总数达 30 万之多。

革命法庭加紧了工作。10 月初，对国民公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清除了吉伦特派议员及其同情者共 136 人，把其中一部分送交法庭审判。10—11 月间，先后把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包括布里索、韦尼奥、罗兰夫人等在内的 21 名吉伦特派分子判处死刑。随后，又把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斐

扬派的巴伊、巴纳夫，以及一些将领送上断头台。在此之前，以危害共和国为借口逮捕忿激派领袖雅克·卢等，镇压了忿激派运动。与此同时，派往各地、拥有极大权力的特派员胡作非为，使中央对他们失去控制。科洛—德布瓦、富歇、巴拉斯、弗雷隆、卡里埃、罗维尔、塔利安等曾在他们的派驻地，主要是叛乱地区进行过激的屠杀。据统计，仅被直接判处死刑者约近 1.7 万人，如果加上未经审判而处死者（不包括在内战战场上杀死者），则达 3.5—4 万人。在所有业经查明身份的死者中，贵族占 8.5%，教士占 6.5%，而原来的第三等级则占 85%。恐怖使革命政府以强制力迫使全民族为救国而作出牺牲。

[前线转败为胜]雅各宾专政政府所采取的各项战时措施，使之能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对付国内的叛乱和外国的武装干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793 年夏秋，共和国的军队先后攻下了由叛军占领的重要城市冈城、马赛、里昂、波尔多，12 月 19 日收复被英军占领的土伦，平定了联邦派的叛乱。12 月 23 日，旺代叛乱平息。

此时，适逢反法联盟各国矛盾重重，指挥不一，故法军在前线也连连取胜。到 1793 年底，法军已开始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由防御转入进攻，战场转移到国境线之外。1794 年春，根据卡尔诺的战略部署，以新任司令皮什格魯的北路军为主力，对科堡统率的奥地利军发起进攻。6 月 25 日，阿登方面军和儒尔当率领的摩泽尔方面军占领沙勒罗瓦。6 月 26 日，两军在弗勒鲁斯会战中击溃奥军主力 10 万人。皮什格魯和儒尔当两军于 7 月 8 日会师攻入布鲁塞尔，然后分兵对付英荷军和奥地利军。向荷兰和比利时继续推进，于 7 月 24 日占领安特卫普和列日，进而控制整个莱茵河左岸地区。

法军在弗勒鲁斯战役中赢得了决定性胜利，第一次反法联盟军被打败，外国武装干涉暂告解除。革命政府的恐怖政策获得了成功。

三、雅各宾专政的瓦解和垮台

[雅各宾专政内部的分歧]雅各宾专政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可是在它的内部却包含着必不可免的瓦解因素。革命专政和恐怖政策一度行之有效，完全出于形势所迫，只是权宜措施，绝非长久之计。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由各个社会阶层代表组成的革命领导集团内部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团结，忍辱负重，一致对外。一旦危象解除，内部分歧顿现激化，从相互倾轧变成生死搏斗，终将导致专政的瓦解。

在雅各宾派内部明显地分为左、中、右三派，即埃贝尔派、罗伯斯比尔派和丹东派。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严厉实行限价政策和采取恐怖措施。各派都想执掌政权，操纵两委员会，斗争不断激化。

埃贝尔派是继忿激派之后城市下层群众激进运动的代表，他们控制着巴黎公社。埃贝尔认为，一切罪恶都是囤积居奇者造成的，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断头台。他说：“正如不能宽恕较大的商人一样，也不能宽恕卖胡萝卜的商人”，“小商店也和大商店一样坏。”他们指责丹东派是“催眠派”，指责罗伯斯比尔派是“新催眠派”。

丹东派较多地承继了吉伦特派经济自由主义的主张，并要求“爱惜人类的鲜血”，实行“宽容”政策，撤销治安委员会，成立“宽容委员会”。丹东声言：“对于那些要使人民的行动超出革命范围及提出极端革命措施的人，我要求大家不要信任。”丹东支持德穆兰创办《老科德利埃报》，猛烈抨击恐怖政策，坚决反对恐怖扩大化，矛头不仅指向埃贝尔派，而且指向罗伯斯比尔派。

处于中间地位，受到两面夹攻的罗伯斯比尔派则是主流派，他们掌握着救国委员会的实权。这场斗争从1793年9月以后日渐加剧。罗伯斯比尔派起初是摇摆不定的。1793年11月狂热的反基督教运动造成严重混乱，罗伯斯比尔联合丹东使国民公会于1793年12月6日（共和二年霜月16日）通过了信仰自由令，从而给埃贝尔派以初步打击。丹东派于12月发动猛烈进攻，企图改组救国委员会，又使罗伯斯比尔对他们失去信任。12月25日（雪月5日），他对左右两派都作了谴责。

[恐怖走向极端和专政的瓦解]从1794年初起，罗伯斯比尔派迫于形势而继续向左转。2月26日和3月3日（共和二年风月8日和13日），圣茹斯特提出的风月法令规定：凡经审查被确认为“革命敌人”者应拘禁到和平实现时为止，其财产应被没收，无偿分配给“赤贫的爱国者”。此法令是极难实行的，事实上也始终未曾兑现，但它表明了罗伯斯比尔派继续推行恐怖政策的决心，既给予丹东派以沉重的打击，又企图剥夺埃贝尔派进攻的口实。然而，埃贝尔派却想乘机举行暴动以夺取政权。

于是，罗伯斯比尔派决定分别镇压左右两派。3月13—14日夜，逮捕了埃贝尔派主要代表人物埃贝尔、隆森等16人，于24日送上断头台。3月30日夜，逮捕了丹东派主要代表人物丹东、德穆兰等，4月5日丹东等20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打击两派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集权。3月27日解散了由埃贝尔派掌握的革命军；4月1日取消了临时执行会议；4月13日处决肖梅特，5月10日逮捕帕什，进而彻底改组巴黎公社，代之以由政府任命的官员。反对派被镇压了，政府的权力更集中了。但专政的群众基础也被瓦解了，掌权的罗伯斯比尔派陷于孤立。圣茹斯特已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

说：“要使恐怖政策不成为两面锋刃的武器是极困难的”，“革命已经冰冷了”。

罗伯斯比尔派曾指望再度鼓起群众的热情，以求革命的团结。他提倡理性崇拜，于5月7日（花月18日）发表关于宗教道德的演说，又于6月8日（牧月20日）举行了盛大的最高主宰节仪式。但是，在这些表面喧闹的底下，强大的新反对派暗流已在国民公会和两委员会内部形成。

救国委员会内部本来就存在着分歧。极左派俾约—瓦伦和科洛—德布瓦，对罗伯斯比尔等处决埃贝尔派、一度保护丹东派深感不满。温和派卡尔诺、兰代和科多尔郡的普里厄，对罗伯斯比尔等左倾的社会经济政策及恐怖措施极为反感。他们都反对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和库东的“三头政治”。治安委员会同救国委员会之间有着权力之争，经常发生摩擦。瓦迪埃、阿马尔、服兰等人对罗伯斯比尔的权势感到不安。在国民公会中，塔利安、弗雷隆等一批人则对罗伯斯比尔步骤深怀恐惧。反对派的矛头集中指向罗伯斯比尔。关于他“独裁”、“专制”的指责时有所闻，刺杀他的事件也屡次发生。

遭到孤立的罗伯斯比尔派却在恐怖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决心清除所有反对派。1794年6月10日（牧月22日），库东向国民公会提出由他和罗伯斯比尔共同起草的“牧月法令”，虽遭强烈反对，仍获通过。该法令以含混的定义扩大了“敌人”的范围，宣布：“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所有企图使用暴力或使用阴谋来破坏自由的人都是人民的敌人。”法令取消了辩护人制度，规定：“被诬告的爱国者可由爱国的陪审官作辩护，法律决不允许阴谋分子有辩护人。”法令还取消了预审制度，在缺乏证据时，法庭可以根据“内心的确信”推断判案。审判程序大为简化。连国民公会议员也只要有救国委员会等的命令就可直接送交法庭审讯，而毋需通过议会决定。从此开始了所谓“大恐怖”阶段。

此一阶段恐怖的特点是，死刑判决数量激增，普通群众在死刑犯中所占比例明显上升。据统计，从1794年3月到6月10日的3个多月中，巴黎共处决1251人；从6月11日到7月26日（热月8日）的45天中，则处决1376人。7月间被处死刑者中，贵族和教士仅占5%，中下阶层约占74.5%，其余为军政官吏。

[热月政变]无休止的恐怖不仅失去了广大群众的支持，也遭到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反对。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反丹东派和埃贝尔派的斗争中罗伯斯比尔派获得了胜利，“但从那时起，对他来说，恐怖成了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从而变成了一种荒谬的东西。”

7月初，罗伯斯比尔已明显感到反对派人多势众，情绪一度消沉，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的会议。7月中旬，他把圣茹斯特从前线召回，决定发起进攻。26日（热月8日），罗伯斯比尔在国民公会发表长篇演说，指责政敌们在搞阴谋活动企图迫害他，声言要改组治安委员会、清洗救国委员会、惩罚叛徒。他没有具体指明谁是阴谋家，这使国民公会顿时鸦雀无声，人人自危。反对派决定反击。次日，即热月9日，经过密谋策划，国民公会完全被反对派所控制，在“打倒暴君”的一片呼喊声中通过逮捕令，罗伯斯比尔、库东、圣茹斯特等人当场被捕。当晚，巴黎公社曾把罗伯斯比尔从狱中救出，但不久又被国民公会的军队逮捕。

热月 10 日（7 月 28 日），罗伯斯比尔等 22 名雅各宾首领未经审判即被送上了断头台。热月 11 日，雅各宾派巴黎公社的 72 名成员也被处死。雅各宾专政彻底垮台。热月政变意味着法国革命高潮阶段的终结。

雅各宾专政是法国革命整个历程中的一个阶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战争时期的非常政权。雅各宾专政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把第三等级各个阶级阶层可能调动的力量都调动起来，集中到前线，从而击退了内外反动势力的进攻，保卫了革命事业。它进一步荡涤了封建残余，把农民从封建制度和教会压迫下解放出来，从而为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它为了同城市平民结成联盟，甚至损及了本阶级的某些利益，从而使革命进程达到上升路线的顶点。它作为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资产阶级革命高潮阶段，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对此后法国历次革命运动和其它一些国家的革命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留下了所谓“雅各宾主义传统”。

第五节 热月和督政府时期的共和国

一、热月党执政

[热月党的“反动”]热月政变时联合起来反对罗伯斯比尔派的那些国民公会议员，通常被称为“热月党人”。他们包括议会中的平原派、丹东派和埃贝尔派残余分子、政变后被召回的吉伦特派。其中最为活跃的塔利安、弗雷隆、巴拉斯等人，都曾以特派员身份在外地实行过恐怖。当恐怖政策在失去其存在的必要性并失去其主要执行者罗伯斯比尔之后，反恐怖政策的任务却奇怪地落在这些前恐怖分子肩上。当然，国民公会中反恐怖政策的中坚力量还是由原来的平原派构成的，那些在恐怖时期明哲保身、噤若寒蝉的议员们，如西哀耶斯、康巴塞雷斯等人，此时都恢复了活力。

所谓“热月党的反动”，其实是对恐怖的反动，是对雅各宾专政及其激进措施的反动。他们企图恢复1789年原则，重建一个正常稳定的政治制度以代替雅各宾派的战时制度。从而结束动荡和恐怖的岁月。可见热月党的这种“反动”，既满足在当时政治势力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们的要求，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大多数居民对过度的恐怖怀有恐惧、忧虑、厌恶的心理而渴求松弛的急切愿望。为此，热月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巩固统治。

第一，对各类反对派或政敌实行宽容和赦免。8月5—10日，两委员会批准释放巴黎的嫌疑犯478名。国民公会继而颁布法令，规定凡根据嫌疑犯法令而被捕，其中证据不足者一律释放，继续扣押者则需由当地革命委员会提供证据。1795年1月，因抗议“6月2日事件”而被监禁的72名（有67名还活着）吉伦特派分子获释，并恢复了国民公会中的席位。3月，参加联邦派叛乱的吉伦特派分子亦获赦。此外，国民公会还派遣代表同旺代叛乱者和布列塔尼的舒安党人进行谈判，答应实行宗教自由，给叛乱者归还财产和恢复公民权，其条件是叛乱者放下武器回归家园。这次谈判使内战暂告平息。同时，1795年2月21日颁布法令，在全国范围内给予天主教以有限制的自由。

第二，改革政权机构，削弱和取消雅各宾时期建立或强化的专政机器。革命法庭于1794年7月29日被停止活动；后经改组恢复正常审判程序；最后于1795年5月31日被取消。牧月法令也于1794年8月1日被废除。1794年7月31日改组救国委员会，塔利安等热月党人加入；同时其职权被削弱，仅限于负责军事和外交。由于规定其成员每月得更换1/4，故原有成员不久之后即被撤换。治安委员会的权力也同样被削弱。国民公会还派遣热月党人充任特派员，去更换各地的机构和成员，清除雅各宾专政残余，推行中央的政策。

第三，严厉打击雅各宾派的残余势力。早在热月政变的次日，雅各宾派的巴黎公社即已被摧毁。以弗雷隆为首、由富家子弟组成的“金色青年”把雅各宾俱乐部作为主要对手，他们手操短棒，横行街头，不断挑起斗殴。1794年11月12日，雅各宾俱乐部终于被封闭。国民公会中残留的雅各宾派分子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处死刑或自杀身亡。与此同时，“白色恐怖”也席卷了外郡许多地方，关在牢狱中的前恐怖分子被以1792年“九月屠杀”的方式处死。

[镇压芽月和牧月暴动]在战时形势下，生产萎缩，市场供应严重不足，投机倒把依然猖獗。热月党人却在1794年12月24日废除了最高限价法令，使物价再度飞涨。加上政府滥发纸币（总额已达80亿里弗尔），使指券下跌到仅及票面值的1/15。面包配给量不断减少，巴黎人往往成天排队才能买到一点点面包。他们怀念起不久以前既有面包又有权力的大救国委员会时期了。

国民公会对巴雷尔、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等人的审讯，成了芽月12日（1795年4月1日）暴动的诱因。这一天，来自巴黎郊区的示威群众提出“面包，1793年宪法，释放爱国者”的口号，冲进了国民公会。但由于群龙无首，缺乏组织和计划，很快就被调来的国民自卫军驱散。当天，国民公会就决定逮捕17名雅各宾派议员。

国民公会企图废除1793年宪法，按照热月党人的准则制定新的宪法。此事导致了牧月1日（1795年5月20日）暴动。这次暴动除了“面包，1793年宪法，释放爱国者”的口号外，还提出撤换现政府并逮捕其成员，立即召开立法议会以代替国民公会等要求。暴动者一度以武力占领了国民公会会场，宣布成立新政府和各项措施。但不久又被市区的国民自卫军逐出会场。次日，郊区群众又携带大炮向国民公会发动进攻，在国民公会答应尽量保证粮食供应和即将公布1793年宪法实施纲要之后，再次解散而去。

牧月暴动由于缺乏有力的指挥和坚强的领袖，也由于整个局势的发展和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终于失败。国民公会派遣市区部队解除了郊区的武装。国民公会内部的雅各宾派分子也遭到彻底清洗。法国革命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暴动日”和由此而产生的街头民众左右政权的现象也就宣告结束。

[基贝隆战役、第一次反法联盟的瓦解]热月党对雅各宾派和人民起义的镇压，使保王党人误认为复辟时机已到，于是蠢蠢欲动。1795年6月8日，传出囚禁于巴黎狱中的路易十六的年幼儿子（又被称为路易十七）的死讯后，他们就拥戴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为路易十八。以皮塞侯爵为首的舒安党人企图争取英国政府的援助，在布列塔尼掀起全面暴动。

由流亡贵族和王党分子组成的数千人的队伍，携带可供数万人使用的武器装备，在英国舰队运送下，于1795年6月23—27日，在布列塔尼的基贝隆半岛登陆，准备汇合旺代叛军，进军巴黎，把路易十八送上王座。但是登陆后不久，即遭到奥什将军指挥的共和国军队的致命打击，迅即被镇压，近千名俘虏被枪决。

基贝隆战役表明，热月党人决不让旧制度复辟。在镇压国内叛乱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战争，以瓦解反法联盟。

热月政变后没有在部队中引起哗变。相反，在热月党领导下，受到军纪严格约束的将领和士兵仍然忠于共和国，继续使战线向国外推移，连战连捷，反法联盟诸国纷纷与法国议和。普鲁士不满于俄国独吞波兰的野心，于1795年4月5日与法国缔结巴塞尔和约，承认莱茵河是法国的东部边界。战败的荷兰发生政变，推翻了总督，宣布成立巴达维亚共和国，于5月16日与法国签订海牙和约，把莱茵河左岸各省割让给法国，并承担了参加对英战争的义务。7月22日，西班牙也与法国签订巴塞尔和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以让出圣多明各岛上的西班牙属地为交换条件，使法国归还所占领的西班牙领土。随后，它也承担了共同对付英国军队的义务。

至此，只剩下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若干小邦继续对法作战，第一次

反法联盟已基本瓦解。

[共和三年宪法、镇压葡月暴动]到 1795 年夏天，热月党人已镇压了巴黎群众的暴动、平定了基贝隆登陆的王党叛乱、瓦解了反法联盟，使政权得到一定程度的稳固。为了建立新的统治，8 月 22 日，国民公会通过新宪法，即“共和三年宪法”，或“1795 年宪法”。

共和三年宪法以维护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为目的，既反对群众的暴乱，又防止政府的专制和王党的复辟。宪法删去了以前两部宪法中关于政治经济平等及起义权的内容；取消了直接普选权和一院制；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了较高的财产资格和年龄条件；公民的政治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宪法规定了立法权属于两院制立法团。两院任期 3 年，每年改选 1/3 成员；五百人院提出法案，经讨论后提交元老院；由 250 名议员组成的元老院则不加讨论或修改而予以批准或否决。行政权属于由 5 人组成的督政府。督政官由五百人院提名、元老院选举产生；每年改选其中 1 名；督政府主席由 5 人轮流担任，任期 3 个月，以防止个人专权。宪法保障了大革命时期国有财产购买者的权益；规定了劳动自由和经营工商业自由；国家和教会分离。宪法维护了 89 年的原则，在全国选民投票表决中，以压倒多数票通过。

为了保证热月党人的实际统治权，还特别提出了一项法令，规定国民公会中的原有议员必须有 2/3 重新选入新的两院。这一规定引起保王分子的极大不满，他们原来指望通过选举进入两院和政府以改变政治体制。于是，巴黎的王党分子就着手公开组织暴动。国民公会指令巴拉斯指挥武装部队准备镇压。巴拉斯起用了曾在 1793 年土伦战役中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拿破仑·波拿巴。葡月 13 日（1795 年 10 月 5 日），王党暴动队伍约 2—3 万人从各方向国民公会发起进攻，拿破仑用大炮轰散了叛军，200 多名保王军被打死，叛乱被镇压。

葡月 13 日暴动被镇压以后，由于新的两院的 2/3 成员都是原国民公会议员，所以热月党人的统治基本上得以延续。两院又选举产生了由原“弑君者”组成的五人督政府。雾月 4 日（1795 年 10 月 26 日）国民公会宣告会议结束，督政府时代自此开始。

二、督政府的统治

[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督政府初期，国内的经济危机局面仍无改善，群众的革命信仰和政治热情却因变幻无常的党派倾轧而趋于衰退，政治冷漠态度广为弥漫，人们开始从公共生活退缩，以谋求平静的私生活。在此背景下，只有为数很少的革命志士仍继续为理想的事业而孤军奋斗，这就是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

格拉古·巴贝夫（1760—1797），出生于农民家庭，革命前曾任土地督察员。革命初期从事新闻活动，因他所主张的土地改革纲领与古罗马的政治家格拉古相似，故以后者之名自称。热月政变后，因在他创办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中揭露热月党的统治而被捕，后在狱中（1795年2—9月）形成了平等派学说。其思想在战友邦纳罗蒂写的《为平等而密谋》（1828）中得到反映。

巴贝夫从自然权利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平等是自然权利的基本原则；代替了自然状态并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应当保护平等的权利。他把历史解释为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断斗争，认为法国这场革命只是新的、更伟大的革命的前驱，而新的革命将是最后一次革命；新的革命应当依靠少数人组成的密谋团体以暴力方式来发动。在从革命开始到完全建成共产主义为止的过渡时期，应建立劳动人民革命专政；新政权不能由人民选举产生，而应把权力交给最坚决的革命者。新政权将建立国民公社，由它掌握国有财产和被没收的敌产，吸收自愿参加者，并不断扩大，以逐渐剥夺私有者；公社实行集中管理，人人必须参加体力劳动。他的思想中充满着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但不失为一种空想共产主义理论。

巴贝夫获释出狱后成了职业革命家，着手组织“平等会”和起义委员会，并通过联络员以秘密方式逐层对外联系，传达意图，发动平民群众。1796年4月发表《平等派宣言》，提出“要求真正的平等，否则宁可死亡”的口号，主张实现财产公有制，建立平等共和国。5月8日举行了巴贝夫主义者、残余的雅各宾派和起义委员会的总会议，计划发动一次有17000人参加的起义，推翻督政府，“恢复1793年宪法，恢复自由、平等和共同幸福”。10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1797年5月，巴贝夫及其战友达特被判处死刑。

平等派密谋是法国大革命中民主派的最后一次革命发动，它的失败说明先前推动革命不断沿上升路线前进的人民暴动的波涛终于退潮。但是，平等派密谋却给日后法国的布朗基主义以强有力的影响，而巴贝夫主义则在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督政府前期的对外战争]对普鲁士、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和约签订以后，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强敌只剩下奥地利。督政府的对外政策是继续战争，彻底击败反法联盟，并扩大战果。负责军事的督政官卡尔诺制定了分三路进军维也纳的战略计划：儒尔当将军指挥马斯河方面军沿美因河推进，莫罗将军指挥莱茵方面军沿多瑙河推进，另派拿破仑·波拿巴将军指挥意大利方面军进入北意大利沿波河推进，三支军队在提罗尔隘口会师后进攻维也纳。

卡尔诺原来以为意大利战场是次要的，战争的结局将决定于进入德意志领土的两支军队。但事态的发展恰恰相反，莫罗和儒尔当的军队在德意志境内受奥军阻遏，被迫撤退，而拿破仑在北意大利却势如破竹，夺得辉煌的胜利。1796年4月初，拿破仑统率3万余人进入意大利，击溃了撒丁王国的军

队，迫使撒丁王国于5月16日同法国签订巴黎和约，把萨瓦和尼斯割让给法国，并承担供应在意大利作战的法国军队军需的义务。随后，拿破仑继续追击奥军，5月占领米兰，6月攻克里窝那、布洛尼亚、摩德纳、托斯卡纳，7—8月包围曼图亚要塞。次年2月，该地奥军投降；罗马教皇国也随即割地赔款求和。在法军控制整个北意大利、占领提罗尔、入侵奥地利国境、进逼维也纳的形势下，奥皇于4月向拿破仑求和，签订了累欧本停战协定。

1797年10月17日，拿破仑代表法国同奥地利签订了康波福米奥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承认莱茵河为法国边界，承认拿破仑在北意大利新建立的利古里亚共和国（建都热那亚）和山内共和国（建都米兰），放弃对原奥属尼德兰（比利时）和北意大利上述地区的主权；瓜分威尼斯共和国，爱奥尼亚群岛归法国，阿迪杰河以东的整个威尼斯以及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均归奥地利。康波福米奥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反法联盟彻底告终。

在此同时，督政府派奥什将军指挥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战事，平定了旺代和布列塔尼的叛乱。1796年6月，内战宣布平息。

[督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 督政府成立之初，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极其困难。秩序混乱，行政管理瘫痪。经济萧条，国库空虚，粮荒严重。纸币泛滥，指券已下跌到票面值的3%。内战和外战仍在继续，而军火库耗用殆尽，军需和给养供应极度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督政府采取了若干整顿措施。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督政府重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体系。在中央，以督政府为中心，5名督政官分工主管不同事务。辅之以陆军、海军、司法、内政、财政、外交、警务等7个部，并录用一批专门人才，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在地方，恢复了1791年宪法规定的地方分权制，确定了郡、区、公社三级建制。特别加强了郡府的行政自主权，同时又派遣特派员给以指导和监督，使之不能脱离中央政府的控制。

为了克服财政困难和经济混乱局面，督政府实施币制改革，统一了税收制度。到1796年初时，指券发行总额已达390亿里弗尔，督政府不得不下令停止印发，并代之以用国有土地作担保的土地票。不久，土地票也迅速贬值，督政府终于在1797年5月下令废除土地票和指券等纸币，改用硬通货统一全国币制，从而稳定了市场。1795年底，督政府下令向富人强制推销10亿公债，暂时解决财政开支之急需。1798年9月，督政府又实行财政改革，在大笔削减行政开支的同时，规定对历年所积欠的公债及利息均只减付原定数目的2/3，从而基本上达到财政收支的平衡。督政府对土地税、营业税、动产税、门窗税以及印花税、注册税、关税等直接税和间接税都作了统一的规定，并对全国的人口、土地、资源和生产状况展开调查统计，对税务机关进行整顿。

督政府承继了革命各阶段经济改造的积极成果，鼓励经济的发展。在农业方面，继续拍卖国有土地并分小块出售，相对加快了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但停止分配农村的公有土地，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小农和贫苦农民。战争使军火业、冶金业、矿业得到发展，对英贸易的断绝又给法国纺织工业的增长以强有力的刺激。同普鲁士、西班牙、荷兰、奥地利等国缔和以后，相互之间的贸易得以恢复。督政府奖励工农业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1798年还在巴黎举办了第一次工业展览会，显示了法国工业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虽然，督政府时期经济复兴的速度还比较缓慢。但它表明社会经济生活已从混乱向有序转变，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势头已经呈现。

[果月 18 日和花月 22 日政变]但是督政府的统治很不稳定，它仍然面临着来自右面和左面的威胁，各派在为争夺政权而斗争，首先表现在立法团和政府选举的合法斗争中。

1797 年 5 月的选举被保王派所控制，新选举出来的立法团代表几乎都是保王分子，元老院议长巴尔贝—马尔布瓦、五百人院议长皮什格鲁以及补缺选出的督政官巴泰勒米都属于保王派。于是，保王派所控制的两院巧妙地利用民意对督政府发起攻击，指责财政混乱、连年用兵，主张和平和放弃武力，要求无限制的出版自由，赦免反抗派教士和逃亡者，恢复天主教的旧日特权等，以便为复辟王政作好准备。他们企图策划政变，驱逐督政官。督政府察觉到保王派政变的危险，于是借助军队的力量，在果月 18 日（1797 年 9 月 4 日）发动政变，占领议会大厅，逮捕巴泰勒米及大部分保王派议员。次日，宣布 5 月选举无效，判处一批保王派议员流放，决定清洗政府机关中的保王分子，并取消了前一时保王派两院所通过的若干决议，恢复新闻检查和对逃亡者、反抗派教士的惩治。

果月 18 日政变粉碎了保王派的复辟企图，维护了共和制度，使督政府的权力达到了高峰。但是，这是以破坏督政府赖以生存的法制为代价的，因为根据宪法，政府是无权解散议会的，何况凭借的又是军队武力。

果月 18 日政变后，保王派敛迹了，共和派和民主派的势力得以复兴，民主的俱乐部又盛行起来。1798 年 5 月选举的结果，一大批雅各宾派分子当选为立法团议员，使作为温和共和派代表的督政府又一次感到形势不利。督政府于是根据两院在果月政变后授予它审核选举会议工作的权力的临时法令，于花月 22 日（5 月 11 日）宣布这次选举无效，再度封闭俱乐部，流放了一批激进共和派和民主派分子。

通过果月和花月两次政变，督政府既打击了右翼势力，又打击了左翼势力，暂时保持了政权。但是，这种“秋千政策”说明它的统治是动摇不稳的。它借用武力发动政变来维护政权的事实则表明，大资产阶级的未来统治需要依靠军队武力来进行。

三、督政府的终结

[督政府后期的对外战争、第二次反法联盟]1797年10月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以后，同法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只剩下一个英国。为了打击英国，争夺霸权，决定出兵远征埃及。督政府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拿破仑。

1798年5月19日，拿破仑统率由300多艘舰船和3万余名士兵组成的部队从土伦等港口出发。途中攻占马耳他岛，7月初在埃及登陆，占领亚历山大港。7月21日在金字塔战役中击溃了土耳其军事封建主的军队马穆鲁克骑兵。继而占领开罗，对埃及实行占领军统治。8月1日，停泊在阿布基尔港的法国舰队被纳尔逊将军统率的英国舰队几乎全部歼灭，进攻埃及的法军同法国国内的联系被切断。拿破仑在次年2—5月的东征叙利亚又受挫，不得不返回埃及。

这时，英国拉拢了俄国、奥地利、那不勒斯、土耳其等国，于1798年12月组织了第二次反法联盟。起初，法军在瑞士和意大利仍占上风，分别建立了罗马共和国（教皇国）、黑尔维谢共和国（瑞士）、帕尔瑟诺佩共和国（那不勒斯王国）等附庸国家，吞并了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一部分）。但当反法联盟的主力部队俄奥联军投入战斗之后，战局急剧逆转。1799年春，在德意志境内，奥军直逼阿尔萨斯边境；在意大利和瑞士，法军接连败退，俄奥联军乘胜追击，法国的各附庸国相继灭亡；在荷兰，英俄联军已经登陆。战争又一次逼近法国本土。

[雾月18日政变]督政府陷入反法联盟压境的严重困境。而国内经济困难和财政拮据的局面仍未扭转。督政官连续更换，政局动荡不已。新上任的督政官西哀耶斯感到，要稳定政局，非借助一把“宝剑”不可。他希望能找到一名听话的将军作为工具，以确保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就成了众所瞩目的大人物。此时拿破仑匆忙把军队交给副手，偕少数亲信离开埃及，于10月16日赶回巴黎。沿途群众和巴黎显贵名流热烈欢迎这位“常胜将军”。在巴黎很快就形成了一个以西哀耶斯和拿破仑为核心，包括另外一名督政官罗歇—迪科以及外交部长塔列朗、警务部长富歇等在内的政变集团，并于雾月18日—19日发动了政变，史称“雾月18日”。

根据事先安排，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由元老院任命拿破仑为巴黎卫戍司令，于是，他迅即用武力控制巴黎，逮捕两名反对派督政官戈伊埃和穆兰（后者脱逃），迫使另一名督政官巴拉斯辞职。督政府实际上被推翻。

雾月19日（11月10日），在近郊圣克卢召开两院联席会议，西哀耶斯和罗歇—迪科陪同拿破仑一起到会。当拿破仑走进会场时，五百人院的议员齐声喊叫：“宣布他不受法律保护！打倒独裁者！”几名议员冲到拿破仑跟前，揪住他的衣领猛烈推拉，拿破仑又气又惊，被士兵保护出了会场。议会中甚至有人提议宣布拿破仑不受法律保护，经五百人院议长、拿破仑的胞弟吕西安·波拿巴极力抗议才没有付之表决。随后，拿破仑的助手勒克莱尔将军，率领士兵持枪进入会场，对议会大声高喊：“我代表波拿巴将军宣布解散立法议会，希望善良的公民们自行退出。卫兵们，前进！”在战鼓声中，五百人院议员们纷纷夺门跳窗而逃。下午5时半，法国立法机构在政变中被解散。

当晚8时左右，几十名跑散了的、惊魂未定的议员被召回，由吕西安主

持会议，通过了决定：废黜督政府，成立临时执政委员会，由前督政西哀耶斯、罗歇—迪科和拿破仑为临时执政。还决定由两院分别成立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两院暂时休会。政变获得成功。

雾月政变并没有在法国民众心理上产生惊恐不安的感觉，相反，人们却对督政府的垮台感到如释重荷。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政变却是改变法国革命进程，乃至改变法国历史发展面貌的一次重大转折。从此以后，法国开始了新的军事独裁统治。

第六章 执政府和第一帝国

第一节 执政府的统治

一、执政府的建立

[拿破仑·波拿巴的崛起]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出生在科西嘉岛。1779年到法国本土的军校学习。大革命开始后，曾参加雅各宾派。1793年12月，在土伦战役中，一举成名。不久，晋升为炮兵准将。在热月党和督政府时期，屡次平定王党叛乱。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出色，多次大败敌军，在全国各阶层人士中赢得广泛声誉。他精力过人，反应敏捷，待人宽宏大量，办事坚毅果断；但脾气暴躁，喜怒无常，权力欲极强。

雾月政变后，拿破仑统治法国长达16年之久。前5年为执政府统治时期（1799·11—1804·12）；后11年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统治时期（1804·12—1815·6）。前期任第一执政，后期称皇帝。国际国内的政治斗争形势，将他推上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了叱咤风云的主角，开创了拿破仑时代，对法国和欧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共和八年宪法]1799年雾月政变胜利后的第三天，拿破仑随即和西哀耶斯、罗歇·迪科组成共和国临时执政府，拿破仑任第一执政。为使已经取得的权力合法化，他匆忙拼凑了一个新宪法。12月15日，将新宪法提交公民投票表决。12月25日，正当新宪法投票表决之际，拿破仑宣布组成法兰西共和国执政府执行政务，并发表告法国人民书，表示承担自己的职责，维护共和国。1800年2月18日，新宪法以301,107票对1562票的压倒优势获得通过，即“共和八年宪法”。

宪法明确宣布废除封建等级制，承认革命后的合法权益，维护共和制度。

宪法规定政府把全权授予执政三人，执政任期十年，连选得连任。并任命拿破仑为第一执政，前司法部长、法学家康巴塞雷斯接替西哀耶斯为第二执政，前元老院委员会成员、经济学家勒布伦代替迪科任第三执政。

宪法赋予第一执政以绝对权力，可公布法律，任免政府各级官员，有权决定宣战、媾和及签订条约。第二、第三执政只有发言权，起咨询作用，成为拿破仑的高级顾问，这样，实际上就集行政权力于一人。

宪法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规定法国议会实行由四院组成的多院制，其中的每一院都无权单独决定国家立法问题。第一院是参议院，由30—40人组成，议员均由第一执政任命。该院根据拿破仑提议草拟各种法案，然后交第二院——保民院审议，该院由100名议员组成，参加讨论法律草案，但无权通过或否决法案。第三院——立法院，由300名议员组成，其职权就是对第二院提交的法案，不作讨论就投票表决，表示赞成或反对。第四院——元老院。该院由60名年龄在40岁以上的元老组成，终身任职，批准第三院通过的法案。最后，再交第一执政，签署公布实行。从中可见，第一执政的权力十分突出，事实上，四院徒有其名，因为所有法律是否生效，最终都由拿破仑说了算。

宪法条文中，除规定夜间不得搜查民宅以外，很少提到公民的权利。虽然规定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者有选举权，但是实际上

并没有享受选举权，因为宪法同时规定了“荣誉公民”制度，每个县按人数选出 1/10 的“荣誉公民”，这些荣誉公民才有权参加郡级选举，从中又选出 1/10 的“郡荣誉公民”，最后从中选出 500 名“全国荣誉公民”，作为社会职务和国家职位候选人名单，第一执政从中挑选部长，参议院议员，元老院元老等。

总之，共和八年宪法既坚持了大革命的原则，又肯定了拿破仑的无限权力，这就为高度集权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准备了条件。1802 年 8 月，拿破仑下令修改共和八年宪法，修改后的宪法史称共和十年宪法，明文规定拿破仑任终身执政，并有权任命后继人，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开始。

二、新型的国家权力结构

拿破仑被任命为终身执政时年仅 33 岁，他要在一个欧洲大国牢牢掌握统治权，进而实现称霸欧洲野心，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听命于他的强有力的权力机构。共和八年和共和十年两个宪法的公布，已经使立法权控制在他自己手里，他还必须把行政权也牢牢掌握住，通过几年的努力，拿破仑终于建立起一个以个人专权为特征的具有高度行政效能的上下畅通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一个庞大的完全听命于他的中央政权。

[行政]对缺乏治国经验的拿破仑来说，他能够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高度集权的新型权力机构，关键在于正视现实，敢于改革，善于用人。面对法国动荡的现实，他努力改革松散的行政机构，实行高度集权。拿破仑亲自挑选了有丰富行政经验的各种专家、名人共 29 人组建了具有最高行政裁决权的参议院，分成海军、陆军、财政、立法、内务五个小组，共商国家大事，成为拿破仑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拿破仑还在中央设立 12 个部，任命有真才实学的又有实际经验的专家担任各部部长，经营全国各类事宜。

拿破仑善于容人，只要是能人并愿意为他的政权服务，不问党派如何，即使曾经反对过自己，他也一概录用，委以重任，使各种人才，为其所用，听他指挥，参与领导和管理全国各方面的工作。他录用的人，有斐扬派的、吉伦特派的，也有雅各宾派的，还有热月党的，督政府的显要人物，其中最典型的是他对富歇的任用。拿破仑明明知道富歇狡诈、善搞阴谋。当时很多人也反对录用富歇。可是拿破仑却认为，富歇在警务方面有突出的才能，又投奔了新政府，应该任用。他说：“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对于过去，我们应当记住好的方面，忘却坏的方面”。决定留任富歇为警务部长，结果使其才能得以发挥，起了重要作用。

在改革中央机关的同时，还努力实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取消大革命中确立的由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把全国划为 88 个郡，郡以下设区或县，县以下设市镇。郡守一律由拿破仑直接任命，县长和市长一般也由拿破仑任命，唯有 5000 居民以下的市镇则由郡守任命市镇长，郡守和县长大都是富有经验、有管理水平的能人，又能直接听任中央指挥，从而使地方绝对服从中央的一整套资产阶级权力机构得以确立和完善，提高了办事效率，巩固了拿破仑的管理体制，使政府政策法规的贯彻从上到下畅通无阻。正如夏普塔尔所说：这种行政体制工作效率很高，“……把政府的法律和法令以电流的速度传达到社会组织的基层”。

拿破仑的行政改革之所以能够奏效，除了他高明的用人政策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之外，还在于这种改革，迎合了当时国内外的紧张局势，符合了革命法国的利益，因而也为人心所向往。因为只有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才能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当然，大革命中对封建特权的废除和封建割据的消灭，国家与民族统一的实现，也为拿破仑的行政改革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否则改革也难成功。

[警察]拿破仑积极改革侦察机关，建立严密的警察制度。他把警察从地方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置于中央机构的直接控制之下，为此，他保留警务部，由密探头子富歇继续担任警务部长，主管治安工作。同时还设立秘密警察机关——巴黎警察总署，任用亲信担任总署负责人。与警察并存的还有组织严密的宪兵队，单独执行任务。拿破仑为使警察机关相互监视，使各警察

机构并存，又各有责守，从中规定一套严格的告密制度，设有高级告密者，遇有重要情报，可直接密告拿破仑本人。警察系统成为拿破仑统治的得力工具。

[军队]拿破仑十分懂得军队在权力机构中的地位，他常常说：“谁有强大的军队，谁就正确”。他不断加强军队建设，建立了一支欧洲最庞大的军队。同时，还创立绝对忠诚于他的近卫军。为巩固统治，还在1802年5月，向国务会议提出创立“荣誉军团”颁授勋章的法案，规定荣誉军团由终身爵位的人组成，共有15个大队，分成5个等级，每名成员按等级享有不等的年俸。并把荣誉军团勋章制度推广到文职人员，以此奖励优秀的学者、专家和文职官员，调动各类人士的积极性。而训练有素的军队就成为拿破仑中央集权统治的主要支柱。

拿破仑还重视司法改革，在1800年3月就颁布了司法系统改革的法令，建立了金字塔式的法官等级结构。使司法权也集中到中央。

[宗教]拿破仑认为新政权光靠暴力实行统治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精神上的支柱，这就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

拿破仑虽然不信任何宗教，却深深感到需要宗教来维护道德和巩固社会秩序，他说：“我从宗教那里看到的不是化身的奥妙，而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奥秘”。“没有宗教的社会就象一艘没有指南针的船”。他大胆地对教会进行改革，使教会隶属于国家，并利用广大人民的宗教感情为其统治服务。他颁布法令，准许开放教堂，使教堂用于宗教目的，取消教士宣誓，恢复礼拜日。他本人经常去教堂参加弥撒，表示对教会的友好感情，努力使教会成为新政权的有力工具。

三、社会与经济政策

[签订教务专约]为争取罗马教廷的支持，拿破仑排除种种干扰，派代表与罗马教廷谈判，施展各种手法使谈判成功，1801年7月15日，拿破仑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协议—政教协议（即《教务专约》）在巴黎签字。不久得到罗马教廷批准。翌年，经法国立法院同意，元老院批准，最后由拿破仑作为国家法律正式颁布实施。

《教务专约》共十七条，其主要内容为：第一、天主教承认法国大革命的原则，革命中已没收的教产，不再要求收回，以“维护法国国内的安宁”，教会特权不予恢复；第二、法国承认天主教是“法国公民中绝大多数人的宗教”，承认公民信教自由，废除限制天主教仪式的革命法令；第三、天主教必须完全服从国家，为国家服务。规定“主教在就职视事之前，必须先直接向第一执政宣誓效忠，永远服从并矢志于按照法兰西共和国宪法所成立之政府”。第四、法国设置九个大主教区，41个主教区。大主教，主教和首席教士均由第一执政任命，再由教皇和教会给予宗教授职，由国家支付主教和圣职人员的薪俸。而后，拿破仑又在《教务专约》上加了附件，即组织条例，共77条，使上述规定更加具体化。进一步明确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规定罗马教廷的任何通谕、文告、法令、信件，未经法国政府批准，任何人不得接受、刊印、发布和执行。罗马教廷的任何人员未经法国政府许可，不得在法国从事任何活动。法国教会的任何活动，必须经法国政府批准方能生效。教务专约与组织条例的公布施行，就以法律的形式既维护了法国广大民众信教的自由，又使天主教从属拿破仑政权，将天主教由封建专制王权的精神支柱，变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的精神工具，成为“神职宪兵”，凡是举行圣礼时，都必须以“上帝保佑共和国，上帝保佑执政”的祷词作为结束语。后来又明确规定，教会对皇帝尽忠。

与此同时，拿破仑颁布了新教组织条例，承认新教与天主教拥有同样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利。接着，又通过了关于对待犹太教的法律，宣布犹太教与天主教，新教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同样受到政府的保护与照顾。拿破仑的宗教政策，深得人心，它不仅消除了国内的宗教纠纷，促进了法国人民的统一和团结，增强了国力，而且在国际上也缓和了天主教国家的敌对情绪，大大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平息反对派]拿破仑运用政权的力量，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和削弱反对力量，努力消除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他首先镇压骚乱社会的盗匪和王党的复辟活动。当时大批土匪、强盗等社会渣滓，横行乡间，拦路抢劫，杀死乘客，严重危害治安。拿破仑派出军队和警察四处出击，对罪犯一律就地正法。对窝藏盗匪和购买赃物者，或与盗匪有勾结者，也一律处死。对罪犯姑息纵容或措施不力的警官，同罪论处。拿破仑的严厉措施收效甚大，社会秩序迅速好转。

拿破仑对王党复辟势力，以巩固新政权为宗旨采取不同的对策，实行镇压和安抚相结合的方针。对发动叛乱顽固反对新政权的王党分子，坚决镇压。拿破仑还贴出招安法令，呼吁叛乱分子投诚，对放下武器向政府投诚者，则赦免之。同时，允许逃亡者回国，只要不搞破坏，不再追究罪责。结果，分化了敌人的营垒，使大批在国外的逃亡者纷纷回国。旺代的叛乱也就很快被平息。少数顽敌则被围而歼之。但是，一小撮保王党头目错误地估计了拿破

仑对亡命者的宽容态度。普罗旺斯伯爵(后来的路易十八)于1800年两度写信给拿破仑,表示愿意和解与合作,共同恢复波旁王朝。拿破仑断然拒绝,严正表示:法国决不允许封建制度复辟,他在回信中说:“您不应盼望重返法国,为此您需要从10万具尸体上踩过去”。1804年当拿破仑获悉波旁王朝的当甘公爵阴谋策划叛乱时,就派骑兵到德意志把公爵抓回,立即处决,表明了他坚决反对封建复辟的原则立场。

拿破仑对左派民主势力也一概打击。当时一些以王党为首的社会不满分子,先后数十次对拿破仑下毒手,进行暗杀,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800年12月25日晚,在圣尼凯斯街上,凶手事先在马车上安放了炸弹,当拿破仑经过时,炸弹突然爆炸,拿破仑幸免于难,而22名无辜群众却因此丧命,56人受伤。拿破仑乘机大肆逮捕和镇压雅各宾党人,1801年下令放逐130名雅各宾党人。与此同时,他还公然剥夺了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将全国73种报刊查封了60种,对各种舆论严加控制,他配备专职图书管理员,及时送交报刊文摘,新书评析和各种剧本的脚本和招贴、广告,不允许招贴、报纸、书刊、戏剧中有损政府威信的观点出现,更不允许作为党派的工具进行煽动宣传。同时严禁工人结社罢工,1803年宣布夏普利埃法继续生效,还建立了反动的工人手册制度,作为迫害和刁难工人的档案,这种反民主反工人的政策,充分反映出拿破仑政权的大资产阶级本质。

[改革经济体制]拿破仑懂得要巩固统治,光有完整的权力系统是不够的,最可靠的方法是发展生产,增进福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当时法国面临的是国库空虚、经济不景气,只有改革经济体制,发展生产,才是振兴法国的唯一出路。拿破仑首先对财政系统进行改革,他任用财经专家担任财政部长,整顿和加强财政机构,改革税收制度,将收税权从地方集中到中央,剥夺地方政府对税额的分配权和征税权,由中央指派代理人负责地方税额的分配和税务的征收。中央还专门派出官员,对财政活动进行监督,保证国库收入。同时,厉行经济紧缩政策,健全会计制度,公开打击贪污和盗窃国家财富的罪犯,杜绝漏洞,节约资金。这些改革措施,起到了开源节流的作用,使国库收入大为增加,财政状况不断改善。

拿破仑认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有发达的工商业,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强大。为此,政府采取国家订货,用巨额津贴补助,奖励竞争,实行发明专利权,举办博览会等各种办法刺激工商业的发展。尤其注意对新型企业的扶植和对技术的革新和新机器创造发明的鼓励。他说:“证明有必要采用机器,就如同证明太阳比蜡烛照得更亮一样”。拿破仑亲自参观某些工厂的技术革新,给各种机器发明人以巨额奖金。政府监督工厂严守技术秘密。1801年成立“奖励民族工业协会”,各郡、县、市镇还纷纷成立商会,协助政府保证和监督工商业的发展。接着还组成“工厂和手工场委员会”,研究、制订法国工商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他还采取特优照顾,引进国外的科技人才。

为加速资金的周转和流通,拿破仑还对金融业进行改革。1800年2月将“往来存款银行”和“商业贴现银行”等私人银行进行改组,成立了新的国家银行——法兰西银行,拥有3000万法郎的基金,每股为1000法郎,200名主要股东选出了15名董事和3名监事。1803年4月7日,法兰西银行拥有发行钞票的垄断权,开始发行重五克九成纯银为一法郎的芽月法郎。使计算上的货币和实际使用的货币在价值上第一次完全相符。从而使法兰西银行在法国的金融业和工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为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拿破仑坚决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加强海关的管理，提高海关人员的地位，拿破仑称海关是“民族的围墙”，充分发挥海关的作用，有力地抵制外国商品在国内市场的倾销。促进并保证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

拿破仑在重视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十分注意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他常常巡视各地，敏捷地组织各郡行政，下令开凿运河，开辟港口，建造桥梁，修整街道，兴建纪念性建筑物，增加交通设施。其中著名的工程有：修筑巴黎大码头，开拓 18 条河道，新辟 200 公里运河，修建从巴黎到里尔、马赛、波尔多、斯特拉斯堡和布勒斯特的各条公路。从而畅通了交通运输，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为人民提供了工作机会。

拿破仑不仅维护小农土地所有制，而且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说：“农业，是帝国的灵魂，是帝国首要的基础”。他注意对农业进行改良，组织群众兴修水利，保证灌溉，下令排干沼泽以扩大耕地，严禁破坏森林，保持生态平衡。实行作物轮种制，培植推广新品种。采用新技术，种植葡萄和发展畜牧业。努力提高产量和谷物售价。拿破仑还提倡用甜菜制糖，1811 年 3 月颁布法令划出 8 万公顷土地种植甜菜，开办 6 所讲习用甜菜制糖的学校，帮助农民种好甜菜发展制糖业。所有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小农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深得农民支持。

[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由于拿破仑采取奖励工农商业的各项政策，使法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法国的经济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从 1789—1815 年间，各种工业品的产量都成倍增长，生铁产量增产 1 倍多，毛织品增产 3 倍，机器使用大大加多，生产效率十分显著。对外贸易头三年就增长了 70% 以上。粮食总收获量从 1790—1812 年增加 10%，有些农产品成倍增长。拿破仑还分别在城市组织大规模建筑工程，在农村搞垦荒，使大批失业者得到了一定的就业机会，生活好转，巩固了社会的安定。只是到帝国末期，因连年征战，才使危机加深，工农大众处境艰难。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人口不断增长。从 1801 年的 2750 万人增加到 1814 年的 2934 万人，1814 年的出生率达到 33.9‰，每对结婚者平均生育 5.15 个孩子，这是法国历史上所少见的。

四、战争与和平

[战争的性质]拿破仑一生几乎是在“马背”上度过的，从1793年12月土伦战役打败英国人开始，直至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战役最后失败，在22年的戎马生涯中，总共指挥过大小战役近60个。在战争中，他凭借大革命所提供的政治条件和物质基础，创造了资产阶级军事史上的奇迹，完善并发展了革命中所创立的资产阶级军事学，成为资产阶级杰出的军事学家。

拿破仑的对外战争大致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与反法联盟国之间进行的战争；一种是与英国之间的战争；另一种就是对反法联盟之外的一些国家的战争，这种战争无疑具有扩张侵略的性质，但在客观上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对前二类战争，其两面性就十分明显，它既有反抗侵略，维护本民族独立的一面，又有扩张侵略，争夺欧洲霸权的一面。这就构成了拿破仑战争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战争性质交叉变化难以判定。

但是，任何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其变化发展，总是有主次之分的，其中必有一面是主要的，拿破仑战争也不例外。统观其战争的发展，在拿破仑统治的前期，一般说，在拿破仑帝国成立前，他与反法联盟之间的战争中，其反抗侵略，打击欧洲武装干涉，保卫革命成果，维护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尊严是其主流。到后期，则逐渐转化为掠夺和争夺欧洲霸权的性质，尤其是当拿破仑权力巩固之后，却不顾民众死活、一意孤行，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其主流明显转化为扩张和争霸，这种战争性质的转化，也是帝国导致灭亡的重要原因。总之，对拿破仑战争的性质，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对每次战争的起因、目的和实际内容进行具体分析和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粉碎第二次反法联盟、亚眠和约]拿破仑在雾月政变后，法国仍处在第二次反法联盟军的包围之中，为巩固统治，必须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为此，他向英、奥、俄三国君主提议媾和，遭到拒绝。拿破仑愤怒异常，决心再战，向全国发出号召，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保卫自由，为了法国的荣誉，必须拿起武器来。他决定首先打击对法国威胁最大的奥地利，把主攻战场放在被奥地利占领的北意大利。

拿破仑把全部兵力都集中到莱茵河战线和阿尔卑斯山方面，任命莫罗指挥莱茵方面军，自己则再次亲赴意大利指挥作战。1800年5月，拿破仑离开巴黎，带领3.6万人的主力，出其不意地穿过大圣伯纳德山口，进入意大利北部。从奥军后背发起进攻并很快进入伦巴第，直插首府米兰，切断奥军后路。6月9日，拿破仑离开米兰。14日，双方主力在马伦哥相遇。马伦哥位于亚历山大里亚东南约5公里处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村庄，拿破仑在这块小平原上共有5个步兵师和4个骑兵旅，总兵力约2.6万人。奥军约2.8万人，双方兵力相当。上午10时战斗开始，奥军全面出击，法军处于正面受挫、两翼被围的困境。拿破仑被迫后退，下午3时奥军统帅梅拉斯以为大局已定，一面派出使者回国报喜，一面命令部队就地休息准备用饭。此时，德塞率5000人的援军赶到，拿破仑当机立断，于下午5时开始发起猛烈进攻，终于反败为胜，奥军以惨败告终。马伦哥会战，双方都付出巨大的牺牲，法军优秀将领德塞阵亡，损兵5800人。奥军伤亡9400人，占梅拉斯兵力的1/3。次日上午，梅拉斯被追求和，战争结束。不久，法军占领了整个意大利，奥军无力再战。1801年2月9日，法奥两国在吕纳维尔签订了和约，奥地利同意康波福米奥和约中的一切条款，法国还取得了意大利的许多领土。从而结束了

第二次反法联盟中的法奥战争，也结束了拿破仑的第二次意大利战役。马伦哥战役是拿破仑执政后指挥的第一个重要战役，这一战役的胜利，对加强拿破仑的统治地位，对巩固新政权，意义重大。

马伦哥战役胜利后，拿破仑作为一个胜利者，希望欧洲能够暂时实现和平，他利用反法联盟国之间的矛盾，发起了以谈判为中心的和平攻势。1801年10月，拿破仑利用俄英矛盾，与沙皇签订了《巴黎和约》，接着，又与几个小国签订了和约。英国迫于形势，接受和谈。英法两国代表在法国的亚眠举行和平会议，1802年3月25日，双方正式签订了《亚眠和约》。和约规定英国承认法国在欧洲占据的领土，同意把大革命以来所占的殖民地的大部分交还给法国及其附庸国荷兰和西班牙。英国必须立即退出所占的马耳他，将它交还给该岛的骑士团，并撤出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所占的据点。法国从埃及和罗马撤军，罗马及其他教皇领地均归还罗马教皇。

亚眠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结束，欧洲终于实现了普遍的和平。和约显然是对英国不利的，英国既未战败，又未能真正解决与法国的矛盾，这是英国陷于孤立形势下被迫作出的重大让步。它无意执行和约的条款，而且迟早会撕毁对英国不利的约束条款。英国果然迟迟不肯撤出马耳他岛。拿破仑终于忍耐不住了，一年后他向英国发出了警告，1803年3月13日，拿破仑在接见英国大使时气势汹汹地指出：“英国人要战争，但如果他们先拔剑出鞘，那就让他们知道，我要最后一个插剑入鞘……要末归还马耳他岛，要末就是战争！要战争我们一定奉陪到底。”其实，拿破仑也无意去执行和约中对法国的约束条款，他只想征服英国，所以在欧洲继续扩张势力。英国对拿破仑的警告自然不肯示弱，3月15日，英国首相明确表示十年内决不撤出马耳他。4月26日，英国大使奉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拿破仑同意英国继续占领马耳他。法国拒绝答复，双方立即断交。英国积极组织第三次反法联盟，法国加强海军装备，准备进攻英国，双方战争不可避免，拿破仑决心走上与英国争夺霸权的道路。

第二节 帝国的建立与全盛时期

一、帝国的建立

[拿破仑加冕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国际、国内的形势，成为拿破仑登上帝位的阶梯。1804年5月18日，拿破仑公然授意元老院通过决议宣布拿破仑·波拿巴为法兰西人的皇帝。并且宣布实行国家元首的世袭制符合法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提请全国公民投票批准世袭制，颁布了新宪法。11月，提倡世袭制的新宪法以绝对多数票通过，正式宣布法国为帝国，把共和国政府托付给一位世袭的皇帝，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共和十二年宪法”。12月2日，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典礼，称拿破仑一世。从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被第一帝国所取代。

[拿破仑政权的实质]拿破仑的统治，表面上似乎凌驾于各阶级之上，拿破仑自己也常常宣扬他是各阶级的代言人。他曾经说过：“我的政策是按照最大多数人的愿望进行统治”。其实，他鼓吹的大多数人就是指法国大资产阶级，他不过将小农拉到自己旁边作为护身符而已。不管是任第一执政还是当皇帝，他实行个人集权统治的形式并没有改变，这种统治形式归根到底对法国大资产阶级最为有利。

至于广大小农，他们受封建之害，记忆犹新，而威胁并未最终摆脱。所以，迫切希望依靠这个政权的力量，保住大革命时期所获得的小块土地，免遭逃亡贵族的重新侵夺。而拿破仑为了稳定统治的需要也确实从法律上维护了小农的所有制，在实践上也采取一些有利小农的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小农的处境，尤其是改善了农村中的短工、仆役和牧羊人的处境，他们的工钱一般提高了20—50%，最高的增加了1倍。于是广大小农就站到了拿破仑一边，一度为保卫自己的小块土地和既得利益血洒疆场，成为拿破仑统治的主要社会基础。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拿破仑不可能真正代表小农的利益，更掩盖不了拿破仑政权的大资产阶级本质。所以，到1810年以后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农民的处境重新恶化。

至于对待广大工人，那更是泾渭分明。拿破仑一方面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工人的工资。例如，在1800—1810年间，在巴黎某些行业中，工资增长了20—40%；而在外郡，估计增长了15—20%。据巴黎警察总署估计，1807年巴黎工人每天的平均工资为3.35法郎，最低为2.15法郎，最高为4.2法郎。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生活有所改善，但极不稳定，工人的劳动日一般都在12—14小时左右。另一方面，拿破仑对工人在政治思想上又严加禁锢，使他们经常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下，没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言。这说明拿破仑政权也不可能是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

至于对待知识分子，拿破仑确实看到了他们在治国兴邦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其权力结构中，重用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并在生活上给予照顾，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在许多重要岗位上发挥特长。但是，知识分子必须忠实于帝国，忠诚于拿破仑，否则就会遭来杀身之祸。

总之，拿破仑政权只能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拿破仑体制中的核心力量就是最富有的权贵名流和拥有大量财富的中高级行政官吏，以及军队中拿高薪的中高级军官，而且有森严的等级特权。拿破仑首先维护的就是这部分人

的利益，这就是第一帝国的实质。

[颁布法典]拿破仑为了巩固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努力使集权与严密的法制结合起来，他经过多年的准备，陆续颁布了五部法典：《法国民法典》（1804）、《民事诉讼法》（1806）、《商法典》（1807）、《刑事诉讼法典》（1808）、《刑法典》（1810）。拿破仑认为《民法典》是他对资产阶级的最大功劳。他曾经说过：“我的真正光荣不在于我打了40个胜仗，但不能被遗忘的，将万古长存的则是我的《民法典》”。这部《民法典》是在拿破仑亲自主持下制订的，1800年8月，他任命了特隆歇、波塔利斯、马尔维尔和比戈·德·普雷阿梅纳等4位著名法学家组成起草委员会，经过4个月的紧张工作提出了民法草案，由参议院立法专门委员会修改，交参议院全体会议逐条讨论修改，参议院先后召开了107次讨论会，其中拿破仑亲自主持了62次会议。拿破仑曾研究过古罗马法并阅读了大量法学书籍，因此，当讨论纠缠不清时，他就理出头绪，归纳出结论，并“提供大部分是正确、新颖、深刻的观念”。经过三年半的修改、讨论，于1804年3月15日由立法院通过，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以《法国人的民法典》的名称正式颁布施行。1807年这部《民法典》被命名为《拿破仑法典》，包括总则、三编（35章），共2281条。

《民法典》内容丰富，其中最突出的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确认了资产阶级财产所有权的原则。几乎有1/3的条文，从不同的角度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可侵犯性，维护了大革命最根本的成果。例如第537条规定：“私人得自由处分属于其所有的财产”。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这就保证了绝对的个人私有制，激发了个人积极性，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民法典》明确肯定了新的土地关系。保障它不受封建复辟势力的侵犯。第552条规定：“土地所有制并包含该地上空和地下的所有权”。“所有人得在地上从事其认为适当的种植或建筑”。第54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制出让其所有权；但因公用，且受公正并事前的补偿时，不在此限”。并且还具体规定了土地所有者权益的范围，提出了保护“添附权”，即凡是土地产生的天然果实或人工果实（耕种所得产品），法定果实（如房租、利息等），家禽繁殖的小家畜等均归土地所有者（见第547条），这样不仅维护了资产阶级在生产资料方面取得的胜利成果，而且保障了农民在大革命中取得土地的合法权利。极大的激发了个人的生产积极性。所以，拿破仑法典不仅受到资产阶级的一致拥护，也深受农民欢迎。

第二，《民法典》确认了契约自由的原则、维护并保障了资本主义自由买卖、等价交换和新的雇佣关系。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了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而且规定原料的取得，商品的流通，工人的雇佣，都必须通过契约，买卖、交换，一切均可以自由经营。第1598条规定：“交易范围的物品，除特别法禁止出让者外，均可出售”。第1710条规定，凡劳动力雇佣者可与出卖劳力者商定，一方为他方完成一定的工作，他方约定支付报酬的契约。并规定工人必须遵守雇主关于工资定额的规定。该《法典》中几乎有1000多个条文规定了契约之责，这就可以使资产阶级利用契约自治原则，不受限制地进行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自由买卖，自由竞争，发财致富，从而巩固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第三，《民法典》确认了损害赔偿的原则。第1382条规定：“任何

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的责任”。接着，在第 1383 条中又规定：“任何人不仅对其行为所致的损害，而且对其过失或懈怠所致的损害，负赔偿的责任”。这一规定对更好地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样起着法律的保证作用。

第四，《民法典》确认了自由、平等的原则。第 8 条规定：“所有法国人都享有民事权利”。第 488 条规定：“满二十一岁为成年，到达此年龄后……有能力为一切民事生活上的行为”。这就是说，每一个成年的法国人，都享有平等的民事行为能力，从而以民法的角度否定了封建等级制度及其特权，强调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资产阶级人权平等的原则。

此外，《民法典》还对婚姻、家庭、继承等方面作了规定，规定夫（父）是一家之长的原则，丈夫有保护其妻子的义务，妻子有服从其丈夫的义务。并规定夫妻双方离婚必须持有严肃的理由，极力保持家庭作为国家基础的稳定性。并规定遗产作为财产整体在继承者之间平分，非婚子女受到法律承认。限制自由立遗嘱的权利。

总之，《民法典》的公布和实行，就从法律上维护和巩固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秩序，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复辟势力；并且对摧毁欧洲的封建反动势力同样起了积极作用，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制订法典的蓝本。

拿破仑在《商法典》中努力调整工商业的关系，运用法律武器保证工商业的发展。在《刑法典》中，强调对各种不法之徒必须严惩，以保证社会的安定。但是，所有上述法典，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维护拿破仑的大资产阶级统治。

[确立新的教育体系]在拿破仑看来，一种新体制象一座高层大厦一样，使它巩固，必须在这块土地上放下大堆大堆的花岗石作为基础。他认为，创立荣誉军团颁授荣誉勋章是在法国土地上打下的一堆花岗石。而改革教育，确立新的教育体系，这是又一堆更为重要的花岗石。所以，拿破仑十分重视文教事业，他说，“在我们的一切制度中，公共教育是最重要的。现在和未来，一切都得依靠它”。从 1800 年开始，法国对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把教育严格地分成初等、中等、高等三个等级。拿破仑虽然把初等教育权交给市镇管理和监督，但仍十分关注对儿童的培养和教育，1801 年 6 月，他在致内政部长的信中对小学的男童学校提出了改革意见，主张把小学教育分成两大部分，12 岁以下进行基础教育，强调读、算、写的基础训练，同时注意爱国和道德理想教育，规定必须阅读《帝国教理问答》，以便从小养成对拿破仑的绝对忠诚。12 岁以上组成高级小学，分设两个班级，一个为准备从事文职而设，一个为准备从事军职而设，前者除学文外，还要学习数学课程。后者，要学点天文学、制图、筑城学、设计等课程，并根据学生水平确定跳级、升级和留级。

对中等教育，拿破仑按照更加正规化、军事化和功用化的路线进行改革。1802 年 5 月颁布法令，将中学改组为普通中学和国立中学两类，并决定建立国立中学 45 所。普通中学由地方兴办，也可由私人或教会开办，其经费也由地方或私人负责。为数不多的国立中学一概由政府直接管理，经费由国家供给。国立中学的教学大纲比普通中学的内容既广又深，但两类学校都特别注重数学和应用科学。中学生进行严格的纪律训练，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每天

上下课均以击鼓为号，一犯大过即被开除。并且实行严格的考试，没有取得中学毕业文凭即会考证书者，不能成为国家干部。国立中学发展很快，1807年全国达37所，到帝国末期增加到100多所。帝国每年培养和造就2000名对政府有用的公务、法律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的中学毕业生，成为各级权力机构中的新生力量。

但是，拿破仑对女子教育十分轻视，规定对女子进行宗教教育，不是启发她们思考，而是只“需要永远顺从”。

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掌握和管理，大学设有五个系：物理数学系、法律系、医学系、神学系和语文系。为加强对领导教育的垄断权，于1806年5月，拿破仑提议由元老院通过，成立帝国教育团（或称法兰西大学院）。它不是一所大学，而是全国教育系统的最高领导机构，统一管理全国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而后，几经调整、补充，这一机构的组织和职权更趋完善。帝国教育团设有一名总监、又辅之30人组成的评议会和督学团，负责制订教育规章，组织编写各类教学用书，严格检查和控制教学内容，批准和任命大学教授等各种事项。全国分设17个学区，同样设有总监、评议会和督学团，分管学区教育工作。拿破仑还要求议员巡视各郡了解学校教育情况，查明为什么有些学校成功，有些学校松懈。还要求列出优、劣教师的名单，以资奖惩。同时，在各级学校设立奖学金制度，鼓励竞争，奖励优秀学生。

拿破仑改革教育的目的是使教育工作有明确的目标，这就是必须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用帝国的标准来铸造整整一代人。使学校培养出忠于皇帝的能干的行政人员和经济部门的领导者，他们不是思想活跃分子，而是有谋生技能，奉公守法的公民和热情、勇敢又顺从的战士。

拿破仑敏锐地觉察到教育成败的关键在于教师，他一再强调教育团对教师资格的授予必须严格把关。同时，要大力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要组织一支不朽的教师队伍。他提议在公共教育事业中，“设置最高职位，使充任这些职位的人置身于国家最显要的人物之列”。他认为，必须使教师这一职业成为吸引人，使人向往的职业。的确，在拿破仑时代，教师，尤其是大学教授，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和很高的声誉，成为教育领域中的最高“权威”。许多杰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等等都登上大学讲台，成为教授。

拿破仑的教育体制改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培养了一大批精明能干的各级人才，对其权力机构的顺利运转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二、建立欧洲大帝国

[粉碎第三次反法联盟、奥斯特里茨大血战]1805年4月，英国鼓动俄、奥、瑞典、那不勒斯等国组成第三次反法联盟。拿破仑迫使西班牙参加法国方面作战，继续大规模准备渡海进攻英国。10月21日，法国和西班牙的混合舰队在地中海的特拉法加海角与纳尔逊指挥的英国舰队发生遭遇战，击沉法舰19艘，俘4艘，法军伤亡7000余人，法、西舰队几乎全军覆没。拿破仑只得放弃进攻英国的计划，把作战重点转向欧洲大陆。他立即率领布伦大军挥戈向东，在陆地上迎战俄、奥联军。为粉碎第三次反法联盟，拿破仑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在俄奥合兵之前，首先突击其主力奥军，予以歼灭性打击后，再迎战俄军。为解除后顾之忧，拿破仑利用普奥矛盾，使普鲁士保持中立。同时，迅速整编军队，组成24万余人的帝国大军，分成10个军团。法军星夜进军，不到3个星期就进入奥地利境内。10月，法军对麦克率领的奥军实行战略包围，并在乌尔姆给予致命打击，迫使麦克率3万奥军投降。11月13日法军占领了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俄军撤出维也纳后即与奥军汇合，准备以优势兵力全歼法军。

1805年12月2日，在维也纳以北120公里的普拉琴高地周围的丘陵地带，即奥斯特里茨（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称斯拉夫科夫），双方展开了世界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血腥大战。7.3万法军与8.7万俄奥联军对垒。拿破仑自始至终亲自指挥这场战役，缪拉等法国的优秀将领都在场，俄军总指挥为沙皇亚历山大，著名将领库图佐夫在场，奥国皇帝弗兰茨为奥军总指挥。拿破仑预料到联军一定要设法截断去维也纳和多瑙河的退路，于是他象演员一样，一边命令前哨开始撤退，一边派人向亚历山大建议休战媾和，表现出胆怯怕战的假象。当和谈遭到联军拒绝后，拿破仑故意在前线高声宣读撤退的假命令，俄、奥联军果然上了拿破仑的圈套，将大军调离战略高地去包抄并堵截法军退路。法军将计就计，调开左翼，迅速占领普拉琴高地，集中火力轰击俄军，将俄军逼到半冰河里去。大批俄军被击毙、淹死，幸存者全被俘虏，俄奥联军大败，法军以少胜多，歼灭联军3万余人，缴获军旗45面。联军丢下巨大的辎重队、粮食和弹药，四散逃命，库图佐夫受伤败走，亚历山大险成俘虏。法军只损失9000人，终以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击少获得全胜。奥斯特里茨战役成为拿破仑军事史上的光辉一例。为纪念奥斯特里茨战役的胜利，1806年2月12日，政府决定在巴黎市中心建造凯旋门，同年8月15日奠基，1836年7月落成。凯旋门高49.54米，宽44.82米，厚22.21米，四面有门，门的内侧刻有当时随拿破仑远征的386个将军的名字，1920年11月11日，门下又添设了一块无名烈士墓石，墓前点着长明灯，它雄伟壮观，至今仍作为国家荣誉的象征。

奥地利被迫与法国议和。1805年12月26日法奥签订普勒斯堡和约，奥地利承认意大利转归法国，并承认拿破仑为意大利国王，割让占奥地利1/6人口的土地给法国，赔款4000万金佛罗伦。此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称号被取消，莱茵河沿岸21个小邦组成“莱茵邦联”，承认拿破仑是邦联的保护人，第三次反法联盟终于瓦解。

[粉碎第四次反法联盟、提尔西特和约]奥斯特里茨战役后，英国政府积极策划第四次反法联盟。而莱茵邦联的领土又一直延伸到普鲁士边境，邦联成为拿破仑在德意志进行统治的工具，这就激化了普、法之间的矛盾，普鲁

士决心充当反法的急先锋。1806年9月初，以英国为核心组成了第四次反法联盟。9月26日，普王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法军撤出德意志，并限令10月8日前答复。拿破仑以兵戎相见，10月14日法军在德意志境内的耶拿给普鲁士军队以毁灭性打击，普军死伤2.7万人，被俘1.8万人。普军被迫放下武器。10月27日拿破仑率大军进入普鲁士首都柏林，柏林市长向拿破仑献上了首都的钥匙，欧洲四强之一的普鲁士终于跪倒在拿破仑脚下。

踏平普鲁士后，拿破仑竭力争取与沙俄妥协，但15万俄军已开进波兰，向法军袭来。法军随即占领华沙，然后挥师北上，多次大败俄军，直逼俄国边境。1807年6月14日在华沙以北190公里的弗里德兰与俄军主力交战，毙、伤、俘敌2.5万人，俄军惨败后退到涅曼河右岸。沙皇亚历山大请求与拿破仑言和，两国皇帝在提尔西特驻地会晤之后，于1807年7月7日签订了法俄和约，即提尔西特和约，接着又签订了法普和约。俄国退出反法联盟，承认法国在国外的一切占有地，并同意把普鲁士的一半领土和新成立的华沙公国交由法国控制。结果，普鲁士忍辱丧失领土1/2，赔款1亿法郎，军队裁减到4.2万人。普鲁士人口从1000万骤减到493万。普鲁士失去强国地位，沦为一个小邦。拿破仑承认沙俄向瑞典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扩张的权利。从1805年到1807年的3年中，拿破仑相继打败了奥、普、俄三个欧洲强国，而提尔西特和约的签订使拿破仑的权力扩展到整个西欧和中欧，成为欧洲大陆命运的主宰，第四次反法联盟彻底瓦解，法兰西大帝国终于建成。

[大陆封锁]提尔西特和约后，拿破仑为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所陶醉，他感到世界不过是他自我意志得以充分表现的场所，决心同还在与法国分庭抗礼的劲敌英国再次较量，争夺世界霸权。但是，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的失利，使拿破仑不得不改变策略，他决心在经济上打击英国，遂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颁布了《大陆封锁令》，宣布：“不列颠群岛处于封锁状态”，“禁止与不列颠群岛的任何贸易和任何关系”，并下令在各地逮捕所有的英国人和没收他们的商品和财产。1807年，拿破仑又颁布《米兰法令》，禁止中立国和英国进行贸易，拿破仑想以此来禁止欧洲大陆各国同英国的任何通商往来，进而使英国经济完全窒息、破产，引起饥饿恐慌而投降。封锁法令实行后暂时斩断了英国与欧洲的联系，给英国以沉重的打击，也一度刺激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促进了新兴工业的出现。但是，引起欧洲其他国家的严重不满并遭到英国有力的反封锁。为了截断英国与大陆市场的一切联系，拿破仑决定夺取比利牛斯半岛。该半岛是英国同欧洲大陆进行贸易的主要途径之一，葡、西港口经常停泊着几十艘英国商船。1807年11月，法国出兵侵占葡萄牙，1808年3月，又出兵西班牙，进占马德里，并立其兄约瑟夫·波拿巴为西班牙国王。拿破仑曾亲自率领20万军队与西班牙人作战，在西班牙烧杀抢掠，激起了广大被奴役人民的极大不满与武装反抗，游击战争的烈火燃遍半岛，给拿破仑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大陆封锁不仅未能达到如期的效果，反而引起原料不足，对外贸易额锐减，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产生严重不满。英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的优势，很快恢复了元气，战胜了法国，大陆封锁体系名存实亡。英国政治家伊韦尔努瓦曾对拿破仑嘲笑说：“你们一心要把人家饿死，人家却吃得胀破了肚子”。

三、帝国的全盛时期

、[粉碎第五次反法联盟]拿破仑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不断失利，鼓起了战败国的勇气。它们开始认识到，拿破仑指挥的法军，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奥地利决心重整军备，再决雌雄。狡猾的英国则乘机抢先行动，在援助葡萄牙的名义下，派出4万人的远征军，在葡登陆，与当地游击队并肩作战。与此同时，奥、英密谋，于1809年1月组成第五次反法联盟。

拿破仑面对现实，积极筹划对策。他调兵遣将，重新部署兵力，以便对付奥军。可是，当法军还未部署完毕，奥国就在1809年4月，不宣而战，提前走上战场，向法军发起进攻。此时，拿破仑匆忙从巴黎赶到前线，法军面临被合围歼灭的危险。拿破仑果断地下定决心，改变原定的防御计划，作出新的部署，由防御转为进攻，从被动为主动，星夜分兵出击，以闪电战形式，在5天中接连展开5次血战，拿破仑脚部负伤，忍痛指挥，连连挫败奥军，5月13日，法军攻占首都维也纳。

可是，奥军主力并未受到致命打击。因此，双方激战仍在进行。5月21、22日，两军在阿斯佩恩——埃斯林进行会战，结果法军大败，2万法军战死，拉纳元帅和不少将领战死疆场。拿破仑并不害怕失败，他一面严厉镇压西欧各地因失败而引起的反抗，一面积极稳住整个欧洲大陆的动荡局势。

奥军主力从阿斯佩恩——埃斯林撤出后，来到瓦格拉姆驻扎，奥军有意利用有利地形等待拿破仑的进攻。拿破仑老谋深算，出敌不意地选择新的渡河地点，于1809年7月4日，乘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之夜，架起6座浮桥，10万法军一夜之间巧渡多瑙河。7月5日，法军展开扇形战斗队形，突然向奥军阵地袭来，双方展开了艰苦的前哨战。7月6日，双方开始决战。经过多次搏斗和反复争夺，奥军无力坚持于傍晚被迫后撤，法军以伤亡2.7万人的极大牺牲换取了决战的胜利，毙、伤、俘敌3.7万人，奥军被迫求和。

1809年10月14日，拿破仑在其驻地申布龙与奥地利签订和约。奥地利丧失领土1/3，减少居民350万人，赔款8500万金弗罗伦。和约还规定奥军人数不得超过15万人，并失去全部通向海洋的通道。奥地利又一次惨遭失败，第五次反法联盟被粉碎。

[法兰西大帝国的顶峰]拿破仑战胜第五次反法联盟之后，法兰西大帝国已经威力无比，其强盛达到顶点。拿破仑直接或间接地统治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法兰西大帝国领土包括比利时、皮埃蒙特、热那亚和西德的一部分，还有教皇国——罗马城和教皇的一切领地。拿破仑还兼任意大利国王、瑞士的统治者和莱茵邦联的保护人。其兄弟分别担任那不勒斯、荷兰、威斯特伐利亚的国王，其军队还控制着波兰以及欧洲北部沿海地区的汉堡、不来梅、但泽等许多地区和港口。帝国领土从原来88个郡扩展到130个郡。从查理大帝以来，法兰西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辽阔的疆域。人口达7500万，几乎超过革命前的2倍。法兰西大帝国威震世界，欧陆上的主要国家奥地利、普鲁士都听命于拿破仑，俄国也委屈求全只图自保。此时的拿破仑所向无敌，成为时代的象征。

拿破仑在被征服的欧洲大陆许多国家中，除了进行种种野蛮的屠杀和掠夺之外，都无例外地以战争的形式完成了各国酝酿多年而无力实行的资产阶级改革。在德意志诸邦，拿破仑传播革命原理，宣传自由平等，摧毁封建势力，赶走封建贵族，尤其是莱茵河左岸地区成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改革封

建体制，实现了各邦的统一。推行《民法典》，发展了资本主义。在意大利，纷纷建立共和国，废除封建贵族特权，实行“自由”、“平等”的原则，建立法国式的管理制度，使大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并且兴修道路，架设桥梁，建立学校、开辟公园，发展经济，促进了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此外，在波兰、比利时、荷兰等国，都不同程度地革除了封建弊端，实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大帝国建成的原因]拿破仑大帝国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是由当时法国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基础决定的，这是拿破仑战胜强敌的决定条件。法国在当时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军事上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条件。通过改革后的法国资产阶级新型的中央政权，比起当时欧洲大陆落后的封建君主国无疑要优越得多，在一定时期内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免遭外敌的入侵和复辟的灾难，都支持了帝国的统治，尤其是法国军队主要由大革命中获得土地的广大农民所组成，他们为保卫革命成果奋勇杀敌，才能取得这样强大的战果。

其次，是由于法国有一支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强大军队。这支军队进行过严格训练，赏罚分明，并打破门第等级观念，大胆从优秀士兵中提拔军官，量才用人，使真正有才干的人担任军队各级领导，使军队士气高涨，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对战役的胜利起了保证作用。

第三，是由于拿破仑的指挥天才。拿破仑提出了一整套适合当时环境的战略战术，诸如一支完备的军队必须由步兵、炮兵和骑兵三个主要兵种组成，军队要有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各兵种要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争取战斗的主动权；要在决定性方向上迅速集中优势兵力，采取突然行动，实行强力猛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要采用攻击战和闪电战的作战方法，运用散兵队形，各个击破，等等，所有这些，比起封建欧洲军队因循守旧的战略战术，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因此，拿破仑的指挥才能，对法军的暂时胜利无疑是起重要作用的。

第三节 帝国的危机与崩溃

一、帝国的危机

[帝国内部充满矛盾]拿破仑帝国的强盛实际上是不稳固的、虚弱的、暂时的，连绵不断的大规模战争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直接动摇了大帝国的根基。

拿破仑用武力征服欧洲许多国家后，虽冲击了被占领国腐朽的封建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更多的是掠夺被占领国的大量财富，强征被奴役国人民充当炮灰，为法国大资产阶级效劳。因此，沉重的赋税、兵役、军费和政治上的压迫，尤其是割地、赔款，严重损害和破坏了被奴役国所有阶级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和广大人民，坚决要求从拿破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必然酿成反拿破仑的民族解放战争。所以，从1808年起，也就是大帝国还在兴旺之时，被压迫民族反对法国占领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高涨起来，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各国的反法运动蓬勃展开，汇成一股摧毁拿破仑帝国的强大洪流。对拿破仑来说，战争越持久，战线越长，兵力就越分散，战斗力就越削弱，大帝国必将分崩离析。

长期的对外战争给国内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和痛苦，促使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基础。战争大量牵制和消耗了法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法国军队由执政府时期的27万人，急增到帝国时期的278万人，其中战死疆场者达180万，15岁以上70岁以下的男子在农村已不多见。公债增加到46亿法郎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大大减少，从1806年45600万法郎，下降到1811年的32200万法郎。原料不足，市场缩小，引起了1811年的经济危机，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大批失业，仅巴黎就有10万2806名工人失业，占当时巴黎人口的1/6，有的城市中工人失业者占75%。普遍恢复税收，1804年开征酒税、1806年和1810年分别征收盐税和烟草税，这些间接税恢复后，税额大大增加，从1804年的16000万法郎增加到1814年的34200万法郎。广大工人、农民深受战祸之害，人民开始逃避兵役和从军队里开小差，据统计1810年共有16万人开小差。拿破仑派宪兵和别动队到处追捕逃兵，不仅其父母要受到罚款，其家庭也要受到驻兵监管。这就引起了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对拿破仑政权的严重不满和反抗，从而使人民群众与拿破仑统治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时是帝国忠实而可靠的支柱，可是在帝国末期，因股票行情下跌，利率大大降低，其经济利益不断受到侵害，对拿破仑的统治政策表示严重不满。拿破仑的统治基础完全动摇，他对本国的后方基地已严重失控，内外交困，矛盾重重，必然导致帝国的崩溃。

[与旧制度的妥协]拿破仑在后期采取了与封建王朝的妥协政策，这不仅为其自身的失败，而且也为封建王朝的复辟铺平了道路。拿破仑曾经这样说过，他要“成为旧与新之间的联盟的拱门，成为旧秩序和新秩序之间的天然居间人”。为此，他逐步使革命前享有特权的贵族和教士重新进入政府，其中贵族任郡守的人数不断增加，1800年为23人，占23%，1804年为35人，上升到43%。他自己更是向封建帝王看齐，把自己降低到封建帝王的水平。称帝后，大搞家天下的“分封制”，将自己的三个兄弟、姊夫、继子，连刚出生的儿子都封为国王和副国王。而且还在1808年3月发布法令，正式建立

帝国的贵族等级制度，直至 1814 年，拿破仑下诏册封了 3600 个贵族爵位，其中 1600 个骑士，1090 个男爵，388 个伯爵。还有 30 个公爵和 4 个亲王。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些帝国新贵族的成员中，旧贵族的比例达 22.5%，几乎占 1/4。这些享有贵族称号的文武高级官员，除享受高薪之外，还有巨额年赏和封地。一般公爵的年金为 20 万法郎，其中内伊元帅得 80 万法郎，马塞纳元帅则高达 120 万法郎。一小撮新的权贵们，过起奢侈豪华的宫廷生活，逐渐腐化堕落。

拿破仑本人更是向旧王朝靠拢，1810 年 8 月娶奥国公主玛丽亚·路易莎为妻，不惜与封建王朝联姻。皇宫中的穷奢极欲，比之波旁王朝和一切封建君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拿破仑到了统治后期，完全走上了与封建反动势力妥协、合污的道路，这种新与旧的融合和新的贵族特权等级的出现，明显地违背了大革命的政治原则，腐蚀了帝国的政治基础，起到了最终摧毁大革命成果的作用，促进了帝国危机的加深。

在后期，权力机构日渐腐败，机制运转严重失灵，官僚机构办事效率低下，官吏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到处可见。尤其是拿破仑为对付因大陆封锁政策而引起的物价飞涨，采取了对某些原料和商品发放特许证的办法，允许其进口。结果许多官吏乘机高价私售特许证从中大发其财。一些商人为取得特许证，则不惜向财政部出高价，向各级官员送礼受贿，官吏的种种腐败现象显然也加速了帝国的崩溃。

二、帝国的崩溃

[1812年的侵俄战争]加速帝国崩溃的重要因素是1812年侵俄战争的失败。拿破仑野心勃勃，他在提尔西特和约签订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世界霸权上。为了统治欧洲，进而称霸世界，他决心先打败俄国，然后压倒英国，成为世界霸主。

拿破仑全力投入对俄作战的准备，调集了70万人组成远征大军，其中多数是附庸国的军队，共有20多个不同国籍的人参加了远征队伍，法国人只占1/3，德意志人占很大部分，还有波兰人，意大利人，荷兰人和瑞士人等。1812年6月24日拿破仑亲自统帅61万大军渡过涅曼河，对俄国不宣而战。在法国大军压境的形势下，俄军全线退却，拿破仑军队乘势直入，沿途不断胜利。8月17日，法俄两军在通往莫斯科的要地斯摩棱斯克进行总决战，激烈的战斗持续了2天，俄军烧毁该城后撤离，法军只占领了一座空城。9月7日，库图佐夫指挥的俄军退至离莫斯科不远的博罗迪诺，双方进行艰苦的交战，法军伤亡高级将领49名和官兵5.8万人，俄军伤亡4.4万人。这次会战法军虽然取得了胜利，却极大地挫伤了军队的士气。

俄军为保存实力，继续采用退却战术。9月14日，法军进入莫斯科时，留给拿破仑的是一座烈火熊熊的空城。拿破仑的副官伤感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写道：“我们在火的大地上，火的天空下，行军在两堵火墙之间”。俄军放弃莫斯科后，不再后撤，而是改组军队，准备反攻。拿破仑实际上已被围困在莫斯科，他自知中计，为挽救败局，曾先后三次向沙皇求和，均遭沙皇拒绝。结果拿破仑在莫斯科白白呆了四周，徒劳无益的求和谈判，延误了时机。10月19日，拿破仑终于决定战略撤退。但是，这一年寒冬早临，大军在-35的冰天雪地里行走，加上粮草困难，饥寒交迫，沿途又遭到俄国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夹击，处境十分狼狈。一路上，法军连连败北。拿破仑从莫斯科出发时，尚有10万主力军，到11月中旬，能够战斗的只有3.6万人了。此时，拿破仑确认自己失败无疑，又接到关于巴黎政局不稳的报告，他立即将军队交给缪拉指挥，只身跑回巴黎。到12月中旬，法军主力只有3万余人渡过涅曼河回国。法军侵俄以惨败告终。

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深刻的政治和军事原因的。这次法俄大战虽然双方蓄谋已久，但是，战争毕竟是拿破仑发动的，而且是拿破仑出其不意地破坏和约强加在沙俄头上的，拿破仑无疑是侵略者，俄国是被侵略的，俄国人民被迫应战，打击入侵者，显然是正义的防御战。我们不能以法国的社会制度比俄国先进为理由，而否认法国发动战争的侵略性质。

拿破仑侵俄战争的失败，使法兰西帝国大伤元气，成为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但是拿破仑官兵在侵俄战争中的种种活动，也给沉睡的俄罗斯大地注进了新的血液，法国士兵手中的三色旗敲开了俄罗斯这个野蛮帝国的大门，播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俄国人的心灵。

[莱比锡战役、皇帝第一次退位]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失败，极大地鼓舞了被奴役国人民的反法民族解放斗争，这就注定了拿破仑帝国覆灭的命运。1813年2月28日，俄普结盟。3月，俄、英、普、瑞典、西、葡等国组成了第六次反法联盟（8月，奥地利也加入），向法军展开了猛攻，拿破仑退回巴黎后，迅速筹组新的军队，准备迎战。10月16—19日，16万法军与32万联军

在柏林西南的莱比锡决战。史称“民族之战”。此时，不仅力量对比悬殊，而且法军士气低落，终于失败。接着，70万反法联军分道进攻法国。拿破仑重整军队，组成了8.5万人的主力部队，并计划各个击破在数量上占优势的联军。拿破仑成为法兰西战役的直接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身先士卒，声东击西，集中优势兵力，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仍然不断打败了普军、俄军和奥军。反法联军在失败面前，被迫改变策略，竭力避免与拿破仑正面交战，而是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各路联军直接插向巴黎，1814年3月31日，沙皇为首的联军终于攻入巴黎。4月1日，卖身变节的前外交部长塔列朗组成法国临时政府。4月3日，法国元老院和立法院联名宣布拿破仑退位。4月6日，拿破仑被迫同意退位。4月11日，发表退位诏，“宣布放弃法国帝位和意大利王位，为了法国的利益，他准备作出任何牺牲，甚至他的生命”。并与普、奥、俄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正式退位。但退位后终身保留皇帝称号，每年领取250万法郎年金，并拥有厄尔巴岛的主权。4月20日，拿破仑对皇家近卫军发表了告别讲话。4月28日登上英国军舰，5月4日到达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名为皇帝，实为囚徒。拿破仑帝国就这样被反法联军所推翻，波旁王朝复辟。

三、东山再起——百日政权

[百日统治]波旁王朝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满腔仇恨，也构起了对拿破仑的怀念之情。军队首先提出问题：“拿破仑在哪里？他什么时候出现？”1815年2月26日，拿破仑利用人民对复辟王朝的仇恨心理，带领1000人，从岛上逃出，渡过大海，于3月1日，在法国儒昂港登陆，在军队里发表演说，号召士兵们戴起三色帽徽，为法兰西祖国跟随他前进。在向巴黎挺进的征途上得到了士兵和工人、农民的广泛支持，他在“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中飞速进军，在里昂，数万人汇聚在他下榻的寓所窗外，欢呼声从未间断，表示出对这位东山再起的伟人之忠诚和敬意。3月20日重返巴黎，拿破仑在大批军官和公民的簇拥下进了杜伊勒里宫，路易十八仓惶出逃，拿破仑重登王位，重新统治法国近100天，史称“百日王朝”。

拿破仑在不到3个星期的短时间内，不开一枪、不伤一人，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整个法兰西，重新成为法国皇帝，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奇迹。在百日统治期间，拿破仑首先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措施，以安定人心，稳定自己的统治。4月4日，拿破仑向欧洲各国君主致函，强调实现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主权，决心用和平代替对抗。无条件地尊重欧洲各国的民族独立。4月10日，拿破仑修订宪法。22日公布《宪法补充条款》，恢复了普选权和各级选民团，赋予人民以更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他还一再声称，保障农民的利益，重申革命时期和帝国时期确立的所有制不受侵犯。并且实行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以赢得社会的广泛支持。接着，拿破仑重新组成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政府领导机构，运用政权的力量镇压各种敌对势力，维护社会秩序。为对付国际反动势力，拿破仑迅速重建军队，号召现役的和退役的军人全部归队，把新兵与退役军人混合编队，短期内组成了一支拥用28.4万人的帝国正规大军，随时整装待发。拿破仑再次出现在欧洲政治舞台上。

[滑铁卢之战]重新创造的奇迹引起了欧洲君王的恐惧与仇视。正在维也纳举行分赃会议的各国君主，为对付重登皇位的拿破仑，匆忙拼凑了第七次反法联盟，动员了上百万军队围攻法国，拿破仑组织了50万军队迎战。1815年6月18日，在比利时的滑铁卢镇（布鲁塞尔以南20公里）展开决战，双方损失惨重，法军损失4万，英军损失1.5万，普军为7000。拿破仑一生中的最后一仗以失败而告终。6月22日，拿破仑再次退位，不久被流放到远离法国的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法兰西第一帝国最终覆灭。1821年5月5日，拿破仑逝世，终年52岁。1840年，拿破仑遗骸运回巴黎安葬。

四、拿破仑的历史地位

[拿破仑传说]拿破仑退出政治舞台后，就在圣赫勒拿岛上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开始了对自己生涯的回忆和口述，从而奠定了拿破仑传说的基础。所以我们通常认为的拿破仑传说，实际上就是从拿破仑对自己一生活动所作出的解释开始的。他在口述中回避了一切会损害自己光辉形象的东西，使自己成了 1789 年原则的捍卫者，自由思想的拥护者；他只是由于不得已才成为独裁者；他渴望和平，只是由于在欧洲不断出现反法联盟才被迫不断进行战争。战争对他来说，完全是被迫的，他违反自己的意愿成了征服者。他始终是自然边界的捍卫者和民族原则的拥护者。

环绕拿破仑的这些口述，从圣赫勒拿岛传出了各种记述。它充实和丰富了拿破仑传说，强调拿破仑是“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效忠的人”，他的功绩是永远不会被人抹去的。拿破仑的口述或回忆录，常常用手抄本的形式，在法国广为流传。

拿破仑死后，在岛上陪伴过他的军官，侍从和医师，也陆续出版了各种记述和回忆录，对拿破仑其人其事大加颂扬。有的回忆录甚至被译成德文、英文、丹麦文、西班牙文、荷兰文等各种文字，这些记述和回忆录的作者用最动听的言辞赞美他，崇敬他，膜拜他。他们认定，凡是拿破仑口述的，都是绝对正确的。从而使拿破仑传说再度加温。

除来自圣赫勒拿岛的“传说”外，那些曾经随同拿破仑南征北战的将领们，为了记述他们所经历过的难忘生涯和所分享过去的光荣，也都用手稿和回忆录的形式，为拿破仑传说添砖加瓦，使得拿破仑的形象显得更加高大和可敬。一大批诗人、文学家、戏剧家，从雨果、司汤达、贝朗瑞到海涅和歌德等等，也运用诗歌、小说和戏剧，竭力赞颂拿破仑，从而给拿破仑传说以新的推动。所以，长期以来，拿破仑的名字成为秩序、民族和光荣的象征，使拿破仑传说不断推向高潮。

总之，随着拿破仑传说的兴起和发展，拿破仑的形象逐渐偏离了历史的真实，甚至达到神化的地步，驱使后人低头崇拜。拿破仑的种种传说，在历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曾被拿破仑三世所利用。但是传说毕竟不等于历史，相反，却严重歪曲了历史，显然不能以传说作为依据对拿破仑进行评价。

[评拿破仑]拿破仑逝世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史学家、军事学家和文学家频繁研究和评述的对象，随着每个人认识的深化和原始资料的新发现，对拿破仑的研究始终成为人们感兴趣的课题。世界各国出版的有关拿破仑的著作，论文和资料估计在 10 万种以上，至少有 9 个国家拍摄过拿破仑的电影达 70 多部。有人称他是“继亚历山大、恺撒以后最伟大的人物”、“世纪的巨人”、“法国革命的体现者”、“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之一”。也有人骂他为“匪徒”、“暴君”、“篡位者”、“法国革命的扼杀者”。两派观点各据一端，无法调和。近年来，全盘歌颂或彻底否定拿破仑其人其事的著述虽不多见，但分歧仍然严重地存在着。

在我国，学术界对拿破仑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对拿破仑的历史作用有基本肯定的，也有基本否定的，至今仍无定论，但比较多的学者肯定了拿破仑的历史进步作用。

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评述拿破仑的历史功过呢？我们认为对这样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采取脸谱化，简单化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决不能在诟骂和

颂扬或者在肯定和否定两种看法之间作出简单的选择，而必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拿破仑有过大量论评，有赞扬也有揭露，这些论述至今仍然值得我们认真阅读，正确理解。我们认为，拿破仑作为法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性人物，他的内外政策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一生活活动无不具有资产阶级明显的两面性。基于他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他所处的时代特征。一方面，能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站在先进势力一边，打击国内外保王势力的反扑，确立了大革命所揭橥的资产阶级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原则，为稳定和巩固大革命的成果做了很多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又仇视并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和工农革命运动，扼杀了大革命的民主成果，具有很大的保守性和反动性。他一方面打败了欧洲封建君主势力的多次武装干涉，维护了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并且在客观上起了欧洲封建制度掘墓人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野心勃勃，发动一连串战争，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侵略，争夺世界霸权，给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以深重的灾难。越是到帝国后期，拿破仑侵略争霸的大资产阶级反动本性越暴露得充分。在后期他在无限权力面前，完全丧失理智，变得十分狂乱，任意运用手中的无限权力，进行无休止的战争，以实现他称霸世界的野心。使一个大国听任一个人的权力去摆布，结果给法兰西人民带来了灾难，至少有 180 万人死于战争，而拿破仑自己也从无限权力的顶峰上跌落下来，成为大西洋孤岛上的囚徒，从而毁灭了自己。一个玩弄无限权力的人，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落得可耻的下场。如果说，拿破仑在帝国的前期运用他的权力，为社会发展做过一些好事，那么他在后期，却运用同样的权力干了许多坏事，终于暴露出他的野心家、侵略者的真面目，成了法兰西民族的罪人。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拿破仑的历史进步作用，应该承认拿破仑为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而作出的努力和为此而建立的业绩毕竟是其一生中的主流，起过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拿破仑不愧是法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拿破仑代表了一种制度，反映了一个时代，正如法国著名史家索布尔所指出的：拿破仑实现了两个方面的稳定，一个是政治体制——国家机器的稳定。拿破仑给法国提供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近代国家体制；另一个是社会的稳定。拿破仑排除了左、右两方面的冲击和挑战，使资产阶级牢牢占有社会的支配地位。所以，拿破仑时期是大革命的稳定和巩固时期，实际上是大革命的最后阶段。拿破仑对法国资产阶级的贡献无疑是应予肯定的。

第七章 波旁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

第一节 波旁复辟王朝

一、复辟王朝的建立

[波旁王朝复辟]在第一帝国刚刚呈现出崩溃的迹象时，有人就开始设计法国的前景。流亡国外的前国王路易十六之弟普罗旺斯伯爵，当 1795 年路易十七死后，即自封为路易十八。这位肥胖、懒散、未老先衰的流亡国王，念念不忘复辟波旁王朝。路易十六的另一个弟弟阿图瓦伯爵则致力于在法国本土发动保王派运动。

1814 年 3 月 12 日，保王派密谋团体“信仰骑士团”在波尔多发起示威游行。接着法国不少地方也出现保王派的活动，为波旁王朝上台作准备。3 月 31 日，盟军进入巴黎后，塔列朗即向沙皇提议：“为了长治久安，必须遵循一项原则，这原则就是承认路易十八，他是法国的正统国王。”他表示愿意说服帝国元老院。不久，盟军贴出布告，宣布“他们将尊重旧法国的完整性，就如法国在它过去正统国王统治时那样……他们将承认法兰西民族所定之宪法。因此，他们邀请元老院立刻指定一个临时政府，以便适应行政的需要和准备一部适合于法国人民的宪法。”

4 月 1 日，元老院指定塔列朗为首的 5 人为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和波旁家族成员的代表进行了接触。4 月 6 日，元老院通过新宪法，新宪法第一款和第二款宣布法国政府为世袭君主制，法国人民要求波旁家族成员担任国王。5 月 3 日，路易十八进入巴黎，波旁王朝复辟。

[1814 年宪章]路易十八知道在他流亡的 20 多年里，法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完全恢复旧制度是困难的，为此，他决定和新体制、新阶级实行妥协。在进入巴黎的前一天，他发布了《圣旺宣言》，允诺在法国实行议会制。进入巴黎后，他组织了由部分临时政府成员和旧贵族混合组成的内阁。塔列朗作为波旁王朝的外交大臣和其他欧洲大国进行谈判，于 5 月 30 日签订了巴黎协定，法国保住了 1792 年的疆界，不付任何战争赔款，也不受外国军事占领，并作为平等的大国出席维也纳会议。

经过必要的准备以后，路易十八于 6 月 4 日颁布了新的宪法。宪法取名为《宪章》，史称《1814 年宪章》。《宪章》共分 7 部分，74 项条款。它最显著的特点是旧制度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妥协。一方面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让步，另一方面又反映出正统意识以及恢复旧制度的倾向。

《宪章》在一般原则和人的权利上，一面承认自由、平等的原则，规定财产权不可侵犯（包括国有财产），以确认大革命所造成的财产权变动。还规定：“禁止对直至复辟为止的选票和观点进行任何追查。”《宪章》维持前政府授予的军衔、荣誉和津贴，保留荣誉军团，承认国家的公债和其他债券等。另一面，《宪章》又宣扬君权神授，提出一切权力归于国王。宣布出版自由，又规定不可滥用这种自由权利，为以后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定下基调。承认信仰自由，又规定天主教为国教。

在政体上，它推行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形式类似英国，但比英国更为保守。国王是至高无上的，拥有行政权，不对任何人负责，并统率全国武装力

量，有宣战、媾和、缔约之权，任命所有行政官吏，有权颁布涉及法律执行和国家安全的法令，还可参与立法，有权解散议会。议会分两院：贵族院和众议院。贵族院成员由国王指定，终身或世袭。众议院成员由选举产生，任期5年。两院的基本作用是通过法律，特别是国家预算，但没有修正法律之权。对于众议院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有严格的年龄和财产限制。年满30岁的男子，每年纳直接税300法郎以上者才有选举权；年满40岁，每年纳直接税1000法郎以上者才有被选举权，当时法国有此资格的分别为9.5万人和1.6万人。所以只有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才能参政。政府部长对国王负责，他们可以成为议会成员。议会对部长有监督控制手段，一旦部长犯法，众议院可以对他们起诉，然后移交贵族院审判。

在司法制度上，《宪章》基本保留了第一帝国时的原状。它确定了司法权的独立，法官为终身制，通过取消特别法庭、公布法庭辩论、设立陪审团的规定防止滥用司法权。还规定：“民法典以及与本《宪章》不相违背的现存法律依然有效”，从而保留了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法律成果。

虽然《1814年宪章》建立了较为保守的政治制度，对选举又有高额财产要求，对自由权利有种种限制，但它保留了议会制形式，维持了大革命和帝国带来的一些变化，所以在复辟王朝时期《宪章》成为资产阶级自由派用以反对极端君主派的一面旗帜。

[第二次复辟]当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人们对波旁王朝能否在法国第二次复辟提出了疑问，因为拿破仑奇迹般进入巴黎，至少说明路易十八的政权并不得人心。欧洲一些大国开始重新审度法国的形势，沙皇甚至提出要扶植奥尔良公爵登上王位。但是，当时主宰巴黎的威灵顿却明显倾向于波旁王朝。

在国外，路易十八获悉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就迫不及待地踏上归国的征途，想以既成事实使盟军放弃扶植奥尔良公爵的念头。6月28日，国王在坎布雷发表宣言，承诺尊重《宪章》的原则，宽恕“走入迷途的法国人。”7月8日，路易十八进入盟军占领下的巴黎，第二次复辟实现。

二、反动和倒退

[新内阁和盟军的占领]国王到达巴黎后的第二天，即7月9日，组成了新内阁。新内阁和前内阁的区别是这届内阁真正具有政府的职能，设立了首相负责领导内阁，不再有王室成员充任内阁部长。政府首脑是塔列朗，兼任外交大臣，富歇任警务大臣，古维翁·圣西尔元帅任陆军大臣，路易男爵任财政大臣，帕斯基耶任司法和内政大臣，若古尔任海军大臣，这些人都是旧日革命时期和第一帝国时期的名人。

新内阁上台首先就面临法国遭受盟军入侵占领的局面。滑铁卢的胜利和国王重新上台并没有使欧洲各国的进军停止下来。不久，他们就部分或全部占领了法国61个郡，外国军队遍及法国领土。当时在法国国内驻有普鲁士军队31万人，奥地利32万人，英国和荷兰12.6万人，俄国25万人，巴伐利亚6万人，还有巴登、符登堡、撒丁、西班牙、瑞士等国的军队，总数约120万。他们是国王根据3月25日条约请来镇压“篡权者”的客人，但他们却在法国国土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甚至干涉地方行政、虐待官吏，绑架郡守。占领军还采取暴力从卢浮宫掳去不少名画和雕塑。对此，法国政府只好忍气吞声。

[白色恐怖]随着波旁王朝卷土重来，保王派分子对大革命和帝国同情者大肆反攻倒算，白色恐怖的阴影笼罩法国。

“白色恐怖”最初是由贵族以及保王派的秘密社团发起的，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法国南部。早在拿破仑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刚刚传出，保王派就举起复仇宝剑。6月25日，狂热的保王分子在马赛大肆杀戮雅各宾党人和拿破仑军队的官兵。不久布吕纳元帅在阿维农被保王派枪杀，暴尸街头后，投入罗纳河。在一些支持过“百日”的地区和城市，保王分子烧毁房屋，洗劫财物，杀戮男子，蹂躏女人，在里昂市，大批工人被迫逃亡，一度使车间3/4的机器停止运转。在尼姆，连信仰新教的市民也遭毒打，财产被洗劫，有37人遭杀害，更多的人被关押，2500人出逃。

在保王派反攻倒算的同时，波旁王朝利用国家政权有步骤地通过法律手段对进步人士实行镇压，有人称之为“合法的白色恐怖”。

路易十八违背自己赦免“步入迷途的法国人”的诺言，在他的授意下，富歇开列了一大批不能赦免的人员名单，递交内阁。塔列朗阅后讥讽道：富歇“在他的名单上没有遗忘他的任何朋友。”内阁最后确定了57人的惩办名单，其中军官19人将移交军事法庭，其余被软禁在巴黎城外，等待议会的处理。许多拿破仑的高级将领被处决，年轻的拉贝德瓦埃上校因为在“百日”期间第一个投奔拿破仑被枪决，著名的内依元帅，因听信部下投向拿破仑，亦遭逮捕而处死。

而后，议会通过一系列法律，用于镇压反对波旁王朝的人。其中重要的有四项：10月29日通过一般安全法，允许政府不经起诉即可任意逮捕一切侵害国王权力和国家安全的人；11月9日通过关于惩治煽动性言论和作品的法律，对呼喊“煽动性”口号者即处以监禁和罚款，严重者流放；12月7日通过重罪法庭法，设立重罪法庭审判政治犯，剥夺被告上诉权，不设陪审团；1816年1月12日通过赦免法，被软禁在巴黎城外的犯人遭流放。根据这些法律，法国出现了镇压高潮，根据不完全统计，判决的政治案件总数达5000件。

国王还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清洗，约 5 万至 8 万官吏被更换，占整个行政官吏的 1/4 ~ 1/3。

[无双议会和第二次巴黎协定]国王在第二次复辟后，马上着手整顿两院，重新召集议会。他下令调整贵族院，7 月 24 日，免去 29 名在“百日”中参加上院的贵族院议员，8 月 17 日，增补 94 名新成员，使贵族院人数超过 200 人，并宣布贵族院成员为世袭。

对于众议院的选举，国王通过法令规定了选举方式，选举分两级进行，先由选区选民团按照各郡分配的议员数，选出各郡议员的候选人，然后由郡选民团从这些候选人中选出议员。法令还对《1814 年宪章》作了两项重要修改，选民的年龄从 30 岁放宽到 21 岁，被选举人的年龄从 40 岁放宽到 25 岁；众议院成员从 262 人增至 402 人。

1815 年 8 月 14 日和 22 日进行了两级选举。选举的结果在 402 个议席中保王派获得 350 席，占绝对优势，路易十八欣喜地狂叫：“如此议会，举世无双”，于是，此众议院就有了“无双议会”的别称。其实，无双议会并不是象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几乎是由旧贵族和流亡者组成的。根据统计，旧贵族在众议员中占 35%，而资产阶级占 45%。其余的为新贵族或身份不清的人。至于逃亡贵族，在出席会议的 381 个议员中只占 90 人，其中 1/3 还曾在帝国中任官职，跟随国王回国的只有 18 人，议院里没有神职人员。议员中许多是地方显贵，其中有市长 42 人，省参议员 53 人。在资产阶级中，占优势的是法官和律师，有 91 人，而商人和工厂主只有 25 人。议员中的成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复辟王朝的阶级基础。

第一批当选的议员到达巴黎后，他们以不允许弑君者再坐在内阁的板凳上为由，迫使富歇辞职，接受了出任驻德累斯顿的公使。塔列朗见状也准备找机会下台。9 月 20 日，反法联盟国将一份使法国受辱的协定草案交给法国政府时，塔列朗于次日立即响亮地表示拒绝，使他在公众舆论前获得了祖国牺牲者的印象，22 日，他向国王提交了辞呈。国王接着组织了以黎世留公爵为首的内阁。

1815 年 11 月 20 日，黎世留政府与反法联盟国签署了第二个巴黎协定。这个协定比第一个巴黎协定要苛刻得多。法国的领土缩回到 1790 年 1 月 1 日的边界。15 万外国联军占领法国东部和北部边境地区 3 年至 5 年。占领费用（每年 1.5 亿）由法国负担。此外，法国向反法联盟国赔款 7 亿法郎。最后，法国政府答应归还前政府向各国个人举贷的债款。

三、复辟王朝时期的政治斗争

、[“无双议会”中的政治斗争]1815年10月7日，无双议会开幕。议会中的多数派逐渐形成党派，人们称之为“极端君主派”，这是复辟王朝最早出现的党派。他们反对妥协，要求彻底恢复大革命以前的旧制度，严厉惩处大革命和帝国的同情者，并要求恢复教会的特权，把没收的教会土地归还给教会。这派的首领是阿图瓦伯爵。在众议院中的领袖是维莱尔伯爵和科比埃。在贵族院中的代表有夏多布里昂和波里尼雅克。他们以《法国报》、《日报》、《辩论报》以及后来发行的《白旗报》和《保守派》为喉舌，并通过一些原来保王派的秘密团体网（如“信仰骑士团”）来协调指挥。

议会中反对极端君主派的人则以内阁为掩护，与之抗衡。这届内阁比前内阁更为保守和右倾，但内阁成员的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反对极端君主派的极端政策。内阁中该派的主角是黎世留和德卡兹。

黎世留是著名的黎世留红衣主教的后裔，在大革命中，他失去巨大产业，逃亡国外后，投奔沙皇，为沙皇经营敖德萨，深得沙皇赏识。他敌视革命，反对拿破仑，害怕自由思想的蔓延，但在策略上却和极端君主派持不同观点，表现得较为温和。担任警务大臣的德卡兹是国王的宠臣，国王视他如养子，因此他具有一定的影响。原先德卡兹也属于极端君主派，但过份的白色恐怖使他马上感到这种过激行为将损害波旁王朝本身，所以他转而反对极端君主派的政策，甚至表现得比黎世留更为坚决。

议会开幕后，议会和内阁在以下三方面发生了冲突：

(1)镇压还是宽容大革命的参加者和帝国的同情者。议会坚决要求扩大镇压范围，并采用死刑，而内阁则主张实行宽容，要有所限制。

(2)放宽还是限制选民资格。在此问题上，出现奇怪的错位现象，作为保守的极端君主派主张加强议会作用，扩大选举权，降低选举年龄和财产限制，即鼓吹议会制度。而作为思想较自由的内阁，则要求恢复《宪章》规定的选举年龄和财产限制，并在提出的新选举法草案中，要求每年更换议会的1/5，以此来使议会的稳定性受到影响。这种错位现象是极端君主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这一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他们想更有效地利用自己占据的议会阵地，以扩大选举权来笼络人心，削弱内阁的影响。

(3)对待财政预算，主要冲突是怎样还清第一帝国和百日政权留下的债务上，内阁提出发行以国有森林为抵押的债券来还债，而议会多数竭力反对，他们认为国有森林许多原是属于教会的，理应还给教会，他们还抗议，国家本不该偿付造反者所欠下的债。

议会例会于1816年4月29日结束，内阁感到再也无法和这届议会共处。因此，德卡兹加紧活动，说服黎世留和国王解散议会。欧洲大国对极端君主派在债务问题上的态度表示不安，向国王施加压力。1816年9月5日，路易十八签署法令，宣布解散议会。这届曾受到国王赞美的议会，一年以后即被国王判处了死刑。

[立宪派和独立派的产生与发展]1816年10月举行了新议会的选举，和前一次选举采用同样的选举方式，参加选举的是同样的选民团，但政府通过各地郡守施加压力，产生了截然不同的选举结果，当选的238名议员，极端君主派只保留了92席，其余146席为政府的支持者获得。

新的议会多数组成了新的政治派别，人们称之为“立宪派”。立宪派没

有明确的纲领，只是一批反对极端君主派，支持政府的人，其中还可分左右两翼。右翼以内阁中黎世留和内政大臣莱内为代表，他们并不厌恶极端君主派的理论观点，而只是不喜欢其手段方法；左翼以德卡兹和陆军大臣古维翁·圣西尔为代表，主张建立以《宪章》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反对极端君主派的过激主张。一批知识分子成为立宪派的思想指导者，他们被称为“空谈派”，其中主要人物有罗瓦耶—科拉尔、基佐、塞尔伯爵、布洛伊公爵。他们的喉舌是一份杂志《哲学、政治和文学档案》。从1816年10月到1820年，政府建立在这一议会多数派的基础上。

政府右翼反对派极端君主派遭到暂时失败，而此时一个来自左翼的新反对派脱颖而出，逐步得到发展。在1817年选举以后，议会中产生了称为“独立派”的政府反对派。在“独立派”这面旗帜下聚集了所有波旁王朝的反对者，其主体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也包括一些波拿巴派和奥尔良派。他们在纲领上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色彩，这派主要成员的学说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愿望，主张主权在民，要求更多的自由权利，仇恨教会势力。其中的拿破仑派还主张对1815年的协定进行复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该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本扎曼·孔斯坦，拉法耶特，拉菲特和佩里叶。由于这派的出版物常常受到书报检查的刁难，所以它的杂志和报纸经常更换名字，时间最长久的是用《立宪报》和《商业报》这两个报名。

独立派从1817年起在每一次更新选举中都得到发展。1818年10月，他们又获得约20个席位。1819年，在55个更新席位中，他们获得35席，而极端君主派只获5席，立宪派获15席。

正是这样的气氛下，立宪派政府采取了温和的和带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色彩的政策，1818年通过兵役法，挫败了极端君主派建立一支职业军队的设想，1819年通过关于出版自由的三个法律。法国面临的困难也得到一定的缓解，1818年，外国军队撤出占领区，法国财政也出现了预算平衡。

[极端君主派掌权]随着独立派的发展，不仅使极端君主派感到恐惧，也使立宪派感到不安。为了控制局势，德卡兹1819年11月出任首相，并逐渐向极端君主派靠拢。接着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更加速了法国政局向右转。

1820年2月13日晚，马鞍匠鲁维尔在歌剧院用匕首将阿图瓦伯爵的次子、王侄贝里公爵刺死，这一想使波旁王朝断嗣的举动，引起极端君主派的惊慌。他们归罪于自由思想，并认为德卡兹应负有责任，借此发难。德卡兹被迫辞职，黎世留再次组阁。

第二届黎世留内阁是立宪派权力向极端君主派转移的过渡内阁。内阁主要成员还是立宪派，但在极端君主派的压力下，执行的是反动的政策。

新内阁一上台就采取了德卡兹早已准备就绪但还来不及实施的镇压措施：

第一、规定对从事阴谋活动的嫌疑犯可以不经审讯即予逮捕和拘留3个月。

第二、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重新建立报刊检查制度，报刊发行必须经事先批准，并封闭一批具有自由思想的报刊。

第三、1820年6月促使议会通过新的选举法——“双重投票法”。新选举法规定，每郡有两个选民团，由所有选民参加的选区选民团选出258名议员，然后1/4纳税最多的选民组成郡选民团，再选出另外172名议员，因此，这1/4的选民拥有两次投票权利。这是明显有利于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选举

法。

根据新选举法，1820年11月进行选举，极端君主派在新选出的430名议员中占160名，左派80名，政府支持者190名。由于极端君主派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极端君主派的维莱尔和科比埃进入内阁。极端君主派越来越不满足于让黎世留占据首相职位，因此在右派的谴责声中，黎世留于1821年12月辞职，以维莱尔为首的极端君主派内阁建立。

维莱尔内阁建立后，极端君主派促使法国政治进一步走向反动。1822年残酷镇压了法国烧炭党人的起义，1823年镇压西班牙革命，同时加强天主教在国家事务中的作用，让教会管理学校。

[查理十世的反动统治及其危机]1824年9月，路易十八逝世。67岁的王弟阿图瓦伯爵继位，称查理十世。他在位期间，变本加厉推行反动政策。早在1824年6月的议会选举中，极端君主派取得了议会的绝对优势。众议院中3/5是贵族，一半以上是前逃亡贵族，其反动性比无双议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查理十世上台后，国王、首相、议会沆瀣一气，妄图恢复旧贵族的特权和君主专制统治。

1825年4月27日，国王颁布了议会通过的《赔偿亡命者10亿法郎的法令》。国家用10亿法郎赔偿逃亡贵族在大革命中的财产损失，其数目比1790年没收他们土地的收益大19倍，赔偿费以年息3%的公债券付给。

为了维护天主教会的权威，查理十世颁布了《亵渎圣物治罪法》。据此法令，对圣物的亵渎者分为三种情况治罪。亵渎不装任何圣体的圣器，处以终身苦役；亵渎盛有圣餐的圣器，处以死刑；亵渎圣餐本身，以弑父母罪惩处，即在砍头前先砍去右手。

1825年5月29日，查理十世在兰斯大教堂举行盛大仪式，加冕为王。

查理十世的倒行逆施并没有获得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结果，相反地，加剧了阶级对立，加深了政治和经济危机。

在众议院、内阁相继落入极端君主派之手以后，云集着前帝国官吏和前自由派内阁成员的贵族院成了反对波旁王朝的一个掩蔽所。1826年4月，贵族院否决了政府关于部分恢复长子继承权的法案。1827年，政府提出重新建立报刊预先批准制度的法案，送交贵族院时，贵族院组成一个对此法案抱敌对态度的委员会来审议，逼使政府撤回这一法案。同时，反对派通过众议院的补缺选举，在议会中逐渐使自己的力量壮大起来。查理十世为对付反对派于1827年11月颁布敕令，解散众议院，并任命76名新的贵族院成员。

在新议会的选举中，资产阶级顶着政府压力，以基佐为首的秘密社团“自助，天将助你”，揭露了政府把支持自己的人非法列入选民团，而把反对政府的选民排除在外的阴谋。选举结果，政府左翼反对派占了180名，极右翼70名，支持政府的议员180名。维莱尔被迫于1828年1月辞职。然而，1829年8月查理十世还是任命极端君主派分子波里尼雅克为首相，内阁和议会的冲突加剧，政治危机加深。

经济危机接踵而来。复辟王朝前期工业不断发展，但到后期出现了不协调，固定资本膨胀，流动资金不足。法兰西银行为保证储备金，于1825年采取减缩信贷的措施，提高贴现率。巴黎股票市场也出现危机，许多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失业工人增加。

在金融、工业发生危机之时，法国又经历了农业危机。1826年—1829年，作为主食的土豆，产量暴跌。1827年—1830年，谷物又歉收，农产品价

格上涨。

经济危机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恶化。农民遭受天灾以外，受到地租和各种捐税的剥削，生活日益穷困；工人实际工资下降，再加上物价上涨，生计难以维持。

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人民多次起来反抗政府。在农村，市场上常常可见农民起来痛打某些政府官员和磨坊主，诅咒国王和各种苛捐杂税，有人袭击粮食车队。在城市，工人罢工频繁，1821年、1825年、1827年和1828年，法国的白铁业、丝织业、烟草业和印刷业先后发生了工人罢工。资产阶级对波旁王朝的反动统治也日益不满。一些资产阶级居住区常常用点亮节日的灯饰来表示抗议。1827年4月，查理检阅国民自卫军，国民自卫军在高喊“国王万岁”的同时，还高喊：“出版自由万岁！”“《宪章》万岁！”“打倒大臣！”“打倒耶稣会士！”等口号，查理十世一怒之下解散了国民自卫军。资产阶级还利用报刊揭露波旁王朝，著名的有1824年创办的《环球报》和1830年1月由基佐、米涅等人创办的《国民报》。

第二节 七月王朝

一、1830年7月革命

[七月革命直接起因]法国人民对波旁复辟王朝的怨恨终于在1830年7月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这种爆发是复辟王朝长期积怨、危机四伏的必然结果，而查理十世的高压政策起了导火线的作用。

3月18日，议会以221票赞成，通过了一份给国王的《致词》（称为《221人致词》），以人民的名义反对政府。《致词》指出：“陛下政府的观点要永远符合陛下人民的愿望，《宪章》把这作为公众事务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陛下，我们的忠心和忠诚促使我们对您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公开要求政府必须和议会的政治观点相一致。5月16日，国王解散了议会。但新选举产生的议会，反对派从221人增加到274人，仍然占绝对优势。对此局面，查理十世孤注一掷，在7月25日签署了四项敕令，史称《七月敕令》。第一项敕令取消出版自由，任何报刊和20印张以下的出版物都应事先获得批准；第二项敕令宣布新的选举无效，解散新议会；第三项敕令实行新的选举法。众议院只由1/4纳税最多者组成的郡选民团选举，选举资格纳税额计算，规定只计算土地税、动产税等，营业税和门窗税不再计算在内；第四项敕令规定9月6日和13日召集选区和郡的选民团，9月28日两院开会。

查理十世想通过《七月敕令》制服反对派，最终抛弃君主立宪，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效果却适得其反，敕令颁布后立即引起了资产阶级、学生、工人群众的强烈不满，点燃了人民愤怒的火焰。

[七月革命经过]对于国王的敕令，资产阶级只主张用合法手段进行抵制。巴黎的工厂主和商人7月26日这天正巧在市政厅开会，选举商业法庭法官，他们决定第二天停工停业以示抗议。一些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报纸编辑，在这一天聚集到《国民报》编辑部，表示不理睬国王敕令，明天继续出报，并在梯也尔的倡议下，起草了一份抗议书，抗议书以《宪章》的名义，反对政府，不再服从政府的权威，但没有公开把矛头指向查理十世。

首先作出强硬反映的是巴黎的人民。7月26日晚，一些印刷工人和学生结集在交易所和罗亚尔宫周围，高喊反政府口号，并用石块砸碎了财政大臣办公室的玻璃窗。

7月27日，一些工厂、商店停工停业，闲散的工人和学生涌上大街，捣毁带有王室徽章的标志，冲击枪支商店，并开始筑起街垒和前来镇压的国王军队发生冲突。晚上，起义已发展成革命，愤怒的人群砍倒树木，揭起铺路的大石块，设起路障，筑起道道街垒。

7月28日清晨开始，起义范围扩大了，混杂着工人、原国民自卫军战士、学生、旧军人的人群奔向大街，巴黎全城布满了用铺路石块、推倒的马车、家具及砍倒的树木筑成的上千个街垒，起义群众达8万之多，举起三色旗，高呼着“打倒波旁王朝！”“自由万岁！”“共和国万岁！”同马尔蒙元帅率领的国王军队展开激烈的战斗，许多国王部队纷纷倒戈。起义者一度占领了市政厅，还占领了巴黎圣母院，宏亮的教堂钟声不间断地在城市上空回荡。国王军队退守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

7月29日，起义者向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发动攻击。占据旺多姆广场的

国王军队第 5 团和第 53 团倒戈，使驻守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军队大为慌乱，在起义者的进攻下溃散了，马尔蒙召集残部，逃向查理十世居住地圣·克鲁宫。这一天中午刚过，巴黎就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里。塔列朗通过他住所的窗子目睹了国王军队的败退，他掏出怀表，看后说道：“12 时零 5 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历时三天的起义取得了胜利。法国史学家称之为“光荣的三天”，在这“光荣的三天”里，起义者死亡人数达 600—700 人，受伤者约 2000 人，死伤者几乎都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工人，其中有 10 多名学生，但没有一个资产者。

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排除了封建制度复辟的危险，重新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它不仅是法国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七月革命冲击了国际反动势力，推动了欧洲革命运动的发展。

[革命的结果]正当革命人民在浴血奋战时，巴黎的大资产阶级却乘机密谋夺取政权。7 月 27 日下午 3 时，有 30 多名资产阶级议员集中在佩里叶家中，委托基佐起草一份反对国王敕令的抗议书。7 月 28 日，资产阶级议员又集会，从乡下赶来的议员拉菲特和拉法耶特，也参加了集会，但还是主张采用合法途径。28 日晚，根据事态发展，拉菲特提出召奥尔良公爵回来。7 月 29 日，当起义胜利后，为了防止运动朝共和制方向发展，聚集在拉菲特家里的众议员们任命拉法耶特为巴黎国民自卫军总司令，瑞拉尔为正规军总司令，并决定建立由拉菲特、佩里叶、莫东将军、肖纳恩等人组成的市政委员会。

7 月 30 日，巴黎墙上出现了不少匿名宣言，拥护奥尔良公爵执政，同一天，拉菲特派梯也尔去求见奥尔良公爵。此时共和派要求让人民决定国家制度，遭到拉法耶特的拒绝。当晚 11 时 30 分，奥尔良公爵到达罗亚尔宫。

7 月 31 日，奥尔良公爵接受议会正式授予他的头衔“摄政王”。当时查理十世还躲在朗布依埃城堡里，8 月 3 日，巴黎人民组织了一次向朗布依埃的进军，国王仓惶出逃，同时，奥尔良公爵在议会宣布查理十世退位。一个新的王朝诞生，史称“七月王朝”，革命成果为大资产阶级所篡夺。

二、七月王朝的统治

[路易·菲力浦]1830年8月7日，议会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1830年宪章，宣布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力浦为国王，9日，宣誓忠于新宪章，正式登上王位。他是依靠一场革命而获得王冠的，所以有人称他“街垒国王”。

路易·菲力浦生于1773年，是在大革命中放弃贵族头衔、主张处死国王最终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的菲力浦平等的长子，曾参加大革命，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并加入共和国军队，参加过瓦尔米之役，以后流亡国外，他所生活的环境和路易十八、查理十世不同，较少受贵族清规戒律的束缚。1814年随复辟王朝回到法国，深居简出，常在罗亚尔宫接待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派。

菲力浦的穿戴也资产阶级化，穿礼服、戴礼帽、手拿雨伞，即使当上国王后也是如此，象征着一种新制度，就如假发、套裤、佩剑是旧制度的象征一样。在经济上，他象资产者那样精于理财，仔细阅读英国的《泰晤士报》，对英国的经济情报了如指掌。他也时常考虑怎样增加自己的财富，为子女们造福，一当上国王，就破坏了王家传统，把自己原有的财产转移给他的子女们，而不归入王家领地。

然而，这位资产阶级的国王毕竟是国王，在骨子里决不甘心让国王成为虚职，每时每刻都在考虑加强个人权力。他极其欣赏基佐说过的一句话：“王位不是一把空椅子。”因此，当他觉得统治逐渐稳固后，就撕下假面具，把制度引向专制的道路，最终走向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政治体制]七月王朝和波旁复辟王朝同是君主立宪政体，所不同的是波旁复辟王朝的国王有着较大的行动自由和更大的专制权力，他们常常随心所欲，解散议会，任免首相和大臣，颁布敕令，而路易·菲力浦则不敢明目张胆和议会对抗，使政治体制具有二元制的特征，即有两个权力中心：国王和议会。

如果把两个宪章从字面上作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对国王权力的规定差别不大。1830年宪章删去了1814年宪章的序言，因为原序言强烈表示复辟王朝和旧制度的联系，而且使人感到宪章是国王对臣民好心的赐予。关于国王的权限，新宪章几乎未加改动，唯一的更改是关于国王颁布敕令的规定，新宪章增加了两项条件，即不能废止法律和不能中止对法律的执行。但在实践上，七月王朝的国王和以前国王却有很大区别，议会称路易·菲力浦为“法国人的国王”以取代“法国的国王”。并用“公民”取代“臣民”。在8月9日，国王向宪章的誓词中明确表示要遵守宪章，要运用法律和依据法律来实行统治。正式承认君主立宪政体。在权力的使用上，路易·菲力浦也懂得，一旦内阁失去议会多数的支持，必须下台，对此他不敢和议会对抗，但他也并非无所作为，曾使某些内阁尚未失去议会信任就把它打发了。总之，国王的权力比起复辟王朝来有所削弱。

贵族院的变化较大。在七月王朝时期，贵族院遭到清洗，一切不愿效忠新制度的贵族院成员都被驱逐出贵族院。根据1831年12月的法律，废除了贵族院成员的世袭制。贵族院的立法地位提高了，它和国王、众议院共享立法创制权。

众议院的变化主要发生在选举上。根据1831年4月的选举法，选民范围扩大了，但很有限。选举人的纳税额从300法郎降为200法郎，被选举人的

纳税额从 1000 法郎降为 500 法郎。选民人数从原来的 9.5 万人增至 16.3 万人。这样，城市中等资产阶级获得了参预国事的机会，另外，众议院也获得了选举议长的权力。

新制度用三色旗作为国旗，而且在王家盾形纹章和国家印章中取消了百合花的图案，表示和旧制度决裂。

七月王朝君主立宪制的建立体现了大资产阶级的政治意志，但是较大的君主权力和选举资格的限制也反映出这一政治体制的保守性，它是大资产阶级既害怕人民革命，又担心封建势力复辟的产物。

[阶级基础]七月王朝是建立在什么样的阶级基础之上呢？从权力机构的成员构成中可以看到这点。

选民是有权参预国事的法国人，选民的资格是根据纳税额确定的，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等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一般土地税比营业税又征收得重一些，所以土地所有者更易获得选民资格。选民的 80%是土地所有者，15%是从事工商业的资产者。

议员的成份和选民的成份略有不同。根据 1840 年议会的统计，土地所有者占 30%，行政官吏约占 40%，其余 30%为从事工商业、金融业的资产者和自由职业者。

贵族院向大资产阶级敞开了大门。根据 1831 年 12 月 29 日法律，国王可以挑选下列人员为贵族院成员：大臣、在众议院有六年资历的众议员、将军、高级行政官吏、大资产阶级（包括土地所有者、工厂主、商人）。而大资产阶级在复辟王朝时期是无权进入贵族院的。但在贵族院中，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大资产阶级并不多，主要的是高级行政官吏。据 1848 年统计，贵族院 311 名议员中 220 名是高级行政官吏。没有贵族身份的贵族院成员有 56 人，真正从事工商业的资产者仅 10 人左右。

内阁的首相人选主要是大资产阶级。首相中有倾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贵族如布洛伊公爵和莫莱伯爵，有为帝国效过力的元帅苏尔特、瑞拉尔和莫提埃，有金融和工商业巨头拉菲特和佩里叶，有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梯也尔和基佐。

由此可见，金融大资产阶级是七月王朝的支柱。七月王朝只是法国资产阶级中一个阶层的王朝。

三、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

[工业革命的缓慢发展]法国工业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象英国那样有一个明显的飞跃的阶段，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第一帝国时，法国的工业革命开始起步，七月王朝时有所发展，而其完成却在第二帝国时期。

工业革命发展最显著的表现是工业产量的逐年递增。据统计，法国工业的年增长率 1815 年—1820 年为 3.74%，1820 年—1825 年为 3.05%，但从 1825 年~1830 年增长速度放慢了，仅为 1.46%。在七月王朝时期，增长率又上升了。1830 年~1835 年，为 3.36%，1835 年~1840 年为 3.07%，1840 年~1845 年为 3.36%，这以后则陷入经济危机。

在机器使用上，蒸汽机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幅度不大。1815 年法国拥有蒸汽机约 200 台，1832 年达到 525 台，1848 年达到 4850 台。主要集中在纺织业中。纺织业在法国工业中仍占绝对优势。纺织机器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1816 年平均每台纺机每天可纺 2 公斤棉花，1847 年增至 14 公斤。但机械化水平普遍还较低，1846 年，法国纺织机器的总数为 31000 台。

在钢铁冶炼上，生产工艺也在不断改进，烧焦炭的高炉逐渐替代烧木柴的高炉。1839 年，法国有 445 座烧木柴的高炉，而烧焦炭高炉仅 33 座，生产钢铁占全部产量的 20%。1847 年，烧焦炭的高炉增至 100 座，产量占总产量的 43%。煤的产量 1814 年为 100 万吨，1830 年为 250 万吨，1847 年达 515 万吨。但法国冶金业总的水平还较低，1847 年的钢产量仅 1.3 万吨。

在交通运输业上，法国在 1823 年建造了第一条从圣太田至安德雷齐奥的铁路，长 20 多公里，主要用来运煤，车皮用牲口、绞车来拖拉。1830 年开始才在圣太田至里昂的铁路线上使用了火车头。法国铁路建设的速度不快。从 1840 年起，法国陆续成立了一些公司，从事铁路建设，著名的有 1845 年罗特希尔德联合英国人布伦特和法国人拉菲特建立的北方公司。1842 年议会通过铁路法案，决定建造 6 条铁路，从巴黎可达里尔、勒阿弗尔、南特、波尔多、马赛和斯特拉斯堡，想以此形成铁路网。实际上直至 1848 年，法国只建造了 1320 公里铁路，并没有形成网络。交通运输上发展最显著的是公路和运河。在 1824 年，只有 40% 的王家公路是可以使用的。经过七月王朝的修复，1850 年有王家公路 35000 公里，其中 98% 是可以使用的。并且，先后开凿了罗纳河至莱茵河的运河和勃艮第运河，还开始开凿马恩河至莱茵河的运河。从 1822 年至 1845 年，运河的总长度从 730 公里增至 3200 公里。

[农业的持续增长]法国工业革命的又一特点是在工业革命开展的同时，农业仍在发展，而不是象英国那样工业革命进行时，农业跟不上工业的发展步伐而相对萎缩。

农业经过 18 世纪的不稳定以后，从复辟王朝起进入缓慢增长的时期，这种增长势头到七月王朝时仍然保持着。据统计，农业总产量在复辟王朝时期增长 29.8%，在七月王朝时期增长 37%。

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仍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有人统计工业产值（包括小手工业，其中有农村家庭手工业）约在 1835~1844 年才超过农业产值，如果把小手工业的产值除外，法国则要到 1880 年时工业产值才最终超过农业产值，这说明农业和小手工业在法国经济中的重要性。法国的农业劳动人口，在 1845~1850 年之间，是工业和手工业人口的两倍之多。

但是，在技术上，农业的发展远远落后工业。农业机械十分少见，生物

科学和化学技术也未应用于农业，尽管轮作制和人工草场的技艺不断发展，但土地的休耕仍很普遍，在七月王朝时期，每年大约还有 600 万公顷的土地休耕，和小麦的播种面积大致相等。所以农业的生产率低于工业生产率的发展。在 19 世纪中期每个农业劳动者的产值只有工业劳动者的一半。

这时法国农业发展的特点是拥有众多的土地所有者。由于长子继承权的废除，在继承权上的男女平等，以及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所以这时土地通过继承，所有权被分割。有人估计，到 1850 年，法国约有土地所有者 700 万。在小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同时，大土地所有制也有所发展，法国大革命并没有能剥夺所有贵族、大资产阶级的土地，1815 年以后，一些前帝国官员回到土地上，1830 年以后，一批正统派也脱离官职或军队返回故里。

[金融业取得优越地位] 从复辟王朝起，法国的金融业在结构上和功能上不断完备，到七月王朝时期，金融业在法国经济生活中已取得较优越的地位。

整个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金融业中有一批银行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整个银行业的核心，他们的银行被人称为“高级银行”。这是一批私人银行，设在巴黎，资金雄厚，以家族闻名。按来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犹太人，如罗特希尔德、拉扎尔、沃姆斯；另一部分为新教徒，如马莱、米拉波、凡尔纳等。他们一般来自莱茵兰和瑞士。在七月王朝时，已投资大的工矿企业，也贷款给国家。其中一些家族如沃丁格尔、沃迪尔和凡尔纳通过联姻和一些工业家携起手来。“高级银行”还通过管理法兰西银行几乎控制了法国整个金融业，法兰西银行的董事主要来自“高级银行”的代表。

在七月王朝时期，政府给予银行家种种优待。在这段时间，261 261 国家预算大幅度增加，政府就向金融家借贷，利息甚为可观。并且金融家的社会地位也日益提高，深得国王的宠信。罗特希尔德曾在 1840 年 12 月不无得意地写道：“随便什么时候，只要我愿意，就能去国王家，他十分信任我，听着我，认真考虑我所说的。”

然而整个金融体制还是很陈旧的。法国流通的货币主要还是贵金属的，纸币的发行量不大，1820 年流通的纸币为 1.53 亿法郎，1830 年为 2.23 亿法郎，1847 年初为 2.06 亿，这年底为 3.11 亿。纸币最小的面值直到 1847 年为 500 法郎，1847 年 6 月才通过一个法案开始发行 200 法郎的纸币。这时纸币只用于重大的交易。整个金融界对信贷还持不信任或谨慎态度，银行最重要的活动还是票据兑现。储蓄业务也没有得到银行的重视，收集积蓄还传统地是公证人、收税员和高利贷者的功能，此外，农民和小资产者还把钱币存放在羊毛长筒袜里。

[无产阶级的状况和两次里昂工人起义] 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法国工人的人数不断增加，阶级意识开始增强，逐渐从自在阶级过渡到自为阶级。但是，由于法国工业革命的展开是渐进式的，所以在七月王朝时期，无产阶级内部成份也较为复杂，存在着差别。

由于新旧经济形式并存，既有现代化工厂，也有旧式的手工业企业。所以，在无产阶级内部有手工业者，也有手工业企业的雇工和工厂工人。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在行为和思想上有很大区别，手工业者许多是受过教育的，他们关心自身的教育和孩子的教育，生活态度严谨。在法国工人中，这部分人占大多数。1848 年，只有 1/4 的工人在工厂里做工。

同时还存在地域上的差别，在布列塔尼和南方大多数地区没有大工矿企业，所以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就较弱，在北方和中部，工业较为集中，手工

业者经不起工厂的竞争，这些地区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

尽管存在种种差别，但其社会地位大致相同。政治上，毫无政治权利，没有选举权，结社受到限止，遭受种种压迫；在经济上，遭到残酷的剥削，生活水平低下。

七月王朝时期，女工和童工被大量雇佣，1847年，据统计在10人以上企业中劳动的105.4万工人中，男工为67万，女工为25.4万，童工13万。

工人的工资十分低下，以挡车工为例，1840年时，男工每天的工资平均为2法郎，女工为1法郎，13~16岁的童工为75生丁，8~12岁的童工仅45生丁，而当时面包价格为30—50生丁一公斤。工人每天的工时也很长，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居住条件更差，住室阴暗潮湿又狭小，并且没有卫生设备。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被迫起来斗争，法国历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独立起义终于在1831年的里昂爆发。11月21日，丝织工人因厂主拒绝执行已达成的增加工资的协议，举行了罢工示威。在遭到军警镇压后，工人们毅然拿起武器筑起街垒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工人把战斗口号：“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写在高高飘扬的黑旗上。工人们英勇战斗，击败了反动军警，俘虏了郡守。经过三天英勇奋战，工人攻占了市政厅，占领里昂市达10天之久，于12月3日，被残酷镇压。

两年后，即1834年4月，里昂工人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比第一次起义具有更明显的政治性质。3月，政府禁止结社。反动当局无视工人抗议，准备公开审讯6位工人代表，引起工人愤怒。4月9日，审讯开始后，军队突然向涌进法庭大院的工人开枪。工人们被迫奔向街头，修筑街垒，并散发传单，决心战斗。传单上庄严宣告：“我们所争取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是我们祖国的幸福，是未来的保证。”并主张建立共和国。激烈的战斗持续了4天，直至4月12日才告失败。总计342人死亡，600人受伤。这次起义在全国影响很大，直接推动了4月13日巴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起义。两次里昂工人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工人武装起义，揭开了法国工人运动史上新的263 263 一页。标志法国无产阶级已经走上独立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他们以自己英勇不屈的战斗行动，站到了欧洲无产阶级斗争的前列地位。

四、七月王朝时期的政治斗争

[政府反对派] 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在左边和右边都有它的反对派。在右边是旧贵族，这时形成了正统派，正统派的唯一凝聚力就是效忠旧王朝，他们以贝里埃和夏多布里昂为首，主要的影响在乡村和外省的城市中。1832年，流亡国外的贝里公爵夫人回国企图组织反路易·菲力浦的起义，结果被镇压，正统派对政府的威胁逐渐被削弱。

在左边，有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派，对政府构成真正的威胁。随着制度的发展，政府政策日趋保守，共和派深感失望，于是决心进行新的斗争。在共和派里著名人物有卡芬雅克、马拉斯特、拉斯帕伊、阿尔芒·卡雷尔。他们在报纸上呼吁实现普选，建立公共教育制度，争取人权。1832年6月5日，他们利用拉马克将军出殡之机，在巴黎发动武装起义，死伤800多人，最后失败。维克多·雨果曾在《悲惨世界》中艺术地再现了这一事件。1832年底，年青的共和派建立“人权社”，立志继承雅各宾派传统。不久该组织担负起领导共和运动的责任。面对共和派的斗争，政府加强了镇压。为阻止共和思想的传播，1833年12月23日通过法案，要求流动报贩必须经过批准；1834年3月，扩大了刑法典291款的适用范围，对不足20人的社团的结社活动予以限制。共和派马上以实际行动抗议政府的措施。1834年4月13日，继里昂工人起义以后，巴黎的共和派领导了反政府的起义，遭到国民自卫军和正规部队的残酷镇压，仅在一所房子里就有14人被杀害，4人受伤，史称“特朗斯诺南街的大屠杀”。1835年7月28日发生了菲厄希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的事件，七月王朝借此颁布了《九月法令》：所有对国王和政府的攻击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所有倡导共和的报刊将处于罚金，如果重犯就得停办，绘画、雕塑、石印术、内政大臣或郡守的批准不得出版等。在政府的高压下，共和派的活动暂时低落。

潜在的波拿巴派，在1836年以后，逐渐有了影响。

[“运动派”和“抵抗派”]七月王朝时期把持政府的大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派又可分为两股政治力量，其一为“运动派”，其二为“抵抗派”。“运动派”的代表人物是巴罗和拉菲特，他们把1830年革命当作民主化运动的起点，对内，主张扩大选举权，对外，主张废除1815年的条约，给当时起义的民族以军事援助。“抵抗派”以抵抗革命运动而得名，代表人物有佩里叶、基佐、布洛伊公爵。对于他们来说，1830年宪章是一个终点，一个句号，要坚决维护建立在1830年宪章基础上的“秩序”，镇压一切反抗力量。

七月王朝建立初期，“运动派”影响较大，在第一届内阁中杜邦·德勒尔和拉菲特占据重要地位。1830年11月组成拉菲特为首的内阁，在其任内，选举权扩大，并通过市政组织法，市议会由富裕市民选举产生。1831年3月法令规定国民自卫军士兵有权选举军官。但大资产阶级抱怨他不能应付国内的骚乱和经济困境，1831年3月12日拉菲特被迫下台，取而代之的是佩里叶。此后，七月王朝政府就始终掌握在“抵抗派”手里。

[从佩里叶到基佐]佩里叶上台后，实行全面镇压的政策。他曾在议会里宣布了他的纲领：“对内要秩序，但不牺牲自由；对外要和平，但不损害荣誉。”在“秩序”的幌子下，他大肆镇压革命运动，对行政机关进行清洗，一批市长、郡守、专区区长被免职；一些地方的国民自卫军被解散；一些报刊被封闭；同时削弱旧贵族的某些影响，如取消把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

的日子作为国哀日的法令，废除参议员的世袭制等。佩里叶把自己上述举动称为“不偏不倚”的政策。1832年法国瘟疫流行，佩里叶于5月死于霍乱。

从1832年5月至1836年初，内阁更替频繁，首相如走马灯似的变换。但是，真正把握政局的是三个人：布洛伊公爵、梯也尔和基佐，被称为“三驾马车”。布洛伊曾出任政府首脑（1835年3月至1836年2月），1832年到1834年任外交大臣。梯也尔在1832—1834年担任内政大臣，任内镇压1834年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共和派起义。基佐在1832年—1834年担任公共教育大臣，1833年在他的推动下通过了《公共教育和教学自由法》，建立由国家、郡、市镇资助的小学校，小学教育对穷人免费，确定小学教员的条件，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接受世俗教育或教会教育。

1836年2月至9月梯也尔第一次组阁。之后，莫莱任首相。莫莱完全是国王的驯服工具，因此，基佐、梯也尔、巴罗组成联盟，反对莫莱。梯也尔和巴罗是代议制政府的维护者，梯也尔的著名纲领是“国王统治而非管理”。至于基佐，参加联盟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赶走莫莱，由自己取而代之。1839年3月，在议会重新选举后，莫莱辞职，国王曾召苏尔特组阁，最后不得不让梯也尔组阁。梯也尔在第二届内阁期间（1840年3月~10月），曾抵制了左派提出的议会改革法案，该法案想把行政官员排除在议员之外，也拒绝了给国民自卫军以选举权的法案。但是他有意削弱国王的影响，内阁会议不再让国王出席，重大的决定由他个人和国王讨论，在保守派和正统派眼里，梯也尔成了“革命者”。1840年10月底，国王以在外交政策上与梯也尔有分歧为由迫使梯也尔辞职。至此以后，基佐成了政府的支配者，1847年9月以前，名义上虽由苏尔特元帅任首相，实权却一直在基佐手中，他使七月王朝的统治日趋反动。

五、殖民侵略的新起点

[恢复强国地位的外交努力]拿破仑战败后，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大为削弱，因此，法国外交的基点是对外乞和，以维护大国地位，同时进行殖民扩张。

复辟时期，法国重建了军队和舰队，1818年参加了四国同盟的定期会议，成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1822年在五国同盟的维也纳会议上，法国承担了武装干涉西班牙革命的任务，1823年出兵西班牙，镇压了西班牙革命，由此成为欧洲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力量。

七月王朝建立后，路易·菲力浦在外交上力求和各强国保持正常关系，以维护法国在欧洲的强国地位。1830年8月3日，七月王朝第一届内阁宣布：“法国将告诉欧洲……它不仅珍惜自由，也珍惜和平，但愿它的邻国幸福和安宁。”法国的和平姿态消除了欧洲强国的疑虑。8月31日英国率先承认新国王，随后普鲁士、奥地利、俄国也相继承认。而后，在“对外和平”的幌子下，竭力争夺欧洲的霸权地位。

[占领阿尔及利亚]根据1814年5月30日第一次巴黎和约，除多巴哥、圣卢西亚和毛里求斯为英国夺去外，法国恢复了1792年的殖民地。当时法国的殖民地十分有限，主要是几个商站和据点。

在复辟王朝后期，查理十世为争夺地中海霸权，决定远征阿尔及利亚。1830年6月14日，法国布尔蒙将军率领殖民军在阿尔及尔西部登陆，7月5日占领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的统治者、土耳其人的“德伊”投降，离国出逃。

但是，阿尔及利亚人民并没有屈服，西部爆发了阿卜杜拉·卡德尔领导的起义。1832年，阿尔及利亚西部各部落推选卡德尔为首领，卡德尔宣布对法国殖民者进行“圣战”，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游击战面前不断失利，1834年2月26日，法国德米舍尔将军不得不和卡德尔签订了《德米舍尔协约》，规定除沿海几个城市外，阿尔及利亚西部归卡德尔管辖。1835年，法国撕毁条约，进攻卡德尔，又遭到失败。1837年5月30日，法国被迫再一次同卡德尔签订《塔夫那条约》，除东部地区和阿尔及尔、奥兰等少数城市由法国占领外，阿尔及利亚都归卡德尔统治。

1839年11月，卡德尔向法国殖民者发起进攻。法国开始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总督比若在1841~1843年间占领了所有平原，1844年，卡德尔逃往摩洛哥，267 267 阿尔及利亚全境被法国占领。

法国占领阿尔及利亚后，大肆掠夺，加紧殖民化进程，法国殖民当局没收其大片肥沃土地，鼓励欧洲移民。1833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只有7800人，到1847年猛增到10.9万人。

[对世界其它地区的侵略和干涉]除占领阿尔及利亚外，法国还在世界各地竭力扩张自己的势力。

在西非，它以塞内加尔为殖民据点，不断扩大占领地，1838至1842年，法国诱骗象牙海岸大巴萨姆地方和阿西尼地方的酋长签订条约，接受法国的“保护”。法国曾数次侵犯马达加斯加岛，1840年至1842年，法国人趁马达加斯加内讧，占据了该岛。

在亚洲，由法驻马尼拉的总领事阿道尔夫·巴罗出面复兴法国在远东的

贸易。在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后，法国趁火打劫，于 1844 年和中国签订了不平等的中法《黄埔条约》。

在大洋洲和太平洋上，法国以传教士开道，使太平洋的塔希提岛（1842 年）、瓦利斯群岛和富图纳群岛（1842 年）甘比尔群岛相继沦为法国的保护国。

在拉丁美洲，七月王朝承认了新独立的国家，努力和英国分享商业利益，使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城市成为法国商船的重要基地。

第三节 1815 至 1848 年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

一、自然科学的发展

[数学]19 世纪上半期，法国在自然科学发展方面超过了英国，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新中心。法国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项目，在 1751 年至 1800 年间，英国是 37 项，法国是 54 项；在 1801 年至 1850 年间，英国是 92 项，法国是 144 项。在数学领域里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

法国数学界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开创了射影几何的系统研究。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在几何学的研究上有雄厚基础。该校的毕业生让—维克多·彭色列，对俄战争中成为俘虏，在押期间，继续从事数学研究，1822 年发表了著名论文《论图形的射影性质》。这篇论文的发表标志着射影几何的正式创立。

同时，法国数学家奥格斯丁·柯西，在数学分析等领域里也取得不少突破。他的著作涉及函数、连续性、定积分、级数收敛性等概念，使数学分析更为严密。他的最重要成就是创立了复变函数论。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位早逝的数学家艾伐里斯特·伽罗瓦，1830 年，他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31 年因发表一篇具有共和思想的文章被学校开除。1832 年，在和别人决斗中身亡，他的主要成果体现在他的学术论文《论根式解方程的条件》，此文创立了群论。

[物理和化学] 当时法国在力学、天文、光学、电学等方面都取得较大进展。

在力学方面，数学家普瓦松把数学方法列入力学研究，丰富了理论力学。法国工程师沙第·卡诺则通过自己的观察研究为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发现作了铺垫。他在 1824 年发表了《关于火的动力研究》。后来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和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分析了卡诺的发现，总结出热力学第二定律。

在天文方面，最重大的成就是发现了海王星，1781 年天王星发现后，天文学家们经过观察，发现它有“越轨”行为，有人推定，在天王星附近可能有一颗未知的行星。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可以推算出这颗未知星的位置。当时世界上有两个人从事了这项计算工作，一位是法国天文学家勒威里耶，一位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生亚当斯，尽管亚当斯在 1845 年 10 月就计算出了结果，但未引起英国天文学界的重视。不久，勒威里耶于 1846 年 7—8 月公布了这颗未知行星可能出现的位置，并写信告诉了柏林天文台台长加勒，加勒进行观察，发现了这颗未知星——海王星。

在光学上，法国人尼埃普斯发明了照相工艺。1816 年，他用涂有氯化银的感光纸拍摄了一张照片，但只能部分定影。1826 年，用涂有感光材料朱迪亚沥青的片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真正的照片。法国人在光学理论上也作出重大贡献。工程师奥格斯丁·菲涅尔在复辟王朝时期完善了波动光学理论，成为 19 世纪波动光学的集大成者，为光的波动说战胜微粒说发挥了重要作用。

19 世纪电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发现了电和磁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一事实，而在这一发现上，法国物理学家安培的努力是不容忽视的。1820 年，安培写出了关于电流能使磁针偏转的论文。以后又确定了电流对磁针作用方

向的右手定则。1825 年他提出分子环流假说。

在化学上，法国化学家的重大发现几乎都在 1815 年以前，但是化学家杜马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他在有机化学方面成绩显著，是有机化学的先驱之一。在 1830 年他发明用于测定有机化合物中氮含量的燃烧法，1834 年他证明卤素可取代有机化合物中的氢，并提出了不同于瑞典化学家贝采利乌斯的原子量。此外，法国化学家热拉尔在有机化合物的基因理论上也有贡献，在 1843 年提出了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支持杜马的同系概念。

[医学] 19 世纪上半叶，法国的医学硕果累累。著名胸腔内科学之父拉埃内克，发明了听诊器，1819 年写成《论间接听诊》。法国外科军医伊塔尔在 1821 年发表了第一部关于耳科疾病的论著。法国病理学家克律韦耶从 1822 年起开始出版《病理解剖图集》，他已能区分胃溃疡和胃癌。法国流行病专家布雷托诺，在 1825 年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气管切开术。1826 年描述了白喉症状，白喉一词也系他所创。在药物学方面，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和另一化学家卡芳杜于 1820 年发现了奎宁。1822 年法国人塞鲁拉斯制成治疗皮肤病的碘仿。1831 年，苏白郎制成麻醉药氯仿。1822 年，化学家罗比凯首次从鸦片中分离出用于止咳镇痛的可待因。

二、各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圣西门的空想社会主义]法国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孕育地之一。以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在法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材料。

克劳德·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生于巴黎，出身封建贵族，自称是“查理曼的后代”。青少年时受过启蒙思想家的良好教育。曾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投身革命。同时，从事国有财产的投机活动，成为富翁。1794年，被捕入狱，关押达10个月之久。出狱后，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科学研究上。自1799年起，开始学习自然科学知识，还游历了欧洲各国，考察了英、德的科学文化。40岁以后，圣西门开始埋头著述，此时，他已一贫如洗，疾病缠身，妻子离异，常常在白天到当铺当缮写员，到印刷厂当校对，到书店当雇员，晚上坚持写作。有两年时间还靠从前的仆人资助生活。变化动荡的生活用圣西门自己的话来说是“一堂经验课”。“我竭尽全力最确切地认识各个社会阶级的习性和观点。”从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奋斗不息。1802年发表了处女作《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1820年以后，又陆续写出了：《论工业制度》（写成于1820~1822年）、《工业家问答》（写成于1823~1824年）、《新基督教》（写成于1825年）等重要著作，形成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圣西门在他的著作中，严厉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的腐朽统治。指出“现今的社会实在是颠倒的世界。”他认为，“专横无能和阴谋”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三大弊病。因此，必须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理想的新制度。

圣西门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和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比，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其一是把着眼的重点放在组织生产上，其二是坚决反对历史的倒退或回归。这些特点表明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进步和发展。

圣西门把法国大革命看作是“从封建和神学制度向工业和科学制度的过渡”，所以他认为今后的社会是建筑在工业的基础的。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改善人数最多而最贫穷的阶级的命运。为此目的，就要加强对生产的组织，他认为生产组织的领导权应由工业社会中最有力量的“工业家”掌握，在他看来，“工业家”就是生产者，包括企业主、商人、手工匠、工人和农民，也包括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等。他认为政治建设也要为生产服务，社会的领导权应交给专家学者。未来的政府应以三院为基础，即科学院（由工程师、作家、艺术家组成）、审核院（由数学家、物理学家组成）和执行院（由工业、农业和商业企业领导人组成）。科学应作为新的宗教，学者即是该宗教的祭司。

在圣西门对理想社会的描绘中，有许多卓越见解，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如改善穷苦人命运，生产的计划性，政治管理以发展经济为重点等思想。但是从本质上说，圣西门并不想废除资本主义制度，他只承认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对立，而忽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而且领导新制度的政府是由社会“精英”组成的，无产阶级和普通农民不在其内。正是由于圣西门思想的这些历史局限性，圣西门的信徒们大多成为专家治国论者，并逐步走向反面。

[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傅立叶（1772—1837）是法国又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亲身经历了1825—1826和1828—1832年两次严重的经

济危机，以及 1831 年和 1834 年两次里昂工人的起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了更深的认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比圣西门更尖锐，在未来社会的设想上，他更关心于消费问题，更注重农业和劳动心理。

傅立叶出生在法国东部贝藏松市一个富商家庭，父亲早逝，傅立叶继承家产，以后定居里昂独立经商。在法国大革命中，他的商品被征用，并遭抄家而破产。因此，他对革命一直抱敌视态度。在此后二十多年里，除了 1794 年 7 月至 1796 年 1 月应征入伍外，全在商业界度过。当然不再作为老板，而是普通雇员，他先后当过店员、推销员、抄写员、发行员和经纪人等，目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罪恶、弊端。1803 年，傅立叶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全世界和谐》，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1808 年匿名出版了第一部重要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关于发现的说明和解释》（简称《四种运动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宇宙观、历史观。1822 年，完成了重要著述《论家务和农业协作社》，此书在 1834 年再版时改名为《宇宙统一论》。1829 年又发表了《工业的协作的新世界》（简称《新世界》），使他的思想达到最高峰，并逐渐引起社会的重视。在著书立说的同时，他还为建立理想社会进行宣传 and 实验。

在傅立叶的著作中，提出了人类有规律发展的历史观，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分为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四个时期，而且指出每个时期的特点是和经济发展的状况相联系的，进而说明资本主义必将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傅立叶著作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他认为，工业无政府状态是经济、政治、社会、思想、道德混乱之源，而造成工业无政府状态的又有两个因素：所有权的分散性和商业的寄生性。他指出“商业的无政府状态和自由竞争”造成了投机、涨价和财产两极分化。他还运用表格列举了商业中的 36 种罪恶，诸如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买空卖空、诈骗、走私、弄虚作假、贩卖黑奴等等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所以，他说，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过去是，将来也只能是一切罪恶的渊藪。”是“幸运的对立物、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

傅立叶把取代这个颠倒世界的新制度称为“和谐制度”，这是 273 273 一个使人们摆脱贫困、痛苦、灾难和不幸，充分满足自己的欲望，得到最大幸福，和睦相处的社会。其基本的组织是由 1620 人为宜组成的生产—消费合作社，称“法郎吉”（Phalange），又按劳动专业分成小组，称谢利叶（Serie），每天可以按个人的志趣到各个小组去劳动，在这里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和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生活享受。法郎吉是一个工农合一，城乡合一的统一体，它以农业为主，兼营工业，因此没有城乡和工农差别。收入按劳动、资本、才能分配。劳动占 5/12、资本占 4/12，才能占 3/12。

法郎吉的成员都居住在名叫“法伦斯泰”（Phalansteres）的漂亮大厦里，那里有食堂、商店、俱乐部、图书馆，有旅馆、宿舍、会议厅。每个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按自己的爱好和口味选择房间和饭菜。在法郎吉里，男女平等，婚姻关系建筑在相互爱慕的基础上，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思想。小孩受到良好的社会教育。傅立叶的上述思想和设计，同样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但是，他与圣西门一样，看不到资本主义雇佣制的本质，不认识无产阶级的伟大作用，在他的和谐社会里，仍有贫富差别，并以资本形式保存了生

产资料私有制；他还不知道现代化大工业在未来社会中的意义和作用，他的和谐社会是建筑在农业基础上的；最后，在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上，他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恩赐上，希望统治者和资本家了解他的理想社会的美妙和快乐，从而慷慨解囊，提供资金。他在报刊上刊登广告，写明每天中午 12 点至下午 1 点，在家恭候富翁光临，结果白白等了一生。

傅立叶去世以后他的信徒维克多·孔西德朗继续宣传傅立叶的主张，进行和谐社会的实验，但都失败了。

[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路易·勃朗（1811—1882）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他出身于贵族世家，曾当过新闻记者，为资产阶级报刊撰写文章，表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在人们对历史怀有普遍兴趣的时候，他又成了历史学家，1844 年写了论述 1830—1840 年奥尔良王朝和资产阶级密切关系的《十年史》，1847 年写成了两卷本的《大革命史》。同时，他还是一位政治活动家，一位民主主义者和共和派。他的社会主义学说集中体现在 1839 年发表在《进步杂志》上的《劳动组织》一文中，该文后来用小册子再版。此书通俗易懂，成为当时法国工人阅读最多的“社会主义”书籍之一。

路易·勃朗对资本主义制度罪恶的揭露批判，明显受到傅立叶的影响。他批判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竞争。他认为，自由竞争对人民来说是毁灭性的制度，对资产阶级来说是破产的原因，在国际关系上，它加剧了冲突，是战争的根源。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路易·勃朗提出建立“社会工场”的方案。这种“社会工场”就是生产合作社，首先由国家投资建立，工场领导第一年由国家指定，以后选举产生，工场成员工资平等，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工人的劳动权得到保障。社会工场取代资本家的企业，从而使资本主义逐渐地、和平地让位于社会主义。

“社会工场”和“劳动权”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是具有魅力的，对动员工人参加维护自身利益的斗争也是有启迪作用的。但是，路易·勃朗把实现“社会工场”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国家身上，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他出身在农民兼手工业家庭，种过田、放过牛，当过排字工人。只读过几年书，主要靠自学掌握文化知识。1840 年他出版了《什么是所有权》（又译《什么是财产》），书中对私有制和维护私有制的各种论据给予尖锐的批判。他愤怒地指出：“所有权就是盗窃，它是杀人的行为，如果它存在，社会就会自取灭亡。”这本书的发表，使他名声大振。1846 年，蒲鲁东发表了第二部著作：《贫困的哲学》，此后，他几乎每年出版一部著作，其中主要有：《社会问题的解决》、《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战争与和平》等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宣扬无政府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改良主义，试图在保存资本主义的前提下，实行以小私有为基础的理想社会——“无政府”主义社会。

蒲鲁东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反对革命，拒绝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他的口号是“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公开提出“打倒政党，打倒政权。”他主张创办“人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实行“契约互助”达到小私有的无政府社会。为了消灭中间剥削，要自筹资金创办“人民银行”，给广大劳苦大众提供无息

贷款，人们利用贷款购得生产资料，使人人获得劳动权，成为独立的小生产者，其产品进行直接的无货币交换。然后，在家庭的基础上，根据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使其不断扩大取代全省、全国，用完全自由的联邦代替原有的国家，从而直接导致国家的消亡。

蒲鲁东力图通过各阶级的“携手合作”，改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一个永远保存小私有制的社会，这是行不通的。

[空想共产主义思想] 在七月王朝时期，除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外，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也在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卡贝（1788—1856）、德萨米（1803—1850）和布朗基（1805—1881）。他们主张废除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其中德萨米和布朗基继承巴贝夫的革命传统，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现政权，进而实现共产主义。三人中对法国工人运动影响最大的要数布朗基。

布朗基出生在尼斯，早在中学时代，就参加了秘密团体烧炭党，积极投入反对波旁复辟王朝的斗争。在大学时代，继续从事进步活动。1830年7月革命一爆发，他作为一名街垒战士与工人并肩战斗，为推翻复辟王朝立了功。之后，又对七月王朝的反动政策极不满。投入了新的斗争，1830年底，他参加共和派组织的“人民之友”社，逐渐成为巴贝夫的信徒。

1835年，布朗基参加并领导了秘密组织——“家庭社”，决心用暴力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建立平等共和国。1837年，他将已被反动派破坏的“家庭社”改组为更加严密的组织——“四季社”。“四季社”以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为主，吸收进步青年和基层军官参加。到1839年春天，“四季社”成员已发展到四、五千人。布朗基为总司令，他常亲自察看地形，拟订起义计划，积极准备起义。

1839年5月12日，布朗基选择星期天警察放假的机会，带领600名社员举行暴动，突然攻占了巴黎枪炮厂和市政厅，进攻警察局，想要一举夺取政权。由于孤立无援，起义被反动军警轻易地镇压了，大多数领导人被捕，布朗基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长期关押在监狱中。布朗基虽然不是理论家，但他在狱中和出狱后，先后写下了许多论文，其门生整理出版了两卷集的《社会批判》，在政治、经济、哲学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理论。

布朗基认为，社会历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向共产主义前进，共产主义是一个文化极高和完全平等的社会，是最文明最幸福的制度。这是因为共产主义一切都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布朗基主张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建立强有力的专政，不给敌人任何自由。布朗基甚至明确提出了打碎旧的官僚机构，废除常备军，实行政教分离的主张。布朗基还认为共产主义是能够实现的，但又是长远的。因此，布朗基主张稳妥地发展到共产主义。他甚至提出，在革命胜利后，不能立即用法律的办法，靠行政命令去消灭和剥夺私有制。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高度文明的基础上，必须有高度的文化。

但是，布朗基并不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制度的实质，他脱离群众，不顾主客观条件，主张少数人密谋盲动，不可能引导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文学和艺术上的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文学和戏剧] 文学艺术上最显著的特点是浪漫主义流派的兴起和发展。浪漫主义是和古典主义相对立的文学艺术流派，它反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要求扩大艺术表现的范围，赞赏人的个性、本能和感情，歌颂自然，反对崇拜理性。浪漫主义起源于英国和德国，紧接着出现于法国，可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

早期浪漫派，除斯达尔夫人属于积极浪漫主义之外，几乎都拥护波旁王朝，歌颂保王主义和天主教，其中有夏多布里昂、拉马丁、维尼等，均属于消极浪漫主义。

积极浪漫主义的早期代表斯达尔夫人，曾寓居德国，受到同时代德国作家的影响，她在《论文学》和《论德意志》两部文艺理论著作中奠定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理论基础。早期浪漫派中的一些年青人经过徬徨徘徊后，认识消极浪漫主义虽然和他们一样反对现存的文学主流，但消极浪漫主义所企望的是历史倒转，恢复封建秩序。于是他们最终和消极浪漫主义决裂。1824年后，法国复辟王朝全面走向反动，而积极浪漫主义却不断发展，最终取代消极浪漫主义而成为浪漫主义运动的主流。

法国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领袖维克多·雨果（1802—1885），出生于贝藏松一个军官的家庭。1827年，他出版了诗剧《克伦威尔》，在序言里，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纲领。他从戏剧角度反对古典悲剧的形式法则，主张戏剧应师法莎士比亚，争取更大的自由与真实，他提出对照原则，认为艺术的任务要再现一切事物的对比，要描写“崇高文雅”的一面，也要描写“丑怪粗野”的一面，强调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可成为艺术题材。《克伦威尔 序言》的发表标志着积极浪漫主义和消极浪漫主义之间的继续分化，确立了雨果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1828年，他写了戏剧《玛丽蓉·德洛麦》遭到禁演。1829年，诗集《东方集》问世，诗集歌颂了希腊民族解放斗争，充满对自由的热烈向往。1830年，发表了他浪漫主义戏剧的代表作《爱尔那尼》，该剧颂扬了主人公爱尔那尼反抗社会，反抗封建暴君，追求纯真爱情的精神，艺术风格上打破了古典主义悲喜剧的界限，呈现出浪漫主义的丰富多彩。1831年，他又在小说方面创作了浪漫主义的标本作品《巴黎圣母院》，小说谴责了那个使表面丑陋而心地善良的卡西莫多和吉卜赛女子爱斯梅拉达遭受苦难的社会，感人至深。同年，雨果还写了诗集《秋叶集》。之后他又发表了一些诗集、戏剧和小说。1811年，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第二帝国时期，雨果的文学创作达到了新的高潮。

法国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小说家乔治·桑、诗人缪塞、诗人和歌手贝朗瑞及文学家大仲马。

乔治·桑（1804—1876）法国著名女作家，原名奥罗尔·杜邦，在她三十年代的小说中，主要涉及妇女问题，她从人道主义出发，主张妇女有不受婚姻习俗束缚的爱的权利。40年代，转而创作“社会问题小说”。1848年革命后，她放弃政治活动，隐居乡间，开始写作田园小说。一生写下105卷文艺作品，20卷回忆录及大量论文。著名的有《雷丽亚》（1833）、《木工小史》（1840）、《安吉堡的磨工》（1845）、《小法岱特》（1849）、《弃儿法朗莎》（1850）等。她的作品多以爱情为主题，但敢于触及社会问题，揭露出社会的黑暗与邪恶，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

贝朗瑞(1780—1857)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当过旅馆雇员、排字工等。直接从法国民歌中吸取营养,创作了大量歌谣,其诗歌具有强烈的反抗性,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感。在拿破仑时代,他那抒情婉约的歌谣就引起反响。拿破仑倒台后,他用诗歌抨击波旁复辟王朝,讥讽君主专制和反动教士。他的诗歌风格朴实、明快、自然、形象,充满生活气息,并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贝朗瑞最有名的诗歌是《意弗托国王》、《穷人的上帝》、《头脑简单的查理的加冕礼》、《老奶奶》和《老军士》等。

大仲马(1802—1870)是法国19世纪多产的作家之一,他从戏剧创作开始文学生涯,后撰写历史小说。死后,留下近300部作品。但作品的文学价值是颇有争议的。他的早期创作和浪漫主义相联系,发表了《昂利第三及其宫廷》(1829)、《拿破仑·波拿巴》(1831)等剧作。他的历史小说不注重史实,而是追求生动曲折的情节,充满浪漫传奇色彩。最主要的作品有《三个火枪手》(1844)和《基督山伯爵》(1844)。大仲马的后期创作商品化了,为了获取金钱,他以极高的速度进行粗制滥造。

[批判现实主义的兴起] 批判现实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是从浪漫主义的阵营中脱颖而出的。一些作家不再满足于借历史题材、异国情调来隐喻资产阶级的理想和感情,来表达自己的追求。由于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转而要求真实反映现实,用批判的眼光观察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其主要代表作家有司汤达和巴尔扎克。

司汤达(1783—1842),原名亨利·贝尔,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作家之一,出身律师家庭。17岁参加拿破仑军队,把拿破仑当作英雄崇拜。复辟王朝建立后,司汤达侨居意大利,开始文学创作。20年代初回国后,参加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论战,发表了著名文学论著:《拉辛和莎士比亚》(1823),他虽然站在浪漫主义立场上反对古典主义,但他的所谓“浪漫主义”实际上就是现实主义。他强调文学要反映现实,为现代人服务。《拉辛和莎士比亚》实际上奠定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

司汤达的主要作品有两部:《红与黑》(1830)和《帕尔马修道院》(1839)。两部小说都是描写紧接着拿破仑垮台以后的时代。《红与黑》的场景在法国,《帕尔马修道院》的场景在意大利,两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但他们的理想,对外界的反应和一般的举止都是十分相似的。于连(《红与黑》的主人公)和法布里斯(《帕尔马修道院》主人公)都是司汤达想象中的自己,他们为了追求幸福不惜伪善欺世,一切服从自我中心和利己的原则,在他们身上反映出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观和幸福观。司汤达赞赏小说主人公的处世哲学,并不等于赞赏虚伪,恰恰相反,作者通过肯定他们只是想说明一个简单的现实:在现今社会,伪善已成为统治力量,每个希图飞黄腾达的人都不得不向它顶礼膜拜。从而批判了现实社会,这就是他的作品的价值所在。此外,司汤达的小说也反映出贵族和资产阶级争权夺利的斗争、教会和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情绪,有助于了解当时的社会现实。

无可争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巴尔扎克(1799—1850)。生于图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以后随家迁往巴黎,曾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当办事员,一度因文学创作来获成功投笔经商,做过出版商和印刷厂老板。到1828年因破产而欠债累累,遭警察局通缉和债主逼债,他只得隐姓埋名,继续创作。坎坷的经历为他写出反映当时社会全貌的小说打下了基础。1829年出版了第一部

以真名发表的作品《朱安党人》，一举成名。1834年，他设想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要把他的全部小说，包括已经发表的和即将动笔的，合成一部巨作。1840年他把这部巨作取名为《人间喜剧》。《人间喜剧》最后包括了巴尔扎克1829—1847年间写的长、中篇小说和随笔97部。

在《人间喜剧》中，他揭露了19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对处在不同阶级和阶层、不同活动场所的男男女女，总计约2000多个人物的活动进行了描述，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当时的社会风俗画和心理解剖图。在巴尔扎克时代以前，爱情是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主题，而巴尔扎克第一次把金钱放到作品的重要位置上，使人无时不感到金钱在当时社会的统治力量，从而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和某些弊病。巴尔扎克还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以及里昂织工的起义，对工农群众的悲惨命运寄以同情，这些创作方法和题材对于以后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作家都有深刻的影响。《人间喜剧》至今仍不失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一本有价值的教科书。

但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对农民的暴动和工人的起义，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广大劳动者描写成群氓，对革命的暴力表示出恐惧，这反映出作者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

[造型艺术]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造型艺术十分繁荣，绘画大师众多，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各派。路易·大卫（1748—1825）是著名的古典主义画家，他把艺术和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留下许多不朽名作，主要有《荷拉斯兄弟之誓》、《处决自己的儿子布鲁斯特》、《网球场誓言》、《马拉之死》、《加冕式》等，他画风严谨，技法精湛。在他的作品中，逼真地勾划出了法国大革命的悲壮情景。拿破仑称帝后，他成为宫廷画家。不同画派的新一代艺术家几乎都受过他的艺术熏陶。

在复辟王朝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大卫的画风被学院派所继承和改造，继续在画坛占有一席之地。学院派的代表人物是安格尔（1780—1867），是美术院院士，以后又任美术学院院长。他发扬古典主义典雅庄严的画风，留下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女裸作品，更有独到之处（《浴女》、《泉》、《土耳其浴室》等）。

1819年，法国年轻画家吉里柯完成名作《梅杜萨之筏》，标志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的兴起。

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著名代表是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早年师承学院派画家盖兰，却喜爱浪漫主义风格。他的绘画题材广泛，善长历史画、风俗画和肖像画。最有代表性的却是现实题材的，如对土耳其人在希腊大屠杀表示极大愤慨的《希阿岛的屠杀》，反映1830年7月革命的《自由引导人民》。在他的作品里，常常反映出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苦难的同情，对革命的歌颂。

维克多·杜米埃（1808—1879年），是法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最优秀的革命画家。他从1830年起开始作讽刺画，用漫画的笔调攻击七月王朝，描绘当时商人、律师、医生、教授、小资产者等典型人物。他的石版画独居一格，其中尤以《特朗斯诺南街——1834年4月15日》最为出名，画中逼真地描绘出政府士兵镇压共和派起义时闯进街区、残暴杀害男女老幼的骇人情景。杜米埃的艺术遗产，十分丰富，总计约有4000幅石版画、900幅木刻画及大量水彩画和油画。

让·弗朗索瓦·米勒（1814—1875年）是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出身农民，

自幼爱好艺术，曾去巴黎学画，1849年开始定居巴黎市郊巴比松村，因此成为巴比松画派的著名领袖。他创作了以表现农民为主的大量农村的题材，富有强烈的农村气息，堪称“农民画家”。其中著名的作品有：《拾穗者》、《播种者》、《牧羊女》和《晚钟》等。他在作品中以深刻的思想蕴涵和独特的艺术手法，赢得了世界画坛的声誉。

浪漫主义也影响到雕塑，七月王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浪漫主义风格的雕塑作品。最著名的浪漫主义雕刻家是吕德（1784—1855年）。他摒弃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雕塑界流行的形式主义，提倡富于动态和激情的风格。他的代表作是巴黎凯旋门上的高浮雕《马赛曲》，重现1792年法国人民保卫共和国的历史场面。

四、史学的繁荣

[历史的反思]在拿破仑帝国时期，法国忙于战争和建设，历史学几乎被遗忘。帝国垮台以后，人们有了反思机会。法国历史的变迁促使人们去思考、去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探求这种历史变化的真正原因。从复辟王朝起，历史成了一种时尚。首先出现了文献收集时期，收集和出版了许多回忆录、通信、古文书、手稿等，随后出现了解释历史的时期。

十九世纪前期，史学家关心的论题之一是法国大革命史，当时许多法国史学家都亲身经历了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一帝国的历史时期，目睹了社会的巨大变化，深切感受到大革命在法国历史上的转折意义，同时他们对复辟王朝统治下的社会表示不满，于是通过缅怀大革命，推崇自由、平等原则，谴责封建贵族的特权。

19世纪前期历史研究的另一重点是法国中世纪史。当时法国在国际上的受压和凌辱激起了国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在史学界就表现为尊重本民族的历史，通过探寻民族发展的轨迹，来揭示民族的个性和精神，恢宏民族荣誉。同时，史学家们为了深入了解大革命，也需要对大革命的根源，对三个等级斗争的历史作出全面的论述，也必然要追溯到大革命以前的历史。

正是在史学研究的这两个方面，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使19世纪前半期成为法国史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著书立说，谴责封建贵族的特权，阐述进步的史学观点。首先，他们提出了阶级斗争的学说，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服务；其次，注意到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历史因果联系的分析，肯定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第三，他们还注意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不只写帝王将相的历史，也写普通群众的历史活动。

但是，这些史学家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否认阶级产生的经济根源，抹煞并反对第三等级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承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终目的。复辟王朝推翻后，他们先后走上了反对阶级斗争的通路，他们之中有的人成为政府首脑人物，成为革命的反对者和镇压者。

[梯叶里和米什莱]梯叶里（1797—1873）历史教授，一度作过圣西门的秘书。他注重中世纪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诺曼人征服英国史》、《论法国史信札》、《历史研究的10年》、《墨洛温王朝纪事》、《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等。梯叶里按照资产阶级观点研究中世纪史，他把第三等级看作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竭力赞扬英法第三等级反抗贵族的革命斗争，他甚至颂扬中世纪人民的起义，一度自称是“札克雷的子孙”。他还第一次把阶级斗争作为解释中世纪以来全部历史的钥匙，试图把英法中世纪史写成第三等级与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史，并指出，这一斗争必然要导致第三等级的胜利和封建特权等级的垮台，从而证明了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米什莱（1798—1874），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文学家。29岁时被聘为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他深受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影响，强调人本身在形成历史中的作用，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持续不断的斗争。1831年出版了《罗马史》两卷后，致力于中世纪史和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从1833年起，开始出版他最重要的著作《法兰西史》的第一卷，到1844年

出版了关于中世纪的六卷，这是全书的精华，他评述了法兰西民族的起源，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应以人民的生活为基础，不应以国家的生活为基础。从1846年起，他开始写作《法国革命史》一书。在书中他倾注了自己全部感情，对人民深表同情，写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由于米什莱重视人民活动在历史中的作用，被称为“法国第一个人民史学家”。当然他所指的人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而且也不赞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武装起义和革命专政的主张，表现出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

[基佐、米涅和梯也尔]基佐（1787—1874），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政治活动家、曾任历史教授，著有：《代议制政府的起源和沿革》、《从查理一世到查理二世的英国革命史》、《欧洲文明史》、《法国文明史》等。在这些著作中，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试图依据阶级斗争观点来解释历史。他严厉抨击了贵族特权的捍卫者，高度赞扬代议制度，热情描写了资产阶级的兴起以及它从封建贵族手中夺取政权的历史。他在当时同情暴力，赞成起义，肯定了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同贵族的一场大决战。基佐还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人类的进步合乎规律地进行的情形，象是星球运行一样清晰”。认为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米涅（1796—1884），著名的历史学家。早年爱好文学，1820年开始转向研究历史，曾在巴黎大学讲授历史，因反对复辟王朝受过法庭审讯。著有：《法国革命史》、《论圣路易时代的制度》等。米涅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明确指出大革命是一场第三等级和腐朽的封建贵族之间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还详细阐述了这场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他对大革命的全部进程和各个时期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及主要人物，都运用阶级斗争和对客观环境的分析来加以解释，进一步肯定了革命的正义性，并歌颂了起义和暴力的积极作用及其历史进步性。他多次指出，当特权等级不愿自动放弃权力时，第三等级只有通过起义的暴力手段来加以实现，而且，除了暴力之外，再无别的更高的权威了。米涅的历史论著，叙述明快简洁，说理透辟，语必有据，堪为当时楷模。

梯也尔（1797—1877），当过律师和新闻记者，七月王朝时期屡任大臣和首相，是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著有《法国大革命史》（十卷）、《执政府和帝国时代的历史》（二十卷）。他是米涅的终生好友，在他的著作中，十分注重引用丰富的原始资料，并且也以阶级斗争和历史发展规律性的观点来解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认为大革命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并运用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了波旁王朝的复辟，指出这也是一场阶级斗争。

第八章 第二共和国

第一节 二月革命

一、革命前夕的法国社会

[基佐的反动统治]在七月王朝统治的 18 年中，基佐先后担任内政大臣、国民教育大臣、外交大臣。1840 年秋，开始组阁，直至 1848 年二月革命，在 8 年时间里，基佐成为实际上的政府首脑。

基佐鼓吹国王不仅要统，而且要治，因此他深得路易·菲力浦的信任，成为国王的左右手。在对内政策方面，他以维护金融贵族的“秩序”为宗旨，百般歌颂资产阶级君主制，极力鼓吹七月王朝是法国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大肆宣扬国家只有在秩序中才能求得进步；实行有利于金融贵族的政策，发给各种商业公司、工业公司巨额津贴和奖金，把大量资本投入金融信贷，而不愿投资于工业生产；执行有利于大工厂主和大矿山主的对外贸易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甚至为使金融贵族尽快发财，不顾法国的实情，给他们提供一切投机的机会。基佐的这些政策既损害了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直接经济利益，又损害了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的利益，引起了各阶层的强烈不满。

基佐对共和派和工农群众极端仇视，不仅剥夺广大工农群众 工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取缔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拒绝进行降低选民纳税额为 100 法郎的选举“改革”。而且用贿买的办法控制议会选举，使拥护政府的保守派在议会中占据多数，把议会变成政府的驯服工具，将工业资产阶级及广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排斥于政权之外。基佐的政策，加深了工商业资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了无产阶级与金融资产阶级的矛盾，引起工人、农民对基佐政府的极大愤慨。在法国，除少数金融贵族之外，各阶层人们都普遍要求改革，实现民主。

[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经济因素常常成为革命的终极原因。1845 年以后，法国的农业、工业和财政就出现了不景气，来自爱尔兰和弗兰德尔的马铃薯病虫害又迅速危及法国各地，致使减产 25%以上。1846 年，因炎热和干旱，使小麦和豆类歉收，法国的主粮因此受到严重威胁，引起粮价猛涨。1845 年，100 公升小麦的价格是 17.15 法郎，而到 1847 年上涨到 43 法郎，在上莱茵省暴涨到 49.5 法郎，个别地区竟超过 50 法郎，尤其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谷物价格普遍上涨 100%至 150%。面包的价格上涨 2 倍。1845—1846 年农业的连续歉收，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

1847 年从英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法国。随着农业危机的加深，农民收入不断减少以及农民对工业品购买力的下降，使工商业危机接踵而至，生产大幅度下降，从 1847 年到 1848 年初，巴黎工业总产值从 14.63 亿法郎减少到 6.77 亿法郎，法国的冶金工业生产产值下降了 1/3，不久又下降到 1/2，采矿业的总额下降了 20%，纺织品的总销售量减少了 30%，金属产值减少了 50%。工厂纷纷倒闭，1847 年上半年，仅塞纳省破产的企业就达 635 家以上，工人大批失业，拥有 1.3 万工人的卢贝市，到 1847 年 5 月，就有 5000 工人失业。有的地区如特鲁瓦、牟卢兹和亚眠等地，失业工人高达 2/3

以上,到 1847 年底失业工人总数达 70 万人之多,其中,35%是纺织工人,35%是金属制造工人,20%是矿工。而在业工人的工资普遍下降,在纺织工业中工资降低了 30%,有的行业中工资降低了 50%至 60%。与此同时,财政危机也日趋严重,破产的银行数不胜数,仅巴黎一地,1845 年就有 691 家破产,1846 年 8 月到 1847 年底又有 1139 家宣告破产。国家的财政赤字高达预算总额的 25%,即 24.7 亿法郎,到 1848 年初,国家的短期债务已达 63 亿法郎。

财政危机使基佐政府信誉扫地,官场腐败日趋严重。在众议院中几乎有 3/5 的议员是内阁的亲朋好友,许多政府官员还和金融贵族相互勾结,例如,在众议院中,多数派的议员,甚至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一方面以立法者身份迫使国家投资公司,另一方面以股东身份参与这些公司活动,实行官商勾结,从中大肆贪污受贿。一些贪官民愤极大,政府被迫查办。

总之,到 40 年代末,法国的农业危机、工商业危机、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交迭在一起,不仅产生了一大批新的失业者和饥饿者,而且也使中小资产阶级陷于困境之中,连大资产阶级也感到焦急不安,这就彻底动摇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社会各阶层的反抗]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引起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反抗。工人罢工运动成倍增加,尤其在外省,无力购买面包的工人不断举行罢工。据不完全统计,1847 年 5 月,在雷恩、图尔、内韦尔、里尔和北部各城市的工人都进行了罢工斗争,夏托鲁的铁路工人用他们手中的工具作为武器,冲进小麦市场,1847 年 7 月,南特市的泥瓦工人罢工持续了 3 个月之久。因歉收和抵押债务而造成饥饿的农民,也掀起了抢粮风潮,他们捣毁地主的庄园,强占粮店,打死粮食投机商,顿时,在全国出现了“面包骚动”,反七月王朝的工农运动日趋高涨。

陷于困境的中小资产阶级和因工厂倒闭而遭到打击的工业资产阶级,对七月王朝的腐败统治也表示强烈不满。小资产阶级共和民主派领袖赖德律·罗兰在众议院中公开指出:“我们的工业、商业、金融信贷处于惊人的危难状态之中,甚至可以说是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这是谁的过错呢?应该把责任归咎于谁呢?应该归咎于这个沉重地压在我们头上十六年之久的制度”!政府反对力量迅速发展并形成不同的派别,提出各自的主张:

以梯也尔和巴罗为首的部分巴黎大资产阶级和一些议员,要求扩大选举权,进行社会改革,改变七月王朝政府支持和追随神圣同盟的对外政策,恢复法国在外交上独立而光荣的地位,但他们并不反对君主制,故称王朝反对派;以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为首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因以《国民报》为活动中心,故称《国民报》派),鼓吹共和思想,反对七月王朝的君主制,极力主张社会自由和经济自由,强烈要求政府保护关税制度,反对跟外国竞争;以赖德律·罗兰为首的广大小资产阶级(以《改革报》为活动中心,故又称《改革报》派),不仅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共和国,而且坚决主张实行某些社会经济改革,赞同劳动权利和改善劳动条件,实行普选权;还有以布朗基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他们周围是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积极主张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建立社会共和国。尽管各派政治主张和阶级立场不同,但不满七月王朝的专横统治却是一致的,因此它们暂时联合在一起。

二、二月革命的胜利

[宴会运动] 反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各派社会力量，共同投入了进行选举改革的运动并以举行宴会为活动方式，抨击朝政，要求政府放弃过高的选民财产资格限制，改变金融贵族独霸政权的局面，以便工商业资产阶级挤入政坛，分享政权。而无产阶级则希望改善生活，实现劳动权。这种具有政治内容的群众性聚餐活动，史称“宴会运动”。1847年7月9日，大资产阶级代表、自由主义律师巴罗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宴会运动，有1200名各界知名人士应邀出席，其中包括84名众议院议员。会上慷慨陈词，一致要求政府进行选举改革，并向政府提呈了实行选举改革的请愿书。接着，在外省许多城市相继出现了宴会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到10月，在科尔马、斯特拉斯堡、苏瓦松、圣康坦、莫城、第戎等地都举行了宴会运动。其参加者不仅有社会主义者、城市平民、小企业主、手工业者、富裕的农民代表，而且有市镇长、区参议员、国民自卫军高级军官的检察官等，到11月，宴会运动具有更明显的政治色彩，11月7日，赖德律·罗兰在里尔举行的宴会上，重新树起了共和国的旗帜，12月25日，《改革报》派的主要领导人在鲁昂举行了外省的最后一次宴会。就在这样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举行了70次宴会，至少有1.7万人参加，宴会运动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广大工人举行的宴会，他们不只限于改革选举制度，而是公开号召起来革命，以推翻七月王朝的统治。

七月王朝反对一切宴会运动，拒绝任何改革。路易·菲力浦公开指责宴会运动是一种“极端错误的盲目热情”，并于9月19日，任命基佐为议会主席，12月28日，基佐在众议院会议上公开讥讽说：“诸位先生，快快去发财吧。发了财你们就可成为选民了”。统治阶级的反对态度，激化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工商业资产阶级与金融大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们决心举行更大规模的宴会，以掀起争取选举改革运动的新高潮，因此，宴会运动成了二月革命的导火线。

[二月革命的胜利] 基佐政府眼见宴会运动将威胁金融贵族的统治，因此，转而采取禁止和镇压手段，自由资产阶级原定1848年1月19日在巴黎举行宴会，却被政府下令禁止，于是被迫改为2月22日举行，同时准备在这一天组织一次和平的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破坏集会自由。但是，到2月21日，政府又宣布禁止宴会，自由派资产阶级害怕政府的高压政策决定退让、屈服，取消了次日的宴会，而人民群众却愤怒万分，决心投入斗争。

1848年2月22日清晨，1000多名巴黎的工人、大学生和手工业者冒着大雨，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承认集会自由的权利，并来到指定地点马德兰广场上集合。到11点稍后，3000多人组成的示威游行队伍高唱《马赛曲》，高呼“改革万岁！”“打倒基佐！”的口号，向波旁宫进发，他们冲过保安警察的封锁线，来到波旁宫的前厅，其中有一些大学生向激进的众议员马利和克莱米约递交了请愿书，随后继续向巴黎塞纳河右岸地区前进。到下午，游行示威队伍已挤满协和广场、香榭丽舍大街、马德兰广场、卡普茨林荫大道、外交部前、交易所罗亚尔宫和巴士底广场。当日晚，游行示威的工人群众开始商议筑起街垒的计划，尤其是聚集在圣—马尔坦大街、圣—德尼等大街的示威者，他们夺取了警察分局中的武器准备起义。

2月23日早晨，工人群众继续冒雨举行游行示威，政府准备镇压，内政

部长已拟好一份逮捕者名单，其中包括 150 名著名的民主人士、新闻记者和被推测为秘密社团的活动分子，陆军部长下令从外省调集援军，并派出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安扎在协和广场、市政厅和杜伊勒里宫花园。但是，大部分国民自卫军没有按照命令到达守卫据点，其中有一部分主张改革、同情革命的国民军不但拒绝战斗，反而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称兄道弟，甚至有一个军团竟向议会递交了要求基佐辞职的请愿书。上午 7 时，革命群众在市政厅区跟政府军开始了激烈的巷战。武装起义的爆发和国民自卫军同情革命的消息一传到王宫，国王路易·菲力浦就惊慌失措。下午，他匆忙将基佐免职，以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同时又授权莫莱组阁，希望自由派中这个享有声望的人物能帮助他平息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

基佐垮台和莫莱组阁的消息传出后，资产阶级反对派欢欣鼓舞，张灯结彩、以示庆祝。许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四出活动，劝说人民停止战斗。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已决心与七月王朝斗争到底，他们响亮地回答说：“无论莫莱或者基佐，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起义人民仍手持武器，守卫街垒。晚上，当起义人民向基佐的住宅推进时，遭到了军队的袭击，当场有 6 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这一血腥事件立即传遍全城，激起全体市民的无比愤怒，他们手持火炬，连夜抬尸游行，沿巴黎工人住宅区缓缓前进，成千上万的工人、手工业者、大学生、妇女和儿童以及由布朗基及其共和派左翼秘密协会所领导的 4000 多工人都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反七月王朝的战斗，他们连夜赶制子弹，修筑新的街垒。至 24 日晨，巴黎东部 1/4 的地区都筑起了街垒，全市街垒总数达 1574 座。此外，起义人民还攻下了科学院和工业部的哨所，并将它们和杜伊勒里宫附近的兵营一起焚烧了。随着起义形势的急剧发展，国王路易·菲力浦赶忙一方面任命梯也尔和巴罗共同组织新内阁，以稳定资产阶级和国民自卫军的情绪，另一方面又授予比若元帅军队指挥权，以屠杀起义人民。《改革报》编辑部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发表声明：“公民们，路易—菲力浦像查理十世一样地杀害我们，我们也让他像查理十世那样倒台吧！”

从 2 月 24 日开始，起义人民在革命家科西迪耶尔和拉斯帕伊的领导下，展开全面进击，努力占领市政厅、兵营、广场和哨所等主要据点，并迅速控制巴黎所有战略据点，阻截从外省调来支援政府的军队。到中午，在巴黎的政府军纷纷倒戈，起义人民高举红旗，在“打倒梯也尔！”“打倒巴罗！”“打倒路易·菲力浦！”“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占领市政厅，并向杜伊勒里王宫进攻。下午 1 时半，路易·菲力浦见大势已去，慌忙宣布退位，立其 9 岁的孙子巴黎伯爵为国王，其母亲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王，自己与王后一起匆忙乘坐马车，逃出巴黎，不久流亡英国。起义人民占领了杜伊勒里宫，把国王的半身铜像抛到窗外，把国王的宝座搬到巴士底广场上的烈士纪念柱前焚烧了。下午 4 时，群众来到波旁宫，冲进议会厅，登上讲台，高呼“打倒议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并且庄重地宣布：“既不要国王，也不要摄政王。共和国万岁！”驱散了立法议会，七月王朝终于被推翻，二月革命获得了胜利。

在这次革命中，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有 350 人牺牲，500 人受伤，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顽强的斗志，通过武装起义的手段，推翻了七月王朝的统治，并挫败了奥尔良公爵夫人在波旁宫宣布摄政的企图，粉碎了资产阶级保留君主制的阴谋，迫使曾主张摄政统治的拉马丁等人倾向共和一边，

保证了二月革命的最终胜利。

[临时政府的组成] 正当革命人民在焚烧王座、驱散立法议会之时，资产阶级共和派议员拉马丁和赖德律·罗兰等人匆匆离开波旁宫，来到市政厅，拟定出临时政府人员的名单，在当晚——2月24日晚上，就乘机宣告临时政府成立。临时政府由11人组成：临时政府主席是81岁的杜邦·德·累尔，他从督政府起历任议员，属右翼资产阶级共和派。因年事已高，不掌实权。外交部长拉马丁，是一位诗人和历史学家，同属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他实际上是政府首脑。司法部长是著名的律师克莱米约、海军部长是享有世界声誉的天文、物理学家阿拉贡、公共工程部长是律师马利，财政部长是股票经纪人加尔涅—帕热，国民报的主编马拉斯特任不管部长，他们都属右翼共和派，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大名鼎鼎的律师赖德律·罗兰任内政部长，《改革报》的主编、政论家弗洛孔为不管部长，这两人属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由于工人的努力，临时政府中也有2名工人代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和机械工人阿尔伯。由此可见，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重要的职位都被资产阶级所占据，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入了资产阶级的手中。

资产阶级为什么能如此轻而易举地掌握政权呢？其主要原因是：第一、革命前，这些资产阶级共和派都是社会名流，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威望。第二、这些人物都曾反对七月王朝，主张改革，积极参加宴会运动，从事各种宣传活动，因而一时得到群众的信任。第三、资产阶级共和派在当时乘机抢先公布临时政府成员名单，并宣布成立临时政府，造成既成事实。第四、广大无产阶级还深受路易·勃朗阶级调和论的影响，无力领导和组织新政权，相反却对资产阶级共和派抱有幻想，加上当时无产阶级与工业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还隐藏在反对七月王朝斗争的外壳之下，工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面目还未彻底暴露，所以工人也乐意支持临时政府的组成。

这个表面上由各阶级的代表联合组成的临时政府，实际上它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内部两派——资产阶级右翼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相互间妥协的产物。这样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政权，虽有工人代表参加，也只能起麻痹群众的作用，无产阶级很难得到实际利益，所以，新的阶级搏斗不可避免。

第二节 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

一、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的确立

[共和国的成立]资产阶级窃取政权后，就开始暴露出对无产阶级的敌视态度，他们把直接领导起义的人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再次把自己的代表安插在临时政府内，分别担任外贸部长、公共教育部长和陆军部长。竭力阻止革命继续发展，有意拖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普遍要求。临时政府中的右翼分子根本不想成立共和国。于是，巴黎工人重新投入斗争。

2月25日，革命家拉斯帕伊医生率领工人代表团来到市政厅，以全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这个命令在2小时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前来“质问”。当时，街垒尚未拆除，起义工人手中还握有武器，可以随时把他们推翻。临时政府在工人的强大武装面前，出于策略考虑，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巴黎墙壁上到处出现了显目的大字：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共和国。

[共和国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武装工人的逼迫下，临时政府除了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外，还连续通过了和无产阶级利益直接有关的法令，使共和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其中主要的有：第一、关于国旗。2月25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承认红旗为国旗，由于拉马丁的坚决反对，继续采用了三色旗，但临时政府却同意在旗杆上系上红色丝条，以象征革命。

第二、关于劳动权。临时政府迫于工人们的压力，宣布负责保证工人能够靠劳动维持生活，并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做。2月27日，临时政府为给失业工人安置工作而创办了国家工厂。国家工厂由公共工程部长马利直接领导、按半军事性的编制进行组织。它从3月2日到5月18日共招收了11.5万名工人，由国家发给工人微薄的工资。2月28日，临时政府向市政厅前要求组织劳动和成立劳动部的近2万名示威工人作出设立工人问题委员会的决定，并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任正副主席，临时政府还拨出卢森堡宫为会址，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有一个由10名工人、10名企业主和一些政论家、经济学家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调解劳资之间纠纷的仲裁机构。

第三、关于劳动日。在工人群众的强力要求下，临时政府于3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缩短工作日1小时，即巴黎的工作日为10小时，外省为11小时。

第四、关于普选权。3月2日，临时政府宣布废除选民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权，规定年满21岁的法国成年男子在一地居住满6个月的都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从而使选民人数从24万猛增到930万。3月5日，临时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发给当选的议员每天25法郎的津贴，此外，还颁布了即将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组织法令。

第五、关于民主、自由。这一问题，在临时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拉马丁和阿拉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只希望实行政治民主，而以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想通过一切手段来立即实现社会民主。最后，临时政府在工人群众的极力要求下，3月4日，取消了对出版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宣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从而在2月到6月之间，政治

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在巴黎和外省产生，仅巴黎就有俱乐部 300 多个，新的报刊达 283 份。政治俱乐部中影响最大的是左翼共和派的“人权社”、布朗基的“中央共和社”、巴尔巴斯的“革命俱乐部”、拉斯帕伊的“人民之友俱乐部”和卡贝的“中央兄弟会”等。3月19日，临时政府废除了债务囚禁法，接着又废除了政治犯死刑和恐怖制度，废除了贵族封号，取消了复辟王朝遗留下来的民事拘禁，撤换了一些人民最痛恨的官吏和法官，释放了政治犯。4月27日，临时政府废除了殖民地奴隶制，5月8日，宣布废除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资格限制，所有公民都可参加国民自卫军。此外，临时政府还公开声明欢迎各国的自由战士来巴黎避难。结果短时期内有上万名各国革命流亡者云集巴黎避难、定居。

第六、关于经济。临时政府采取了货币流通的强制手段，3月7日，重新开放巴黎交易所。3月10日，提高了储蓄银行4—5%的利息，3月31日，实行了酒税改革。4月，取消了盐税。另外，临时政府还鼓励巴黎和外省创办贴现银行。

所有这些共和国的社会经济政策，都是工人在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是资产阶级掌权的临时政府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在当时既看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又还没有作好同无产阶级进行决斗的准备。事实上，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让步的同时，却在积极准备向工人进攻。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阴险毒辣的反工人措施：

首先，他们不断强化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2月26日，临时政府宣布建立一支由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的2.4万人组成的24营“别动队”，这是一支享有高额薪金、穿着特制服装的警察武装，成为资产阶级的可靠支柱。此外，充实官僚机构，大量起用旧时的达官贵人，以加强权力机构，准备对付无产阶级。

其次，在工人中败坏社会主义声誉，瓦解无产阶级斗志。临时政府一边把失业工人大量安置到“国家工厂”工作，一边则把失业工人，不管其原来有何技术特长，一律安排植树、刷墙、挖土、修桥、铺路等简陋而繁重的粗活，并且故意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向工人挖苦说，你们不是要社会主义和劳动权吗？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劳动权，从而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

第三，挑拨中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临时政府为维护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于3月9日颁布法令，规定减少储蓄银行的现款支付，凡是提取存款超过100法郎者，一律付给贬值的国家证券。这就严重损害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存户的强烈不满和对共和国的愤恨，而政府却宣传说，国家需要把钱用于维持“国家工厂”，从而挑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不满。

第四，更其恶毒的是离间工农关系。3月1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一条极为反动的法令，规定对农民所缴纳的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4种直接税，每法郎增加45生丁的附加税。税收的增加，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极度不满和反抗，许多省、区，出现了农民愤怒殴打并赶走税吏的暴烈行动。而资产阶级却说增加税收是为了养活“国家工厂”的工人，为了使工人能搞“社会主义”。这样，在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的附加税。巴黎无产阶级就是专靠他们出钱而逍遥享乐的消费者，受到欺骗的农民对工人和社会主义产生不满，使无产阶级在行将到来的搏斗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3月17日和4月16日的示威游行] 资产阶级在作完上述种种准备后，

认为自己的阵脚渐渐巩固起来，便对无产阶级一步步加强进攻，他们决定在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以便成立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新政府，实现其独占统治。无产阶级在继续受苦的切身感受中，开始朦胧地认识到这个“共和国”并不是工人理想中的“社会共和国”，因此，在街头张贴布告，宣称“我们的不幸应归咎于自私和短见的政府”，表示“还不能放下武器”。这样，无产阶级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展开了。

3月17日，布朗基派组织了15万人集合在革命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唱《马赛曲》和《吉伦特之歌》，向市政厅进军。工人们最初的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在必要的时候，把资产阶级阁员排除出去，并使制宪议会的选举延期举行，军队撤出巴黎，以便无产阶级作好选举的充分准备。但是，游行的前一天，资产阶级为了先发制人，出动了3万忠于他们的国民自卫军，举行游行，并在巴黎街头高喊“打倒赖德律·罗兰！”企图改组政府，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赖德律·罗兰排挤出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3月17日示威的工人群众不得不喊出：“赖德律·罗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的口号。工人们为了打退右翼的进攻，只得暂时保护他们认为是处于危急中的共和国，因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而临时政府则同意将原定4月9日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延期两星期。

4月16日，10多万工人再次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劳工联合会”，并且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将要举行的选举问题。可是，资产阶级却趁机造谣说：“共产主义者要造反”，甚至胡说10万工人将进攻市政厅，建立共产主义政府。临时政府立即发出警报，在市政厅结集大批别动队、国民自卫军和其他武装与工人对抗，到处呼喊：“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卡贝！”“打倒布朗基！”“打倒拉斯帕伊！”游行队伍被武装部队冲散，政府还把几个团的正规军调进巴黎，准备镇压。

3月17日和4月16日事件，表明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既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又暴露出它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结果使自己失去了优势，使资产阶级趁机加强了自己的阵地。

二、六月起义

[制宪议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反动]资产阶级加强自己的力量后，就在4月23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880个议席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得550席，君主派占212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了100席，而工人代表只得了18席，甚至连布朗基、卡贝等工人领袖都落选了，面对即将上台的右翼势力，工人们极度不满，4月26日，鲁昂、里摩日等许多城市爆发武装起义以示反抗，结果惨遭屠杀，11人被打死，81人受伤，近100人被捕和判刑。布朗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政府的背叛行径，并表示“人民流的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这说明两大阶级间的搏斗已经临近。

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临时政府宣布解散。5月10日，由议会秘密选出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作为国家行政首脑。5人中有4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拉马丁、阿拉贡、加尔涅·帕热和马利，只保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罗兰作为点缀品。工人代表全都被排挤出了政府，实行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所争得的名义上的“社会共和国”已经化为乌有。

执行委员会还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内政方面，它否决了设立劳动部的提案，通过了禁止人民集会请愿，只准递交书面请愿书的决议。对外政策方面，它秘密勾结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反动统治者，支持他们镇压波兰等国的革命运动。

为了声援波兰人民的革命斗争，巴黎15万工人于5月15日上午举行了游行示威，大批群众在巴黎俱乐部联合会主席于贝尔领导下，高呼“波兰万岁！”“共和国万岁！”冲进议会大厅，派出拉斯帕伊、布朗基、巴尔贝斯等5名代表，在制宪议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政府将正规军调出首都，并组织一支远征军开赴波兰援助起义的人民，还建议向富人征收一种特别税，来支付声援部队的一切费用。这些要求遭到政府拒绝，愤怒的示威群众坚持斗争到下午4时，也不肯退出会场。政府已下令发出总集合警报，准备镇压。在这关键时刻，于贝尔突然登台讲话，大声宣布：“公民们！国民议会拒绝对人民作出答复！好吧！我现在以被他们的代表愚弄的人民的的名义，宣布国民议会解散！”随后，示威群众又冲向市政厅，在那里宣布成立由巴尔贝斯、布朗基、阿尔伯、科西迪耶尔、路易·勃朗等人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布朗基等人并不主张这种盲目行动，他没有到市政厅去。资产阶级立即调来军队包围了市政厅，逮捕了巴尔贝斯和阿尔伯。接着，拉斯帕伊、布朗基等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遭逮捕，共约400多人被捕，“中央共和社”等许多俱乐部被查封。马克思惋惜地指出：“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徒劳无益地试图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

资产阶级向革命人民步步紧逼，5月16日，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卢森堡委员会。5月17日，执行委员会任命屠杀北非人民的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卡芬雅克为陆军部长，他调集大批听其驱使的军队进入巴黎。6月7日，颁布严厉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6月15日，议会成立了一个由保王党人和极其温和

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研究解散国家工厂问题，6月21日，政府悍然颁布了解散国家工厂的正式法令。规定凡年满18—25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余工人全部发往外地垦荒或作其他苦役。并扬言：拒绝服从命令者，将以武力对付。这一反动法令把10余万国家工厂的工人逼上绝境，成了六月起义的导火线。

[六月起义]解散国家工厂的法令公布后，工人们认为这是政府对公民和人身尊严的侵犯，曾派代表向政府交涉，要求放弃这一无理决定。可是，马利代表执行委员会公开威胁工人说：“如果工人不愿意自动离开，我们就要用武力把他们赶出巴黎”，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得起而斗争。6月22日整天，成千上万的工人拥上街头，举起红旗，高唱《马赛曲》，高呼：“打倒马利！”“打倒国民议会！”“我们决不去外地做苦工！”大街上游行的人群川流不息。晚上10点，中央共和社理事布若尔，在火把照明下，向示威群众讲话，号召工人必须加紧构筑街垒，拿起武器准备战斗。工人们一夜之间就筑起600多个街垒，布满了巴黎的东半部。街垒顶端插着红旗，旗帜上写着：“不能劳动而生，毋宁战斗而死！”“民主的社会共和国万岁！”“全部企业社会化！”“打倒人剥削人的制度！”充分反映出六月起义的无产阶级性质。

6月23—26日，两大对抗阶级间的伟大决战在巴黎展开。这是巴黎无产阶级第一次自发斗争，它既没有革命政党的领导，又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统一的指挥部。领导六月起义的是在各街区作战的各个街垒指挥员，他们彼此之间没有足够的联系。这些人多是革命俱乐部的活动家和国家工厂的干部或工人代表，其中著名的有机械工人拉卡里，曾参加过工人秘密团体，多次领导过罢工运动。在六月起义中他领导孚日广场的保卫战，表现出巨大的毅力，成为起义工人的好带头人。青年机械工人巴特来米，曾参加过秘密的“四季社”，是另一区街垒战的出色指挥员。担任社会主义报纸《劳动组织》的编辑和圣安东郊区一个俱乐部主任的拉卡隆日，在起义中也起了重要作用，当起义工人占领第八区后，一度担任该区区区长职务。

尽管在起义中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中心，但起义仍有相当的计划性，这次起义的军事行动计划是由“人权社”行动委员会主席、退伍军官盖尔索济制订的。他曾是30—40年代著名的革命家。根据盖尔索济的作战计划，起义工人应分四个纵队四路集中进攻市政厅、杜伊勒里宫、波旁宫以及其他政府大厦。各纵队的作战基地应该是塞纳河左右两岸郊区工人的居住区。恩格斯曾肯定了 this 作战计划，同时也指出它的缺点是完全没有注意到巴黎西部资产阶级住宅区内也有工人集中的居住点，如果在这里安置第五个纵队，既可切断市政厅的交通，又可在这个突出的据点附近箝制敌人的大量兵力，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后来的事实证明，恩格斯的批评完全正确，起义军的防线就是从这里突破的。

6月23日清晨，起义工人与政府军队之间的战斗开始了。参加这场伟大决战的有男女老幼广大劳动群众，其中有参加过里昂工人起义的多次冲锋陷阵的老工人，也有刚满20岁的年轻工人，有76岁高龄的老女工，还有不满10岁的儿童，他们都齐心协力投入殊死的街垒战。第一次激战是在巴黎东北郊的圣丹尼林荫路和克列里街一带展开的，起义工人多次打退敌人的反扑，

出现了许多动人的事迹。在克列里街的一个街垒战中，街垒的守卫者只剩下7个男人和2个姑娘。他们仍顽强抵抗，英勇不屈，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人，街垒才被敌人占领。

激烈的巷战继续到深夜，起义者的队伍已发展到5万人，每个街垒都由同一行业的工人分段负责，进行严密的防守和进攻。

6月24日上午，起义者先后攻克了第八区和第九区之公署，市政厅岌岌可危。到中午，起义者占绝对优势，资产者一方面假装与起义者谈判，而工人果然受骗跟卡芬雅克部下的杜维埃将军谈判，给反动派以喘息之机；另一方面，执行委员会宣布辞职，授予卡芬雅克独揽军政大权，准备大屠杀。卡芬雅克随即宣布巴黎戒严，继续调进大批军队，总计达25万反革命武装，然后用霰弹、榴弹、燃烧弹等野蛮地轰击起义者的街垒、居民区及一切公共建筑，疯狂屠杀起义工人。

这一天，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下午3时，距市政厅不远的花河沿街地段，600名起义者占领了有名的“丽人”服装店，并把它变成坚强的街垒，进行无比英勇的抵抗，有80名工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到晚上，反动派逐步占优势，但起义者仍坚守着全城68个街垒。

6月25日，斗争愈来愈紧张、残酷和猛烈。以卡芬雅克为头子的刽子手们，集中了40门大炮，向起义者占领的克洛—圣拉查尔、坦普尔和圣安东三区，整整轰击了一天，工人们沉着应战、毫不动摇。到了傍晚，起义者被迫退出市区。

6月26日，进入了最后的决战，反动派向起义者的最后阵地圣安东郊区发起总攻。这里是巴黎多次起义的真正策源地，筑有特别坚固的街垒和巧妙的工事，敌人要攻取这些街垒是十分困难的。反动头目先是诱降，后是亲自督战。内政部长、巴黎副市长、国民议员先后到营地督阵。起义工人在敌人的重炮猛攻下，坚守阵地，宁死不屈，但终因寡不敌众，到黄昏时刻，最后一个街垒被攻陷，六月起义经过整整五天的英勇战斗而被残酷地镇压了。外省的许多城市，如鲁维埃、第戎、波尔多、南特、亚眠等地曾纷纷起义声援巴黎工人，也都遭到反动派的野蛮镇压。六月起义的失败是必然的，因为在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无产阶级还远远没有成熟，不具备革命胜利的主客观条件。

六月起义失败后，卡芬雅克继续采取镇压措施，枪杀工人达1.1万多人，逮捕、判刑、流放者共约3万人。但是，六月起义的战士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崇高品质是可歌可泣的。

三、资产阶级共和派统治的终结

[卡芬雅克的统治]六月起义被镇压后，一切社会和民主共和国的希望都随之成了泡影。政权完全落到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手中。6月28日，“血腥亲王”卡芬雅克被批准为“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的首脑”。卡芬雅克掌握了由制宪议会授予的权力后，便不顾一切地实行了一系列极其反动的政策。卡芬雅克两次改组内阁，从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营垒中挑选最反动的分子充当各部部长，使共和派中的保守分子占据政府各部部长和一切重要职位，在法国确立纯粹共和党人的统治。他在巴黎安插一支8万人的军队，实行恐怖。同时，建立军事法庭，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决治罪。还成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六月事件和五月事件中社会主义党派、民主主义党派的领袖们的行为，监禁了阿尔伯、布朗基和拉斯帕伊。与此同时，卡芬雅克为了博得君主派和教权派的欢心，不仅放弃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经济纲领，恢复了七月王朝的财政制度，而且颁布了许多反动透顶的法令：7月3日，下令取消铁路国有计划，否决由临时政府拟定好的资本课税方案。7月11日，恢复对报纸出版社征收高额税金。7月28日，规定俱乐部必须受警察当局的严密监视。8月9—11日，限制出版、集会自由。8月24日，严格制订邮政制度。8月底，正式批准施行45生丁附加税法令。9月，取消缩短工作日一小时的法令，工作日又延长到12—14小时。此外，宣布反对债务延期，恢复债务囚禁法。这就引起了广大农民和工人群众的极大不满和坚决反抗，约有23个省出现了暴动，反对卡芬雅克的倒行逆施政策，尤其是反对征收附加税。共和国已经威信扫地。

[1848年宪法及其特点]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从法律上巩固自己的统治，匆忙进行制宪工作。早在5月，议会就成立了制宪委员会，拟定宪法草案。8月底，起草完毕，9月到10月底，议会逐条讨论，争论激烈。11月4日，制宪议会投票表决。资产阶级共和派以739/30的绝对优势通过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宪法，即1848年宪法。宪法规定法国为议会制共和国，是民主的、团结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为其原则，家庭、劳动、财产、秩序为其基础。这部宪法的最大特点是把总统的权力规定得很大，近于国王的权力。这是因为：卡芬雅克估计到自己能当上总统，又渴望运用总统的权力与民主势力相抗衡。所以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享有任免部长、官吏和法官，支配军队，领导外交等广泛的权力，而且总统的权力不受议会约束，不受任何制约。宪法还规定议会实行一院制，享有无上权力，不受总统监督，也不受总统解散，有立法、宣战、媾和、批准条约等权力，议会通过的决议总统无权废除。这实际上规定了两个彼此不相隶属的权力机关——总统和议会，使总统和议会之间潜伏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孕育着对共和国的严重危险。

宪法规定总统由普选产生，四年改选一次，不得连选连任。议会由750人组成，三年改选一次。凡年满21岁，在本区居住6个月以上的男子享有选举权。并规定人身、出版、言论、结社、集会、教育、信教等等自由不可侵犯，但必须接受国家监督，并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同等权利和公共安全为前提。

[总统选举]1848年11月21日，宪法正式颁布。议会根据宪法决定于12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当时，各派提出了六个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选举结果是路易·波拿巴出人意料地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占总票数75%的压

倒多数，战胜了卡芬雅克。波拿巴登上总统的宝座，显然是违反 1848 年宪法的。宪法第 44 条规定，凡丧失过法国公民资格的人是不能当选总统的。波拿巴不仅丧失公民资格，加入瑞士国籍，还充当过英国的特别警察。然而，这样的人却居然当上了法国的总统。

波拿巴当选为总统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就客观原因论，则完全是由当时法国阶级斗争的情势决定的。六月大屠杀把无产阶级赶下了民主斗争的舞台，引起了广大工人对卡芬雅克的仇恨，从根本上动摇了共和派的统治。共和派的反动税收政策则严重地损害了广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自然引起他们的反对。至于大资产阶级中的保皇派，他们为了拥护君主政体，也本能地反对共和派。当然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对拿破仑的怀念和迷信，就把希望自愿地寄托在拿破仑的侄儿身上，广大小农把波拿巴看作自己利益的化身，终于投了波拿巴的票。另外，卡芬雅克对君主派和教权派过分的、公开的卑躬屈膝，引起了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愤恨，从而使卡芬雅克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丧失了一部分选票。就这样，各个阶层怀着不同的目的，都投了波拿巴的票，使他获得了绝对多数票的支持当上了法国的总统。

但是，波拿巴之所以能够当上总统，也不应忽视他个人的作用，他善于采取欺骗、引诱、收买、恐吓和暴力等种种手段为己所用。为击败自己的劲敌——卡芬雅克，波拿巴在竞选宣言中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超党派”的人，自吹为其伯父拿破仑一世的继承人，是“民族统一”的坚决维护者，并且还向所有各阶级提出了煽动性的纲领，许下了诱人的诺言：答应为资产阶级“捍卫社会秩序，实现对外和平”；答应给天主教徒“信教自由”；向工人保证“消灭失业”、“大赦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向农民保证“减轻赋税”、“保护小土地私有制”，以“消灭贫困”；并用“低息贷款”来安抚小资产阶级，等等。但在暗地里，波拿巴四处活动，发展其党羽势力；勾结君主派和教权派；收买莫莱和梯也尔，重用心腹佩尔西尼，利用保王的“普瓦蒂埃街委员会”，为自己效劳；并且不惜大量金钱，不仅自己花去了 30 万法郎，而且还从英国的一个银行经理那儿提取了 100 万法郎，来创办报刊、发行小册子、填谱作曲等为自己的竞选大造舆论，战胜对手。

路易·波拿巴被推上法国的政治舞台，这就结束了卡芬雅克的统治，它表明资产阶级共和派已经失去法国大多数人的信任，包括大资产阶级自己。这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共和国被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共和国所代替，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失败的开始，预示着一场新的权力之争，建立新独裁的复杂斗争将不可避免。

第三节 资产阶级保守派的统治

一、保守派统治的确立

[秩序党内阁]波拿巴一上台，就一心一意想实现个人独裁的野心。但在当时，资产阶级共和派仍然占据着内阁和议会，拥有很大的势力；而统称为秩序党的波旁王朝和奥尔良王朝这两个君主派集团也还有很大影响。因此，波拿巴要搞独裁统治，恢复帝制，就必须首先打击共和派，然后才能清除秩序党。为此，波拿巴在打垮共和派的过程中巧妙地利用秩序党。12月21日，波拿巴任命奥尔良派的首领奥迪隆·巴罗组阁。巴罗立即进行了国家机关的大清洗，清除了共和派、罗织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组成秩序党内阁。秩序党内阁成为二月革命以来第一个完全没有资产阶级共和派参加的内阁，新政府的领导权就从共和派手中转到了秩序党手中。紧接着，秩序党还控制了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查署和市政厅。12月26日，正统主义者尚加尔涅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最高指挥和巴黎卫戍司令，使军权掌握在秩序党手中。

随着秩序党权力的加强，12月29日，在巴罗指使下，内阁对议会发起进攻，迫使议会停止各项法律的制订工作。与此同时，波拿巴还利用秩序党跟共和派控制的制宪议会进行公开斗争，他们软硬兼施，于1849年1月29日用武力包围议会大厅，迫使共和派在2月14日解散了制宪议会。3月，秩序党内阁又对1848年5月15日举行示威游行的主要领导人向特别最高法院起诉，阴谋削弱革命力量。4月，阿尔伯、巴尔贝斯、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放逐，布朗基、拉斯帕伊等人被监禁。波拿巴和秩序党解散制宪议会和摧残革命民主力量后，就急忙准备定于1849年5月13日举行的立法议会选举。

[立法议会的选举]为了在这次选举中获得胜利，秩序党早在选举前夕就采取了种种手段，1月29日，他们逮捕了27名“共和同盟”的成员，随后强迫这一组织自动解散，并且化了20多万法郎在全国进行宣传、收买，控制了法国西部、北部和东部的选票。还控制了立法议会的选举程序，结果在参加选举的660万选民中，有330万选了秩序党，200万选了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组成的新山岳党，共和派只得了80万票。而在议会的750个席位中，秩序党得到450席，占绝对多数。新山岳派得180席，共和派只得80席。共和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秩序党开始确立了议会专政，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共和国地地道道成为资产阶级保守派的共和国。

二、小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当权派的斗争

[立法议会中的反对派]1849年5月28日立法议会开幕,直到1851年12月2日被解散,此期间被称议会制共和国时期。在立法议会中,以赖德律·罗兰为首的新山岳党为反对秩序党内阁,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尊重别国人民的自由,实行直接普选,新闻完全自由,改革兵役和司法机构,取消盐酒税,废除45生丁税,修改土地税和营业税,征收纯收入的累进税等。新山岳党在立法议会中成为秩序党最大的反对派。

在对外政策上,两派开始发生严重分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关于进兵罗马共和国的问题。早在2月初,意大利人民在马志尼等人的策动下,剥夺教皇统治罗马国家的世俗权力,正式宣告成立罗马共和国。在教皇的请求下,波拿巴和秩序党决定派兵进驻罗马共和国,干涉意大利革命。4月30日,由乌迪诺将军率领法军对罗马共和国发动第一次进攻,6月3日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对此,只有新山岳党人坚决反对法军干涉意大利革命。6月11日的立法会议上,赖德律·罗兰强烈指控波拿巴总统出兵罗马的举动违反了宪法,因为宪法第5条规定禁止使用共和国军队侵犯他国人民的自由。第54条又规定,禁止行政机构不经议会同意就宣布战争。因此,对波拿巴及其部长们提出了弹劾案、提议将他们送交法庭审判,并且表示不惜用武力来保卫宪法。第二天,这个弹劾案被议会否决了。于是小资产阶级的新山岳党议员退出了议会,决定6月13日举行游行示威。

[6月13日的游行示威及其后果]6月13日早晨,巴黎的民主派报刊发表宣言,强烈谴责共和国总统、政府部长和大多数国民议员违反宪法的行为,公开要求所有公民为捍卫宪法起来斗争。中午,在新山岳党议员的带领下,约有1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新山岳党万岁!”“宪法万岁!”“罗马共和国万岁!”宣布共和国政府和总统“不受法律保护”。结果遭到秩序党的镇压,尚加尔涅指挥军队轻而易举地驱散了游行队伍。赖德律·罗兰等32名民主派议员被剥夺议席,他本人匆忙逃往英国,至少有8名成员被逮捕,并受法庭审讯。新山岳党在议会中的力量被瓦解。

巴黎6月13日游行的被镇压,引起了外省许多城市的同情和声援,在里尔、亚眠、第戎、图卢兹、波尔多等地都先后举行了游行示威并与军警发生冲突,尤其是里昂在6月15日掀起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工人英勇奋起,坚持了6个小时的巷战后才被镇压,结果有150人伤亡,2000人被捕和受审讯。

6月13日事件的后果是严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丧失了议会力量和武装力量后,退出了政治舞台。秩序党取得了议会的独裁权力,最终确立了议会专政。波拿巴的威信大大提高。新山岳党力图将波拿巴交付法庭审判,结果是自己受到了审判。而新山岳党可怜的发动,却使大资产阶级感到更需要有一只强有力的手来保护他们,使他们不再遇到破坏秩序类似事件。所以,山岳党的失败,实际上就是波拿巴的胜利。

新山岳党遭致失败后,秩序党进一步加强对民主派的迫害,6月19日,颁布了禁止俱乐部和公共集会的法令。7月27日,颁布了严禁报刊自由出版的法令。《和平民主报》、《真共和国报》、《社会民主革命报》和《改革报》均被禁止出版。并且解散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驱逐在巴黎的外国政治流亡者出境。小资产阶级的这次游行示威并没有改变政府对罗马的政策,6月30日至7月3日,法军攻克了罗马,驱逐了马志尼等爱国者,镇

压了罗马革命，颠覆了共和国，拥护教皇复辟。

三、秩序党与波拿巴的斗争

[秩序党的矛盾与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在 1849 年 6 月 13 日的游行示威失败后，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就剩下了秩序党和波拿巴派，双方为争夺独裁统治展开了复杂的斗争。秩序党认为自己控制了立法议会，而且掌握着内阁和军权，就显露出狰狞的反动面目。他们力图恢复自己的王朝。8 月间，奥尔良派与逃亡英国的路易·菲利浦秘密勾结，进行恢复七月王朝的活动；正统派跑到爱姆斯去参拜自封为亨利五世的尚博尔伯爵，企图复辟波旁王朝。他们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活动，到处串连，煽动各省省长，要求修改宪法，搞君主复辟。但是，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在下届总统的候选人问题上矛盾十分尖锐。为期待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派，坚持让查理十世的继承人、亨利五世尚博尔伯爵当总统候选人。而奥尔良派则打算推儒安维尔亲王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双方争执不下。

秩序党内部的这种矛盾给波拿巴创造了培植其党羽和乘机进攻的良机。1849 年 8—9 月，波拿巴到外省作了隆重的巡游，以扩大自己的势力，笼络民心。9 月底，成立了由巴黎流氓无产者拼凑而成的“十二月十日社”，共 1 万人，他们随驾陪行，装作迎驾的群众，沿途以人民的身份，欢呼“皇帝万岁！”并且还企图暗杀秩序党人和军队的领导人。11 月 1 日，波拿巴交给立法议会一份咨文，通知它已经命令受秩序党控制的巴罗内阁辞职，任命奥普尔组阁，又委任富尔德为财政部长。富尔德是著名的金融寡头，波拿巴把他拉入内阁使得金融贵族倒向自己一边。从此，秩序党不可挽回地丧失了对行政权力的领导，失去了维持议会权力的支柱，严重地削弱了它的议会权力；波拿巴的行政权力大大加强，也倍增了波拿巴下一步从秩序党手中夺取军队实权的信心。不过，波拿巴在采取这一步骤之前，耍弄阴谋，暂时与秩序党狼狈为奸，继续镇压一切民主活动，颁布一系列极其反动的法令，剥夺社会主义报刊的发言权，关闭俱乐部，而其中最突出的法令是，1849 年 12 月 10 日正式决定，从 1850 年元旦开始重新恢复二月革命废除的向农民征收的葡萄酒税，明文规定：不分酒质优劣，一律按税率征收，这就致命地打击了主要靠酿酒为生的小农。1850 年 3 月 15 日，又颁布了国民教育法，即法卢法案（法卢系教育部长，狂热的教权派。此提案由他提出而得名）。规定：凡属教士及教会教友，不论男女，均可担任教育职务，所有初等学校均归教区教士管理。这样，就把国民教育的领导权和监督权授予教会，教会在短时期内就设立了 250 多所中学，13 所大学。大批世俗小学教师被免职，教权派完全掌握了教育权。

[普选权的废除]为填补 6 月 13 日事件中新山岳党的一些人员被逐出立法议会的空缺，1850 年 3 月 10 日和 4 月 28 日，立法议会举行了两次补选。新山岳党在补选的 31 个议席中，得了 20 个。尤其在巴黎，民主派保持了 3 个席位。民主派在这两次补选中的胜利，引起了大资产阶级莫大的恐慌，更为即将进行的 1852 年总统选举担忧；而秩序党则认为这是由普选制所造成的。因此，企图取消普选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秩序党当即成立了一个由梯尔、贝利耶、福适等 17 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修改选举法。新选举法草案规定，凡在一地居住 3 年并能提交在同一地方纳税单据或主人证明者，方有选举权。5 月 8 日，福适把该草案经总统同意后以政府的名义送交议会审核。秩序党企图废除普选权的草案一提出，就立即激起了新山岳党的强烈不满，

掀起了激烈的宣传运动，坚决要求实行普选制。与它相呼应的共和派也在报刊上发起请愿运动，不到几天，就有 50 万人参加了请愿运动。尽管如此，1850 年 5 月 31 日，立法议会最后仍以 433 票对 241 票通过了废除普选权的法令。结果大量的流动工人、城市平民失去了选举资格，选民从 9,618,057 人减少到 6,809,281 人，即被剥夺了约 300 万人的选举权。

[议会与总统之间的争夺]普选制被废除后，波拿巴立刻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通过他的内阁向立法议会进行敲诈勒索，索取 300 万法郎的年金，并且威胁说，如果立法议会拒绝这个要求，那么，他就把立法议会取消普选制的犯罪行为诉诸人民。立法议会只好让步，拨出 216 万法郎送给他。波拿巴利用这笔钱在 7 月巡游了阿尔萨斯、布尔戈尼、里昂。9 月到了诺曼底等地，用金钱、美酒、雪茄烟、冷盘禽肉和蒜腊肠款待军官和士兵，以此收买军队，拉拢军心。1850 年 10 月 10 日，波拿巴又在萨托里进行了大检阅，检阅时，军队高呼：“拿破仑万岁！皇帝万岁！”表示支持。波拿巴虽然有了军队作靠山，但是根据宪法第 50 条规定：总统对军队有支配权，但不能亲自指挥军队。这就意味着只有当军队中最高指挥对总统俯首听命时，总统才能真正掌握军权。同时，也表明若波拿巴不掌握军队实权，就难以使自己的野心实现。然而，从 1848 年 12 月起，正统主义者尚加尔涅一直担任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和巴黎卫戍司令，是军队中的第一号人物。他既是秩序党在军队中的代表，又是立法议会调集军队保卫自己的执行者，更是波拿巴的仇敌。尚加尔涅曾说：“如果议会主席给我下一道逮捕总统的命令，我将送他到万森监狱。”因此，波拿巴为了夺取军队实权，就必须干掉尚加尔涅，由此可见，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冲突必然转化为两个权力之间你死我活的争夺。

为了尽快干掉尚加尔涅，波拿巴首先发起进攻，一方面利用爱丽舍的报刊攻击尚加尔涅。另一方面，采取狡诈手段，于 1850 年 11 月任命施拉姆将军为陆军部长。并于 1851 年 1 月 3 日，公然无视议会，撤销了尚加尔涅的两个要职。尚加尔涅被撤职使得许多部长大为震惊，甚至宣布辞职。而波拿巴乘虚而入，1 月 9 日，改组内阁，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任命圣让·丹热利为陆军部长，巴拉盖·狄利埃将军指挥巴黎正规军，佩罗将军指挥国民自卫军。这样，波拿巴最终夺取了军权，这不仅加强他的实权，扫除了对自己独裁统治的最大威胁，而且还加深了秩序党内部的矛盾。许多秩序党议员在失去了行政权和军权以后，眼见大势已去就脱离了这个党，甚至有 277 名成员还投入了波拿巴派的阵营。紧接着，秩序党又分裂为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这两派再分裂成许多小党派，彼此之间争吵不休，至此，秩序党丧失了自己在议会中占多数的优势。

波拿巴利用这种情况，进一步对立法议会发起了攻势，声称议会中不存在一个党派的多数，不能从分成几个部分的议会多数中组织新内阁。1 月 24 日，他宣布由不属于议会任何党派的人士组成新内阁，即组织议会外的内阁，超议会的内阁。议会对总统的行动无可奈何，而总统在和议会的争夺中力量越来越强。不久，他决定让这个内阁下台。4 月 10 日，波拿巴又组织了一个主要由他的忠实信徒富尔德、鲁埃等人组成的新内阁，一个“反议会”的内阁，使总统的个人权力更加集中。但波拿巴知道，对自己搞独裁致命的障碍便是 1848 年宪法第 45 条规定。根据这一条规定，总统不得连选连任。波拿巴的总统任期于 1852 年 5 月届满。到那时，他的权力将全部丧失，恢复帝制的梦想也将随之破灭。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波拿巴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

一是修改宪法，延长总统任期或取消总统不得连选连任的条款；二是采取暴力、实行政变、夺取全权。

第四节 波拿巴政变与第二共和国的终结

一、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

[政变的准备]1851年春，波拿巴就指使其党羽在全国掀起了要求修改宪法的请愿运动，并且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5月23日，有23名保守派议员向议会提出了全面修改宪法的提案。5月28日，议会对提案开始进行讨论。各个派别的态度不同。波拿巴派主张部分修改宪法，废除第45条或延长总统任期；正统派主张全面修改宪法，以取消共和国，恢复波旁王朝的统治；奥尔良派则分裂了，一部分主张全面修改宪法，另一部分则反对修改宪法；共和派坚决反对修改宪法，它的强硬态度使任何提案都得不到宪法规定的3/4的票数而得以通过。1851年7月19日，议会就修改宪法的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结果赞成票446张，反对票278张，未获得3/4的多数，提案被否决。修改宪法未成。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波拿巴的失败，实际上，却给波拿巴有了完全的行动自由。今后，如果波拿巴撕毁宪法，那么他的行动是合乎议会精神的，因为议会的多数赞成修改宪法；如果他解散立法议会，那么他的行动又是合乎宪法精神的，因为立法议会的多数要求修改宪法。因此，修改宪法未成反而为波拿巴发动政变作了准备。

修改宪法的提案被否决后，波拿巴急于诉诸武力，曾于8月中旬和9月中旬两次企图发动政变，只因其亲信认为具体措施、人员尚未安排就绪、时机不适等而被推迟。随后，波拿巴积极地为政变作具体的准备。为此，他巧妙地在1850年5月13日选举法案上大做文章，把通过这个不得人心的法律的责任完全加在秩序党和立法议会身上。9月底，波拿巴声称自己赞同取消5月31日的法律，10月10日，他向部长们宣布要废除这一法律，恢复普选权，故使内阁发生危机。10月26日，总统乘机组织了清一色的波拿巴派内阁，并于1851年11月4日，又向刚复会的立法议会递交一份咨文，要求废除5月31日法律，恢复普选权。如果秩序党反对他的提议，那么就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以此来加深秩序党和共和派、民主派之间的分裂，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反对他发动政变；二是以此来赢得群众的支持，使议会在人民中威信扫地，打击议会的权力。11月13日，立法议会讨论总统的提议，共和派、民主派和波拿巴派支持这个提案，秩序党反对，结果353票对347票否决了此提议。波拿巴的上述目的达到了。

与此同时，波拿巴作了充分的军事准备，以确保政变成功。1851年7月26日，他委任圣—阿尔诺为巴黎正规军最高指挥，10月27日，又改任他为陆军部长，任命莫帕为巴黎警察总监。并且下令波拿巴派的将军们把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4个步兵团和2个骑兵团调离巴黎，把驻非洲的军队调来补充，10月底，军队调动工作全部完毕。此外，波拿巴还从法兰西银行预支2500万法郎，从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处借来50万法郎，用作收买军官，笼络士兵。

至此，波拿巴的政变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毕。

[政变的经过]波拿巴眼看时机成熟，就不再拖延，跟其亲信一起策划，决定于1851年12月2日，即拿破仑一世取得光辉胜利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的纪念日发动政变。

为了迷惑人们，波拿巴于12月1日在爱丽舍宫举行盛大晚会。深夜，他

跟参加政变的积极分子：莫尔尼、佩尔西尼、圣—阿尔诺，莫帕和自己的副官德·贝维尔中尉在总统办公室召开会议，协商行动计划，会上决定立即行动，出动军队占领立法议会所在地波旁宫；进行大逮捕；把准备好的公告、告人民书和告军队书送交国家印刷厂印刷。

会后，波拿巴宣布巴黎实行特别戒严，莫尔尼自任内政部长，佩罗派遣亲信安置在各军团，监视任何军官的行动，圣—阿尔诺调集军团潜入首都，占领巴黎所有重要的战略据点，控制各区的钟楼和鼓楼，切断与外界的邮电联络，封锁重要的印刷厂和报社，包围波旁宫。

12月2日凌晨3—4时，莫帕下令各警察分局局长和800名士兵，分头进行大逮捕。计划逮捕78人，其中议员16人；7名山岳党人和梯也尔等3名奥尔良派人士。其余62名均是民主派的新闻记者、2月和6月的起义者。78名被逮捕者以“参加”威胁国家安全的阴谋罪，被关进莫扎监狱。约4时后，守卫波旁宫的指挥官厄斯皮拉斯上校被收买后，倒向政变者一边，并且集合士兵，下令紧闭议会大门。5时，波旁宫落入政变者手中，立法议会宣告解散。6时半后，早由德·贝维尔负责，强迫国家印刷工人印刷的公告，告人民书和告军队书已张贴在巴黎各街头。

公告的主要内容是：解散立法议会；解散行政法院；宣布巴黎戒严；废除1850年5月31日法律，恢复普选权；12月14日—21日举行全国投票，对是否同意路易·波拿巴的权力举行公民表决。

波拿巴在告人民书中指责议会是阴谋的巢穴，是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的祸根。扬言自己的义务是维护共和国和拯救法兰西。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满足人民的合法要求，再建第一执政所创建的制度。在告军队书中，波拿巴大肆夸奖军队是民族的精华，标榜他自己是人民主权的合法代表人。

到12月2日早晨7时，政变结束。波拿巴依靠暴力使政变获得成功，史称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反政变的展开] 波拿巴政变在巴黎和外省引起了各阶层的不满和反抗。在巴黎，12月2日上午，以自由资产阶级奥尔良派为主的200多名议员在第10区区政府聚会，秘密通过决定：解除波拿巴的总统职务，国家最高法院立即开庭审判总统及其同谋者，全部行政权转归议会掌握，任命乌迪诺将军为国民自卫军和巴黎正规军的最高指挥。试图借助法律的力量来抵抗波拿巴的政变，结果被马尼扬将军派来的军队所驱散，拘捕了不愿意离开会场的议员。秩序党议员的抵抗烟消云散。

新山岳党和左翼资产阶级共和派议员的行动比较坚决。他们立即召开秘密会议，指责波拿巴是叛逆，违反宪法，号召人民起来实行武装抵抗，并且还成立了由雨果、舍尔谢、卡尔诺、法夫尔等7人组成的“反抗政变委员会”。当晚，委员会就决定进行武装反抗。12月3日上午11时，一些共和派议员走遍圣—安东郊区，高呼“宪法万岁！”“共和国万岁！”号召人们拿起武器，建筑街垒，一度与军队发生冲突，共和派议员博丹死在街垒上。12月4日，塞纳河右岸布满了街垒，参加保卫战的有1000—1200人，坚决反抗波拿巴政变。波拿巴来取暴力镇压了巴黎的抵抗运动。

在外省，武装反抗的范围比巴黎更广泛，不少工人、农民参加了反政变的起义和暴动，特别是在法国中部和东南部的蒙太尔吉、克拉姆西、拉帕利斯、菲热克、维尔诺夫、锡斯特龙、迪涅、马尔兰德、布里尼奥和法国的重要城市图卢兹、马赛、利摩日、佩皮尼昂、巴莱纳、土伦、波尔多、斯特拉

斯堡等 20 个省市地区，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宪法，展开了激战。波拿巴立即派军队前去残酷镇压，宣布 32 个省处于戒严状态，进行大搜捕，至少有 2.6 万人被逮捕，其中有农业工人 5423 名，在业工人 1850 名，皮匠 1607 名，小手工业者 1570 名，医生 325 名，律师 225 名。此外，还有 1 万人被流放。到 12 月中旬，全国各省反政变的起义和暴动基本上被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二、共和国的终结

[波拿巴称帝]1851年12月2日政变成功后，波拿巴加快了称帝的步伐。12月21日，他在刺刀的保护下实行了对“法国人民愿意保持路易·波拿巴的权力，并且授予他必要的权力，从事制订一部以他在12月2日公告中所确立的原则为根据的宪法”是否同意的全民投票。结果7,439,216票赞成，6,467,370票反对，这样，波拿巴既获得了政变的正式承认，又获得了制订宪法的权力。1852年元旦，他下令将国旗旗徽改为鹰徽，以象征拿破仑帝国。5天后，下令将法国革命的箴言：自由、平等、博爱，从所有建筑物上清除干净。1月14日，颁布新宪法。这部宪法是以共和八年宪法为蓝本而制订的，也正如同共和八年宪法集权于第一执政之手一样，这部宪法将总统任期改为10年，并由总统独揽一切权力，普选产生的议会只是装饰品。其实，这是一部帝国宪法，只要把总统换成皇帝，就可以建立一个新政权，波拿巴确实也是这样做的。1852年9月和10月，他再度巡游法国各地，沿途组织党徒扮演迎驾的群众，高呼“皇帝万岁！”还在报纸上宣传人民群众举行集会要求波拿巴称帝，以此大造舆论，强奸民意。同时到处举行军人宴会和阅兵，继续笼络军心。当他作好称帝的充分准备后，就假心假意去征询参议院的意见，参议院自然不敢反对，于是就以征得参议院同意为名，强迫人民在11月21日进行是否赞成帝国的全民投票，结果783.9万票表示支持，25.3万票表示反对。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就以人民推戴的名义登上了法国皇帝的宝座，号称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正式建立。

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关注法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以顽强的毅力对革命的失败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在1850—1852年期间先后写成了《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两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共和国短命的原因]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1848年2月到1852年12月只存在4年时间就被颠覆，堪称为短命共和国。究其原因，实属必然。

第一、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从它诞生时起，就潜伏着自身灭亡的危机。很明显，第二共和国是资产阶级迫于无产阶级的压力而宣告成立的，却又是迎合资产阶级心意的共和国，而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又都按自己的要求在解释共和国，他们各怀不同目的，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内部矛盾重重，必然因矛盾激化，而导致共和制度的瓦解，尤其是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了确立自己的独占统治，就不断走向反动，甚至不惜动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结果，无产阶级被六月的屠刀所残害，使支持共和国的这一主要力量被打倒，再也无力阻止反动势力对共和国蓄意进行的颠覆活动。

第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还缺乏牢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十九世纪40—50年代的法国，大工业经济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小生产仍占优势，工业革命尚未完成，因此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远没有发展到足以能够实行自己统治的程度。而共和观念又在广大法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头脑中十分淡薄，更因共和政府的种种反动措施，引起他们对共和制度的厌恶情绪和巨大离心力，致使共和国十分短命。

第三、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短命，还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强大。在国内，拥有经济实力和占据支配地位的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念念不忘七月

王朝对他们的优惠和保护；保王党仍然拥有实力，尤其在农村中势力浓厚，他们仇视和反对共和制度，而波拿巴的诱人宣传和收买政策，使更多的人支持他建立独裁统治尤其是广大小农对他的支持。在国外，几乎遍及全欧的革命都被反动派的联合所镇压，1848—1849年相继成立的共和国一一颠覆。国内外十分猖獗的反动势力，促使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存在4年多的时间，终于寿终正寝。

第九章 第二帝国

第一节 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统治

一、帝国的建立

[帝国的权力结构]1852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改第二共和国为第二帝国，自己由总统变为终身制的皇帝，称拿破仑三世。12月30日，参议院发布法令，把略加修改后的1852年1月14日宪法确认为第二帝国宪法。宪法规定：皇帝享有全部行政权，一切文武官员皆由皇帝任免，并需对皇帝宣誓效忠；法律创议权和颁布权等立法关键环节统归皇帝掌握；司法以皇帝名义实施；皇帝还有权对外宣战、媾和、签订商约和其他条约。

在皇帝统率下，实行议会多院制。议会被分成三院：参议院、国务会议和立法团。参议院由名流显贵80人组成，后来增至150人，其成员均由皇帝指定、终身任职。皇帝的主要亲属、元帅、海军上将、红衣主教等是当然成员。参议院正副议长及领导机构成员也由皇帝钦定，会议内容对外保密。它的职能是按皇帝旨意审查各项法令是否符合宪法、接受请愿并取消有悖于宪法的行政裁决，有权为重要的法案提供法律依据，并有权以发布参议院法令的形式补充或修改宪法。这个以“宪法保卫者”自居的机构，其实不过是皇帝的工具。

国务会议由40至50名参事组成，名义上是最高法案评议委员会，其成员亦全由皇帝任免。它的职能是在皇帝授意下，制定法规和起草法令。会议由皇帝主持或任命他人主持。会后，皇帝指派3名参事以政府特派员身份在立法团会议上提交法规草案并进行辩护，一俟获得通过，再由皇帝正式作为法律公布。可见，国务会议只是为皇帝起草法案的秘书处以及皇帝旨意的辩护士。

立法团由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普选产生，但议会代表的候选人均由政府指定，实行“官方候选人”制度，选民只有遵命投票的“权利”。立法团开会由皇帝亲自召集，正副议长也由皇帝任命。立法团只是讨论、表决政府特派员宣读的法案，分别表决政府各部预算和决定税收。他们对现成法案只能被动地表示赞同或反对。所以，立法团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开会时不设讲台，每个议员只能在原座位上发言。参议员年薪高达3万法郎、国务参事为2.5万法郎，而立法团议员的职位则没有薪水。所以，当时有人把立法团讥讽为皇帝的“法律登记所”。

第二帝国不存在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所谓政府由皇帝及治下各部大臣组成。宪法规定，所有大臣均由皇帝任命并从属皇帝一人。各大臣间没有连带责任，大臣不得兼任立法团成员，也不许出席立法会议。大臣需绝对服从皇帝。省长、副省长和市长，必须根据皇帝旨意由内政大臣任免（中小城镇的市长可由省长任免），同样对皇帝负责。各级官吏均享受高薪。例如大臣年薪为4万法郎，还可兼职兼薪。国务会议副议长、被人称为“副皇”的鲁埃身兼多职，年薪达26万法郎，波拿巴的年薪高达2600万法郎。

[政权的特点及阶级本质]从第二帝国的权力结构中，可以看出这个政权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其中最大的特点是实行专制独裁统治。拿破仑三世位于

帝国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权于一身，一切机构、一切官员不过是执行他旨意的工具。皇帝虽然每周两次召集大臣们议事，但大臣只能按皇帝定下的议程提出报告而无权作任何决定，皇帝也从不在会上表态。一切决定都由皇帝背着大臣私下作出，大臣们从《政府通报》中才能了解其内容。大臣们的作用局限于为皇帝提供信息并执行决定。此外，皇帝还经常通过贴身随从私下处理连大臣都不得与闻的国家大事。

第二帝国政权的又一特点是依靠军队实行暴力专政。拿破仑三世深知武装力量的重要，他靠军事政变上台，上台后把由他统率军队写进宪法。他效法拿破仑一世，建立了一支近卫骑兵团，作为他的私人卫队。同时大力扩充军队、警察与宪兵，使他们“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他把参议院中 1/4 的名额分给军人担任，并指使宪兵密切监视民众，密报各级官吏是否忠诚于他。从而使拿破仑三世的统治打上明显的军事独裁烙印。

第二帝国政权的另一特点就是以全民利益的代表来掩盖独裁。波拿巴总是喜欢这样自我标榜：“我不承认任何人比我更有权代表人民”。全民表决是他得意的杰作，它把一切都披上合法的民众认可的外衣。其实，帝国并不代表全体法国人民的利益，它只代表一小撮大金融家、大工业家的利益。一切军政财界要职均由波拿巴的亲信及大工商业资产阶级掌管。参议院成员多数为大银行家和大工业家，立法团成员中也有 1/4 属于此类人士。尤其是七月王朝时期的政客权贵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 18 年间活跃于帝国政坛的总是一些老面孔。真正的波拿巴派为数不多。在 1852 年皇帝任命的 40 名国务会议参事中，七月王朝的权贵占 24 人。同年参议院中除当然成员外，尚有 72 名成员，其中七月王朝原众议员约占 20 名、原贵族院议员占 12 名，到 1856 年，后者在参议院中竟增至 46 名。1852 年立法团中波拿巴派只占 1/3，其余均为七月王朝时期的显贵。在帝国时期先后担任过省长职务的共约 220 人，其中多数人的政治生涯始于七月王朝；直至 1870 年，在任省长中仍有 2/3 属七月王朝的显贵名流。在有案可查的担任过帝国大臣的 20 多人中，七月王朝原议员、官吏同样占 2/3。前朝旧臣如此大批地受到新主子的垂青，实属罕见。难怪某些波拿巴分子力劝皇帝要防范奥尔良派和奥尔良主义。

七月王朝的遗老遗少能在第二帝国继续走运完全是由拿破仑三世统治的阶级本质决定的。1852 年，早已在野的基佐凭借一个老政客的洞察力指出，波拿巴可利用士兵平息骚乱，利用农民获得选票，但必须依靠上层阶级才能进行统治。综观帝国权贵的社会构成，基佐可谓一言中的。无论议会三院、中央各部还是各省府，跻身其中者无例外地都属于上层阶级或是他们的代表。除上述七月王朝的旧臣外，担任大臣要职的还有波拿巴的亲信和财主。例如，波拿巴的堂兄弟、即拿破仑一世的幼弟热罗姆亲王的儿子担任参议院议员兼殖民大臣。波拿巴的同母异父兄弟，交易所投机家莫尔尼伯爵，担任立法团议长兼内政大臣。波拿巴流放时的忠实伙伴，政变的主谋之一佩西尼任内政大臣。政变的另两名主谋圣—阿尔诺和莫帕分别任陆军大臣和警务大臣。大造船主迪科，任海军大臣。这一小撮人操纵了整个法国，主宰着法国人民的命运。拿破仑三世的政权实际上就是一种以君主批准为原则的国家委任制，一种以普选和全民表决的形式民主掩盖起来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独裁制。

二、专制帝国

第二帝国 18 年的统治,大致可以分为二个阶段:专制帝国(1852—1858)和自由帝国(1859—1870)。拿破仑三世为维护统治,在帝国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专制帝国的措施]在专制帝国阶段,拿破仑三世实行的是赤裸裸的镇压手段。其主要措施有三:第一,大力强化军队、警察和官僚机构。把帝国军队从 40 万扩充到 60 万,把国家和地方行政官员从 47 万扩充到 62 万人,并建立起一整套严密的警察监视告密制度,严惩政府反对派。第二,严禁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取消一切民主成果。早在称帝以前,波拿巴就为自己统治定下了基调:1852 年 2 月 17 日他发布新闻法令,规定一切报刊均需获得政府事先批准、登记在册后方可发行,并规定高额保证金和印花税。报社经理和主编由政府任免,编辑人员亦需备案审查。还建立惩治报刊的法庭,那些受过政府三次警告的报刊,必须立即停刊,书店销售的书刊均需受到审查。3 月 25 日法令规定,取消一切政治性俱乐部,禁止一切结社和公共集会。全国 290 个工会只保留了 15 个。1855 年,昂赞矿区几位工人因组织共和主义协会,结果被判刑 2 至 4 年。第三,实行高压政策。波拿巴的军事独裁统治一开始就引起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广大人民群众의 强烈不满。一些不满人士曾在 1853、1854、1855,先后 4 次行刺皇帝均遭残酷镇压。1858 年 1 月 14 日,以奥尔西尼为首的三位意大利爱国志士,因不满皇帝对意政策,又用炸弹袭击拿破仑三世。死里逃生的皇帝趁机进一步强化专政措施。他以保障安全为借口,立即恢复 1852 年初实行过的“非常期”统治,还宣布,如他不在,皇后将主持摄政。为杜绝议员在当选后拒绝向他宣誓效忠的情况,他又通过参议院下令,一切候选人必需在选举前 3 天作出忠于皇帝的书面宣誓。2 月 19 日,通过《安全法》,使镇压达到新的高潮。该法律规定,对有现行活动的反政府分子以及一切不满分子,可不经审判就将其投入监狱或流放海外。同时在全国对共和派进行搜捕和迫害,先后有 430 名知名人士遭逮捕和流放,大批与奥尔西尼毫无关系的群众因此受到株连。

[帝国与教会]拿破仑三世十分重视宗教这一精神武器。他希望通过笼络教会使广大天主教徒脱离正统派而投向自己麾下,并以此赢得教士及受他们影响的农民对于官方候选人的支持。此外,政府还希望扩大宗教的社会和精神影响来对抗革命宣传。为此,皇帝努力与天主教结盟,扶植天主教会,并使教会享有一系列特权:红衣主教成为参议院当然成员,宗教预算逐年递增,1852 年为 3950 万法郎,1859 年增至 4600 万法郎,而同期教育经费则从 2300 万法郎减少为 2100 万法郎;到 1868 年,宗教预算已占全部国家预算的 10%,约为同年教育经费的 20 倍。教士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教会还享有结社权和报刊出版权。在皇帝支持下,修女会等宗教团体成倍增加。修女从 1851 年的 34200 人增加到 1861 年的 89200 人。至帝国末年,每 730 名居民中就有一个教士。教会学校从 1850 年的 1277 所增加到 1863 年的 3038 所。教会不仅受政府保护,而且受统治阶级资助:1852—1860 的 9 年中,教会所得捐赠是前半个世纪总和的 62%。这些被人们称为“黑衣强盗”的教士,充斥学校、机关、农村、城市,成为拿破仑三世统治的强大精神支柱。

不过,拿破仑三世和其叔父一样,只想利用教会而决不受制于教会。所以,他拒绝教皇提出的由罗马教廷任命法国主教的要求,也拒绝在法国恢复

宗教婚礼，而且坚决取消反对帝国政策的教士的待遇，甚至还解散了一个拥有 3 万之众的拥护正统派的宗教团体。

[政府反对派的形成和发展]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引起了不同政见者的反对。根据对帝国的不同态度，反对派大致可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反对派包括正统派、没有归附帝国的奥尔良派以及政见与之相似，组织上却不属奥尔良派的主张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大多数正统派遵尚博尔伯爵之命，不参与帝国政治生活，不担任需先向帝国宣誓效忠方能得到的公职，他们对帝国持消极抵制态度。少数正统派参加竞选，并在 1860 年后和教权派一起反对帝国对意大利的政策。没有归附帝国的奥尔良派属资产阶级自由派，其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以资产阶级自由和议会主义为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帝国。主张保护主义的资产阶级赞成奥尔良派关于自由的主张，尤其赞成经济自由，但又坚决反对帝国对外自由贸易政策，因为这项政策损害他们的利益，这派人中以纺织业和冶金业资产阶级居多。右翼反对派是保守的反对派，奥尔良派的梯也尔于 1864 年 1 月提出的资产阶级五项“必要的自由”概括了他们的全部政治要求，但他们并不从根本上反对帝国，也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王朝，只要拿破仑三世作出某些让步，给予一定的自由，他们就会接受帝国。

左翼反对派系指共和派，其共同特点是反对帝制或王朝，主张建立共和政体。但在具体政治实践上却又分成温和派和激进派。以卡尔诺、西蒙、法夫尔等人代表的温和派，主张参加帝国政治活动，通过议会斗争逐步实行以共和制为最终目标的改革。以甘必大、费里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和帝国作公开的包括议会外的斗争，反对一切妥协，以实行共和制度。

反对派在帝国初年虽未形成足以动摇帝国的力量，但在立法团中力量不断增强。1852 年立法团中反对派议员只有 3 名，1857 年达 13 人，其中 5 名属于共和派，组成了引人注目的“五人团”，在 1857 年立法团选举中，反对派获得选民总投票数的 13%，共和派在大城市及工业区影响扩大，首都有一半选区被共和派控制。1863 年 5 月，反对派在立法团选举中结成自由联盟以对抗官方候选人，结果，反对派得票数成倍增加，包括梯也尔在内的 32 人入选立法团，其中共和派占 17 名。巴黎选出的议员全部是反对派，帝国从此有了一个站在自己对立面的首都。

然而，即使是激进共和派，他们也害怕革命运动，并摒弃一切通过革命来推翻帝国的做法。所以，资产阶级反对派对帝国的斗争只能是软弱无力的。

[向自由帝国过渡]随着帝国反对派的增加，拿破仑三世开始改变统治策略，从高压统治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自由化”政策，向共和派和人民群众作某些让步。1859 年 8 月 15 日，拿破仑三世以其叔父 90 诞辰为由发布大赦令，对政变时被捕的以及因《安全法》而受迫害的政治犯和被流放者，一律大赦，准许回国。1860 年 11 月 24 日，皇帝以法令形式宣布扩大两院权力，允许参议院和立法团有权对皇帝的演说发表不同意见，报刊可以公布两院辩论情况。1861 年 11 月 31 日法令又规定，不经立法团通过，政府今后不得私自确定追加特别预算，从而加强了立法团对政府预算的监督权。

1864 年 5 月 25 日，参议院法令宣布放宽执行严禁结社罢工的《夏普利

系指个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人自由、当选人自由和议会自由。

这五人是：法夫尔、奥利维埃、达利蒙、毕卡尔和埃农。

埃法》，经批准允许工人罢工和结社，但不准举行秘密结社和集会。对被批准结社者，政府免费提供办公室和其他必要用品。60年代后期，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皇帝再度扩大两院权限，1867年1月31日法令规定，两院有权对政府的方针政策提出质询；两院从原来只有建议权上升为享有质询权，这意味着议会对政府监督权的增强。同年3月14日的参议院法令使参议院享有责成立法团再议法案的权力。1868年3月9日的新闻法令，取消了报刊发行需获预先批准的规定以及对报刊的警告制度，并降低了印花税。同年6月颁布的“自由”法令，准许非政治性和非宗教性集会可以公开自由举行。

三、自由帝国

[1869年立法团选举]这是帝国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立法团选举。和以前相比，这次选举具有明显特点。首先，反对派利用争得的自由权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竞选集会常常变成抨击帝国的场所；1868年新闻法令发布后短短一年时间里，反对派办起了140种报纸，发行总量达百万份，它们在争取群众摆脱帝国控制、帮助反对派竞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此外，皇帝地位大为削弱，很多非共和派候选人在竞选中也大讲自由，并主张限制皇帝权力。官方候选人制度不得人心，并在1/6的选区中已被废除，某些官方候选人甚至不愿表明自己的这种身份。

5月24日，选举结果揭晓。反对派得票达330万张，占总投票数40%强，巴黎和所有大城市皆被反对派控制，而且激进派在反对派中比重明显增加。在当选的292名议员中，反对派占74名，官方候选人占118名，已失去了议会多数派地位。7月6日立法团开幕之际，116名议员就如何满足民众对自由化要求的问题向政府提出质询，并要求组成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制内阁。皇帝再也不能随意任免政府部长。7月12日，以鲁埃为首的内阁辞职；拿破仑三世在一份咨文中表示，将在包括关税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作出更大让步。接着，建立了一个专门负责改革的过渡内阁。自由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

[自由帝国的措施]在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复冲击下，拿破仑三世被迫继续进行自由化改革。1869年9月颁布的参议院法令，规定立法团和皇帝共同享有法律创议权，立法团独立、其议长及各委员会成员不再由皇帝任命而由选举产生，进一步扩大立法团对政府预算的决定权，同时使它有权决定关税，政府大臣今后从议员中挑选，他们可不再通过国务参事而直接回答立法团的质询，从而确立了政府同时对皇帝和议会负责的制度。大臣的作用也作了调整：宪法把“皇帝通过大臣进行统治”改为“皇帝在大臣协助下统治”，这样，大臣不再是皇帝的工具，而成为皇帝的助手。

1869年10月31日，皇帝秘密会见温和共和派奥利维埃，一起商定新内阁的大臣人选。1870年1月2日，由奥利维埃组成第二帝国时期第一个责任制内阁。同年4月20日，帝国以参议院法令形式公布了1870年宪法。新宪法扩大了参议院的立法权限，使参议院变成第二个立法机构，并确认了1860年以来一系列自由化措施。新宪法在保留1852年权力结构的基础上，强化了议会权力，给帝国涂上了代议制的色彩。不少法国史学家因此而把第二帝国的后期统治称为“议会帝国”。但是，帝国并不是真正自由的，它对人民群众和反对派的镇压从未停止过。

[1870年全民表决]4月28日法令规定，全国将于5月8日就是否赞成皇帝从1860年以来的自由化改革以及是否批准1870年4月20日参议院法令进行全民表决。应当指出，拿破仑三世付诸全民表决的问题提得十分巧妙，因为他把自由化改革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并把自己打扮成自由化的推动者。这就使反对派陷于进退维谷之中：如果在表决中投赞成票，就意味着支持皇帝；反之，就意味着反对自由化改革。许多反对派成员，都勉强地投了赞成票。表决结果735万票赞成、153.8万票反对、190万票弃权。由于广大农民忠诚地投票拥护帝国，终于使皇帝在全民表决中取得胜利。这一胜利使许多人、甚至包括激进共和派都认为，“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其实，帝国内部深埋着危机，结果在对外战争中很快土崩瓦解。

第二节 帝国的经济发展

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完成

[铁路与交通]铁路建设是第二帝国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法国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名符其实的“铁轨时代”。1851年，法国虽拥有42家铁路公司，但它们各自为政，无法制订统一的整体铁路规划，铁路网远未形成。1852年以后，国家为畅通铁路交通，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政府废除了1842年法令关于国家负责修建路基、铁路公司负责路面和车站建设的强制性规定，使铁路公司享有更多的自由权；其次，把承建公司对铁路享有的专利期限延长为99年，使其有利可图；第三，国家统一制订整体规划，然后把铁路修建权转让给有关公司。1857年，42家公司在国家干预下融合成了6大铁路公司。这些措施产生了明显效果：至1858年，第一期骨干线路已经修通。为保证第二期工程顺利进行，国家于1859年6月以法令形式规定，法兰西银行帮助有关铁路公司发行股票，国家保证股金分红，如有必要则给予财政补贴。二期工程因此也圆满完成。为修建零星分散的短程铁路以完成整个铁路网建设，国家从1865年起又批准铁路承建公司自行发行股票，并责令有关省长作出担保。充足的资金，保证了各项铁路工程的展开。全国铁路线总长度从1851年的3248公里增加到1869年的16465公里，完成了全国铁路网络，巴黎已建成12个火车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交通枢纽之一。法国还与邻国铁路连成一线。铁路网的建成冲破了封闭式的地方经济，有利于整体性国内市场的形成，也刺激了冶金、机械、采矿等工业的发展。1852—1869年间，铁路货运量猛增近10倍，运费则大大降低。1852年铁路公司年利润为1亿法郎，1869年增至8亿法郎。

随着铁路线的迅速增加，和铁路配套的公路也得到长足发展，许多公路深入铁路未能到达的内地，势如铁路的延伸。内河航道也得到整治，国家出资购买了所有运河并加以疏通，还开辟了许多新运河。运河长度从1847年的3750公里增加到1869年的4700公里，汽船总吨位增加9倍多。水陆交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交通落后经济分散的局面，而且加速了商品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也推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前进。

[银行信贷业]路易·波拿巴十分注意金融业的发展，他使金融业和高利贷资本继续处于优先发展的地位。第二帝国时期，新的银行和交易所纷纷建立。1852年2月，国家开办了实力雄厚的“土地信贷银行”，用以促进农业技术革新。同年11月，金融家佩雷尔兄弟开设法国最大的信贷机构——“动产信贷银行”，皇帝的同母异父兄弟莫尔尼、银行家富尔德以及德·莱塞普斯等皆是该行股东。为了控制殖民地，1851年和1852年，波拿巴还在阿尔及利亚、马提尼克、留尼汪、圭亚那等地开设或重建了银行。1853年，政府重建了“国家贴现银行”。1859年，“工商信贷银行”建立。随着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的增加，金融界迫切要求冲破以往关于建立银行的严厉立法。1863年，帝国通过新法令，取消了股金不满2000万法郎者开设银行需预先获得政府批准的规定。于是，“里昂信贷银行”、“奥托曼帝国银行”、“马赛工业信贷储金公司”等应运而生。1863年银行法极大地刺激了金融业，仅里昂一地，除信贷银行外还建立了7家中小银行。一些大银行则效法法兰西银行，

纷纷开设分行。至 1870 年，法兰西银行已设立 74 个分行。1867 年法令进一步放宽了对金融业的规定：任何人开设银行或股份公司皆无需政府批准。银行业的发展有利于闲散资金的集中和流通，使工商业者不必再从高利贷者手中获取资金。为方便流通，1865 年颁布法令，使用支票，从而改变了旧式的支付手段。

与此同时，股票交易所的发展十分惊人。据 1865 年的调查，1852 年以后银行和各实业公司每年平均发行价值 15 亿法郎的股票。1850—1869 年间，股票由 118 种增至 307 种。1869 年，仅在巴黎交易所洽谈买卖的股票总额就达 330 亿法郎。交易所在当时的地位犹如中世纪的教堂。

储蓄业同样兴旺。1850—1869 年间，储蓄所从 355 个增至 508 个，存折由 586169 份增至 1968007 份，存款额由 7390 万法郎增至 7 亿 1120 万法郎。

金融业发展中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银行资本加强了对工商业的控制，金融寡头的雏形开始出现。如佩雷尔兄弟的“动产信贷银行”不仅控制了全国铁路的重要部分，还控制了巴黎 6 家煤气公司、电车公司，建立了两家保险公司，重整了食盐工业，建立了对整治巴黎工程起过重大作用的“不动产公司”以及专事外贸的“泛大西洋公司”。该银行甚至对奥地利、俄国、瑞士、西班牙等国的铁路公司及丹麦银行、西班牙动产银行等都有投资。通过融合、兼并购或财政控制，银行控制了有关企业，组成规模空前的大财团。据统计，183 个大财阀控制了当时的法国。成为法国著名的二百家族的前身。此外，财界加强了对政界和报界的渗透。除拉拢政界权贵外，金融巨子纷纷跻身政坛，甚至一门数人同时担任政府要职。金融家投资报刊或自办报纸者也比比皆是。这一切给法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深刻影响。

[工农业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完成]第二帝国的工业发展呈现出复杂的不平衡状态。一些重工业部门，如冶金、采矿、机械及化工、建筑业发展较快。而轻工业尤其是传统工业，如纺织、食品、服装及其他传统手工业则相对缓慢。

在重工业中，新铁路的铺设刺激了冶金、机械行业的发展。1861—1869 年间，冶金业总产量增长 2.8 倍，其中钢铁冶炼发展尤为迅速，生铁年产量从 41 万吨增加到 135 万吨，钢产量从 1.4 万吨增至 11 万吨。机械工业增长 2.4 倍，机车数量从 1000 个增至 4800 个。采矿业增长 2.26 倍，其中煤产量从 455 万吨增至 1350 万吨；但铁矿从 1862 年起停滞不前，整个帝国时期只增长 72%。

建筑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全国房屋增长 2.24 倍。纺织业发展缓慢。1860 年以后，英国纺织品涌进法国，再加上美国南北战争导致出口法国棉花的减少，使法国一度出现棉荒，帝国时期纺织业总产量仅增长不到 50%。

工业的迅速发展是以科学的进步与技术的革新为前提的。这一时期科技发明成果累累。在 1851—1855 年的五年间，就颁发了发明证书 14964 份，1865—1869 年间增至 22652 份。冶金业中 1856 年引进了英人贝氏炼钢新技术，1864 年又采用新的马丁炉，焦炭炼铁基本取代了木材炼铁。1854 年，德维尔炼出了铝。1860—1862 年间，勒努阿和博·德·罗萨制成了内燃机。1861 年索尔韦发明了新的制碱法。1867 年德利埃造出了制冷机。1869 年贝尔热实现了水力发电。在冶金、采矿等主要工业部门，机器使用已十分普遍。帝国末年，蒸汽机总动力比帝国初年增加 3.5 倍。即使在发展较慢的纺织业中，机械化程度也明显提高。如浮士省 1856 年自动纺纱的纱锭只占总数的 9%，

1868年即提高到80%。1847—1871年间阿尔萨斯省的纺纱工人减少14%，而纱锭却增加1倍。此外，在制糖业、木材加工业、面粉业和成农业中，也开始技术革新并采用新式机器。机器的广泛使用和技术长足进步标志着法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从而使法国的工业总产值从1850年的60亿法郎增加到1870年的120亿法郎，工业生产水平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

与工业相比，法国的农业显得缺乏活力。耕地面积的扩大是这一时期农业中最大的成就。波拿巴先后颁布并贯彻“垦荒法”和整治沼泽地的“排水法”，使耕地面积扩大了150万公顷，耕地总面积达2650万公顷，创造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和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促使农业经济向专业化和农作物种植的合理化过渡。不少地区的农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专门种植当地最宜发展的作物，这就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增加了产值。此外，农业机械的使用也有所增加，法国在1862年已有9000架收割机、1万架播种机和10万架打谷机。然而法国农业与英、荷及德意志诸邦相比仍较落后，农业机械不仅老式，而且极不普遍，使用者约占全部农民的5—7%。因此，1850—1870年间农业总产值虽增长58%，但扣除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因素，实际农业产量只增长不足25%。

[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经济发展对原料和商品市场的需要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法国几个主要外贸港口如马赛、勒阿弗尔等都增加了泊位、更新了储运设施。1851—1861年间泛大西洋公司等三个新的外贸公司相继建立。对外贸易的固定航线已经形成：驶往北美的货轮皆由勒阿弗尔起航，去南美则以波尔多为起点，马赛专营对非洲和远东的贸易。法国船队的总吨位在帝国时期从68.8万吨增至106.5万吨，居世界第二。1850—1869年间，法国外贸总额从18亿5900万法郎激增至62亿2800万法郎，而且，除1855—1857、1861及1867—1869年以外，第二帝国其余十多年的外贸皆是出超，其总额累计达27亿7600万法郎。法国进口的主要是廉价的原材料，其中棉花和煤占2/3。而出口的则主要是昂贵的成品。这种进出口态势既保证了法国出超国的地位，又保护并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兴旺。不过法国在外贸运输手段上存在严重缺陷：机器为动力的船只较少，占运输总吨位88%的商品是由帆船承运的。

资本的大量输出是帝国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现象。据统计，法国人当时的全部储蓄几乎都被用作认购国债、投资工业（尤其铁路）和对外投资。法国几乎对欧洲大陆所有国家都有投资，大约有14个国家的政府获得法国银行家的贷款。对外投资的狂热席卷了法国所有银行，甚至“土地信贷银行”也不例外。财界两巨头罗希尔德和佩雷尔兄弟则在从卡斯底高原到多瑙河河谷、从伦敦到君士坦丁堡、从莫斯科到的里雅斯特的广大地区展开了资本输出的激烈竞争。1850—1870年间，法国资本输出总额从20亿法郎增至150亿法郎。其中除少数是对国外实业或大工程的投资外，主要用作放债获取高额利润。1867年以后，每年所得利润高达6亿法郎，超过了年资本输出的数目，这就使法国资本主义具有明显的高利贷性质。但是，资本的大量外流给本国工业品出口带来了潜在威胁，同时使国内资金明显不足，使帝国末年的工业经济缺乏活力。

二、经济发展的原因和特点

[经济发展的原因]第二帝国经济之所以得到较快发展，除了国内有较长时间的安定局面外，拿破仑三世的经济政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拿破仑三世算不上经济学家，但从其政变以前发表的二部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对发展经济比较重视。他认为国家应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角，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并通过预算的数量及其分配方向对经济发展的全局进行直接引导，同时积极扩大政府生产性支出。此外，他还一反以往政府向银团举债的做法，数次直接向全民发行国债，筹措扩大生产所需的巨额资金，从而改变了法国人民以土地为唯一投资对象的旧观念、而习惯于以认购国债或购买股票的形式参与对工商业的投资。国家还颁布一系列工农商业经济法规，制订各种优惠条例，尤其重视对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国家运用特许权和保证4%的最低利润额鼓励铁路承包公司大规模筑路，而且注意对边远地区的开发。从而畅通了原料和商品的运输，增强了经济的活力。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引起争议最多的是对外自由贸易的政策。1860年1月，皇帝背着立法团和英国签订了法英通商条约，大胆地废除了第一帝国以来一直坚持的保护关税政策，宣布自由贸易，取消对某些商品的禁运规定，取消高关税，大幅度降低商品入境税。大量原煤和纺织品因此而源源进入法国市场。这一政策一度遭到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采煤和纺织业资产阶级的反对，他们指责皇帝搞了一次“关税政变”。但是，这一条约归根到底对商业资产阶级和需要廉价进口原料的工业家是有利的，而且最终刺激了工业家的竞争能力和技术革新。为此，皇帝继续与比利时、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挪威、葡萄牙等国签订了同类条约。自由贸易政策的扩大，把法国经济进一步纳入了国际市场，提高了法国工业家在国际上的竞争地位。

拿破仑三世的教育政策对经济的发展同样有着促进作用。他广泛进行教育改革，并拨出专款、创办综合性高等文理学院，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增设中小学校，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

波拿巴的这些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最终在法国确立了资本主义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讲，路易·波拿巴与拿破仑一世一样成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遗嘱继承人。

此外，这一时期的客观环境也对帝国经济发展有利。1848年美国加里福尼亚金矿及同期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使世界采金量大大增加。从1850年起，大量黄金流入欧洲。帝国利用其高额外贸顺差，获得了大笔硬通货。于是，始于1815年的物价下跌趋势得以制止并出现回升。1856年以后，物价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此种物价水平使生产者更加有利可图，从而刺激了生产发展。同时，大量黄金的涌入，使帝国期间货币流通总量增加1.2倍。这对经历了长期货币匮乏的法国经济不啻是一付强心剂，因为它使经济领域中不可或缺支付手段得以充分实现，从而保证了经济活动利展开。

[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局限性]帝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其中主要有三：第一，金融业始终处于特殊的优先发展地位。第二，在工业中铁路运输业的优先发展也十分明显。第三，现代化大工业与分散的小工业并举，并出现了生产的集中化。以冶金工业为例，1864年该行业中组成了法

指1842年发表的《食糖问题分析》和1844年发表的《论消灭贫困》。

国第一个卡特尔——“冶炼业委员会”，它是该行业的信息中心、技术促进中心，又是决定价格、代表全行业业主和政府及工人谈判的统一组织。规模巨大的企业也已出现。1867—1868年间，克勒佐冶炼厂雇佣了9950名工人，次年该厂的生铁产量占全国生铁总产量10%；而温德尔控制的冶炼厂同期生产了占法国总产量11%的生铁。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和集中使法国工业的重心在这一时期开始了由小工业向大工业的转移。

然而从总体来看，这一时期中小工业仍占绝对优势。传统的纺织、服装、食品、制革、木材、家俱等行业不仅发展缓慢，而且大多处于分散的手工劳动状态。1866年法国有各类业主133.4万人，而工人为289.8万人；平均每个业主仅雇工2.17名。同年纺织业中每个业主平均也只雇工3名，手工劳动占70%。建筑业尽管发展较快，但1851—1866年间，业主与工人之比仅从1比1.27提高到1比1.44。可见，在现代化大工业和分散的传统中小工业并存的同时，中小工业始终占多数，而且在产值上，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

此外，这一时期消费品生产远远超过生产性生产。还应指出，帝国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呈明显下降趋势。工业生产平均增长率1850—1855年间为3.87%；1855—1860年间为2.36%；1860—1865年间为2.19%；而1865—1870年间仅为1.16%。而且各行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也不是持续发展的，我们不能对第二帝国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估计过高。

第三节 帝国的社会状况与文学艺术

一、社会状况

[城市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化]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第二帝国时期出现了城市的新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1851年法国城市人口为913万，到1866年已上升为1159万。同一时期5万居民以上的城市，占总人口的比例从5.44%上升到10.83%。大城市人口增长尤为迅速，里昂、马赛等城市进一步扩大，其人口增加近1倍。城市的繁荣吸引了广大农民，引起农村人口减少，同一时期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4.5%下降到69.5%。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巴黎面貌的改变是最典型的。帝国建立时，巴黎约有120万人，住房拥挤，道路狭窄，照明、卫生条件很差，公共设施不足。1853年，拿破仑三世委任奥斯曼为塞纳省省长，在皇帝授意下，制订巴黎扩建工程计划，史称“奥斯曼计划”。奥斯曼计划的蓝图是由皇帝亲自绘制的。这项扩建工程历时17年之久，耗资25亿法郎，巴黎面积扩大了1倍。城内五层以上的成片新楼拔地而起，40米宽的十字形主干道贯通全市，宽阔的街道四通八达。新建的火车站、中心百货商场、住宅区、教堂都别具一格。全巴黎共拆除旧房11万7千所、新建楼房21万5千幢，兴建中小学154所，剧院、教堂34座，街心公园21个、大公园5个，铺设自来水管500公里、现代化阴沟系统400公里，新增连接市内塞纳河两岸的桥梁8座，市内巍峨的喷泉、高耸的纪念碑引人驻足。市东西两侧的万森、布洛涅森林区扩建后更加迷人。巴黎这座历经沧桑的千年古城陡然变成雄伟庄重整洁美丽的世界旅游名城，人口增加70万。

奥斯曼计划推动了全国的城市化发展，几乎所有城市的面貌在这一时期都起了重大变化。里尔市新建房屋增加1.9倍，圣太田增加2.1倍，图尔增加2.7倍。然而，城市的发展并未给穷人带来福音。原来住在巴黎市中心的穷人因付不起新建住房的房租，而只得去城市边缘栖身，穷人富人同住一幢楼房的现象不复存在，巴黎明显地分成了富人区和穷人区，两者界线更为鲜明。

[生活水平的变化]这一时期法国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从食品构成来看，尽管消费品种类并无多大改变，但消费数量却有所增加。1845—1854年的10年间，法国人均每天消耗的面包、土豆、鱼肉、水果蔬菜、糖、奶制品等分别为714、107、78、245、10和168克，1865—1874年的10年间，它们的消耗量分别提高到763、253、100、265、20和208克。1851年，法国人均咖啡和可可的消耗量分别为520克和58克；1871年提高到1109克和221克。法国人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平均身高略有提高。1839年适龄青年中因身高不到1.56米而不能入伍者占适龄青年的16%，帝国末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0%。市民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普遍使用煤气灯照明以代替蜡烛和火把，用自来水代替井水，用钢笔代替鹅毛笔。生活较为宽裕的人，还开始旅游，这一时期外出旅游的人数增加3倍。

然而平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所有人生活都得到了改善，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据奥斯曼估计，1862年巴黎有70%的人死后没留下任何遗产、甚至必要的丧葬费也没留下。

[资产阶级]第二帝国时期，真正有权势、占统治地位的是资产阶级，尤其是由大金融家、大工业家、大商人组成的大资产阶级。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内部结构的变化，银行家、大工业家和大商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已融合成金融寡头集团。他们不仅人数比七月王朝时期有所增加，而且经济实力急速膨胀，其总资产在帝国时期至少增加3倍。他们掌握了大量企业，一人往往身兼数家大公司的董事，同时还在政界占据高位。如铁路大亨伏依特里曾任国务会议主席。冶金业巨子施耐德是立法团议员，还一度出任议长。动产信贷银行开办者佩雷尔兄弟一家有3名议员。大银行家富尔德，家庭成员中有1人担任大臣，3人任议员。大资产阶级成为第二帝国政治经济的真正主宰。到帝国中期，他们中间最富的183个大财阀已经拥有二百亿法郎资产。他们靠巧取豪夺得来的巨额财富，过着穷奢极欲的享乐生活，宴会、舞会、郊游、赛马场、海滨浴场都是他们炫耀财产、寻欢作乐的地方。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影响了一代世风，帝国时期出现的轻浮放荡令人作呕的社会风气，其祸首便是这些腰缠万贯而又粗俗可鄙的暴发户。

中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他们的年收入约在4000至5000法郎以上。他们中除了中小企业主和中小商人外，还有法官、律师、公证人、诉讼代理人、记者、医生等，构成所谓“新阶层”。他们对大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一统天下十分不满，帝国反对派中不少人来自这一阶层，其中包括激进共和派领袖甘必大。

但是，上述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属于那个阶层，这一时期在心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变化：对占有土地渐渐丧失兴趣。帝国初期，不动产占资产阶级总资产67%，帝国末年则下降到55%。这说明，把占有土地视为财富唯一来源以及社会地位上升的唯一途径的观念，在资产阶级中开始失去市场。

[农村与农民]第二帝国时期农村人口2640余万，可耕地面积2650万公顷，农村人均耕地一公顷。但事实上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缺少甚至没有土地。占地4公顷以下的小农占农村人口4/5，他们只占全部耕地的1/5。占地50公顷以上的大土地所有者仅占农村人口0.9%，却占总耕地的27%。所以，法国既是小农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又是土地高度集中的国家。农村小生产仍占压倒优势。1852年经营10公顷土地以下的农户占总农户68%，而1862年则上升为75%。经营40公顷土地以上的大农户只占总农户4.8%。

不同阶层的农民，在帝国时期境遇迥然不同。大土地所有者、大自耕农和大农场主从地价和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中得到了好处，他们的收入增加了82%—125%。他们是帝国在农村中的支柱，也是农村的直接统治者。占农户总数1/4的农民，虽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土地养活，但因没有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所以无法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中得到实惠。至于广大缺地、无地的小农，他们生活艰难。据1862年调查，当年农村中的雇工、季节工和佣人，共约有420万人，他们的工资虽然也有所提高，但完全被物价上涨抵销。而且其居住条件、卫生条件均极为低下。1856年全国有20%的农民居住在草房中，1866年仍达17%，穷困的拉芒什省农民住草房的比例高达84%。由于农村住房安装门窗需要交税，所以农舍大多阴暗，牲畜和人同处一屋的现象到处可见。宗教信仰在农村十分盛行，教士仍对农民保持牢固的精神控制。不过，随着人口的外流及铁路交通的发展，沉闷、封闭的农村世界开始被打破。

二、工人运动的展开

[工人阶级的处境]这一时期的工人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类是传统行业的工人，如印刷工、制鞋匠、钟表匠、裁缝、家俱工、石匠等，他们有专门技能，工资比一般工人稍高，受教育程度也在工人平均水平之上，因此阶级觉悟较高，工人运动的领袖和骨干成员往往来自他们中间。另一类是现代大工业中的工人。他们之中很多人来自农村，大多没有文化，很少专业技能，被资本家当作会说话的机器。但是，大机器生产造就了他们的集体观念和守纪律习惯，因此，战斗力很强。还有一类工人，他们并未完全脱离农村，有的尚有少量土地，亦工亦农。帝国时期，工人人数大约增加 10%，总数达 300 万，其中女工和童工约占 50 万。

工人们在政治上始终处于无权地位，常常遭到歧视和冷落。没有结社罢工的自由，劳资纠纷中，雇主光凭言辞即可取信法官。每个工人必须备有“工人手册”，上载雇主对工人的评语，被雇注有不好评语的工人就很难另找工作。在工厂做工的工人常常受到密探和工头的严密监视，稍有不慎，即遭罚款和监禁，有一个工人因房租涨价，一气之下讲了吊死房产主的话，即被判处 4 个月监禁。

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名义工资平均增长 17—30%，实际工资增长了约 10%。但工人的绝对收入仍很低微，而且深受物价上涨之苦。在巴黎，男工平均日工资 3—5 法郎，女工仅为男工的一半；在外地，如里尔地区，男工日工资 2.5 法郎，女工最高为 1.5 法郎。一个男工的全年收入因行业而不同，大致在 900—1500 法郎之间，而一个四口之家的年支出需要 1700—1900 法郎，其中房租约占年工资收入的 1/3，所以，一个人工作的家庭，就入不敷出；不少妇女为了生计被迫卖淫。工人中赤贫现象十分普遍，1866 年，仅官方注册的乞丐，在巴黎就达 12 万多人。

工人的工时很长。1848 年 9 月法令曾规定工人每天劳动 12 小时，实际上资方往往迫使工人超时劳动。里尔地区工人普遍每天劳动 13—15 小时，个别行业竟达 18 小时。工作条件十分恶劣，铁路公司还规定，即使在夏天，烈日当空，中午就餐也不许离开路面。工厂里安全设备奇缺，资方对工伤却不负任何责任。

[工人运动的复苏]由于 1848 年六月起义中无产阶级遭到残酷镇压加之帝国初期拿破仑三世的高压政策，工人运动出现较长时间的沉寂状态。即便如此，法国工人为提高工资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仍接连不断。这些斗争虽规模不大，但次数频繁。据统计，1852 年举行的工人罢工有 36 次，1853 年为 109 次，1855 年达 168 次。到 60 年代初，法国工人不仅为改善经济条件，也为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而斗争，出现了工人运动的新形势。

1862 年，巴黎印刷业工人举行罢工，并上书拿破仑三世，要求定期和资方谈判工资待遇，同时要求建立工会联合会。工人群众重新提出建立工会的政治要求，把矛头直指统治阶级总代表。同年，拿破仑三世为了笼络工人以对付力量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同意选派 200 名工人代表赴伦敦参观国际博览会。然而法国工人代表把这次参观变成和英国工人阶级交流斗争经验的场所，使拿破仑三世的政治阴谋完全落空。1863—1864 年间，英法两国工人阶级并肩战斗，掀起声势浩大的支援波兰民族起义的政治斗争。工人阶级在这些斗争中拓宽了视野，提高了阶级意识。在 1864 年补缺选举中，巴黎

工人第一次提出了本阶级的候选人参加立法团议员竞选。2月17日，工人们在《国民舆论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六十人宣言》，指出工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阐明提出工人候选人的意义，强调“工人必须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议会中应当有工人代表，强调工人有权参与国家政权的活动，并“要求最起码的经济改革”以捍卫自身的利益。尽管《六十人宣言》充满着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但它毕竟是引导无产阶级重新走上独立斗争的纲领性文件，使法国工人摆脱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监护，重新登上独立政治斗争的舞台，成为工人运动新高涨的标志。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当时，法国工人仍然在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的领导下活动，这两派理论上虽有错误，但在当时起过积极作用。

《六十人宣言》就是由蒲鲁东派发起的，在宣言上签名的托伦、利穆津等人，还为在法国建立国际支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曾作为法国工人代表团的成员，出席了1864年9月28日在英国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的第一国际成立大会。回到巴黎后，他们立即筹建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并于1864年12月底在格拉维里埃街44号开设办事处。接着，用法文出版第一国际的《临时章程》，正式成立第一国际巴黎支部。1865年6月，巴黎支部改组，建立了有瓦尔兰、卡梅利纳、马隆等十七人组成的支部委员会。不久，里昂、亚眠、南特、卢昂、里尔、圣太田等城市也相继成立了国际支部。国际工人协会的地方组织在法国迅速发展。为加强领导，1870年春天，各地的支部先后组成巴黎联合会、里昂联合会、马赛联合会和鲁昂联合会等四个地区性组织。第一国际在法国卓有成效的活动，使法国工人阶级重新成为一支独立的强大力量。

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法国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也获得了可喜的进步。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蒲鲁东派内部逐渐分化为左右两派。右派代表托伦渐渐走向反面，最后背叛无产阶级而投靠了反动派。左派代表瓦尔兰在实践中认清了蒲鲁东思想的危害而日趋靠拢马克思主义，成为法国工运中的著名活动家，积极组织 and 领导工人运动，主张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并反复强调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瓦尔兰及其战友们的活动，促进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的拥戴。

60年代后期，法国工人的罢工浪潮不断高涨。1867年1月，巴黎铜器工人互助会会员5000人举行历时2个月的大罢工，迫使厂主作出让步。8月，巴黎成衣工人举行集会，要求提高工资并实行计件工资，随后又从4月1日起举行罢工，这次罢工还得到了国际工人组织的资助，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1868年以后，工人阶级联合组织不断涌现，至1870年，各地相继建立起67个工会联合会，其中1869年建立的“巴黎工人社团联合会”影响最大。制帽业工人还建立了全国性的行业工会。尽管帝国政府加强镇压，甚至动用军警对付工人罢工，如在1869年6月圣太田附近的一次罢工中，反动军队枪杀了13名工人，另有9名工人受伤，但罢工斗争持续高涨，帝国最后两年中，工人罢工达188次，参加者近13万人，罢工斗争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第一国际法国支部的活动引起帝国政府极大恐惧。1867年12月、1868年3—5月以及1870年6月，政府先后三次对国际支部瓦尔兰、弗兰克尔等近40位领导人，进行审讯，判处3个月至2年监禁。然而，被告们把帝国法庭变成了宣传国际思想的讲坛。工人活动家弗兰克尔在其辩护词中严正宣告：“国际协会已是扎根于一切国家的大树，企图砍去它的某一树枝来使其

枯死，实是幼稚可笑的……，各国无产者的联盟是既成事实，任何力量也不能分化他们”。尽管政府破坏了国际巴黎联合会，但国际会员在群众中播下的火种不会熄灭。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更为激烈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三、文学与艺术

[文学的发展]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文坛上浪漫主义文学已被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取代，后者已成为文学创作中的主流。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力求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不仅对过时的封建阶级进行批判，而且对新确立的资本主义秩序进行揭露，对下层人民和劳苦大众则表示同情。代表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主帅的雨果，此时走上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是福楼拜。他的作品着力于展示资本主义社会繁荣昌盛外表下灰暗丑恶的现实生活和腐败庸俗的社会风习，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

维克多·雨果在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政治态度发生明显变化，成为坚定的共和派。1849年至1851年间，他是国民议会中社会民主派的领袖。1851年末，因发表宣言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而被流放海外。在流亡的19年时间里，他始终用笔和拿破仑三世的独裁政权进行斗争。1852年出版了嘲骂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小拿破仑》。1853年，他的政治讽刺诗集《惩罚集》问世。1859年，他拒绝了拿破仑三世的“大赦”，以此表示对独裁者的蔑视，直至1870年拿破仑三世垮台后，他才凯旋式地回到巴黎，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在流亡期间的文学创作还有：诗集《静观集》（1856）、《历代传说》（1859）、《街头与森林之歌》（1865）；长篇小说《悲惨世界》（1862）、《海上劳工》（1866）、《笑面人》（1869）以及文艺批评专著《莎士比亚论》（1864）。

福楼拜（1821—1880），是第二帝国时期最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创作。1856年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发表后轰动文坛，使他在读者中获得了盛誉。小说以简洁而细腻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中叶法国的外省生活，通过小资产阶级女子爱玛的经历，对污浊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忿怒的控诉，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所谓精英人物，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嘲弄，对法国的“经济繁荣”作了辛辣的嘲讽和深刻的剖析。这部小说奠定了福楼拜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然而，小说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激怒了政府，帝国当局以小说败坏道德、有伤风化、诽谤宗教、“污蔑法兰西”为名，要求对“主犯福楼拜必须从严惩办”，至使福楼拜陷于被“政府攻击、报纸谩骂、教士仇视”的窘境。

《情感教育》（1869）是福楼拜另一部重要小说。这部作品基本上以40年代的巴黎为背景，通过一个思想平庸、性格懦弱的青年日益堕落的生活道路，反映了当时、特别是1848年革命前后的社会现实，是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再现。但是，这部小说也流露了作者蔑视人民群众的消极情绪。正是这种错误看法，使作者后来对巴黎公社革命采取了诋毁的态度。

[印象主义及印象派画家]印象主义是第二帝国时期出现于绘画领域的一个新鲜事物，它是现实主义画风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不过，它并不追求现实主义画派所讲究的图象的准确性，而是着力于表现某个事物给画家造成的最初的最强烈的印象。它是使画家从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非现实主义画法的开端，同时又为抽象主义开辟了道路。印象派主张绘画应色彩鲜明，因此充分发挥光线在画面中的作用。它要求画家注重物体的色调，而不是物体本身。画家的眼睛不能盯住物体某个特定部位，而要观察整体，尤其要观察物体周围色彩的反映。画家应运用细腻的笔触，即刻画出对物体的感觉。印

象派认为，绘画的目的是交流画家对自然界产生的感觉和印象。因此，他们把被正统画家拒之门外的人和物搬上了画面，而大自然中种种奇妙的景观又往往成为他们笔下再现的对象。在源远流长的法国绘画史中，印象派独树一帜。

在印象派画家中，德加、莫奈、马奈、雷诺阿、塞尚、毕沙罗等人尤为著名。1863年，被帝国拒于官方画展门外的印象派画家们自行筹办了“被拒绝者沙龙”的画展，标志着这一画派的正式崛起。这一年，德加发表了《奥尔良城的灾难》；马奈的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展出后，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这幅画描绘了几个穿着日常服装的男人与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子在草地上一起野餐的场面。马奈因此而遭到帝国卫道士的猛烈攻击，称他为“堕落”的艺术家。由于马奈等人真实地反映生活，所以印象派画家的作品逐渐为大众所公认，并传播到许多国家。1867年巴黎博览会上，印象派为自己争得了一席之地。印象派在帝国时期发表的其他作品主要有：《花园中的妇女》（莫奈、1866）、《伞状流沙》（雷诺阿、1867）、《团聚》（巴西尔、1867）、《阳台》（马奈、1868）、《鲁弗西耶纳驿车》（毕沙罗、1870）。

第四节 帝国的对外战争和覆灭

一、帝国的对外战争

[帝国的对外政策]路易·波拿巴为了笼络人心，欺骗舆论，满口大喊“和平”。可是，当他一登上皇帝宝座，就连连发动战争，试图消除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后果，重振法兰西威势，称雄欧洲，进而争霸世界。经济实力急剧膨胀起来的法国大资产阶级也迫不及待地需要扩大廉价原材料的来路、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因此全力支持拿破仑三世的对外扩张政策。法国殖民扩张进入一个新阶段。

为实现世界霸权的野心，拿破仑三世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策略，忽而拉拢英国，忽而又与俄国接近，因势取利，孤立和打击法国不同时期的对手，积极投入殖民扩张战争。

[克里木战争和巴黎和约]帝国进行的第一次战争就是参与瓜分地中海东部势力范围的东方战争，即 1853—1856 年的克里木战争。1853 年 6 月 14 日，俄国沙皇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以保护当地的东正教徒利益为名，派兵占领了属土耳其管辖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10 月，土耳其对俄宣战，但不久即被俄军击败。英、奥两国在这一地区皆有很多利益，不能容忍俄国的行动。法国不仅在该地区有巨额投资需要保护，而且从俄土冲突引起的列强对抗中看到了分化维也纳条约签字国的机会，因此与英国组成联合舰队，于 1854 年初驶入黑海。3 月 27 日，法英两国向俄国发出从占领地区撤军的最后通牒，遭到拒绝后即向俄国宣战。8 月 17 日，拿破仑三世下令联合舰队离开黑海西海岸向克里木进发。9 月初，以夺取俄军要塞塞瓦斯托波尔为主要军事目标的克里木战争拉开帷幕。这场战争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腐朽。而法英方面一则战场远离本土、补给困难，二则军中正值霍乱流行，甚至法军主帅也因此丧生，所以战争打得难分难解。在历时一年的血战中，法军死于霍乱和战场者将近 10 万人，耗去战费数百万法郎。1855 年 9 月 10 日，英法联军终于攻占塞瓦斯托波尔。1856 年 1 月 18 日，克里木战争结束。参战国在巴黎举行和会，签订了巴黎和约。和约规定黑海为中立海，禁止俄国在黑海保存舰队；多瑙河则为自由航行的河流。这样，俄国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遭到沉重打击，法英在土耳其地区的优势得以确立，法皇则称雄一时，取得了欧洲大陆上的霸权地位。

[意大利战争]这是拿破仑三世以援助意大利统一为名，蓄意策划的侵意反奥战争。克里木战争时，拿破仑三世就表示要支持撒丁王国的反奥战争，因此，法国与撒丁王国频繁接触。1858 年 7 月 21 日，拿破仑三世秘密约见撒丁王国首相卡富尔，与撒丁王国议定，法国援助撒丁把奥地利逐出伦巴第和威尼斯；作为交换，撒丁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同年 12 月 10 日，法皇与撒丁国王正式签约，确认上述协定。法国和撒丁王国方面的战争准备就绪。1859 年 4 月底，法国以奥地利对意大利进行战争威胁为由，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境内。6 月 4 日，法、撒联军在马让塔大败奥军。6 月 24 日，在索尔费里诺又展开大会战，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 17 万人，奥军死伤 22000 人，并准备后撤，威尼斯的解放指日可待。在胜利可望的紧急关头，法皇背信弃义，单独向奥地利提出停战建议。7 月 11 日，法国和奥地利

皇帝在维拉弗兰卡签署了损害意大利民族利益的停战协议。11月10日，法撒、奥撒、法奥撒诸方在苏黎世签订三份条约，规定奥地利把伦巴第归还撒丁、威尼斯仍由奥地利管辖，法国则得到萨伏依和尼斯。这样，法皇一箭双雕，既削弱了奥地利的力量，又不让意大利实现完全统一，以便使之继续有求于法国。拿破仑三世的这种背信弃义行为，不仅引起意大利爱国人士的愤慨，也遭到法国民主派的不满和反对。

[对亚、非及大洋洲地区的侵略]第二帝国除在欧洲进行战争外，还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给这些地区带来了深重灾难。

1853年，法国占领了大洋洲地区的新喀里多尼亚岛，使它沦为法国殖民地。在亚洲则多次武装侵略中国，并勾结清政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法国还参与组织洋枪队，先后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和杭州、绍兴等地的太平军。1857年，法国伙同英国组成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使中国南部大片领土惨遭蹂躏。1858年和1860年，法国又先后两次和英国一起侵略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法天津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不仅向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还开辟多处商埠并取得在华传教的特权。更令人愤慨的是法英联军在1860年10月火烧圆明园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在抢走价值连城的稀有国宝后，为掩人耳目，将这座举世无双的中国皇家园林古建筑付诸一炬！致使中国人民遭到无法估量的损失。

与此同时，法国自1856年起还进军印度支那，1859年2月占领西贡，迫使安南阮氏王朝签订第一次不平等的《西贡条约》、向法国割地赔款。1867年6月，法军占领安南仅存的三个省份，使整个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法军还向柬埔寨扩张，1863年8月11日，强迫它签约，使柬埔寨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866年3月，法国还以教案纠纷为由出兵攻打朝鲜。总之，第二帝国在广阔的亚洲地区几乎都留下了法国侵略军的脚印。

非洲历来是法国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1854年9月，拿破仑三世任命费德尔布为塞内加尔总督。费德尔布上任伊始，即建立塞内加尔银行，控制该国经济。继而又连年征讨，使之成为法国的殖民地。1857年，法军占领了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利亚山区和南部绿洲，从而完全征服该国。法国还极力扩大在埃及的势力，并通过国际竞争于1854年取得苏伊士运河开凿权。1869年，运河凿通，法国不仅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还巩固了在中东的地位。法国势力还伸向西非和赤道非洲，先后在马达加斯加、索马里、毛里塔尼亚、达荷美和苏丹等国，建立殖民据点和商站，取得贸易特权，扩充殖民势力。通过大规模的殖民扩张，到1870年，法国拥有的殖民地面积达9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50万，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

[墨西哥战争]拿破仑三世最大的殖民冒险是远征墨西哥。他对美洲大陆垂涎已久，早在1837年被流放美洲时就对这片广阔富庶的土地想入非非。从1858年起，他开始考虑远征墨西哥。1860年，以华累士为首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推翻了代表天主教会和大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墨西哥封建王朝，建立了墨西哥共和国。为改善财政状况，共和国政府宣布推迟偿还前政府欠下的外国债务。蓄意干涉别国内政的欧洲列强借机行事。1862年2月，以讨债为借口，法、英、西三国联合舰队在墨西哥登陆。墨西哥政府为免遭战祸，忍辱接受了列强的经济要求。英、西两国随之撤军，但拿破仑三世执意要实现他的美洲梦，因此增派数万远征军，继续向墨西哥腹地进逼，对当地居民进行血腥镇压。许多村落几被杀绝。1863年6月，巴赞将军率领的法军终于攻占了墨

西哥首都，推翻了华累士政府，废除了共和国。随后，法军授意墨西哥原王朝中的保守派和教会头面人物宣布恢复帝制，并于 1864 年 6 月迎立法国的傀儡、奥地利皇帝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皇帝。为赶走法国入侵军并重建共和国，墨西哥人民在华累士领导下，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1867 年 3 月，法军被迫撤出墨西哥，傀儡皇帝被华累士派枪毙。法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一无所得。这次殖民冒险的失败，对法国是沉重的打击，它动摇了第二帝国的根基，加速了灭亡的到来。

二、普法战争和帝国的覆灭

[内外交困的帝国]60年代后期，帝国已经处于内外交困之中，继1857—185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1865—1867年，周期性经济危机再度爆发，不仅破坏了工业的发展，而且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更大的灾难，引起了广大劳动群众和各阶层人士对帝国的严重不满和反对。连奥尔良派分子梯也尔也指责政府“种种错误无一不犯”。一切反对帝国的社会力量都加强了活动。除直接冲击帝国统治基础的工人运动正在迅猛发展外，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力量在帝国后期也迅速壮大起来。共和派一面极力和官方候选人争夺立法团中的地盘，一面创办报刊，宣传共和，并利用“博丹事件”向帝国发难。博丹是第二共和国议员，因反对路易·波拿巴政变，于1851年12月3日被波拿巴的士兵枪杀。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他的死并未引起人们注意。1868年，一位史学家揭露了事件真相。共和派对此广为宣传，以揭露波拿巴的暴虐，还通过报纸发起募捐，要为博丹建立纪念碑。帝国政府以“煽动人们仇恨和蔑视政府”的罪名传讯发起募捐的报纸负责人。但在法庭上，共和派律师甘必大列举帝国的种种罪孽，并指出是政变者“把法国投入了深渊”。共和派把帝国法庭变成了控诉帝国的讲坛，直接向帝国挑战。在反对帝国的斗争中，共和派的著名领袖甘必大还提出了民主改革的纲领《贝尔维尔纲领》。要求实行普选权，出版、结社自由，废除常备军，主张国家与教会分离，实行世俗义务教育等。此举与工人运动相呼应，在客观上动摇了帝国的基础，加深了帝国的危机。

与此同时，帝国在外交上接连受挫而日显孤立。拿破仑三世为摆脱困境，继续称霸，决心孤注一掷，终于发动了普法战争。

[普法战争的开始]1870年的普法战争是普法双方争夺欧洲霸权的一场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拿破仑三世力图通过战争转移国内视线，阻止德国统一，继续称霸欧洲。而普鲁士如同法国一样，也正需要战争。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既想通过武力打败法国、实现统一，又想夺取法国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称霸欧陆。因此，普、法双方都积极备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是普法战争的导火线。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推翻了女王的统治，王位虚悬。俾斯麦乘机用重金收买新政府实力人物，提出由普王的堂弟继承西班牙王位，因为后者是西班牙国王的女婿。1870年7月3日，西班牙新议会接受了俾斯麦的提议。此举使法国震惊：如果普王堂弟正式就任西班牙国王，西班牙将成为普鲁士的盟友，法国将腹背受敌。为此，法国向普鲁士提出抗议，英、奥、俄也附和这一抗议。普王迫于压力遂宣布普鲁士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要求。但拿破仑三世并不满足，命令法国驻普大使去普王威廉一世当时的休养地爱姆斯面谈此事，要求普王保证霍亨索伦家族永不继承西班牙王位。此次会晤虽颇多周折，但普王并未断然拒绝法方要求。事后，普王把会晤内容电告俾斯麦。但急欲战争的俾斯麦会同军方人士，删改电文内容，使之对法带有侮辱口吻，并将其公诸报端。俾斯麦断定此举“对高卢牛来说，将是一块红色的破布”。拿破仑三世看到电文后，果然极为恼怒，就以此为借口，于1870年7月19日向普鲁士宣战。

[色当惨败与帝国覆灭]拿破仑三世企图以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在短期内打败普鲁士。但是，战争一开始就暴露了第二帝国的腐朽。法国虽是宣战一方，其动员军队的速度和数量却远不如普鲁士。7月下旬，拿破仑三世

携带皇子、由奢华的侍从队伍护卫亲赴前线指挥，皇后欧仁妮在首都摄政。8月4日，普法双方正式交火，法军一个师初战失利。8月6日，麦克马洪指挥的军队在法国东北边境被普军重创，阿尔萨斯沦陷。弗罗沙尔指挥的另一支法军在边境地区也遭惨败。初战的连续失败，引起法国上下一片惊慌。奥利维埃内阁被欧仁妮作为替罪羊赶下了台，八里桥伯爵入主内阁，奉命组成没有皇帝参加的新政府。8月12日，摄政皇后把前线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此时，拿破仑三世已经失去了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他的统治已经终结。而普军乘法军主帅易人之时，迅速调兵遣将，以优势兵力将法军主力分隔开来。至8月底，普军在色当和梅斯分别完成了对法军两大军事主力的分隔包围。自8月30日起，普军猛攻色当，法军大量伤亡，军无斗志。9月1日，法皇在色当竖起白旗，皇帝和麦克马洪等将领及10万法军全部成为普军俘虏。

色当惨败决定了第二帝国的命运。9月3日，色当败讯传到巴黎，首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行动起来，并于9月4日发动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统治法国18年之久的第二帝国即告崩溃，从此结束了法国历史上王朝统治的时代。

第十章 第三共和国的确立

第一节 第三共和国的建立

一、9月4日革命

[色当败讯传到巴黎]1870年9月1日，拿破仑三世在色当投降。八里桥伯爵于当天晚上就获悉这一消息，可是直至3日上午，他在立法团会议上仍守口如瓶。下午，欧仁妮皇后正式收到路易·波拿巴已投降和被俘的电报。晚上，立法团再次开会，为讨论皇帝投降后法国政府的组成问题，八里桥伯爵才被迫向全国公布了色当投降的消息。

色当败讯一经传开，立即震动了整个巴黎。9月3日晚上，成千上万的工人、学生、国民自卫军战士和小资产者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布朗基派原来就准备于9月4日发起反政府的群众游行，如今见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就立即投身于斗争洪流之中。布朗基派打算占领立法团，迫使反对派议员宣布成立共和国，释放在押的有声望的小资产阶级政论家罗什弗尔等政治犯，并决心把群众游行发展成革命，进而建立革命政府。

立法团中的各个资产阶级派别也在紧张活动。共和派主张立即召开立法团会议，通过废黜路易·波拿巴和把政权交给立法团的决议。其实，波拿巴已成俘虏，废黜之举无大意义，他们只不过是趁合法地接管政权。以梯也尔为代表的奥尔良派主张成立一个由立法团任命的国防和管理委员会。波拿巴派则主张建立以八里桥伯爵为独裁者的国防委员会。各派对是否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却不闻不问。他们共同关心的只是建立一个有利于本派别利益的政权。

可见，色当败讯传到巴黎以后，要不要建立共和国成了人民群众和立法团中各个派别斗争的焦点。而随着斗争的发展，由谁来领导建立共和国又成了另一个焦点。

[9月4日革命和共和国的建立]9月4日早晨，示威游行的群众挤满了巴黎的主要街道，大多数工人走出工厂，涌上街头，成为游行队伍中最有生气的力量。推翻帝国和建立共和国是他们共同的斗争纲领，也是他们缺一不可的要求。中午，各区的游行队伍聚集在协和广场及其附近街道。下午1时后，游行队伍向波旁宫进军，沿途高呼：“打倒帝国”、“共和国万岁！”成千上万的示威群众，指望正在开会的立法团能迅速宣布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决议，但立法团议员的自私和无能使群众十分失望。为此，从下午2时半起，示威群众开始冲进立法团所在地波旁宫，大批群众站在宫内庭院和走廊上，不少人涌进了立法团会议厅，冲上了主席台。直至今刻，立法团议员仍只答应废除帝国。共和派议员甘必大规劝人们保持安静、遵守秩序；法夫尔更是用内战威胁群众。布朗基派成员对此置之不理，登上主席台，强烈要求议员们立即宣布推翻帝国、建立共和国。与此同时，布朗基派一面派人冲进监狱、

八里桥伯爵真名库赞·蒙托邦。1860年参加英法联军对中国的侵略，在北京附近八里桥一仗中指挥军队屠杀中国军民有功，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

释放政治犯，一面又在市政厅筹划建立革命政府。形势使共和派感到，若再不采取主动，他们就会被一场更激烈的革命所淹没。为了使立法团从人民的包围中解脱出来，也为了打乱布朗基派在市政厅的活动，甘必大和法夫尔以尊重历史传统为名，提出只有市政厅才是宣布建立共和国的最合适的地方。于是，甘必大提议：“公民们！让我们到市政厅去宣告共和国成立吧！”大多数群众跟随甘必大和法夫尔离开波旁宫，分别沿塞纳河两岸向市政厅进发。

下午4时，甘必大和法夫尔带领的两支队伍来到市政厅。市政厅广场挤满了人群，一些布朗基派成员和新雅各宾派打算赶在共和派前面宣布新政府成员名单，他们中的领导人之一米利耶尔还将拟就的名单从窗口扔给广场上的人群，名单上开列的成员包括布朗基、弗路朗基、德勒克吕兹、皮阿、罗什弗尔、甘必大、法夫尔等人。但是，他们为了等待罗什弗尔的到来而未及时向群众宣布这一名单。而当罗什弗尔在群众簇拥下来到市政厅时，共和派马上把他拉进他们正在拟定政府成员名单的房间，并且把他列入他们拟就的名单之中。结果，罗什弗尔宣读了由共和派拟定的临时政府成员名单，从而废除了第二帝国，建立了第三共和国。这样，革命成果就落入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奥尔良派手中，革命派试图利用罗什弗尔的声望来和共和派抗衡的想法落了空。

9月4日革命是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它推翻了帝国、宣告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成立。巴黎人民、尤其是工人，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可是，他们缺乏统一的集中的领导，唯一比较有组织的布朗基派也不善于领导群众进行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且在宣布革命政府成员名单问题上表现了明显的迟疑，再加上甘必大等资产阶级共和派在群众中尚有相当市场，因此革命的成果再次落到资产阶级手中。

二、国防政府

[政府的构成及其实质]共和派拟定的临时政府成员名单包括了原帝国立法团中所有巴黎议员以及甘必大、皮卡尔和西蒙三个外省议员。允许罗什弗尔参加政府，为的是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声望，给临时政府涂上进步的色彩。当时，普法战争仍在继续，普军正疯狂地向巴黎扑来。共和派没有掌握军队，又视革命群众如洪水猛兽，只得向巴黎总督、奥尔良派将军特罗胥乞求合作。特罗胥趁机要挟共和派，必须由他担任政府首脑，并确保宗教、家庭和私有制原则不受侵犯，否则，决不参加政府。共和派别无选择，接受了所有条件。法夫尔让出临时政府首脑的职位。9月4日晚上，临时政府成员开会组织内阁。特罗胥任政府总理兼巴黎总督，法夫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甘必大、皮卡尔、克列美和西蒙分别任内政、财政、司法和教育部长。费里、罗什弗尔等人虽属临时政府成员，但未担任部长职务。而原先不属临时政府成员的奥尔良派健将勒夫洛和福里松却担任了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要职，另一名奥尔良党人凯腊特里被特罗胥委任为巴黎警察局长。

9月5日，新组建的内阁在《致巴黎国民自卫军》公告中自称为“国防政府”，并声称它只有一个愿望：“拯救祖国”。其实，从国防政府的构成就可看出，它比临时政府已经倒退了一步。临时政府成员是清一色的共和派（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在国防政府中，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另一个君主主义派别——奥尔良派不仅窃据了总理职位，而且控制了军队和警察等要害机构。共和派并不掌握实权。因此，“这个共和国依照它那帮资产阶级首脑中的某些人的意图，不是只应充当奥尔良王朝复辟用的跳板和桥梁吗？”国防政府的这种政治构成既埋下了共和国政体危机的祸根，也决定了法国在普法战争第二阶段的继续失败。

[巴黎之围]色当战役以后，德意志统一的最后障碍已经排除。但是，普鲁士国王抛弃了不对法国人民作战的诺言，继续挥师向法国腹地进军。普军第三军团和第四军团分两路直扑巴黎。当时，巴黎以东和以北地区尚有许多法军据点，国防政府若能认真组织抵抗，有可能减慢普军推进速度、以赢得加强首都防御的时间。可是，这个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梯也尔游说欧洲各国朝廷，以废共和国、立国王为交换条件，乞求它们出面调解，而对首都东北方向各支法军不给任何增援，对人民自发进行的抗普斗争更是疑心重重，至使法国贻误了许多战机。

普军一面向巴黎方向长驱直入，一面又放出和谈烟幕迷惑法国。9月16日，俾斯麦代表普鲁士政府宣布，愿意与法国开始和谈。国防政府闻讯后更加放松了对普军的阻挡。这样，普军几乎未遇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就于9月18日完成了对巴黎的包围。

[人民的抗战活动]国防政府的政治构成从一开始就引起巴黎无产阶级，尤其是先进分子的不安。当他们看到这个政府听任普军长驱直入、并派遣梯也尔出使欧洲，拜倒在各君主面前乞求调解以后，他们对政府就警惕了起来。为了抵御普鲁士入侵军并监视政府的所作所为，巴黎的国际会员发起组织了各区警备委员会，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巴黎二十区国防共和中央委员会。在巴黎被围期间，这个委员会是领导人民抗战的实际中心。巴黎人民还

通过组织俱乐部和民众集会表达他们抗战的意志的要求。他们建议政府实行普遍征兵制，要求发给武器，建议利用教堂的钟、旺多姆圆柱和国王铜像铸造大炮。工人们还在集会上对政府的卖国政策进行尖锐批评。抗战心切的巴黎人民冲破了政府限制，在9月5日以后的3周时间里组成了194个国民自卫军新营，超过政府限额2倍多，使国民自卫军总人数达30余万。时人阿尔努回忆说：“在最初那些日子里，他们包围了区政府，要求发给武器”，“前来报名投军的公民人山人海，致使满足报名的要求成了最大的困难”。国民自卫军新营的成员大多是工人，他们自筹款项、制造武器，奋力投入保卫首都的战斗。正是因为这支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的存在，才使国防政府没敢在巴黎被围之初立即开门揖盗。

[政府中的投降派与抗战派]巴黎被围之初，军事上并未陷于绝境，首都拥有强大的武装：共有13万正规军、11万别动队以及新扩建的30万国民自卫军。巴黎防御设施坚固齐全，而且外省正在积极增援首都。如果政府放手与工人联盟并认真组织抵抗，守住巴黎进而击败敌人是可能的。可是在特罗胥、法夫尔、梯也尔一伙眼里，工人手中的步枪要比普鲁士的大炮可怕十倍。“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出于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需要，特罗胥一伙所要防御的首先是巴黎的工人；他们决定要巴黎饱尝饥饿和残杀的痛苦，并且借普鲁士之手灭绝巴黎革命力量，以便铺平自己卖国求荣的道路。为此，他们一面密切注意国民自卫军工人营的活动，残酷镇压敢于以暴力反对他们投降的革命群众，一面又故意频频制造军事指挥的失误，使大批国民自卫军官兵白白送死。

与此同时，国防政府幕后的投降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早在巴黎被围的第二天，法夫尔就亲赴普军大本营同俾斯麦开始了和谈。只因普方过于苛求，法夫尔担心接受后激起人民反抗才未敢签约。10月底，出使欧洲各国的梯也尔刚回到巴黎，政府立即又委派他恢复同普鲁士的停战谈判。10月27日，指挥将近18万法军官兵的巴赞元帅在梅斯向普军投降。当《战斗报》披露这一消息后，特罗胥竟然还发表声明，无耻赞扬巴赞是“不断以英勇的出击击包围城普军惊恐的光荣战士”。国防政府的最终目的就是最终使国内人民同意投降。

政府成员中反对投降、力主抗战的唯有内政部长甘必大一人。国防政府成立伊始，考虑到首都指日间就将被围，甘必大建议把政府迁往外省，以便使政府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巴黎被围以后，首都和外省联系被切断。10月7日，甘必大乘气球飞离巴黎，10月9日到达图尔，以内政部长身份兼领陆军部长之职，主持政府在外省的代表团的工作。在尔后近一个月中，他几乎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建立了包括步兵、炮兵、工兵在内的一支60万人的军队，领导除巴黎以外的整个法国，顽强地抗击普鲁士军队。他组织的卢瓦尔军团一度还收复了奥尔良城。甘必大的军事努力延缓了普军向法国纵深进逼的速度，减轻了巴黎的压力。

[巴黎停战协定]国防政府为迫使人民接受向普鲁士投降，从1871年初起加紧策划卖国勾当。在1月10日的政府会议上，特罗胥公然提出，“如果在巴黎城郊的大战中，死掉2万到2.5万人，巴黎就会投降”。政府还在1月17日的会议上专门讨论了进行投降谈判的人选、以法国还是以巴黎名义投

降、以及投降时采取那些措施对付群众反抗等问题。按照这一预谋，政府在1月19日和20日间蓄意制造了一场失败的出击，随后又大肆渲染法方的伤亡，企图胁迫人民承认投降是唯一出路。1月20日晚，法夫尔和特罗胥在区长会议上一唱一和，硬说巴黎不能再作任何抵抗，保卫巴黎只不过是“英勇的蠢举”。人民群众对这伙卖国贼忍无可忍，于1月22日举行了巴黎被围期间反对政府投降的第二次起义，又遭到残酷镇压。

至此，政府以为通向投降道路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便委派法夫尔从1月23日起再次和俾斯麦谈判，并于1月28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了停火时间及普法两军在法国各战场的停火线（但普军应停止对法国东方军团的军事行动却没有列入条款）；规定巴黎交出全部防御工事、绝大部分炮台和大批武器弹药，卫戍部队除留下一个师保留武器以“维持秩序”外，其余全被宣布为战俘；法国必须在三周内选出国民议会，以最终决定和战问题。只有国民自卫军没有放下武器。

对于特罗胥一伙的卖国活动，甘必大是有所警惕并极力反对的。直至1871年1月27日，他还给巴黎的国防政府成员发去这样一封急信：“无论从实际上看还是从法律上看，你们都不能代表政府投降。法国没有被击败。如果你们没有我们的同意和批准而签订了涉及巴黎问题以外的条款，那都将是无效的……”确实，如果综合考虑普法双方当时的军事、经济、外交以及战争潜力，就不难发现，法国远远没到无法继续作战的程度，而普方却行将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法国并不是被击败的，而是被国防政府出卖的。但是，甘必大过于迷恋“合法性”，不敢利用自己的地位去发动群众和投降派斗争。因此，当国防政府正式投降以后，他仅仅代表了消极的抗议，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局限性。

三、国民议会和梯也尔政府

[议会选举的背景]按照巴黎停战协定规定，法国必须在3周内选出国民议会，以便由它最终决定和战问题。

当时，德国军队占领着法国东部，北部和中部已由德国委派的省长管辖，法国被占省份达43个。巴黎和外省的联系已被切断，一切交通路线已被破坏。42万有生力量已先后被德军俘虏。甘必大派往东线解贝尔福之围的一支大军又受停战协定中一项秘密条款之害而被逼入绝境，8万人马只得越出国界，在瑞士被解除武装。不过，甘必大仍试图通过他领导的政府代表团对国民议会选举施加影响，以便选出一个主战的议会。为此，他通告各省省长，不让旧帝国官吏和现政府成员参加议会竞选。此举引起俾斯麦抗议。特罗胥和法夫尔马上加强对甘必大的压力，迫使他放弃这一决定。甘必大被迫辞职。此后，议会选举完全被投降派控制。

甘必大辞职以后，外省选举由政府信任的省长主持。农民在外省占绝对优势，他们处在帝国遗留下来的反动官吏、地主乡绅以及教士的严密控制之下，无法不把选票投给受官方支持的主和派。而当地的革命者和主战的共和派人士事先不知道停战协定，猝不及防的限期选举使他们根本无法展开竞选。因此，主和派在外省选举中窃取了胜利。在巴黎，以资产阶级君主派和温和共和派为一方，以激进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派别为另一方的竞选进行得十分激烈。鉴于前者在巴黎被围期间的丑恶表演，加上数万名富裕的资产者为躲避战乱已经逃离巴黎，结果削弱了主和派的社会基础，使之在竞选中遭到失败。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主和派在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压倒优势。

[议会成员的构成及其后果]1871年2月12日，国民议会在波尔多举行第一次会议。同日，国防政府宣告解散。聚会波尔多的共有645名议员（不包括后来马上辞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议员），主和派占压倒多数。而在主和派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这三个君主派又占了绝对多数。君主派能在这时重新抬头，完全是国防政府在议会选举中极力扶植的结果。主和投降是国防政府的政治需要，此种需要只有在君主派身上得到实现，所以，政府必然转向君主派。而君主派十分明白，9月4日巴黎革命以后，战争是在共和国的旗帜下进行的，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共和国的胜利以及自己的失败，因此也力主投降。国防政府和君主派在和战问题上利害关系的一致，决定了它们在议会选举中的勾结，成为君主派卷土重来的客观条件。

据统计，在645名议员中，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共占420名，自由派占80名，共和派145名（其中激进共和派不足40名）。因此，把这个议会称作“地主议会”可谓维妙维肖。

议会成员的这种政治构成不仅使法国的屈辱投降成为定局，而且使共和国本身的存在也成了问题。2月16日，国民议会选举领导机构。除议长格列维是温和共和派外，其余4名副议长全是君主派。议会下属各委员会的9名领导成员中，君主派占了8名，他们在议会中连“共和国”这一称谓也加以反对。可见，国防政府组建时埋下的共和国政体危机的祸根，在国民议会建立以后明显地暴露了出来。

[梯也尔政府和“波尔多协议”]梯也尔没有参加过国防政府，但在幕后参与了这个政府的全部投降活动。法国投降后，他凭自己长期从政的经验、

翻云覆雨的政客手腕以及在欧洲各国当权者中的影响，使自己成为法国大资产阶级处理战后棘手的内政外交事务中所“必需的人”。1871年2月17日，他被国民议会选举为“政府首脑”，二天后，他组成了战后第一届内阁。奇怪的是，虽然三个君主派别都在内阁中占据了位置，但是他把内政、外交、公共教育这三个部长职位留给了共和派。君主派在国民议会中的压倒优势在梯也尔政府中并未得到体现。3月10日，正当君主派就议会制宪权问题吵吵嚷嚷之际，梯也尔在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认为制宪时机尚未成熟，先要重建法国，政体问题留待以后解决（这一演说后来被人称为梯也尔和君主派达成的“波尔多协议”）。然而他又对共和派说：“共和国在你们手中，它将对你们智慧的奖赏。”梯也尔这种貌似折中、仿佛给各派都留下了希望的做法，客观上有利于共和派。他把议会中的君主派和共和派视为平起平坐的双方，说明他并没有认真地把君主派的多数放在眼里。怪不得共和派首领甘必大把他称为“我们对议会里保王党人的最好盾牌”。

象梯也尔这样一个与奥尔良家族关系很深的政客，为什么在普法战争后产生了偏于共和制的倾向呢？

梯也尔是个世故极深的老滑头。他知道，尽管君主派在议会中占有优势，但1871年的法国毕竟不再是君主制的天下，时势已不容王朝复辟。更何况君主派之所以在2月8日选举中获胜，一则靠了德国的刺刀，二则靠了他本人的活动。因此他不相信君主派真能在战后成什么大气候。值得指出的是，梯也尔的倾向共和，丝毫不是出于什么政治原则。《执政府和帝国史》的作者从来都是拿破仑一世狂热的崇拜者。他熟知拿破仑由军人成为第一执政直至称帝的历史，并渴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握有拿破仑般的权势。而在梯也尔眼里，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局正是他实现这一梦想的天赐良机：法国失败了，共和派削弱了，占据议会多数的君主派又分为三个派别，而他自己却当上了政府首脑。此刻他所关心的，当然不是王朝的复辟，因为任何一个王朝复辟，都不可能给他带来他已经拥有的权势。他最理想的政治方案是保留共和国、一个由他掌管的“保守的共和国”。所以此刻他最害怕的是站在他面前的武装起来的巴黎工人阶级。为了维护既得权势，他准备向巴黎的工人阶级下毒手。

第二节 巴黎公社

一、3月18日起义

[起义的胜利]梯也尔为解除工人武装，将大批军队从前线调进巴黎，并于3月16日召见高级官员、举行内阁会议，任命波拿巴分子瓦伦顿为巴黎警察局长，宣布巴黎立即进入特别戒严状态。3月17日，在陆军部大楼召开有军界要员列席的政府部长会议，决定夺取工人武装，并于当晚8时，在军官会议上宣布了具体行动计划。

1871年3月18日凌晨2点，梯也尔的反动军队偷偷地向蒙马特尔停炮场移动。将近5点钟，列康特将军指挥的步兵88团先头部队首先到达，他们开枪打伤了一名哨兵，并与守卫大炮的约20名国民自卫军发生流血冲突。凭借大部队的优势兵力，夺取了高地上的大炮。当反动派运走大炮时，被蒙马特尔的妇女发觉，她们敲响警钟，工人和广大市民，闻讯赶来，团团包围了军队，不让敌人拖走大炮。反动的列康特将军命令士兵向群众开枪。愤怒的群众严厉斥责军官这种替卖国贼效劳的可耻行为，并把广大士兵称作朋友，请他们不要朝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开枪。士兵为群众的爱国行动所感动，拒绝开枪，并准备站到人民方面。列康特见此情景，气势汹汹地一连下了四道命令，叫士兵立即开枪射击。可是88团士兵仍在沉默之中，此时一个叫维尔达格的中士，站了起来，向士兵们大声高喊：“枪放下！”并当场逮捕了列康特等许多反动军官，士兵们纷纷倒戈，站到人民一边，敌军被瓦解，大炮被安放到原来的位置，梯也尔解除工人武装的阴谋完全破产。几小时以后，列康特和另一名将军克列基·托马被革命士兵枪毙。

梯也尔蓄意挑起的内战，演变成了一场革命。正如革命的参加者，后来当选为公社委员的阿尔努所说：“3月18日的事件是在遭到卑鄙的进攻以后进行合理自卫的情况下发生的”。

3月18日早晨，蒙马特尔区的国民自卫军在费烈和雅克拉尔领导下，筑起街垒，拿起武器，迎接新的战斗。在塞纳河左岸，闻讯抢夺大炮事件后，于早晨8点左右，在杜瓦尔领导下，也集合起国民自卫军战士，加固各个重要据点，等候进攻。巴黎人民被反动派的突然袭击所激怒，他们决心投入战斗。

上午10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领导已经开始的革命。到会者一致认为，必须迅速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最危险和最重要的战略据点，特别是集中到蒙马特尔高地。11时，中央委员会发出了第一道“向蒙马特尔高地进发”的命令，瓦尔兰奉命率部开进蒙马特尔高地。与此同时，国民自卫军的营队迅速占领了一些区公所、兵营和政府机关。

下午2时半，中央委员会向分散在郊区的各营营长发出了向市中心挺进的命令，要求全面出击以便占领陆军部、市政厅和其他政府大楼。国民自卫军所到之处，政府军节节败退。一些反动军官狼狈逃窜。许多士兵还与国民自卫军握手言好、举行联欢。革命深入发展，梯也尔为首的反动统治集团，惊恐地说，我们完蛋了。如果再不离开巴黎，“我们都会被逮捕”。下午4时左右，梯也尔从旁门出宫，利用早已准备好的马车，逃往凡尔赛。政府官员、巨亨富商也一个个的溜往凡尔赛。根据梯也尔的命令，反动军队从下午

5 时开始，陆续撤出巴黎。晚上 8 时，国民自卫军占领了市政厅，鲜艳的红旗飘扬在市政厅的屋顶上，巴黎全市获得解放，巴黎工人夺取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革命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了实权，成了无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可是，他们没有乘胜追击敌人，而是立即宣布将通过选举成立公社。把政权移交给它。结果是敌人在磨刀，而人民搞投票，坐失时机，延误了革命。

[工人第一次选举自己的政府]3 月 26 日，巴黎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民主选举。在正式投票前一天，中央委员会号召巴黎人民“只有从你们自己中间选出来的，与你们同甘共苦的人，才能最好地为你们服务，要提防野心家和向上爬的人；……要提防言而不行的空谈家；……同样，也要避开财运亨通的阔佬，……总之，要挑选真心实意的人，……公认为正派的人。”巴黎劳动群众都积极参加了各区的公社选举，他们第一次行使自己的神圣权利。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产生的城市代表组成的。共选出 86 名公社委员，其中有 17 名资产阶级分子，不久即退出公社。公社尚有 68 名成员：32 名知识分子（有记者、律师、医生、军官等）、25 名工人、8 名职员、1 名手工业者、2 名小业主。就政治见解来说，他们多是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只有瓦尔兰等极少数的人接近马克思主义。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在公社中结成联盟，组成为统一的“多数派”，蒲鲁东派则被称为“少数派”。但是，不管那一派，他们多是各行业中的有文化素养、有组织才能的优秀分子，是一致公认的忠诚于无产阶级事业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属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成员约有 37 人，其中有瓦尔兰、弗兰克尔、杜瓦尔、鲍狄埃等，都是公社的出色领导者。

3 月 28 日，在市政厅广场举行隆重的公社成立典礼。这一天，市政厅广场上红旗招展，全副武装的 10 多万国民自卫军排着整齐的队伍威武雄壮地走进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怀着从未有过的欢乐心情，参加了这一盛会，主席台上坐着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新选出的公社委员。下午 4 时，中央委员会委员、新当选的公社委员兰维埃高声宣布：“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顿时，乐队奏起《马赛曲》的雄壮旋律，礼炮轰鸣，欢声雷动，数 10 万群众同时高呼“公社万岁！”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政权庄严地移交给公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政权——巴黎公社，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二、无产阶级自己创建的事业

[新型的权力机构]整个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欢呼声惊醒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权力结构，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所以，这个权力结构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不仅可以从公社领导成员的构成中，还可以从公社在政治、社会、经济等各方面所采取的措施中得到完全的证实。

在政治上，公社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1871年3月29日，第一个公告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各国家机关的职员一概无效”。在同一天，公社还宣布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用人民的武装来代替它，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接着，公社又宣布取消旧的警察和官僚机构，解散军事法庭、封闭资产阶级法院，释放在押政治犯。

巴黎公社委员会成为完全新型的全国最高的权力机关，为了领导好全国各部门的工作，行使新型国家的职能，公社于3月29日，给各委员分派了行政职责，并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具体分管全国各条战线的日常工作：

- 1、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
- 2、军事委员会。代替旧陆军部，负责军事领导和军需供应工作，取代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职能。
- 3、粮食委员会。负责粮食和食品的管理和供应工作。
- 4、财政委员会。代替旧财政部，负责国家的预、决算，财政拨款及各项税收工作。
- 5、司法委员会。负责诉讼工作和司法机构的改革工作。
- 6、治安委员会。负责社会治安和镇反工作。
- 7、劳动、工业和交换委员会。负责工人的劳动、工资、福利，领导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
- 8、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主管邮政、电讯和铁路、公路的交通运输工作。
- 9、对外联络委员会。负责外交工作，主管对内、对外的交往与联络。
- 10、教育委员会。负责教育事业，为实现免费义务世俗教育作准备，并进行教育改革。

每个公社委员都分别参加委员会并兼任所属区的区政府领导工作。这样，公社委员会就彻底废除了由少数人统治的资产阶级的官僚集权制，实行了由多数人统治的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所有重大问题，一律经过民主讨论，作出决议，然后再贯彻执行。

公社对旧社会的官僚特权独裁专横深恶痛绝，为防止国家干部搞特权和蜕化变质，公社决定废除了个人集权制、终身制和等级授职制，实行集体领导制，定期轮换制（执行委员会任期一个月，主席任期一周）。尤其具有深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8、379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468页。

远影响的是采取了如下两项果断的措施：

第一，实行普选制、监督制和撤换制。上至公社委员下至各级行政机构，司法部门及军队，厂矿企业等多数领导人均由人民民主选举产生。这就保证了人民把大家信得过的、真正能为民办事的优秀分子选进各级领导班子，从而彻底打破了“官职终身制”。同时，公社规定各级干部必须对选民负责，定期向人民汇报工作，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定期改选，对不称职者可以随时撤换，进行罢免。这充分体现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民主精神。

第二，公社为从制度上确保公职人员的社会公仆地位，规定了合理的工薪制度，取消高薪和一切特权。公社先后颁布了废除高薪和实行兼职不兼薪的法令。在4月2日公布的《废除国家机关高薪法令》中指出：“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国家机关的高级职务由于支給高薪，是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的；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里，既不应有乾俸，也不应有高薪；为此决定：……各公社机关的职员，最高薪金规定为每年6000法郎。”由于这一规定，担负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公社委员年薪不过5400法郎，大体相当于巴黎较好的行业中一个优秀工人的工资。5月19日，公社通过了取消兼职兼薪的法令，正式宣布“取消兼职兼薪”，除去本人日常工作以外，从事其他工作的公社工作人员，没有权利再领任何报酬。并废除任何特权。这就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保证公职人员的社会公仆本色，防止干部的腐化堕落。公社的许多领导干部，严以律己，廉洁奉公，从不擅权营私，对金钱财富，毫不动心，始终保持劳动者的本色，成为忠诚的社会公仆。

上述措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它反映了无产阶级国家同以往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根本区别。反映了巴黎公社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廉价政府”，也充分反映出这个新型政权的特点。

[公社的社会改造]公社在建立新型民主政权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措施，实行了对社会的全面改革。4月16日，公社通过了《关于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场转交工人协作社的法令》。法令指出：“鉴于大批工场被……业主所遗弃”，“使许多关系到公共生活的企业生产停顿，影响劳动人民的生活，为此决定，召开工会会议，以便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提出报告，拟定这些工场迅速开工的切实措施，开工将不指望潜逃的业主而是靠工人协作社的力量”。即使逃亡业主回来，也不再归还工场，而由工人协作社给业主一定数额的赎金。这一法令直接触动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而且实际上成为以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必要时对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赎买”政策的先声。

改革工薪制度。公社既降低了高薪，又提高了低薪，同时承认工资额的差别，力求使劳动报酬与劳动量相称，并使最高报酬与最低报酬之间相差7—8倍。公社的劳动报酬措施既反对了资产阶级的高薪特权，又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体现了公社政权对劳动人民物质利益的关心。所以，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

改革劳动立法，维护劳动者利益。4月20日，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废止面包房夜工制的决定》，一律取消面包房的夜班制。4月27日，执行委员会又通过《关于禁止任意罚款和克扣工资的法令》，严禁厂主对工人无理扣款和罚金，职工的薪水应全数发放，为打击承包商用低工资的办法从中剥削，还通过了关于包工合同的法令，宣布“凡是能够直接向工人协会签订的一切包工合同，都要委托给工人协会”。此外，公社设立了职业介绍所，着手解

决工人失业问题，尤其重视妇女的劳动就业；颁布了免除或延期缴纳房租的法令，征用逃亡资本家和官吏的住宅，分配给劳动人民居住；命令当铺把价值在 20 法郎以下的典当物品无偿归还原主，颁布了关于债务无息延期偿付的法令，规定所有债务的还期一律延长 3 年，不付利息。这就大大减轻了小商人和小业主的债务负担，争取和团结了中小资产阶级。公社还开办国营商店，其价格比私人企业低 1/3—1/2，以保证物资供应，防止中间剥削。

改革教育。4 月 3 日，公社颁布了“教会与国家分离”、“取消宗教预算”的法令，宣布教会财产“为国家财产”，反对宗教教育，取消学校里的神学课程，将教士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用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关注学生的道德修养。规定儿童免费入学，还开办职业学校。公社十分注意挑选有知识的世俗教师管理学校，不仅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而且较大幅度的提高了教师的物质待遇。通过改革，男教师的平均薪金增加 1—1.5 倍，女教师提高 2—2.5 倍，使广大教师从过去受歧视的悲惨境遇中解放出来，受到社会和人民的广泛尊敬，极大的激发了他们的事业心和积极性。

公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民族沙文主义，热烈欢迎和吸收外国人参加公社的斗争及公社的领导。匈牙利的优秀工人弗兰克尔担任了劳动和交换委员会的委员，波兰革命家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都成为国民自卫军的著名将领和军事指挥官。与法国工人并肩战斗的有波兰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英国人、罗马尼亚人、俄国人、匈牙利人等等。

通过改革，巴黎面貌焕然一新，巴黎人民广泛地组织革命俱乐部，每天约有 1.5 到 2 万人参加活动，心情舒畅地讨论国家大事，提出批评、倡议，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监督作用。

但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公社的变革仅仅是个开始，许多决议、法令还来不及付诸全面实施，而且还犯了许多严重的过错：诸如国民自卫军过早地放弃自己的权力，热衷于搞选举交权；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直捣反革命巢穴，结果反使反动派得以喘息之机，卷土重来；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致使反动派从中取得巨款作为扼杀公社的反革命经费；没有向全国扩大革命成果，建立起与农民的广泛联盟。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公社这个工人新型政权的不成熟。

三、公社的保卫战、失败与教训

[保卫公社的英勇战斗]梯也尔为首的反动派逃亡到凡尔赛后，时刻不忘扼杀公社，夺回失去的天堂。为此，他们一面玩弄“和谈”阴谋，假装同公社谈判议和，以争取时间；一面加紧收罗残兵败将，重整军队，拼凑反革命武装，由加利费将军统率，准备疯狂反扑。4月2日清晨，他们开始炮轰巴黎，出动军队，试图夺取直通巴黎市中心的讷伊桥。遭到公社战士的严厉回击。接着，梯也尔任命麦克马洪为总司令，并乞求俾斯麦放回6万俘虏，总共调集和整编成拥有11万兵力的反革命武装，勾结德国以完成对巴黎的包围圈。

4月7日，梯也尔军队凭借军事优势，攻打讷伊桥和靠近巴黎防御工事的许多据点。公社战士在巴黎城防司令东布罗夫斯基和南部地区司令符卢勃列夫斯基等将领领导下，组织反攻，公社战士日夜奋战，多次击退了10倍于己的敌人。

由于领导的软弱和分裂，严重削弱了公社的领导力量。加利费乘机发起大规模进攻，5月8日，伊西炮台被凡尔赛匪徒占领。巴黎西、南线的要塞均被敌人攻破。接着，反动派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继续夺取伊西地段并开始强渡塞纳河。

5月10日，梯也尔政府与德国正式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法兰克福和约》，法德反动派公开勾结，共同扼杀巴黎公社。5月中旬以后，凡尔赛军队紧缩对巴黎的包围圈，梯也尔公开叫嚣，他“将手持法律进入巴黎”。

5月21日下午3时，在间谍杜卡特尔的指引下，梯也尔大批反动军队，迅速通过不设防的圣克鲁门，冲入市区。

[五月流血周与公社的失败]5月22日（星期一），凡尔赛近10万反动军队，一夜之间开进巴黎，双方开始了激烈的巷战，即著名的5月流血周。公社军事代表德勒克吕兹草拟了《巴黎公社告巴黎人民并国民自卫军》书，号召人民“为了光荣的法兰西，向着敌人进军吧！”巴黎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公社号召，挺身投入保卫公社的战斗。

5月23日，凡尔赛军从三方面向公社最重要的阵地蒙马特尔高地进攻。公社战士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使敌军每前进一步都付出重大代价。公社女英雄路易丝·米歇尔领导妇女营同来犯的敌人英勇搏斗，牵制敌人达数小时之久。公社的著名将领东布罗夫斯基也亲临最危险的地带组织防务，并严词拒绝敌人用150万法郎的重金对他的收买，继续指挥战斗，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35岁。

5月24日，战斗异常激烈，战场集中在市政厅周围。公社社员顽强地阻击敌人向市政厅进逼，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年轻的公社检察长里果率领一队国民自卫军到监狱，把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决后，便奔向街垒，与敌人作殊死战斗。不久被旅店主出卖被捕，匪徒们逼他喊“凡尔赛军队万岁！”他却高呼“公社万岁！打倒杀人犯！”最后，被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25岁。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天，晚上，市政厅被反动派攻克。

5月25日，激战的重心移向巴黎城东工人区。在沙托·得奥广场战斗进行得特别猛烈，德勒克吕兹、泰斯、龙格等许多公社委员都在这里为保卫公社作殊死斗争，德勒克吕兹在伏尔泰路的街垒上光荣殉职。公社任命瓦尔兰为军事代表，指挥最后的战斗。

5月26日，战斗主要在11区的圣安东和12区的贝尔西进行，尤其是巴士底狱广场和文新车站的战斗十分残酷，公社战士誓死保卫公社，守卫在达利格勒和克罗查提街垒的100名公社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名公社老战士不幸被俘，敌军官想把这位老战士拉到垃圾堆上去枪毙，老人巍然不动，大声怒斥说：“我勇敢地进行了战斗，我有权利不死在垃圾堆上。”视死不牵动一步，表示出人身不可侮的美德。这一天，公社丧失了巴黎城内的全部据点。

5月27日，公社只剩下了19区（伯利维尔区）和20区（麦尼尔蒙坦区）两个工人区。幸存的公社战士主要集中在肖蒙高地、伯尔维尔高地和拉雪兹神甫墓地，瓦尔兰身先士卒，奔走于街垒之间，指挥并参加战斗，每条大街，每个街垒，每座房子里，公社战士都在同敌人拚搏。守卫肖蒙高地的战士们，同比自己多20倍的敌人进行死战，直至高地失陷。为保卫拉雪兹墓地，约200名公社战士同5000名凡尔赛匪徒决战，多次打退敌军的进攻。最后在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声中全部壮烈牺牲，为保卫公社的正义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至5月28日，公社还残存着伯尔维尔高地约4平方公里的地区，公社战士在瓦尔兰指挥下继续坚持战斗，英勇的法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疯狂暴戾面前，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一直奋战到底。下午3时，公社的最后一个街垒被敌人攻破。傍晚，杰出的公社活动家瓦尔兰被一牧师出卖而被捕，他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和游街示众达数小时之久，瓦尔兰的一只眼珠被挖出，浑身被军刀砍伤，无法站立，仍宁死不屈，并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站起来连声高呼：“公社万岁！”最后，壮烈牺牲，时年32岁。

震撼世界的“五月流血周”就此结束，存在72天的巴黎公社被梯也尔反动派扼杀在血泊之中。黑暗重新笼罩了巴黎，到处都是白色恐怖，被杀、被关、被流放者总计达10万人以上，整个巴黎冤狱遍布，尸横遍地，鲜血染红了塞纳河水。

但是，巴黎无产阶级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监狱里、法庭中和刑场上，以及在流放所里，继续斗争，歌颂公社的正义事业。

公社失败后不久，著名的工人诗人、第一国际委员、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怀着血海深仇写下了激动人心的无产阶级战斗诗篇《国际》。17年后，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它谱了曲，定名为《国际歌》。从此，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响彻寰宇，激励着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公社的成败教训]由于无产阶级实现社会主义胜利的主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巴黎公社被强大的敌人镇压了，但它留给后人的成败教训却是深刻的。马克思在他的名著《法兰西内战》中，对此作了科学的总结。1891年，在纪念公社20周年准备出版《法兰西内战》的德文版时，恩格斯写了长篇《导言》，对公社的成败教训作了重要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在各自的论述中，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取得解放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夺取领导权，建立起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正民主的“廉价政府”。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公社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些宝贵经验，又一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第三节 共和制度的确立

一、梯也尔的保守共和国

[君主派复辟活动的第一次浪潮]公社的失败不只是工人的失败，它同时意味着保卫共和制力量的削弱。正因为如此，君主派在公社被镇压后立即掀起了复辟活动的第一次浪潮。

为了创造君主制复辟的条件，波旁王室长幼两支图谋融合。1871年6月，奥尔良派王位觊觎者巴黎伯爵致函正统派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表示愿意放弃对王位的要求，而尊尚博尔伯爵为整个波旁王室的首领。作为报答，尚博尔伯爵指令议会中的正统派议员支持奥尔良派为确认儒安维尔亲王和奥马尔公爵（七月王朝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第三、第四子）的当选资格而作的努力。1871年6月8日，两派使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1832年和1848年对波旁王室成员的流放法。这样，虽在2月8日当选议员，但慑于流放法而不敢赴会波尔多的儒安维尔亲王和奥马尔公爵，在其当选资格被议会确认后，得以大模大样地在凡尔赛就席。

正当波旁王室长幼两支为重新修好而眉来眼去之际，在“9·4”革命后沉寂过一阵的波拿巴派也重新活跃了起来。他们出版书籍、创办刊物，竭力为帝国辩护，并把法国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9·4”革命。拿破仑一世的生卒日期、欧仁妮皇后的生日等都成了波拿巴派聚众集会的时机。巴黎有一家咖啡馆是他们天天聚会的场所，以至人们把这家咖啡馆所在的街称为“厄尔巴岛街”。

君主派的复辟活动已经处于紧锣密鼓之中。国民议会建立时已经暴露出来的共和制危机，正在演变成共和制可能被推翻的现实危险。

[梯也尔就任总统及其活动]梯也尔对复辟君主制的冷淡虽然使占议会多数的君主派感到不满，但是，一则因为刚刚镇压了巴黎公社的梯也尔正炙手可热，二则因当时的法国百废待举，梯也尔仍是“必需的人”，所以君主派还不打算和他彻底摊牌。1871年8月31日，议会通过“里韦提案”，梯也尔成为“共和国总统”。表面上看，除政府首脑外，梯也尔又多了总统的头衔。实际上，鉴于议会同时规定，总统和政府部长都要对议会负责，而且还增设了副总理的职位，因此，梯也尔在议会里的法律地位只和部长一样，而且还要受到副总理的掣肘。尽管如此，梯也尔仍然采取措施努力使保守的共和国在法国得以巩固。

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重新整顿经历了外战和内战而陷于一片混乱的法国，其中最紧迫的任务是履行法兰克福和约规定的对德赔款的条款，以便尽早结束法国的被占领状态。据和约规定，法国在1874年3月2日以前需对德赔款50亿金法郎。其中5亿应于政府在巴黎恢复统治后一个月内交付，10亿在1871年12月31日前交付，5亿在1872年5月1日前交付，其余30亿在1874年3月2日前付清。法国未付清赔款前，德军仍占领法国。为此，梯也尔于1871年6月和1872年7月，两次发行公债，获得了巨大成功。1873年3月，法国提前一年付清了赔款，德军则于同年7月提前撤离法国领土。

梯也尔还整顿军队，加强国力。1871年6月29日，他在龙尚举行了军事检阅。次年春，他解散了国民自卫军，并在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重整

法国军队。

整顿和改组国家机构。为了使外交官向国内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梯也尔撤换了一批无能的驻外人员，整肃了外交官队伍。调整了地方行政人员，撤换了一些平庸的省长，并主要根据才干而不是据其政治色彩任命了一批较有作为的省长。他还建议国民议会加强地方立法，并总结了巴黎被围时期外省与首都联系中断后很多省份无所适从的教训，扩大了各省议会的职权。

梯也尔对恢复法国经济做了大量工作。至 1872 年底，法国的道路、桥梁全部修复，经济出现了好势头。这一年法国的外贸总值达 70 亿法郎，比战前的 1869 年增加了 7 亿。

梯也尔为维护金融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把 1848 年革命中被没收的财产归还给奥尔良王室成员。同时还颁布法律，对工人运动继续进行镇压。梯也尔的种种活动，对重新振作战败的法国，在客观上起了积极作用。

[梯也尔的辞职]1873 年 3 月，当法国付清了对德赔款、法德关于德军撤离法国的协定在柏林签署后，梯也尔仿佛成了法国的“领土解放者”，议会特意通过了“梯也尔有功于祖国”的决议，法兰西学士院也随之选他为院士。梯也尔的荣誉达到了顶点，但君主派对他的容忍此时也到了极限。君主派和梯也尔之间在政体问题上的矛盾，此时因对德关系的缓和迅即暴露出来。梯也尔不再是“必需的人”，君主派要摆脱他。

在 1871 年 3 月“波尔多协议”以后的 2 年时间里，梯也尔对君主制复辟的可能性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怀疑。1872 年 11 月，梯也尔在议会发言中明确宣布：“共和制存在着，它是国家的合法政体。”并且警告君主派，舍此将会出现新的革命。在和君主派的另一次辩论中，他直率地说：“……我实施共和制是因为两个理由：一则因为我已投身于此，二则因为如今实际上不可能有别的做法。”

梯也尔已经成为君主派的眼中钉。从 1872 年 6 月起，在奥尔良派头面人物布罗伊公爵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反对梯也尔的派别，并在加紧活动。由君主派控制的议会，于 1873 年 2 月底通过法令，禁止梯也尔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直接登台发表演说，他只能通过一个部长来宣读其书面发言。君主派还在 1873 年 4 月 2 日迫使温和共和派格列维议长辞职。5 月 18 日，君主派聚会，商定推翻梯也尔后将推举麦克马洪接替总统。5 月 19 日，君主派在议会里对梯也尔实施的政策提出质询，指责他为激进派进入议会提供方便。5 月 24 日，议会以 362 票对 348 票的多数对梯也尔政府投了不信任票。梯也尔被迫宣布辞职。当天晚上，被恩格斯称为“法国最大的笨蛋”的麦克马洪元帅继任总统。

二、麦克马洪和“道德秩序”

[麦克马洪的道德秩序]麦克马洪是色当战役中的败将，曾经被俘，后又 被遣送回国。他之所以被君主派选中，因为他是顽固的君主派。

1873年5月25日，麦克马洪任命奥尔良派重要头目布罗伊公爵为副总理，麦克马洪沿用梯也尔惯例，自己兼任总理。布罗伊实际上拥有政府首脑的职权。次日，麦克马洪在议会宣读了由布罗伊代他起草的总统咨文：

“在上帝和我们永远忠于法律的军队的帮助下，在一切教养有素的上流人物的支持下，我们将继续从事解放领土，并重建我国的道德秩序。”

这个咨文是麦克马洪的施政纲领。其中关于继续解放领土云云，纯属空话。咨文中的“上帝”意味着教会和教权；“教养有素的上流人物”是督政府时期统治者的惯用语，它专指那些拥有地产的阔人；而军队在这里则一如既往地 被作为政权的支柱。因此，麦克马洪所要重建的“道德秩序”，实际上就是依靠军队的力量，重新整顿教会和有产者的统治秩序。可见，重建“道德秩序”不过是加强教权势力、复辟王政的代名词。

[波旁两派融合的失败和总统七年任期法的通过]在麦克马洪上台所造成的政治气氛中，在教权派的助威声浪中，波旁王室长幼两支加快了联合复辟的步伐。1873年8月5日，两位伯爵在尚博尔伯爵住地会晤，双方商定由正统派尚博尔伯爵登基（以亨利五世名义即位），因尚博尔伯爵无嗣，所以，巴黎伯爵为王位继承人。会晤中巴黎代表奥尔良家族向正统派的首脑致以敬意。

这次会晤在法国引起巨大反响。君主派、尤其是正统派为此欣喜若狂，在正统派的别墅和城堡中，人们赶制国王用的轿式马车和白旗，暗中盘算各自在未来宫廷中的职位。

正当君主派沉浸在复辟狂热中时，一件意外之事发生了：1873年10月30日，正统派机关报《联盟报》奉命发表了尚博尔伯爵三天前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重申了登位的先决条件——取消三色旗，采用波旁王朝时代的白旗为国旗。这一态度和主张保留三色旗的奥尔良派大相径庭，双方各不相让，于是波旁两派的融合顿时化为泡影，君主派的复辟计划也随之流产。

对于法国形势的这种转变，教皇庇护九世曾懊丧地说：“只是为了那么一块破布”。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君主派复辟计划之所以流产，首先是由于法国广大人民群众和共和派的坚决反对。当然，波旁两派融合的失败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

正统派代表大土地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他们当中除少数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外，绝大多数是外省地主和乡绅，土地仍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是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和神权政治的遗老遗少，1815—1830年间的复辟王朝是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目标。

奥尔良派是七月王朝的拥护者。他们代表金融贵族的利益，和旧制度中由银行家、包税人、军火供应商、国家特许公司股东等构成的社会势力一脉相承。此辈中拥有地产者虽也不乏其人，但就总体而言，他们大多是金融界豪富、商业界巨贾、或是大工业公司董事会里的要人。他们之所以主张君主制，是因为需要用这种形式来加强对资产阶级其他集团的驾驭和控制，以确保自己的优势。所以，他们心目中的君主是听命于他们这个集团的资产阶级君主，而不是向他们发号施令的封建国王。

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之间不同的政治主张和经济利益，促使了他们之间的融合必然破产。

但是，君主派的复辟梦想仍未泯灭，他们决心东山再起，为赢得时间，在布罗伊操纵下，议会在 1873 年 11 月 20 日通过了把麦克马洪总统任期延长为 7 年的法案。布罗伊的如意算盘是：延长麦克马洪的任期、以排除别的派别复辟的可能；如果疾病缠身的尚博尔伯爵在 7 年内去世，奥尔良派就乘机复辟。

可见，总统 7 年任期法的通过是要稳定麦克马洪的地位并巩固没有共和党人的共和国，为复辟创造条件。但是，在共和派的努力下，法国政局却起了不利于君主派的变化。

[1875 年宪法]在“波尔多协议”以后的将近 4 年时间里，法国政体始终处于没有一部根本大法可资依据的临时状态之中。不过，法国政坛的格局却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国民议会中共和派的力量有了明显增强。议会建立之初，共和派议员人数不足君主派的 2/5。但在当年 7 月 2 日举行的议会补选中，共和派却在 114 席中占据了 99 席。这说明君主派在议会建立之初能取得压倒多数，完全是由于当时的特殊环境。一旦选民有了自由表达意志的机会，他们就毫不含糊地选择了共和制。1871 年 10 月 8 日，在各省省议会选举中，共和派占据了省议员总数的 2/3。共和派不断壮大的趋势即便在麦克马洪当上总统以后依然不衰。1873 年 10 月——1875 年 2 月间举行的几次补选中，共和派在 29 席中得到了 23 席。到 1875 年初，议会中共和派的数量不仅远远超过每一个君主派，而且与三个君主派之和也已相当接近（大约为 4：5）。

共和派力量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们进行的宣传，尤其是对农民的宣传。共和派提醒农民，王朝的复辟意味着他们小私有者地位的丧失，意味着什一税甚至意味着封建义务的恢复。而正统派在这一时期的活动恰恰为共和派的宣传提供了佐证。这些被大革命所打倒、在复辟王朝时期向农民勒索了 10 亿法郎“补偿”、然后又沉寂了近 40 年的法国旧制度的残渣余孽，此刻重新在公众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他们公然主张恢复波旁王朝时代的白色国旗，并且和教权派紧抱一团，这就使农民真切感到了复辟封建义务和什一税的危险，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正因为如此，1873 年 10 月，当尚博尔伯爵似乎登位在即时，上卢瓦尔省、阿尔代什省及塞纳—马恩省的农民，立即以《民法典》为武器，展开了对君主派的斗争。显然，农民态度的转变，对于共和制确立关系极大。

与此同时，议会中三个君主派的力量也起了很大变化。波旁两派由于重新交恶而相互削弱了力量。总统 7 年任期法通过后，正统派撤销了对布罗伊内阁的支持。1874 年 5 月 16 日，处于共和派和正统派左右夹攻中的布罗伊内阁倒台。波旁两派内讧为波拿巴派死灰复燃创造了条件。1874 年 5 月—1875 年 2 月，在补选的 13 名议员中，共和派占 7 名，奥尔良派占 1 名，而波拿巴派竟占 5 名。1874 年 3 月，拿破仑三世之子已满 19 岁，达到原帝国规定的政治上的成年年龄。为此，波拿巴派在全国掀起拥戴这位废帝之子的运动，并且产生很大的影响。同年 5 月 24 日，拿破仑三世的前宫廷侍从布古安在被共和派视为禁裔的涅夫勒省出人意外地得以当选，而且公开宣称他对帝国的忠诚。6 月 5 日，一位议员在议会出示一份文件，证明波拿巴派已经建立了旨在复辟帝国的全国委员会。

波拿巴派的再起，向议会中其他各派表明，如果再不结束政局的临时状态，刚被推翻的帝国就有可能复辟。这种前景无论是共和派还是波旁两派都是不能接受的。于是，制订一部宪法来结束政局的临时状态、以制止波拿巴派复辟，成了共和派和波旁两派的共同政治需要。这种共同的政治需要又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例如，巴黎伯爵就曾指示其追随者，对共和派要表示一定程度的和解。而共和派则在甘必大推动下也改变了过去否认国民议会制宪权的做法，转而和奥尔良派就制宪问题开始谈判。共和派以同意建立参议院等条件换得了一部分奥尔良党人对共和制的承认。这就形成了通过共和宪法的客观条件。1875年1月30日，瓦隆提出的、确认共和制为正式政体形式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以1票的多数得以通过。同年2月和7月，国民议会又先后通过关于参议院组织、政权组织及政权机关间关系的一系列法律，合称1875年宪法。

1875年宪法不是一个统一的法律文件，它只是一系列法律文件的总称。宪法在法国正式确立了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两院组成的议会，并分别规定关于总统、众议院、参议院的选举、组成、职权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但对公民的权利只字不提。宪法赋予总统以极大的权力，如，统率军队、任命全体文武官员、有权特赦、有权在参议院赞同下解散众议院等等。宪法规定众议院由普选产生，任期4年。而参议院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9年，并且规定1/4的参议员由国民议会选出、并终身任职。这种规定违背了共和派传统，当然更不为人民大众所希望，反映了明显的保守性。其所以如此，因为它不是人民群众斗争的直接产物，而是共和派与君主派相互妥协的结果。它反映了法国当时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共和派力量虽有发展，但不足以单独制宪；君主派虽无力复辟，但把某些政治要求塞进了宪法。

然而，这部宪法的通过，毕竟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它为共和国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依据。为斗争中的共和派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使君主派此后的复辟活动又多了一重障碍。

[新议会选举和西蒙内阁的建立]根据1875年宪法规定，必须进行新的议会选举，但有75名终身任职的参议员按规定必须由国民议会本身选出。因此，国民议会在解散以前还需进行参议员选举。为了牢牢掌握参议院以对抗共和派在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中可能赢得的优势，布罗伊公爵十分重视这次选举。他精心策划，提出了一份由62名君主派和13名中左派（即接受了共和政体的奥尔良派左翼）组成的候选人名单。可是，正统派因为和奥尔良派融合失败而把后者视为破坏复辟的罪人，波拿巴派因奥尔良派对帝国的指责也对其心怀芥蒂，两派便打算联合共和派，共同对付奥尔良派。当共和派首领甘必大获悉这一情况后，马上从中看出了可供利用的机会，便和两派谈判，并亲自领导了这场富于戏剧性的选举。结果，在75名终身任职的参议员中，共和派占了60名，赢得了新议会选举过程中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1875年12月31日，国民议会自行解散。1876年1月30日，参议院选举揭晓，在参议院300名议员（包括75名终身任职的参议员）中，君主派共占154名，只占微弱多数。在同年2月20日和3月5日举行的众议院的两轮选举中，共和派获得压倒多数，在总共533个席位中占据了340席，君主派只占155席，另有30多席为中间派占有。

1876年3月8日，众议院正式集会。鉴于当时担任内阁总理的比费，在4个选区的竞选中均遭惨败、被迫辞职，麦克马洪需要另外物色组阁人选。

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制惯例，议会中多数派首领理应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而在 1876 年 3 月的法国，这个人就是共和派首领甘必大。可是，麦克马洪无视议会制原则，从奥尔良派左翼中挑选了一位 78 岁高龄的杜福尔作为内阁总理，并且还以政局需要为名，责令杜福尔保留比费内阁中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人皆是君主派）的职位。麦克马洪此举的用心不言自明。

杜福尔内阁注定是无所作为的，它既受制于麦克马洪总统，又要受到众议院共和派多数和参议院君主派多数的两面夹攻，因此左右为难，处处碰壁。1876 年 12 月初，杜福尔辞职。

1876 年 12 月 13 日，麦克马洪责成温和共和派西蒙组阁。西蒙是国防政府时期的主和派，1871 年 1 月底，曾受国防政府之命去波尔多取代甘必大。麦克马洪据此把他看成甘必大的政敌，他任命西蒙的目的在于分裂共和派，但是，从客观上说，任命西蒙也是麦克马洪对众议院共和派多数作出的无可奈何的让步。因为自从第三共和国建立以来，由共和派出任内阁总理，还是第一次。所以，西蒙的上台，表明共和派的力量正在超过君主派。

三、共和制度的确立

[君主派的新反扑] 新议会选举和西蒙内阁建立以后，共和派在众议院内就财政改革、军事、铁路垄断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利用其多数地位使议会作出了有利于共和派的相应规定。君主派虽然失去了对众议院和内阁的控制，但还占据着共和国总统的职位和参议院多数，他们总想伺机向共和国发难。

1877年3月，教权派机关刊物《社会和宗教卫报》透露了君主派的杀机：“香榭丽舍宫从来没有把1875年宪法放在眼里。元帅只是因惊人的克制才容忍了朱尔·西蒙先生……，麦克马洪元帅正在等待宣布结束（共和制）试验的时机……，以后，他再也不许（共和派）越雷池一步了。”信号一经发出，教权派蜂拥而上。蒙贝利埃主教把共和国说成是“一片混乱”；翁热主教竭力鼓吹恢复长子权和宗教婚姻。纳韦尔主教干脆致信麦克马洪总统，要他立即和意大利世俗政府断交，以示对教皇的支持。

针对教权派掀起的旨在颠覆共和国的新浪潮，甘必大于1877年5月4日在议会发表重要演讲。他严正警告教权派：“你们要么不做法国人，要么服从法律”；在结束演讲时，甘必大引用其朋友的一句话向教权派宣战：“教权主义，这就是敌人！”随后，甘必大领导议会中的共和派，促使西蒙政府作出了限制教权派活动的规定，给了教权派以有力打击。

打击教权派就是打击君主派。麦克马洪读了甘必大在议会的演讲稿后，暴跳如雷，公开宣称“让步已到极限”。君主派和共和派之间的再次较量已不可避免。

[1877年5月16日事件] 针对共和派对教权派的打击，君主派决意进行报复。1877年5月15日，众议院通过法令，恢复陪审团对于新闻出版违法案件的审理权。西蒙对此并未反对。而在君主派眼里，恢复这一权利，无异于对他们社会秩序的侵犯。于是，在布罗伊公爵支持下，麦克马洪决定借机向共和派发难。5月16日，麦克马洪致信西蒙，指责他无力制止众议院通过上述法令，迫使他辞职。麦克马洪告诉西蒙，他“宁肯被推翻，也不愿受甘必大指挥”。共和派内阁的被推翻，这就是法国近代史上著名的“5·16事件”。君主派反攻倒算的帷幕拉开了。次日，布罗伊公爵再次组成君主派内阁，并让波拿巴派铁腕人物富尔图担任举足轻重的内政部长。

为了对付君主派的反扑，众议院的363名共和派议员采取一致行动，签署了《363人宣言》，强烈谴责麦克马洪。6月16日，甘必大在议会猛烈抨击麦克马洪强加给众议院的布罗伊内阁，把它称为“教士的政府，神甫的内阁”。6月19日，众议院以363票对158票通过决议，拒绝承认布罗伊内阁。麦克马洪见众议院不肯就范，就伙同参议院的君主派于6月25日解散了众议院。君主派和共和派的斗争进入高潮。

[众议院重新选举和麦克马洪辞职] 为赢得新众议院的多数，双方都投入了空前激烈的竞选活动。君主派利用其执政地位，竭力打击共和派。据统计，从布罗伊5月17日组阁到10月14日第一轮选举揭晓，政府共罢免25名共和派省长，解散了613个支持共和派的市镇议会，撤换了共和派市长1743人，副市长1344人。1385名共和派官员被解职，另有4799人被调离要害部门。共和派聚会的2067家酒吧间被关闭，344个共和派团体被禁止活动。这一时期，共和派人士因竞选而被判刑的总计达46年，罚款总额达100多万法

郎。波拿巴派的一家地方报纸甚至叫嚣：“我们要把共和国和共和派搞成连狗都不吃的烂泥浆！”君主派如此穷凶极恶，怪不得时人爱德蒙·阿布写道：“布罗伊—富尔图内阁的杰作就是在5个月内集中了专制帝国在18年里专横跋扈地所干的一切”。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共和派加强团结。甘必大成了共和派无可争辩的首领。为了集中力量，甘必大提议，6月19日投票反对布罗伊内阁的363名共和派议员，在竞选中不要成为竞争对手。他又把3家最有影响的共和派报纸联合在一起，作为指导共和派斗争的舆论中心。甘必大告诉人们：“看起来我们似乎是为政体的形式和宪法的完整性而战，但这场斗争还有更深刻的意义。这是1789年革命的继承者和旧制度特权等级的残余及罗马神权政治的代理人之间的斗争”。

由于法国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支持，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在同年10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再次获胜。10月14日，第一轮选举揭晓，共和派就占了很大优势。11月7日，新众议院集会；经过议员当选资格的审查，共和派占了更大优势。甘必大担任了众议院议长，君主派的反扑彻底失败。麦克马洪曾指望利用军队举行政变，但他发现，大部分官兵倾向于共和制，于是只得屈服。11月10日，布罗伊内阁倒台。12月13日，共和派再次组阁，夺回了行政权。这时，共和派已经有了主动进攻的力量。1879年1月5日，他们乘参议院改选之机，又赢得了参议院多数。1879年1月30日，麦克马洪见大势已去，被迫辞职，共和派格列维担任总统。至此，众、参两院、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掌握，共和派全面胜利的格局已经形成，“共和派的共和国”终于得到最终的确立。

[共和制最终确立的原因及意义]第三共和国初期，君主派以议会多数派的有利条件图谋复辟而终究失败，共和派一度居少数地位而终于确立了共和制，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首先是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共和制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二帝国18年间，法国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和工业生产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是法国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迅速膨胀。这支与日俱增的力量曾因拿破仑三世空前强大的军事警察官僚机器而被排斥于帝国政权之外，因此十分不满。因此当帝国一旦倾覆，他们就立即跃上了政坛。他们凭借日趋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不断扩大的社会影响，以前所未有的凌厉攻势重新提出了对政权的要求。在政体问题上和形形色色的君主派展开激烈的角逐。

除了工业资产阶级以外，中产阶级、即被甘必大称为“新阶层”的力量此时也有新的发展。“新阶层”主要是指城乡中小资产阶级，如：小工业家、批发商、店主、建筑工程承包人，以及律师、医生、记者等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同样利用了帝国垮台后一度出现的政治真空，积极开展活动。

还应当看到，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派别提出的建立共和制的主张，客观上迎合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为在70年代，农民已经习惯了共和国，他们反对君主派搞政变。工人群众对于共和制的态度更为鲜明：1873年4月，正是靠了巴黎工人的支持，“新阶层”的候选人、激进共和派巴罗德才当选了议员。选举中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尽管工人和他们的老板之间矛盾重重，但只要老板赞成共和制，工人在选举中就投老板的票。对于这种情况，君主派中比较清醒的人也是能认识到的。德·莫子爵就无可奈何地说过：“我们是君主派，但法国不是”。由此可见，在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建立共和制

乃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历史必然。

此外，君主派内部的矛盾和分裂（一个王位，三个王位觊觎者）、共和派内部的相对一致、以及共和派采取的正确斗争策略（分化瓦解君主派、积极争取军队和农民等），都对共和制的最终确立起了重要作用。

共和派对君主派的胜利对于法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19世纪70年代，法国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自19世纪30、40年代无产阶级带着自身独立的政治要求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争夺政权的第三位战士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在大革命以后至第三共和国确立的90年间，法国社会还存在着其他多种矛盾，其中资产阶级与传统的封建势力之间的较量仍表现得非常突出。封建势力总伺机对大革命的成果反攻倒算，以恢复他们昔日的黄金时代。复辟王朝时期的查理十世便是此种势力的典型代表。1830年复辟王朝的被推翻，并不意味着这股社会势力的绝迹。他们虽然被逐出了政坛，但仍在乡间固守着传统的地盘。70年代，他们利用外敌入侵、国内战争之机重新抬头，并一度成为国民议会中最强大的集团，于是便在查理十世之孙领导下，掀起了复辟查理十世事业的浪潮。尚博尔伯爵有句名言：“我个人微不足道，我的原则就是一切”。什么原则呢？就是由白旗所象征的封建王权和神权统治法国的原则。正如马克思所说：“法国人民起初以为所有高贵的布索那克们已被埋藏，如今看到他们重又出现，感到惊讶和耻辱，他们已经明白，不仅需要进行十九世纪的革命，而且必须彻底完成1789年的革命，即把这些畜牲赶到农村中一切牲畜的最后归宿——屠宰场里去。”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和共和派对正统派的斗争具有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性质和意义，而斗争的胜利也意味着1789年革命的彻底完成。

与此同时，共和派对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的胜利，结束了七月王朝和第二帝国时期由资产阶级中某个派别集团独霸政坛的局面。“因为单单王朝这个名称就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集团驾驭另一集团，意味着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失败（意味着一方的得胜和另一方的屈辱），而共和制则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从此，资产阶级各个集团都在政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以共和制为政体形式的统治得到最终确立。现代法国的政治制度（如总统七年任期制、两院制、政党内阁制等）基本上是在第三共和国确立时期形成的。对于以往的资产阶级君主政体而言，共和制是一个进步，它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分享政权的机会，促进了法国工业资本的发展。

共和制对于君主制的胜利，客观上也有利于无产阶级。因为共和制是使无产阶级有可能去准备进行彻底解放斗争的制度。恩格斯在《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文中曾对当时法国共和派的胜利作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任何君主制的复辟必然会带来暴力的统治，对各种社会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压制，而这正是工人阶级应当力求避免的。另一方面，保存现有的共和政府，至少使工人阶级仍然有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以便创办工人报刊，在集会上进行鼓动和组织独立的政党；此外，保存了共和国，工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文版第178页。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文版第113—114页。

人阶级就不必在将来专门为了赢得共和国而再进行斗争了。”“可见，不管目前法国的共和政府怎样被人瞧不起，然而，共和国的最终建立毕竟使法国工人有了一个基础，可以组织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并且在将来不是为他人的利益而是为它本身的利益进行战斗。”

工人运动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论断。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后处境极为困难的法国工人，一面积极投入保卫共和国的斗争，一面又利用共和派胜利所造成的客观条件，努力开展谋求自身解放的斗争。

第十一章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的法国

第一节 经济与社会

一、人口演变和经济的缓慢发展

[人口演变趋向]人口增长的缓慢，长期困扰着法国社会。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人口问题尤为突出。1876 年，法国总人口 3700 万，1911 年为 3960 万，平均每年净增长不到 10 万人。人口总数自 1860 年被德国超过后，1890 年又被英国赶上，1910 年落到意大利之后。

法国人口的出生率很低，而且呈现下降趋势。1872—1875 年间的出生率为 26.2‰，1896—1900 年下降到 21.9‰，一次大战前只有 20‰，根据 1911 年的统计，10%的家庭没有孩子，27.9%的家庭只有一个，23.7%的家庭有两个孩子，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占少数。

法国出生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各阶层人士都不愿多生孩子。广大小农不愿把很小一块土地再分割给后代，而靠剪息票为生的中小食利阶层，则力图保持原有的生活水平，许多中产阶层为使子女有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社会升迁的机会，有些工人则响应一些工会实行“肚腹罢工”的倡议，不愿为资本家提供任人剥削的劳动力，以及不充任帝国主义的“炮灰”。

法国这时人口绝对值还能缓慢增长是由于死亡率下降和大量外国移民的补充。19 世纪中叶，法国死亡率约为 23‰~25‰，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下降到 18‰，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860 年，男性为 38 岁，女性为 41 岁，1910 年，男性达到 48 岁，女性达到 52 岁。这一时期，大量外国移民取得法国国籍，1872 至 1911 年间，有 99.2 万移民成了法国人。1914 年，法国有外国移民 160 万。

人口的缓慢增长，引起法国人口结构老化，严重影响民族的活力，同时，在经济上，法国也由此缺乏社会需求的刺激，阻碍了生产的发展。

法国人口演变中的另一种现象是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这在人口的地理流动和生产部类间的流动中都反映出来。阿尔卑斯、比利牛斯和中央高原等山区以及法国南部和巴黎盆地东部乡村人口逐渐减少，许多人涌向一些工业化的省份，如塞纳、诺尔、加来海峡、罗讷河口、以及法国东部地区。从生产部类看，从事第一部类（农、林、渔业）生产者向第二部类（工业）和第三部类（运输业、商业、服务业）转移。第一部类的从业人数在 1872 年占全法总从业人数的 52%，1913 年降为 42%，同期第二部类从业人数和总从业者之比从 23%上升到 31%，第三部类从 25%上升至 27%。

但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者为数不多，主要是一些因农业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劳动力、无业农民和工匠、小业主。流动是缓慢的，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人口的大多数仍在农村。1914 年，城市人口为 45%，乡村人口占 55%。

[工业]普法战争后，法国一直为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70 年代末，公共工程部长、工程师夏尔·德·弗雷西内制订了全力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计划，即著名的弗雷西内计划。其目标是完成铁路网的建设，完善水陆航运体系，使商港拥有现代化设备。80 年代开始，国家拨出了 50 亿法郎的专款，用于此项建设。在 20 年的时间内，法国新修筑了近 20 万公里的公路、3 万公里

的铁路，开凿了 200 公里的运河，新辟和疏浚了勒·阿弗尔、南特、波尔多、鲁昂、敦刻尔克等近 10 个港口。从而进一步疏通了国内水陆交通，刺激和推动了整个工业生产的发展。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法国工业发展的中心是铁路建设，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交通运输本身。1870 年，法国有铁路交通干线 2 万公里，1913 年增至 4 万公里，并且新建了地区性铁路 1.1 万公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拥有 12,000 个火车头。

铁路的建设促进了重工业的发展。生铁产量由 1870 年的 117.8 万吨增至 1900 年的 271.4 万吨，1913 年达到 500 万吨，钢的生产由于采用了托马斯炼钢法等新工艺，产量激增，由 1870 年的 11 万吨增至 1903 年的 463 万吨。诺尔省和加莱海峡省形成了巨大的冶金工业中心。煤产量这时也不断增加，由 1880 年的 2000 万吨增至 1913 年的 4000 万吨。但法国仍十分缺乏焦煤。同时，还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门，如水力发电、汽车制造、制铝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等，一些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居世界领先地位。到 1913 年，法国汽车年产量达 45,000 辆，其中一半远销国外，铝的年产量达 13,500 吨，均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化工产品的产量，也仅次于德、美，名列世界第三。然而，重工业总的水平远不及美、德、英诸强。

轻工业也有发展。作为法国传统工业的纺织工业，不仅在国民经济和出口贸易中继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到 19 世纪末，不少地区手工纺机已经消失，因此工效大为提高。法国奢侈品制造业，仍占突出地位，时装、化妆品、丝织品和葡萄酒的生产占世界第一位。

[农业]19 世纪晚期法国的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仍占很大比重，农村中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大农场发展了，农业中的机械化程度也提高了。1862—1892 年的 30 年中，播种机从 10,853 架增加到 52,327 架，收割机从 8907 架增加到 23,432 架，脱粒机由 100,733 架增加到 234,382 架。此外，化学肥料的使用也大幅度增加。生产效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法国主要农作物小麦和马铃薯的产量均有增加，继续保持着欧洲主要小麦生产国的地位。而且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日趋明显：在地中海沿岸以种植蔬菜和鲜花为主，西北部以畜牧业和种植甜菜业为主，北部以小麦为中心，南部则主要种植葡萄。

另一方面，小农在农业中一直占居优势。1882 年占地 10 公顷以下的小农占总户数的 85%，占土地面积的 35.3%。依靠双手劳动的小块土地占有者，人为地阻碍了机器的推广和生产力的发展。19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世界性农业危机，严重地冲击了法国的农业，廉价粮食的大量进口，促进本国农产品价格连续下跌，小农无力与外国竞争，纷纷破产，再加上葡萄种植园的严重根瘤蚜虫病，引起葡萄大片死亡，种植面积大大减少。1882—1892 年葡萄种植面积从 219.7 万公顷减为 180 万公顷，即减少了近 40 万公顷左右，葡萄产量几乎减少一半。小麦播种面积也从 1885 年的 695.7 万公顷减少到 1900 年的 686.4 万公顷。

面对农业的萎缩，法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各种保护政策，1892 年实行梅林关税法，大幅度提高关税，限制农产品进口，并强制提高小麦收购价格，减低农业税，拨款资助葡萄种植者，设立农业奖励金，建立农业信贷银行和兴办农业技术学校。由于政府采取种种保护农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农业的发展因此，从 1895 年开始，农业状况有所改善，粮价开始回升。

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法国的农业生产却处于停滞状态，生产率比英国、荷兰、比利时都要低，农场的规模也很小，每个农场的平均规模不及美国的1/6，英国的1/3。

[经济缓慢发展的原因]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是法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法国在工业上的进步表明法国已经开始了以电力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然而把法国经济发展和同期美国、德国、英国相比，却显得缓慢，它在世界工业中所占的地位已从第二位沦为第四位。1894年，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只有29亿美元，而美国高达94.98亿美元，英国和德国则分别为42.63亿美元和33.57亿美元。法国经济，尤其是工农业发展相对缓慢，其原因393 393是多方面的。

第一、法国的政治结构对经济的影响。长期以来，掌权者多为金融资产阶级，不少掌权者本人就是金融家。因此，他们无例外地代表了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把主要资金投入金融事业，放高利贷，很少投入工业生产，这无疑阻碍了法国工业的迅速发展。

第二、法国的经济结构也影响了工业的发展。法国经济结构中有许多明显的特点，如传统的奢侈品工业占优势，排挤和阻碍了其他工业的发展；分散的小企业、小手工业占优势，到19世纪末，94%的工厂还只有1—10名工人，拥有工人总数的60%，严重阻碍了技术革新和现代化；农业中的小农经营占优势，造成国内商品市场的狭小，自由劳动力的限制。加上农业生产的分散和落后也势必阻碍工业的发展。

第三、普法战争的影响。战争不仅破坏了安定的环境，而且使法国损失了200亿法郎（包括赔款）和丧失了煤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两省，还丧失了约占全国1/4的纱锭，引起了法国资金、燃料和原材料的严重缺乏，尤其是燃料的不足，必然导致工业的缓慢发展。

第四、经济危机的冲击。法国在这个时期里，曾于1873、1882、1891年三次爆发经济危机，打击了经济的发展。例如1882年的危机，使7000余家企业倒闭，引起了冶金采矿、铁路、建筑、纺织等各个工业部门生产的大幅度下降，致使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约倒退了5年。此外，也由于法国机器设备陈旧，资本家不愿搞固定资本更新，同样影响工业的发展。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法兰西的民族心理。普法战争的失败与巴黎公社的被残酷镇压，严重地伤害了民族自信心和热情，广大民众失去了建设的热忱，产生了严重的消沉心理，这无疑会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所有这些，使法国经济发展出现了相对缓慢的状况。

二、法国帝国主义的形成

[工业集中和垄断] 随着工业发展，各行业之间的竞争加强了，从而促进了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组织的产生。垄断组织首先出现在冶金工业中，早在1877年成立的龙维辛迪加，联合了全国13个最大的铸铁企业。1887年出现的西克列达辛迪加，垄断了全世界铜销售量的30%。化学工业中，也出现了垄断组织。20世纪初，垄断组织又有了进一步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重工业部门和新兴工业部门。在冶金工业中，施耐德和温代尔成了最大的垄断资本家、施耐德发迹于勒克勒佐，20世纪初年，作为冶金企业的老板，他不仅生产钢铁，也生产铁路和公用事业的设施、军火和工业机械，他还拥有勒克勒佐的煤矿和诺曼底的铁矿并且还通过掌握温代尔公司的一些股份，把触角伸向洛林，在波尔多，还参与建造军舰，在国外，还控制了俄国部分冶金企业。温代尔以洛林为大本营，控制了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铁，以及荷兰的煤，他的主要经济活动在冶金业，是名符其实的“钢铁大王”。在化学工业，佩施内、圣·戈班、久尔曼三巨头控制了整个行业；雷诺和佩若垄断了全国的汽车工业。

工业的集中有利于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推广，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法国冶金垄断组织采用托马斯炼钢法来处理含磷量较高的铁矿石，加速了洛林铁矿的开发，1880年，洛林钢的年产量1,600吨，1913年增至230万吨。洛林已在冶金方面名列前茅。这一时期，法国科技发明也明显增多，法国授予的专利权从1880年的6000件上升到1907年的12600件。此外，随着生产的集中，怎样科学地组织劳动，加强企业管理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泰罗制引起人们的兴趣，泰罗的著作《工厂管理》法文版在1903到1913年间发行了6版。法国还采用工人入股的方法，到1911年，共有114家公司推行了这种做法。

但是，法国工业生产的水平和集中程度远远不如美、德诸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的生铁产量不到美国的1/6，钢产量不到美国的1/10。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象施耐德、温代尔那样的托拉斯形式并不多见。虽然法国在冶金、棉纺、煤炭、石油等行业曾出现确定价格和销售市场的卡特尔形式，但常常十分脆弱，昙花一现。法国较普遍的垄断组织形式是辛迪加，它负责协调同业资本家在流通领域里的经济活动，也参与和各国垄断同盟达成瓜分世界市场的国际协定。所以在这种垄断形式下，各企业在生产上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从总体上说，法国的生产还很分散，中小企业仍然占优势。

[高利贷帝国主义] 法国垄断资本的明显特点是银行资本的发展和集中远远超过了工业资本。这一时期创设了许多新银行，1872年成立了巴黎荷兰银行，在国外还设立了分行，很快成为法国最强大的金融集团之一。1875年又成立了东方汇理银行，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亚洲许多国家，成为进行殖民侵略的有力工具。1901年开办了法国工商银行和西非银行。同时，银行也迅速走向集中和垄断。以前的一些“高级银行”于1874年联合组成了巴黎银行，1904年改为巴黎联合银行。一些存款银行把势力扩展到全国各地，在地方上设立分行，如1913年，兴业银行拥有分行560个，里昂信贷银行有411个。在1914年银行资金总额已达110亿法郎，其中最大的五家银行（法兰西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兴业银行和巴黎荷兰银行）占有资金80亿法郎，掌握了全国银行资本的2/3。除法兰西银行执行国家银行的职能之

外，其余 4 家银行垄断了全国有价证券的发行，组成了“大银行托拉斯”。

法国银行资本家为了稳妥的攫取高额垄断利润，也为了外交斗争的需要，把积聚起来的巨大的货币资本，大量输往国外，只把很少一部分投入国内工农业生产。输往国外的资本也不直接投资于工商业，而是采取借贷资本的形式，坐收渔利。在第一次大战前，法国资本输出额大幅度增加，1890 年，输出资本为 200 亿法郎，1902 年增至 270 亿至 370 亿法郎，到 1914 年则猛增到 600 亿法郎，在 20 年中增加了 3 倍。法国资本的输出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法国把资本主要投放在欧洲，尤其是俄国。到 1914 年，法国借贷给俄国的资本总额达 140 亿法郎。其次是借贷给邻国的意大利、西班牙、奥匈帝国以及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诸国，总数达 120 亿法郎。而对所属殖民地的投资却很少，只占总投资的 1/10。可见，法国资本输出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

法国借贷资本的大量发放，带来了多方面的经济利益，最突出的是利息收入，每年至少可得 17.05 亿法郎，最高的年息收入达 30 亿法郎。放高利贷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业，这样，在法国不仅大资本家从事高利贷活动，广大的中小资产阶级也常常将款项存入银行或购买股票债券以攫取高利收入。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靠剪息票为生的食利阶层，在大战前夕，这个食利阶层总计达 200 万人以上，连同家属约 500 万人，占全国人口的 1/8。法国成了典型的食利国，明显地表现出法国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所以列宁称之为高利贷帝国主义。

[金融资本的不成熟]法国垄断资本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金融资本的不成熟。金融资本，按照列宁的定义，即工业资本和银行的溶合和混合生长。这种溶合的过程，在 20 世纪初的法国还处在开始阶段。

20 世纪初，一些工业巨头插手银行事务，如施耐德在 1904 年建立的巴黎联合银行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工商银行，如巴黎荷兰银行，法国工商银行，巴黎联合银行及里尔、里昂、马赛、南锡、格勒诺布尔等地的地方银行则积极参与工业投资。从而使金融资本有所发展。

但从整体上说，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溶合不紧密，它们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法国的工业企业对银行抱不信任态度，他们不希望受制于银行，因此他们的扩大再生产往往通过自身积累来解决。据统计，1900 年到 1913 年，在每年的工业投入中，71%来自企业本身的积累，29%来自企业外部，其中包括银行购买股票和债券。从银行方面来说，里昂信贷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兴业银行、工商信贷银行等四大银行逐渐减少工业投资，不参与企业事务，甚至不提供中长期贷款。里昂信贷银行董事长亨利·瑞尔曼曾在 1905 年说：“工业企业……甚至是管理最好的企业都担有风险……这和使用存款银行的资金所必需的安全是不相容的。”法国金融资本的不成熟性，反映了法国帝国主义比之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相对落后。

三、社会各阶层的状况

[支配阶级]这是由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两大类组成的上层统治者。到 20 世纪初期，它们虽然失去了政治统治的垄断权，但是在政治上、经济上仍然拥有巨大的实力。这些贵族不仅拥有土地，在政府机构中身居要津，而且投身新兴工业部门，成为实力浓厚的企业巨头。至于大资产阶级其经济力量更加强大。在工商界中占居优势地位，财富高度集中。仅在巴黎就有 50% 的大资产阶级年收入达 100 万法郎以上。他们为维护自身的权益，把势力渗透到报界和政府机关各个部门，通过行政管理，控制国家事务。总之，这两大阶层继续凭借其实力在国家机构中保持着牢固的支配地位。

[新阶层]他们通常是人们所说的中等阶层或中小资产阶级。这个新的社会阶层的代表，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逐步进入政界，分享统治权。数以百万计的手工业和小商业构成了法国小资产阶级的基础，也是新阶层的组成部分。人数众多的中等企业主、老板和食利集团则构成了新阶层的核心。而分布各地的自由职业者，诸如律师、医生、教师、工程师、记者以及公务员等等，是新阶层中最活跃分子，成为新的显要人物。他们有较优厚的收入，每年工资约 1—3 万法郎之间。其中越来越多的人被推选为议员、市长和内阁部长，直接参与了各级政府的管理。例如在众议院里，这个阶层的比例从 1871 年的 27%，上升到 1893 年的 40%。它们成为维护共和制度的中坚力量。

[农民]农民占法国人口的大多数，成份极其复杂，因此很难把他们视为一个阶级。

从事农业生产者大体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承租他人土地者。在法国，有相当一部分土地贵族居住在大都市，把自己的土地租佃给他人经营，或以现金，或以分成制收取地租。承租者包括土地经营者和分成制佃农。他们的生活境遇、社会地位大相径庭。大土地经营者一般雇工经营，有时还兼营农产品加工业，他们富有，懂技术，常常互相联姻，由此成为乡村的上流人士。小土地经营者靠家庭成员自己经营，生活艰辛，尤其是分成制佃农，处境更为艰难。

第二类是耕种自己所有的土地者，据 1892 年统计，这类人占全部农户的 75%。其中有大土地所有者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由于占有的土地面积和肥沃程度不等，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也相差悬殊。

第三类是主要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农业工人，有短工和长工之分。短工的报酬以日计算，其中约半数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打工是作为生计的补充。长工是长期受雇的农场帮工，在 1892 年，他们有 183.2 万人，其生活条件往往是十分艰苦的。此外，还有些季节工和生活在林区的伐木工、烧炭工等。在最初的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中，他们是率先者。1862 年尚有长工和短工 2400 万，1892 年减少为 305.8 万。

农民成份虽然复杂，但其主体是小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经营者，即小农。小农构成法国乡村社会的最大部分。

广大小农租税沉重，还深受高利贷的盘剥，处境艰难。他们希冀有一份自己的财产和安静稳定的生活，信奉的是狭隘的个人主义。他们不主张革命，但同时又把 1789 年革命视为自己财富的起源。随着第三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农民作为选民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由于交通运输发展，大批农民进城经商做工，一些青年农民离开家乡服兵役，从而加速了城乡开放和交

融，使农民开阔了眼界，给农村注入了新思想，农民不再对贵族老爷顶礼膜拜，在南部和中部乡村，宗教活动也明显减少。同时世俗化教育使保守的传统小农头脑开化，增加了共和意识。广大小农成为共和国的忠实卫士，成为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工人阶级] 工人依然保持着成份的复杂性和分散性，人数很难确定。直到 1891 年，工人总数约 600 万人，其中家庭工业占 15%，自由个体工匠占 14.8%，独立手工业者占 9%，属于产业工人的约 330 万人。根据 1896 年的调查，1—10 人的工厂占 36%，10—100 人的工厂占 26%。这说明大多数的工人分散在中小企业里劳动。法国工人成员的复杂性和分散性，使工人运动的联合产生了困难。

在工人斗争的不断推动下，工人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工资待遇有所提高，工时也在缩短，社会保险制度开始起步，失业率下降。同时工人也获得了一定的民主自由权利，工会组织合法化了，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一些工人代表进入了议会。据众议员社会成份统计，1893 年工人议员占全部议员数的 5%，1919 年上升为 10%。

但是工人阶级仍然是被压迫阶级，生活还未获得根本改善。工人的劳动时间仍然很长，一般在 9—11 小时之间。有些行业更由老板随意决定。工人的生活没有保障，实际工资在危机年代常常大幅度下降，也面临失业的危险（20 世纪初失业率仍有 10%，1913 年还有 5.2%）。即使在平时，资本家对广大工人仍然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不少行业中工人的工伤严重，许多童工常常惨死在厂房、车间。工人的住宅条件可谓西欧最差。在北方城市中的许多纺织工人，一般 3、4 人同住一间，多者达 8、9 人合住。没有卫生设备，光线暗淡，空气混浊。

工人阶级由于其成员的复杂性，内部的分散性以及劳动条件、生活条件的不同，造成了阶级觉悟的差异和各自的不同要求。但是，大多数工人，尤其是大中企业中的工人，他们意识到自己是被压迫的“奴隶”，把工厂称为“兵营”从而认为必须组织起来，同政府和资方进行斗争，必须自己掌握命运。所以，他们倾向社会主义，其中的先进分子成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骨干力量。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在法国社会中地位较高，从大革命开始，知识分子便积极参政。而德、意、俄与法国相反，知识分子是被排斥在政权之外的。由于法国知识分子的这一特点，他们不但不去抨击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理论，反而积极奉行，使自己成为统治者中的一员。知识分子在议会和政府中占有很大比重，所以当时有人称共和国为“律师和教授的共和国”。但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则经常处于挨饿状态，受着压迫和剥削，同体力劳动者相差无几。因此，他们的自我意识增强，其中有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工农相结合，成为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保尔·拉法格已经自觉地意识到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并严厉批评那种对知识分子采取歧视和排斥态度的错误倾向，强调要把更多的优秀脑力劳动者吸引到社会主义方面来，以便担负领导解放全人类的重任。尽管知识分子只占法国总人口的 2%，但在社会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日常生活

[技术发明带来的便利] 这一时期，法国的科学技术在总体上和经济一样落后于欧美的一些强国，但在一些领域出现了许多世界先进水平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和从国外引进的先进技术一起，不仅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也直接改变了法国人的日常生活。

首先表现在交通和通讯上。1890年以前由于价格昂贵，自行车只限于富人使用，90年代以后，逐渐进入寻常百姓家。1893年自行车数量达15.1万辆，1897年增至40.9万辆。自行车进入乡村后，促进了村庄之间的交流，使年轻人有可能去参加附近村庄的节日聚会。妇女们扩大了她们的生活圈子。工人们也开始购置自行车，他们由此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工业区以外的世界。

汽车在这时由试制进入工业生产阶段。1894年，汽车从巴黎到鲁昂的平均时速达每小时21公里，汽车数量为200辆，到1896年，汽车增至1200辆。1895年，阿尔芒·波若把他的厂改名为波若汽车制造公司，1899年雷诺也建立了汽车制造厂。当时汽车的机器声嘈杂，也不太舒适，加上价格昂贵，只有极少数富翁们使用。

尽管有这些新的交通工具，但火车在长距离的旅行中仍然是最重要的。这时铁路交通得到了改善。铁路网延伸到了乡村，火车的速度加快，车厢更舒适，增设了有过道的车厢、卧车和餐车等。

城市公共交通也在发展。1895年巴黎出现了用蒸汽机为动力的有轨公共汽车，1900年建成了第一条地铁，1910年，第一批公共汽车投入运行。

电话机开始在城市普及，1893年用户有2.7万家，1900年达到7万家，1913年增至31万家。

能源的开发也直接影响日常生活，尤其是电的使用。1882年，法国在多菲内地区建立了第一座水力发电站。同年，物理学家马赛尔·德普勒发明了远距离输送电力的方法。从1889年起，巴黎开始采用电灯照明，但主要是在塞纳河右岸的富人区，这使巴黎获得“光明之城”的美誉。1914年各大城市都用上了电，但仍有不少普通老百姓的家里使用煤气灯。

给人民生活带来更直接利益的是医学的进步，查明了一些病的病原和防治方法，初步奠定了医学微生物学的基础。1880年法国医生阿·拉维兰，第一次发现了疟疾的病原体是一种最简单的寄生物——疟原虫，为防止疟疾找到了病原。法国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用减毒的炭疽和鸡霍乱病原菌制成疫苗，对绵羊和鸡接种，免疫成功。1885年，他把疫苗接种直接用于人类，用狂犬病疫苗救治了一例9岁患儿。1894年，鲁医生发现了白喉血清，促进了白喉免疫和白喉血清疗法的发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人类防治疾病的能力，使死亡率，尤其是婴幼儿的死亡率大为降低。

有些科学发明，对当时的生活虽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却预示了未来辉煌的发展前途。1884年，法国工程师圣·夏尔多内研究出用硝化纤维素制造人造纤维的新方法，为人类用化学方法制造织物开辟了道路。尤其令人注目的是法国在放射性研究中的进展。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昂·贝克勒尔发现铀的放射性质。来自波兰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和她丈夫于1898年7月，在沥青铀矿石中提炼出一种新金属，取名为钋（以纪念居里夫人的祖国），同年12月又发现了新的元素，称为镭。居里夫妇通过进一步研究，再次证实

了这两个元素的放射性质及与它们有关的放射性蜕变现象。特别是镭的发现（它的放射强度要比铀强 200 多万倍），不仅开辟了物理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镭以后被用于肿瘤的放射疗法，而且被用于军事目的。1903 年，居里夫妇和贝克勒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乡村生活]随着交通通讯发展和社会进步，乡村生活呈现出开放和变革的趋势，火车的到来、小伙子进城当兵、小学教员的言传身教、报纸的发行给乡村送来了一阵现代文明的春风，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总体上说，乡村生活还保持着传统面貌，变化不大。

农民的住房仍很原始，房屋低矮，地面是夯实的泥地，屋顶大多是茅草顶，没有卫生设施，一家数口挤在一间房间里，照明用油灯。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瓦房逐渐增多，有些家庭还建造了地窖，铺设了地板。

在农民的消费中，饮食的开支占据了收入的 2/3，人们对稻米、糖、面粉的消费增加了。南方的葡萄酒也出现在农民的餐桌上。然而，肉和家禽仍很少见到，吃的常常是粗糙的传统食品，诸如洋葱汤、蚕豆和玉米糊、土豆块、煎饼等等。人们往往通过婚礼、洗礼、葬礼等机会才享受好口福。

在服装上，地区性的服装逐渐消失，只留下一些诸如饰带、围巾、围裙、头巾等。男人们大多穿粗布蓝色罩衫，他们的节日服装一般到结婚时才定做，有时甚至是从父辈手里传下来的：黑色的礼服和裤子、白色的衬衣、黑色的领带、礼帽。妇女们一般穿女短上衣或衬衣、裙子加围裙、围巾、无边软帽或头巾。在发达地区和靠近城市的地区，时髦服装也开始在妇女和青年中流行。

在农村，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和消遣活动。赶集成为农民最重要的、交流活动，每逢集市日，一家人带上牲口、禽蛋、蔬菜等作交易，同时买回生产工具和一些日用品，他们乘此也看看热闹。也几乎没有什么体育活动，只有法国北方的“弓箭骑士”、巴斯克地区的回力球、东南部的滚球戏作为传统的体育游戏保留下来。

[城市生活]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各阶层之间的差异极大，从大多数居民来看，这一时期的收入普遍提高，例如领薪阶层，他们的相对工资和实际工资都有增加，1872 年每天人均工资巴黎 4.5 法郎、外省 8 法郎，1901 年分别增至 7 法郎和 4.5 法郎，1913 年增至 8 法郎和 5.25 法郎，从第三共和国初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资总额增加 60%~80%。工资和价格联系起来看，1872—1885 年，价格下降了 28%，工资增长了 12%；1885—1901 年价格下降 8%，工资增长了 34%。从 1901 年起，物价开始呈上涨趋势，1901—1911 年物价上涨 18%，工资只增加 5%，导致这一时期实际工资下降。

城市一般居民消费的分配，在 20 世纪初，饮食占 62%，服装占 16%，住房 12%。人们的饮食已有很大改善，一般居民用于肉类的费用已经超过面包，面包费用占饮食费的 18%，而肉类占 21.2%。但对于穷人来说主要食用的是猪肉和牛肉，家禽要到节日才能品尝。牛奶、糖、水果、咖啡、新鲜蔬菜越来越成为工人阶级的必备食谱。温饱已经解决。但在危机年代，工人阶级的饮食仍有恶化。

这一时期，城市居民逐渐关心起服饰打扮。工人们在平时不再穿工作服装，在节日里工人的服装与资产阶级的穿戴已很少差别。19 世纪 80 年代时兴的高礼帽和礼服，到 20 世纪初，改为圆顶礼帽和礼服，更多的人开始穿西服。女子则时兴灯笼袖、服装多采用边饰、衬垫，戴插着鸵鸟羽毛的大檐帽

和短面纱。

居民的住房条件还较差。据 1906 年调查，一般工人住房 80%以上没有厕所，而且一般只有两间住房，最多也只有 3 间。即使在巴黎，只有一间住房的家庭仍占 26%。城市里还存在着贫民区，居住条件更差。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再加上 1906 年颁布了每星期一天休息日法，人们有更多的机会消遣和娱乐，参加舞会、音乐会，观看歌剧演出等。

许多居民还把阅读报纸当作消遣，读报不再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他们通过谈报关心时事，也关心商品信息。

体育也成为人们关心的热点，自行车运动成为法国最热门的体育活动，1903 年创设了环法自行车大赛，冠军不仅能迅速致富，而且能名扬四海。

电影作为新的娱乐形式进入生活圈子。1895 年 12 月，卢米埃尔兄弟向世界推出了第一部电影《工厂的大门》。到 1896 年底电影已脱离实验阶段与观众见面，法国建立了卢米埃尔、梅里爱、百代、高蒙等电影公司，每天晚上都有好几千观众挤在漆黑的电影院里，满足好奇心。

参观博物馆、博览会往往成为广大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1878 年国际博览会观众有 1600 万，1889 年的博览会达到 3900 万，1900 年博览会观众多达 5000 万。每一次博览会都给巴黎添置了新的景观。1889 年博览会开幕之际，在巴黎落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此塔以工程师埃菲尔的名字命名，建筑用钢材就化去了 560 万公斤，铁塔本身高度为 300 米，加上顶端天线 20 米，总共高 320 米，外观雄伟壮丽，可登上塔楼饱览巴黎全景，至今仍为旅游者必到之地。

第二节 从温和共和派到激进共和派

一、温和共和派执政

资产阶级共和派执政后，因政见不同分裂成两大派：温和派和激进派。政权首先落到温和派之手，实行了长达 20 年的统治。温和派由甘必大领导的共和联盟和费理领导的共和派左翼组成。温和派在完善和巩固共和制度方面，仍然作了一些努力，尤其是费理在 1879 年 2 月—1881 年 11 月，1882 年 2 月—7 月担任部长和 1883 年 2 月—1885 年 3 月担任总理期间，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使法国成为典型的议会制共和国。

[完善议会制度]温和派继续维护共和政体，确立巴黎的政治中心地位，1879 年 6 月，宣布将政府和议会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并宣布 7 月 14 日为法国国庆节，《马赛曲》为法国国歌。

强化议会权力。通过改革，使总统和议会两个政治权力中心逐渐过渡到一个权力中心，使议会成为真正的权力中心，总统的权力中心被消失。议会对立法提案有极大的修正权，对提案的讨论和表决也常常由议会掌握。立法权实际上掌握在议会手里。政府的实际行政部门—内阁，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接受议会的监督。议会还分别设置了与政府部门相应的委员会，委员会主席的实权比正副部长还大。使议会有效地监督了行政。议员还拥有对政府的质询权，致使许多内阁常常在质询中倒台。质询权成了牵制政府的有力武器。议会权力中心的形式，使法国成为典型的议会制国家。

温和派还努力实行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世俗化、民主化。先后对军队、法院、各省行政机构进行改革，撤换教权派和保守派，由共和派掌握领导权，并全面推行文官考试制度，择优录用人才。宣布宗教节日工作自由，取消公众集会时的集体祈祷。颁布由纳盖建议的《离婚法》（1884 年），由教会确认的婚姻关系不再成为神圣不可侵犯。对宪法进行重新审议并作了部分修改，规定“政府的共和制形式”不可触犯。凡统治过法国的王室成员及后裔，无权当选为总统。实行参议院民主化，取消部分参议员的终身制任职。参议院议员任期 9 年，每 3 年改选 1/3。1884 年 4 月 5 日，通行关于市政厅组织法，改任命制为选举制，把选择市长和副市长的权力从中央指定，改由市议会选举产生。

同时恢复和整顿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1880 年 8 月，议会通过全面大赦法案，使大批巴黎公社流放者和流亡者返回祖国。1881 年 6 月，通过了关于集会自由的法律。7 月，通过了关于出版自由的法律，规定“一切报纸和期刊，……无须获得预先许可，也不必缴纳保证金，均可发行。”1884 年 3 月 21 日，通过了工会合法化的法律，正式宣布“废除 1791 年 6 月 14 日—17 日颁布的法令”，即《夏普利埃法》。从而使广大公民享受比过去更多的民主自由权利，促进了全国工会运动的迅速发展。

[实行教育改革]法国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当时教会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教会财产不下 100 亿法郎），而且有庞大的教会机构，全国 3600 个市镇都设有教堂、教徒达 600~700 万之多。全国受宗教教育的学童达 4,949,591 人，教会势力占据一切文化教育中心，渗透到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严重动摇着共和制度的基础。因此，实行教育世俗化就成为法国教改的主线，

贯穿在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

教育部长费理推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方案。他首先进行教育领导体制改革，改组全国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大中小学教师的代表参加领导，驱逐教权派代表，实行世俗国家对教育的领导。同时明确提出了世俗的、免费的小学义务教育的口号，于1881年和1882年颁布了两个教育法令，即关于小学免费义务教育的法令和把享受中等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女青年的法令，废除第二帝国统治以来实行的《法卢法令》。新法令规定6—13岁的法国儿童实行强制的免费义务教育。女青年享有国家中等教育权。并规定教会不准干与学校，学校普遍施行世俗化。废除了国立学校教育中的神学课程，禁止教士施教。短时间约有5000名教会成员被逐出学校。

费理政府还努力加强师范教育，提高师资水平，规定只有获得考试合格证书的人，才有资格当教师。同时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师地位、待遇。由于他的努力，学校开始摆脱教会的控制，实行了教育的普及。这不仅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且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具有共和意识的各类人才，使教育在巩固共和制度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加强劳工立法]温和派为维护共和统治，对工人采取安抚与镇压的两手策略。一方面通过劳工立法给劳工群众以安抚，颁布了好几个缩短劳动时间的法令。1874年5月的法律规定：12—16岁的少年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禁止16岁以下的男孩和21岁以下的姑娘上夜班。1892年11月，又规定，妇女和16岁以下的少年每天劳动时间减为10小时，不得超过11小时（包括一小时的用膳时间）。1902年开始，成年工人劳动时间每天为10小时半。随着劳动时间逐渐趋向减少的同时，又适当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待遇，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

另一方面，当群众开始觉醒起来反抗时，他们又进行镇压。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力量的增长，温和共和派公开宣布“社会主义就是敌人”，他们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作为借口，先后颁布两项法令，1893年12月，颁布了被人们称为“罪恶的法律”，宣布限制出版自由，严禁“非法”报刊自由出版，进行越轨宣传的鼓动者中进行“预防性监禁”。1894年7月又颁布了《镇压法》，对危害共和国安全者一律予以镇压。矛头对准社会主义者。暴露出温和派并不温和的真面目。

[归附运动]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完善使共和制度在法国不可逆转。为此，头脑机灵的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多次暗示天主教徒应与共和制度和解。主教应该向共和派靠拢。1890年11月，在教皇的授意下，阿尔及利亚大主教拉维热里在为地中海舰队军官举行的宴会上，发表了归附共和国的祝酒词，宣称对于法国天主教徒来说，赞成共和制度的时刻已经到来。1892年2月，教皇发布通谕，号召法国天主教徒真诚地归附共和制度，声称这是上帝允许的，也是合法的。

但是，主教和教皇的归附主张却遭到了法国大部分天主教徒的抵制和反对。只有少数人出于策略考虑才接受归附，他们参加了议会选举，在众议院中出现了以雅克·皮乌和德·孟为首的30名“归附”议员，组成了归附共和国的“独立右派党团”。但是，归附派的活动并不表明罗马教皇、法国天主教徒真心实意地拥护共和制，在新出现的共和国危机中，他们仍然扮演反对共和制的角色。

二、温和共和派统治的危机

在温和共和派统治的整个时期内，虽然采取种种改革措施，努力使国家机制运转正常，以巩固共和统治。但在政府和议会中，派别繁多，斗争激烈，内阁更迭频繁，丑闻层出不穷，共和制度出现新的危机。

[勋章丑闻]1885年10月的众议院选举，机会主义派的优势开始丧失，出现了机会主义者、激进党和保守党三者势均力敌的局面，机会主义者得200席，保守党得202席，激进党得180席，议会的固定多数没有形成。机会主义派因无力组织起一个足够多数派的政府，只得时而和左派联合，时而又和右派联合，造成政府的不稳定，众议院的无能，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反议会潮流的出现。

首先震惊法国社会的是“勋章丑闻”。1885年12月，格列维在其女婿威尔逊的多方活动下，继续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不久，议会议员威尔逊就利用岳父的权势，勾结陆军副参谋长卡法雷将军及其它高级官员，暗中非法盗卖官职和荣誉军人勋章，大发横财，获取2.5万法郎。1887年9月，威尔逊再次出卖勋章时被警察当场抓获，丑闻被公开揭露，并查明是总统默许下搞的，全国舆论轰动，一致要求从严惩办。10月，卡法雷将军被逮捕。11月，上台不到5个月的鲁维埃内阁因为力图庇护威尔逊而倒台。12月2日，格列维在群情激愤中辞职，迪萨·卡诺当选为新总统。但是，资产阶级政府并没有严惩主犯，只判处卡法雷罚款3000法郎，革除官职，剥夺勋章和开除军籍，而威尔逊则被宣判无罪，充分反映出资产阶级统治的腐朽。

[布朗热事件]布朗热生于1837年，第二帝国初期毕业于圣西尔军官学校，1857年起先后参加过阿尔及利亚战役，意大利战役，交趾支那战役和普法战争。担任过荣誉军团指挥，1884年5月被晋升为准将，任师团长，指挥过在突尼斯的远征军。他在服役期间曾六次受伤，作为将军在军队中有很高的声誉。

1886年1月，由激进党首领克雷孟梭推荐，担任了陆军部长，布朗热从此博得“左派”将军的名声。他以“左”派面目出现，一方面，大肆煽动对德国的复仇主义情绪，与沙文主义组织“爱国者同盟”的头目德鲁莱特一起，进行狂热的沙文主义宣传，猛烈谴责政府抛弃阿尔萨斯、洛林，表示要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在军队内部发起了一场改革运动，把保王军官从部队中清除出去；改善士兵的伙食条件，将大锅菜改成小锅分食制；允许士兵留胡子；设置三色哨棚；用新式步枪武装军队，并不让武装的士兵镇压工人。在德卡兹维尔矿工罢工期间，布朗热还命令部队和矿工分享士兵的“菜汤和面包”。同时，还恢复7月14日的国庆节庆祝活动，进行大规模的阅兵仪式，以培养军队对他的个人崇拜。

布朗热暗地里却勾结各类对现状不满的人（包括保王党人），准备推翻共和国，实行波拿巴式个人军事独裁制。当政的鲁维埃内阁害怕因布朗热的煽动而引起法德之间新的战争，更看到了布朗热对共和制构成的危险。于1887年6月免去其陆军部长的职务，任命他为驻克勒蒙菲朗的十三军团司令。布朗热只得离开巴黎去驻地任职。他的追随者在巴黎的里昂车站举行了大规模的沙文主义示威，15万人把火车站及其四周围得水泄不通，一些人激动地拥抱他，一边喊着：“您不能走啊！”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把布朗热看成是“爱国主义”的化身。

“勋章丑闻”被揭露后，群情激愤，布朗热将军更成了全国不满现状者的总代表。他利用有利时机，广泛勾结各派人士，把波拿巴分子、军国主义者和复仇主义者，以及极左的激进党人团结在自己周围，组成布朗热党。甚至不惜从王室家族中领取巨额津贴，准备推翻议会制度，阴谋夺取政权。1887年12月他在给俄国沙皇的信中明确表示：“当我行动的时机到来的时候，我将摧毁议会制这一灾祸连同它所孕育的可恶的脓疮……我将在社会主义邪说面前垒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1888年2月，他在布朗热党人的机关报《军帽徽》报上，提出解散众议院，修改宪法，召开制宪议会作为行动纲领。3月，布朗热脱离军界，投向政界，获得了被选举的资格，接着在好几个省当选。尤其是1889年1月27日在巴黎的补缺选举中，布朗热因245,236票的绝对多数，击败共和党人而取胜，许多布朗热分子也相继选进众议院。他的同伙和不明真相的群众，都支持他立即向众议院进军，发动政变，夺取政权。但是布朗热想通过全国选举的合法手段上台，拒绝了政变主张。布朗热主义的狂热在巴黎选举后达到了高潮，有几千种布朗热的肖象在全国流传，约370首歌曲颂扬他的“光荣”。布朗热主义狂热已经发展成强大的政治运动，使共和国面临严重的威胁。部分激进派分子和温和共和党人起而反对布朗热。不久，布朗热勾结保王党的阴谋败露，开始失去追随者的支持。1889年4月1日，政府决定以破坏共和国安全的罪行逮捕布朗热。次日，他潜逃国外，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1886—1889年，历时三载的布朗热运动遂告结束。4月8日，布朗热被剥夺了议员的不可侵犯权。8月14日，法国最高法院缺席判处布朗热终身监禁。1891年9月30日，布朗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附近的以克塞尔自杀身亡。恩格斯曾经正确的评述了布朗热主义，指出它不过是波拿巴主义的变种，其整个运动不过是为了推翻共和制，实现个人军事独裁制。

布朗热主义的失败，对法国的各派政治势力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激进党人因此受到沉重打击而威信扫地，保王党也同样受到致命打击，一些教权派、保王派为摆脱不利的处境，开始归附共和制度，温和共和党的地位暂时得到巩固。

[巴拿马丑闻] 90年代初，一场新的丑闻又一次引起了法国政局的动荡。1893年，一起震惊全国的大丑闻——“巴拿马丑闻”被揭露。这是一件耸人听闻的贪污受贿舞弊案。早在1879年5月，法国的企业家、工程师雷赛布从哥伦比亚政府中取得了巴拿马运河的开凿权，1881年他组成了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并发行了大量股票，总数达30多亿法郎。想发财的法国广大中小资产阶级把股票抢购一空。运河开工后，由于对运河开凿工程估计的错误及法国银行强加于雷赛布的苛刻条件，也由于开凿公司的贪污挥霍，使资金严重不足，工程很快陷入绝境。为获得资金，公司企图发行新的股票，但这需要议会的立法授权和政府的批准。为此，公司通过银行中间人用大量金钱贿赂国家要人、高级官员、议会议员及报刊舆论界，从而得到议会和政府同意又发行了大量股票。但是，到了1889年2月，当公司骗到了大量股金之后，却突然宣布因负债12.8亿法郎而破产，工程只完成1/3而被迫停工。购买了股票的约90万户小股东也因此破产，许多企业倒闭。

1892年底，巴拿马舞弊案的真相被揭露，原来，该公司为掩盖其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所筹集的资金，曾广泛采用贿赂手段，法国的前三名内阁总理弗雷西讷、鲁维埃、弗洛凯，著名的激进党首领克雷孟梭，还有公共工程部长、陆军部长、议长等重要官员及200名议员，和一些报刊记者均受贿赂。

由于政府官员的支持，才酿成了本世纪最大的骗局。克雷孟梭受贿 100 万法郎，有的议员收受 50 万法郎。丑闻揭露，加速了法国的政治风潮。

1893 年 2 月，法国政府被迫对巴拿马公司的董事长和三名董事以诈骗罪审判，司法机关判处公司董事长 88 岁的雷赛布和他的儿子公司董事 5 年徒刑和 3000 法郎罚款，另三名同案人被判处 2 年徒刑，但许多受贿的政府头面人物却逍遥法外。4 个月后，重罪法庭再次宣判他们全体无罪，这场本世纪最大的骗局在资产阶级政府的庇护下，不顾舆论的反对，就这样草草收场。这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反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法国人通过巴拿马丑闻也终于在本国范围内开始领悟这个道理，在那里当权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早就懂得了这一点，并且不声不响地付诸行动。”

巴拿马丑闻的后果是严重的：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人士因受贿而名声狼藉，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新一代共和派取代了他们的地位，这些人抛弃了机会主义派的特点，变得更加温和，准备和所有的人联合，甚至不惜放弃反教权主义的传统政策，与教会言归于好，并与右派接近来共同对付社会主义以维护其统治；丑闻使资产阶级政府和实业家信誉扫地，许多中小储蓄户和银行家对政府和实业家更加不放心，他们宁愿把资金投向国外，通过放债取得高利。

丑闻的揭露使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开始认清统治者的真面目，纷纷脱离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欺骗转向社会主义。因此，社会党的力量开始加强，在 1893 年的选举中获得 70 万票，在众议院中形成了 50 人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成为议会中一支强大的力量。

[德雷福斯案件] 19 世纪 90 年代初，由于巴拿马丑闻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出现了政局的动荡，无政府主义者乘机多次在政府机关、公共场所和议会大厦等地安放炸弹，巴黎不断发生爆炸事件，1894 年 6 月 24 日，萨迪·卡诺总统被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者、年仅 21 岁的卡塞里奥刺杀。6 月 27 日，百万富翁昂赞煤矿主卡齐米尔·佩里埃当选新总统，由于人们的普遍不满，上任半年就被迫辞职了，由前海军部长费里克斯·富尔接任。而这一场冤案的出现，就使法国政治斗争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

阿尔弗勒德·德雷福斯（1859—1935）出身于阿尔萨斯一个犹太血统的纺织资本家家庭。普法战争后，家乡被普鲁士侵占，德雷福斯举家离开该省，并加入了法国国籍。1892 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进入法国陆军总参谋部任见习上尉军官。

1894 年 9 月 26 日，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充当女仆的一个法方情报人员，从德国武官施瓦茨科彭上校的字纸篓里发现了一张没有署名的便笺，上面开列了关于法军布防情况和炮兵训练动向等五份法国国防部机密文件的清单，这说明法国总参谋部内部肯定有德国的间谍，法国总参谋部反间谍处副区长亨利少校等人在侦察中认为这是犹太人干的，又以字迹相似为由，认定罪犯就是德雷福斯，笔迹鉴定专家虽有不同意见，总参谋部仍然于 10 月 15 日，以间谍和叛国罪将德雷福斯逮捕，并由迪·德克朗陆军中校负责进一步调查，德克朗乘机大搞逼供信，认定德雷福斯犯罪属实。

1894年12月22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军事法庭秘密判处德雷福斯无期徒刑，后将其押送到法属圭亚那附近魔鬼岛服役。德雷福斯在审讯中和流放地，始终拒绝认罪，他的家属也竭尽全力为其申冤平反，可是毫无结果。

1896年3月，法国陆军部情报局新任局长皮卡尔中校截获了德国大使馆拍给艾斯特拉齐的一份电报，经过调查断定此人与德国驻法大使馆的武官有可疑关系，而通过对“秘密档案”的重新审查，皮卡尔确信，艾斯特拉齐才是盗卖秘密军事文件的真正罪犯，而德雷福斯是无罪的。皮卡尔把这一真实情况报告了副参谋长贡斯将军，总参谋部借口维护军队威信，拒绝重审德雷福斯案件，并撤销了皮卡尔情报局长之职，将他调往突尼斯，还命令他不许声张真情。

但是，皮卡尔在去突尼斯前仍然把情况告诉了他的朋友——律师勒布卢瓦。这位律师不久便在报纸上公布了皮卡尔揭露的案件真情。1897年11月，巴黎《晨报》刊登了作为德雷福斯罪证的那封信的照片和艾斯特拉齐的字迹样本，以确凿的证据证明真正的罪犯是后者，从而要求政府重新审理此案。但陆军部长声称德雷福斯已经得到了“公正合法的惩处”，而内阁总理也公然表示：“不存在德雷福斯事件”。由于德雷福斯的哥哥一再要求军事法庭审讯真正的罪犯艾斯特拉齐，并释放德雷福斯，巴黎军事法庭只得装模作样进行提审。

1898年1月11日，巴黎军事法庭竟宣判艾斯特拉齐无罪，而皮卡尔却以泄露机密罪遭到逮捕。这一横蛮无理的判决，激起了一切正直人们的无比愤怒。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以《我控诉》的通栏标题，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左拉控诉阻止德雷福斯案件重审的一切人是存心不良，蓄意制造冤案。这些人是违犯人道，违犯正义，践踏法律。左拉在公开信中愤怒地指出：“真理在前进，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当人们把真理埋在地下，它就会在地下积聚起来，酿成爆炸性的巨大力量；而且一旦爆发，就会使一切归于毁灭。”“至于我所控诉的人，我并不认识他们，也从未见过他们，我对他们既无怨无仇。在我看来，他们只不过是心怀社会邪恶灵魂的几个实体罢了。而我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促使真理和正义早日大白于天下的一种革命手段。……我的激动和抗议是我灵魂的呼声。让他们把我带到刑庭受审吧，我要求公开的调查。我正等候着。”

左拉的公开信在法国以及国际上引起广泛的反响。当时正在法国的著名俄国作家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世间尚有公理存在，如果有人受到冤枉，还有人替他伸冤明理。”在法国，迅速分化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民主势力和反动势力展开了猛烈的搏斗，反动政府竟又一次颠倒黑白，指控左拉污蔑军队，犯了诽谤罪，1898年2月，法庭公然判处左拉1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左拉被迫逃往英国。但是，支持德雷福斯的法国民主势力，继续坚持斗争，有的地方两派发展到严重的武装冲突。有的家庭成员也因观点不同而争吵、斗殴、直至破裂。

1899年8—9月，军事法庭通过一个多月的辩论，仍然以52票的多数肯定德雷福斯有罪，但迫于形势，改判为10年徒刑。愚蠢的判决激起了广大群众和世界上近20个国家的示威抗议。上任不到一年的卢贝总统只得随即宣布赦免德雷福斯，陆军部长为平息民心，宣布“案件业已结束”，但仍然不愿平反昭雪。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不得不重审此案，宣判德雷福斯无罪并

复了职。皮卡尔中校也回到军队，晋升为准将。经过十二年的斗争，冤案才算了结，但制造冤案的真正罪犯，仍然逍遥法外，无一受到惩处。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反动的军国主义分子、民族主义者、排犹主义者和教权派为了煽动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情绪，进而推翻共和国而蓄意制造的一起大冤案，这一案件的受理经过充分说明了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虚伪和法国军国主义势力的反动与猖獗，彻底暴露出资本主义制度卑鄙、狠毒、腐败和专横，以及资产阶级法庭的反动阶级实质。这一案件“证明了资产阶级费尽心机企图掩盖这样一个真理：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实际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恐怖和专政居统治地位”。

德雷福斯案件使执政的温和共和派威信扫地，无法继续统治下去，而激进共和派由于广泛介入重审德雷福斯派的行列而信誉大增，温和共和派，很快被激进派所代替。

三、激进共和派统治

[瓦尔德克·卢梭内阁] 1899年6月12日，迪比内阁倒台。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局势需要资产阶级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维持共和制度和社会秩序。卢贝总统首先指定由普恩加莱组阁，但未获成功。于是，这项使命落到瓦尔德克·卢梭身上。

由瓦尔德克·卢梭组阁在当时对于维护资产阶级共和派的统治是合适的。他属于温和共和派，但反对温和共和派日益右倾的政策，因此，他既能得到一部分温和共和派的支持，又便于和激进共和派接近，容易得到议会多数的支持。他曾担任内务部长，1894年当选为参议员。他是一位大资产者，又是颇有声望的律师，当时已53岁。他性格冷峻，处事稳重，仪态不俗，有人把他比作冷血动物，称之为“站着的鱼”。

6月26日，议会通过内阁人选。这届内阁以“保卫共和内阁”而著称，其成员大多数是倾向德雷福斯的温和共和派。但它所依靠的多数是共和派的左翼：温和共和派内部的左翼反对派，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而当时议会多数是以激进共和派为主的。因此，瓦尔德克·卢梭内阁的建立标志着激进共和派开始执掌政权。

瓦尔德克·卢梭在组阁后，为了迎合激进共和派的要求，也出于保卫共和制的需要，走上了反教权主义的道路，他所采取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制定结社法。

1899年11月14日，瓦尔德克·卢梭向议会提交了关于结社问题的法律草案，这是一个对全部结社作出规定的共同法，但世俗的结社早在1884年就作了规定，所以此法主要是针对宗教团体的。为了避免和教会直接冲突，他把本该针对宗教团体的特殊法规隐蔽在关于普通结社法的外壳下，而且在法律条文里避免使用“宗教团体”一词。草案规定：普通社团只要向省行政当局声明后就能自由成立，而部分由外国人组成，或受外国人领导的社团由内阁法令批准。后者指的就是宗教团体。但是，根据立法程序，提交议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不是提案本身，而是由议会委员会修改过的文本。议会委员会对内阁的提案作了重要修改。修改后的草案直接用了“宗教团体”一词，并规定这种团体的建立必须由议会立法批准，禁止未经批准的宗教团体的成员从事教学活动。

1901年1月15日，议会开始对结社法规进行辩论，4月初，法案以303票对224票获得通过。6月，法案被参议院批准。1901年7月1日在《公报》上颁布。

1901年结社法规走出了反教权主义的第一步，它打击了教权势力的嚣张气焰。法律颁布后，梵蒂冈被迫同意。1901年10月在147个未经批准的男性宗教团体中有64个，606个女性宗教团体中有482个申请议会批准，其他的宗教社团有的解散，有的迁往国外。

1902年，法国举行大选，选举结果使1/3的议员更新，激进共和派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1902年6月3日，瓦尔德克·卢梭以健康原因提出辞呈，激进共和派爱米尔·孔勃组成新内阁。从而完全确立了激进共和派在法国的统治。

[激进共和派的组织和主张] 1901年分散在各地的激进派组织开始联合起来，建立了“激进社会党”。该党是法国第一个统一的、具有较严密纪律

和组织的资产阶级政党。其组织呈金字塔型。在基层，有村镇委员会，县委员会，地区联合会，省联合会；在上层，有设在巴黎的执行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以保持基层领导人的接触和联系。1901年6月23日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总报告人米卡叶·贝勒当提出了党的纲领。这个纲领和从前激进派的要求没有多大区别，它大致包括：取消宗教团体的学校；政教分离；缩短军队服役期；废除军事法庭；实行累进所得税和工人退休金。纲领舍弃了以前激进派取消参议院的要求，而且表示不打算废除私有制。

这个左派资产阶级政党当它上台之后，面对无产阶级的强大力量，迅速变成了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它表面上同情群众，以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面貌出现，实际上始终维护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时虽对工人作些让步，但仅仅是为了维护其统治。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激进党采取了野蛮的镇压手段。所以，到了帝国主义时期，温和党、激进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并无本质差别。

在20世纪初，激进共和党的对内政策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针对教权主义，另一方面针对工人运动。

[孔勃内阁和政教分离法案]孔勃是反教权主义的激烈主张者，曾是1901年结社法委员会的主席。1902年上台后，立即实行了结社法，一年之内，关闭了未经允许的约10000所教会学校和3000多个修道会，没收了他们的财产。除了5个宗教协会外，孔勃拒绝所有请求批准的宗教协会。对已经批准的宗教团体，也通过法案禁止他们从事教学活动，限期10年内关闭他们的学校。

孔勃的行动引起了教权势力和右派势力的一致反对，受到罗马教皇的攻击。教皇公开支持法国反动势力，并与法国断绝外交关系，1904年孔勃政府在与教皇断绝外交关系后，开始制订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孔勃内阁同时通过秘密调查了解军队军官的政治观点，力图清除军队中最反动的保皇派军官，提拔共和派的军官，实行军队改革。结果引起保皇军官和社会保守势力的不满和反对，在他们的压力下，孔勃于1905年1月被迫辞职，上述任务没有完成。

右翼激进党人鲁维埃组成新内阁后，无法阻止议会中多数派反教权主义的意向。1905年7月，众议院以341票对233票的多数通过了由白里安提出的政教分离法案。12月9日，又以181票对102票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正式废除了1801年的《政教协议》。

《政教分离法》保证法国人信仰自由，同时明确规定：“共和国对任何宗教信仰既不承认，也不给予工资和津贴。”凡属举行宗教仪式的开支，均将从国家预算、省政府预算及市镇预算中取消。法案还决定教会不许干预政治，教会只能管理宗教组织，学校只许在课外时间上宗教课，并宣布教会财产在清查造册后转归教徒，建立的组织所有，国家不再监督教会，教会占用的公共建筑一律归还国家。

法令在实施时遭到教会的强烈抵制，教皇唆使教徒起来公开反抗，有的教徒在本堂神甫的率领下，抵制对教会财产的清查，有的还捉来野熊，放在教堂门前，迫使警察离开教堂。有时国家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实施法令。但这一法令却得到了法国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接受。事实上它打击了教权势力，终于使天主教和国家机构分离，并实行了教育的世俗化，对提高民族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

但激进党并不是想真正反对宗教，而是要使宗教成为巩固统治的工具。白里安在说明分离法案时更明确地说，这个法案不应该变成“针对教会的手枪”，而应当“开辟法国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新纪元”。所以虽然实现了政教分离，但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教会仍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

[社会立法和对罢工的镇压]对付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和一般人民群众的要求，激进派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颁布一些社会立法，向工人让步，另一方面血腥镇压工人罢工。

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成为欧美各国瞩目的社会问题。各国相继颁布了社会立法，但法国在此问题上步履蹒跚。直到 20 世纪初，激进共和派政府才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立法。1900 年 3 月，通过了缩短工作日的法律，规定男工每天劳动时间不得超过 11 小时，1905 年 3 月，通过了二年兵役法，缩短了服兵役的时间；1906 年通过每周一天休息制，1910 年 4 月，通过了工农退休金法，规定年满 65 岁即可享受退休金，虽然年龄太高，被人们称为“死人养老金”，但毕竟从无到有，还是前进了一步。

但是在让步的同时，对工人斗争的镇压也在升级。1906 年 3 月，鲁维埃内阁垮台，左翼激进党人萨利昂组成新内阁，克雷孟梭任内政部长，并成了内阁的实际领导人，同年 10 月，克雷孟梭组成了以他为首的内阁。他上台后，一方面表示要改善劳动条件，调整企业主与工人的相互关系，缓和资本家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且为德雷福斯和皮卡尔加薪晋级，恢复名誉，将左拉的遗骸移葬至巴黎先贤祠。另一方面对工人的罢工斗争、社会主义运动一概采取野蛮的血腥镇压手段，多次出动军警，造成流血冲突，其残酷性和频繁程度都超出了温和共和派执政时期。人们称克雷孟梭为“屠夫、杀人犯”。1909 年 7 月，克雷孟梭垮台后，独立社会主义者白里安组成新内阁，参加内阁的还有米勒兰（任公共工程部长）、维维亚尼（任劳工部长），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社会主义的诺言，成为资产阶级的掌权者，任内继续推行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疯狂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工人们称它为“三叛徒内阁”。

四、对外政策和殖民扩张

[70年代的欧洲政治格局]普法战争后，法德矛盾成为欧洲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环绕这一主要矛盾，形成了新的欧洲政治格局。以德国为一方，它在吞并阿尔萨斯、洛林，取得大量赔款后，促进了德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力的日益强大，从而，积极投入欧洲霸权的斗争。另一方面，紧靠德国的法国则不甘心失败，积极推行“大陆方针”准备收复失地，对德复仇。虽然当时还不具备复仇的可能，但法德关系却十分紧张，双方都在寻找同盟者。

法国为实现对德复仇，在忍辱退让的同时，千方百计向俄、英靠拢，以图支持，摆脱孤立境地。德国则力图破坏法国同任何一个大国建立同盟，为此，德国抢先拉拢俄国作为盟国，1873年5月，即与俄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明文规定，“如果两国一旦遭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攻击，另一帝国立即以精锐军队二十万人予以援助。”后来，又将此约扩大为《三皇协定》，即德、俄、奥《三皇协定》，使法国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同时不断制造战争危机，进行恐吓，以抑制法国。1875年3月，德国无中生有地指责法国用高价大量收购德国的战马，准备战争。故意在报上公布“严禁马匹出口”的法令，表示德国将严阵以待，迫使法国屈服。1877年德国再次制造战争恐怖气氛，捏造法国正准备进攻德国，用战争恫吓来孤立法国，在欧洲出现了“武装的和平”。

法国为了摆脱孤立困境，把外交政策的重点放在拉拢俄、英方面，尤其是力图靠拢俄国，早在1871年7月法国外交部长法夫尔就指示法驻俄大使，要搞好与俄国的关系，要驻俄大使向沙皇表明，法国在与德国签订“法兰克福最后和约”时，“曾经获得亚历山大皇帝表示同情的珍贵证据”，要使沙皇“知道我们深感这些好感的价值……并且将到处尽力维持这些好感。”沙皇对法国的“友好”表示未作出明显的反映，而是在德法之间利用矛盾从中取利。所以，80年代的法国是孤立无援的困境中度过。尤其是1879年奥德同盟条约签订后，其国际地位更加恶化，直到80—90年代，情况才有所变化。

[80年代的殖民扩张]19世纪80年代开始，掌权的资产阶级温和共和派把对德复仇的计划暂放一边，转而进行疯狂的对外扩张。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主要鼓吹者是内阁总理费理，他曾说：“难道法国只是大陆国家吗？殖民地领土的寸土尺地，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贵的，……睁开眼睛看看世界地图，看看许多大国，它们……都怎样急切地，怎样火热地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市场。”“殖民地是一个最有利可图的资本投放地。”

费理首先向突尼斯开刀，他声称突尼斯“在未建立秩序之前，应当被看作是资本的殖民地”。法国殖民者也都支持这一主张，认为，为法国的资本寻找新的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突尼斯变为法国投机者的一个称心如意的狩猎场。”因为地处北非的突尼斯，不仅是地中海的战略要地，而且物产丰富，土地肥沃，是有利可图的好地方。

1881年4月24日，3万法军不宣而战地从阿尔及利亚侵入突尼斯，几天以后法军就占领了突尼斯。5月12日，突尼斯的贝伊政府被迫投降，双方在突尼斯的巴尔杜签订条约，即《巴尔杜条约》，承认法国的保护权，并同意它的领土被占领，答应给法国赔款，还把对外联络权交给法国，接受法国总督的监督。但突尼斯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直至1883年6月签订了第二个

条约，进一步肯定了保护关系。至此，人民的反抗斗争才被平息。

法国没有把突尼斯宣布为殖民地，而是建立了保护国制度。因为这样对法国更有利一些，费理曾在众议院公开说过：“法兰西在突尼斯保持这种保护国地位，对我们来说大有好处。它……不必使法国的财政承受极大的负担”，又可“维护战败国的尊严”。“显然，保护制度要经济得多”。所以，突尼斯在形式上，仍然有自己的臣民，武装力量和名义上的主权，也有自己的国家元首。但是，事实上，一切实权操纵在总督之手，在政府中除留下三个部长给突尼斯人之外，其余都是法国人。就这样，法国在突尼斯建立了间接的殖民统治。接着，法国资本源源而入，垄断了贸易，控制了工矿企业，强占了大片土地。据统计，到 1892 年法国人已夺取 44.3 万公顷土地，其中 16 个大土地所有者就占有 41.6 万公顷。许多军人和官员也纷纷强占土地，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各种原材料源源流入法国，突尼斯成为法国资本家的投资场所和原料供应地，而广大突尼斯人民却陷入无穷无尽的灾难之中。

与此同时，法国进一步扩大在西非的殖民侵略，法国殖民军队集中在塞内加尔河流域，并向尼日尔河上游发起远征。为夺取达荷美作好准备，首先于 1882 年迫使其附属国阿扎圣接受法国的保护。1883 年法国入侵开奥尔，把塞内加尔的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置于法国人的控制之下。通过残酷的殖民战争，到 1886 年，确立了法国对塞内加尔河上游和尼日尔河上游左岸的全部土地的统一，并在尼日尔站稳了脚跟。1889 年建立了对象牙海岸的保护地位。法国在西非所占领土是其殖民帝国中最大部分。法国殖民者在西非所到之处，对手无寸铁的人民实行最残酷的摧残和屠杀，许多目击者都证实了法军的血腥暴行，一个参加过尼日尔河上游战斗的人曾回忆说：“所有的人不是被捕获就是被打死了，……每个欧洲人都挑了一个女人……我们同俘虏一起往回走了四十公里。儿童和一切走不动的人，都用枪托和刺刀给打死和杀死了。”因此，鼓吹法国带给非洲以安宁和文明，用“和平代替了贫困、专横和战争”，纯系欺人之谈。

在向非洲进行扩张的同时，费理政府还积极向印度支那扩张侵略，把侵略矛头指向远东和中国，企图征服整个越南，他们把侵占越南看作是在远东争霸的关键，是侵占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的跳板和基地。早在 1862 年和 1874 年曾先后两次签订《西贡条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的部分领土和特权。1883 年 8 月，乘越南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夺皇位之际，法军随即向中圻发动攻势，并包围朝廷所在地顺化，不久，法国强迫越南统治者，签订卖国的《顺化条约》，正式承认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的保护权，越南沦为法国的保护国。不久，法军又向北圻发动进攻，进而侵略中国。遭到越南和中国军队的有力抵抗。尤其遭到驻在红河三角洲的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的坚决抗击，屡败法军。但清政府主和派李鸿章却在中国军队连打胜仗的情况下力主妥协，于 1884 年 5 月，在天津与法国侵略者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承认法国与越南所订的条约，同意调回在越南的中国军队。法见清政府退让，反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 1884 年 6 月，法军再次向中国的台湾省和广西、云南省边境进攻，均遭到猛烈反击而失败。1885 年 3 月，中越军队在谅山与法军交战，法殖民军狼狈溃逃。在谅山战役中，法国殖民军许多官兵死于黄热病，大批士兵被战死，谅山大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法国政界的严重动荡，人们称谅山惨败是“第二个滑铁卢”，“又一个新的色当！”激进派人士纷纷谴责费理的扩张政策，称他为“东京佬”。费理的这一冒险举动削弱了法国在欧洲的

地位，助长了俾斯麦的反法气焰和声势。激进派的头目克雷孟梭指着费理的鼻子大骂“你背叛了法国的尊严、荣誉和正义”。激进派和温和派在 1885 年 3 月 30 日的内阁会议上，为此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在一片“打倒费理！费理滚蛋！”的呼喊声中，费理被迫辞职，负责殖民扩张的费理内阁终于倒台。形势对中国有利。可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反而在胜利中屈辱地结束了中法战争。1885 年 6 月，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帕特诺特尔在天津订立了《中法新约》，条约共十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税率。这样，法国不仅在越南建立了野蛮的殖民统治，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使其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云南、广西一带。

法国在越南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巩固其殖民统治。为扩大殖民势力，法国从 1887 年起，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政府，将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组织在同一个行政机构中，统归西贡的法国人总督统治，受殖民者的奴役与掠夺。法国侵略者，不仅掠夺了大片肥沃的土地和征收苛重的捐税，而且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放高利贷，从中取得高额利润，还从印度支那掠夺了大量的大米、橡胶、铅、锌、煤等原料。殖民当局可以任意逮捕、监禁、杀戮和剥夺土著居民，他们被迫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被奴役的印度支那人民，为摆脱法国殖民者的残暴统治，曾进行了长期不屈的抗法斗争。

[殖民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殖民主义不仅受到国内人民的反对，一些资产阶级党派也持否定态度。但从 19 世纪晚期起，殖民主义逐渐在国内占了上风，到 20 世纪初，已被资产阶级政府和舆论宣传所普遍接受。

从 1889 年开始创办了“殖民学校”，以培养进行殖民扩张的专门人才。1892 年，议会里专门形成了“殖民党团”，20 世纪初，该党团在众议院已拥有近百名成员，在参议院也有 30 名左右，他们的主张已为大多数议员所接受。1893 年建立了一支由专业人员和志愿人员组成的殖民军队。1894 年，政府设立了专门管辖殖民地的殖民部。各个党派也纷纷鼓吹殖民主义，曾在费理时代反对殖民政策的右翼政党，转而倾向民族主义，并把殖民主义看作是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殖民主义的竭力鼓吹者；激进共和派则成为殖民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党派虽然投票反对殖民活动的预算，但并不要求政府撤出殖民地。在一般法国人眼中，也认为殖民地是对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补偿，不少人要求把殖民地和法国连成一体。这时各种殖民组织，诸如“殖民联盟”、“航海与殖民团”、“非洲委员会”、“亚洲委员会”等相继产生，殖民主义理论大肆泛滥。

在殖民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非洲大陆重新成为法国掠夺的主要对象。

法国殖民者通过探险、传教、订约和武装进攻等手段，进一步夺得了非洲的大片土地，1891 年侵占了几内亚，1892 年完全占领达荷美，1893 年，又侵占了中非，1896 年吞并了南非最大的岛屿马达加斯加。

值得注意的是对马达加斯加岛的进攻。1883 年，法国曾对马达加斯加发动过一次殖民战争，1886 年，马达加斯加被迫签订和约，虽然没有一字谈及保护权问题，但在具体条文中却规定了法国拥有其外交权，马达加斯加的国外侨民受法国保护等等，这就在事实上承认了法国的保护权。但是，法国并不以此为满足，1894 年 10 月，法国政府向该岛女皇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将全岛交于法国人管理。随即遭到女皇朗那瓦洛的拒绝，她将此事通报全

国，说：“起初他们要夺取我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因为我拒绝了，就开始了战争。现在，他们想得到整个马达加斯加，他们想统治全岛，我拒绝了！我把这件事预先告诉你们老百姓”。

1895年2月，15000名装备精良的法军在马岛登陆，向首都进发，马达加斯加军民奋起抵抗，与殖民军经过五次血战，遂告失败。王宫遭法军严重炮击，女皇被迫投降，1895年10月签订了保护条约，1896年6月，法国议会通过法令，宣布马达加斯加及其所附属岛屿均为法国殖民地。女皇被放逐到留尼汪岛，各地人民反抗斗争坚持了两年之久，才被平息。高喊和平、稳定和进步的法国殖民者，就这样，通过野蛮的殖民战争，终于在马达加斯加岛确立了殖民统治，到19世纪末，法国已拥有殖民地面积1000万平方公里，人口5000万，即为1871年的10倍。

庞大的法国殖民地，使英国大为不安。在争夺非洲的角逐中，英法关系日趋紧张，1898年9月，法国军队与英国军队在苏丹的法绍达（今名为科多克）相遇，英国差一点同法国作战。法国唯恐德国乘机进攻，对英军让步，11月，法军撤退该地，并对瓜分非洲进行谈判。次年3月，英法共同发布宣言，法国放弃尼罗河上游地区，而取得乍得湖、瓦达依地区为补偿，双方妥协解决了这场冲突，史称“法绍达事件”。从此，英、法两国接近起来，为英法协约铺平了道路。

[摆脱孤立地位、准备对德复仇]法国在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对德复仇，从80年代末开始，法国开始致力于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争取俄国的支持。1888年，法国向俄国提供了1.25亿金卢布的借款，想以金钱收买俄国，但当时沙皇还无意同法国结盟。

1890年3月，德国政府改变了政策，向俄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俄德关系恶化，从而促使了俄法的接近。1891年7月，法国舰队驶进俄国喀琅施塔得港进行友好访问，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到场欢迎，他在昂扬的《马赛曲》歌声中脱帽致敬，表示对法国的友好感情，双方还订立了政治协定。1892年7月，法俄两国总参谋长进行秘密磋商，为两国间的军事协定作准备。1892年8月，法俄两国总参谋长签订了军事协定。这是一个为了对付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永久性秘密条约，规定：（1）假如三国同盟中的一个强国实行军事动员或部分军事动员，法国和俄国就立即决定实行军事总动员；（2）假如法国受到德国的进攻，俄国保证用80万人的军队对付德国；（3）假如俄国受到德国的进攻或奥地利及另一国的进攻，法国提供130万人的军队，对付敌国。1894年1月俄法两国政府以互换外交文件的形式，正式通过这项军事协定，法俄同盟最终形成。法国摆脱了外交上的孤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德国对法国的轻举妄动，巩固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而后，法俄关系不断密切，法国资本大量渗入俄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尤其是1896年沙皇携同皇后访问巴黎，受到法国的盛大欢迎。次年8月，法国总统访问俄国，两国的政治同盟更为牢固，法国的后方开始稳固。因此，这就使法国有可能向外进行大规模侵略扩张。

[德尔卡塞的外交方针]从1898年6月至1905年6月的7年间，法国外交部长始终由德尔卡塞担任，德尔卡塞的外交方针集中到一点就是对德复仇。为此，他采取了三项措施：（1）加强法俄联盟；（2）改善法意关系；（3）缓和法英矛盾。

1899年8月，他亲赴彼得堡，会见沙皇尼古拉二世，并和俄国外长莫拉

维耶夫进行商谈，通过双方交换信件，进一步充实 1893 年军事协定的内容，协定不再受期限的限制，同时扩大了 1891 年政治协定的适用范围，暗示法国维护俄国在巴尔干的既得利益，俄国支持法国收复阿尔萨斯—洛林。

1901 年 2 月，法国派军事代表团去俄国，和俄国总参谋部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一项秘密的议定书，规定了两国军队动员在战时互相支援的条件。同年 4 月，德尔卡塞应沙皇的邀请，第二次到俄国访问，俄国答应缩短军队动员的期限。9 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偕夫人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02 年 5 月，德尔卡塞陪同卢贝总统再次前往彼得堡。双方领导人的互访，进一步加强了法俄联盟。

为了对德复仇，德尔卡塞施展手法，把德、奥匈、意三国同盟中最不稳定的伙伴意大利争取过来。

当德尔卡塞入主外交部时，长期不和的法意关系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896 年，法意就居住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的地位问题达成协议。1898 年 11 月，双方的商业协定谈判又获得成功。接着，德尔卡塞通过法国驻意大利大使巴雷尔进一步促进法意政治上的接近。

从 1899 年开始，巴雷尔和意大利政府举行谈判，寻求在瓜分地中海南岸势力范围的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并在 1900 年 12 月，双方达成秘密协议：法国政府承认的黎波里是意大利的势力范围；意大利则表示，它不反对法国在摩洛哥可能采取的行动。1901 年 4 月，意大利派出舰队对法国土伦进行了友好访问。1902 年 6 月巴雷尔和意大利外长互换信件达成秘密协议，一旦法德发生战争，意大利保持中立。意大利的这一立场已经违背了意大利在三国同盟中的诺言，但在公开场合，意大利仍留在三国同盟内。所以德国对这种变化毫无察觉，德国首相皮洛尔甚至在帝国议会的讲坛上公开说：“如果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跳华尔兹舞，他决不会生气。”结果这场华尔兹舞越跳越热乎。1903 年 10 月，意大利国王对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04 年 8 月，法国总统卢贝访问罗马。法意接近使法国部分实现了瓦解三国同盟的目标，消除了它对德复仇的一个后顾之忧。为准备对德战争又向前跨进了一步。

长期以来英法在殖民地等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898 年“法绍达事件”的和平解决，为英法缓和矛盾铺平了道路。德尔卡塞利用英德之间在争夺殖民地与外贸竞争中的矛盾，促使英法接近。1903 年 5 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到巴黎访问，表示英法友好的时代应该到来。7 月，法国总统卢贝回访英王，由德尔卡塞陪同，双方互访气氛热烈，消除了英法之间的疑虑。接着两国进行多次秘密谈判，最后于 1904 年 4 月 8 日达成了“诚意协约”。双方在瓜分非洲殖民地问题上采取妥协谅解的态度，法国承认埃及为英国势力范围，放弃了几十年来法国在埃及问题上的对抗政策；英国则以保证不妨碍法国在摩洛哥的行动作交换。英法协约虽然只涉及殖民地问题，并未提及战时的双方支援，但此协约消除了英法冲突的根源，实际上使英国成了法国的盟国，正如英王在访法时所宣布的那样“英国和法国，从前的敌人，今天成了朋友和盟国。”

[摩洛哥危机]20 世纪初，法国殖民扩张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摩洛哥保护权的确立。法意协定和英法协约达成后，法国以飞快的速度向摩洛哥进行扩张。1904 年夏，在巴黎成立了所谓摩洛哥事务委员会，准备吞并和开发摩洛哥。1905 年 2 月，法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对摩洛哥的“改革”计划，力图建立保护关系。但是，这一行动遭到了德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对，3 月间，德

皇威廉二世在访问摩洛哥时表示“希望在素丹的统治下，摩洛哥将为世界各国和平竞争开放，不得由任何人所独占，并且对任何人都要一视同仁，”并提到要保卫德国在摩洛哥的利益，不久，德国政府强烈要求法国放弃“改革”计划，并指出“如果法军越过摩洛哥边境，德国也就立即越过法国边境”。法国政府被迫让步，鲁维埃接替了德尔卡塞的外交部长之职，并于1905年7月与德国达成协议，表示愿意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解决摩洛哥问题。这就是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

1906年1月—4月，讨论摩洛哥问题的国际会议在西班牙的阿尔及西拉斯召开，有11个欧洲国家和美国、摩洛哥的代表参加会议。4月8日，会议最后签订了一个确定摩洛哥国家地位的条约，条约规定素丹的独立自主地位和各国在经济方面在摩洛哥享有“自由和完全的平等”。但是，多数国家支持了法国，因此使法国在摩洛哥许多地方获得维持秩序的优先权利。

法国并不以此为满足。1911年春天，摩洛哥非斯地区爆发了起义。法国利用这一机会，以平息骚乱，保护法国侨民为借口，于5月派兵6万占领了摩洛哥非斯城。1911年7月，德国巡洋舰“豹”号驶入摩洛哥大西洋沿岸的阿加迪尔港。这一充满火药味的“豹”的跳跃，引起了历史上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想再次准备用武力要挟法国。英国干预了法德之间的冲突，发表声明说，在摩洛哥问题上，英国将站在法国一边，不惜与德国一战。德皇见势不妙，表示愿意和谈，法国内阁总理卡约与德国进行了秘密谈判。1911年11月，法德签订协定，德国承认法国对摩洛哥的保护权，而法国则将在刚果的领地让给德国一部分。这样，法国就获得了在摩洛哥的行动自由。1912年3月，法国正式宣布摩洛哥为保护国。

与此同时，法国殖民者最终完成了对赤道非洲4个地区，即加蓬、刚果、乍得和中非的占领，并于1910年1月15日，将法属刚果改组为法属赤道非洲。至此，法国占领了全部非洲35.9%的领土，在面积上超过英德，占第一位。到第一次大战前夕，法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占有面积1060万平方公里，约等于本土面积的20倍，人口5550万，仅次于英国，成为世界第二殖民大国。

[走向战争]20世纪初，由于法德矛盾的逐渐激化，民族沙文主义又趋活跃，大肆煽动对德复仇。集合在民族沙文主义旗帜下的有夏尔·莫拉斯为首的新保王主义者，1905年他们把1898年的“法兰西行动委员会”重建为独立的团体“法兰西行动”，它的报刊《法兰西行动》1908年改为日报；还有曾经站在德雷福斯派一边的共和党人，如贝居；也有许多名作家如巴雷斯。他们叫喊战争，把矛头对准“德国人和坏法国人”，为鼓动对德战争，他们把推行和平外交政策的政治家约瑟夫·卡约和坚持反战的社会主义者饶勒斯等人都划入“坏法国人”之列，竭力加以攻击。

他们在报刊上大造舆论，攻击卡约签订关于摩洛哥问题的法德协定，要求实行强硬的外交政策。他们甚至以调查和学术研究为名，夸大青年中的好战情绪。例如他们宣称，根据政治科学私立学校学生对他们所提问题的回答，可以确定，青年人不害怕战争，并渴望行动。巴雷斯在1897—1902年完成了《民族活力小说》三部曲之后，又创作了煽动民族情绪，以洛林为题材的小说，如《柯莱特·博多希》和《有灵感的丘陵》，在青年中极有影响。“法兰西行动”还煽动青年在街头发动骚乱，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多次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煽动下，法国很快作好了战争的精神准备。

1912年1月10日，约瑟夫·卡约在国内右翼势力的抨击下，辞去法国总理职务。普恩加莱在战云密布的形势下，组成新内阁，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普恩加莱以870票中得483票的多数当选为法国总统。

普恩加莱(1860—1934)出生在洛林一个桥梁工程师家庭，普法战争后，普军侵占他故乡的耻辱在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年轻时他成了巴黎律师公会著名的律师，1893年起进入政界，历任财政部长、教育部长、众议院和参议院议员，在各种政治事件的斗争中，他始终以各派调停人的身份出现，博得各派的欢心。实际上，他是资产阶级右翼势力的领袖。

普恩加莱任总理后，积极推行对德复仇的强硬外交政策以取代卡约的和平政策，为准备战争制造舆论，大肆宣传“民族观念”，鼓吹要建立“强大的法兰西”。当选总统后，与前任不同，他非常积极干预并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他把自己的当选总统说成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胜利。”在给众议院的咨文中一再强调保卫法兰西民族的重要，说什么“为了维护和平，只能准备战争。”因此，获得“普恩加莱—战争”的绰号。普恩加莱利用民族沙文主义煽动起来的“爱国”热情，疯狂地进行一系列扩军备战。

首先，实行三年兵役制。1912年7月，众参两院在社会党的反对声中通过了新的兵役法，将原来的两年兵役制改为三年，士兵入伍年龄从21岁—45岁放宽到20岁—48岁。三年兵役法的通过，不仅延长了士兵服役的时间，而且增加了军队的员额。

其次，大力扩充军队。普恩加莱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使常备军增加50%，从55万猛增到82万人，加上殖民军队共达88万人，使法国的兵力大大扩充。

再次，大幅度增加军费，高速度发展军火生产。普恩加莱使军费预算从原有的9亿法郎猛增到15亿法郎，占国家全部预算开支的38%。并大规模增设兵工厂，生产各种武器大炮。战前法国总共有15万人从事军火生产，仅次于德国。各种新式武器被大批制造出来，3年之内军队的机枪增加2倍多。大炮增加1/3，到1914年已拥有137架战斗机。

在扩军备战的基础上，法国于1914年4月制订好作战计划，做好了投入战争的全部准备工作。

第三节 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和发展

[工人运动的复兴]巴黎公社的被镇压，使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暂时转入低潮。梯也尔因此而得意忘形地高喊：“人们不再谈论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这些词已在我国永远被埋葬了。”但是，无产阶级并没有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重又投入了新的斗争。1871年7月，巴黎马车夫工人率先开始了罢工斗争。9月，罗亚尔宫首饰工人也掀起了罢工浪潮。12月，布拉萨和圣·弗罗里纳的矿工罢工。1872年初，卡斯特尔、隆尚矿工也举行了罢工。无产阶级斗争的发展，使资产阶级十分害怕，他们归咎于第一国际的活动。于是，在1872年3月14日，颁布了反国际的杜弗尔法，宣布：“任何国际协会，不论它用什么名称，……它在法兰西土地上的存在和分支机构，本身就构成了对社会治安的侵犯”。因此，决定对一般会员处以2—3个月的监禁，50—1000法郎的罚款，对协会的工作人员和宣传者则处以5年监禁和2000法郎罚款。但无产阶级并没有被吓倒，此法公布不久，北方省和加莱海峡省的矿工，展开了大规模的罢工。全国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不断高涨。1871年为52次，1872年达151次，1873年为44次，1874年为58次，1875年为101次，1876年为102次，到1875年处于半合法状态的工会组织已有135个，还出现了秘密的社会主义小组。所有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力量，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在多次惨遭镇压的沉痛教训中，再一次懂得了组织起来的必要，他们决心为筹建自己的组织而努力。

1876年10月2—10日，在巴黎召开法国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350名代表参加了大会，他们代表了90多个省市。这次大会虽然被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新闻记者巴尔贝勒所控制，但多数代表并不满意巴尔贝勒提出的温和的劳资合作的主张，而是希望建立一个“和一切现存的其他政党区分开来”的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这次代表大会成为法国工人运动再次复兴的标志。

[盖得和拉法格]在法国建立工人政党的过程中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活动中，作出杰出贡献的是盖得和拉法格。

茹尔·盖得（1845—1922），真名叫马蒂约·茹尔·巴齐尔。1845年11月11日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中学教员。因家境清寒，盖得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全靠父亲的严格管教和自己的刻苦自学，才获得丰富的知识。

家境的贫困，使盖得很早就走上了独立谋生的道路，先在内政部当了两年文件抄写员。19岁去塞纳省新闻办公室任事务员。一边工作一边抓紧一切空闲时间，博览群书。还开始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尔后，担任了新闻记者和编辑部秘书，猛烈抨击第二帝国，热情赞扬共和制度。

普法战争开始时，盖得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带头反对普法王朝之间的争霸战争，坚决主张推翻第二帝国的统治。他因此遭到帝国当局的迫害，被判处6个月徒刑。巴黎公社起义时他虽身居外省，仍在报纸上撰文热烈地歌颂公社，并努力促进外省援助公社。1871年6月，即公社失败后不久，盖得得悉被判5年徒刑和4000法郎罚款，就被迫流亡瑞士，在那里他加入了第一国际汝拉支部，跟随巴枯宁派，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1872年，盖得到意大利的罗马和米兰定居。在米兰，他阅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和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德萨米的著作，并与米兰的社会主义者交往密切，从而促使他逐渐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派一边。

1876年9月，盖得回到法国，经常与马克思主义派交往，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研究马克思的基本观点，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言行，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转而宣传马克思主义。1877年11月，他创办了法国第一张宣传社会主义的报纸《平等报》。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主义者、无神论者，而且首先是社会主义者，强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历史的必然。1878年他写的《社会主义教理问题概论》一书出版，接着又出版了《集体主义和革命》等著作，在书中系统地阐明了他的集体主义理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与此同时，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示，要在法国创立一个“独立的和革命的工人党”，领导工人“只有斗争才能得到解放”。为此，盖得与拉法格共同努力，为在法国建立工人政党而不倦地工作，成为党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

保尔·拉法格（1842—1911），生于当时属于西班牙的古巴岛，父亲是法国波尔多的葡萄种植园主，生活并不富裕。拉法格在9岁时跟随父亲回到法国。在巴黎大学读书时，因积极参加反对第二帝国的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

1866年1月，拉法格被迫流亡英国，在伦敦继续进大学学习医学专业，并开始与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亲密的友谊。3月初，拉法格被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兼任西班牙通讯书记。在伦敦的两年多时间里，他成为马克思家里的常客，受到马克思的直接教诲，逐渐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1868年4月，拉法格与马克思的次女劳拉结婚，不久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医学课程，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1868年秋，拉法格和劳拉同返巴黎。边行医边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积极参加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的工作，同蒲鲁东派展开斗争。普法战争爆发后，拉法格夫妇赴波尔多，任波尔多国际支部书记。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后，拉法格立即投入声援公社的斗争，并于4月6日，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到达革命中心巴黎，会见公社领导人，接受公社委派的声援任务，居留达13天之久。回波尔多后，在报纸上宣传公社事业的伟大意义，还积极准备在波尔多建立公社政权。

公社失败后，拉法格遭到梯也尔反动派的追捕，被迫离开法国，到达西班牙，他立即投身于反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斗争。1872年9月，拉法格参加了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他站在马克思派一边，与巴枯宁阴谋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会后，他协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起草了全面清算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正式文件：《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

海牙会议后，拉法格夫妇长期侨居伦敦，虽远离祖国，对法国工人运动仍十分关注。他与盖得建立密切的通讯联系，为在法国建立工人政党而共同努力，成为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1882年春，拉法格重返法国，积极参与工人党的领导工作，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撰写了：《共产主义和经济发展》、《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财产及其起源》、《美国托拉斯的经济、社会及其政治意义》、《思想起源论》等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专

著，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还与盖得并肩战斗，成为工人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

[工人党的创立及其纲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法国工人中的先进分子，要求建立独立政党的呼声越来越高。1878年1月28日—2月8日，在里昂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派已经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出现了，许多代表从巴尔贝勒的合作主义转向了集体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巴黎雕刻工人夏尔·夏贝尔，他曾经是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的发起人之一。坚决的合作主义者。可是，通过本次大会，他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说：“我曾长期反对集体主义，但是，现在我认识到个人主义的危险，我有信心说，未来是属于集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已成为到会先进工人的思想武器，为法国工人政党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此次大会后，盖得等人深入巴黎和郊区及外省的工人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日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法国的广大工人急切希望建立自己的政党来领导斗争。

1879年10月20日—31日，法国第三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在马赛召开，会议一开始就改名为“社会主义者工人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30人，代表全国45个城市。盖得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宣传的集体主义思想已被广大代表所接受，大会通过辩论，合作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均被击退，马克思主义派，即集体主义派取得了胜利，以73票对27票的多数，通过了一系列原则上正确的决议，关于工人候选人参加议会选举的决议；关于工业和资本国有化和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的决议；关于工人夺取政权的决议；关于成立法国工人党的决议。大会还一致通过党的正式名称是“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合会”即法国工人党。该党下设六个地区联合会，中央设执行委员会联络日常工作。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就这样宣告成立。法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无产阶级政党要真正带领群众前进，就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政治纲领作为全党的行动准则。为此，盖得和马隆等人立即着手起草党纲的工作，由于意见无法统一，社会主义者就推派盖得去请求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1880年5月，盖得专程到达伦敦，由拉法格引见，在恩格斯家里与马克思共同商讨了党的纲领。四人共同对党纲逐条逐句进行讨论、修改。马克思还口授了纲领的导言（即理论）部分。

法国工人党纲领分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它基本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纲领明确指出：（1）无产阶级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彻底解放全人类。（2）“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并使全部生产资料归还集体”，即夺取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3）无产阶级必须组成独立的政党，以领导并保证革命的胜利。（4）近期内必须做到的政治、经济具体措施，诸如出版、集会自由，取消宗教预算，八小时工作日，男女同工同酬等。这个纲领既指出了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又规定了眼前的政治、经济要求，使党具有统一思想和行动的前提条件。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这个纲领，他说：“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

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

但是，由于盖得坚持己见，这个纲领仍然存在着一些错误，例如错误地规定工人的最低工资额，结果资本家往往把最低工资额变为最高工资额。此外，关于废除常备军、废除遗产继承权等的提法，也都不够科学。不过，它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来则前进了一大步。而后，工人党又相继制订并通过了《市政纲领》（1891）、《土地纲领》（1894）和《航海纲领》（1896），使工人党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的代表者。

盖得从伦敦带回这个纲领草案后，首先得到中央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代表的一致通过，接着在《平等报》、《无产者报》、《社会主义评论》上分别公布，得到党的地方组织的广泛支持。

1880年11月，工人党在勒阿弗尔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并准备通过党纲草案。一些合作主义者坚决反对这一纲领。盖得派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据理驳斥了合作主义者，使到会的多数代表站在盖得派一边，终于以43票对10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不久，这一纲领也遭到党内布鲁斯、马隆等人的公开反对。他们要求取消党的最终目标，主张要把理想的目标分成几个阶段，并应集中力量争取眼前可能实现的利益；他们反对党纲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提倡地方自治。因此，他们被称为“可能派”。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19世纪80、9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迅速发展，罢工的人数和次数均不断增加，例如1882年，罢工次数为182次，参加罢工的工人为65,500人；1889年为199次，达89,100人；1893年为634次，达170,123人；1899年则增至771次，计177,300人。面对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党内部部分歧扩大，以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决心夺取党的领导权。勒阿弗尔代表大会后，可能派公开污蔑盖得、拉法格等工人党的主要领导人要在党内神化“领袖”，实行“独裁”。并扬言要“建立一个排除独裁的可能性的组织”。他们通过密谋策划，成立了一个由可能派垄断的全国委员会，并于1881年10月底11月初，在兰斯举行了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又操纵多数批准全国委员会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取代原来的执行委员会，从而排斥了盖得派的领导。他们还宣布在下次代表大会上重新讨论党纲问题。

盖得派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揭露了可能派的篡权活动，指出全国委员会“是马隆的阴谋的产物”，是“扰乱和离间党员群众的阴谋机关”，“这就意味着把权力交给阴谋家”。并准备在必要时与可能派实行组织上的决裂。1882年9月，工人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圣太田举行，由于可能派填发了一些空白委托书，结果在112名到会代表中取得86名的多数。盖得派眼见对己不利，于会议的第二天毅然退出会场，到罗昂召开了对抗性的代表大会，称工人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一致通过全党必须遵守党的统一纲领，并宣布全国委员会背叛了党的原则，将马隆、布鲁斯等人开除出党。罗昂大会将党的名称正式命名为法国工人党。

留在圣太田的可能派，接受了若夫兰提出的纲领，否定了工人党的统一纲领，正式建立了一个新党，称“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副名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联合会”。他们宣传市政社会主义，竭力主张在资本主义内部通过改革，尤其是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1890年9月，可能派内部发生分裂，

以阿列曼为首的一部分人，另立山头，称阿列曼派，次年正式采用“革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这一派受蒲鲁东无政府主义影响，否定一切权威，不信任议会斗争，主张通过总罢工，实现工人自治，取得解放。五年之后，再度分裂，一些不满阿列曼派的人，于1897年成立“革命共产主义同盟”。这些人在行动上与布朗基派、工人党重新协调起来。

除了工人党和可能派之外，1881年7月，布朗基派在前巴黎公社国民自卫军将领埃德领导下建立了“中央革命委员会”，坚持布朗基的传统观点。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政权。1888年埃德去世，内部矛盾激化，1889年8月，格朗热派分裂出去，另立“中央革命社会主义委员会”，坚持布朗基主义的消极因素。瓦扬坚持原派立场，成为中央革命委员会的领袖。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放弃秘密的关门主义，倒向马克思主义派。他们与工人党合作，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努力。1898年7月，该党改组，取名为“革命社会主义党”。

此外，还有独立社会党人，1893年组成，先由马隆、饶勒斯领导，后来被米勒兰、维维亚尼接替。鼓吹和平改良主义，积极参加竞选和议会斗争，逐步成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小集团，对工人运动起了腐蚀作用。

由上可知，19世纪80、90年代，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即派别林立，力量分散，而且与工会运动严重脱节。造成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这种分裂状态的原因，主要是由工人队伍本身的分散性决定的，当然也受到法国历史传统的影响，他们既有革命的传统，又有雅各宾派的传统，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传统，无政府主义的传统。这就造成了社会主义分散性。还有当时环境的影响，即议会民主提供的政治自由，也促使工人组织不易统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严重地影响了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顺利发展。

二、工人党的活动

[工人党的活动]罗昂代表大会后，法国工人党的队伍迅速扩大，1882年罗昂大会分裂出来时，只有26名代表，其成员也只上百人。但是到1889年，已拥有党员2,000人，1893年为10,000人，1898年则达16,000人，不仅成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中的最大组织，在国际上，也仅次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第二大党。

法国工人党在这个时期的主要活动是：第一，组织全国性工会联合会。1884年政府被迫颁布组织工会自由的法律后，全国工会运动迅速发展，1884年只有地方工会68个，到1890年发展到了1,006个。工人党利用这一形势，努力领导工会运动，发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会，于1886年10月，正式成立全国工会联合会。并且使工会组织与社会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一度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到90年代以后，由于工人党的错误策略，放弃领导，使工会与政党分离，工会被无政府主义者掌握，1895年改称为法国总工会，成为无政府工团主义。

第二，继续揭露可能派的反动本质，粉碎他们妄图夺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阴谋。1889年正当各国工人政党迫切需要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领导工人运动之时，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乘机与英国工联等机会主义相勾结，决定抢先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阴谋夺取新国际的领导权。法国工人党在恩格斯的直接帮助下，拉法格和盖得等领导下，立即投入筹备新国际的组织工作，并于7月14日胜利召开了第二国际成立大会，使可能派的篡权阴谋惨遭失败，会上还通过了5月1日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为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斗争。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源，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又一次取得了胜利。

第三，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工人党在罗昂大会上曾作过决定：“工人党的义务不仅是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罢工，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组织和领导罢工。”工人党直接支持和领导了多次重大的罢工斗争，1886年1月底，法国南部德卡兹维耳城的2,000多名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愤怒的工人打死了拒绝改善工人条件的煤矿经理瓦特兰，并坚持斗争到6月中旬。正当工人处于危难之时，盖得和拉法格等工人党的领导人公开发表演说，愤怒揭露反动政府的暴行，坚决支持工人被迫处死煤矿经理的正义行动。盖得虽然因此而受审，但仍在法庭上申明，无产阶级的暴力举动，正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表示将“以牙还牙，斗争到底”。由于工人党的支持，工人坚持斗争，达6个月之久，终于使这次罢工取得了部分胜利而结束。从而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正如恩格斯所说：“德卡兹维耳使巴黎投社会主义者的票数从三万张增加到十万多张。”

第二国际成立后，法国工人在工人党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每年五一节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开展争取八小时工作日的斗争。1890年5月1日，全国有150个城市举行游行示威，巴黎成千上万的工人在游行示威中情绪激昂，几乎酿成内战，胆颤心惊的老板吓得连夜逃出首都，以防革命，这一年在全国至少有40万人以上参加了5·1示威游行，显示出无产阶级的伟大战斗力量。

1891年，工人党为了使工人更有效地进行斗争，在5·1节前夕，设立了专门筹备委员会来负责组织工作，并发表了《告法国劳动者宣言》，希望劳动者“表现团结的伟大行动”，积极参加5·1节的示威活动，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工人党诺尔省富尔米市支部也发出了《告工人书》，号召工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并向当局提出五项具体要求。拉法格专程到达富尔米市，代表工人党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工人起来斗争。富尔米市的厂主向工人进行公开威胁；5月1日，不上工者，一律开除。工人们毫不动摇，这一天毅然上街游行，结果遭到反动军警的疯狂屠杀，造成60—70人伤亡的流血惨案。富尔米市人民愤怒万分，抬着同伴的尸体游行示威，坚持斗争达1周之久。拉法格因此而被判处1年徒刑和500法郎的罚款。这场斗争虽遭野蛮镇压，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反动本质却暴露无遗。富尔米惨案在全国各地引起极大的愤慨和不满，各地无产者纷纷举行声援斗争，使工人运动继续发展。

1892年8月16日，法国南部卡尔莫煤矿工人举行大罢工，这次罢工的起因是，在1892年的市政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在卡尔莫市取得了胜利，煤矿的装配工加尔文约克当选为市长，矿井当局为阻止其当选，立即将其解雇。卡尔莫矿工当即用罢工来抗议矿井行政当局对加尔文约克的解雇，坚决要求将其复职。罢工完全是政治性的，工人党表示坚决支持，并在全国募集罢工基金，以保证罢工继续进行。3000名工人坚持斗争达3个月之久，终于取得了胜利。在这场斗争中，饶勒斯以果断的态度站在罢工者一边，他因此而出名。

第四，积极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努力提高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法国工人党通过多种形式，创办报刊、举办学习班和专题讲座、召开大型辩论会、利用节、假日进行公开演讲，以及编写通俗读物、翻译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等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宣传无神论思想，宣传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社会发展规律。

但是，法国工人党并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该党成立后，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习气和宗派主义情绪、策略上的过分刻板不够灵活，因而在许多重大事件中严重脱离了群众。当布朗热煽起狂热的反共和主义运动之时，工人党对这场保卫共和政体的斗争却错误地站在宗派主义的中立立场，把它看作是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争夺，喊出了“不要费理，不要布朗热！”的口号，说什么两者都不是好东西，在“鼠疫和霍乱之间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轰动全法国的德雷福斯冤案，形成了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大搏斗。工人党又一次按兵不动，甚至错误地向工人发出了公开信，劝导“无产阶级在这场……互相厮杀的混战中，是用不着麻烦自己的。”“切不误入为个人申冤的歧途”。结果失去了群众，危害了革命。

90年代后，工人党逐步转向于合法的议会斗争。1893年工人党以盖得为首的12名代表被选入众议院，布朗基派等社会主义组织也获得了12个席位，米勒兰为首的独立社会党人则获得25个席位。盖得派把自己的当选看作“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认为靠“选票这种合法武器，就足以使工人党执掌政权。”于是，同坚持改良的米勒兰携手合作，结成了有50人组成的社会主义议会党团，从而使合法主义的思想开始在工人党内抬头。

[统一的尝试与米勒兰事件]无产阶级对反动统治的不满为社会主义者带来了更多的选票。1890年5月，在市政议会的选举中，社会主义政党获得了新的重大胜利，许多社会主义者当选为市长，并控制了马赛、蒙吕松、鲁贝、

第戎、土伦、罗昂、卡尔莫、加莱等将近 150 个市镇的市政府。在里昂、图卢兹、蒙彼利埃等 70 多个市府中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少数派。

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法国各派社会主义者在巴黎的圣芒德举行盛大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有社会主义者议会党团的各派议员，有社会主义各派的著名活动家共 1000 多人。其中瓦扬、米勒兰、盖得、饶勒斯等相继发表了演说。米勒兰是这次宴会的主持者，他发表了充满着改良主义的长篇演说，史称《圣芒德纲领》。

米勒兰（1859—1943）律师出身，原属资产阶级激进派，因能说善辩，1885 年，即 26 岁就当选为塞纳省众议员，而后多次选为议员。90 年代初，他投机转向社会主义，成为独立社会主义派的头目，一个冒牌社会主义者。实际上他始终是个资产阶级激进派，改良主义者，他自己也常常公开称自己为改良主义者。米勒兰在圣芒德演说中的中心思想就是鼓吹议会道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通过社会改良，实现和平过渡。因此，他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用他自己在演说中的话来说，这就是：“国家进行干预，使各种形式的生产和交换手段按其成熟到可为社会占有的程度逐步从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通过普选获得国家权力；劳动者的国际协调”。短短三句话，高度概括了他的机会主义纲领的基本观点，就是要依靠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普选权来实现社会主义。这在当时却被选举胜利冲昏头脑的各派社会主义者所接受，成为以后各派暂时联合的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者的力量，在工人党的倡议下，于 1898 年 10 月在巴黎召开各派社会主义者联合大会，会上成立了由各派代表组成的全国警惕委员会。12 月，即改名为全国社会主义者协调委员会，1899 年 1 月，协调委员会正式成立，它由 5 个党派各派 7 名代表组成，在《圣芒德纲领》的基础上，各党派统一联合起来，但委员会无权干预也不插手各党派的内部事务。但是，这种统一是暂时的。

1899 年 6 月，米勒兰未经党的同意，借口“拯救”共和国和“保护”社会主义利益，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一起，共同参加了瓦尔德克·卢梭内阁，担任工商部长。米勒兰的入阁引起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重新分裂，饶勒斯经过动摇后，与布鲁斯等机会主义派一起形成了“入阁派”，他们把米勒兰的入阁看作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政治上剥夺资产者的开端，表示坚决支持入阁。瓦扬、盖得、拉法格领导的布朗基党和工人党则立即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入阁，形成“反入阁派”。明确指出社会党是阶级斗争的党，不是阶级调和的入阁党。米勒兰入阁是背叛行为，只能危害社会主义事业。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而形成入阁派和反入阁派，社会主义者的协调委员会几次召开大会，讨论入阁问题，均引起激烈的争辩，以至发生殴斗，双方无法调和，工人党、布朗基党等革命组织纷纷退出了协调委员会，各党派开始重新分化和组合，刚刚实现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又陷入了新的分裂之中。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

[社会党的分裂]米勒兰入阁以后，引起法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思想分歧，进而发展到组织分裂。1900年9月，入阁派和反入阁派在巴黎举行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继续进行激烈的争论，引起了公开的分裂。工人党全体代表退出了大会，并与反入阁派一起另行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坚持阶级斗争立场的新的社会党。1901年11月，坚决谴责米勒兰入阁的盖德派（工人党）和布朗基派及一些地方自治联合会，联合起来组成了法兰西社会党。党的宣言中声明法兰西社会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它跟资产阶级国家势不两立”，“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拒绝采取任何一个可能延长敌对阶级统治的措施。”1902年3月，支持米勒兰入阁的以饶勒斯为首的独立社会主义者、布鲁斯为首的可能派及一些地方自治联合会，共同组成了法国社会党，这是一个坚决主张入阁的改良主义政党，两党各不相让，使法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再次陷于分裂。

[统一社会党的建立]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两个社会党后，两党党员在工人运动中，常常采取统一行动，这为消除组织上的分裂准备了基础。1904年8月，第二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会上通过了建议法国社会党人建立统一的政党的提案。统一是革命的需要，是顺乎潮流的，为此两党不久就建立协商委员会，着手准备统一事宜。1904年11月，法兰西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联合条件，再一次强调“要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实现党的统一；党的目的不在于进行某些社会改良，而要改造社会。”1904年12月，通过各派协商，发表了联合声明，明确提出：“社会党是一个阶级政党，它的目标是实现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也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集产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党“决不是一个改良主义政党，而是一个……主张革命的政党。”根据联合声明，法国两个社会党于1905年4月23日—25日在巴黎环球大厅举行大会，实行合并，取名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法国统一社会党，拥有党员34,688人，白里安、维维亚尼和米勒兰拒绝参加统一社会党，另立独立社会主义者集团，蜕变为资产阶级的一翼。

法国统一社会党的建立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统一使党得到了发展而且加强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所以得到了广大工人的支持和党员的拥护。党的队伍随之迅速增大，到1906年11月党员已达43,400人，到1908年增至49,300人。但是统一社会党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各派从不同的立场理解联合声明，实际上貌合神离。由于盖得派向改良主义妥协退让，领导权被饶勒斯所掌握，使统一社会党成为放弃革命斗争，鼓吹议会道路的改良主义政党。

[社会党内的思想分歧]组织上的统一并没有带来思想上的统一，社会主义各派仍存在严重的思想分歧。

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是饶勒斯派的思想 and 主张。饶勒斯（1859—1914）是一位才气横溢的演说家、著名的政论家和出色的历史学家，他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1878年他19岁时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1年毕业后任中学哲学教师，1885年当选议员，任期届满后，又去图卢兹大学任教，1893年再度当选议员。1890年以后，他转向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有区别的。他自己也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起源于法兰西，受法兰西精神的鼓舞，是法兰西性质的。”在世界观上，他采取折中态度，希望协

调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他还是一位泛神论者，但在1900年，他又坚决反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维护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在政治上，他在本质上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他希望通过渐进的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他并不排斥一旦统治阶级不肯让步就诉诸暴力的可能性。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和谐。他认为“一个阶级的统治是反人道的暴行。”这种改良主义思想把社会党引上了错误的道路。

尽管如此，饶勒斯的一生却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他著有多卷本《法国社会主义的大革命史》，为法国历史科学作出了贡献。他积极支持和领导工人运动，支持工人的正义要求，在工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孜孜不倦地为反对殖民扩张、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斗争，直至为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法国和世界进步人们的心目中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但是，饶勒斯至死未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盖得派继续反对饶勒斯的“市政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改良主义。但他们采取教条式的态度，根本不理解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而产生的根本变化，也不是从实际出发，走革命的道路，结果既掩盖了自己的错误倾向，又掩盖了饶勒斯的改良主义面目，因而成为社会党内的中派。

以加香为代表的左派，虽然严厉批评饶勒斯的片面议会道路，表示“我们将实行的不是伸手乞求的政策，而是高举拳头的强硬政策。”坚决主张走革命的道路，争取无产阶级的解放，可是人少力微，无法改变党的路线。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一社会党内还有一个以爱尔威为中心的具有特殊地位的小派别。爱尔威以党内“左”翼代表自居，大叫大嚷地批评党的领导，在报纸上宣传充满假革命词句的反军国主义纲领，号召工人不论战争的内容如何，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并建议用总罢工和士兵开小差的办法来回答一切战争。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极其有害的半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只会葬送革命。

社会党内的思想分歧严重削弱了社会主义运动，人为地阻挠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损害了法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四、工农运动的新高涨

[工人罢工运动高涨]20世纪初，法国广大劳动群众生活恶化，大部分工人的实际工资普遍下降，从而促使了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同时法国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上的统一，法国总工会的扩大发展又有利于工人的斗争，而1905年俄国革命的爆发，也推动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这时工人运动高涨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罢工风起云涌，且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罢工的次数多，规模大，时间长。20世纪初，参加罢工的次数逐年大幅度增加。如果与19世纪末相比，每年平均罢工者的人数、次数均增加一倍以上，与西欧各国相比，尽管法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比英、德诸国少，但法国在20世纪初头10年参加罢工的人数却超过了英、德，居欧洲第一位。工人坚持罢工斗争的时间也长，有的地区的工人罢工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

第二，罢工斗争的方式激烈，出现了暴力行动。尤其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工人一方面掀起声援俄国工人的运动，另一方面同本国统治者展开坚决的斗争。1905年，全法国至少有39个城市举行了声援俄国革命的示威游行和群众集会，坚决支持俄国工人试图推翻沙皇统治的革命活动。

1906年，罢工斗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一年中发生了1354次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43.7万人，其中诺尔省和加莱海峡省矿工举行的罢工规模特别大。1906年3月10日，由于煤矿主不顾工人死活，引起“库里埃”矿井塌陷而造成1100多名矿工死亡的大惨祸。这一惨剧震动了全国，矿工们纷纷罢工，抗议矿主，声援遇难者，总共有85,000名矿工参加了历时52天的大罢工。克雷孟梭派出25,000名军队赶往矿区，进行残酷镇压，工人们奋起反抗，双方酿成武装冲突。工人的斗争取得局部胜利，结果以增加10%的工资而告结束。

1906年5月1日，巴黎20万工人举行了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罢工斗争，资产阶级惊慌失措，纷纷逃离巴黎。1908年6月，巴黎城郊德拉维掘土工人举行大罢工，工人们胸前挂着“8小时”的大纸牌，为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克雷孟梭再次动用军队镇压罢工者，不少工人伤亡。为声援掘土工人的斗争，并抗议政府的暴行，巴黎建筑工人举行了抗议总罢工。当游行的工人来到巴黎城郊的维尔内夫—圣—乔治时，遭到反动军队的伏击，8名工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工人们拿起武器，筑起街垒，决心用革命暴力进行战斗。

第三，参加罢工者的成份有所扩大，不只局限于工业企业的工人，铁路员工和公务员也加入罢工行列。根据1907年的一个法令规定，禁止铁路员工和公务员组织工会和参加罢工。1909年3月和4月，法国邮局职员不顾政府的禁令毅然举行公务员的总罢工，并与警察展开搏斗，罢工遭政府残酷镇压，先后有600名公务员被解雇。1910年10月，法国铁路员工也不顾禁令，在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掀起了总罢工。他们要求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日，白里安政府继续采取高压手段，调遣大批军队接管铁路，逮捕罢工委员会，镇压罢二者，死伤200多人，罢工惨遭镇压。

资产阶级政府虽然通过镇压手段，暂时平息了震撼全国的罢工运动，但说明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新的觉醒，革命形势正在成熟。

[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在第三共和国前期，农村一直是比较稳定的地

区,但在 20 世纪初,也出现了革命运动,许多地区受到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倾向。

首先是农业工人的觉悟开始提高,他们把斗争矛头指向所有的资产者,也包括激进共和派,并且把自己的斗争和城市工人的斗争联合在一起。一些农业工人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土地劳动者联合会”,并加入到总工会里。1904 年,埃罗省和奥德省的农业工人举行罢工;1906 年 2 月和 3 月,朗德省的树脂采集工人和巴黎郊区的园艺工也举行罢工,农民们高唱起《国际歌》,表达了自己的政治倾向。

社会主义也逐渐赢得了农村的选民,反映出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深入农村,根据 1914 年选举的统计,投统一社会党票超过 30%的省份有三个:上维埃纳省、阿利埃省和阿登省,基本上是农业省。1906 年以后,选票显著增加的几个省份也是以农业为主的,如上维埃纳省、阿利埃省、伊泽尔省、洛特省、塞纳—马恩省和涅夫勒省。

对全国震动最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是 1907 年南方酿酒农的暴动。1907 年 6 月开始,南方各省葡萄酒产区的农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甚至出现了农民暴动。由于葡萄园遭受葡萄根瘤蚜虫病和酒税的苛重,加上酒价猛跌,使葡萄酒农纷纷破产,生活十分贫困,酒农被迫组成葡萄酒业联合总会,先后在尼姆、贝济埃、纳尔榜和蒙彼利埃等城市举行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要求改善生活,反对纳税。在贝济埃有 15 万酒农参加集会,在蒙彼利埃达 50 万人参加游行示威,他们高举着“南方行动起来”,“巴黎坚持下去”的标语牌,要求城乡联合起来共同战斗。领导运动的是纳尔榜市市长社会党人菲鲁尔和葡萄酒业农民阿尔贝,许多市议员支持农民的正义要求。酒农忍无可忍,与警察发生冲突,并采取暴力行动,捣毁副省长的寓所。克雷孟梭慌忙调集 17 步兵团前去镇压,并密令逮捕运动的领导者菲鲁尔等人。但 17 团拒绝服从命令,士兵同情农民,他们枪口朝天,高唱《国际歌》,出现了使军队转向农民的动人场面。反动政府只得重新调遣军队,化了很大的力气才将农民运动和起义军镇压下去。

农民的革命斗争表明,法国的农民阶级开始觉醒,逐渐成为工人阶级的同盟军。

五、无政府工团主义

[全国总工会的重组]20 世纪初，法国的工会逐渐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和无产阶级的政党分道扬镳。工会和政党的分裂也是法国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

在 19 世纪晚期，法国的工会有两大系统，一是根据不同行业组成的行业工会，一是按地区组织的地区工会。在 19 世纪晚期，两大系统都先后组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在 90 年代中期以前，行业工会的全国组织“全国工会联合会”是受法国工人党领导的，而地区工会的全国性组织“地区工会联合会”在费尔南·佩鲁梯埃的领导下却反对盖得派的主张。1894 年全国各工会组织在南特举行代表大会，大会再度坚持总罢工的原则，这标志着无政府主义开始侵蚀行业工会，全国工会联合会逐渐摆脱工人党的领导。全国工会联合会和盖得派决裂后，未能和地区工会联合会实行合并。1895 年 9 月，全国代表大会在利摩日举行，建立了以行业工会为主的全国总工会。

1901 年，维克多·格里菲埃尔当选为总工会书记。同年，地区工会的领袖佩鲁梯埃逝世，这就促使了全国总工会的重组。1902 年，在蒙彼利埃工人第 7 次代表大会上，地区工会加入了全国总工会，总工会于是包括了 56 个地区工会，29 个联合会，373 个行业工会，实现了全国工会的统一。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策略路线]全国总工会重组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又一次放弃了领导，结果使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总工会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06 年 10 月，全国总工会在亚眠举行代表大会，以 830 票对 8 票（一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亚眠宪章》。《亚眠宪章》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却集中反映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策略路线。

在与党的关系上，工团主义表示不和任何政党发生关系。在亚眠代表大会上，全国纺织联合会书记维克多·雷纳尔曾提出动议建立和统一社会党的联系，但他的动议却被大会否决。《亚眠宪章》宣称，不必“操心其他政党和派别的事情。”它宣称工团领导一切，“工会今天是抵抗的团体，将来会成为生产和分配的团体，社会改造的基础。”实际上就是要工团取代一切。

在斗争手段上，工团主义反对利用议会讲台进行合法斗争，也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总罢工是唯一有效的手段，所谓只要用“双手交叉的总罢工”，资本主义就会崩溃。

无政府工团主义实际上是工联主义在法国的变种，表面上左倾，实际上反对革命，把工会看得高于一切，这只能使无产阶级迷失方向，走上歧途，所以列宁称它为“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

[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破产]无政府工团主义脱离无产阶级政党的路线，造成工人运动的涣散和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也阻碍了工会本身的发展。虽然在 20 世纪初参加工会的人数在增加，但占工人的比例并不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只有 9% 的工人加入工会，而同期英国和德国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高达 25% 和 28%。

1906 年以后工人罢工的相继失败，也使工人对工团主义总罢工的策略表示怀疑，总工会内部思想分歧。邮局公务员罢工失败后，1909 年 6 月雷翁·若奥当选为总工会书记。他逐渐使工团主义向右转向改良主义道路，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后，总工会领导采取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无政府工团主义彻底破产。

第四节 思想和文化

一、文学的发展

[无产阶级文学的新阶段]无产阶级文学随着无产阶级斗争的出现已经兴起。但是，由于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的成立，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显示了与过去一切旧文艺根本不同的特点。在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一支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队伍，突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伟大主题，塑造了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和诗人，他们在公社存在时期和在流放所及囚禁中，写下了许多诗歌、小说和散文。其中最著名的有鲍狄埃、米歇尔、克莱曼、于格和瓦莱斯。

欧仁·鲍狄埃（1816—1887）是著名的公社活动家、诗人。生于巴黎一个贫穷的工人家庭。13岁就做工，14岁开始创作。早年参加工人运动。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后，领导了印花布行业的工人，组织工会，加入第一国际。在普法战争中，参加过保卫巴黎的爱国斗争。巴黎公社时期被选为公社委员，负责领导工人协会联合会和艺术家联合会的工作。在“五月流血周”里，他拿起武器，走向街垒，为保卫公社浴血奋战，并写下了光辉诗篇《国际歌》。公社失败后被迫流亡美国，参加了美国的工人运动。1880年重返祖国，立即参加了工人党，投入新的斗争。

鲍狄埃用笔作武器，一生写下了大量诗篇。1884年他的第一卷诗集《谁是疯子？》出版，1887年逝世前出版了第二卷诗集《革命歌曲集》。在著名的《国际歌》中，他以气势磅礴的语言，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通过革命去砸碎套在工人颈上的锁链，推翻资本主义的黑暗统治，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这首歌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无产者为人类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

路易丝·米歇尔（1830—1905）是公社活动家、诗人。出生在上马恩省农村。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乡村当小学教师，1856年到巴黎继续教书并为共和派报刊撰稿。1870年始，努力投身群众运动，成为国民自卫军战士，担任18区警备委员和妇女警备委员。在1871年3月18日武装起义中，表现出色，以“蒙马特尔红色姑娘”的称号闻名巴黎。忘我献身于公社事业，积极参加了保卫公社的最后战斗。被捕后，宁死不屈，在法庭上厉声斥责反动政府，为自己能成为公社战士而自豪。后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在那里她接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想。1880年11月回国后，参加无政府主义的派别。

米歇尔为人热情而又不怕牺牲。她尽管在理论上有所错误，但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革命家，一生写下了许多诗篇。著名的有《红石花》；《囚徒之歌》等，表达了公社战士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和信念。他用散文体写成的《回忆录》、《生活历程》和《公社》，具体而形象地记述了自己在巴黎公社时期的革命活动，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茹尔·瓦莱斯（1832—1885）是公社活动家、作家。曾积极投身巴黎公社革命，被选为教育委员会委员。在“五月流血周”保卫战中英勇奋战。公社失败后流亡伦敦，被缺席判处死刑。1880年回国，不久复刊《人民呼声报》，继续向反动统治展开斗争，著有长篇小说《雅克·万特拉》三部曲（即《童年》、《中学生》和《起义者》），描写了一位贫穷知识分子如何走上革命

的艰苦历程。这是无产阶级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尤其是在《起义者》中，作者以强烈的爱憎，歌颂了公社的诞生和保卫公社的壮烈斗争场面，怒斥了反动派的残暴。本书被改编成七幕历史剧《樱桃时节》曾于1985年在我国上演，获得好评。

此外，于格（1851—1907）在《狱中歌》中，揭露了公社战士被惨遭集体屠杀和种种酷刑的野蛮行径，表达了作者对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刻骨仇恨。还有克莱曼（1836—1903）的《浴血的一周》，在诗中作者声泪俱下地控诉了刽子手的滔天罪行，以坚定的信念预示着“这些坏日子总有过去的时候”，在革命的失败中蕴藏着胜利。

上述公社时期的著名作家，他们都身历其境，以革命事业的积极参加者和捍卫者的身份，抒发了这场惊天动地的巴黎公社革命，这不仅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意境，而且还为后人研究公社史提供了生动形象的史料。

[文学中的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在这一时期里，法国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中，除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继续存在外，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和象征主义。

自然主义，产生于60年代中期，80年代为法国文学中的主要流派。这一派的主要观点是强调在艺术创作中的科学性。艺术构思必须以自然，即事实作根据。作家的创作实践就象科学试验一样，要把人放在依据事实创造出来的环境中，研究环境对人的影响。作家要象科学家找出科学中的规律那样，在生活中也应找出固有的规律来。同时强调小说家应该是超党派，超政治的。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左拉、莫泊桑和《最后一课》的作者都德。

在80年代的法国文坛上还出现了新的文学流派——象征主义。1885年由让·莫雷阿斯首先提出。它是当时资产阶级颓废文学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流派之一。这一派反对自然主义提倡的如实地描写客观世界的方法，反对明确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宣扬艺术至上，逃避现实，抛弃对世界的理性认识，要求艺术家逃到奥秘的个人内心世界中去，去追求不可知的“象征”的“理想”社会。这一派最后终于掉进宗教神秘主义的泥坑。其主要代表有：斯提芬·马拉美、保尔·魏尔伦和阿瑟·兰波。在他们的作品里，着力歌颂远离现实的，美丽而神秘的理想世界，用孤居独处的清幽对抗资产阶级的腐朽和丑恶，用死亡和遗忘来摆脱环境的肮脏。

[左拉和莫泊桑]在当时文坛上影响最大的是左拉、福楼拜和莫泊桑，他们因创作大量的优秀作品而驰名世界。

爱米尔·左拉（1841—1902）是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小说家，他虽出生于工程师家庭，但因七岁丧父，所以仍在贫困中度过其童年和青少年。中学毕业后即去谋生，当过运输公司职员、书店店员，而后专门从事创作，其主要作品有20卷的连续长篇小说《鲁贡·马卡尔家族》，副题是《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1871年出版第一卷《鲁贡家族的家运》，1893年出版最后一卷《巴斯卡医师》）、《三大名城》（1894—1898年）等。

《鲁贡·马卡尔家族》是一部结构宏大的巨著，它以第二帝国为背景，系统而全面地描述了这个家庭的盛衰兴亡，展示出一幅广阔的社会图画，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尖锐矛盾，刻划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从贵族集团（《欧仁·鲁贡阁》）、大资产阶级（《金钱》），直到巴黎的底层（《陷阱》）、农民（《土地》）、工人阶级（《萌芽》）和军队（《崩溃》）。

《萌芽》（1885）是左拉的巨大系列作品《鲁贡·马卡尔家族》的第13卷，是左拉的著名代表作。本书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劳资双方的斗争，出现了无产阶级人物形象。这卷代表作中，左拉以煤矿工人的罢工斗争为背景，描写了矿工的悲惨生活，以及资本家的残酷压榨和工人们激烈的反抗和斗争；也描写了工人的罢工斗争惨遭镇压的结局。《萌芽》可以使人们形象地了解到第三共和国时期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法国矿工的地位和处境以及资本主义统治的反动和丑恶。但是，在左拉的笔下，工人们却变得粗鲁、愚昧和盲从，歪曲了工人的形象，这是左拉资产阶级局限性的反映。不过，左拉把这部小说定名《萌芽》，表示出他对工人运动是抱有信心的，是寄托着对未来的希望的。

居伊·德·莫泊桑（1850—1893）是法国著名的小说家。他生于破落贵族家庭，普法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分别在海军部和教育部当职员，而后爱好文学，1880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羊脂球》，接着又陆续写出了35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其中主要有短篇《疯婆》、《米隆老爹》、《项链》和长篇《一生》及《俊友》。

莫泊桑的作品具有明显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他创作的短篇小说多半是以普法战争为主题的，作品中深刻揭露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残暴与野蛮和法国军队的腐败与无能，描写了法国民间抗敌的英勇事迹。但在莫泊桑笔下，却没有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地位，其正面人物多为小资产者和小市民。

在《俊友》（又译《漂亮朋友》）这部长篇小说中，莫泊桑无情地揭露了小说中的主人公乔治·杜洛阿向上爬的丑恶一生。杜洛阿原是一个下级军官，钻进了报社，接着又用造谣欺骗等手段取悦于报社主编、经理和金融财阀，又用下流手段取得上流社会贵妇人的欢心。主编死后，他即取其夫人为妻，吞得遗产，变成富翁，并成为政界、新闻界的重要人物。而后又采取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终于爬进了第三共和国的统治集团，从而进一步揭露出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贪婪、尔虞我诈及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

莫泊桑在小说中虽然暴露了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却无力摆脱丑恶的现实生活，陷入了宿命论的泥坑，宣扬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但是，他的作品对我们了解法国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有价值的，当时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保尔·拉法格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莫泊桑是现代作家中唯一的例子，他敢于在他的小说《俊友》中揭开帷幕的一角，暴露巴黎资产阶级报界的贪污和无耻”。

二、史学与哲学

[实证主义史学]19世纪50、60年代开始，实证主义就在法国史学界传播开来，到70、80年代在法国史坛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泰纳和瑟诺博司。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社会学的奠基者。1830年起陆续出版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实证哲学教程》（六卷），传播实证主义，提倡不可知论，主张以“实证的”事实为依据认识现象世界。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人类精神的、知能的进步，并提出了人类社会进步的三阶段定律，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的依次更替，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是进入了实证阶段的社会。他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和社会现象，旨在得出规律，预见未来，以维护社会秩序，推动社会进步。

伊波利特·泰纳（1828—1893）是法国的哲学家、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孔德实证哲学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对实证主义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他坚持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主张从种族、环境、时机来解释文艺创作、心态发展和历史现象，著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等。在他为探讨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和巴黎公社革命的原因而在1876—1893年印行的《当代法国的起源》（五卷）中，泰纳作为实证主义者，主观臆断地引用资料，百般污蔑和丑化大革命及大革命中群众的形象，成为实证史家中反动学者的代表。

夏尔·瑟诺博司（1854—1942）是法国实证主义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与夏尔·朗格卢瓦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论》（1898）一书中，高度概括了实证主义史学的方法和原则：搜集资料、考订真伪、综合分类、落笔成书。他认为史学家必须持客观态度，准确的叙述通过文献考证所揭示的事实，不必作超出事件叙述范围之外的评述，提倡文献资料第一，让史料说话，拒绝历史为谁服务。

实证史学在当时为很多史家所运用。但是由于实证主义史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史方面，很少注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所以到20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发展，实证史学已不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柏格森主义]20世纪初法国出现了新的哲学热潮，被称为“柏格森热”。

亨利·柏格森（1859—1941）是法国二十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哲学家。早年致力于数学和物理学，后来转向哲学。1878年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在巴黎郊外执教。1889年发表了第一部哲学著作《论意识的直接材料》（英译本为《时间与自由意志》），并获博士学位。1896年出版了第二部代表作《物质与记忆》，1907年第三部代表作《创造进化论》问世。在一次大战前，他的思想在知识界引起很大反响。1914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192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柏格森一生留下众多著作，他的哲学具有以下特征：第一，非理性主义。他强调直觉和本能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凭直觉才能把握实在，洞察自我。他贬低理性的作用。为此，他提出了时间“绵延”的概念。在生活中，人们是用钟表、日历来衡量时间的，这种机械的时间只表示一连串不连贯的时刻，而实际上时间是一种流动，一种连续不断的绵延，它和空间是无关的，无法作定量分析。因此通过概念和推理来认识事物的理性思维只能认识外部联系和静止的东西，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理智是和空间相关连的，只有本能和

直觉才和真正的时间联系在一起。第二，二元论。他认为世界分成两个不相关连的部分，一方面是生命，一方面是物质，世界的真实的实在和本源，既非精神，又非物质。自称他的哲学是无党派，力图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界限，但他最终还是认为“生命的冲动”是世界的中心，它象“强大的火箭束似的迸发出世界来”，从而反映出他的唯心主义面目。第三，强调运动和变化。柏格森的哲学在西方被称为“变的哲学”。但他所指的运动只是生命和意识的流动，和物质是无缘的，他说：“不存在事物，只存在活动。”而且他认为运动就是绵延，反对运动的空间性，否认运动是间断和不间断的对立统一。

柏格森哲学并未形成学派，但其影响却很大，被后来的实用主义、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哲学流派所吸收，同时还对文学、绘画、音乐、政治和宗教产生深远影响。

三、艺术

[印象主义绘画的发展]在印象派方兴未艾之时，内部就逐渐出现两种偏离印象派现实主义的倾向，一种是依据科学原理来取得预期效果的新印象主义，另一种是更强调个性表现力的后期印象主义。

新印象主义以画家修拉和西涅克为代表，他们根据色彩学的某些原理，采用点彩的表现手法，更强烈地表现瞬息即逝的光和色，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点彩派”。这种机械地把科学原理搬到艺术创作上来的方法，伤害了艺术的本身规律，使绘画象机器制造的产品一样千篇一律。这就注定其不会长久，到 90 年代即告消失。

后期印象派，一般是指以塞尚、梵高和高更为代表的画派。他们的艺术更强烈地表现出画家个人的主观感受，加强了线条的表现力，色调的运用更单纯强烈而带装饰性。1886 年才来到巴黎的荷兰画家梵高，善于表现在强烈阳光下的物体（如《向日葵》、《盛开的桃花》等），他常用鲜明的色块和跃动的线条来表达自己激动和狂热的情绪。高更早期受印象派影响，1891 年，离开法国去法国殖民地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他的许多作品是以塔希提岛的风情为题材的。高更的风格是兼用象征和装饰手法，有些画还带有神秘色彩，也有人称之为“象征主义”画家。塞尚原是印象派的成员，善于运用欢快的色彩，但和印象派不同，他注重自然形体的内在结构，表现上更具夸张性和装饰性，这种倾向影响了 20 世纪初的两大艺术运动立体主义和野兽派。

[野兽派和立体派]1905 年，在巴黎一年一度的秋季沙龙中展出了马蒂斯、弗拉曼克、杜飞、德兰等人的画，这些画家的作品放荡不羁，形式自由，有一位批评家就把这些画的展厅称为“野兽之笼”，野兽派因此得名。野兽派盛行时间不长，二、三年后即失去影响。

1907 年，继野兽派之后，出现了立体派艺术。这一年，画家毕加索完成了作品《亚威农的少女》。1908 年，画家布拉克创作了《在艾斯塔克的房子》，被批评家讥讽为用立方体组成的，立体派由此得名。在一次大战以前，是立体派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分析的立体主义”。

[雕刻]19 世纪晚期 20 世纪初法国的雕塑可以称为罗丹时代。

罗丹（1840—1917）出生于巴黎平民家庭，从小喜爱美术，但因生活所迫，曾从事过首饰匠、泥水匠、木匠等工作。1877 年创作了成名作《青铜时代》，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作品通过人物表情和姿态的塑造，刻画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他在雕塑上的主要贡献在于恢复了西方雕刻对人类的理解和对精神世界的表现，被誉为现代的米开朗基罗。他的主要作品有《加莱义民》、《思想者》、《吻》、《巴尔扎克像》等。1900 年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展出了他 150 件雕刻和素描，从而赢得了国际声誉。

这一时期另一重要的雕刻家是马约尔（1861—1944），他曾在罗丹工作室学习过，并当过罗丹的助手，但他并不模仿罗丹的样式。和罗丹富有情感的作品相反，他的作品构图清楚，表现出平静与和谐，力图保持古典希腊的雕刻传统，人物形象大多为成熟的女性。主要作品有《夜》、《地中海》、《站立的浴女》等。

[音乐]这时法国的音乐有了空前发展。在第二帝国时期，法国流行的还是轻歌剧和喜剧音乐，并大多受德国音乐家瓦格纳的影响。普法战争以后，

法国作曲家扭转了盲目崇拜德国音乐的心理。他们继承法国民族音乐的传统,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1875年,比才根据梅里美小说写成了歌剧《卡门》,以他的现实主义风格打动了观众。圣桑在这一时期首创了交响诗,并创作了歌剧《参孙与达丽拉》(1877年)。1886年,他还为小型管弦乐队写了《动物狂欢节》,这是一首诙谐的幻想曲,一直为年青人所喜爱。

当时最杰出的音乐家是德彪西(1862—1918)。他1873年入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早年受瓦格纳影响,在音乐中力求体现象征主义诗人和印象派画家的主张。1894年,他根据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的诗创作了交响诗《牧神午后序曲》。1902年上演的歌剧《佩利亚斯与梅丽桑德》是由象征主义诗人梅特林克作词,由他谱曲的。1905年,他受英国画家特纳和法国画家莫奈构思的启发,创作了交响音画《大海》。这些作品被公认为音乐印象主义的代表作。

第十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

第一节 法国与大战的爆发

一、七月危机和法国参战

[七月危机]1914年6月28日的“萨拉热窝事件”，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把这一刺杀事件作为吞并塞尔维亚的好时机。7月4日，奥皇向德皇威廉二世发出一份私人信，政府也随即发出关于巴尔干政策问题的备忘录，探询德国的态度。德国立即作出反映，表示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开战。

在协约国方面，俄法表示支持塞尔维亚，英国则装出一副“保守中立”的样子。可是，俄国实战准备不足，态度犹豫不定。法国为坚决支持俄国参战，总统普恩加莱和总理维维亚尼于7月20—23日，访问俄国，进行外交活动，全力推动俄国参战。可见，法国统治者是积极主战者，扮演了大战中的主要角色之一。而德国则是大战中的另一个主要角色。7月23日晚，奥匈向塞尔维亚提出条件极其苛刻的最后通牒，限定48小时内答复。7月28日，奥匈在德国的支持下，以没有得到满意答复为借口，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二天，普恩加莱、维维亚尼立即电告俄国，坚决支持俄国采取行动。7月30日，俄国宣布总动员。8月1日下午，德国向俄国宣战。

法国在鼓励俄国同德国作战的同时，一面故作姿态，继续与德国进行外交谈判；一面采取广泛的紧急动员措施：完成五个边境军团的调遣、停止全军休假，确定重要的保卫目标。为迷惑德国和欺骗国际舆论，总理维维亚尼于7月31日命令第一线的部队后撤10公里，以避免接触。这种微妙的后撤手腕，实际上是预谋中的作战计划的一部分。

[饶勒斯被刺]在“七月危机”的严重关头，法国社会党领袖饶勒斯为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奔走呼号，竭尽最后的努力。7月27日，他去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为拯救和平而召开的大会，会上继续为争取世界和平、制止战争大声疾呼。两天后，返回巴黎参加在瓦格拉姆大厅举行的和平会议，再次呼吁保卫和平，避免战争。31日，《人道报》发表了饶勒斯的最后一篇文章《冷静是必要的》。可是，饶勒斯为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正义活动，却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当晚9时40分，他在“新月”餐馆用膳时，被凶手维兰暗杀。饶勒斯被害的消息震动了巴黎全城，愤怒的群众涌向被害的地方，郊外的工人也纷纷赶到市中心，反战怒潮达到顶点。可是，好战的内阁却进一步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加紧战争动员。

[总动员与法国参战]8月1日，法国总统向全体陆海军下令总动员。下午4时，一份预告张贴在各地邮局：“特别紧急——通告。全国总动员令。8月2日，星期日开始正式动员。”这一天，所有教堂、修道院都敲响了大钟，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根据总动员令，军队加紧集结。3日，德国向法国宣战。接着参战国家不断增多，一场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二、“神圣联合”内阁的建立和社会党的立场

[“B名册”]1914年6月上台的维维亚尼内阁，在加强法俄同盟的同时，对内软硬兼施，向反战的人民群众发起进攻。陆军部长墨西制定了一份黑名单，称“B名册”，“名册”中列出3000名社会党、总工会的活动家和积极分子的名字，准备随时予以逮捕。另一方面，内政部长马尔维向内阁提出与社会党、总工会领袖谈判的建议。内阁会议同意了这个建议。7月29—30日，马尔维与总工会头目儒奥等开始进行秘密谈判。饶勒斯的被害激起了群众的公愤，人们要求制止战争，为饶勒斯报仇。可是，社会党领导人却劝告人们保持冷静。政府也利用这一事件，企图实现各个政党的“神圣联合”。当天，内阁通过了不按“B名册”实行逮捕的决议，以便各政党结成联盟，实现总动员。

[社会党的立场]8月1日总动员令发布后，法国的各个党派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者是改良主义的社会党、总工会，都在“保卫祖国”、“保卫法兰西”的幌子下联合起来。8月1日，内政部长马尔维和社会党、总工会领导人就参加政府问题进行正式谈判。8月2日，社会党在巴黎召开秘密会议，讨论战争问题。总书记迪布勒伊认为战争对法国是正义的，他声明：“可悲的命运迫使我们进行防御的战争。”不久前还主张用罢工反对战争的瓦扬，也发表文章，号召社会党人“为了法兰西，为了共和国，为了人类”，应当履行自己战士的职责直到最后。社会党又在巴黎瓦格拉姆大厅召开群众大会，桑巴在大会上号召：你们要为保卫法国文化和人民的自由而战！”龙格也说：“如果明天法国受到侵犯，社会党人怎么能够不带头去保卫革命和民主的法国，1789年百科全书的法国、1848年6月的法国和饶勒斯的法国呢？”总工会头目儒奥也公开表示要在战争中和政府保持一致，号召劳动者为反对德国而战。法国社会党陷入了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

[8月4日的议会]8月4日，总统普恩加莱发出文告，号召人民实现“神圣的联合”。同一天，召开了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维维亚尼宣读了总统致议会的谕文。总统代表全国人民向陆海军战士“表达了法国人民的信任”，表示要“忠诚于盟国，为法国的自由正义而战斗到底！”议会任命维维亚尼为“神圣联合”内阁的总理。他随即发表了鼓动性的讲话：“我向今天信赖祖国的所有法国人致敬。我向手擎保卫我们希望旗帜的法国人致意。成年的男公民们准备着！起来！为我们的命运和法国的永生而斗争”。社会党议员和其他资产阶级党派的议员一起投票，通过了军事拨款，宣布法国处于军事状态，实行书报检查制。并以“神圣联合”内阁已经成立为由，宣布延迟召开议会的期限。

[“神圣联合”内阁的最后形成]8月4日的议会之后，总理维维亚尼并无多大权力，内阁也不健全。真正掌握实权的是由总司令、总参谋长组成的“总司令部”。霞飞（1852—1931）为最高统帅。在他周围有200个军官负责参谋、后勤、铁路运输、部队调动、战役计划等工作，它的作用愈来愈在政府之上，史称“总司令部（GQC）专政”。总理维维亚尼要求扩大权力以指挥战争。8月13日，维维亚尼兼任外长，26日，维维亚尼扩大内阁，吸收了3个前总理（白里安、里博、杜梅尔格）入阁，统一社会党的盖得、桑巴也被吸收入阁，分别任不管部长、公共工程部长。社会党还发表了党员参加政府的宣言，表示：“他们将保证对政府的绝对忠诚，以保持和加强全国的勇

气和争取胜利的意志。”“今天我们满怀信心，不仅要为祖国的生存和法兰西的尊严而战，并且要为共和国的自由和文明而战。”以后，社会党人托马被任命为军事国务秘书。“神圣联合”内阁进一步扩大。

“神圣联合”内阁是资产阶级在战时的“国民联合”内阁，它包括了国内一切主要党派：共和社会党、左翼联合党、联合激进党、共和联合党、左翼激进党、统一社会党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其任务是在“保卫法兰西”的名义下，动员国内一切力量参加大战。它的形成和扩大，从政治上保证了军事行动的实施。

三、大战初期的军事行动和国内的经济状况

[初期的军事行动]8月4日晚，德国向比利时不宣而战。16日，列日陷落。接着，德军第一、第二集团军经比利时、卢森堡直接向法国进攻。21日，德法军队的主力在法比边境发生激战。史称“边境战役”。25日，战斗结束。法军统帅部为集中力量，改变了战略部署，北部各军实行了战略退却。德军向南追击法军，对巴黎造成了直接威胁。9月2日，50万巴黎人和政府一起撤退到波尔多。3日，加利埃尼将军担负了保卫巴黎的使命，他发表宣言，表示“要保卫巴黎直到最后！”

边境战役后，德军孤军南下，直抵马恩河畔。这时，霞飞和英军统帅弗兰奇密商退阵诱敌的战术，再退至马恩河与塞纳河之间地带，伺机反攻。德第一集团军在渡过马恩河后，继续向南追击，结果孤军深入，为法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4日晚，霞飞下令转入进攻。5日，法国第六集团军开始向巴黎东北进发，与德第一集团军发生遭遇战。6日凌晨，法军展开了反攻，以强大的炮火阻止了德军的冲击。7日，德军的三个军向法第六集团军反攻，取得了一些胜利。法军统帅部为加强反攻实力，重组两个军，并急忙用火车、汽车调遣军队。为此，还调用了巴黎的1200辆小汽车，一夜间就把步兵运到50公里远的前方，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小汽车运送兵员。10日，德军司令部下令撤退。法军追击。马恩河战役双方投入兵力达200万，大炮6600门。战役前后持续八天。法英盟军推进了60公里，德军狼狈向北逃跑。马恩河战役是大战的重要转折，它宣告了德军“闪电战”计划的破产，中止了德军战略上的正面进攻。马恩河一战使法军反败为胜，在政治上、心理上起了重大作用。

马恩河战役后，德军退至埃纳河一线，凭借高地，修筑阵地。法、英盟军不断追击。从9月中旬，开始了“向海奔跑”战役。直到10月中旬，双方各有胜负，且战且进至北海沿岸地带，结果将战线延长了170—180公里。

[国内的经济状况]战争的持续与扩大，打破了法国关于短期作战的幻想，暴露了经济实力的不足。大批工人参军入伍，使许多工厂被迫关闭。武器储备远远不够实战需要，战争开始后一个月，就出现了武器供应危机。陆军部每天需要枪弹近10万发，可是，实际只得到12000发。步枪的储备也只能维持到11月。农村几百万青年参军，造成劳动力奇缺，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开战后几个月，北部10个省先后沦为战场或被德军占领，使法国工业，尤其是钢铁、化工、纺织业受到沉重打击，几乎全部铁矿和80%的煤矿都落到德军手里。许多钢铁厂、化工厂、纺织厂也被德军占领。要拆迁或重建工厂又往往遇到资金、原料和交通的种种困难，一时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

财政状况也很困难。庞大的军事费用，使1914年度预算赤字达55亿多法郎。政府只得向法兰西银行贷款，并同意银行发行货币，因此，货币流量不断增加，1914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量达96亿多法郎。1914年8月1日，浮动债务高达16亿多法郎。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甚至连结算兑现也不可能。为此，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宣布钞票停止兑现，暂时渡过了“挤兑”的难关。但大战期间财政状况的恶化仍无法根本改变。

第二节 西线对峙局面下的法国

一、西线对峙局面的出现

[佛兰德战役]利斯河两岸的战斗结束后，德军企图占领加莱海峡沿岸的法国港口，对英国造成严重威胁。10月13日，出现了德军进攻佛兰德地区的态势。可是，法军统帅部在10月18日才获得德军向佛兰德推进的情报。19日，英军总司令弗兰奇下令反攻。法、英、比联军迎战反击。20日，重组的法第八集团军在伊普雷到伊瑟尔河的中央地段与德军展开战斗。22日，德军强渡伊瑟尔河，在左岸设防固守。25日，比军统帅部趁涨潮时打开水闸，让滚滚海水淹没伊瑟尔河左岸低地，迫使德军抛弃阵地。10月30日晨，德军转入进攻，向伊普雷推进。法、英盟军立即增调兵力，封闭德军突破口。11月4日，法、英盟军抵制了德军的新进攻。11月11日，由于气候恶劣，在双方各有胜负的情况下，停止了战斗。持续25天的佛兰德战役宣告结束，西线形成相持局面。

[转入阵地战]佛兰德战役后，双方之间形成了一条长达500多公里稳定的战线，各自坚守阵地，消耗对方实力。西线这种对峙的阵地战局面延续了近4年。

阵地战是防御自己、消耗敌人的战争形式。1914年年底，法北方军指挥官福煦向法军官兵指出：他们已面临“严阵以待的防御阵势”。1915年1月，霞飞又多次指示盟军建立牢固的防御体系。因此，“挖堑壕、筑掩体，成了阵地防御的首要任务。在几个月时期内，挖战壕的铁锹和其它工具几乎成了战士的主要武器。当时的堑壕是两条并列，前面的称为前沿阵地，筑有掩蔽部、避弹所、机枪和火炮发射点，掩体之间由交通壕相连接。堑壕的正面，甚至侧翼都围有铁丝网。在敌人可能打击的主要方向上筑第二阵地。法国士兵身穿天蓝色的服装，头戴钢盔，坚守在工事里，随时准备可能的反击或进攻。

二、战时政府的活动和战争经济的加强

[政府与议会迁回巴黎]1914年末，随着战线的稳定和巴黎危急状态的解除，政府迁回巴黎。12月10日，总统普恩加莱重进爱丽舍宫。12月22日，参、众议会也在巴黎复会，开始正常活动。总理维维亚尼在议会上发表政府宣言，表明了议会、人民和军队结成联盟的决心。1915年5月，在议会、总统的委任下，设立了二个负责陆军部的副国务秘书。10月，白里安（1862—1932）组阁，维维亚尼为副总理。11月3日，白里安向议会宣读内阁声明，宣布“一切为了战争”，他指出：“你们不要等待我们的长篇声明，在战争中，时间就是行动！”号召各党派加强合作和支持。随着议会和政府活动的加强，“总司令部专政”的越权局面受到了抑制。

[战争经济的加强]战争经济是国民经济军事化在战时的继续和发展。为适应战争需要，“神圣联合”内阁全力组织战争经济，不断增加军事拨款，扩大军事生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于1914年9月开始发行国防息票，至12月底，认购达16.19亿法郎。1915年2月，又发行国防公债，在3个月内就认购了30亿法郎。10月，发行战争公债。1916年10月，发行第二期国防公债，认购总数达100.82亿。与此同时，不断提高税率，增加捐税，1915年的国家税收为41.13亿法郎，1916年达62.5亿法郎。为保证军工生产的优先发展，政府对工农业生产和一切贸易活动进行直接干预，新建了一些军工厂，大量进口新的机器设备，在一些造船厂和雷诺汽车厂进行“劳动测试”，推行“泰罗制”，提高生产效率。1915年春，社会党人托马为军火制造工业的国务秘书，组织军工生产，调解劳资纠纷，鼓动工人为战争加紧生产。这时，法国已有25,000个大小工厂为战争服务，从1914年8月开始的半年中，步枪生产增长了30倍，75mm大炮增加了10倍，炮弹增加了13倍。军工厂实行军事制度，工人处于军事状态之下，劳动时间长达10—12小时。垄断资本家乘机大发战争财，从军事定货中获取高额利润。战争经济的建立和加强，不仅使法国很快克服了军火供应的危机，保证了战争的需要，而且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1915年的外交活动]在战争对峙的局面下，双方为获得新的盟友，都加强了外交活动，1915年初，为争取意大利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大战爆发后，意大利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在两大集团间进行秘密交易，以便在适当时候转向胜利者一方，巩固它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地位。3月4日，意大利与法、英代表开始谈判。4月26日，签订了伦敦条约，意大利参加协约国。根据条约，意大利在战后将获得特兰提诺、的里雅斯特和其他一些有意大利人居住的奥地利土地，还将有权管辖阿尔巴尼亚和统治150万南斯拉夫人，等等。意大利承诺在一个月后参加协约国方面作战。5月23日，意大利宣布对奥匈作战。意大利的参战，削弱了德国集团的地位，出现了一条反对奥匈的新战线。

1915年3月，英、法盟军企图入侵君士坦丁堡，打击德国的盟国土耳其。可是，3月18日，英、法海军对达达尼尔海峡的远征遭到了失败。之后，协约国与同盟国都竭力争取中立的巴尔干诸国站在自己一边参战。1915年夏，法国与英、俄一起，与保加利亚谈判。而德国却抢先一步，许诺给保以更多的领土。于是，保加利亚就站在德国一边。罗马尼亚在与俄国讨价还价的谈

判中，法、英力劝俄国同意罗马尼亚的要求。法国在凡尔登的胜利，加强了同罗马尼亚谈判的影响。1916年8月，罗马尼亚终于和协约国签订盟约，宣布对奥匈作战。法国争取盟国的外交活动，对于削弱德国同盟的势力，加强西线与东线的配合，坚持长期的阵地战，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三、西线的消耗战与“少数派”运动的兴起

[凡尔登战役]从1915年到1916年是大战的第二阶段，东线是主要战线。法英盟军为了配合和支援东线俄国的进攻，于1915年春季，在香巴尼、阿杜瓦、伊普雷等地区，连续发动三次攻势，企图突破德军防御阵地，把他们从西线的东部赶出。可是，德军防线巩固，不易攻取。在春季攻势中，法军死伤25万多，却毫无进展。秋季，英法盟军又展开了新攻势，企图突破德军阵地。双方使用了化学武器和燃烧炮弹。从11月开始，西线又告沉寂，双方仍凭阵对峙。

1916年初，德军在东线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之后，又把攻势移向西线，集中兵力，打败英法的联合攻势。德军把主攻方向选择在凡尔登。凡尔登是法国北部边境的著名要塞，是法军右翼防御体系的枢纽。从1月开始，德军就作了周密准备，部署了10个师27万兵力，1000门大炮。德国皇太子也亲率精锐部队来到战地。为迷惑法军，德军故意在整个西线佯装进攻，以掩饰对凡尔登的重点攻击。

法军统帅部却因忙于制定索姆河反攻计划，对德军的战略意图不予重视。只是到2月中旬才得知德军进攻的情报，加强了凡尔登要塞的兵力。可是，直到2月21日，霞飞还是认为德军新的进攻地段在香巴尼，凡尔登仅仅只是第二位意义的打击地区。统帅部分析的错误，使法军处于被动局面。

2月21日8时12分，德军以1500门大炮、迫击炮的强大火力，猛轰勃兰本、奥尔纳与凡尔登狭窄的三角地带。16时44分，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德步兵6个师向马斯河东岸前沿阵地发起冲锋。霞飞命令法军不惜一切代价死守阵地。双方展开了白刃战，法军拼死抵抗，德军进展缓慢。25日，德军经过多次血战，攻占了杜莫炮台。法军的阵线被切断，与后方交通断绝，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法国采取紧急措施，急忙增派援军，并委派贝当为凡尔登地区的司令官。贝当于25日夜赶到凡尔登，一面要求士兵顶住德军进攻，一面立即组织人力抢修公路。他组建了一支9000人的运输队，调集了3900辆汽车，在一星期内赶运了援军19万人和军需品5万吨。有人估计：在巴勒杜克到凡尔登的75公里的小公路上，每24小时通过的汽车达6000辆，平均14秒钟通过一辆，最快时5秒钟通过一辆。因此，这条路被誉称“神圣之路”。从3月到6月，德军连续发动进攻，法军猛烈反击，双方展开消耗战，伤亡惨重。6月底7月初，由于俄军在东线进攻和索姆河战役的发动，德军的攻势被迫减弱。8月，凡尔登战役的主动权转到法军一边。10—12月，法军给马斯河右岸德军以两次有力的最后攻击，收复了一些炮台和大部分失地。12月18日，凡尔登战役结束。凡尔登战役持续了10个月，双方伤亡达100万，是历史上少有的消耗战。凡尔登战役是西线中期的决定性战役，也是大战的转折点，它使德国一举歼灭法军主力、迫使法国投降的战略计划再次破产，使德国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索姆河战役]协约国经过5个多月的准备，终于在7月1日发动索姆河战役。1日清晨，英、法军在航空兵掩护和强大的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打得德军措手不及，以至在英、法步兵到达德军工事时，德军士兵还来不及从掩蔽部爬出来。但是，在索姆河以北和以南地段，由于英法盟军战术上的失误，以及配合不够，被德军击退。到7月9日，最初占领的一些阵地又被迫放弃。之后，德军增援兵力，拚力还击。到17日，英、法盟军只楔入德军防

御数公里，突破没有成功。7月底8月初，英、法军队继续发展索姆河战役，但没有获得多大战果。9月15日，英军又在索姆河北岸发动强大攻势，第一次使用了坦克，给德军以很大威胁。德国步兵丢弃阵地，有的逃跑，有的躲进掩体，或被俘投降。9月战斗，英、法盟军虽有进展，但仍未突破德军防线和转入运动战。10月，英、法盟军发动有限攻击，给德军以极大的消耗。直到11月18日，由于双方物资耗尽和气候转坏，索姆河战役才告停止。索姆河战役是大战中最大战役之一，是1916年协同战略总计划的组成部分。在持续四个月的战斗中，英法盟军摧毁德军的抵抗，德军损失惨重，以致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战斗力，成为一年后溃败的先兆。

[“少数派”运动的兴起]战争的延续，给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人民生活日益困苦。于是，人民的厌战和不满情绪开始滋长，反战的“少数派”运动应运而生。

1915年5月，上维埃纳省的社会党地方组织通过决议，谴责社会党领导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宣传。里昂、巴黎等地方的社会党联盟支持上维埃纳联盟的立场。在阿利埃省，社会党地方组织也开始了对“神圣联合”内阁的批评。

“少数派”在工会有较大的影响。罗纳省工会联合会驻总工会的代表莫纳特为表示自己的反战立场，公开宣布退出总工会。梅尔黑姆、布尔德朗联合在《工人之声》报周围，进行反战宣传活动。

“少数派”在国内进行反战活动的同时，还加强了与国际上革命“少数派”的联系。1915年9月5—8日，梅尔黑姆、布尔德朗参加了在齐美瓦尔德召开的各国社会党“少数派”代表会议。法国代表虽然跟随会议中的中派，拒绝号召革命和建立第三国际。但是，他们同德国代表共同签订了法德宣言，要求实现不割地、不赔款和以民族自决为基础的和平。在会上，他们认识了列宁。回国后与列宁和在法国的托洛茨基等人保持了经常联系。1916年4月24—30日，国际“少数派”召开昆塔尔会议。法国政府不发给梅尔黑姆去瑞士的护照。于是，亚历山大·布朗、布里藏、腊凡杜让3人以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议员身份参加了昆塔尔会议。这些人充满和平主义思想，并继续为“民族自卫战争”辩护。不过他们拒绝投票通过政府的新军事预算。

除了齐美瓦尔德派之外，在巴黎还出现了其他“少数派”，他们联合在龙格、赖伐尔周围，批评社会党领导的多数派。1916年12月31日，在巴黎召开了社会党代表大会，以列诺代尔、盖得、列巴为首的多数派与以龙格、洛里奥为首的“少数派”展开了激烈斗争。不久，以龙格、保罗、富尔为首组织了“中派”，梅尔黑姆、布尔德朗因赞同威尔逊和平主义而被开除出“少数派”，从此他们公开转入中派，要求通过和平协商以结束战争。

第三节 1917 年危机与大战的结束

一、1917 年的危机

[战时经济的潜在危机]国民经济的军事化，造成了经济的畸形发展。在军事工业高度发展的同时，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如轻纺工业每况愈下，棉毛织业生产规模缩小，棉花的消费量从 1913 年的 27 万吨减少到 1918 年的 14 万吨。毛织业生产下降了 37%。亚麻生产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57.7 万多枚纺锭中，实际生产的只有 3.6 万多枚。农业的状况更为困难，有 350 万男劳力（占农民总数的 45%）被动员入伍，劳力严重不足，只能由妇女、少年、老年顶替。由于战场的扩大和东北 10 省被德军占领，1913—1918 年播种面积减少了近一半。农产品收获量大为下降，如小麦的收获量 1913 年为 8800 万公担，1914 年为 7700 万公担，1915 年为 6000 万公担，1916 年则为 5800 万公担。畜牧业同样困难重重，畜牧头数不断减少。由于农产品严重不足，供不应求，因此，1917 年实行面包、食糖凭卡配给制。接着，又实行了“供应日”制。规定一周内二天供应肉类。

为应付与日俱增的军事开支，政府不断向法兰西银行透支，银行则大量发行货币，1915 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通额为 130.08 亿法郎，1916 年第四季度为 164.21 亿法郎，1917 年第四季度为 222.12 亿法郎。物价也随之高涨，1914 年第四季度的物价指数为 100，1915 年上升为 184.3，1916 年为 190.7，1917 年高达 283.0。国家内外债务俱增，1915 年内债总额 497 亿，浮动债务 170 亿，1917 年则分别提高到 984 亿和 380 亿。国家财政困难，赤字由 1914 年的 55 亿多法郎增加到 1916 年的 229 亿、1917 年的 284 亿法郎。只是由于战争经济的实施，在国家的直接干预下，经济危机才处于潜在状态，延至到战后才爆发。

[内阁危机的加深]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加深，这是政治危机的表现之一。1916 年 1 月 29 日晚，德国第一次派“齐普林”飞船空袭巴黎。2 月 7 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就空袭事件指责负责航空的副国务秘书勒内·贝纳尔监视不力。第二天，贝纳尔宣告辞职。陆军部长也因此受到议会中社会党议员的质询。议会与政府、统帅部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议会要求有权监督全国军队。可是总理白里安却坚决反对。内阁中的反对派起而攻之，白里安内阁出现信任危机。1916 年 12 月 13 日，白里安改组内阁，在 23 个部长中留任了 10 个，总司令霞飞也以指挥凡尔登战役失误而撤职，代之以尼韦尔。不久，白里安内阁纷争加剧，1917 年 3 月 17 日，白里安辞职。9 月 13 日，潘勒韦上台组阁，社会党人拒绝参加，“神圣联合”开始破裂。但潘勒韦内阁只维持两个月，11 月 13 日，就被议会所推翻，这是战争以来第一次议会推翻内阁的举动。在不到一年时间内连续更换三个总理，反映了政局的严重动荡。

为摆脱面临的经济与政治危机，尽快结束战争。1917 年 1—2 月，协约国军队代表会议决定各条战线在 4 月 1 日至 5 月 1 日间展开全面攻势。法军新任总司令尼韦尔还提出了进攻计划的指示要点。4 月初，德军已撤往工事坚固的齐格菲防线，协约国军改变战役计划，由法军向伊尔松方向实施主要突击，英军实施辅助突击，攻击齐格菲防线。4 月 9 日，英军首起进攻，

未获重大战果。4月16日，法第五、第六集团军发起攻击，遭到德军的拦阻射击，伤亡惨重。为攻击德军的第三防御地带，法军出动了128辆坦克，分二队冒险向德军阵地推进，在德军的猛烈炮击下，极大部分被摧毁，只有10辆坦克逃回法军阵地。在十几天的进攻战中，法军死亡4万人，伤18万人，有人讥讽这次进攻是“尼韦尔的屠场”。5月16日，尼韦尔被撤职，由贝当任法军总司令。尼韦尔进攻的失败，受到议会的指责，引起法军士兵的愤慨。使法国政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反战运动的掀起]战争的持续，前后方人民状况的恶化，以及俄国二月革命对法国的影响，加强了群众性的反战革命运动。战时一度平息的罢工浪潮又迅猛展开。1917年发动了696次罢工，参加人数达293,810人，其中塞纳一个省就有104,587人，而1916年仅罢工314次，参加人数4.1万人。5月1日，巴黎冶金工人再次发动罢工，举行了1914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五一游行。6月2日，巴黎罢工工人上街游行，与警察和殖民军发生冲突。军工厂罢工工人提出了“打倒战争”、“把工厂主送到前线去！把士兵送回家！”的响亮口号。罢工运动席卷巴黎、里昂、卢昂、圣太田、南特、吐鲁兹等城市。可是，由于总工会改良主义者的活动，使罢工运动遭致了失败。

在前线，发生了士兵的反战骚动。5月4日，有的地区，整个连士兵拒绝执行进攻的命令，他们说，再也不愿为每天的五个苏（sou，相当于1/20法郎）而去送命。在克弗来，士兵高举红旗，唱着《国际歌》，进行反战示威。6月29日，驻桑松的二个团决定向巴黎进军，抗议议会秘密会议关于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定。5—6月间，共有3—4万的士兵投入了拒绝执行命令的集体行动。士兵骚动的扩大，吓坏了法国统帅部。6月7日，贝当宣布对不执行命令的士兵恢复死刑。尽管如此，士兵的拒战运动还在继续扩大，席卷了75个步兵团、12个炮兵团和23个狙击营。反战运动一直延续到9月。

几乎与此同时，社会党“少数派”的反战活动进一步展开。“多数派”也主张签订不割地的全面和约。社会党人为表示对战时政府的不满和反对，拒绝参加刚成立的潘勒韦内阁，“神圣联合”内阁出现了严重危机。

二、克雷孟梭内阁的建立及其活动

[克雷孟梭内阁的建立]克雷孟梭（1841—1929）是现代法国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之一。在里博内阁和潘勒韦内阁危机深重之时，克雷孟梭利用各种丑闻和叛卖事件攻击政敌。他指控内政部长马尔维为“内奸”。8月底，马尔维被迫辞职。前总统卡约也被指控为“内奸”，说他与中立的或敌对的一方进行“和平谈判”。潘勒韦内阁威信扫地，困难重重，几度向总统普恩加莱提出辞职。面对深刻的政治危机，法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建立公开的军事专政。1917年11月16日，总统普恩加莱叫激进党领袖、“老虎”克雷孟梭组阁。克雷孟梭任总理兼陆军部长，内阁由14个部长和9个副国务秘书组成，其中激进党人就占9个部长职位。

[军事专政的加强]克雷孟梭一上台，就狂热煽动沙文主义，鼓吹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他在11月20日的内阁声明中表示：“我对你们说，我要进行战争！”

克雷孟梭设置了“政府特派员”的新行政机构，专门担负加强战争经济的使命，并力争美国的经济援助，以缓和国内危机。在军事上，加强同协约国的联合，一面参与反对苏俄的军事干涉，一面积极准备对德军的反攻，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克雷孟梭采用各种手腕打击政敌，以稳定统治。12月，他向最高法院起诉，指控前总统卡约与“失败主义者”勾结。1918年1月中，卡约被捕。原内政部长马尔维也以“与敌人同谋”的罪名被判驱逐出法国5年。与此同时，还用恐怖手段镇压了国内掀起的反战运动和工农群众的斗争。

[十月革命在法国的反响]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签署了“和平法令”，向各国政府建议立即就公正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可是，法国克雷孟梭内阁坚决拒绝。12月6日，克雷孟梭向巴黎各报通报情况，对苏俄造谣中伤，胡说德国用7,000万卢布收买了列宁与托洛茨基，诬蔑俄国“背叛了盟国”。12月27日，议会就俄国问题展开辩论。社会党议员向外交部长皮雄提出质问，指责协约国的秘密条约。原社会党人部长桑巴指出：“我们为不知道俄国而感到遗憾。俄国喜欢法国，敌视德国”。皮雄百般攻击苏俄，宣布“决不允许与俄国新政府保持关系”。议会还以378票对103票的多数，否定了社会党议员关于公开秘密条约的提案。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法国人民中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反战斗争的发展。列宁的和平号召，首先得到前线法国士兵的响应，他们拒绝参战，与苏俄军队联欢。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支持列宁领导的苏维埃共和国。作家巴比塞和诗人、工会活动家瓦扬—古久里一起创办了《光明》杂志，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十月革命思想。1918年，《人道报》改组，加香为社长。《人道报》开始刊登一些知识分子反对战争、同情苏俄的声明。

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法国工人积极投入反战斗争。1917年12月，鲁尔矿区的冶金工人，由于工会书记安德烈被捕送往前线，举行了抗议罢工。电力、军工、矿山及其他企业的工人也参加了罢工。驻鲁尔区的军队拒绝开赴前线，支持工人斗争。1918年1月到3月，鲁尔区工人举行多次集会，要求立即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公开战争目的，抗议政治迫害。克雷孟梭被迫释放了安德烈。1918年5月1日，巴黎工人准备总罢工，由于社会党和工会改良主义者的破坏，遭到了政府的禁止。但是，5月1日那天，巴

黎、马赛、里昂、卢昂、圣康坦等地工人还是停止了工作。5月中旬，巴黎军工厂工人罢工，要求立即签订和约，反对政府的战争政策，前去镇压的士兵也转到工人一边，高呼“打倒战争”的口号，政府被迫召回军队。工人们争取和平的斗争，虽然还缺乏组织性，且先后遭到失败，但它却是革命高潮的前锋，并直接影响着战争的结局。

三、西线的总反攻和大战的结束

[第二次马恩河战役]1918年初，苏俄退出战争，德军乘机从东线调兵加强西线，想在美军到达以前发动攻势，在夏季结束战争。从1918年3月21日到7月15日，德军相继发动了4次大规模的攻势。英、法盟军在飞机、坦克配合下，一再给德军以有力反击，终于阻止了德军的迅猛攻势。德军春、夏季的连续进攻，使它损兵折将，死伤、被俘和失踪的人数达100万。而德国的后备兵力、物力已经枯竭，难以继续支持战争。

协约国军在对德军攻势的反突击中，加强了协调行动。3月26日和4月3日，先后召开了两次重要军事会议，任命福煦（1851—1929）为盟军总司令。美军也络绎而来，7月，西线美军已超过了100万人。7月15日早上，德军强渡马恩河。晚上，德军到达马恩河左岸的法军抵抗阵地。法军以强大的炮火阻止德军的攻势。18日清晨4时35分，法军炮兵向正面的德军阵地发起猛烈炮击。之后，法各集团军在500辆坦克、3000门大炮和850架飞机的支援配合下，向马恩河德军阵地发起强大攻势。德军且战且退，直退至埃纳河和韦勒河。8月4日，法军停止了在马恩河的反攻。这就是著名的第二次马恩河战役。通过这次战役，德军后退40公里，损失官兵6万人，受到沉重打击，而协约国军则夺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福煦因指挥有功，被晋升为法国元帅。

[盟军总反攻]第二次马恩河战役后，法、英盟军为消除德军对亚眠和巴黎—亚眠铁路的威胁，击退索姆河和阿夫勒河间的德军，从8月8日开始，对蒙特第迪以北全线发动攻击，给德军以重大杀伤。21日，德军整个防线被突破。于是，鲁登道夫决定向齐格菲防线撤退。9月初，英、法军分别推进战线。9月12日，美军经过四小时的炮火射击，在坦克部队声援下向圣米那尔发动进攻，德军已无力抵抗。9月26日早晨5时30分，法、美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首起进攻絮维普河与马斯河一线德军阵地。这标志着协约国军总反攻的开始。27日起，英、美、法、比各路协约国军按计划发动总攻。10月8日，英军突破兴登堡防线。10月14日，协约国军从海边至马斯河正面展开全线进攻，给德军以毁灭性打击。德军后撤到第二防线体系固守顽抗。协约国军继续推进，相继突破德军阵地。11月初，德军退守安特卫普—马斯阵地。此时德军的惨败已成定局。

[贡比涅停战]德国在军事上迅速崩溃的同时，国内政局也急剧恶化。10月3日，新成立的巴登亲王内阁向美国请求停战。10月26日，德皇威廉二世撤去鲁登道夫之职，以取得协约国谅解。德国的盟国已土崩瓦解，后院又燃起革命烈火，11月3日，基尔港的士兵起义，十一月革命全面展开。德国统治集团为对付国内革命，迫切要求停战。并成立了以外交大臣埃尔茨贝格尔为首的停战委员会。11月8日晨，德国代表团到达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德车站，在福煦的车厢里进行谈判。福煦向德国代表提出了停战条件：停止军事行动，德军在15天内撤出阿尔萨斯—洛林，立即释放全部战俘，向协约国交出大炮5,000门、机枪25,000挺、迫击炮3,000门等，并允许他们在72小时内有权同自己政府商量。他声明如果在11月11日11时前还不签订停战条约，那末，就立即恢复战争。11日晨5时，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11时，实行全线停火。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最终胜利而结束。

四、大战结束时的法国

[大战对法国经济的破坏]法国是大战的战胜国。可是，战争使法国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

战争期间，死亡的官兵达 131.5 万人，占被动员人数的 16.5%，占 18—27 岁男人的 27%。伤 280 万人，其中，60 万人变成了残废。战争使法国在物质上、财政上受到了严重损害。约 7% 的国土和大部分工业和富庶地区遭到德军占领和蹂躏。222132 所工厂、公共建筑物或住宅被毁坏，342,000 所受到部分破坏。3259564 公顷土地变为废墟或荒地。战争破坏了牧畜业，到 1918 年底，马减少了 100 万头，牛减少了 250 万头，绵羊 700 万只，猪 300 万只。6000 公里铁路和 5.2 万公里公路被毁坏，商船沉没了一大半。煤的生产量由战前的 4084.4 万吨下降到 2625.9 万吨，钢由 468.7 万吨下降到 180 万吨，谷物产量由 1.74 亿担下降到 1.06 亿担，草料由 9.59 亿担下降到 5.6 亿担。据财政部统计，法国遭受的物质损失总数达 1340 亿法郎。法国宗主国的总财产由 1914 年初 3020 亿金法郎减少到 1918 年的 2270 亿金法郎，即缩减了 25%。战争结束时，法国欠美国的债务达 39.91 亿美元，欠英国 30.3 亿美元。法国从债权国沦为债务国。战争给法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法国与巴黎和会] 1919 年 1 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了分赃会议。法国在和会上扮演了主角。1 月 18 日下午 3 时，普恩加莱总统在外交部大厅宣告和会开幕。法国代表团除总理克雷孟梭外，还有外交部长皮雄、财政部长克洛茨、议员达迪厄、大使康邦。福煦作为盟军司令参加了会议。克雷孟梭当选为和会主席。“俄罗斯问题”是和会的主要内容之一。克雷孟梭要求协约国提供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确保俄国白卫军的胜利，并提出建立一道从巴尔干到北海的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军事障碍”。法国借口“安全问题”，决意严厉制裁德国，它不仅要求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且要求取得盛产煤矿的萨尔区；要求莱茵河作为法国东方边界，在莱茵河左岸建立同德国分离的莱茵共和国；索取巨额的战争赔款，据财长提出，总数达 2090 亿金法郎。法国力图彻底削弱德国，重建在欧陆的霸权。英、美代表为维护自己利益，反对法国过于苛刻的要求，相互争吵不休，美国总统威尔逊甚至命令军舰载他回国，以示威胁。法国不得不作某些让步。6 月 28 日，在凡尔赛明镜厅，即德国在 1871 年宣布帝国的地方，签订了凡尔赛和约，这是法国资产阶级民族复仇主义的一个表现。

凡尔赛和约的签订，尽管未能满足法国的一切要求，但对抑制和削弱德国、建立法国的欧陆霸业还是有利的。根据和约规定：法国收复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萨尔区由国联代管 15 年，但煤矿转交法国作为补偿；莱茵河左岸由协约国占领 5—15 年，右岸 50 公里地带宣布为非军事区；德国承担赔偿责任，在赔款委员会确定赔款总数之前，于 1921 年 5 月 1 日前先交付 200 亿金马克，法应占一半；法国“托管”德国的殖民地喀麦隆、多哥，“托管”土耳其的殖民地叙利亚、黎巴嫩。10 月 2 日，法众议院以 372 票对 53 票，通过和约。12 日，参议院一致通过和约。《凡尔赛和约》“不过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它的签订并没有消除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和斗争。“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

第十三章 20 世纪 20 年代的法国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法国

一、1919 年的议会选举和“国民联盟”执政

[1919 年的议会选举]1919 年 11 月，法国举行战后第一次议会选举。7 月 12 日，发布关于选举改革的法令，规定众议院议员按比例代表制的名单投票选举，每个省按 7.5 万名法籍居民选出 1 名议员，凡超过 3.75 万名居民的，有权增选议员 1 名；每个区域的候选人名单，由得到法律手续认可的候选人集团提出，并在报上公布，但必须有该区域 100 个选民的签名支持才有效。这一改革有利于右翼政党取得议会中的多数。11 月 16—30 日，展开了议会的选举活动。共和联盟与共和民主同盟等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政党组成“国民联盟”，提出竞选纲领，把“反对布尔什维克和社会无秩序”、“保卫文明”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它还向人民许诺：保卫共和制、维护社会与宗教的和平、国家与学校的世俗化、恢复被解放的地区、优抚复员军人、严格实现凡尔赛条约等等。企业主为大资产阶级竞选拨出巨款公开表示支持。大多数报纸也为“国民联盟”的候选人摇旗呐喊。一切右派组织都站在“国民联盟”一边，甚至连激进党领导人也附和它们。唯有社会党反对“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号召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保卫八小时工作制、保卫工会权利、实现运输业、银行业和冶金工厂的国有化、实行义务教育和普遍裁军等。由于选举法的改革，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以及种种骗人口号的迷惑，“国民联盟”在选举中获胜。

[“天蓝色议会”] 11 月的议会选举使“国民联盟”取得绝对优势，在 613 名议员中，“国民联盟”占 437 名，即占议员席位的 2/3 以上。左派在选举中遭到严重削弱。统一社会党的议席由 1914 年的 101 席减为 72 席，激进党的议席由 1914 年的 288 席减为 138 席。从议员的出身地位看，贵族占 10%、上层资产阶级占 30%、中等资产阶级占 35%、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占 25%。

12 月 8 日，新选出的议会正式开始活动，波旁宫周围挤满了人群，议会大厅水泄不通。会上，右派议员在“民族主义”旗号下，联合一切保守派、教权派反对社会主义，攻击新生的苏俄。12 月 23 日，总理克雷孟梭在议会发表外交声明，公然提出：“只要俄国在无政府统治之下，欧洲就没有和平的保证。我们首先应执行我称为铁丝网包围的政策”，“在布尔什维克国家周围布置铁丝网系统，以阻止他们涌向文明的欧洲”。右翼议员以“老战士”居多数，每逢议会开会，他们都身着天蓝色军装以显耀自己的身份。因此，史册上就把 11 月产生的右倾议会称为“天蓝色议会”。1920 年 1 月 11 日，举行参议院选举。1 月 17 日，选举德夏内尔（1856—1922）为总统。

[米勒兰的“国民联盟”内阁]1920 年 1 月 18 日，克雷孟梭受到众议院议长白里安的攻击而下台。20 日，米勒兰组成第一届“国民联盟”内阁。9 月 21 日，德夏内尔因病辞职。24 日，米勒兰当选为总统。他自称“无党派”，实际上却倾向右派。米勒兰在政府宣言中保证实现《凡尔赛和约》，支持复员军人和残废军人、同通货膨胀作斗争。米勒兰对内实行反人民的政策，加

强对工人和工会运动的进攻。1920年5月铁路工人总罢工。政府宣布“总动员”，逮捕工会领导人，解雇了2万多参加罢工的铁路工人。还禁止国家职员参加工会和罢工。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企业主拒绝同工会签订集体协议，拒绝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在对外政策上，米勒兰继续推行克雷孟梭的反苏抑德政策。法国以凡尔赛体系的“主要维持者”自居，反对修改条约的任何企图，叫嚷要用德国赔款重建国家。反苏是米勒兰政府外交活动的主要方面，他给弗兰格尔、波兰白卫政府提供武器，派以魏刚为首的军事使团去波兰，帮助他们进攻苏俄。第三次武装干涉被粉碎后，法国仍允许一切白卫组织在法的反革命活动。法国竭力拉拢和控制东、中欧诸国，1921年2月，同波兰签订了协定。同时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军事支持，并于1920—21年组成“小协约国”，成为法国反对苏俄、争霸欧陆的工具。1920年11月，米勒兰政府为迎合教权派，与梵蒂冈重建外交关系。

二、战后革命运动的高涨与法国共产党的建立

[工农运动的发展]从1918年下半年起，由于法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由于东欧、中欧革命运动的影响，法国的革命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工人运动明显的政治性和战斗性，是革命高涨的主要标志。1919年5月1日，举行了战后第一次“五·一”节大游行，全国有300万人参加，仅在巴黎就有50万人，他们高举红旗，高唱《国际歌》，英勇地走上街头。政府宣布巴黎为“戒严状态”，调动军队镇压。可是，士兵拒不执行命令，有的同示威者联欢。警察和骑兵被成千上万的群众赶散，狼狈地躲在林荫道边。1920年，罢工运动达到高峰。1—2月，波尔多码头工人首先罢工，拒绝为干涉军装运炮弹。2月26日，全国70万铁路工人宣布总罢工，切断通往巴黎的铁路。5月1日，不顾政府的恐吓和禁令，又有25万铁路工人罢工。接着，码头工人、海员、运输工人、冶金工人、煤气工人都举行了支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总计达150万人，仅巴黎一地，就有75%的工人罢工，交通陷于瘫痪。由于铁路、海员、码头工人的罢工，供应干涉军的枪枝弹药无法运输，只得搁置在车站、码头。法国工人以自己的行动，支援了苏俄人民的斗争。罢工一直持续到5月28日，才被政府镇压。在战后的革命运动高潮中，法国其他各阶层人民也都参加了斗争。广大农民十分关心苏俄的《和平法令》和《土地纲领》，要求用“俄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反对侵略苏俄的战争。1920年3月初，在里摩日举行了全国农业工人代表大会，向苏俄和德国革命致敬。与此同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也发表文章，举行集会和示威，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在作家巴比塞领导下，成立了“苏维埃”小组，广泛开展保卫苏俄的宣传鼓动。以法朗士为首的71位著名科学家、文学家在《人道报》发表声明，反对干涉苏俄。

[黑海水兵起义]水兵起义是这个阶段革命高涨的又一重要标志。法国干涉苏俄的反革命行动，引起了士兵的反抗。1919年2月2日，驻在比萨拉比亚的第58步兵团首先奋起，拒绝指挥部进攻的命令，他们宣布“我们不再上前线”，要求“返回祖国”，纷纷离开阵地。第58团的拒战骚动得到了其他军团的响应，第72步兵团、第11步兵团、第82步兵团、第156师等部分士兵也集体拒战，要求返回祖国。

1919年3月初，军事当局在敖得萨枪杀了法国女共产主义者让娜·拉布勃（1879—1919），激起了士兵的公愤，军队中的革命运动由拒战转变为公开的起义。4月5日，驻在敖得萨的第72步兵团士兵起义，与那里的工人、红军战士联欢。他们高喊“布尔什维克万岁！”“打倒战争！”的口号，赶走军官，离开城市，把武器交给俄国工人。指挥部被迫放弃敖得萨。

海军中的革命情绪也迅速加强，停泊在敖得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许多军舰成立了水兵委员会，在士兵中进行反战的宣传鼓动。4月14日，“普罗太”号军舰组织了水兵委员会，轮机军官安德烈·马尔梯动员水兵发动起义，准备投奔苏维埃俄国。但他不幸被捕。愤怒的水兵立即扩大“兵变”。4月16日，黑海舰队指挥部命令炮轰塞瓦斯托波尔的红军驻地和居民，水兵愤怒抗议，公开发动起义。主力舰“法兰西”号水兵选出代表向指挥部提出要求，立即停止反苏干涉，返回法国。4月17日，驻在那里的海军起义浪潮不断高涨，水兵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被捕。4月20日，旗舰“约翰·巴尔”号和主力舰“法兰西”号水兵起义。他们在舰首升起红旗，高呼“回到土伦去！”“打

倒战争！”士兵们还与其它舰只建立联系。上岸的水兵第一次参加了塞瓦斯托波尔劳动人民的示威，举行联欢。当俄国汽艇“克松”号驶过时，分舰队的水兵就唱《国际歌》和苏维埃歌曲，向红军致敬。4月27日，驻敖得塞的旗舰“卢梭”号起义，要求立即返回法国。5月1日，全体法国黑海分舰队水兵全部撤离黑海。在黑海水兵起义推动下，驻在其他港口的水兵也开始骚动。在二个多月内，起义席卷了40支军队，24艘军舰。法国政府被迫从苏俄撤军，放弃了直接的公开的武装干涉。

战后法国革命运动的发展，是战后国际革命运动高涨的组成部分，它有力地支援了苏俄人民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加速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左派的成长，促进了共产党的成立。

[社会党分化的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反战革命运动的高涨和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法国社会党开始分化为左、中、右三派：右派以列诺得尔、托马、桑巴为代表，是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派；中派以龙格、普雷斯曼、梅尔黑姆和保尔—富尔为代表，鼓吹社会和平主义；左派即“革命少数派”，以洛利欧、加香、弗罗萨尔为代表，主张与资产阶级坚决斗争，与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他们是第二国际的少数派，曾在齐美尔瓦尔德会上成立了法国“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可是，不久洛利欧等少数派与龙格派妥协。结果在1918年10月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龙格派取得了领导权，弗罗萨尔为总书记。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后，法国社会党内的三派，环绕着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展开激烈论战。左派主张退出第二国际，加入共产国际。法国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代表亨利·吉尔波在共产国际宣言上签了字。5月8日，“重建国际关系委员会”改组为“争取参加第三国际委员会”，创办了《共产主义公报》。右派主张继续留在第二国际，坚决反对加入共产国际，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他们参加了1919年2月成立的“伯尔尼国际”。中派站在中间立场，既反对第二国际的活动，也不参加共产国际，主张以第二国际为基础，重建一个“国际”。1920年2月25日到29日，召开了社会党的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展开论战。中派的主张取得胜利。大会决定派出加香、弗罗萨尔组成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考察，以便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6月13日到7月底，以加香为首的代表团在莫斯科等地进行广泛深入的访问，应邀参加了共产国际“二大”，得到了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他们二人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同意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并打电报给《人道报》说：“依我们看来，参加第三国际势在必行。”

[图尔代表大会与法共的建立]加香回国后，立即周游全国各地，为加入共产国际、支持苏俄展开广泛的宣传鼓动。社会党的各省总支部，大多数拥护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条》。

1920年12月25日，图尔代表大会（即社会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出席代表285人，代表了4575个单位。大会的中心任务是最终解决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会上，三派代表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左派坚决主张接受《二十一条》，加入共产国际。右派坚决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竭力否定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勃鲁姆预先声明不承认最后的表决，拒绝服从多数。他认为参加第三国际是违背“传统的社会主义”。中派的主要代表龙格已经撕破了“中间派”的外衣，公开反对第三国际，攻击苏俄革命说：莫斯科所推荐

的“外科手术”是“致党于死命的，是极可诅咒的”。

12月28日，共产国际代表、德国共产党人克拉拉·蔡特金秘密地来到会场，受到大会的热烈欢迎。她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只有用革命斗争才能夺取政权。她主张要与改良主义者、中派和社会爱国主义者决裂。29日，会议主席特罗凯宣读了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名义发给大会的电报，指出要开除中派分子龙格、保罗—富尔一伙，认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影响在无产阶级中的忠实代理人……共产国际与他们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季诺维也夫的电报引起了各派激烈的争论，分裂已经不可避免。29日晚上9时，大会进行表决，赞成立即加入共产国际的计3208票（占67.8%）、反对加入的计1022票（占21.6%）、弃权的397票（占8.3%）。宣布投票结果时，已经是30日凌晨3时。代表们高唱《国际歌》，表示庆贺。大会选举弗罗萨尔为总书记，加香为《人道报》领导人。法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反对加入共产国际的少数派，宣布脱离党的代表大会。次日，在勃鲁姆建议下，在市政厅开会，保持原有党的名称法国社会党。

法共的成立是战后法国革命运动的重要成就，是第三国际在法国的一个重大胜利。但是，法共从成立时起，就存在着社会改良主义的思想残余，混进了一些投机分子，削弱了党的战斗性、纯洁性，对以后法共的活动有严重影响。

三、德国的赔款问题和鲁尔事件

[赔款问题]“国民联盟”内阁执政期间，把解决赔款问题作为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之一。德国赔款是战后欧洲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之一，也是法德冲突的中心。赔款问题一开始就有争论。巴黎和会只指出德国负有赔款的义务，而没有规定赔款的总数。1920年7月，赔款委员会确定了赔款分配的比例：法国占52%、英国占22%、意大利占10%、比利时占8%、其他占8%。直到1921年4月的伦敦会议上，最后确定赔款总数为1320亿金马克。会议还规定德国发行A、B、C三类公债票，每年应交赔款20亿金马克。赔款委员会还通知德方，以占领鲁尔区域作为最后制裁。德国表面上被迫同意。实际上口是心非，千方百计地拖延抵制。

1922年1月15日，普恩加莱组织了第二任内阁，他在政府声明中强调：德国必须支付赔款。可是，德国几次要求延期偿付赔款。英国主张满足德国的要求，以恢复德国的市场，并利用法德矛盾牵制法国。于是法国外交渐趋孤立。同时，普恩加莱的“强硬外交”也受到部分议员的反对，“国民联盟”出现了裂痕。德国利用时机，以马克贬值、资本外流为理由，正式请求在二年半期间内停止付给赔款。各国对此展开争论。最后，法国同意德国停付赔款2年，但须有莱茵或鲁尔的“抵押品”作为保证。因此，赔款问题更趋向紧张。

[法、比占领鲁尔]由于1921年法国的经济危机，引起工厂倒闭，法郎贬值，物价高涨，财政困难，民众不满。直到1922年12月，法国财政仍然十分困难，政治局势渐趋紧张。12月中，普恩加莱再次访问伦敦，希望得到英国的保证，敦促德国支付赔款，不然，法国政府将采取单独行动。

1923年1月11日清晨，法国以德国欠交木材2万立方米、煤1/16、电杆木13.5万枝为理由，派出一个法、意、比工程师组成的“国际工厂和煤矿监督代表团”，在2个法国师、1个比利时分遣队的保护下共同占领鲁尔。当天，法国众议院以452票对72票的绝对多数，批准了普恩加莱政府的行动。法比军队占领鲁尔，表面上是“迫德付款”，实质上是长期占领鲁尔，控制德国经济，巩固法国在欧陆的霸权地位。

法国占领鲁尔的侵略行动，遭到了英美的反对。德国宣布“消极反抗”：抽逃资本流往国外；停止向法国交付一切实物赔偿品；号召居民不纳关税、煤税或输出税；号召工人罢工，关闭钢铁厂、矿山、铁路停业、通讯机关拒绝为外国军队使用，等等。法国为报复德国，也采取相应措施：派遣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开矿、开火车；严禁在矿区运出任何东西；逮捕或放逐支持“消极反抗”的人；征用200多所学校，关闭170多家报馆；增派军队，入侵德国南部的领土。鲁尔的占领，使德国局势急剧恶化，马克猛烈贬值，1美元值1万马克，8月初，上升到400万马克。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尖锐，爆发了反政府的总罢工。8月12日，古诺政府辞职。9月26日，德国新政府签署了停止“消极反抗”的决定。法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可是，占领鲁尔对法国却是得不偿失。在经济上由于德国的“消极反抗”和占领军费用的扩大，法国财政更为困难。1923年的预算赤字达100亿法郎，法郎进一步贬值，1923年1月，1英镑值69.74法郎，12月则达82.92法郎。在政治上，国内工人掀起了反对占领鲁尔的抗议运动。法共组织了行动委员会，在占领军的士兵中进行工作，组织法德工人的国际主义联欢。许多地方

发生兵变，法国士兵拒绝向示威游行的德国人开枪，并加入了他们的游行队伍。外交上，鲁尔事件加深了法国同英国的矛盾，法国处于孤立地位。1923年8月11日，英国向法国发出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如果法国继续占领鲁尔，英国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将不再支持法国。10月12日，英国建议美国召开一次非常国际会议，在美国直接参与下解决赔款问题。法国拒绝参加以英美为领导的国际会议，但同意把赔款问题交给专家委员会解决。1924年4月9日，以芝加哥摩根银行经理道威斯为首的专家委员会向赔款委员会提出了建议书，法国表示同意。9月，“道威斯计划”开始实行，不久，法、比解除了对鲁尔的占领。鲁尔事件使普恩加莱的对德“强硬政策”受到了挫折，法国外交被迫转为守势，它在欧陆的霸权地位开始衰落。

第二节 “左翼联盟”内阁及其活动

一、1924年的议会选举和“左翼联盟”的胜利

[“国民联盟”的分裂]占领鲁尔是法国政局的重要转折点。1923年5月25日，出现了“1小时的内阁危机”，司法部长科尔拉因逮捕、审讯共产党人遭到反对派和群众的指责而被迫辞职。接着，内阁集体辞职，总统米勒兰拒绝内阁的要求。因此，普恩加莱内阁又勉强地维持了一个时期。与此同时，议会中的激进党转向反对派，强烈谴责法比占领鲁尔，主张与苏联及中东国家结盟。由激进党左派组成的“共和集团”主张与左派各党派团体重新联合，组织“左翼联盟”，共同参加1924年的议会选举。1924年1月初，31个省的参议员进行补选，左翼各党的参议员名额有了增加，这是政治力量转向左派的一个重要表现。3月25日，政府多数在议会上受到严厉指责，通过了不信任案。29日，普恩加莱改组内阁，撤换了二个前任部长，集全力于解决德国赔款与国内法郎危机问题。可是，他仍受到左派和右派的两边夹攻，“国民联盟”陷入困境。

[社会党的重建和“左翼联盟”的形成]图尔代表大会分裂后，以勃鲁姆为首的社会党在组织上四分五裂，党员由图尔代表大会前的133,100人缩减到近9,000人。为了加强社会党的力量，勃鲁姆等人把恢复和重建地方联盟作为重要任务。1921年2月13日，在巴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会上通过宣言，指出：“社会党仍是一个阶级的党，其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为集体主义社会。3月，《人民报》定为党的机关报。10月29日至11月1日，社会党在巴黎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即分裂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社会党的议会党团，决定参加1924年的选举，并准备拟定一份竞选纲领。到1921年底，在78个省中已有党员55,000人，党的地方联盟由1921年2月的56个发展到68个。社会党基本上实现了重建。

为迎接即将来临的议会选举，保尔·邦库主张在选举中结成左翼联盟，发出了“一切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联合”的号召。1924年1月底的社会党第21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与激进党组成“左翼联盟”的决议。3月，激进党与社会党签订了选举协定。接着，社会共和党也签署了竞选的共同纲领，至此，“左翼联盟”最终形成。

[“左翼联盟”在选举中的胜利]1924年5月11日，议会选举正式开始。“左翼联盟”不仅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还提出了具有和平民主主义性质的竞选纲领：对因参加1920年革命运动而被捕的人实行大赦，恢复被解雇的铁路工人的工作，国家公务员有权组织工会，实行社会保险，实行累进所得税，实行八小时工作日和政教分离法。在外交方面要求鲁尔撤军，恢复同英美的密切合作，同德国和解，承认苏联等等。这一纲领符合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受到了他们的拥护。

法共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执行了宗派主义的错误路线，提出“打倒国民联盟！打倒左翼联盟！他们两个都是资本家的工具”的口号，主张建立保证推翻资本主义的工农政府。法共提出的“工农联盟”没有实现，反而失去了选民。结果，“左翼联盟”取得了胜利。在新议会的581个席位中，“左翼联盟”占了327席（激进党139席、社会党104席、社会共和党44席、左

翼激进党 40 席)， “ 国民联盟 ” 占 228 席，共产党只占 26 席。

二、赫里欧内阁的内外政策

[赫里欧内阁的组成]6月初，“左翼联盟”占多数的议会公开攻击米勒兰总统。赫里欧领导的激进党议会党团与潘勒韦为首的社会共和党议会党团共同指控米勒兰超越权力，违反宪法。6月1日，普恩加莱内阁辞职。9日，由普恩加莱内阁时期的财政部长弗朗索瓦·马尔萨尔组阁，这是一个少数派内阁，旧部长就占了8个。它竭力维护总统米勒兰的地位，结果遭到“左翼联盟”议员的反对。10日，执政仅48小时的马尔萨尔被迫下台。11日，总统米勒兰辞职。13日，温和激进党人加斯东·杜梅格（1863—1939），当选为总统。

杜梅格上任后，立即叫激进党主席爱德华·赫里欧（1872—1957）组阁。赫里欧急忙与社会党磋商，社会党议会党团领袖勃鲁姆表示不参加内阁，但愿意在议会支持内阁。于是，赫里欧就在15日组成了激进党人占多数的内阁，并成为“左翼联盟”第一届内阁的总理兼外交部长。

[赫里欧内阁的内外政策]赫里欧内阁上台后，执行了竞选纲领中提出的一些诺言：大赦关在狱中的黑海水兵起义的参加者、赦免前激进党人的部长卡约、马列维，准予1920年被解雇的铁路工人复职，实行政教分离，执行世俗化纲领。在对外政策上，也有明显改变，1924年8月，议会接受了“道威斯计划”。9月，法、比从鲁尔撤军。10月2日，赫里欧在国联提出了“仲裁、裁军、安全”的协议书，主张通过仲裁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10月28日，法国正式承认苏联，受到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的欢迎。

但是，赫里欧的内外政策，却日益受到右派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对。累进税法无法实施，实行政教分离法阻力重重。银行家、财政家拒绝给政府贷款，组织“资金外逃”，破坏国库和法郎价格的稳定。赫里欧也承认“金钱专政者”反对他。右派势力重新聚集，成立各种反议会、反政府的组织。1925年3月11日，天主教徒发表《法国天主教与红衣主教宣言》，抗议政府的“反天主”活动。在马赛，天主教联盟发动了“反对极左派”的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打死2人，伤60人。内务部因此而受到猛烈攻击。4月，国库危机严重，货币流通额达430亿法郎。4月10日，参议院中多数议员谴责赫里欧的财政政策，拒绝由内阁发行公债的措施，赫里欧被迫辞职。

三、“左翼联盟”内阁的瓦解

[对摩洛哥、叙利亚的殖民战争]4月17日，社会共和党人潘勒韦（1863—1933）组阁。他任命卡约为财政部长，企图以增加税收、发放国库券、增加法兰西银行预支等办法解决财政困境，遭到右派反对，也引起左派的不满。10月29日，潘勒韦改组内阁。可是，“左翼联盟”内部矛盾重重，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潘勒韦内阁为缓和内部矛盾，维持统治，就借口平息里夫的“叛乱”，在1925—1926年期间，发动了对摩洛哥、叙利亚的殖民战争。

摩洛哥于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并为法国、西班牙所瓜分。摩洛哥名义上由苏丹统治，实际上，一切权力都操在法国总督手里。摩洛哥人民从“保护”的那天起，就开始反抗。1921年9月，北部的里夫族成立了共和国，推举阿卜杜勒·克里姆为总统。1923年，里夫人起义，给西班牙军以沉重的打击，并袭击了法属摩洛哥的法军哨所。法国以此为借口，于1924年5月挑起了对里夫人的战争。里夫人坚决反抗，1925年4—7月底，在阿卜杜勒·克里姆的率领下，对法军发动猛烈攻势。法国和西班牙达成了联合作战的协议。法国任命贝当为总司令，并以10万兵力和强大炮兵围攻不足3万人的里夫军。总理潘勒韦还亲自飞往摩洛哥，了解战况。1926年4月，法国一面与里夫人谈判，一面积极准备新的进攻。法国要求里夫人解除武装，遭到拒绝。于是，谈判破裂。5月6日，法军发动突然进攻，把里夫的战线切成两段，包围司令部。26日，阿卜杜勒·克里姆投降。里夫共和国灭亡。

几乎在摩洛哥战争的同时，法国还对叙利亚发动了殖民战争。1920年，法国接受了对叙利亚的“委任统治”。头五年，由法国直接统治，三个军事将领连续担任了驻叙利亚的高级专员。法国还把叙分为六个地区，由法国官员任总督，分裂民族的统一。法国的委任统治。一开始就遭到了叙利亚人民的反抗，仅在1922年就爆发了35次起义，损失法军5000人。1925年7月，叙利亚的德鲁兹山区人民又一次爆发起义。9月，起义发展到大马士革和克拉门区，直至黎巴嫩的黎波里。法国的权力只局限于城市的中心区域。法国恐慌万状，派魏刚率兵镇压起义，对大马士革狂轰滥炸，几千名起义者与和平居民遭到屠杀。1927年春，法国镇压了里夫人起义后，与叙利亚南部的英国占领当局合作，共同扑灭了叙利亚的民族起义。

[白里安继起组阁]1925年11月23日，总统杜梅格叫社会共和党人白里安组阁，以挽救财政危机。可是，当时“左翼联盟”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于是，白里安就争取赫里欧的支持，由激进党、左翼激进党与社会共和党组成左翼的多数。28日，白里安正式组阁，兼任外交部长。这是白里安的第八任内阁。之后，白里安又于1926年先后两次组阁。在白里安任职期间，内阁日趋右转。白里安在应付国内财政困难的同时，全力推行法德和解与反苏的外交路线。白里安外交政策的基础是“和平主义”、“集体安全”，竭力避免法国卷入国际冲突。白里安曾表白说：“法国的贫穷，经受不了新的战争冒险”。他积极参加了1924年的国际裁军会议，一直拖延了十多年。他以法国名义，签订了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化学和细菌武器。1925年10月16日，白里安与德国、英国、比利时、意大利代表一起签订了洛迦诺公约。同时，在洛迦诺还签订了法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条约。法国应诺，如果这些国家的边境遭到侵犯，法国将给以援助。

[“左翼联盟”内阁的瓦解]法国外交上的失利与摩洛哥、叙利亚殖民战

争的持续，进一步恶化了法国的财政状况，国库空虚，法郎急剧下跌：1926年3月，1英镑等于135.81法郎，5月为155.06法郎、7月为199.13法郎。7月17日，卡约要求议会赋予他解决财政问题的全权，遭到左派和右派议员的反对，议会以288票对243票拒绝对内阁的信任，白里安内阁被迫下台。20日，赫里欧再次出任组阁，可是，内阁仅仅维持二天就垮台了。“左翼联盟”内阁最终瓦解。

第三节 20 年代中后期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国民联合”内阁的执政

[普恩加莱的“大内阁”]“左翼联盟”瓦解后，议会内的政治力量进行新的组合。右翼党不是议会的多数，不能组织内阁。左翼党虽然占议会的多数，可是出现分裂。7月22日凌晨，总统杜梅格找普恩加莱组阁。普恩加莱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神圣联合”内阁为榜样，提出组织“国民联合”内阁。可是，社会党人拒绝参加，共产党则被排除在外。所谓“国民联合”不过是右派和中派的联合。7月23日，普恩加莱正式组成“国民联合”内阁。时年66岁的普恩加莱任总理兼财政部长。在13个部长中，有6个是前总理。因此，历史上以“大内阁”著称。普恩加莱一上台，立即提出解决财政的方案，获得了议会的信任。8月开始，他大胆地进行行政改革，撤销了106个副省长和70个总秘书职位。紧缩或调整各部属机构，司法部改革审判程序，减少了327个初审法庭，缩编了318人，行政开支大为减缩。

[白里安的外交政策]白里安退出“左翼联盟”后，就投向“国民联合”内阁，担任外交部长，继续推行法德和解与集体安全的政策。1926年9月8日，法国支持德国加入国际联盟，白里安在国联大会上发言，表示“在和平事业中，法德共同保持合作”。9月17日，正当国联开会期间，白里安与德国外交部长斯特莱斯曼在日内瓦城郊图瓦里秘密会谈。白里安认为：没有外国的援助，法国的财政就不能稳定，要求德国财政资助。为此，法国作出了重大让步，表示要结束对莱茵地区的占领、把萨尔归还德国、撤销军事管制。由于法、德矛盾不断发展，图瓦里协议并没有具体实行。白里安的法、德和解政策，遭到议会反对派的强烈反对。于是，他就竭力推行集体安全政策。1927年9月24日，国际联盟大会通过了非战总协定的原则。白里安在大会上鼓吹“大家以仲裁走向和平”。1928年8月27日，白里安在同美国国务卿凯洛格长期会谈后，终于在巴黎签订了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宣布普遍放弃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各国争端。白里安的对外政策为整顿国内财政、稳定法郎创造了某种有利的国际条件。

二、法郎的稳定与塔迪厄内阁的“繁荣政策”

[普恩加莱与法郎的稳定]普恩加莱的“国民联合”内阁上台后，就把整顿财政、稳定法郎作为治理内政的主要任务。普恩加莱被人们誉为“法郎拯救者”，他的“理财”之道可概括为三个方面：

第一、调整税率，增开新税，增加收入作为“生财”的主要源泉。1925年，税收总额为291亿法郎，法国人民的税收负担占收入的1/4，是资本主义世界税收最重的国家。1926年8月，又颁布法令，进一步提高税率。1927年由于工业、商业、农业利润税率的提高，税收增加了90亿法郎。同时，广为发行各种短期的公债，如“国库券”、“国防公债”等等，吸收流动资金，增加国家收入，以保证收支平衡。据统计，1928年的公债发行达200亿，其中有一半提供开支。

第二、压缩开支，裁员简政，减少国家行政支出，甚至限制人民的消费。

第三、稳定法郎汇价，紧缩通货，恢复对法郎的信任。为吸引黄金或外汇，提高贴现率6.6%。结果，增加了30多亿现金和更多的外汇。由于资金内流，国库充实，法郎价格明显上升，1926年7月，1英镑值199.03法郎，8月为172.11法郎、9月为170.07、10月为165.55、11月为141.17、12月为122.86。1926年12月，法兰西银行确定法郎的汇价为1英镑等于124法郎，这一价格一直保持到1928年中，实现了法郎的稳定。为巩固这一稳定，1928年6月25日，国会通过了普恩加莱关于改革货币制度的法令：确定法郎的汇价，1英镑等于124.42法郎，或1美元等于25.52法郎；发行一种新的金法郎，以成色900‰的65.5毫克的金铸成，实际上恢复了金本位；重新估价法兰西银行所有的金、银和外币，凡多余的作为政府偿还该行借款的款项；法兰西银行向政府提供50亿法郎的无息贷款，政府则以同等数额的财政部证券交付该行。所有这些措施的实行，迅速加强了法国的财政实力，1926年的国家预算中，收入430亿法郎，支出420亿法郎，出超10亿法郎，以后连续四年盈余。法兰西银行给国家的预支也由1925年360亿法郎缩小到1928年的30亿法郎。随着法郎的稳定，物价也逐渐下跌，消费品的零售价也开始下降。

[塔迪厄内阁的“繁荣政策”]财政的好转，提高了普恩加莱的威望。在192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国民联合”的议员重新当选，并获得了议会中的大多数。6月，普恩加莱组织新的“国民联合”内阁。但是，右派企图单独组阁。结果，重新引起了各派的斗争。11月4日，激进党第15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谴责“国民联合”内阁。接着，激进党人的4个部长辞职。11日，普恩加莱改组内阁，组成了以石派、中派占优势的、没有激进党人参加的新内阁，直到1929年7月因病辞职。

1929年7月29日，白里安组织第11任也即他最后一任内阁。他自称“联合内阁”，呼吁各派停止争论。可是，白里安的外交政策遭到左、右双方的攻击，被迫于10月22日辞职。11月2日，出身巴黎大资产阶级的左翼共和党人塔迪厄（1876—1945）组织右派内阁。这位法国政坛的新秀，在注意边境安全、保障国家独立的同时，潜心国内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繁荣政策”，准备拨款50亿法郎，改建和新建农业、工业、商业部门的重大工程，争取在5年内分期实施。12月，陆军部长马其诺向议会提出建筑防御工事系统的原则，它以“马其诺防线”而著称于世。

三、20 年代中后期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破坏地区的重建]战后，法国政府立即着手对战争破坏地区的重建，在北部、东北部地区，投资 1000 亿法郎，恢复或重建约 8000 个工业企业，新建几十个大型工厂和电站。至 1925 年，已重建了各个破坏项目的一半以上。20 年代末，基本上完成了破坏地区的重建。

破坏地区的大规模重建，引起了固定资本的大量更新。同时，重建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当时，政府把复员军人、流动劳力大批安排到重建地区，还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就有大批移民和国外劳工涌到法国。1919 年侨居法国的外国人有 141.7 万人，占法国居民总数的 3.7%，以后则不断增加，从 1921—1925 年外国居民平均每年增长 10%，是战前的 5 倍（1905—1911 年平均每年增长 2%）。这些侨民和外国劳工在法国经济的重建中起了很大作用。

[经济的相对繁荣]20 年代中后期，法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出现短暂的“工业高涨”局面，进入了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国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1924 年，工业生产总量第一次超过了战前水平，以后不断增长，见下表：

年份	工业生产总指数
1913	100
1919	57
1921	55
1924	109
1928	127
1929	139.56

1924—29 年期间，工业发展的速度每年达 5%，而战前 15 年的最高速度仅为 3.4%。同时，工业结构也有了变化，由主要是轻工业的发展改变为基础工业、重工业的发展。1914—1929 年期间，冶金、机械、建筑等工业设备部门的生产约增加了 50%，而纺织、皮革、食品等消费工业则不超过 10%。铁矿石由 1913 年的 2191.8 万吨，增加到 1939 年的 5073.1 万吨，铸铁由 520.7 万吨增加到 1036 万吨，粗钢由 4687 万吨增加到 971.7 万吨。汽车制造占世界第二位，产量由 1918 年的 4.5 万辆增加到 1929 年的 25.4 万辆。随着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从 1921—1931 年，共增长了 321.5 万人，而农村居民则减少了 60 万人。1921 年，城市人口占人口的 46.4%，1931 年占 51.2%，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法国由农业—工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

在工业发展中，大工业企业的地位增强了。在不到 10 个雇佣工人的工厂中劳动的工人，1906 年占工业就业居民的 58%，1931 年减为 34%，而在 500 人以上企业劳动的工人，则由 1906 年的 29%提高到 1931 年的 33%。同时，较广泛地采用了所谓“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各种措施，在一些大企业，以美国为榜样，实行“泰罗”制、“福特”制，装置了传送带，对工人的行为进行测定。在人造纤维、电力、摩托制造业采用新的生产程序。国家特别注意化学工业的发展，统一了标准，实行生产合理化。工业技术的现代化、标准化，改变了法国工业陈旧、落后的状态，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农业生产也得到缓慢发展。1924 年，农业总产量达战前 1913 年的水平。

各种农产品也基本上达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也趋向现代化，大量使用了化肥和拖拉机。1920 年有拖拉机 2.7 万台、收割机 140 万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还表现在生产更多的消费品，为了满足生产牛奶的需要，牧场的面积占了耕地的 15%，而小麦的种植面积则减少了 50 万公顷。

贸易得到很快发展。国内贸易异常活跃，1931 年，商业中的雇佣人员超过战前的 15%。1913—1929 年外贸总额增加了 50%，占世界贸易额的 6%。外贸中还出现了新的趋向，同英、德、比、苏等欧洲国家的贸易相对减少，而其他国家尤其是对殖民地各国的贸易则有显著发展，1913 年，对殖民地的贸易占法外贸的 12%，而 1930 年则提高到 16%。

[工资与福利]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民收入由 1920 年的 2350 亿法郎提高到 1929 年的 3835 亿法郎。在分配中得利最多的是资本家，据统计，1921 年公司分配的利润是 37 亿法郎，1929 年则增加到 118 亿法郎。当然，工人的工资也有所提高，加上物价相对稳定，因此，人民生活还是有所改善。见下表：

日工资指数（1913 年为 100）

	名义工资		生活指数		实际工资	
	巴黎	外省	巴黎	外省	巴黎	外省
1921	339	398	338	381	100	104
1924	372	462	377	406	99	114
1927	498	575	498	522	100	110
1930	648	707	587	621	109	114
1931	643	707	531	551	121	128

同时，法国政府为缓和社会与阶级矛盾，还实施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如 1926 年第一次实行了失业补助金法，1928 年对低工资的职工实行养老金制，对疾病、残废的工人、孕妇实行津贴等。

在 20 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显示了它的阴影，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人口增长缓慢，轻纺工业下降，小企业仍然占有优势，等等。还应该看到，当时复兴发展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对外加紧掠夺殖民地基础上的。因而是虚弱的，不可靠的。

第四节 20年代的文学与艺术

一、文学

[“达达”运动的衰落]“达达”(Dada)运动是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虚无主义的现代文学思潮，是反理性、反传统的突出表现。“达达”主义的倡导者是法国诗人特里斯唐·查拉，1916年，他与一些青年诗人在瑞士苏黎世创立名为“达达”的文艺团体，开始倡导“达达主义”，很快在瑞士、美国、法国流行起来。“达达”运动是一群青年仇恨战争、反对战争的产物，他们力图反对产生战争的精神世界。可是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推翻旧的精神世界，创建新的精神世界。1920年，查拉定居巴黎，建立了“达达”分子的国际中心，散布“除了否定一切，‘达达’的名字不再意味着什么”。他们发布宣言，组织一些挑衅性的表演，诗人的狂叫乱喊，伴以嘈杂的音乐，使戏谑嘲笑达到了极点。1921年，“达达”运动分裂，以布勒东、阿拉贡等为代表的一些人走上了超现实主义的道路，“达达”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已销声匿迹。

[超现实主义]1921年，布勒东、苏波、阿拉贡等“达达”分子，虽然仍团结在《文学》杂志的周围，但他们对“达达”主义粗鲁的言行和贫乏的技巧感到厌烦，认为必须进行新的理论探讨，发起一场新的“精神革命”。同年，布勒东与苏波合作，创作了一部诗集《磁场》，奠定了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基础。1924年秋，布勒东发表一篇《超现实主义宣言》。12月1日，创办刊物《超现实主义革命》。同年，成立“超现实主义调查局”，负责集中和总结超现实主义团体成员的经验。超现实主义比“达达”分子更少无政府主义。他们要求人身和思想的自由，敌视一切平庸的道德传统，追求“纯精神的自动反应”，用一种新的理想取代传统的理想、文化与道德。他们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强调“潜意识”梦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提倡写“事物的巧合”，他们认为清醒的、理智的思维活动，是受资本主义文明毒化了的精神，不是“纯粹”的精神。只有“潜意识”的、睡眠状态的、或偶合情况下的思维活动，才是还未受到外界干扰的“纯粹”精神。因此，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任务就在于挖掘和解放被理性、传统压抑的意识和感情。他们往往在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捕捉人们思维活动的原始状态，或者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捉住梦幻。他们的诗歌、小说，实际上就是“潜意识”、“非理性”的一种形象的表达。阿拉贡的诗集《欢乐之火》、小说《安尼赛》、布勒东的小说《娜佳》，都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1928年，超现实主义运动开始分裂。一部分人主张作家要投身革命，运动要为革命服务。以布勒东为代表的一些人仍固执己见，认为运动本身包含着革命，要保持绝对自由，不接受任何外界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监督。1930年，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重申反抗的绝对性、不顺从的彻底性与对规章制度的破坏性。阿拉贡等人则离开超现实主义，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上。

[批判现实主义的发展]在超现实主义现代派文学运动流行的同时，批判现实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开始兴起。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出生于巴黎书商家庭，从青年

时代起就爱好文学，对古希腊文学有较高的修养。他的成名作《希尔维斯特·波纳尔的罪行》（1881年），描写一个学者同资产阶级法律秩序的冲突。小说《黛依丝》（1890）反映了作者对天主教会的不满。90年代，他积极参加支持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斗争，逐渐接受社会主义。他的4卷本长篇小说《当代史话》（1897—1901），愤怒地揭露了德雷福斯案件中反动军人、封建贵族与教会的阴谋活动，描绘出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穿了统治者的政治黑幕。小说《企鹅岛》、《诸神渴了》、《天使的叛变》等，鞭笞当时的社会制度，讽刺资产阶级文明，但却对人类理性的将来表示怀疑，流露出悲观思想。苏联十月革命后，法朗士更倾向社会主义，公开谴责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192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4年去世，法国为他举行了国葬。

另一个杰出的文学大师是罗曼·罗兰（1866—1944），他出身于银行小职员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从1904—1912年，他出版了10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在这部享誉世界的小说中，作者通过主人公德国音乐家克利斯朵夫一生的活动，广泛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图景，表现了作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进步立场和坚持人类进步文化的艺术观点。这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巨著，荣获1915年度诺贝尔奖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坚持人道主义，反对战争。1919年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号召世界各国知识界联合起来，抵制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20年代，他发表的小说有《母与子》、《皮埃尔和柳丝》、《格莱昂波》，音乐理论和音乐史的最重要著作有7大卷的《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1928—1943），戏剧计有《理性的胜利》（1899）、《丹东》（1900）、《7月14日》（1902）、《爱与死的较量》（1925）、《百花盛开的复活节》（1926）、《流星》（1928）、《罗伯斯比尔》（1939）等21部。30年代起，罗曼·罗兰积极参加反战、反法西斯斗争，公开声明站在苏联一边，关心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罗曼·罗兰还和法国其他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1873—1935）、阿拉贡、瓦扬—古久里（1892—1937）等一起，在批判现实主义基础上，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心理小说]它是以现代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强调人的“意识流”，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零散的各不相同的方法，而是以一种“意识流”、“思想流”的方法进行的。因此，他们着意刻划人的意识、感情等心理活动，其著名代表作家普鲁斯特。他从1906年开始，就构思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1913年已确定小说的全部布局轮廓，共7卷15册，并在同年出版第一卷《斯万之家》。1919年出版第二卷《在花枝招展的少女们身旁》。1922年，普鲁斯特去世。但他的小说已最后写成，从1924—1927年陆续出版其他各卷。《追忆逝水年华》实际上是自传性系列长篇小说，叙述他对青春的无限怀恋和追念。这部小说用感性的回忆、分析等手法，形象地描写20世纪初巴黎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生活和众多的人物。继普鲁斯特之后，心理小说的著名作家有雅克·德·拉克雷泰尔、雅克·夏尔多纳、埃米尔·昂里奥等。

二、艺术的发展

战后和平生活的开始，20 年代经济的发展，以及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在部分人们，特别是青年中出现了一种追求享乐的发疯似的风尚习俗，这种生活方式到 30 年代危机爆发才基本中止，因此，史称“疯狂年代”。“疯狂年代”的思想精神生活，无不在法国艺术中得到反映。

[戏剧与电影]20 年代是法国戏剧繁荣的年代。巴黎的剧场座无虚席，喜剧家爱德华·布尔代、萨夏·吉特里、马塞尔·阿夏尔和让·吉罗杜等人的剧作，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喜剧题材广泛，有风俗喜剧、社会或政治讽刺喜剧，暴露与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导演家热米埃建立了国家人民剧院，兼任经理。他认为剧院应该具有宣传真正的“社会平等”的使命，使人民能掌握“他的命运的意识”。著名导演科波在他创办的“老鸽舍剧院”演出民主主义戏剧，对抗一些“商业性”剧院的活动。这两位导演家还培养了一批戏剧导演新秀，如迪兰、儒韦、巴蒂和皮托耶夫，他们在 1927 年组成象征性的“四人联盟”，努力发展戏剧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传统。

电影是一种创新的艺术形式。从 1895 年发明电影起，电影事业发展很快。可是，20 年代开始，由于美国电影的竞争，一度出现衰落的景象。有声电影的放映，为电影事业带来了新的生机。法国一些剧作家、导演、电影创作者为挽救电影业的衰落，进行大量工作。他们创作一批现实主义的影片，组织各种鉴赏讨论的团体。1924 年，他们组织“先锋队”，一些影院也统称为“先锋剧场”、“先锋影院”。于是，“先锋派”电影的影响不断扩大。1930 年，雷内·克莱尔摄制了《在巴黎屋檐下》，这部反映法国城市生活的杰作，使电影业有新的发展。

[音乐与芭蕾]20 年代初，法国有影响的老一辈作曲家如德彪西、萨蒂、富尔等人相继去世。但他们培养了一代新的作曲家。其中，鲁塞尔在法国有显著地位。在萨蒂的构成主义创作方法影响下，一批年轻的作曲家开始活动，如米约、奥内热尔、奥里克、普朗克、迪列、塔耶费尔等以“六人团”著称于法国。他们反对浪漫派和印象派的音乐创作方法，以自己的节奏感、轻巧的风格和深刻的讽刺，创作了许多交响曲、钢琴曲以及接近民间曲调的浪漫曲。奥内热尔的清唱剧《达维德国王》、米约的芭蕾舞剧《世界的创造》，很受人们欢迎。

在“疯狂年代”里，如醉如痴舞蹈的盛行，对国外一切艺术潮流的开放，以及录音技术的发展，使爵士音乐在法国广泛流传。

芭蕾的兴盛是法国戏剧、舞蹈艺术发展的结果。早在 1909 年，俄国芭蕾舞剧团的演出就轰动了整个巴黎。后来，俄国有才华的芭蕾舞大师季亚吉列夫留在巴黎，他与法国音乐界、舞蹈界著名人士一起，设计了适应时代的大的舞蹈动作，使舞蹈自由地表现现代日常生活的素材和姿态，更能吸引民众。法国的音乐家、剧作家都为芭蕾配曲，或创作新的芭蕾舞剧。著名的芭蕾是让·科克托创作的《屋顶上的牛》与《艾菲尔铁塔的新娘》，深受民众欢迎。

[绘画艺术]20 年代的法国绘画艺术，以立体派的艺术流派占主要地位。立体派把体和面作为艺术表现的重点，在表现物象时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主张构图以球体、锥体、圆球体为基础，把自然形体分解为几何切面，使他们相互重叠，或在画面上同时出现无数的面，在平面上显示出长度、宽度、高度、深度以至视力看不到的结构。立体派画家从主观感觉出发，求助于几

何的形式，把有机联系的自然客体表现为支离破碎的东西。立体派的代表人物有毕加索、莱热、布拉克。毕加索原籍西班牙，出身于图画教师家庭，求读于马德里高等美术学校。1900年定居巴黎，研究印象派绘画。1906年，他开始画立体派风景画，1907年发表油画《达维诺的贵妇人》。20年代，他和布拉克一起，在欧洲画坛大兴立体派画风，代表作有《三个戴假面具的音乐家》等。他在后期转向现实主义。

第十四章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法国

第一节 经济大危机在法国

一、经济大危机在法国的爆发

[30 年代初法国的经济格局与盲目乐观] 1929 年 10 月 29 日，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的崩溃，引发了一次世界规模的经济大危机。然而，在法国，1929 年、1930 年却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繁荣时期”的最好年份。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平衡、法兰西银行的黄金储备雄厚，金额不断增加，从 1929 年 5 月的 290 亿法郎增至 1930 年 5 月的 550 亿法郎，财政状况良好。除农业外，绝大多数经济部门仍在持续发展。煤、铁矿和铝的产量创造了两次大战期间的最高记录。连技术落后的纺织业也因美国等国家的危机一度获利。1928 年，法郎大幅度贬值之后使法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大增强。外贸方面传统的不平衡虽仍存在，但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和海外投资的利润得到很大补偿。失业问题并不严重，当美国、德国、英国分别有 160 万、190 万、140 万人失业时，法国的失业人数只有 9000 人。外籍移民的继续增加也说明了这一点，到 1931 年时，外籍移民已达 290 万人。

这些现象导致法国朝野盲目乐观。1929 年 11 月 7 日，第一次担任政府总理的塔迪厄在议院大胆地提出了为期 5 年的“国民装备计划”，要求国库拨款 50 亿法郎。在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后仍提出这一耗费巨大的“繁荣政策”，足以反映塔迪厄政府的乐观情绪。有人甚至得意的宣称：我们国家的相对平衡证明，法国的方式虽然是折衷的，但始终是审慎的，它是最佳良策，是民族智慧的反映。这种乐观情绪在一般群众中也广为流行。

其实，这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法国受这次大危机的影响虽然要晚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但它仍难幸免。只是由于法国传统的历史条件，特别是一战后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使危机推迟发生。法国工业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相对落后，使工业、农业相对平衡，构成法国经济总体上的平衡性；外贸在法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大，因而国际市场的冲击也相对较小；此外，破坏地区的重建、各种规模浩大的公共工程、“普恩加莱法郎”带来的法郎稳定和法国产品竞争力的加强、农村人口仍然众多及政府对农业的保护主义政策等因素都有利于推延危机在法国的爆发。

[危机在法国的爆发] 1930 年 11 月，法国乌斯特里克银行宣告破产，标志着法国经济危机的开始。接着，大批银行与企业纷纷倒闭、破产，生产下降，失业人数激增。1930 年 12 月失业人口还只有 12000 人，翌春猛增至 5 万人。物价暴跌，资本输出锐减，对外贸易萎缩。

1931 年，经济危机波及到整个工业部门，该年工业生产下降 17.5%，其中钢铁生产下降达 29%，破产的企业增加了 60%。1931 年秋失业人数达 18 万人，1932 年 1 月上升到 25 万。轻工业部门受危机打击更大。尤其是纺织业在日本产品的激烈竞争下处境艰难，1931 年的生产指数只及 1913 年水平的 71%，1934 年的开工率比战前降低 66%。服装业和制革业的生产也有所下降。据估计，这次危机大约使法国的工业倒退到 1911 年的水平。

危机也沉重地打击了长期处于慢性危机的法国农业。农业危机在 1932

年和 1935 年表现得特别严重。农产品大量过剩导致价格暴跌。下跌最厉害的是主要农产品小麦与葡萄酒的价格。1931 年至 1935 年，小麦的价格由每公担 184 法郎降为 74 法郎，葡萄酒的价格由每百升 154 法郎降为 64 法郎。危机期间，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更加扩大。大贸易公司和垄断组织利用危机极力压价收购农产品，同时抬高工业品价格。据统计，农民的收入从 1928 年的 430 亿法郎减少到 1934 年的 180 亿法郎。

危机使法国的对外贸易陷于困境。尽管法国商品的批发价从 1929 年到 1934 年下降了 46%，但由于法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使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又重新趋于劣势。1929 年法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中所占比重为 6.4%，至 1937 年仅占 5.1%。这种状况又使传统的外贸逆差更为严重。到 1937 年，法国的出口几乎比 1929 年减少了 3/4。同时，资本输出下降，对外投资的收入也由于外国债务人的破产而缩减。结果，国际收支的逆差更为扩大。

危机使 1928 年法郎贬值后一度稳定的法国财政再次处于混乱状况。1931 年有 118 家银行破产。胡佛延债令、德国停付赔款、英国放弃金本位后对法郎的冲击、对外投资收入的减少、外贸逆差的不断增长和旅游业的衰落使国家财政收支失去平衡。1931 年的财政预算出现了 50 亿法郎的赤字，1933 年为 100 亿。政府被迫抛售大量黄金应急，一度雄厚的国库再次空虚。另外，1931 年开始出现的资金外流也严重地影响了法国的财政状况。

二、经济危机对法国社会的冲击

[危机对法国社会的影响]法国这次经济危机的特点是爆发较迟而持续时间较长。危机冲击着法国社会，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危机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和中小资产阶级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和生活水平普遍降低。生产下降、企业倒闭使大批工人和职员失业，首当其冲的是就业妇女和外籍移民。尽管在危机期间，商品零售价格的下降幅度似乎要低于工资下降的幅度，但日益严重的失业使许多家庭中就业人数减少，从而导致购买力的下降。据统计，1935年初，在1250万工资收入者中失业人数约为200万。从1930年至1935年，群众的购买力下降了大约15%。危机使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批中小店主破产，中小资产阶级的收入平均减少约30%。危机使许多家庭开支入不敷出，居住条件恶劣导致夫妇吵架，儿子失业引起父子关系紧张。危机也对结婚率和出生率产生一定影响。青年因为失业无法结婚，因无力抚养子女而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在农村，农民生活水平受到的影响更大。危机使农产品价格猛跌，特别是剪刀差的扩大，使一些农民因无力偿还债务和缴纳租税而变卖家产，背井离乡到城市谋生，在城市又找不到工作，只得流落街头。留在农村的农民的生活状况也极为悲惨。

第二，为数极少的垄断资本家利用危机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和地位。他们用低价收买、兼并破产或濒于破产的中小企业，从而加强了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特别是银行资本的集中和它在国家经济中的作用明显增强。1933年，6家大储蓄银行的存款额为380亿法郎，其中有两家银行的存款额竟相当于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一半。冶金行业的巨头施奈德和德旺得尔以及新兴的石油业的大垄断资本家，也因危机大大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危机期间拨出巨款资助私人垄断资本。随着这些垄断集团经济力量的进一步扩大，垄断巨头对法国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他们企图在法国建立“强力政权”来更好地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第三，危机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使斗争日趋激烈。广大人民群众为改善生活状况，反对政府和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的后果展开了顽强斗争。在城市，广大工人和公务人员等主要是反对降低工资，要求取消间接税。在农村，农民和农业工人也开展反对政府农业政策的斗争。

[政局动荡不安，内阁更迭频繁]重大的经济危机往往导致政治危机。法国因危机而使政局动荡，内阁频频更迭。

从1929年11月塔迪厄第一次组阁到1935年5月议会选举，法国共更换了8届内阁，都因无力应付经济危机先后下台，每届平均任期不到4个月。其中，塔迪厄、赖伐尔各领导过3届内阁，他们执政期间，法国政局出现向右转的趋势。他们对内采用紧缩政策向广大人民群众转嫁危机，如缩减公务人员工资、减少各种抚恤金、补助金。同时却拨出巨款帮助垄断资产阶级渡过难关，并且用秘密基金资助一些法西斯组织。对外继续孤立和反对苏联，主张同德意接近和亲善。更有甚者，塔迪厄在1932年2月第三次组阁时，公然主张建立“强力政权”，力主修改宪法，使国家机器能够更好地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他的这一主张一出笼就遭到左翼力量的一致谴责。在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斗争下，塔迪厄企图消灭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实行公开反动统治的阴谋未能得逞。

1932年5月，法国举行议会选举。为此，激进党、社会党和一些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别组成了“左翼联盟”，并在选举纲领中主张缩减军费开支、为劳动者设立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减少中间阶层的捐税，对铁路、保险公司和部分军工厂实行国有化。左翼联盟在5月1日的第一轮选举中取得重大胜利。5月6日，即第二轮选举前两天，总统杜梅遇刺身亡。凶手是患有精神错乱的白俄分子格尔古洛夫。右翼政党借此事件大作文章，说凶手是苏俄间谍，但是右翼的阴谋未能得逞。左翼联盟在第二轮选举中仍取得了胜利。6月3日，新任总统勒布伦授命激进党领袖赫里欧组织“左翼联盟”内阁。赫里欧内阁在外交方面力排众议，着力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并在11月29日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在内政方面，赫里欧内阁同样拿不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付危机，基本上承袭了前几届内阁采用的紧缩政策。由于赫里欧内阁的政策逐渐右倾，遭到社会党的反对。12月14日，赫里欧在左右两面的压力下被迫辞职。

三、法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法西斯组织的涌现]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法国大资产阶级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日益趋向法西斯主义。法西斯组织纷纷出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组织主要有“法兰西团结”、“法兰西主义”、“法兰西行动”和“火十字团”。法兰西团结在1933年由化妆品巨商弗朗索瓦·科蒂资助组建，扬言要横扫议会民主，建立独裁统治，成立时拥有大约2万名成员。法兰西主义在1933年11月由马塞尔·比加尔创建，拥有1万名成员，主张摧毁议会制度，用代表行会的立法机构取而代之。比加尔还代表法国在1934年12月参加了在蒙托洛召开的国际法西斯代表大会。法兰西行动最初产生于19世纪末，原是个教权主义的保皇组织，因出版《法兰西行动》而得名，二、三十年代逐渐演化为法西斯组织。30年代初约有成员6万人，并建立了特殊的准军事组织“国王的报贩”，破坏左派的集会游行，甚至谋害某些左翼领导人。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以拉罗克上校为首的火十字团。该组织最初由一战期间荣膺“战斗十字”勋章的退伍军人组成，成员按军事编制组织，有严密的纪律。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象在前线一样联合起来”，“挽救民族、荣誉、秩序和财产。”该组织发展极为迅速，成员也由原来清一色的退伍军人扩展到各界人士。1934年春大约有成员35,000人，同年夏天超过10万人，次年发展到20万人，到1936年初时成员多达45万。火十字团除了拥有大量枪支外，甚至还拥有飞机。

[1934年2·6事件]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给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法国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人民群众对危机后果的不满情绪，企图夺取政权。2·6事件就是他们的一次夺权尝试。

1933年底和1934年初，报刊揭露了斯塔维斯基丑闻。斯塔维斯基是法籍乌克兰犹太人，长期从事诈骗活动，骗取了巨额财富。他用诈骗得来的钱财贿赂大批政界要人与警察、司法部门的头目，与他们过从甚密。他在一些部长的庇护下，伙同众议员兼巴荣纳市市长加拉开设巴荣纳市立信贷银行，并以大批假珠宝作抵押，发行巨额股票。案发后，银行经理被捕入狱，斯塔维斯基却逃之夭夭。1934年1月8日，警察在夏蒙尼包围了斯塔维斯基隐藏的住所，并宣布说斯塔维斯基已自杀。警方的这一说法遭到大多数人的怀疑，他们认为很可能是警察奉命杀人灭口。斯塔维斯基丑闻牵涉到1,200多个政界要人，甚至还牵连到内阁总理肖当。

丑闻揭露，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当局查明事实真相。法国的法西斯组织也以此为借口，伺机“向议会进军”。1月10日，“国王的报贩”举行首次反议会的法西斯示威。嗣后，各法西斯组织天天在圣日耳曼大道、协和广场举行类似性质的示威游行。1月27日，肖当被迫辞职。1月29日，达拉第受命组阁，决定撤换与丑闻有牵连并与极右势力关系密切的希亚普巴黎警察署长的职务，另任他为摩洛哥总督。希亚普拒绝新的任命，一些右翼部长也以辞职表示对希亚普的支持。法西斯组织决定利用希亚普撤职之事作为发动叛乱的借口。

2月5日，右派报刊鼓动法西斯组织，在次日举行示威游行。2月6日下午，达拉第要求议会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火十字团等组织在协和广场纠

法国学者对此分歧很大，有人认为法国不存在法西斯主义，所谓的法西斯组织不过是一些极右团体。

集了约 4 万人，准备冲击正在召开议会的波旁宫。火十字团在三色旗指引下，以胸佩勋章的残废退伍军人为先导列队游行，高呼“打倒窃贼，打倒达拉第”等口号，逼迫达拉第政府辞职。晚上 7 时，法兰西团结的一些暴徒开始冲击波旁宫。为了不让暴徒冲进议会场所，守卫部队鸣枪阻止，双方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造成 17 人死亡，2329 人受伤。几个叛乱头目被逮捕，法西斯分子妄图解散议会，夺取政权的阴谋未能得逞。

就在暴徒冲击波旁宫时，达拉第政府以 343 对 237 票的多数获得议会的信任。然而，由于内阁成员中派别各异、矛盾重重，使达拉第感到无能为力，遂于 2 月 7 日下午决定辞职。2 月 9 日，组成了以杜梅格为首的联合内阁，成员中包括右翼领袖塔迪厄、赖伐尔等人。

[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特点]法国法西斯主义分子夺取政权的企图未能得逞，是由法国法西斯主义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国际现象，法国的法西斯与意德的法西斯显然具有许多共同点。事实上，许多法国法西斯组织的纲领、口号以及活动方式都明显的表露出模仿意德法西斯的痕迹。然而，由于法国国情与意德不同，特别是 30 年代经济危机对法国社会的冲击在某些方面与意德等国有别，使法国法西斯主义必然具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第一，法国法西斯主义作为国内一股政治力量出现在社会上要迟于意德。这是因为法国在一次大战后的国际地位和战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同于意德，而 30 年代经济大危机又较迟影响法国。第二，法国法西斯主义的社会阶级基础较为薄弱，始终未能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运动。这是因为危机对法国冲击的突发性相对较弱，带来的灾难相对要小。而法国又具有较强的民主传统，这对法西斯主义的发展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第三，由于法国法西斯理论的多元性，使法国法西斯始终没有一个系统的统一的纲领，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法西斯政党组织。

第二节 人民阵线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一、人民阵线的建立

[反法西斯运动的展开]从30年代初开始,法国人民就以各种方式同国内外的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1932年,在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和亨利·巴比塞的倡议下,成立了国际反战委员会。1932年8月27—29日国际反战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25个国家的2244名代表。法国代表团的阵容最大,达585人。会上设立了驻在巴黎的常设机构——国际局,与会各国大多相应建立了反战委员会,法国也在大会期间设立了全国反战委员会。

根据德国、意大利、波兰革命工会的倡议,1933年6月4日在巴黎普莱埃尔大厅召开了欧洲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3700名代表,其中法国代表2562人。法国共产党、社会党和总工会的代表一起出席了这次大会。8月20日,国际反战委员会和反法西斯委员会在巴黎通过了两大运动在国际范围内联合的决议,成立了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法国也成立了相应的委员会,法国反法西斯运动广泛开展。在运动中,各个党派、工会间的接触日益增多,为法国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2·6事件爆发后,巴黎等地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统一总工会、社会党和总工会的分别发动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斗争。2月9日,巴黎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和统一总工会号召下,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社会党和总工会的许多成员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2月12日,在社会党和总工会号召下举行了总罢工,法共和统一总工会虽未受邀请,也参加了这次罢工。是日,全国各地的工人群众都卷入了总罢工浪潮。下午3时,巴黎万森林荫大道左边聚集由勃鲁姆、茹奥率领的社会党和总工会的游行队伍,右边聚集着由加香、杜克洛率领的共产党和统一总工会的游行队伍。两支队伍同时向民族广场挺进,声势浩大。两支队伍中都有人高呼“统一、统一”。这次总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统一行动的愿望和作用。

[三大党的联合与人民阵线的正式成立]1934年5月,法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完成了策略转变,对与社会党的联合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对此,社会党领导人最初疑虑重重,但还是接受了联合行动的呼吁。6月11日,勃鲁姆、齐罗姆斯基和法共的多列士等人举行了第一次会晤。7月14日,勃鲁姆、富尔和多列士、加香又进行了一次恳切的会谈。7月27日,两党代表在巴黎签订了《统一行动公约》,相约共同反对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在统一行动中,两党均应互相节制,停止攻击和批评。《统一行动公约》的签订奠定了两大无产阶级政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团结统一的基础,迈出了人民阵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为组成坚强的反法西斯屏障,必须扩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此,积极争取与在农民和中间阶层中有巨大影响的激进党的联合,便成为建立人民阵线的另一重要步骤。

勃鲁姆是较早主张建立联盟者之一。他在1934年2月6日的议会发言中就号召全国的共和派组成一个联盟,反对法西斯。而共产党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多列士在10月底公开号召建立一个劳动、自由与和平的人民阵线。

与此同时，统一行动协调委员会中的法共代表提出了建立联盟的纲领。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法共提出的纲领中排除了所有可能刺激中产阶级的经济条款，并采纳了一些激进党纲领里的内容。法共的这些姿态对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联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35年1月18日，由人权同盟主席维克多·巴什主持在巴黎举行了反法西斯集会。勃鲁姆、加香和部分激进党人代表都出席了大会。5月，法国举行市政选举，社会党和共产党取得了重大胜利。激进党受挫，加剧了内部的裂痕。激进党为确保自己在选举中的地位，并由于党内外压力的影响，接受了人民联盟的主张。达拉第表示：我代表小资产阶级。我声明，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天然的同盟者。至此，左翼三大政党在人民阵线问题上趋向一致。

6月8日，反战反法西斯全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在7月14日举行示威的号召，呼吁各左翼政党和组织参加，使7月14日成为显示法国人民团结力量的日子。7月14日上午，69个党派团体的1万名代表在布法罗体育场集会，并进行庄严宣誓，“决心为给劳动者以面包，给青年以工作，给世界以和平而斗争”。下午2时，在红旗和三色旗指引下，约有50万人在巴黎参加了游行。多列士、勃鲁姆和达拉第并肩前进，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同日，各地也都举行了大规模游行。7月14日的集会和游行，标志着法国人民阵线的正式成立。

二、勃鲁姆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

[选举胜利与勃鲁姆组阁]1936年1月，参加人民阵线的98个组织通过了《人民阵线纲领》。该纲领的主要内容是：解散各种法西斯组织及其武装，宣布政治大赦，消灭失业和农业危机，改组法兰西银行，军事工业实行国有化，对外实行法苏友好，建立集体安全等等。这一纲领较为充分地反映了工人、农民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因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同时也为人民阵线左翼政党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的获胜奠定了基础。4月26日至5月3日，法国举行议会选举。在第一轮选举中，各党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选举结果，右翼政党占423.3万票，左翼政党为624.1万票，其中激进党、社会党的票数有所下降，法共的票数大增。4月27日，社会党、激进党和共产党联合号召在第二轮选举中投人民阵线共同候选人的票。法共为争取人民阵线候选人的胜利，撤销了自己的一些候选人，并提出“一切为了人民阵线”的口号。在第二轮选举中，人民阵线各党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议院共占376席，而右翼各派只占238席。社会党以147席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团。

人民阵线的选举胜利，特别是社会党成为议会中的最大党团，使勃鲁姆踌躇满志。他在5月5日《人民报》发表的《社会党已准备就绪》中自豪地说：“社会党不仅成为多数派中最强大的党团，而且在整个议会中也是最强大的”，“所以我们坚定地、刻不容缓地宣称，我们已准备好充当属于我们的角色，即组织和领导人民阵线政府”。6月4日，勒布伦总统委派勃鲁姆组阁，早已作好准备的勃鲁姆欣然接受，并于次日组成了第一届人民阵线政府。勃鲁姆也由此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党人总理。

[五月罢工浪潮]勃鲁姆上台之际，一场规模前所未有的罢工运动正席卷全国。

1936年5月11日，勒阿弗尔的布勒凯工厂800名工人为抗议厂方解雇两名工人宣布罢工，由此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五月罢工浪潮。罢工很快扩展到全国各地的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在五月浪潮期间，全国发生了12,000次罢工，罢工人数达200万人。这次大罢工的特点是范围广泛，许多过去从未发生过罢工的行业这次也卷进了罢工浪潮。同时出现了新的罢工方式——占厂罢工，占领工厂的罢工工人就象过节似地在车间里聚餐和跳舞。这次罢工既是自发的，又是有组织的。两大工会的统一和人民阵线选举的巨大胜利强有力地推动了这次罢工浪潮。

罢工工人在五月浪潮的斗争中有着双重目的，一方面是反对资本家转嫁经济危机，迫使资方答应罢工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勃鲁姆过份拘泥于法律程序，在大选获胜后迟迟不上任表示不满，想敦促勃鲁姆立即组阁，尽快实施人民阵线纲领中提出的改革措施。

五月浪潮规模之大，不仅使资产阶级惊恐万分，使即将执政的勃鲁姆也大为震惊，甚至连法共和总工会的领导人也深感意外。在这种局势面前，一些人过高地估计了形势，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托派分子也趁机到处煽动说：法国的革命开始了。其实当时法国并未具备革命的条件。因为在这次罢工浪潮中并没有提出革命的口号，只提出一些具体要求。罢工缺乏统一组织，各工厂、各地区的罢工工人往往自行其是。工人占领工厂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挫败资本家策划总辞退的阴谋，同时也为了防止工贼进入工厂，只有极

少数工人想占领工厂后由自己管理工厂。而且罢工没有涉及整个工人阶级，罢工的工人、职员只有 200 万，而当时工人、职员的总人数约有 700 万。当时法国社会中占据多数的农民和中产阶级没有发动起来，工人阶级若走得过远就会陷于孤立。

〔勃鲁姆的社会改革〕勃鲁姆上台后，为消除危机的后果，从 1936 年夏季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积极调整劳资关系，为即将着手进行的其他社会改革提供较稳定的社会秩序。

勃鲁姆上台之际，正是五月浪潮迅猛发展之时。罢工虽然迫使资本家作出暂时让步，但混乱状态仍在继续，这既不利于“行使政权”，也会给法西斯分子以可趁之机，最终影响人民阵线纲领的贯彻。因此，勃鲁姆政府上台之初就百般努力，在劳资双方中间进行调解，促使法国雇主协会和法国总工会于 6 月 7 日夜在总理府马提尼翁宫签订了一项协议。主要内容是订立集体合同，承认工人加入工会的权利，提高工人工资。然而，只有《马提尼翁协议》并不能解决劳资关系问题。事实上罢工浪潮仍没有平息。因此，勃鲁姆政府在 6 月 24 日向议会提出集体合同法案，给《马提尼翁协议》中达成的条款提供法律保证，以求借助立法手段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新的劳资关系原则。该法案通过后，签订集体合同的数字猛增。这一法案的通过，虽然没有象茹奥所说的那样，开创了“工业关系中的新时代”，但毕竟在法律上正式承认了无产阶级可以有组织地同资本家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开始改变过去企业主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同时强化了政府对企业事务的干预。此外它还提高了工会的地位，有利于工会的发展壮大。

第二，提高人民群众的社会福利待遇，改善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为此，勃鲁姆政府向议院提交了关于带薪休假的法案，规定工人或雇员在企业中连续任职一年后每年有权享受 15 天带薪休假。政府在与铁路部门协商后使带薪休假者及其家属在休假期间可以享受半票或优惠乘坐特快列车。8 月酷暑，成千上万的工人平生第一次乘坐着汽车、火车，或骑着自行车涌向海滨避暑胜地休假。昔日梦寐以求的奢望而今成为现实，喜悦之情可想而知。一个老工人特意给勃鲁姆写信说：因为您，我看见了大海。同时，还通过了 40 小时工作周法案，使工人们实现了长期以来所要求的缩减工作时间，降低劳动强度的目标。

第三，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勃鲁姆政府还采取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7 月 21 日，政府向议院提交了关于大工程计划的法案。该计划的首要目标是能够吸收失业工人参加工作，减少庞大的失业队伍。政府还拨款帮助奄奄一息的中小企业重新开工，以容纳一部分失业工人。

政府还改组了法兰西银行。法兰西银行是私营银行，从创建以来一直充当中央银行的角色。可是银行却操纵在“二百家族”手里。这些垄断巨头通过银行用各种手段影响政府的财政政策。改组后，银行组织了一个有关各方代表（包括政府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取代原有的董事会对银行进行管理。这样，尽管银行性质上仍属私营，但国家对它的控制较之过去大为加强。

此外，勃鲁姆政府还对军火、飞机制造等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并设立国家小麦管理局，加强国家对农业生产的干预。

〔勃鲁姆政府的失策与失败〕勃鲁姆的社会经济政策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各种棘手问题接踵而来，尤其是财政问题更为突出。

勃鲁姆几经努力，却奏效甚微。

勃鲁姆政府在法国财政状况极为困难之时，进行规模巨大的社会改革，显然是无法承受的。政府在振兴经济方面并未取得预定的成功，经济的不景气未能改变财政的窘迫，而资金匮乏又反过来影响许多改革措施的实施，如大工程计划就是如此。而“资本固积”、“资本外逃”却日益严重。本来政府可以通过限制或禁止购买外币来尝试减少资金外流，但又担忧此举危害“信任的环境”和招致英美政府的反对，迟迟不敢实行兑换控制，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勃鲁姆政府不可能为大资产阶级创造信任环境。结果外逃的资金不但没有收回，反而越逃越多。资本外逃引起黄金储备紧张，进而削弱了人们对法郎的信任，使人们担心法郎贬值。尽管勃鲁姆政府在上台后几个月为避免贬值作了许多努力，但在9月还是被迫宣布法郎贬值。

法郎贬值与不干涉政策严重地影响了勃鲁姆政府的声望。在这种形势下，勃鲁姆不得不在1937年2月13日的广播讲话中宣布“暂停”改革。对《马提尼翁协定》耿耿于怀的资本家此时气焰嚣张，要用“资本的罢工”来报复“占厂罢工”。财政危机的愈益严重迫使勃鲁姆试图采取强制手段。6月15日，勃鲁姆举行内阁紧急会议，决定请求议会授予发布“一切必要措施”的法令的暂时权力，以应付财政危机。这一要求在保守势力极为强大的参议院被否决。勃鲁姆政府被迫在6月21日提出辞职。经过法郎贬值、宣布暂停、被迫辞职的“失败三部曲”，“勃鲁姆试验”宣告结束。

三、人民阵线的瓦解

〔人民阵线的内部矛盾〕人民阵线虽然有共同的纲领，但它是各左翼政党、政治派别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了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暂时结成的广泛联盟。这些党派同时有着自己的政治纲领、目标主张。它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各有所求。因此，相互间的摩擦、矛盾在所难免。从人民阵线的组织构成来看，主要存在着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党分别代表的左中右三极。处于中间位置的社会党领袖勃鲁姆试图在左右两极间搞折衷平衡。事实证明勃鲁姆没有、也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勃鲁姆虽然有时也得到了左右两极的共同支持，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取悦了左边，惹怒了右边，或者取悦了右边，惹怒了左边。更糟的是有时还遭到左右两极的共同反对。如为了行之有效地行使政权，平息罢工浪潮，解除经济危机的后果，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由国家对生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尽管勃鲁姆极尽能事，避免在这方面刺激激进党，但仍然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安，并不时招致他们的反对。又如在西班牙事件中，勃鲁姆屈从于英国和右派的压力，并且为了避免激进党的强烈反对而导致人民阵线的破裂，被迫放弃援助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计划，转而实行不干涉政策。此举虽然维持了和激进党的关系，却又引起了共产党的极大不满。人民阵线内部的矛盾分歧极大地削弱了勃鲁姆人民阵线政府的力量和地位，成为“勃鲁姆试验”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矛盾的激化〕勃鲁姆辞职后，勒布伦总统根据勃鲁姆的提议，授命原副总理、激进党人肖当组阁。前内阁的大部分部长仍留任，勃鲁姆本人也担任了新内阁的副总理。肖当上任后，对内继续实施“暂停”措施，并宣布法郎再次贬值。法郎再次贬值后，生产虽有一些恢复迹象，但引起了物价的不断上涨。外交上，肖当内阁继续追随英国推行绥靖政策。

肖当内阁的内外政策引起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大不满。从9月起重新出现了占厂罢工浪潮。12月，巴黎也出现罢工，政府竟派遣军队驱赶。为此，被激怒了的工人在整个巴黎地区举行罢工，并很快扩展到全国。12月底，巴黎公用事业部门举行总罢工，整座城市一度停止煤气、电力供应，公共交通陷于瘫痪。1938年1月14日，肖当在议会中大肆诋毁工人的罢工，并对共产党横加指责。共产党议员当即驳斥了肖当的指责，并拒绝投政府的信任票。与此同时，社会党议会党团命令社会党人部长退出政府。次日，肖当内阁宣布辞职。1月18日，肖当再次组阁。肖当第二届人民阵线内阁仅维持了两个月，内政外交四处受挫，不得不在3月10日再次辞职。

3月13日，勃鲁姆第二次受命组阁。他试图建立“从多列士到路易·马兰”的联合内阁，未能成功，只得组成由社会党、激进党等党派组成的新内阁。4月1日，勃鲁姆要求议会授予政府财政全权，以便实施财政措施。这一要求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但却被参议院否决。4月8日，执政仅26天的勃鲁姆第二届人民阵线内阁宣布辞职。人民阵线已经名存实亡。

〔达拉第上台与人民阵线的彻底瓦解〕4月10日，达拉第受命组阁。达拉第最初试图组成一个从“勃鲁姆到路易·马兰”的联合内阁。社会党全国委员会讨论决定拒绝入阁。于是，达拉第组成了由激进党和中派、右派人士组成的新内阁。达拉第为了骗取左翼政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声称他仍然忠于人民阵线纲领。4月12日，新内阁以573对5的悬殊票数获得议会的信任，共产党也投了信任票。4月13日，新内阁又在议院取得财政全权。在

这之后，达拉第以恢复经济为名义开始实行与人民阵线纲领大相径庭的政策。5月，颁布了第一批非常法令，把主要由群众承担的直接税和间接税增加了8%，而同时却降低了大工商企业的利润所得税。还再次宣布法郎贬值。8月21日，达拉第又宣布40小时工作周可以灵活掌握，意欲取消40小时工作周制。其后又颁布了一系列危害劳动人民利益的法令。

由于达拉第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日益背离人民阵线纲领，引起共产党、社会党和其他左翼党派的强烈反对。而激进党也千方百计地寻求机会断绝与人民阵线的关系。10月28日，激进党在马赛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以法共给历届人民阵线政府制造困难和危害人民阵线其他政党的团结为名，通过了赞成达拉第政府并同人民阵线断绝关系的决议。11月10日，激进党正式宣布退出人民阵线。面对着达拉第政府的进攻，11月30日，在共产党和总工会的领导下举行了24小时总罢工，抗议达拉第政府的非常法令，参加者达数百万。达拉第政府竟然宣布全国戒严，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并大肆迫害共产党。至此，人民阵线彻底瓦解。

法国人民阵线运动虽然被破坏了，但是它在30年代有效地动员了法国各阶层的进步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确保了共和制度的继续存在，使法国没有步意德的后尘走上法西斯道路。它还为人民群众争得了一些基本权利，改善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它还为法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为当时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因此，人民阵线运动的历史进步意义和作用巨大的。

第三节 30年代的对外政策

一、30年代前期的法国外交政策

〔法德矛盾的加深〕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国际局势愈益动荡的形势中，法德矛盾更形尖锐。法国力主维护凡尔赛体系，竭力阻遏德国。然而，法国统治集团中部分极右势力对希特勒的反苏反共姿态又颇为欣赏。所以，面对纳粹的崛起，法国统治集团处于矛盾而复杂的心理状态中，既恐惧不安又暗自欣赏。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法国对德政策的两面性。

30年代初法国继续奉行对德强硬的外交政策，这突出地表现在裁军和德国要求“军备平等”的问题上。早在1932年，巴本政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就正式提出“军备平等”。希特勒上台后赋予这一要求新的含意，即公开场合上打着裁军的幌子，以受欺负的弱者面目出现提出军备平等的要求，暗地里却无视《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备的限制，加紧扩整军备。法国深知德国的意图，因此在裁军会议等场合对德国军备平等要求持严厉态度，始终坚持把裁军和德国军备平等问题同法国的安全保障联系起来，不愿对德作出重大让步。法国代表在裁军会议上先后提出的塔迪厄计划、赫里欧—保罗·邦库尔计划等裁军方案，都说明法国意欲通过国联来抑制德国的扩军要求。1933年10月，德国为放手扩整军备，宣布退出裁军会议和国联。对此，法国反应十分强烈。

〔巴尔都建立集体安全的努力〕1934年2月9日，路易·巴尔都出任第二届杜梅尔格内阁的外交部长。巴尔都在政治上虽属保守派，却颇具国际战略眼光。他是法国部长中屈指可数的几个读过《我的奋斗》的人之一，他看到了纳粹的危险，曾指出应当及早对纳粹德国采取有力措施。因此，他力主独立自主的实力政策，反对削减军备开支，主张维持强大的陆军，同时又在国际上致力于建设和巩固抗德联合战线。

巴尔都认为法国的安全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安全密切相关，保卫法国和防止法西斯危险应当依靠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同盟体系，同时也要与苏联结盟和维护法英合作。1934年4月，巴尔都照会英国政府，提议共同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英国政府对此反应冷淡。在这种情况下，巴尔都未囿于自己保守的政治见解，立足全局，转向积极与苏联结盟，把苏联拉入法国在一战后同东欧一些国家建立的条约体系之中。同年5月，巴尔都建议苏联政府签订两项条约：东方条约（或称东方洛加诺公约）和法苏互助条约。苏联同意了这两项条约的草案。为建立东方洛加诺，巴尔都风尘仆仆，遍访波、捷、罗、南诸国，四处奔走呼号，获得成功。此外，巴尔都还提出缔结“地中海洛加诺公约”的主张，由南斯拉夫、希腊、意大利和法国参加。主张亲法的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前往法国与巴尔都商谈，在10月9日抵达马赛。当天，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都双双被民族主义分子刺杀。

巴尔都的强硬外交和建立集体安全的努力是法国传统外交在30年代前半期的继续，同其继任者们后来的政策迥然相异。巴尔都的去世，标志着法国抗衡德国，称雄欧陆的外交时代的终结。

二、法国的绥靖政策

〔赖伐尔——法国绥靖政策的始作俑者〕1935年1月7日，赖伐尔首次访问罗马，访问期间与墨索里尼会谈四次。双方订立了法意协定，主要内容是：法国将法属领地乍得的114平方公里、索马里的800平方公里，其中有22公里的海岸线以及突尼斯的一块不大的地方让与意大利，意大利则在突尼斯的意侨民国籍问题对法让步。从墨索里尼的侵略计划来看，这条海岸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这一协定为意大利在非洲的侵略活动开了方便之门。赖伐尔还允许墨索里尼在埃塞俄比亚有放手行动的自由，实际上等于怂恿意大利侵埃。

1935年6月至1936年1月，赖伐尔任总理。在整个意埃战争期间，赖伐尔采取了实质上亲意的“中立”立场。1935年12月，赖伐尔还伙同英外务大臣霍尔在巴黎秘密缔结了出卖埃塞俄比亚的协定，扮演了一个为虎作伥的角色。在萨尔归属投票问题上，赖伐尔竟然在投票前两天以一种局外人的口吻声称：法国对全民投票的结局不感兴趣。这种冷漠的态度无疑是在鼓舞希特勒德国。使他们的气焰更为嚣张，以至在该地区归并德国后，公开在纳粹报刊上要求收回根据《凡尔赛和约》让出的全部“德国地区”。

赖伐尔是引导法国步入绥靖主义歧路的始作俑者。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屈从于法西斯国家，在某些问题上还不得不继续奉行法国的传统政策，摆出对德强硬的姿态。如1935年8月德国宣布建立空军，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后，立即提出抗议，并向国联控告德国，要求实行集体制裁。又如同年4月倡议建立“斯特莱沙阵线”，5月代表法国同苏联正式签署了酝酿已久的法苏互助条约，并亲访莫斯科。

〔莱茵区重新军事化〕1936年3月7日，德军悍然进占莱茵河左岸的非军事区，从而完成了毁约扩军的一个必经步骤。德军进驻莱茵震动了法国。法国萨罗内阁在3月7日至9日连续开会，研究对策。一部分阁员强烈要求采取一次“警察行动”来回击德国另一部分阁员则顽固反对实行对德制裁。内阁的决议最后是：在国联未作出决定之前，法国不采取任何行动。萨罗一面在广播演说中声称：我们不准备把斯特拉斯堡暴露在德国大炮炮口底下。一面却叫人们“保持平静”。军方的态度也很暧昧。

当时，德国刚刚开始扩充军备，人数和装备都不如法国。法国不用英国援助，只靠自己的军队就能把德军赶出莱茵区。事实上，进入莱茵区的德军奉有密令，一遭法军采取敌对行动就立即撤回。希特勒后来自己也说：“进军莱茵区以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如果当时法国人也开进莱茵区，我们就只好夹着尾巴撤退。因为我们手中可资利用的那一点点军事力量，即使是用来稍作抵抗也是完全不够的。”可是，法国却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只是将此诉诸国联，要求洛加诺公约各签字国磋商行动，并建议实行经济制裁。最后取得的不过是一纸口头“谴责”的空文。法国实际上已向希特勒的冒险挑战屈服。

法国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加速了其同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德国开始在西部边界修筑齐格菲防线，加紧扩军备战活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后，法国在对外政策方面开始日益唯英国马首是瞻，表现出越来越浓重的妥协和绥靖色彩。

〔勃鲁姆政府的“不干涉政策”〕勃鲁姆上台不久，西班牙内战爆发。7月19日夜，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总理吉拉尔给勃鲁姆发电求援。勃鲁姆在次日看到电报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开会，决定援助西班牙政府。为了避免德意及国内右派利用此事兴风作浪，与会者商定尽量不让此事公开。7月22日，勃鲁姆偕外长德尔博斯前往伦敦参加法英比三国总理和外长会议。会议并未讨论西班牙问题，但这次伦敦之行却对勃鲁姆影响很大。英国当时执政的是鲍尔温保守党政府，他们对人民阵线原本就十分反感。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外，英国仗着有利的天然屏障，自忖只要保持海空优势就能确保平安，所以仍坐视德国重整军备，并图谋以此平衡法德势力，保证英国在欧洲的仲裁地位。因此，英国政府一开始就决定在西班牙内战中采取“中立”政策。由于勃鲁姆把加强国联和集体安全的希望寄托在加强法英关系上，不愿为此同英国搞僵。所以，英国政府对勃鲁姆政府准备支持西班牙政府的决定的不合作，甚至是反对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勃鲁姆在西班牙问题上的决策。此外，勃鲁姆准备援助西班牙政府的行动在国内也遭到了右派舆论的猛烈攻击和竭力反对。更有甚者，议会和内阁里许多激进党人对此采取了强烈的反对态度，甚至以退出政府来要挟。

从7月25日开始，勃鲁姆内阁在3周内召开了三次内阁全体会议，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干涉政策，并终于扮演了推行不干涉政策的带头羊的角色。8月2日，法国政府在与英国政府协商后，建议所有欧洲国家严格执行不干涉西班牙事务的政策。5月15日，法英互换照会，相互承担义务，不向西班牙或其属地输出武器和军用物资。到9月3日，共有25个国家接受了英法的建议，这样共有27个国家缔结了不干涉协议。为监督协议的执行，9月9日，各国又在伦敦成立了不干涉委员会。

不干涉政策是一种失败的政策。尽管德意加入了不干涉委员会，仍源源不断地向叛乱者输送武器。而西班牙合法政府却因为这一政策被剥夺在国际市场购买武器的合法权利。这一政策对法国也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在国内，不干涉政策引起了作为人民阵线三大支柱之一的共产党及广大人民群众的莫大愤慨，使人民阵线因此而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其次，法国与德意毗邻，处境原已十分艰险，不干涉政策导致在西班牙出现一个受德意支持和控制的独裁政权，更使法国处于三面受敌的困境，同时又面临着被切断本土与北非属地的联系的危险。再次，欧洲其他国家目睹法国听凭德意支持佛朗哥在西班牙篡权而不问，对法国早已有之的不信任感愈益加深，纷纷另寻出路，法国自一战结束以来苦心经营的同盟体系终于分崩离析。

〔达拉第与慕尼黑会议〕1937年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形成，为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扩大侵略作好了准备。不久，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紧接着又把矛头直指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根据1925年法捷互助条约，法国有义务在捷受到德国进攻时立即提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法国外交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当时法国政府内部四分五裂，以雷诺、曼代尔为代表的强硬派力主采取坚定立场，而以庞纳为代表的妥协派则坚持采取忍让态度。达拉第动摇于两派之间。危机初期的达拉第出于法国切身利益的考虑和法捷互助条约的约束，曾有过履约援捷的打算，也曾有过一些强硬的表示。但在绥靖势力的压力下，终于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越滑越远。

9月危机中，达拉第紧急约见英驻法大使，要求张伯伦火速同希特勒谈判。9月15日，张伯伦屈尊与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会晤。18日，英法两国

总理在伦敦举行会议，次日向贝奈斯政府发出建议捷满足希特勒要求的联合照会。21日，又警告贝奈斯政府说：如果因拒绝英法建议而导致德捷战争，英法将不给捷以任何援助。捷政府在同日下午照会英法政府，“以沉痛的心情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经过英法和德国之间反复的讨价还价，9月29—30日，张伯伦、达拉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开会并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慕尼黑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幕丑剧，也是英法等国纵容纳粹侵略的绥靖政策的高潮，由于达拉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其可耻的角色，使他成为法国30年代绥靖政策的集大成者，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三、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

〔绥靖政策的破产与法英苏三国谈判〕《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才5个半月，希特勒就制造借口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的这一行动极大地震动了欧洲各国人民，使更多的人从和平的幻想中醒悟过来，也进一步证明了绥靖政策的破产。英法两国统治集团内部反绥靖派对张伯伦、达拉第之流的攻击日益加强。至此，张伯伦政府在强大的压力下开始逐步改变自己的政策。1939年3月21、22日，法英两国政府在伦敦商定一旦发生对德战争，两国相互支援，并用互换照会的形式达成了在战时互相援助的协定。这样，两国虽然没有正式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但已经建立了事实上的军事同盟。不久，法国又同英国一起对波兰等国提供保证。为加强战备，法国不断增加军备开支。4月9日，将大西洋舰队调往地中海，加强其在突尼斯和法属索马里的军事力量。

同时，法国还同英国一起加强与苏联的接触。三国从4月份起进行政治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苏联答应得到英法保证的国家遭到德国侵略时提供援助，如果波罗的海国家的中立遭到破坏时，英法苏三国应给予援助。英法以爱、立、拉三国不愿接受援助为借口，在谈判中一直回避对这些国家提供保证。为了打破政治谈判中出现的僵局，苏方于9月9日建议在政治谈判达成协议之前举行军事谈判，英法同意。苏联派出了以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率领的、具有全权的高级代表团，而英国代表团团长德拉克斯只是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法国代表团团长杜芒克只是一位兵团司令，两人都没有签订军事协定的全权证书。8月11日，英法代表团搭乘客货轮到达莫斯科，次日开始军事谈判。在军事谈判中需要详细规定相互援助的方式、军队数量等问题，但英法首席代表声称他们此行只是讨论一般原则，极力回避具体细节的讨论。此外，苏联要求英法与波兰、罗马尼亚磋商，允许苏军在援助时过境，也遭到英法代表的多方推拖。8月21日，伏罗希洛夫发表声明，说苏联对英法是否真正有同苏联进行军事合作的愿望表示怀疑，英法应对军事谈判的拖延和中断承担责任。三国谈判遂告破裂。8月23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法国走向战争〕英法的“绥靖政策”助长了法西斯的气焰，希特勒调兵西进，向波兰开刀。9月1日凌晨，德国大批陆、空军分三路向波兰发动突然袭击。9月2日，达拉第明确宣布法国准备通过“自由谈判”和平解决冲突，遭到希特勒拒绝后，法国被迫于9月8日下午5时向德宣战。

第四节 30年代的法国社会和科技文化

一、30年代的法国社会

〔人口状况〕30年代的法国人口基本稳定在4100万至4200万之间，略呈增长趋势。据统计，1936年至1938年间人口约增加5万人。可见法国人口的增长率是十分缓慢的，而出生率更是日益下降。1911年，法国每户家庭平均有1.97个孩子，1926年为1.82个，1931—35年减少到只有1.65个，1936—38年更减少到1.48个。出生率之低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首。导致法国人口出生率下降除了历史的原因外，还在于：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约有140万男子在战争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青年男子，形成法国人口史上明显的出生率低谷期。到了30年代，特别是30年代的中后期，这一低谷时期出生的人相继进入结婚生育年龄。由于他们人数奇少，因而必然导致整个法国出生率的普遍下降。第二，一战后，特别是20年代中后期的相对繁荣使第二、三产业大大发展，大批农民进城做工，农村人口减少，而工人为了确保和提高一定的生活水平，所生子女往往要比农村居民，尤其是西部和中部的农民家庭要少。第三，30年代经济大危机造成大批工人和职员失业，失业青年中已到结婚年龄的青年人由于生活拮据无法结婚，这就促使法国结婚率大大降低。1926—30年法国新婚人数为339,400人，1931—35年下降为308,200人，1936—37年则只有276,100人。结婚率的降低不可避免地引起出生率的降低。

法国人口增加的极度缓慢使人们惊叹“法国人越来越少了”。从1900—39年，法国的人口只增加了3%，而同期德国增加了36%，意大利增加了33%，英国增加了23%。美国甚至增加了72%。人口资源的严重不足极大地影响了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法国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阶级状况〕30年代法国社会的主要阶级是农民、工人、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

农民。法国农村人口约占法国人口的一半和就业人口的1/3。与欧洲其他工业国家相比，农业在法国仍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农民绝大多数是自耕农，拥有大小不等的土地。此外也有一部分农业雇工。30年代危机对法国农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危机使农产品价格猛跌，农民收入锐减，再加上工农业产品间的剪刀差不断扩大，引起农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大批自耕小农破产。随着危机的加深，农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不断进行各种抗议活动。由于农民在选民中占据极大比例，左右翼政党都想利用农民的不满和愤慨。社会党在1933年建立了全国农民联合会，右翼政党则在农民中间大肆宣扬“合作主义”。法西斯组织也趁机在农村网罗追随者。

工人。法国城市人口在1931年占全国总人数的51%，1936年增至52.5%。城市人口中人数最多的是工人。法国的工人阶级与农民不同，较早具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富有革命传统。危机使工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引起广大工人的失望和不满。因此，危机年代里工人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但是，工人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内部构成极为复杂，一般分为高级技工、熟练工人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粗工三类，他们之间的工资待遇有着明显的差别，因

而社会地位也有所不同。特别是一战后，工人阶级中大量来自农民的新工人和外籍劳工，使工人阶级的内部构成更趋复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斗争性。

中产阶级。30年代时法国中产阶级的人数相当可观。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性极大，其内部构成较之工人更为复杂。它包括小厂小店的老板，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金融和商业团体的雇员和从事教育、医疗和司法的自由职业者。中产阶级是30年代危机的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但由于他们成分复杂，使他们无法形成一支统一的阶级力量，共同斗争，而往往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追随不同的政治派别。

大资产阶级。处在法国社会顶层的是大资产阶级，其成员既有施奈德等老的大亨，又有雪铁龙等新的巨头。他们人数不多，势力极大。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已在逐渐放弃政治，而实际上只是从政治前台转移到后台，利用手中的经济实力影响甚至左右政权。法兰西银行是他们的坚实堡垒。30年代危机对大资产阶级虽有影响，但冲击不大。他们除通过垄断组织进行调节外，还得到了右翼政府的有效保护。此外他们还在危机期间收买和兼并了大批破产和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进一步扩大了垄断的范围。

二、科技与文化

〔自然科学〕法国 30 年代自然科学研究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下降，整整十年只获得一项诺贝尔化学奖，不过，法国在某些研究领域仍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最为突出的是原子物理学和现代数学。

1930 年，科学界还不知道有中子存在，当时德国科学家玻特和贝克用钋放出的射线轰击由轻原子铍、铝、锂、硼等做成的靶子，再用铅板吸收掉钋的粒子，发现了一种穿透力极强的奇特的射线，当时有人认为它是射线，约里奥·居里夫妇在以钋为射击源轰击铍时发现射出的射线比射线更强，所以它不可能是射线。这一实验对于中子的存在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1932 年，英国科学家查德威克重复了这一实验，并发现了中子。中子的发现对人类正确了解原子核结构奠定了基础。1934 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又用钋的粒子轰击硼、铅、镁的靶子。观察的结果表明，除产生中子以外，靶本身也开始发射正射线。他们指出这是一种新型放射线。这是本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第一次利用外部的影响引起某些原子核的放射性——人工放射性。用人工方法获得放射性元素是人类改造微观世界的一个突破，为同位素及原子能的利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35 年，约里奥·居里因这一发现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20 年代后期，法国一些青年数学学者深感当时国内数学研究的领域过于狭窄，学术思想保守，数学界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决心大胆突破旧框框的束缚，复兴法国的数学科学。在著名数学家阿达玛及后来的儒利雅主持的“论文分析”讨论会上，他们了解到当时国际数学界的最新进展，眼界大开。1934 年冬，在儒利雅主持的讨论班上，年轻的数学家们开始拟定一个庞大的计划，即以出版丛书的形式来概括现代数学的主要思想。他们决心运用公理化方法，以数学结构作为分类的基本原则，撰写巨著《数学原理》，并统一以“布尔巴基”作为笔名。1939 年出版了第一卷，至今共出了 40 多卷，仍未宣布完毕。由于布尔巴基学派运用联系的、整体的观点考察现代数学，揭示了其内在联系，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数学本质的认识，大大促进了现代数学的发展。布尔巴基的名字也风靡整个数学界。

〔史学——年鉴学派的确立〕1929 年，吕西安·费弗尔与马克·布洛克在他们共同执教的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年鉴”的创刊标志着年鉴学派开始形成。30 年代是年鉴学派的确立时期，以费弗尔和布洛克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想展开了对传统史学的全面进攻，并在与旧史学的论争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年鉴学派在 30 年代就已具备该学派的 5 个基本特征：（1）思想理论来源的多元性；（2）研究方法的多样性；（3）史料来源的多样化；（4）研究领域的多样化；（5）注重加强历史研究和社会现实的联系。

年鉴学派在 30 年代以批判传统史学、制造舆论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在《经济与社会历史年鉴》杂志上还辟有“辩论与斗争”专栏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争论，但同时更为重视通过具体实在的研究成果来扩大学派的影响。如布洛克的两部名著《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质》（1931 年）和《封建社会》（1939—40 年）就是在 30 年代问世的。1933 年费弗尔被选入法兰西学院和 1936 年布洛克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经济史教授，标志着年鉴学派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文学创作〕危机的冲击与战争威胁的加强，使法国作家在这一时期面临着严峻的选择。阿拉贡、艾吕雅等著名作家、诗人先后离开超现实主义运动，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直接投身于革命斗争。更多的作家则为人类的前途担忧，并由此进行自己新的探索。他们的小说不再是仅仅为了供读者得到某种消遣，而是力求表现人类在世界上的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下应当采取的态度。一大批“人类处境”小说应运而生。“人类处境”小说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试图在真实记录人类处境的基础上，揭示“处境是艰难的，但只要人们行动，就一定会取得人生的价值。这类小说主要以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1933年）和《希望》（1937年）为代表。第二种则是悲观型，小说中的人物常常在艰难的处境面前得不到自由，这类小说以塞利纳的《长夜茫茫的旅程》（1932年）为代表。

多卷本长篇小说的写作在30年代继续流行，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茹勒·罗曼的《善意的人们》。马丹·杜加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蒂博一家》在30年代继续陆续出版，1937年，杜加以该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法国现代著名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季奥诺、埃梅等人在30年代都不时有佳作问世。如莫里亚克在1932年发表的《盘缠在一起的毒蛇》被认为是他的最佳作品之一。季奥诺在1934年和1935年出版的《四海之歌》、《愿我的欢乐长存》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埃梅在193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绿色母马》是二战前法国最畅销的小说。此外，萨特在1938年发表日记体小说《恶心》，开创了法国存在主义文学。

第十五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国

第一节 二次大战的爆发和第三共和国的覆灭

一、“奇怪战争”期间的法国

〔“奇怪的战争”〕法国宣战后，总理达拉第即发布《致国民号召书》，号召人民“奋起反抗”，“履行诺言”，“为保卫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家园、我们的自由而斗争”。

事实上，法国却宣而不战。从1939年9月8日到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全面进攻止，西线并没有象样的军事活动。西方报纸几乎天天报道“西线无战事”的消息。对于这种奇特的军事局面，当时法国人称之为“奇怪的战争”。

在这段时期里，法国在军事上公然违背对波兰的保证，在德军大举进攻波兰后二天，才迟迟宣战。宣战后六天，9月8—9日，法国才出动一些先头部队渗入德国领土，同前沿德军有所接触。但深入德国领土不过18公里。9月12日，法军指挥部又发出停止进攻的密令。10月16日，德军首次出击，法军随即撤回原来阵地，连象征性的进攻也停止了。英、法军队静守在马其诺防线钢筋水泥工事后面，警戒的哨兵面对德军阵地，眼看他们装卸辎重枪炮、挖工事，也丝毫不去打扰他们，守兵既不进行军事训练，又不挖战壕，而是躲在工事里听音乐、下棋、写家信或情书。同时，法国还特别害怕德国的空中优势，从战争一开始就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引起德国报复性的打击。偶而起飞，也只投下成吨的传单。这种军事史上的咄咄怪事，解除了德国的后顾之忧。助长了德军的反动气焰。

但是，在海上却有比较激烈的争夺。英法海军从海上对德国进行封锁，德国则发展潜艇战术，以有限的力量突破英法的封锁。法国为切断德国的铁矿和石油供应线，企图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开辟一个战场，通过挪威、瑞典、芬兰攻击德国的后侧。早在苏芬战争期间，法国就打着“援助芬兰”的旗号，准备派遣远征军团5万人，并企图轰炸苏联的巴库和巴统，以达到压德反苏的目的。1940年4月，法、英联盟军在挪威与德国开始争夺战。10—13日，英军在纳尔维克展开海战。12日，法远征军在挪威登陆，一度攻占纳尔维克。6月初，因法国形势危急而被迫撤退。

〔外交上的孤立和国内危机〕“奇怪战争”期间，法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地位。法国盟国波兰，在希特勒打击下，三星期内即遭覆亡。“小协约国”罗、捷、南实际上已经瓦解，法国同他们的盟国关系也早已破灭。1939年8月苏德条约的签订，使法苏互助条约宣告废除，法国直接受到德国进攻的威胁。法国的北邻比利时，名义上是“中立国”，实际上对法国心有戒备。为避免德军的进攻，迟迟不向英法提出军事援助，不让盟军先进驻比境。英国虽然与法国早结军事同盟，可是却松散无力。英法对德宣战后，既无共同的作战参谋部，又无统一的作战计划。只是到11月中旬，才设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共同的作战计划直到1940年3月才最后确定下来。美国对欧洲事务仍坚持孤立主义政策，法国很难指望得到美国的援助。

在国内，政治矛盾不断加深。9月1日，政府宣布国内处于“军事状态”，

禁止集会、示威，报刊、广播受到严格检查。内政部加强了国内治安和警戒活动，内政部长宣称：“我们必须结束软弱状态，清洗是必要的”。法国政府以法共“反战”为由，查封了《人道报》、《晚报》。9月26日，解散了共产党。不久，把共产党议员驱逐出议会，交付法庭，判处长期监禁，从而削弱了民族团结和抵抗法西斯德国的力量。

11月30日、12月2日，众、参两院先后通过关于在战争时期授予政府全权的法律草案。然而，政府内部仍然矛盾重重。1940年初，环绕着挪威的军事行动、芬兰事件，达拉第政府受到议会反对派的猛烈攻击。3月19日，众议院召开秘密会议，谴责达拉第政府在反德战争中“软弱无能”，要求推翻或大规模改组内阁，要求反对苏联、反对共产主义。20日，达拉第内阁向总统勒布伦提出辞职。21日，总统与两院议长商议后，叫雷诺组阁。雷诺宣称自己是“战争内阁”。27日，雷诺访问伦敦，与英国签订了两国“绝不单独谈判或缔结任何停战和平条约”的宣言，表示和英国联盟抗德直到最后胜利的决心。

二、德军在西线的进攻和法国的溃败

〔德军在西线的进攻〕1940年5月10日，德军在西线发动全面进攻，“奇怪战争”被迫中止。在德军发动全面攻势以前，法德双方的军力对比不相上下，都集结了几乎相等的约200万兵力：德国157个第一线的师中，有135个师在西线。而英法盟军方面，有96个法国师、10个英国师、加上22个比利时师、9个荷兰师，盟国还略占优势。法国与盟军一起，有可能利用战机，变被动为主动，转入进攻的局面。可是，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德军的攻势，把主要兵力部署在战略上的次要地区。在面对瑞士、莱茵河以及马其诺防线一带，驻有32个师和相当于10要塞师的兵力。他们视“马其诺”为固若金汤的防线。往北，则是森林绵亘、峰峦峻峭的阿登山脉，他们认为德军的现代化坦克无法通过。他们视宽阔的马斯河为“天然的防线”，认为只要依靠它，就万无一失。因此，在阿登——马斯这道屏障后面，防守薄弱，装备不足。在中部95英里长的防线上，只驻有第二、第九2个军的16个步兵师和骑兵师，其中有4个是B级师；2个师不配备25mm的反坦克炮。第二军只有三个坦克营，第九军只拥有20架歼击机。然而，德军在同一防区却拥有13个坦克师，300架中型轰炸机、200架俯冲轰炸机和200架歼击机。在法比交界的旷野，法国统帅部认为是德军进攻的战略重点，驻有第一集团军的39个师，其中3个摩托师，3个轻机械化师。英军也保持23个师预备队和3个装甲师，只待比利时国王邀请，即可深入比、荷境内作战。当然，法国统帅部也并不是完全否认德军经过阿登进攻的可能性，但他们认为那只是德军在比利时被打败后，才有可能这样做。法军的战略就是建立在这一假设上的。

5月10日，德军向荷、比、卢发动突然袭击，英法盟军根据甘末林制定的“D”计划，向比利时推进阻拦德军。德军一边在北佯攻，一边调兵向马斯—阿登一线推进。当时，法军的侦察机也注意到德军坦克在阿登一带移动的情况，第九集团军的一个师长奥热罗也注意到了德军在马斯、色当的机械化部队的调动。可是，法军司令部对德国军队的意图还是捉摸不清，仍然认为：这是“德军另一攻势的次要方面，主要的攻势继续在比利时展开。”然而，德军的坦克师却出其不意地翻越了阿登山，突破色当防线。14日，色当陷落。当法军接到反击的命令，德军的坦克已经迅速向法国北部推进。16日，德军越过瓦兹河，向圣康坦至亚眠方向发起攻势。拉昂被占，巴黎受到直接威胁。这时，戴高乐指挥的第四装甲师在蒙特康纳进行有力反击，中止了德军在30公里内的攻势，俘敌120人。可是，戴高乐得不到友军的配合，只得孤军奋战。之后，德军再没有受到大的阻击，向西疾行，直奔英吉利海峡。

〔敦刻尔克大撤退〕1940年5月20日，德军装甲师向阿腊斯加莱袋形地带推进。5月28日，比利时无条件投降。英法盟军被压缩到敦刻尔克三角地带。在这个不到50公里的狭窄地域，德军在数量上，特别是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占绝对优势。5月26日—6月4日，英军执行“发电机”计划，实行了敦刻尔克大撤退，33.8万多盟军（英军20万、法军13万）撤到英伦三岛。4万多法军遗弃海边，被德军俘虏。剩下的北路法军被迫向南实行了“一次灾难性撤退”。

〔“法兰西战役”的溃败〕正当大军压境的严重关头，法国统治集团惊恐异常。雷诺于5月19日委任贝当、魏刚分别任副总理和总司令。又借口领导战事不力，撤了甘末林的总司令职务。魏刚接任后，加强了法境的防御，修

筑了长达 270 多公里的“魏刚防线”，同马其诺的临时防线相接。魏刚还从东部、东南部抽调兵力充实此线，企图以 65 个师（近 150 万人）的兵力对抗德军的进攻。

针对法军的弱点，德军集结了 124 个师的兵力、编组成 B、A、C 三个集团军，从沿海、中央、东方三个区域发动攻势。6 月 5 日，德军在进占敦刻尔克后，即转锋南下，展开进攻，开始了“法兰西战役”。那天拂晓，德军先出动大批轰炸机猛袭巴黎周围的法空军基地，随后分兵二路，强渡索姆河和瓦兹—埃纳河，猛攻法军防线。

6 日，德军右翼进抵埃纳河，左翼德军已越过索姆河。法军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当天，法内阁再次改组，踢开了达拉第，总理雷诺兼任外长、国防部长，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副部长。7 日，德军继续猛攻，“魏刚防线”在瓦兹河与索姆河的分水岭处被切断，开始全线崩溃。8 日，德军在海峡至卢昂间发动主力进攻。同时，在香巴尼境内，降落大批伞兵，骚乱法军后方。9 日，卢昂失陷，德军向东紧逼巴黎。在香巴尼的德军也发动进攻。法军后方，完全混乱。10 日，德法两军在距巴黎仅 50 多公里处展开激战，德军投入 200 万兵力，巴黎处于德军东、西、北三面包围之中。同日，意大利向法宣战。11 日，在阿尔卑斯山区发动攻势，在法国背后捅了一刺刀。

在德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当魏刚向雷诺报告法军的瓦解只是时间问题时，总理雷诺坚定地表示：他决不离开巴黎，“要在巴黎的前方、在巴黎城内、巴黎的后方继续战斗。”可是，政府还是撤离了巴黎。10 日，魏刚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政府迁至图尔。14 日，又迁到波尔多。政府的迁离，军队的南撤，使法国处于惊慌失措之中，出现了民众大逃难的惨状。从 6 月 10 日至 14 日，有 200 万人逃离巴黎。如果从诺尔省的第一批逃难开始，加上南部法国的部分地区，估计从 5 月 15 日—6 月 20 日至少有 600 万法国男女舍弃了他们的家园。成千上万的逃难者，包括军队中的官兵和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他们扶老携幼，用小轿车、卡车、手推独轮车、儿童车，乃至步行，充塞于公路，汇成了潮涌似的“人流”，严重地阻塞了交通，妨碍着军事行动。

雷诺为摆脱面临的军事败局，在两个多月内，三次改组内阁，并对贝当、魏刚委以重任，企图以此振作军心，结果反而助长了失败主义者的投降活动。特别是政府迁到波尔多之后，主战派与主和派展开了公开的、激烈的斗争。以芒代尔为中坚的主战派，力主政府迁往北非继续战斗；以贝当、魏刚为首的主和派认为“败局已定，必须立即停止战争”；还有一些部长如肖当等人，动摇于两者之间，主张先向德国探询停战条件，然后再决定去向。这时，主和派在内阁中占了多数，并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他们一再散布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擅自宣布巴黎以及许多中小城市为“不设防的城市”；他们控制国家和地方的警察，使内政部长芒代尔也无法指挥调动；他们制造谣言，胡说什么“被共产党人改造的几个师已抛弃战线，开往巴黎以领导革命”，更有甚者，他们以“密谋推翻政府”为理由，竟然逮捕了主战派领袖内政部长芒代尔。使主战派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6 月 14 日，巴黎卫戍司令邓兹不战而降，拱手交出了首都，还无耻地宣布：凡从事抵抗者格杀勿论。

巴黎陷落后，马其诺防线的后路被切断。6 月 15 日，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50 万守军大部投降，只有少数人逃入瑞士境内。军事上的大溃败，直接决定了法国的灭亡。

[贡比涅停战协定]在法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以雷诺为首的主战派和以贝当、魏刚为首的投降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6月11日，在盟国最高军事会议上，魏刚最后一次要求英国重新派遣几个空军中队，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巴黎陷落的第二天，英国政府立即决定撤出英国远征军，全部英军和2万波兰军队一起登船撤回英国。16日晨，内阁继续讨论和战问题，贝当力主求和，并以辞职相威胁。晚上，总理雷诺辞职，贝当任总理。当夜11时半，贝当召集了第一次内阁会议，决定停战。深夜12时半，外交部长博杜安召见西班牙大使，请求西班牙充当与德国谈判的中间人。17日中午，贝当在电台第一次发出了公开的停战号召，宣称：“今天我以沉痛的心情向你们表示，必须停止战争”，“体面地寻求结束军事行动的方法”。之后，除小部分部队不执行停战命令外，整团整团的法军都停止了军事行动。可是，德军对贝当的请求不予理睬，直逼波尔多。6月20日，贝当政府正式向德国停战投降。21日，法德代表在贡比涅森林的小车站雷通德开始谈判。谈判的会场就设在1918年11月11日签订法德停战协定的福煦当年乘坐的车厢里，希特勒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德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宣读了德国的条件。法国政府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停战条件。6月22日11时，德法代表团又开始新一轮会谈。德代表坚持只有在法政府接受停战条件，才能停止对波尔多的进攻。晚上，波尔多又召开内阁会议，并通知法国代表签署停战协定。晚上6时50分，正式签字。24日，法意也签订了停战协定。25日零点15分，两个停战协定生效，全线实现了停火。

根据贡比涅停战协定，法国被分割为“占领区”和“自由区”两部分：占领区占法国领土的2/3，包括北部所有的主要工业区、巴黎、以及英吉利海峡、大西洋沿岸的全部港口。后者包括法国的西南部、南部和殖民地，由贝当控制。按停战协定规定，法国应偿付德国占领军所需的全部给养费。德国勒索的占领费每天高达4亿法郎，每年的费用相当于1939年法国民收入的48%。法国除保留10万“休战军”以维持“秩序”外，所有陆、海、空军都被解除武装，并强行复员。法国应立即交还德国战俘或被法拘留的德国人，而180万法国战俘和拘留在德国的法国人则仍然关在集中营，或在工厂里强迫劳动。显然，这是一个割地赔款、肢解法国的卖国投降协定。

1940年法国的溃败，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30年代以来，法国经济的停滞衰退，政治上的分裂混乱，军事策略上的迷信“阵地战”，以及精神思想上的畏战、厌战，早已埋下了法国失败的根子。战争期间，以贝当、魏刚为首的投降主义者逐渐在政治上占了上风，推行失败主义路线，他们打击抵抗派，散布“再战必败”的悲观论调，更直接导致了军事上的溃败，而法国在外交上的孤立和国际上的寡助，以及英、法盟军缺乏必要的密切配合，更加速了法国的覆亡。

三、第三共和国的终结和维希政府的建立

[第三共和国的终结]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德国占领者凭借刺刀维持占领区的法西斯统治，建立“封锁区”，各区之间的往来受到严格管理，与非占领区的往来受严密限制，甚至连维希部长的往来也得有德军当局的“通行证”；占领当局解散了一切政党、工会。7月4日，命令禁止聚集街头、印刷和散发传单、组织公共集会和一切示威，禁止收听外国广播，对共产党人实行死刑；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大批犹太人被关押在德国集中营；1941年，实行了人质制度，凡杀死一个德国兵，要用50至300个法国居民抵偿。

“自由区”名义上由贝当统治，实际上却受到希特勒德国的控制。法国投降后，6月28日，贝当政府由波尔多迁到克勒蒙菲朗。然而，这个城市缺乏供政府各部使用的房屋。于是，7月1日又迁到温泉疗养胜地维希。维希成为首都，史称“维希政府”。

贝当一伙十分厌恶议会民主制，认为议会应对这场失败的“大灾难”负责，有的人甚至说，战败比胜利更为有利，因为战败摧毁了一个“不光彩的议会制度”。1940年7月10日，在赖伐尔的建议下，举行了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以569票对80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制宪法令，赋予贝当以全权起草新宪法。从7月11日起，贝当连续颁布三个制宪法令。第一项法令宣布贝当为“法兰西国家”元首；第二项法令规定，在新议会组成之前，贝当拥有立法权，拥有任命一切军政职位的大权和国家元首的全部权力；第三项法令规定，原来的参、众两院一律休会，听候进一步的通知。两天之内，共和国总统、总理被废除，国会的活动被停止，一切行政、立法、司法大权集国家元首贝当身上，甚至连“共和国”一词也被“法兰西国家”所代替。存在70年的第三共和国就此终结。

[维希政府的建立]第三共和国崩溃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元首”贝当的个人专政。贝当是在法国大溃败的形势下登台执政的，而且他又是凡尔登的胜利者，在法国有很大威望。因此，贝当的个人权威和专政，是维希政府的重要支柱。当时，维希政府的一切文件都是以君主政体的格式开始的：“本人，菲利普·贝当，以法国元帅，法兰西国家元首名义宣布，”这句话明显地表明了贝当政权的个人性质。他为加强个人权力，实行了效忠宣誓制，从1941年1月至10月，一切军政大小官员都分批实行宣誓，效忠贝当。根据1940年7月12日颁布的第四号制宪法令，赖伐尔成为贝当的第一继承人。

维希政权于1940年10月11日发出了建立“新秩序”的文告，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宣称他们的目的就是“保卫劳动、家庭和祖国”，以此代替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民族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解散一些企业家的组织，在所谓“反资本主义”基础上成立管理经济的各种委员会；提出“反托拉斯的斗争”、“消灭阶级斗争”、“回到农业去”等蛊惑人心的口号；进行道德和精神上的革新，号召人们回到敬重上帝、祖国和家庭的观念上去。所谓“民族革命”不过是欺骗舆论、掩盖维希制度反动实质的骗局。

实际上，维希政府反映了法国财政寡头和反动军人集团的利益，尤其反映了与希特勒德国有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许多大垄断资本家直接参加了贝当政府，当了部长。如印度支那银行总裁蓬杜埃为外交部长，冶金工业巨头皮舍为工业部长，公共运输公司经理布第埃为财政部长，等等。维希政权受到了“法兰西行动”、天主教神职人员等极右派和右派的广泛支持。

维希政权的一切政策措施，都是为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巩固其反动的独裁统治。政治上，消灭一切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停止从国民议会到地方市政局的选举，解散了一切政党，对共产党人进行残酷镇压，对犹太人进行疯狂迫害；经济政策上，解散了企业主联合会，成立了各种组织委员会，由大垄断资本家控制工业、商业各组织委员会的领导权；农业上，由大农业主领导“农民联合会”，加紧对农民剥削；劳工政策上，解散一切工会组织，制定“劳动宪章”，把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统一于“劳资协会”的组织；在文化教育上，规定青年有义务在“劳动营”劳动，进行法西斯教育，并为德国提供劳动力。教会又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成了维希政权的重要支柱之一。

[维希政府与德国的“合作政策”]同德国占领者的合作，是维希政府的基本政策。1940年10月24日，贝当和希特勒在卢瓦河畔蒙都瓦会谈，确定了法德的“合作政策”。会谈在赖伐尔、里宾特洛甫陪同下进行，双方起草了一份议定书，一致承认迅速击败英国是符合法国和轴心国的共同利益。希特勒向贝当提出，如法国参加对英战争，就可以在北非维持超出停战协定规定的军队。保证法国拥有它在大战开始时同等的殖民地。贝当答应在经济上同德合作，并同意讨论反英的联合军事行动。12月10日，在贝当的指示下，由赖伐尔签订了进攻西非的英国殖民地与拒绝承认维希政权的法殖民地计划，由赖伐尔和德军最高司令部共同执行。这一计划遭到了一部分同殖民地、英美利益有密切关系的大资本家的反对。贝当于12月13日把赖伐尔免职，1941年2月，由海军上将达尔朗代替。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维希政府断绝同苏联的外交关系，批准建立“反布尔什维克军团”，实行“强迫劳动”制，为德国提供劳动力，进一步加强了同德国占领者的合作。1942年4月，在德国的建议下，赖伐尔重新执政，成为维希政权内外政策的领导者。6月22日，赖伐尔发表了臭名昭著的声明，他说：“我衷心祝愿德军胜利，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胜利，明天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会到处泛滥。”维希政府的“合作”政策充分证明它不过是希特勒的傀儡，明显暴露出它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本质。

第二节 法国抵抗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一、戴高乐与“自由法国”的建立

[戴高乐的《告法国人民书》]法国抵抗运动是全民族反法西斯占领的运动，具有广泛的民主性和社会性。法国抵抗运动是主张抵抗法西斯德国的派别、集团或个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内逐步形成的，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对于法国抵抗运动的酝酿和形成，起了直接的影响作用。

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出生于里尔一个天主教家庭。父亲亨利·戴高乐参加过普法战争，他那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对戴高乐影响很深。戴高乐1912年毕业于圣西尔军校，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得到三次嘉奖。在二、三十年代，他作为贝当的幕僚，执行军事使命，并致力于战略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出版了《剑刃》(1932年)、《建立职业军》(1934年)等书。1937年，任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戴高乐率部驻守亚尔萨斯，几次写信给总参谋部，呼吁建立装甲部队。1940年5月，戴高乐受命指挥第4装甲师，在拉昂一带进行阻击。6月5日，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力主抵抗，曾两度飞往伦敦，向英国表示雷诺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

6月14日，巴黎陷落。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戴高乐为拯救法国，曾经向雷诺总理表示：“决不同意求和”。为促进雷诺继续抵抗，戴高乐同意丘吉尔关于建立英法“两元帝国”的倡议，并设法得到英国的协助。但是，他的主张却遭到投降派的竭力反对。投降派贝当组阁后，魏刚发布命令，准备逮捕包括戴高乐在内的坚持抵抗的一些人。戴高乐不堪忍辱，为了法兰西的荣誉与独立，毅然于6月17日离开法国。次日，通过英国广播公司，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告法国人民书》，他庄严声称：“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我向目前在英国土地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土地上的军火工厂的一切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告法国人民书》表明了戴高乐抵抗到底的决心，他第一个高举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号召向法西斯德国和维希政府进行公开的抵抗。

[“自由法国”的建立]为振奋全民族的抵抗，争取和团结一切愿意抵抗的人们，戴高乐连续发表各种文告、广播和通讯，揭露可耻的停战协定，谴责维希政权和敌人的“合作”罪行，明确指出维希政府是“不合宪法的”，不过是敌人的工具。戴高乐于6月22日宣布建立“法兰西临时民族委员会”，他认为“没有武装就没有法国。建立一个战斗部队比什么都重要”。他设法争取撤到英国的法国官兵和伤病员，积极招募志愿军，使部队从6月下旬的几百人发展到7月底的7000人。7月14日，戴高乐检阅了自由法国第一支部队。

在艰难的抵抗斗争中，戴高乐的政治威望不断提高。6月28日，英国政府承认戴高乐是“自由法国人的领袖”。8月7日，戴高乐和丘吉尔达成了关于法国志愿军的组织、使用和服役条件的协议，明确规定法国志愿军坚决“反对共同敌人”。戴高乐还努力争取法属殖民地的工作，视非洲为“打回

欧洲的最好基地”。到 8 月下旬，赤道非洲喀麦隆地区已归附自由法国。9 月，大洋洲上的法属殖民地、印度的法国居留地也站到戴高乐一边。散布世界各地的法国侨民，也建立了戴高乐委员会，积极支援自由法国。10 月 27 日，戴高乐在布拉柴维尔以全法国的名义宣告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成立，号召法国人民为完成“伟大的、保卫法国的任务”而“参加战斗，或准备牺牲”。

戴高乐在巩固国外抵抗基地的同时，着重加强对法国本土的工作，首先是开辟情报工作的“特殊战场”，德瓦弗兰队长（化名帕西）领导的第二局承担了在法国的侦察任务。一年内，他们先后向国内派遣了十个谍报小组，在国内抵抗组织协助下，搜集情报。

戴高乐激动人心的号召和一系列的组织工作，极大的鼓舞了遭受德国铁蹄蹂躏的法国人民。戴高乐 6 月 18 日的广播讲话，引起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响。人们冲破严密的检查，给戴高乐寄来了各种邮件，有的还在照片上面写着：“戴高乐，我们听到你的话了。现在我们在等着你。”国内不少爱国者纷纷宣布自己是戴高乐派，散发传单传播抵抗思想。在北部占领区，特别是在布列塔尼沿海一带，一些法国人还冒着危险，偷渡海峡，投奔戴高乐。在南部，《小普罗旺斯报》在广播后的第二天即头版全文发表，其他报纸也刊登了广播的消息。戴高乐 6 月 18 日的演说成为鼓舞人们起来抵抗的一种伟大力量。德·拉巴东尼回忆说“自从我聆听了戴高乐的首次广播起，我就参加了抵抗运动……当我意识到戴高乐讲演的内容时，我大声叫喊着“我们战胜了”。可见，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运动对鼓动国内的抵抗运动，起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二、国内抵抗运动的产生

[国内抵抗组织的出现]国内的抵抗运动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它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由单个的分散行动到逐步地有组织的行动的过程，而它的第一批发动，则是少数爱国者对德国法西斯统治的直接反抗。早在巴黎陷落后的第二天，即6月16日，有个叫埃蒙德·米歇莱的人就散发了500份关于“认清形势的真诚忠告”的传单，发出了坚决反对停战的忠告。一些被德国囚禁的法国士兵和难民，从德国集中营逃出，因无家可归，被迫走上反抗的道路。人们运用各种形式，打击侵略者。有的袭击边区小村的德国哨兵。有的利用在飞机工厂工作之机秘密切下机上的重要铆钉，使飞机在空中坠毁。尤其是在科雷兹省的达纳芝森林区，到1940年底有20个小组活跃在那里，组成了早期武装抵抗运动的中心。1940年11月11日，巴黎各地和郊区的大学生、小学生和教师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佩戴三色旗胸章，拿着小旗和红白花束，估计人数从3000人增加到1万人。在南部地区，人们传播戴高乐的广播，收集敌占区的情报，出版地下报纸，成立抵抗组织等等，如德拉巴东尼听了戴高乐的广播后，就约了7个朋友，经常开会讨论怎样行动。他们多次搜集情报，送到瑞士再传到英国，经过3个月的努力，终于建立起情报网。

抵抗斗争逐渐由分散到集中，形成了一些大的组织或运动，他们以出版的报刊定名，北部地区主要有五个抵抗组织：“保卫法国”、“解放”、“抵抗”、“解放北方”、“军政组织”。南部地区主要有三个组织：“解放南方”、“战斗”、“自由射手”。它们大多是在1940年秋冬和1941年初建立起来的，参加的成员较广泛，有军官、工商业家、职员、作家、教员、学者等，而起主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如记者、律师、教授、科学家、学生等。这些抵抗组织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散发传单、出版地下书刊和收集情报。1940年末，据维希警察的通报，在10—20个城市包括巴黎、里昂、马赛等地出现了标语、传单，约有15种非共产党人抵抗组织的报刊。他们揭露希特勒的蛊惑性煽动，支持居民的爱国热情，打击德国占领者。尽管这些组织缺乏联系，成员也较复杂，有的对贝当政府抱有幻想。但是，它们的成立说明了国内抵抗力量的兴起，成为后来戴高乐统一抵抗运动的国内基础。

[法国共产党的“7月号召”]正当法国国内抵抗运动兴起的时候，曾经是抵抗法西斯的主要力量的法国共产党，由于屈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压力陷入了思想混乱、政策错误的困境。1939年8月的苏德条约，使法国共产党更加被动，他们执行“革命失败主义”的策略，鼓吹使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建立同德国和平的“人民的”法国政府。

在德国占领的最初几个月，法共中央领导仍然充满幻想，宣扬和平主义、合法斗争，企图恢复党的合法地位，一封由共产主义者代表署名的信件送到议院，要求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媾和的条件，和平主义的教授、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还发表声明支持媾和。6月中下旬，党的秘密机关二度派人和德军事当局联系，就《人道报》的合法复刊问题进行交涉。7月，地下《人道报》主编写信给德国当局，请求允许报纸再次合法地出版。7月整整一个月，《人道报》继续使共产党游离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公开抨击英国金融资本和法国帝国主义，不敢明确谴责德帝国主义。只是到了8月底，由于德国占领者对法共迫害的加剧，《人道报》才撤回了合法出版权的申请。

在争取合法化的同时，法共中央还在7月中旬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号召，即“七月号召”，并用传单形式向群众散发或在墙上张贴。号召书详细阐述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统治阶级的背叛和维希政府的反民族政策。号召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维希政府，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甚至提出了“法兰西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的口号。这个号召书与6月中的党的立场相比，无疑是个进步。但是，它基本上仍旧站在战争爆发时的立场，执行“革命失败主义”的路线。

[法共抵抗运动的展开]同法共领导的路线相反，基层党员个人或某些地方组织，从德国占领后不久，即已行动起来，从事抵抗斗争，反对德国侵占。1940年7月，西南部的法共负责人狄戎严厉地指责中央在夏季的轻率举动，认为一些党员的被捕，就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幼稚决定引起的。某些基层组织进行了有计划的秘密抵抗斗争，他们夺取占领者在当地征收的存粮、鼓动劳动者罢工、收集和储藏武器以备战斗。党员的地方性行动冲破了中央的轻率指示，形成不可阻挡的抵抗潮流。随着德国占领者迫害事件的加剧，更加强了地下党的领导转到同希特勒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立场。于是，党在全国建立了战区委员会同隐蔽在巴黎地区的中央领导机构保持经常联系。还组织了第一批“特别组织”的小组。

1941年1月，共产国际领导劝告法共放弃对戴高乐的批评，并指示考虑戴高乐运动所起的客观积极作用的必要性。5月15日法共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宣言，号召人民建立“为法国的自由、独立而斗争的民族阵线”。5月至6月，法共组织并领导了诺尔—加莱海峡10万煤矿工人的罢工，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法共改变对戴高乐的态度，同“自由法国”情报组织和其他各抵抗组织开始接触，有组织地走上了公开抵抗德国占领者的道路。

三、抵抗运动的广泛发展

[国内外抵抗运动联系的加强]1941年6月，希特勒进攻苏联后，他把法国作为反苏战争的基地，加紧掠夺物资，强征劳力，而维希政权却进一步实行与德“合作”政策。德国占领者的掠夺和维希政权的“合作”政策，激起了人民的更大不满和反抗。同时，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法国各爱国派别、组织在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分歧逐渐得到解决，这就为扩大爱国者的军事行动和抵抗运动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性。

1941年夏，各抵抗组织的联系日益加强，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组织。如被解散的社会党的积极分子，在北、南二个地区分别建立了“社会行动委员会”。7月，在法共倡导下，建立了“民族阵线委员会”，发布宣言，号召“一切不愧为法国人的人们，应该站在苏联、英国和一切反希特勒人的一边，为争取祖国解放而斗争。”当年夏秋季，在地方上，按照地区或职业也开始建立民族阵线委员会，如学生民族阵线委员会、青年民族阵线委员会等。参加民族阵线委员会的有共产党人、戴高乐派、天主教徒、新教徒等。9月21日，《解放北方》报在《祖国统一的必要性》为题的社论中，第一个直接向一切爱国者包括共产党人提出了联合起来的号召，社论指出：“唯一的主要问题——没有任何妥协余地的问题——就是祖国的独立，一切领土的解放——为了解放必须联合一切……”

由于国内抵抗运动的发展，也由于戴高乐在殖民地问题上同英美的冲突，使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日益感到有联合国内抵抗运动的必要性。1941年9月24日，戴高乐宣告民族委员会成立，戴高乐为主席，设八个委员，实际上承担起国家政权的职能。为联合国内的抵抗力量，戴高乐先后两次派出了特别的“政治代表团”到法国。12月24日，任命前埃尔—罗亚尔省省长让·穆兰为非占领地区的民族委员会的全权代表和自己的代表。1942年1月1日，穆兰到法国南部。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工作，南方三个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与穆兰签订了议定书，承认戴高乐作为“战斗法国”（1942年夏，“自由法国”改称此名）的政治和军事领袖，三个组织的军事组织也统一加入“秘密军”，其首领由戴高乐任命。在1942年底到1943年初，“战斗法国”同占领地区的各抵抗组织也加强了联系。“自由法国”与法共领导的“民族阵线”与“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的联系也有了加强。戴高乐认为：“我愿意他们为国效忠”，但必须接受他的“控制”。1942年2月，法共通过“自由法国”情报人员勒米转告戴高乐，准备接受戴高乐的指挥，并决定派一名代表到伦敦。1943年1月，议员弗·格列尼埃作为法共代表到达伦敦，在戴高乐领导下工作。

[维希政权危机的加深]1942年11月8日，美英盟军在艾森豪威尔统率下于北非登陆，贝当命令北非法军对抗。美国宣布与维希断交。维希政府的国际地位更加陷于孤立。11日，刚到阿尔及尔的维希军队总司令达尔朗下令停火，与盟军签订停战协议，并投向盟军一边。达尔朗为北非最高专员，吉罗（1879—1949）为陆军司令。维希当局失去了对北非的控制。11月11日，德国为报复盟军对北非的行动，占领了法国南部，“自由区”不再存在。10万“休战军”也被解散。11月26日夜，德军调集一个装甲师包围土伦，企图夺取停泊该港的法国军舰。27日晨5时29分，舰队司令发出军舰自行凿沉的命令，水兵立即行动。一天之内，倾覆、烧毁3艘装甲舰、1艘战斗巡

洋舰、7艘巡洋舰、1艘航空运输舰、29艘驱逐舰、12艘潜水艇，总吨位达23万吨，100多座附属建筑也被毁。土伦法国舰队的“自凿事件”，粉碎了德军攫取舰只的妄想，沉重地打击了维希政权的统治。至此，维希政权已丧失了“自由”领土、陆海军主力以及北非、西非的殖民地，实际上已土崩瓦解。

[国内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是法国抵抗运动高涨的主要标志之一。苏德战争爆发后，《人道报》于1941年7月17日发出了“公民们！拿起武器”的战斗号召。法共领导下的“特别组织”、“青年营”加强了战斗活动，从1941年7—12月，在工厂、铁路线进行的破坏活动增加到148次。8月21日，法国爱国者乔治·皮埃尔在巴黎地铁巴尔贝车站打死一名德国军官，引起了德国占领者的恐慌。10月，“特别组织”在南特、波尔多又杀死了几个德国军官。占领者就在南特一集中营枪杀了50名人质。但是，抵抗组织并没有被吓倒。10月，法共成立了“全国军事委员会”，出版《复仇者》报，在各省、区也相应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并把法共领导的地下武装组织联合起来，1942年初，改称为“法国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在城市展开游击杀敌活动，仅1941年12月，在巴黎地区登记的反占领军的谋杀事件就达221件。1942年夏，法共加强了对游击队的领导，广泛展开“征募志愿者运动”，派遣大批活动分子加入“自由射手和游击队”。“游击队”的基层战斗单位是“三人小组”，二个小组组成一个班，三个或四个班组成一个小分队，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和灵活性。6月，在巴黎地区正式建立了第一支游击兵营，展开游击活动。

非共产党人的各个抵抗组织，在进行宣传鼓动，怠工等活动的同时，也进行一些军事活动，并成立了准军事性或军事性组织。1942年，“战斗”组织了不大的“志愿队”、“秘密军”，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1942年9月初，维希政权通过了《义务劳动法》，强迫18—50岁的男子和21—35岁的未婚女子为“民族的最高利益进行任何工作”，不断为德国招募劳工。维希政权和占领当局还成立了“义务劳动局”，大肆围捕青年工人、学生。《义务劳动法》和强征劳力，引起青年工人、学生的抗议，他们常常举行罢工和游行，得到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很多被动员的人开始逃出城市，隐藏到偏僻的乡村、山区或森林地带，当时称这些人为“马基”。1942年末—1943年初，在法国人烟稀少的森林和山区，尤其是中央高原、阿尔卑斯山区，出现了第一批“马基”营，他们和各抵抗组织取得联系，展开游击活动。另一些“休战军”的士兵和军官也建立了抵抗组织——“军队抵抗组织”。

1943年，武装斗争迅速发展。据统计，1942年游击队组织了276次捣毁铁路的活动，1943年则增加到2009次，一年内增加了6倍多。游击活动基础薄弱的南部地区，斗争也有新的发展。

[全国抵抗委员会的成立]在武装斗争广泛发展的基础上，国内各抵抗组织之间、“自由法国”与国内抵抗运动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在南部，1942年11月，三个主要抵抗组织成立了联合抵抗运动。在北部地区，各抵抗组织也实现联合，成立了“协调委员会”和“秘密军”参谋部。

1943年2月21日，戴高乐召集自己在国内的代表到伦敦，叫让·穆兰

Maquis 是科西加语，意为稠密的灌木丛林。科西加人把那些为逃避警察迫害而到灌木丛中去的人叫“马基”。

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他在给让·穆兰的训令中指出，“在最短期间内，应在法国本土成立一个统一的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并由戴高乐将军的代表让·穆兰担任主席”。5月15日，全国抵抗委员会宣告成立，加入全国抵抗委员会的共有16个派别和组织，其中包括八个抵抗组织（“民族阵线”、“军政组织”、“抵抗”、“解放”、“解放北方”、“战斗”、“自由射手”、“解放南方”），6个政党（共产党、社会党、激进党、人民民主党、共和联盟、民主联盟）以及2个工会。每个派别无论其影响如何，在委员会内部都拥有一票。1943年5月27日，全国抵抗委员会在巴黎第6区富尔街48号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让·穆兰任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任务，还选举了由7人组成的常设机构，以协调各抵抗力量。6月21日，穆兰被捕后由“战斗”组织的负责人皮杜尔为主席。在全国抵抗委员会领导下，各省和地区也相应成立了抵抗委员会，一般常称解放委员会，最有影响的是9月成立的巴黎解放委员会，其主席是巴黎联合工会总书记共产党人托莱。

[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在国内各抵抗组织实现联合的同时，戴高乐在北非也加强了同吉罗的联合。1942年12月24日，达尔朗被人打死，于是，由殖民地长官组成的“帝国委员会”任命吉罗为北非的军事和民政司令，以代替达尔朗。吉罗宣布自己的目的是同盟国一起，反对法西斯德国。这就使戴高乐的“战斗法国”同吉罗的联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而英美为控制北非和戴高乐，也需要戴高乐和吉罗的联合。1943年1月14日至23日，罗斯福、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开会，通过了进攻西西里岛的计划（“哈斯基”计划）。因此，夺取北非的全胜，争取法国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就成为美英十分关切的问题之一。会议期间，罗斯福在丘吉尔的建议下再三电请戴高乐赴会同吉罗会晤，遭到戴高乐的拒绝。于是，丘吉尔就以拒绝继续支持“战斗法国”运动相威胁。在美英的压力下，戴高乐到卡萨布兰卡和吉罗会谈。26日，戴高乐和吉罗发表了联合公报，确定了双方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彻底打败敌人，获得法国的解放和全人类自由的胜利。2月23日伦敦的法国民族委员会照会吉罗，要求把消除非洲维希制度的残余，恢复基本民主自由，立即建立中央临时政权，建立抵抗协调委员会等作为谈判的基础。3月14日，吉罗同美英协商后，发表了重要演说，宣布维希颁布的法律不再有效，恢复地方政府机构，并声明在法国解放后，法国人民有可能根据共和宪法选举自己的临时政府。以后，双方环绕着谁是法兰西民族的合法政府和领袖问题，展开长期争论。5月30日，戴高乐到达阿尔及尔。在美英的调解下，戴高乐与吉罗实现了妥协。经过三天的谈判，6月3日，终于签订了建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定，戴高乐和吉罗二人共同担任主席。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发布了《成立宣言》，宣言指出：“这样成立的民族委员会，就是法国的中央政权机关。”其任务是“继续与各盟国密切合作，继续为解放法国的全部领土和盟国的领土而共同奋斗，直到彻底战胜一切敌人为止”。“委员会号召全体法国人来同它一起，通过战争和胜利，使法国重新恢复自由、伟大和在强大盟国中的传统地位”。8月26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得到美、英、加拿大、苏联、中国和拉美国家的承认。9月27日，民族解放委员会第二次改组，戴高乐成为它的唯一主席，吉罗仍为总司令，指挥军队。11月3日，临时咨询会议正式召开，参加的有国内外抵抗运动组织和各党派的代表。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和咨询会议的召开，最终实现了全民族抵抗力

量的联合，为民族起义准备了条件。

第三节 1944 年的民族起义和法国的解放

一、民族起义条件的成熟

[科西嘉的解放]民族起义是法国抵抗运动发展的最高阶段。早在 1942 年 4 月 18 日，戴高乐在广播演说中就指出：“每一个法国男女的任务在于用他们掌握的一切手段进行积极的斗争，既反对自己的民族敌人，同时反对维希，他们是共同的敌人。民族解放不能同民族起义分开”。1943 年 1 月，法共代表和“战斗法国”就民族起义、联合抵抗进行了会谈，民族起义问题已提上日程。

1943 年 9 月，法西斯意大利投降。9 月 9 日，科西嘉人民在民族阵线领导下宣布起义，消灭意大利占领军，伏击正在北撤的德军。科西嘉爱国军民的抵抗斗争得到了吉罗将军的援助，他们相互配合，共同战斗，终于在 10 月 3 日获得了科西嘉的解放。岛上游击队迅速发展到了 12000 多人，民族阵线的威望不断提高。科西嘉的解放，是内部抵抗力量与吉罗领导的法国军队联合作战的一个胜利，实际上是民族起义的一次大预演。

[全国抵抗委员会《共同纲领》的制定]1944 年 3 月 15 日，经过各抵抗组织的长期争论，全国抵抗委员会通过了《共同纲领》。《纲领》以民族阵线提出的《抵抗宪章》为基础，主要内容有：立即开展武装斗争，给准备战斗的组织配发武器，建立爱国警察，军事行动与群众抵抗如罢工、示威、反对强征劳力的斗争相结合；要求实现人民的广泛民主自由，保证劳动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要求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消除经济领域中的财政寡头；要求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尽力为爱国者提供武器，同时强调，一切军事行动均应在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要求英美盟军开展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尽快地解放被占领的土地。《纲领》指出民族起义只能在政治军事能保证它胜利时开始，起义应该在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下，由全国抵抗委员会指导。《纲领》得到了各主要抵抗组织的承认。3 月，抵抗运动的三个主要军事组织：“自由射手和游击队”、“秘密军”、“军队抵抗组织”最终联合为“法国内部武装部队”（即“内地军”）。“内地军”中各组织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但需服从全国参谋部的统一指挥，而全国参谋部又受到几个主要抵抗组织代表组成的军事委员会的监督，同时承认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4 月，戴高乐派柯尼克（1898—1970）将军到英国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6 月，柯尼克为“内地军”司令，使“内地军”与盟军作战的战略相配合，为民族起义作好组织上的准备。

[游击活动的广泛展开]经过两年多的艰苦斗争，国内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更为壮大，游击活动广泛展开。1944 年上半年，游击队实行了 2731 次捣毁铁路的行动，而 1943 年一年内只组织了 2009 次。“马基”游击队的活动也不断扩大，1944 年夏，有几十个“马基营”，每个营聚集了 5—10 个“马基”分子，有时多达几百人。1944 年初，武装的“马基”总数约 5000 人。在“马基”营控制地区，维希的行政机构已经瓦解。“马基”的办事机构实际上已成为当地的政权机关，征收赋税，维持秩序，确定物价，供应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夺取被占领军和维希当局征调的粮食，在劳动群众中进行分配。“马基”的政治倾向各异，但一般都受到国内抵抗运动主要军事组织

的影响。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分子也在法国组织了游击队参加战斗。1944 年春，有 35 支苏联人游击队活跃在法国国土上，消灭了 3500 名希特勒分子，倾覆了 65 辆军运列车，破坏了 3 座桥梁，俘虏了德军官兵 650 名。

5 月 16 日，戴高乐发布关于法国内部武装部队作战的命令（即“加门计划”），要求内部武装部队从盟军登陆之时起，与盟军取得联络，直接参加战斗。命令还对不同地区提出了战斗目标，主要是配合盟军，破坏交通线，攻占机场、港口，从而确定了民族起义的大体方向。

[盟军在诺曼底登陆]1944 年 6 月 6 日凌晨，英美盟军在蒙哥马利指挥下，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英、美 2395 架运输机和 847 架滑翔机载着 3 个伞兵师在诺曼底海岸重要地区空降着陆。接着，2000 多架飞机猛烈轰炸法军海岸防御工事和炮兵阵地。进攻部队分乘小艇和大型登陆艇在密集的炮火下向诺曼底方向推进，迅速占领滩头阵地，不断扩大战果。到 6 月 7 日午夜 12 时，总计有 15.5 万名盟军战士在法国登陆上岸。以后，盟军后续部队迅速增加。7 月初，登陆盟军达百万人。希特勒德国苦心经营的“大西洋壁垒”被摧毁。8 月 15 日，盟军又在法国南部普罗旺斯沿岸登陆。塔西尼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一集团军作为盟军的组成部分也随着登陆。一再拖延的第二战场终于开辟。从此，开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的新阶段。

二、民族起义的广泛发展

[民族起义力量的壮大]盟军在法国的登陆，成了民族起义的信号。6月6日，戴高乐在伦敦发表演说，号召法国人民投入“解放法国的战役”。可是，戴高乐在给国内代表的秘密指令中却指示，抵抗运动“只能按照伦敦的命令”发展，只应“限于地方的罢工行动和盟军当局规定的游击行动。”同一天，法共中央也发表声明，号召人民与盟国一起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伟大斗争，为恢复法国的自由、独立与伟大的权利而斗争。法共还建议加强罢工和破坏活动，用最紧急的方式从速建立爱国民警队。根据法共建议，在民族阵线、自由射手和游击队、进步工会、爱国青年联合会、妇女同盟倡议下，建立了爱国民警中央委员会，和内部武装部队一起，在各地建立爱国民警队。国内的其他抵抗组织如联合抵抗运动等，也支持民族起义的方针，从执行“等待”政策转变为武装斗争的政策，刚恢复活动的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在6月号的社论中响亮提出：“公民们！拿起武器，这是最后的、坚决的斗争！”与此同行，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迅速扩大，到1944年夏，内部武装部队发展到50万人，其中法共领导的自由射手与游击队则由2.5万人猛增到25万人。可是，当时的全国抵抗委员会、军事行动委员会与戴高乐的军事代表在起义的时机、方式以及军火的供应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盟军对内地军的游击活动抱有某种蔑视态度，给内地军尤其是法共的自由射手与游击队在物资、武器供应上设置障碍，致使内地军武器不足，装备低劣，如在奥恩（即在紧接登陆地区的地方）1800名内地军的士兵中，只600人有武器，其中每4个士兵才有1挺机枪和150匣子弹，每30人才有1挺重机枪和200匣子弹。尽管如此，抵抗运动的武装部队积极响应民族起义的号召，发挥爱国主义精神，配合盟军展开了积极的军事行动。到7月中旬，全国90个省中有40个省爆发了武装起义。

[民族起义席卷全国]8月，当法军迅速向法德边境溃退时，民族起义席卷了全国。在布列塔尼，到8月初，已成功武装了5万志愿者，大部分参加了自由射手和游击队。他们同盟军配合行动，解放了几乎整个布列塔尼，俘虏了德国官兵6万人。在中部山区和西南部地区各省，抵抗战士积极开展战斗，到8月，他们用自己的力量解放了28个省。在东南地区，早在6—7月间，游击队就发动起义，夺取中小城市，解放部分领土。当盟军在南部登陆后，游击队紧密配合，在敌后进行破坏活动。8月18日，马赛发动总罢工。19日展开了巷战。23日，法国第一集团军先头部队进入马赛，德卫戍部队投降。由于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使法第一集团军迅速推进，提前解放了许多城市。抵抗战士的军事行动给盟军和法正规军以很大支援，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也承认：“如果没有他们的巨大支援，法国的解放以及敌人在西欧的失败，将会延缓很长时期，而我们的损失也会更大”。

三、巴黎起义和法国的解放

[巴黎起义] 巴黎起义是 1944 年民族起义的最高潮。巴黎是抵抗运动的重要基地，法共在巴黎地区抵抗运动中有很影响，巴黎“内地军”司令、巴黎解放委员会主席均由法共党员担任。1944 年夏，随着第二战场的开辟，德国占领军加紧对巴黎的控制和掠夺，致使生活必需品奇缺，面包、糖、肉、牛奶只能定量供应，物价猛涨，黑市盛行。由于原料缺乏和空袭，许多工厂停产，失业工人增加。巴黎人民对占领者的不满和仇恨情绪进一步增长，人们盼望早日解放。可是，以戴高乐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不同国内抵抗运动组织协商，就事先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巴黎警察总监，由勒克莱尔将军指挥的法国第二装甲师直向巴黎推进。戴高乐的总代表亚历山大·巴罗迪被任命为尚待解放地区的特别代表，竭力拖延首都的起义。但是，随着盟军的推进和民族起义的广泛发展，巴黎起义的形势日趋成熟。7 月 14 日，巴黎地区的人民不顾占领军的镇压危险，举行了四年来的第一次国庆游行，参加者达 11—15 万人。巴黎的一些公司企业升起了三色旗，工人开始罢工或怠工，群众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巴黎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也更加壮大，到 8 月 26 日，计有内部武装部队 5 万人，爱国民警 5 万人。8 月 7 日，当盟军向巴黎推进时，巴黎“内地军”司令发出了“第三号命令”，指示部队动员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开展军事行动。9 日夜，民族阵线、自由射手和游击队在巴黎张贴宣布总动员的布告。10 日，巴黎铁路工人总罢工，揭开了武装起义的序幕。

8 月 14 日，巴黎解放委员会积极支持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号召“一切劳动者停止工作，加入爱国民警，武装起来参加战斗，使总罢工成为解放巴黎的民族起义的出发点。”15 日，巴黎警察开始罢工，部分警察加入了内部武装部队。16—17 日，邮政工人、地铁职工和海员相继罢工。16 日夜，巴黎“内地军”和爱国民警转入进攻，开始占领重要目标。起义形势成熟。

可是，戴高乐的总代表巴罗迪却反对起义。全国抵抗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中一些抵抗组织也以武器不足为借口，要求延迟起义。但是，抵抗战士已经行动起来。18 日，总工会和基督教工会同盟宣布了总罢工。邮电、铁路、纺织、地铁各部门职工、各大商店也宣布了罢工。铁路工人和建筑工人从德军车站和运输中心站搞到了大批武器。一批志愿者袭击了德军控制的“慈善医院”，缴获了许多武器，捉住了 250 名德军伤病员，充当“人质”，几天后用他们从德军手里交换了许多爱国者。同一天，巴黎警察解放委员会也决定转入行动。19 日，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论，全国抵抗委员会常委会和巴黎解放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正式通过开始举行起义的决议。随后，在巴黎解放委员会的号召下，“内地军”、“爱国民警”迅速占领了警察局、市政局和报社。战斗在各区胜利进展。

巴黎起义时，驻守巴黎的约 2 万名德军卫戍部队已被内部武装部队包围。卫戍司令冯·肖尔蒂茨为了自己的出路，对希特勒关于炸毁巴黎的电报指示不予理睬，而是玩弄手腕，通过瑞典领事诺尔德林和戴高乐的代表进行接触，并释放了部分政治犯，以便进行休战谈判。19 日，警察局长夏尔·吕伊惹、总代表、巴黎解放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和卫戍司令谈判，签订了休战协定，并派出广播车向“内地军”宣布。休战协定受到了共产党、“民族阵线”、“战斗”等领导人的坚决谴责，在 20—21 日的全国抵抗委员会上，

大多数代表拒绝休战协定。

21日下午5时，巴黎解放委员会发出了继续战斗的号召。巴黎人民热烈响应号召，成群结队地在工人住宅区、主要街道建筑了600多个街垒，军事行动不断扩大，到21日晚，起义者已解放了巴黎80个街区中的61个和郊区的3/4。

22日，内部武装部队在人民的支援下继续发起攻势。然而，肖尔蒂茨与巴黎新的警察局长达成了让德军撤退的协议。同时，起义的迅速发展，引起了戴高乐的不安。他派柯尼克将军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亲笔信，请求盟军立即向巴黎挺进。

23日，首都战斗激化。德军企图夺路后撤，向市政厅反攻，被“内地军”打退。在其他各个区，德军也受到了阻击。这时，德军只困守在巴黎的9个主要据点，其他27个较小据点都为起义者占领。同一天，勒克莱尔第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兵临巴黎城下。24日，“内地军”奉命进攻共和广场的德军最后据点，战斗继续到深夜，德军终于宣告投降。22日，第二装甲师的第一批坦克在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下进入首都。这时，市政厅响起了《马赛曲》，钟楼敲响了胜利的钟声。25日下午3时许，德军签署了投降协定。傍晚，戴高乐也随第二装甲师进入首都，驱车直向国防部。

在解放巴黎的过程中，德占领军死亡3000人、伤5000人、14800人被俘。法国方面，内地军死亡901人、伤1455人；第二装甲师死亡130人、伤319人；平民死亡692人、伤2012人。法国抵抗战士和人民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解放了首都。

[法国全境的解放]巴黎民族起义的重大胜利，加速了法国全境的解放。9月12日，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与从南部登陆的盟军在蒙巴尔会合。勒克莱尔第二装甲师同塔西尼的法国第一集团军会师。法军同盟军一起向法比边境推进。解放了比利时。到9月中，除阿尔萨斯——洛林和西部沿海岸的几个港口外，几乎所有法国领土都得到了解放。11月23日，第二装甲师攻占了斯特拉斯堡，阿尔萨斯省最后获得解放。

1945年1月起，法第一集团军与盟军一起乘胜追击德军。3月底，法军越过莱茵河，在德国境内胜利推进。4月，配合苏联红军展开攻克柏林的战役，在易北河与苏军会师后，不断扩大战果。5月7日，在巴黎以东的兰斯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德军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8日下午3时，戴高乐与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一起向全世界宣告盟国的胜利和欧战的结束。午夜12时，在柏林正式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法第一集团军司令塔西尼受戴高乐委托参加了仪式。9日零时10分，德国代表凯特尔在投降书上签字。

当法第一集团军在德国境内胜利挺进的时候，其他法国军队仍在大西洋沿岸与德军残部进行战斗。5月8日，拉罗舍尔获得解放。9日，敦刻尔克的德军宣告投降。翌日，法军与盟军进入这个最后解放的法国城市。5月初，在阿尔卑斯战线的战斗，也由于德、意军的投降而胜利结束。法国人民经过了四年多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垮了德国法西斯，赢得了祖国的解放。

法国抵抗运动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消灭了反动的维希政府，恢复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赢得法兰西民族的独立，促进了人民进步力量的发展，对战后法国的政治生活、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十六章 第四共和国

第一节 第四共和国的诞生

一、战后初期的法国

[百废待兴的法国]战后初期，法国的社会经济陷入严重的混乱和衰退之中。由于德国的占领和维希政府的统治，再加上大战后期多次军事行动在法国本土进行，使法国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据统计，战争使法国经济遭受的损失高达 47930 亿旧法郎。全国约有 100 多万公顷的耕地因战火而荒芜，有 1/5 的房屋被毁坏，牲畜减少了一半，大批工厂被摧毁。其中交通设施的破坏尤为严重，铁路桥几乎全部被毁，铁路线近一半不能使用，土伦、布列斯特、勒阿弗尔等重要港口陷于瘫痪。战争使法国工农业生产下降 55%以上。战争的灾祸给法国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后遗症：首先，战争使法国直接或间接损失了 145 万人口，特别是大批青壮年的丧失和致残，使战后经济恢复面临劳动力奇缺；其次，要把战时经济重新改造为和平经济，需要大量资金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技术改造，引起资金的严重短缺；再次，要迅速恢复安定局面和保证人民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必须进口一定的原料、燃料以及生活必需品，这也需要大量资金。凡此种种，导致法国战后初期生产凋敝，贸易停滞，商品奇缺，粮食、食糖等生活必需品只能凭卡限量供应，从而黑市盛行，投机猖獗，黑市价格比平价高达 19 倍。财政赤字在 1944 年已达 3000 亿法郎，同年 8 月流通的纸币多达 6320 亿法郎，比战前增加 5 倍，而库存现金则由 1939 年的 970 亿减少到 1944 年 9 月的 800 亿。内外债务由 1939 年 8 月的 4500 亿法郎增加到 1944 年 8 月的 15000 多亿，法国在债务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配置]战争引起了法国政治生活的巨大变化，其中突出的变化是民主进步势力的发展和人民精神的振奋。深受战争煎熬的法国人民，渴望民主新生活的来临，并要求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法国左翼力量开始加强，其中法国共产党影响的扩大尤为明显。法共在人民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人数 1936 年为 32 万，1945 年 6 月时已增加到 90 万，成为全国左翼中的第一大党。他们在法国中部、北部、东南部以及巴黎周围地区建立了“红色地带”，广泛进行各种活动。特别是法共当时还掌握着几十万的武装力量，更使其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左翼中的第二大党是社会党，因战前参与执政，在战备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失误一度受到人们的责难，又由于该党议员中竟有半数以上曾投票赞成授予贝当全权，使党的声誉受到很大影响。但社会党在抵抗运动中表现较好，又在 1944 年 11 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将曾投票授予贝当全权的议员开除出党，并与法共组成了谅解委员会，共商统一大业。社会党的队伍也有了一定的扩大，党员人数由战前的 28 万多增加到 1945 年的 33.8 万多人。

在左翼力量发展的同时，中派与右翼政治力量也进行了重新组合。战后初期，激进党的威信明显下降，不少人认为该党对法国的败亡负有责任。但是，激进党利用自己参加全国抵抗委员会的事实，竭力表明它是抵抗的党，并也在 1944 年 12 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开除了 34 名议员，以纯洁内部。右翼政党的力量则受到很大削弱。战前两个最主要的右翼政党，共和联盟和民

主联盟，在 1945 年 12 月，联合组成为“自由共和党”，在“自由”口号下坚持右派立场。以雷诺为首的一部分右翼政治家则组成“独立派”。当时在资产阶级中影响最大的党是人民共和党。该党在工人群众中也有广泛影响，是由天主教政治活动家、全国抵抗委员会主席乔治·皮杜尔在 1944 年 11 月创建的。人民共和党自称继承了天主教社会主义传统，还提出改革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胆计划，再加上其纲领和成员均具有强烈的抵抗运动色彩，因此在成立后发展很快，1945 年时其成员就达 23.5 万人。被誉为“解放的明灯”的戴高乐将军，主张“革新”，建立“民族的”、“强有力的国家”。

二、临时政府的建立及其活动

[临时政府的建立与改组]1944年6月2日，以戴高乐为首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临时政府。戴高乐在民族解放过程中进一步掌握了军政大权，其派往各地的总代表、军代表的权力高于全国抵抗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之上。戴高乐还向巴黎以及各省派遣了大批行政官员，准备接管各地的权力。然而，国内抵抗运动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法共手中还握有大量武装，使这些官员无法完全掌握各地的权力。因此，临时政府仍不得不承认各地的解放委员会。巴黎解放后，戴高乐力图独占政权并使之合法化。8月26日，当皮杜尔建议在市政厅阳台上宣布共和国成立时，戴高乐拒绝说：共和国一直存在着，自由法国、战斗法国、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都与它形成一体，维希政权过去和现在都是无效的和非法的，我本人就是共和国政府的主席，为什么还要宣布共和国成立呢？8月28日，戴高乐召集巴黎游击队的20个主要负责人，宣布解散“内地军”指挥机关和参谋部。

由于临时政府成员中大多数是跟戴高乐从阿尔及尔来的人，引起了国内抵抗运动派的不满，他们强烈要求改组政府。9月9日，临时政府改组。改组后的所谓“举国一致内阁”共有22名成员，两名共产党人狄戎和皮佑分别担任空军部长和公共卫生部长，这是法共第一次入阁参与执政。戴高乐兼任了这届政府的国防部长。戴高乐抗击德国法西斯，维护民族独立，需要借助人民的力量，但他又害怕人民力量发展壮大后危及资产阶级的统治，于是，他竭尽全力，采用各种手段限制法共和进步力量的发展。9月19日，他下令将内地军与正规军合并，由国防部统一指挥，继而又把全国抵抗委员会合并到咨询议会，把巴黎解放委员会改组为市议会。并下令解散爱国民警队的武装。戴高乐的这些决定和命令激起了广大国内抵抗战士和法共地方组织以及部分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反抗，为此纷纷举行群众示威和集会。为争取法共的支持，戴高乐在11月6日宣布赦免多列士。11月27日，多列士从莫斯科回到巴黎。11月30日，他发表了《为了胜利，为了法国的伟大而劳动和战斗》的演说，重申“只能有一个政府，一支共和国军队和警察”。后来在中央全会上强调：目前情况已经改变，人民武装不应该长期保留。由于多列士一再推行让步政策，使戴高乐得以解散在抵抗运动中创建起来的人民武装，夺取了抵抗运动的胜利果实。

[临时政府的对内政策]在政治上，临时政府对维希分子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清洗和惩办。一大批通敌分子受到法庭的审理。截至1946年8月初，共计判决了约35,000个案件，其中死刑案件约5千，强制劳动案件11,000件，有期徒刑案件19,000件。有4783人判处死刑，其中786人立即处死。1945年8月，最高法院判处贝当等18人的死刑，对贝当不久改判为终身监禁。10月组织特别法庭，对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叛国罪行进行审判，赖伐尔等3人被处决。

临时政府为了安定人心，及早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社会经济措施。针对当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政府断然执行紧缩通货政策，冻结了工资和物价。为缓解财政困难，政府在1944年11月发行了1640亿“解放公债”，1945年又发行公债1千余亿法郎。临时政府还根据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制定通过了一些有利于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政策和劳工政策，如家庭津贴、社会保险、奖励生育，带薪休假15天、

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等。1945年2月22日，政府颁布法令在企业设立由工人推选代表组成的企业委员会。凡有百名雇员的工厂，企业委员会有权商讨劳动条件，审查有关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报告。在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其权力更为扩大，可以协助工厂行政委员会掌握企业的管理，审理工厂的资产等。然而这条法令受到不少资本家的抵制，在许多私营企业里不过是一纸空文。

临时政府社会经济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大规模的国有化。这一时期的国有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44年到1945年的所谓“紧急时期”。临时政府把北方煤矿、雷诺汽车厂、法国航空公司和主要新闻机构收归国有。第二阶段是从1945年底至1946年，实行国有化的有法兰西银行和四大私人银行：通用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国民工商银行、巴黎国民贴现银行，34家保险公司以及电力公司、煤炭公司和煤气公司。

[临时政府的对外政策]临时政府在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特别是在欧洲的地位上，作出了重大努力。1944年春，美英策划在法国实行军事占领制度，建立盟国军政府，以便战后变法国为美国的附庸国。戴高乐在国内外抵抗运动支持下，同美国进行了斗争。在盟军进行诺曼底登陆前4天，全国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称临时政府。盟军登陆后，戴高乐坚持派遣法国精锐部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役，利用内地军配合盟军作战，尽量依靠本国的力量解放祖国，最终迫使美国放弃建立盟国军政府的方案。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外交处境极其艰难。6月2日成立的临时政府，直到10月23日才得到盟国法律上的承认。一些重要国际会议上，法国屡遭排斥。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美英苏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开会，草拟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法国被撇在一边。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法国也没能参加。会后，罗斯福希望回国途中在阿尔及尔会见戴高乐，后者愤然拒绝。同年7月的波茨坦会议也在没有法国人参加的情况下制定了多项处理战后德国的决议。因此，戴高乐政府就把摆脱美国的控制，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作为重要策略，希望到东方去寻求西方在对德政策问题上不愿给它的支持，并通过在东西方之间保持平衡，打开法国“参与处理欧洲事务的局面”。1944年11月，戴高乐在外长皮杜尔陪同下访问苏联，签订了为期20年的法苏同盟互助条约。戴高乐也不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争取美国的支持，在1945年8月对美国进行访问。但在欧洲，特别是对德关系问题上，法美矛盾并没有解决。

在殖民政策方面，由于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临时政府按照1944年1月布拉柴维尔会议精神，对殖民地人民作了一些让步，改变了殖民地的管理方式，允许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治，并在法国议会中给他们保留了一定议席。

三、第四共和国的诞生

[围绕制宪展开的斗争和戴高乐的隐退]1944年11月7日，戴高乐召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组成咨询国民议会。对确立何种政治体制进行讨论。这一问题又具体涉及到怎样制定宪法和由谁制定宪法的问题。对此，法国各派出现了三种不同的主张。第一派坚持认为1875年宪法仍然有效，现在需要做的仅仅是按照宪法的规定选出议会，如果选出的议会愿意对宪法作些修改的话，可由它来进行修改，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是激进党等党派。第二派主张建立一个拥有唯一最高权力的国民大会，立法权和行政权都要掌握在国家一级当选代表的手中，该国民大会不仅局限于起草宪法，还要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权力，持这种主张的主要是法共，社会党当时也倾向于这种主张。第三派则主张专门为制定宪法成立一个制宪议会；其权力和任期都应有所限制，这些限制应由临时政府拟定，然后由公民投票批准，持这种主张的有戴高乐本人及其拥护者。各派都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四处活动。

1945年7月9日，临时政府向咨询国民议会提议，决定于10月举行议会选举和全民表决，由人民决定是否授予咨询国民议会制宪权力以及规定授职后的国民议会的权限。议会以210票反对，19票赞成否决了这一提案。由于该国民议会属咨询性质，戴高乐临时政府对这一否决不加理睬，仍然坚持将提案提交公民投票表决。10月21日，法国就制宪议会进行公民投票，同时举行战后的第一次议会选举。表决前，戴高乐竭尽全力向选民呼吁，要对两个问题均持肯定的回答。人民共和党、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运动联盟以及社会党等也持相同意见。法共则要求选民对第一个问题肯定，对第二个问题否定。最后，公民表决的结果是以96%的绝对多数和66%的多数分别肯定了两个问题。法共的主张未能得到赞同。然而，在议会选举中，法共取得了159个席位，成为第一大党。人民共和党获得152个席位，社会党获得142个席位。根据惯例，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有权组阁。法共提议建立法共、社会党占多数的民主联合政府。然而，社会党则坚持成立一个以戴高乐为首，包括人民共和党的三党联合政府，法共被迫让步。11月13日，议会一致推选戴高乐为总理。11月21日，以戴高乐为首的三党联合的临时政府成立。

戴高乐为首的三党联合的临时政府成立后，议会是最髙权力机关，政府只是贯彻议会决议的执行机构。戴高乐无力解决战后法国经济的迫切问题。他反对美国控制的政策又受到国内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关系密切分子的指责。同时在分配部长职务时，又与法共和社会党产生新的矛盾。在政府内得不到多数的支持。在议会里他的政策又经常不能获得通过。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因军备案被否决，毅然宣布辞职，退居幕后，从而结束了历史上的“第一戴高乐时期”。

[1946年宪法]1945年11月29日，通过公民投票选举出由42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草案基本上按照法共和社会党的意图起草。1946年4月19日，制宪议会以309票赞成，249票反对通过了以一院制为基础，加强议会权力的宪法草案。人民共和党坚决反对这一宪法草案，社会党右翼也表示支持。5月21日，宪法草案付诸全民表决时遭到否决。第一个宪法草案遭到否决导致了制宪国民大会的解散。根据1945年10月21日法令，法国选民在6月2日选出了新的国民议会。在新的议会中，人民共和党因反对宪法草案，声望大增，获169席，成为第一大党。法共获150席，社会党获129席。

6月23日，人民共和党领袖皮杜尔当选为总理。皮杜尔政府重组宪法起草委员会，并竭力在宪法草案中反映各派政治力量间的平衡。8月2日，社会党与人民共和党联合提出了一个草案，并和法共达成了妥协。9月29日，制宪国民议会通过了第二个宪法草案。10月13日举行公民投票，以微弱多数获得通过。12月24日，宪法正式实施生效。

1946年宪法规定：第四共和国为资产阶级多党议会制国家。议会由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院组成。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民议会每5年选举一次，全民以比例选举制选出国民议会，以两级间接选举制选出共和国参议院。参议院的主要职责是为国民议会提供建议。两院联合选举总统，任期7年。国民议会有权颁布法律，批准国际条约，授权总理组阁，总统主持全国最高司法会议，有权提名内阁总理候选人。总统并无多少实权。内阁对国民议会负责，国民议会可以由于不信任提案解散内阁，也可以授权内阁。所以，根据宪法，法国成为典型的议会制国家。

1946年宪法体现了全国抵抗委员会的纲领，它规定了一定的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为进一步实行民主改革提供了法律基础。同时，宪法还确认了法国和平的外交政策，摒弃了一些旧的殖民政策的内容。可以说，1946年宪法是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民主的宪法之一。但由于法国毕竟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该宪法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烙印，它的许多条文具有资产阶级的虚伪性。

[国民议会选举与第四共和国最终确立 1946年11月10日，法国举行第四共和国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在新的国民议会中，法共重新成为第一大党，按照议会传统，法共作为第一大党理应组织政府。法共提出多列士为总理候选人，遭到了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抵制。人民共和党提出皮杜尔出任总理，也遭到法共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转向社会党的莱昂·勃鲁姆。勃鲁姆最初试图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但在分配部长职务问题上遭到失败。于是，他在取得了法共和人民共和党两方面的同意之后，在12月16日组织了一个清一色的社会党人“看守内阁”。勃鲁姆内阁成立后不久，进行了共和国参议院的选举。紧接着，国民议会和共和国参议院根据新宪法举行联席会议，选举共和国总统。在总统选举中，共产党和社会党联合竞选。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则各自提出自己的候选人。选举通过无记名投票进行。1月16日，刚当选的国民议会议长、社会党人樊尚·奥里奥尔以452票的多数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月21日，国民议会选举赫里欧接替奥里奥尔担任议长。至此，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告结束，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最终确立。

第二节 第四共和国的发展

一、三党联合执政及其失败

[没有戴高乐的三党联合政府]戴高乐宣布辞职后，法共、人民共和党、社会党等三个当时影响最大的政党在1月23日制定了“三党合作宪章”，重申三大政党必须协调一致，“避免任何有侮辱性的或者谩骂性的舌战和笔战，……发扬政府内部光明磊落的团结精神，以捍卫共同作出的政府决议。”1月26日，由社会党人弗利克斯·古安组织了一个纯粹的三党联合政府。法共的多列士和另一名人民共和党人同时担任副总理。古安政府的紧迫任务就是尽快地完成宪法的起草。第二届制宪国民议会选举前后，尽管三大党之间，尤其是法共和人民共和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法国政治也出现向右逆转的趋势。但是，三党联合执政的体制仍继续存在，在由人民共和党人皮杜尔组织的新内阁中，多列士仍为副总理。1946年宪法通过后，法共和人民共和党在总理职位问题上互不相让，于是，由社会党的勃鲁姆出任总理。樊尚·奥里奥尔当选为总统后，勃鲁姆内阁宣布辞职。1月28日，由另一名社会党人保尔·拉马迪埃组织第四共和国的第一届政府。新政府同时也是一个扩大了

的三党联合政府。

[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冷战的影响]拉马迪埃政府上台后，法国国内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困境一直笼罩法国，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工资冻结、粮食、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匮乏。食品定量制又被恢复，人民在苦难中挣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曾一度沉默的戴高乐以为时机已到，3月30日在布吕纳瓦尔的官方集会上，他当着5万听众的面猛烈抨击：“国家结构弊端百出，法兰西民族误入歧途，国家威信扫地”，认为“改造国家结构的日子就要到了”。4月7日，戴高乐在斯特拉斯堡宣布准备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4月14日，法兰西人民联盟正式成立，它宣称自己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个统一的联盟和组织，主张取消宪法，改革国家结构，建立“强力政权”，反对共产主义。并积极展开活动，争取选民。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立表明法国右派势力的加强，而与此同时，国内的左翼力量却受到了削弱，社会党与法共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逐渐脱离了和法共的合作。

国际形势对法国国内政治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美英已经拉开了“冷战”的帷幕，公然执行分裂方针，单方面合并德国占领区。1947年3月，杜鲁门发表演说，希望欧洲各国把共产党从政府中排挤出去，并以此作为获得美国经济援助的条件。法国政府为解决经济困境，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国际形势的这些变化，为法国右派的进攻创造了条件。

[三党联合政府的破裂]法共部长在政府中力图阻止拉马迪埃政府进一步投靠美国，反对法国在印度支那继续进行殖民战争，抗议对马尔加什人民起义的血腥镇压，因此，他们与拉马迪埃及其政府中其他党派的成员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1945年4月25日，法国最大的汽车工厂雷诺工厂3万多工人举行罢工，反对政府冻结工资。法共积极支持工人罢工斗争。而拉马迪埃政府中除法共外的所有成员都拒绝满足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5月4日，拉马迪埃政府在国民议会受到质询时，全部共产党议员和法共部长都投了反对票。拉马迪埃政府借口共产党部长破坏“内阁团结”，政策不能统一，在次

日的《公报》中刊登了一则消息：“1947年5月4日，共产党部长们在国民议会中投票之后，他们的部长职务被认为已经结束。”法共部长被驱逐出政府，三党联合政府破裂。

拉马迪埃驱逐法共部长后，重新改组内阁，社会党的部长几乎占了一半。改组后的内阁遇到了重重困难。由于粮食仍非常紧缺，政府将面包的每日配给量由250克降至200克。政府还以防止物价上涨为名，拒绝批准总工会与法国企业主全国理事会达成的关于普遍提高工资11%的协议。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更为不满，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不断发生。1947年10月30日，法共宣布断绝和社会党、人民共和党的政治合作关系，三党联合彻底破裂。11月，法国各地掀起了因马赛发生政府当局枪杀示威群众的流血事件而激起的罢工浪潮，法国大中城市共有300多万工人参加。与此同时，以戴高乐为首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也积极展开反对政府的活动。戴高乐在10月27日发表演说，要求进行新的议会选举，重申要修改宪法，并表示法兰西人民联盟将为“拯救法国”而继续斗争。遭受到左右夹击的拉马迪埃政府在11月19日辞职。

二、第三力量政府的统治

[何谓第三力量政府] 从 1947 年 11 月到 1952 年 2 月，是所谓的第三力量政府执政时期。“第三力量”一词最初出现于勃鲁姆的文章。1947 年，勃鲁姆针对戴高乐组成法兰西人民联盟和鼓吹改革国家结构、反对共产主义，撰文谴责戴高乐和法兰西人民联盟，标榜社会党是既反对法共，又反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第三力量。”第四共和国时期的第三力量政府是指排除了法共和法兰西人民联盟，由介乎其间的社会党、人民共和党、激进党以及温和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勃鲁姆在拉马迪埃辞职后试图组织第一个第三力量政府。11 月 21 日，他在要求国民议会授权时发表声明说：“现在有两个危险：一个是国际共产主义已经向法兰西民主公开宣战，另一个是，在法国已建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的目标——也许是唯一的目标——是剥夺国家主权的基本权利。”勃鲁姆因 9 票之差未能得到授权。次日，由人民共和党人罗贝尔·舒曼组阁。舒曼由此成为第一位第三力量政府的总理。舒曼内阁上台后，采取了一些较为有效的经济措施，同时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之下，使法国经济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社会经济秩序渐趋稳定。在政治上，舒曼内阁尽量避免与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矛盾，同时却坚持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破坏和镇压当时正处于高潮的工人罢工运动。第三力量政府的实质由此可见一斑。

1948 年 7 月，舒曼内阁因军事拨款问题倒台。从那时起到 1952 年 2 月，法国先后更换了 9 届政府。这些内阁要么由于社会经济原因，要么由于外交或殖民地方面的原因先后倒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 1950 年 2 月社会党在战后第一次离开政府起，第三力量政府就轮流掌握在人民共和党、激进党、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运动联盟手中，日益向右翼中间派过渡。

[1951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 1951 年 6 月，法国举行第四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选举。选举前，第三力量联盟的党派为保持自己的地位，箝制法兰西人民联盟、特别是法共的力量，操纵国民议会在 5 月 7 日通过了“选举制度改革法”。以一轮多数联盟制取代比例代表制。由于一轮多数联盟制在塞纳省和塞纳—瓦兹省反而对法共有利，新选举法特意规定这两个省份不实行一轮多数联盟制。选举于 6 月 17 日举行。新的选举制度导致选举中出现了极不公正的现象。最典型的是里尔第二选区的例子。在这里，人民共和党、社会党、激进党和独立派组成的选举联盟得到绝对多数，获得了全部 10 个议席。其中社会党以 10.7 万张选票得 5 席，人民共和党以 8.4 万张选票得 4 席。可是拥有 10.6 万张选票的法共和拥有 9 万张选票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却一席未得。选举结果，第三力量联盟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法共获 500 多万张选票，却只得 101 席，而按照原来的比例代表制则可得 180 席。法共成为新选举制的最大受害者。尽管如此，它在新的国民议会中仍保持了重要政党的地位。

第二届国民议会中有 6 个政党拥有上百名议员，所以被人称为“六边形议会”。由于没有一个党拥有绝对多数，因此不可能建立一党政府。同时又由于法兰西人民联盟反对第四共和国体制，所以也不可能组成六党联合政府。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力量联盟得以继续执政。8 月 10 日，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抵抗运动联盟的普列文组织政府。新政府的三大支柱是人民共和党、激进党和温和派。社会党没有入阁，但在议会中支持政府。不久，法兰西人民联盟就对私立中小学提供津贴问题挑起政治纠纷，导致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复杂化。议会在经过辩论后通过了巴朗热法，规定私立学校的学生和公立学校

一样可获得国家的补助金。巴朗热法引起了法共和社会党人的强烈反对，并最终导致了社会党和人民共和党彻底决裂。第三力量受到严重削弱。1952年1月7日，普列文政府由于社会党反对削减行政开支而倒台。1月20日，激进党人埃德加·富尔组阁。2月29日，富尔内阁因无法同时满足社会党和温和派的要求而辞职，标志着第三力量执政时期的结束。

[第三力量政府的外交政策]第三力量政府执政期间，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性进一步削弱。历届政府因国内政治经济的现实需要，加紧投靠美国。1948年，法国正式接受了马歇尔计划。同年3月17日又和英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四国在布鲁塞尔签订了一项为期50年的条约。条约的主要目标是加强西方联盟的防务，防止共产主义的西进，并为此建立了由5国国防部长组成的西方联盟防务委员会以及西方联盟参谋部和西方联盟司令官委员会。6月28日，法国同美国签订了《法美经济合作协定》，规定法国及其海外属地为美国提供原料，美国资本在法国居地内享有投资的便利。这一协定为美国资本进入法国打开了大门。1949年4月4日，法国又参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同意将北约组织的军事参谋部和一些军事基地设在法国。至此，法国进一步把自己牢牢地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朝鲜战争爆发后，法国还派兵参加了侵朝战争。在对德问题上，也在美英的压力下，步步退让，从对德实行严厉政策走上法德和解的道路，并以此为基础倡导欧洲联合。1950年5月9日，法国提出舒曼计划，主张把西欧各国的煤钢基本工业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一体化组织。同年10月26日，法国又提出建立欧洲军的普列文计划。

在殖民政策方面，第三力量政府力图通过法兰西联邦的新形式继续维持其在殖民地的统治。面对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浪潮，法国采取了军事镇压与玩弄政治手腕相结合的政策。扩大了对印度支那的殖民侵略。1948年在西贡扶持了一个以前安南皇帝保大为首的伪政权。在北非，用所谓不妥协政策取代了前期所采用的自由化政策，加强了对北非殖民地的控制和镇压。

三、右翼中间派政府的统治

[右翼中间派联盟执政]1952年3月6日，国民议会授权独立党人安托万·比内组阁。这是右翼在战后的第一次执政。从比内上台到1956年1月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先后执政的6届政府基本上由右翼的独立派和中间派的激进党、人民共和党结成的联盟组成。因此，这一时期亦称右翼中间派政府时期。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法国各党派矛盾加剧引起的。在国际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冷战上升到热战，美国为了增加自己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抗衡的实力，加强了对法国的拉拢和控制，这就为法国右翼势力的抬头提供了外部条件。在国内，由于法共和社会党先后被排斥出或退出政府，并同人民共和党彻底决裂，导致议会和政府中左翼和中派力量的削弱。而一向与政府作对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现在却开始逐渐支持右翼分子执掌的政府，右翼势力进一步加强。

比内政府上台之时，法国财政困难重重。于是，比内亲任财政部长，力图稳定一直不断上升的物价和工资。正好这时世界物价经过几年因朝鲜战争引起的通货膨胀后已开始下跌，为比内财政、经济政策的一度成功提供了较好的机会。比内政府还使议会通过工资指数法，使最低工资限额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随着物价波动。为了减少资金外流，政府宣布对外流的资金免予征税。此外政府还发行黄金公债，并紧缩国家的财政开支。但是比内政府在执政后期也遇到了许多困难，特别是由于物价仍在缓缓上涨，迫使比内在9月11日决定把物价冻结在8月31日的水平，将自由经济转变为统制经济。12月23日，比内政府因为在预算问题上未能得到人民共和党的支持宣布辞职。

[拉尼埃政府的内外政策]比内政府辞职后，激进党人勒内·梅耶在1953年1月8日组成新政府。梅耶内阁仅存4个多月就宣布下台。之后，法国出现了持续一月有余的内阁危机。6月27日，独立党人约瑟夫·拉尼埃出任政府总理。拉尼埃政府采取了“稳定中求扩张”的经济政策，即在物价稳定情况下增加生产和提高工资。此外还颁布了一系列紧急措施法令，企图通过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解决财政经济困难。对此，广大人民群众极为不满。8月5日，由于政府公开表示打算推迟国营公用事业部门的退休年龄，触发了战后法国最大的罢工活动。首先罢工的是邮电工人，紧接着，铁路工人、矿业工人、煤气工人和电气工人也加入罢工队伍，人数多达400万人。这次罢工使法国全国陷入瘫痪。政府当局只得以军用车辆代替电车维持城市交通，由士兵代替邮递员工作。工人的英勇斗争迫使政府对紧急措施法令进行修改。

拉尼埃政府在印度支那问题上采取了拖延政策，继续进行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印支战争给法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并日益成为法国在政治、经济上的重大包袱，所以已极为不得人心。要求停止印支战争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在人民的压力下，拉尼埃政府被迫答应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讨论恢复印支和平的问题。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经过55天的战斗，完全解放了奠边府，歼灭法军16000人。奠边府大捷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殖民主义，也加速了拉尼埃政府的垮台。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宣布下台。

[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和印度支那停战]1954年6月17日，激进党左翼领袖孟戴斯—弗朗斯组成新政府。孟戴斯—弗朗斯力图革新法国政治，起用

了不少年轻人担任部长。新内阁的许多措施带有左翼联盟政策的色彩，社会党虽没有参加政府，但却是政府的支持者。孟戴斯—弗朗斯内阁最引人瞩目的事情就是果断地解决了印度支那问题。孟戴斯—弗朗斯本人在上台前就是资产阶级政界人士中反对拉尼埃政府对印度支那战争采取拖延政策的主要代表，上台后即把果断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己任。他在6月17日的就职声明中宣布：“我们一定要在一个月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到了7月20日，我们还没有达到目的，如果日内瓦谈判还没有结束的话，我就重新回到这里来，代表我的政府向国民议会辞职。”由于中国、越南和苏联的努力，也由于孟戴斯—弗朗斯内阁的积极态度，7月20日深夜，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谈判终于达成协议。7月21日，签订了关于在印度支那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并发表了最后宣言。印度支那殖民战争是第四共和国的一个沉重包袱，法国历史学家、《第四共和国》的作者福韦算了一笔总帐：6年半战争、3万亿法郎、死92000人，伤114000人。孟戴斯—弗朗斯上台伊始即果断地解决了这一持续多年的问题，大大提高了他在公众舆论中的声望。

但是，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并没有在“左倾”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阿尔及利亚人民在1954年11月举行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时，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再声称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叫嚣“我们对叛乱决不姑息、决不妥协……不论哪一届议会、哪一届政府永远不会在这个基本原则让步。”其态度与半年前解决印支问题时迥然不同，从而也暴露出政府的真实面目。由于孟戴斯—弗朗斯内阁坚持在阿实行顽固的殖民主义政策，以及在欧洲防务集团、限制家庭酿酒特权等一系列国内外问题上遭到众多反对派的反对，1955年2月15日，该政府在议会以319票对273票被推翻。接着由埃德加·富尔组阁。

第三节 第四共和国的失败

一、共和阵线政府

[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和共和阵线政府]富尔政府非但没有实行组阁时许诺的财政经济改革，反而扩大了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并为此追加军事预算，延长士兵服役期限。这一政策遭到了舆论的广泛谴责和左翼反对派的强烈反对。内阁也在11月29日的议会信任投票中以318票反对，218票赞成被推翻。由于宪法规定在不到18个月的时间若出现两次由议会绝对多数造成的内阁危机，政府有权解散议会。12月2日，富尔政府下令解散国民议会，并决定提前于1956年1月2日举行第三届国民议会选举。选举过程中，各派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成两大选举联盟。一是政府联盟，即右翼中间派联盟；一是共和阵线联盟，即左翼中间派联盟。法共在选举中提出彻底改革国家政策的建议，并向共和阵线联盟提议团结民主力量共同行动，但遭到拒绝。此外，极右派的布热德分子也参加了竞选，他们反对代议制，鼓吹建立法西斯的专政。

选举揭晓，法共在国民议会中获得150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党获95席，人民共和党获73席，形形色色的右翼党派惨遭失败，只有极右派的“布热德运动”意外地获得了52席。这次选举表现公众的情绪再次明显地倾向左翼。选举结束后，法共向社会党和激进党提议建立人民阵线政府，遭到了两党的拒绝和右翼集团的阻挠。于是共和国总统科蒂选择社会党人出面组阁。1956年1月31日，以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为首的共和阵线政府宣布成立。

[摩勒政府的内外政策]摩勒政府是第四共和国执政时期最长的政府。新政府上台伊始，在社会经济领域积极推行工业现代化计划，并为了反对“社会不公平现象”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措施，如建立全国互助基金会、增加养老金、将带薪休假时间由2周延长到3周。此外还积极反对法郎贬值。在外交政策上，摩勒政府主张和平解决北非问题。1956年2月摩勒在赴阿尔及利亚视察时表示要恢复阿尔及利亚的和平。3月，承认突尼斯和摩洛哥的独立。摩勒政府还注意寻求东西方接近的新途径，5月，摩勒在外长陪同下访问苏联，并声称必须考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关系的缓和。摩勒政府因此而一度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和支持。

但是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下，摩勒政府的政策日渐向右转，这在阿尔及利亚及苏伊士运河问题上表现最为突出。政府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的军事行动，将在阿的法国殖民军增加到40多万人，并多次采用卑鄙手段破坏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争取友好国家帮助的活动。1956年10月22日，本·贝拉等5位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从摩洛哥飞往突尼斯，法国政府指示本·贝拉等乘坐的飞机上的法国机组人员在中途着陆，并拘捕了这5位领导人。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摩勒政府伙同英国政府经过3个月的策划和准备，利用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发动了苏伊士运河战争。侵埃战争遭到埃及军民的英勇抵抗，美国又趁机要挟英法，11月6日，法英被迫宣布停火。侵埃战争的失败使摩勒政府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政府越来越不得人心，终于在1957年5月被迫下台。

二、陷入困境的第四共和国

[垂危的政局]摩勒政府垮台后，议会授权激进党人布尔热—莫努里组阁。布尔热—莫努里内阁仍以激进党和社会党人为主组成。执政仅三个来月，因在阿尔及利亚的《根本法》问题上遭到反对而下台。经过长达 35 天的内阁危机之后，由激进党人弗利克斯·盖伊阿在 11 月 5 日组成了一个有人民共和党、戴高乐派和温和派人士参加的所谓“全国团结内阁”。其中人民共和党的弗林姆兰任财政部长，戴高乐派的沙邦—戴尔马任国防部长。盖伊阿政府继续丧心病狂地坚持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为了阻止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边境补充给养，法国空军在 1958 年 2 月 8 日惨无人道地轰炸了与阿毗邻的突尼斯小村庄萨基埃特。此日恰逢赶集，结果 69 位无辜平民被炸身亡，其中 21 人为儿童。这一骇人的暴行激起世界（包括法国）人民的极度愤慨。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下令包围还驻在突尼斯的法军，并立即向联合国提出控诉，要求英美进行“调停”。盖伊阿政府迫于国际舆论的压力不得不同意英美“调停”。但是，盖伊阿在 4 月 15 日要求议会批准接受调停时遭到反对，同日盖伊阿内阁宣布下台，法国再度出现内阁危机。

[5·13 事件]盖伊阿内阁倒台之后出现的内阁危机延续了 4 周之久。1958 年 5 月 8 日，共和国总统科蒂召请人民共和党领袖皮埃尔·弗林姆兰组阁。但由于弗林姆兰是公认的以实力求和平的对阿政策的拥护者，因而遭到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集团和法国驻阿军队中的极端殖民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弗林姆兰的政策斥之为“放弃政策”。前驻阿尔及利亚驻节部长罗贝尔·拉科斯特公开地表示担心法国正在“向一个外交上的奠边府”进军。驻阿部队总司令拉乌尔·萨朗打电报给巴黎的国防部总参谋长保罗·埃利，报告军队以叛乱反对谈判的可能性。因此，议会讨论授权弗林姆兰组阁便成了 5·13 事件的导火线。

5 月 13 日下午，正当巴黎的国民议会为弗林姆兰授权问题进行辩论时，阿尔及尔的叛乱分子发动了 10 万人进行示威游行和武装叛乱，他们占领总督府大楼，并成立以驻阿伞兵司令雅克·马絮将军为首的救国委员会。同日，萨朗将军起草了一份致总参谋长埃利将军请转科蒂总统的电报，要求在巴黎有一位能够主持全国大局的人出来组成一个可使阿尔及利亚公众舆论安心的救国政府。由这位最高权威人士发出和平的呼吁，重申使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坚定决心，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局势。翌日凌晨 5 时，马絮将军公开呼吁戴高乐打破沉默出面组织一个救国政府，把阿尔及利亚从外交上的“奠边府”惨败局面中拯救出来。

三、戴高乐东山再起

[戴高乐力图东山再起]5·13事件是一场军事叛乱。极端殖民主义者是叛乱的发动者和主要力量，叛乱的目的旨在反对政府“软弱无力的对阿政策”，维护自己的殖民利益。驻阿军队将领和戴高乐派分子也参与了叛乱，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第四共和国体制，拥戴上台。此时的极端殖民主义分子也乐意拥护戴高乐上台，作为其殖民利益的维护者。

这一切对于戴高乐来说，无疑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戴高乐自1953年隐居科隆贝以来，表面上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实际上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势力，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执政。在5·13事件中，戴高乐虽没有直接参与，但实际上是与闻其事的。他与在事件中起重要作用的莱昂·德尔贝克的联系就是例证。德尔贝克从1957年12月至58年5月往返巴黎与阿尔及尔之间多达27次。当德尔贝克向戴报告现在公众的情绪都在赞成将军再度出山时，戴高乐向他暗示，一旦召唤到来，他将起来响应。另一戴派要员雅克·苏斯戴尔也秘密前往阿尔及尔进行拥戴活动。

5月15日上午10时，当萨朗将军在德尔贝克鼓动下，在阿尔及尔喊出“戴高乐万岁”的口号之后4小时，戴高乐终于打破多年的沉默，向报界散发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准备担负起共和国的权力”。这一声明打响了重新上台的第一炮，在舆论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为了消除某些人的不安和疑虑，争取多数政党支持，戴高乐在5月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否认支持5·13叛乱，表白自己无意侵害公共自由，并吹嘘自己过去执政时的政绩，重申准备执掌共和国的权力。5月24日，一支从阿尔及利亚出发的伞兵部队未发一枪一弹就在科西嘉岛安然登陆并建立政权，由马赛派往科西嘉岛恢复秩序的宪兵队被解除武装。据内政部估计，类似的入侵将在法国本土发生。此事加快了戴高乐争取上台的进程。5月26日深夜，他约请弗林姆兰总理在圣克卢博物馆主管人家里秘密会晤。次日，他在新的公开声明中宣布：“我已经开始了为建立一个能够确保国家统一和独立的共和政府所必须的正常程序。”

[第四共和国寿终正寝]1958年5月27日，弗林姆兰内阁辞职。同一天，法国总工会发动工人罢工。28日，左翼发动200多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5·13叛乱分子。群众运动的高涨，使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看到了新的人民阵线的危险，更迫切地感到有必要改变议会政治软弱无力的状况，有必要推出一个铁腕人物建立“强力政权”。而戴高乐正是最适合承担如此重任的人物。20日，科蒂总统向议会两院发出咨文，宣布已吁请戴高乐担任总理，如果议会拒绝授权给戴，他本人将辞去总统职务。是夜7时半左右，戴高乐来到爱丽舍宫，并很快与科蒂总统达成了协议。5月30日，戴高乐在科隆贝接见各党派的来访者。31日，戴高乐在巴黎戴派的总部拉佩鲁斯饭店召集除法共外的各议会党团负责人开会，当场阐述其执政纲领。6月1日，戴高乐宣布完成新政府的组织工作。戴高乐在议会讲坛宣读了总理候选人的例行声明，他不仅要求国民议会授权他组阁，还要求赋予新政府6个月的全权。国民议会以329票对224票通过授权戴高乐组阁。6月2日、3日，议会又通过3项议案：重新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经参议院同意，国民议会宣告解散。至此，戴高乐便作为第四共和国的末任总理东山再起。

为期 12 年的第四共和国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

第四节 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影响

[莫内计划与战后经济的重建]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三党联合政府与第三力量政府基本上沿袭了戴高乐临时政府的经济政策，采取多种措施以促进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莫内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让·莫内曾主持过战时抵抗运动的后勤供应和美援的组织工作，是一位有魄力、有远见的实干家。他关于恢复经济与实现现代化同步进行和争取法国大国地位的设想，深得戴高乐的赞赏。战争使法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必须集中使用有限的资源、人力、资金和美援，恢复基础工业部门，并为实现法国工业和农业的现代化创造条件。因此，编制全国性的经济计划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1946年，莫内组建计划总署并编制出《现代化与装备计划》（1947—1953），简称莫内计划。1947年，该计划经过政府批准正式实施。莫内计划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全国性计划。它以发展煤、电力、钢、水泥、运输、农机、石油和化肥等基础部门为重点，规定全国生产在1948年要达到1929年的水平，1950年超过1929年水平的25%。经过几年努力之后，莫内计划确定的目标基本实现。从1947年至1953年，煤炭生产从原来的4700万吨增加到5800万吨，发电量从210亿千瓦时增加到400亿千瓦时，钢产量从6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遭到战火破坏的交通运输设施得到了修复和改善。莫内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对战后法国经济的恢复和重建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由于生产的发展，1949年1月取消了面包配给制。几个月后，其他生活用品的配给制也宣布取消。但农业发展仍很缓慢，通货膨胀持续存在。又因印度支那殖民战争的扩大和持续，致使军备开支猛增，财政困难进一步增加。

[50年代法国经济的发展]继莫内计划之后，从1954年起法国又开始实行为期4年的第二计划（1954—1957年），该计划又称伊尔斯计划，由莫内的后任得名。第二计划规定了工业、农业和建筑业等部门的全面发展指标，要求外贸平衡，注重产品质量，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强科学技术研究。第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使法国经济得到新的发展。整个50年代成为法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显著提高，1950年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849亿法郎，1958年时增至2603亿法郎。工业生产有了长足的发展。195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1939年指数的两倍，特别是在电力、煤炭、石油、汽车、飞机、制铝等方面更是飞速发展：1957年发电量为580亿千瓦时，钢产量为1400万吨，化学工业产量翻了一番，煤炭产量已达到法国历史上的最高点，快帆式喷气客机试制成功，旅游汽车的生产从1952年的37万辆提高到1956年的64万多辆。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工业结构开始发生越来越大的变化，生产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集中程度进一步加强，中小企业的处境日益困难，不少中小企业被大企业兼并。这种现象在重工业和化学工业部门尤为突出。

农业现代化使50年代法国农业生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1950年，农业生产已超过战前水平。1954年与1951年相比，小麦产量增加了48%，土豆产量增加了32%，葡萄酒产量增加了11%，甜菜等其他的农产品也均有所增长。在种植业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有很大发展，畜牧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不断提高。这一时期农业的现代化使法国的农业结构，特别是经营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土地兼并加强，大块土地集中，广泛地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农业生产专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完成保证了法国农业生产在农村劳力大大减少的情况下继续稳步发展，使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交通运输、内外贸易以及其他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也很快。铁路已广泛地使用了电气机车，1954年时就已占全铁路线的42%，1955年底，“密斯脱拉风号”列车开始在巴黎——马赛的铁路线上运行，平均时速108公里，成为当时法国最快的列车，公路和水上运输量成倍增加，对外贸易也迅速发展。

[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影响]法国经济在50年代中后期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后初期经济的恢复和重建为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科技革命、国有化和计划化的实施为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国际局势的相对缓和、西欧联合步伐的加快则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经济的飞速发展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第一、法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产日益适应国际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法国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差距在缩小。第二、工业人口和第三产业人口迅速增加。工业部门新增加的就业人数主要集中在设备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如飞机、机械、化工、船舶、原子能……），纺织、煤矿等传统工业部门的工人增加不多，甚至开始逐渐减少。第三产业人口增加的速度又大大超过整个工业人口增加的速度，商业、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直线上升。第三、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由于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劳力，且城市生活毕竟比农村优裕、便利，许多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总想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土地，转入别的行业工作，使农业劳动力大量外流，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老化问题愈益严重。第四，农业劳动力和外籍工人大批涌入法国城市，弥补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促进了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法国社会都市化的进程。但由于大城市收入高，使得一些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巴黎人口过度集中，人满为患。而城市设施和住宅建设的发展又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要，导致城市秩序混乱，并出现一系列新的问题。

应当指出，法国在5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相对的。法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经济地位并未提高。从1950—1960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5%，虽高于英国（2.8%）、美国（3.2%），却落后于意大利（5.5%）、西德（7.7%）和日本（9.8%）。同时，由于法国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决定了战后法国同样无法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二、思想与文化

[萨特与存在主义哲学]第四共和国时期，存在主义哲学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存在主义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等反理性主义哲学的继续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主义的中心由德国转向法国。法国由于战争期间长期处于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自由统统被法西斯分子践踏在地。战争结束后不久，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又相继爆发，接二连三的炮火在人们心中投下了新的阴影。战后资本主义生产的畸形发展，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异化现象。人与自然之间失去了平衡、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和谐。当时法国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为消沉颓废、悲观失望等气氛所笼罩，在知识分子中由于苦闷、孤独、被遗弃、找不到出路而形成一种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风尚，旧的价值观念已土崩瓦解。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哲学由于强调“自由”和“责任”两个概念，使他们得以面对恐怖和荒谬而不失去人的尊严，从而为他们提供了暂时的精神归宿。

萨特是存在主义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大致经过4个时期：1. 建立存在主义本体论；2. 从哲学思辨转向对社会问题的思索，主张“行动哲学”；3. 试图把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4. 试图超越马克思主义。萨特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的哲学活动基本上属于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从前一时期的晦涩的哲学思辨转向了对社会问题的思索，重点是讲人道主义，强调存在先于本质，人是绝对的自由，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反对宿命论，宣扬选择自由和人的责任。《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是此时期的代表作。萨特这一时期在政治上也一直比较进步。1945年，萨特与梅洛—庞蒂等几位知识界名流联合创办激进的《现代》杂志。1948年，他参加了一个名叫“革命民主联盟”的知识分子组织，后来因为该组织日益倾向美国，便声明退出。从50年代初起，萨特与共产党人接近，自称是“同路人”，试图在党之外思考真理，并且希望党能利用他思考出来的真理。1954、1955年，萨特曾两次访问中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和支持。萨特还积极支持国际进步与和平事业，在1952、1955年出席了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是战后西方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第四共和国时期正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迅速发展并达到鼎盛的时期。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萨特、加缪和波伏瓦。

萨特不仅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的象征，而且也是法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首席代表。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首先是哲学，其次才是文学。他的作品往往把阐述一种哲学观点作为作品的出发点，把存在主义哲理作为作品的核心内容，把宣扬这种哲学理论作为作品的写作目的。这种以文学戏剧形式出现的萨特存在主义，远比他的庞杂晦涩的哲学著述的影响要大。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了现代西方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人文学说与现代派文学的合流。它是一种特殊的哲学现象和文学现象，并在思想上对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新小说等文学流派以深刻的影响。196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但萨特以“谢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拒绝接受。

阿尔贝·加缪（1913—1960）是一位重要的存在主义作家。虽然他后来与萨特分道扬镳并在生前一再表示自己不是存在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和

创作实践都使世人始终将他和萨特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加缪在 1942、1943 年接连发表了代表作《局外人》、《西绪福斯的神话》，声名大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他又发表了著名的作品《鼠疫》（1947）、《戒严》（1949）、《正义者》、《反抗者》（1950）。加缪的大多数作品哲理性都很强，无论作品中的人物，还是事件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哲学观点。其作品在语言上也很有特色。为了与存在主义主人公的性格特点相统一，他善于用一种刻板、拘谨、干巴巴的语言来表现作品里的主人公。法国一些评论家将此称为是“空虚的存在”的写作风格。

存在主义文学的另一位代表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是萨特的终身伴侣。她在 1929 年与萨特同时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先后在马赛、鲁昂、巴黎等地任教。1943 年，波伏瓦发表了小说《女客人》，这部小说被认为是与萨特的《恶心》齐名的存在主义作品。自此她开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他人的血》（1944）、《人无不死》（1947）、《吃闲饭的嘴》（1954）、《一代名流》（1954）。波伏瓦还写了大量理论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二性别》（1949）。这部巨著轰动一时，被称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称为西方妇女的“圣经”。

[荒诞派戏剧]荒诞派戏剧是在西方兴起的一种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其中以法国的荒诞派戏剧影响最大。这一流派起初被统称为先锋派戏剧。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在法国先锋派戏剧中，几位法籍外国人缪尔·贝克特、尤金·尤内斯库、阿瑟·阿达莫夫等人在他们的一系列剧作中蔑视一切传统的戏剧形式。公开掀起“反戏剧”的旗帜。他们反对传统戏剧的要有连贯情节，揭示矛盾、展开冲突、得到解决的三部曲公式，强调用离奇的、夸张的、荒诞的、象征的手法突出人的精神苦闷。他们还打乱时间顺序，使戏剧成为超脱时间的、抽象的东西，从而让其具有“普遍的人性”，并试图使观众通过赤裸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的没有情节、没有个性、没有合乎逻辑的语言的怪诞的、非理性的舞台形象本身来认识世界。荒诞派戏剧可以说是存在主义哲学在戏剧园地中结出的果实，它用特殊的方式曲折地反映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部分现实，尤其是反映资本主义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生活的平庸、思想的空虚和困惑、心情的苦闷与焦虑。荒诞派戏剧产生之初并不被人们承认，更不被人们重视，甚至遭到鄙视与冷遇。但是，贝克特等人并没有灰心丧气。1953 年，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上演获得成功。之后，他们那种荒诞不经的作品逐渐得到学术界与知识圈的尊重和赏识，影响迅速扩大，成为风靡于欧美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剧流派。

法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是贝克特、尤内斯库和阿达莫夫。贝克特 1906 年出生爱尔兰，1938 年起定居法国。主要剧本有《等待戈多》（1953）、《剧终》（1957）等。由于他在戏剧方面的卓越成就，在 196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与贝克特一起被公认为荒诞派戏剧重要奠基人的尤内斯库于 1912 年生于罗马尼亚，翌年随父母在巴黎定居，此后基本上住在法国。1949 年尤内斯库创作了《秃头歌女》，上演时被观众喝了倒彩。1950 年法国著名剧评家雷蒙·格诺肯定了《秃头歌女》的文学价值之后，尤其是他的《椅子》等作品获得成功以后，其戏剧才逐渐被人们接受，并成为欧美舞台上红极一时的人物。1970 年他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阿达莫夫是除贝克特、尤内斯库外法国最重要的荒诞派戏剧作家。他出生于高加索，从 40 年代末起开始创作荒诞派戏剧。他的创作可以 1954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创作的主要作品

有《讽刺诗文》（1947）、《大家的敌人是大家》（1952）等。后期创作以“政治剧”为主，主要作品有《弹子球机器》（1954）等。

第十七章 第五共和国

第一节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

一、新的政治体制的确立

[政治体制改革与制订新宪法]戴高乐上台后，即对原有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革，努力建立新的政治体制。新体制的宗旨是革除滥用议会权力的弊端，重新调整总统、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即扩大总统和政府的权力，削弱议会的权力与地位，变传统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半总统制共和国。戴高乐的体制改革主要是通过制订新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来完成的。

第五共和国宪法以戴高乐 1946 年 6 月 16 日在贝叶的著名讲话精神为基本思想，在司法部长米歇尔·德勃雷领导下制订。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两个委员会，即由宪法专家组成的技术性委员会和由部长组成的部际委员会。先由技术性委员会起草，7 月下旬交部际委员会讨论。8 月上旬，宪法草案提交给新近成立的宪法咨询委员会审议。随后，最高行政法院也对草案进行了一次讨论。9 月 3 日，政府正式通过宪法草案。9 月 4 日，戴高乐在巴黎共和广场向全国公民提出了这个草案。9 月 28 日，举行公民投票，结果投赞成票的人占投票总数的 79.25%，弃权人数极少，只占 15.1%，这是自 1936 年人民阵线议会选举以来弃权人数最少的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这次政治体制重大改革的关切和支持。10 月 5 日，新宪法正式公布。

[新政治体制的特征]从宪法条文的变动和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实践来看，新政治体制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总统不再是“虚位元首”，其权力和地位大大增强和提高。第三、第四共和国时期，法国总统大多处于“虚位元首”状态。新政治体制一反传统，大大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共和国总统按其地位和权势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居于国家机器的中心地位。新宪法中有关国家元首的条文写在第二章中，即紧接着“主权”这一章的后面，在其它各章之前，以示共和国总统在宪法中属于首位，而在以前的各种宪法中则是议会居于首位。总统由一个来源更为广泛的选举团选举产生，而不再由参、众两院联合选举产生。新宪法赋予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总统任命总理，并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其他部长，有权主持内阁会议、宣布法律，可以无须内阁连署，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提交公民投票等等。特别是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总统可以援引宪法第十六条，根据形势需要采取非常措施。总统权力之大，在法国共和制度史中是少有的。

第二个特征是扩大政府的权力，政府成员非议员化。新宪法对政府的权力作了明确规定：政府决定并指导国家的政策。新宪法还规定议员职务和政府职务不得同时兼任。议员一旦被任命为部长，就得辞去议员职务，并在本届议会的全部任期内由他的候补人代替。此举使政府的实际结构非议员化，或至少部分地非议员化，在一定程度上便于政府摆脱议会党派的箝制，提高政府对议会的相对独立性。新宪法还改变了只有议员才能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陈规，便于从议员之外挑选部长，使得有可能改善政府本身的素质，提高其效率。

第三个特征是限制和削弱议会的权力和地位。议会的活动期限大大缩短，每年只能举行两次例会，每次不得超过3个月。议会只能按照明确的规定进行活动，议会本身不能决定这些规定，而政府有权确定议事日程，有权参与议会讨论。这与第四共和国时期国民议会有制定议会法规和安排议事日程的最高权力的规定完全不同。从表面上，议会仍拥有立法权与监督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是徒有虚名。新宪法明确规定了法律和条例的界线，除了宪法规定的纯属议会和立法方面的事项外，制定条例的权限属于政府和国家元首。即使纯属法律范畴的议案，总统也可以超越议会直接由公民投票表决。新宪法还取消了议员对政府的质询，这就使议会失去了制约政府的传统手段。新宪法还使得弹劾权和信任权很难发挥作用。新宪法加强了参议院的权力和地位，让两院互相制肘。当总统不能行使其职责时，不再由国民议会议长代理，而改由参议院议长代理。以上规定使议会，特别是国民议会的权力和地位大大下降。

[戴高乐派统治的确立]新宪法在公民投票中获得通过之后，戴高乐政府就组织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建立新的政权机构。

各个政党都在积极准备议会选举。但左翼政党力量涣散，共产党十分孤立。右翼政党，特别是独立农民党异常活跃，甚至建议各个反马克思主义运动达成谅解。戴高乐派内部分为三大派系，在苏斯戴尔的协助下，于10月1日法兰西复兴联盟，社会共和党、共和国会议三派组成了保卫新共和联盟。选举前，政府内部围绕投票方式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在戴高乐的干涉下，决定废弃比例代表制，采用单记名多数二轮投票制，并以9.3万名居民为一个标准选区，把全国划分为465个选区。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分别于11月23日和11月30日举行，结果右翼政党，特别是保卫新共和联盟取得了巨大胜利，左翼政党则一落千丈。在465个席位中，保卫新共和联盟获198席，而共产党只获10席。在这次议会选举中，投票制度及选区划分原则对左翼各党，尤其是对共产党极为不利，如共产党获得了20%的选票，但只有2%的席位。而与此同时，保卫新共和联盟的席位却比按比例代表制可获得的席位多了一倍半。12月9日，新国民议会选举戴高乐派的沙邦—戴尔马为议长。

12月21日，由国民议会议员、参议院议员、省参议员、市长和市参议员组成的选举团选举共和国总统。参加总统竞选的除戴高乐外，还有共产党候选人乔治·马拉内和非共产党的左翼候选人阿尔贝·夏特莱。戴高乐获得了80000张选票中的62394票，以绝对多数击败对手，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1959年1月8日，新总统前往爱丽舍宫就职，次日，新总统任命原司法部长、戴高乐派的重要成员德勃雷为第五共和国第一届政府总理。至此，第五共和国新体制正式确立。

二、解决内政外交中的两大难题

[财政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戴高乐重新上台之际，法国财政濒临破产边缘。1958 年国家预算中的赤字至少达 12000 亿法郎，外债超过 30 亿美元，其中半数要求在一年之内偿还。

戴高乐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采取许多临时性措施：大量发行公债，紧缩行政机构的办公费用和推迟增加公职人员的薪金。降低小麦价格，降低多种商品的零售价，提高商业税，并对公司企业和奢侈品征收 500 多亿法郎的附加税。提高汽油售价，减少或暂停支付许多建筑和装配工程已经核定的用款。这些措施减缓了由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限制了国内消费，并使对外贸易状况出现好转的势头。

为更有效地解决财政问题，戴高乐在 1958 年 9 月 30 日成立了以著名财政经济专家雅克—吕夫为首的财政委员会。12 月 8 日，该委员会向戴高乐提交了一份系统的改革计划。计划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的中心内容是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紧缩开支，增加收入，暂时压缩国内消费，增加储蓄，并使生产转向出口方向。为此，计划中提出了一套严格的措施，如公营部门的薪金一律限于增加 4%。从 1959 年起停止支付非残废的退伍军人的补助金，并对公司企业和高额收入增加税收，对酒、酒精、烟草增加附加税。为了使新增加的负担尽量不影响收入微薄的人，政府给予最低保证工资 4%的资助金，家庭津贴在 6 个月内提高 30%，老年人退休金增加 5200 法郎。

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货币方面的一系列决定，其目标是把法郎重新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使法国的产品价格在世界市场的争夺中具有竞争能力。计划建议法郎贬值 17.5%，实行一种具有稳定不变的价值的新法郎，每一新法郎等于 100 旧法郎。

计划的第三部分是摆脱实行一个世纪之久的保护贸易主义，实行自由贸易。通过竞争使法国在经济领域内重新恢复国际地位。计划建议从 1959 年 1 月 1 日起直接和欧洲国家交换 90%的产品，和美元地区的国家交换 50%的产品。

这一计划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戴高乐排除种种阻力，由内阁会议以法令形式批准该计划的执行。该计划实行六个月后，法国经济从衰退走向复苏，失业人数减少，物价上涨率降低，出口活跃，外汇储备增加，工业结构渐趋合理，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是戴高乐重新上台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戴高乐采取非常谨慎的作法，整整花了 4 年时间才使这一问题得以解决。

从 1958 年 6 月至 1959 年 9 月，戴高乐首先花了一年多时间试探各方态度。1958 年 6 月 4 日，他首次视察阿尔及利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理解你们”，6 月 6 日在莫斯塔加内姆甚至高呼“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与此同时，戴高乐还提出关于在军事方面实现和平的“短期政策”和关于阿实行和平以后的前途问题的所谓“长期政策”。由于戴高乐未把阿的独立作为实现和平的前提，短期、长期政策均遭阿民族解放阵线的拒绝。1959 年 9 月 16 日，戴高乐在广播演说中第一次提出要在阿实行“自治”政策，提出了自治的条件和时间——恢复和平的第四年，并提出了三种方案：与法国分离、完全法兰西化、同法国紧密联合的阿尔及利亚，让阿尔及利亚人自由选

择。

但是，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并不赞成戴高乐的“停火、安抚、自决”三部曲，要求就阿的政治前途进行会谈。同时，戴高乐的自决政策也遭到了极端殖民主义者的强烈反对。1960年1月24日，当戴高乐撤换马絮将军并召他回国时，极端殖民主义分子立即在阿尔及尔发动了称为“街垒周”的叛乱。戴高乐在阿宣布非常状态，强令叛乱者放下武器。叛乱者于2月1日宣布投降。戴高乐与阿临时政府代表团在6月25—29日于默伦会谈。戴高乐坚持停火是谈判的前提，阿临时政府则认为不提供实现自决的保证就不停火。谈判在维持了四天以后宣告失败。

此时，法国公众对于戴高乐这种优柔寡断的政策日渐不满，出现了由知识分子和工会领导的争取阿尔及利亚和平运动。在法国人民的压力下，戴高乐又于11月4日在电视讲话中再次提出自决政策，并要求举行公民投票。1961年1月18日公民投票的结果表明大多数法国人拥护戴高乐的自决政策。2月27日，戴高乐和布尔吉巴进行会谈。随着戴高乐自决政策的重新提出和法阿双方的初步接触，极端殖民主义者也加紧活动，并成立了从事暗杀活动的恐怖组织“秘密军队”。4月22日，曾担任过驻阿殖民军队统帅的夏尔、萨朗、儒奥、泽勒四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戴高乐对此采取强硬政策，决定执行宪法第十六条。迫于戴高乐的威望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压力，叛乱者在4月25日宣布投降。

5月20日，法阿代表在埃维昂正式谈判。由于阿方坚持只有承认撒哈拉为阿所有才能进行真正的谈判，法方曾两度中断谈判，双方的僵持局面一直延续到1962年初。这一时期，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和左派组织也都加强活动，各自对戴高乐施加压力。“秘密军队”加紧在阿和法国本土的暗杀活动。1961年9月9日，在塞纳河桥附近还发生了一起企图炸毁戴高乐座车的事件。左派组织，特别是工会组织也发动了一系列群众示威游行。面对这种局势，戴高乐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尽快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1962年3月7日—18日，双方在埃维昂进行了长达11天的正式谈判，最后签订《埃维昂协定》。根据协定，阿尔及利亚将在7月1日举行公民投票，如果选民投赞成票，那就说明他们赞成阿独立并且根据《埃维昂协定》与法国进行合作。4月8日，法国举行关于是否同意《埃维昂协定》的公民投票，90%的人投票赞成。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选民投票赞成阿独立。至此，法国在阿132年的殖民统治和旷日持久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宣告结束。

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为阿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同时，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也消除了法国政局动荡不安和财政经济危机的一大根源，对于法国政局的稳定、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第二节 第五共和国体制的巩固

一、宪法改革——半总统制的最终确立

[宪法改革与公民投票]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标志着法国的政治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阿尔及利亚事件的解决以及戴高乐实行的内外政策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提高了戴高乐的威望。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问题解决后，议会觉得没有必要再完全受制于戴高乐，要求加强议会权力。于是，在议会中形成了一个政府反对派，政府与议会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为了加强行政权，特别是总统的权力，戴高乐在1962年4月8日罢免了与自己有分歧的德勃雷总理，而让非议员出身的蓬皮杜接替他的职务。戴高乐的这一作法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为了缓和这种局面，新总理广泛邀请议员担任部长。尽管如此，新政府在信任投票中仍遭到许多议员的反对。

为了使总统能名正言顺地拥有更大的权力，戴高乐试图实行宪法改革，通过普选选出总统，1962年6月9日，戴高乐在广播演说中宣告：走普选的道路，我们就能确保共和国在未来的岁月不受人事变迁的影响，保持力量强大，秩序井然和绵延不断。8月22日，在巴黎近郊发生了一次谋杀戴高乐的事件——珀蒂—克拉玛尔谋杀案，首犯是一个名叫巴斯蒂安—蒂里的军事工程师。戴高乐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之后，利用这次谋杀事件加快了修改宪法的步伐。8月29日，他通知内阁：我准备建议修改宪法，以确保政权的持续性。9月12日，内阁发布文告宣称戴高乐将军已经表明有意通过公民投票的途径，向全国建议今后共和国总统将通过普选制选出。9月22日，戴高乐再次发表广播电视演说，宣称为了使总统能够有效地承担宪法规定的主要职权，他必须明确地得到全国的信任，需要选民的明确支持。戴高乐关于改变总统选举方式的主张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议会为此通过对政府的弹劾案，迫使蓬皮杜政府在10月6日集体辞职。对此，戴高乐始则通过广播电视演说，发布咨文，终则采取解散议会，把修改宪法、改变选举方式这一问题直接提交公民投票。在10月28日举行的公民投票中，赞成票占有效选票的61.8%，结果普选总统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接着，在11月18日举行的第一轮议会选举和11月25日的第二轮议会选举中，戴高乐派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总统选举与半总统制的最终确立]1965年，戴高乐7年总统任期届满。根据1962年修改后的宪法规定，新总统将由普选产生。这是自1848年以来第一次公民直接投票选举总统。由于总统权力和地位的提高，任期又长，因此各党派都围绕总统竞选展开积极活动。

12月5日举行第一轮投票，戴高乐在法国本土获得43.71%的有效选票，社会党的密特朗获得32.23%的有效选票，社会和欧洲民主派的代表勒卡尼埃为15.85%，极右派的蒂克西埃—维尼扬古为5.27%，中右派的马尔西拉西为1.73%。海外领地的投票结果和本土的结果相差不大。尽管戴高乐在第一轮选举中遥遥领先，但由于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使原先极为自信的戴高乐不得不面临再选一次的难堪局面。12月1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根据1962年法案的条文，只能由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参加。戴高乐得到了55.1%的选票，再次当选为总统。戴高乐的再次当选总统标志着半总统制的最终确立。

二、“法国的伟大”——戴高乐的对外政策

[与美国抗衡]戴高乐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全面抗美，维护民族独立，力争大国地位。他这种以抗美独立为特色的外交政策，首先表现在对北约的态度上。1958年9月14日，戴高乐重新上台后不久，就在致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麦克米伦首相的备忘录中要求改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提出组成美英法三国“指导机构”，让法国分享北约组织的领导权，但遭到美英拒绝。1959年3月，他宣布从北约撤出法国地中海舰队。6月，拒绝美国在法国储存核弹头和在法国建立中程导弹基地。1963年6月又撤回大西洋舰队。1966年2月宣布法国退出北大西洋公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撤除美国在法国的驻军和基地。

坚持独立的国防观念，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力量是戴高乐争取大国地位政策的重要基础。他毫不隐讳地说，没有独立的核力量，法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的卫星国。”戴高乐上台后加速了制造核武器的步伐。1960年2月13日，法国第一个原子装置在雷冈沙漠中心地带试验成功。1963年4月法国正式拒绝美国提出的“多边核力量”计划。此外法国还坚持抵制美苏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的另一突出表现就是不顾美国压力，于1964年1月27日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政府公开反对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对于第三世界的其它国家也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1964年戴高乐两次访问拉丁美洲，走访11个国家，签订了许多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协定。

与此同时，戴高乐还十分注意法国的经济独立，他严格限制美国在法国关键工业部门的投资，大力发展本国尖端工业的政策。并竭力保护新法郎的币值，使法郎成为国际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此外，戴高乐还坚决反对战后支配国际上结算的金汇兑本体制，主张恢复金本位制，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挑战。[西欧的联合]西欧联合是戴高乐抗美独立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戴高乐主张“欧洲人的欧洲”，反对“大西洋的欧洲”，并把实现法德和解作为西欧联合的核心。戴高乐上台后不久，在阿登纳的共同努力下，法国与西德取得了谅解。1958年9月14日至9月15日，戴高乐与阿登纳在戴高乐的家乡科隆贝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双方会谈时认为，在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情况下，不能久远指望美国。因而加强法德合作，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必要的。同年11月26日，戴高乐到西德同阿登纳进行了回访性会晤。巴黎一波恩轴心的建立为西欧联合奠定了基础。

西欧共同市场是第四共和国的遗产。戴高乐上台后为共同市场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种种方便，并多次“踩踏油门”，使共同市场工业品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得到“顺利实现”，进一步促进了西欧国家在经济上的联合。欧洲一体化是当时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对此，戴高乐主张“各个国家的欧洲”，反对建立超国家的欧洲。戴高乐虽然不要欧洲一体化，但他要欧洲合作。说穿了，戴高乐所希望的欧洲就是一个由法国取代美国来发挥作用的欧洲。为此，戴高乐极力提防英国，把英国视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先后两次断然拒绝英国参加共同市场，以防共同市场溶化在美国设计的“大西洋共同体”之中。

[非殖民化政策]法国是个老牌殖民帝国，戴高乐上台时正面临着法兰西殖民帝国全面崩溃的形势。1958年宪法把法兰西联邦改为法兰西共同体。标榜海外领地和宗主国一起加入有共同的国籍、共同的总统、一个执行委员会

和一个议会的共同体。海外领地由“半自治共和国”改为“自治共和国”。各领地享有内部自治，而外交、国防、财政大权仍操诸法国手中，实际上是以某种局部的有限让步继续维持法兰西殖民帝国。

为此，法国政府决定在各领地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他们是否参加法兰西共同体，不参加共同体者不能得到法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投票结果除几内亚外，其它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各领地都赞成加入共同体，成为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几内亚则于1958年10月独立。但是，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快冲破了戴高乐设置的藩篱。在现实面前，戴高乐逐渐改变了对海外领地的态度。他在1959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法兰西共同体对所有的成员国来说是实际上的独立和有保障的合作”。这就是说独立和与法国保持联系之间没有矛盾。1960年5月，法国修改宪法，规定共同体成员国也可以通过协议途径变成独立国家，而并不因此脱离共同体。这一年就成为非洲独立年，在黑非洲法语地区和马达加斯加岛许多法语国家相继宣告独立。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也宣告独立。戴高乐以“合作”政策代替传统的殖民政策，利用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存在的困难迫使它们和法国签订外交、国防、经济、战略物资等“合作”协定，同时法国又建立了赤道“非洲关税联盟”、“协商委员会”、“非洲—马尔加什国家联盟”等区域性组织。在新条件和新形式下运用军事、经济、政治等手段继续保持法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防止美国取代与苏联渗透，尽可能保全尚能保全的利益。

三、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阿尔及利亚问题的解决和财政状况的改善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后期，法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戴高乐继续执行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戴高乐上台前制订的现代化和装备计划(即 1958—1961 年的第三计划)由于已经不符合当时的需要而被废弃。1960 年初，德勃雷政府制订了一个“临时计划”，计划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 5.5%。继“临时计划”后制订并执行“第四计划”(1962—1965)。这一计划强调扩大投资，注重分配和领土的整治，注意增加社会福利。规定 4 年内国民生产增长 24%，平均每年递增 6%。1966 年开始执行第五计划(1966—1970)，该计划继续强调加强国际竞争能力，特别是尖端工业产品的竞争力。计划期限延长为 5 年，预定 5 年内国民生产增长 27.5%，平均每年递增 5.5%。

这些计划的贯彻执行有力地推动了法国经济的发展。1958—1970 年，法国的工业生产平均每年递增 5.9%，仅低于日本而高于西欧和北美诸国，其中 1956—1963 年期间每年平均增长 6.8%。1963 年后由于经济危机等原因，经济发展有所缓慢，平均每年递增 3.4%，但仍快于同期的美国、西德和英国。当时美国工业生产平均每年的递增率仅为 3.2%，西德为 2.7%，英国为 1.2%，在这期间，特别是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的能源生产有很大发展。拉克的天然气年产量达 40 亿立方米。马库尔和希农等核电站已开始发电。法国的许多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快，如航空、宇航、核电和军事工业仅次于苏美而居世界第三位。法国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仅在临时计划时期法国就铺设了 4 千公里的电气化铁路，高速公路的建设在经过长期耽搁后也开始动工，还建造了新机场，重新修建和改造一批旧机场，并使之现代化。

随着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生产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也得以加强。1960 年，拥有资产 10 亿以上的大公司在法国只有一家，1966 年增加到 10 家，1970 年增至 27 家。1954—1962 年，工业生产的集中程度，电力部门为 33%，纺织部门为 35%，皮革部门为 38%，不到全国企业总数 1/3 的大企业所雇佣的劳动力占全部就业人员的 2/3，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42%。1958 年，法国只有 8 个特大市场，1500 家超级商场，到 1962 年，特大市场增至 207 个，超级商场增至 4000 家。

这一时期法国农业生产得到了持续的发展。从 1960—1970 年，法国农业以每年递增 2.4% 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同期西德为 1.7%，美国为 1.2%。特别是法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更是名列前茅。1960 年，法国粮食总产量比战前 1936 年的 350 亿斤提高了 51.5%，单产提高 82.6%。粮食与饲料的大量增加又促进了法国畜牧业生产的发展。1961 年法国肉类产量比 1950 年增长了 64.2%。

[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法国经济在 60 年代以来的迅速发展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预与管理，促进了经济的协调发展。戴高乐通过国有化和计划化大力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到 1968 年，法国国有化企业资本已占全部资本的 33.5%，国家垄断资本控制 80% 以上的行业有：电力、通讯、煤、天然气和煤气等。控制 40—80% 的行业有：航空、汽车、军火、

矿业、运输、焦炭和自动化设备等。在对企业实行国有化的基础上，政府大力推行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法国的经济计划一般提出经济发展的趋势以及某些综合指标和部门指标，并不规定具体企业指标，更不下达指令性指标，而主要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作为中心目标，协调政府、企业、工人以及农民等方面的利益。经济计划不是通过行政命令的方法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政策和立法（如工厂法、劳动法、贸易法、商业和手工业法、农业方针法等）以及财政经济手段的干预和调节来实现的。它使原来个别的、局部的国家干预活动发展为有计划的系统的国家干预体系，从而有利于国家全面协调和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第二、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尽量摆脱美国资本的控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法国接受马歇尔计划后，美国垄断资本大规模侵入法国。到 50 年代末，美国资本在法国建立的企业已达到 500 家，雇佣的职工人数超过 10 万（这还不包括被美资渗入和控制的法国公司）。而且美国的投资大部分集中在新兴工业部门。随着美国资本的大量输入，美国商品也大批涌入法国，法美贸易逆差日益扩大。为此，戴高乐在上台时就提出要谨防“法国经济的殖民化”，并在 1963 年、1964 年展开了限制美国资本输入的“有组织调整”运动。1963 年，法国政府宣布外国资本如需高价购买法国公司的股票须经法国政府的批准。次年又直接干涉，致使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购买法国波尔机器公司股票的计划破产。法国还与以美国资本为主的外国石油资本展开激烈的经济战，逐步削弱外国石油资本在法国的势力。从而保证了法国民族工业的飞速发展。

第三、工业、农业现代化同步进行，互相促进。法国政府在大抓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还力促农业现代化，把改造小农经济，加速集中，扩大农场规模放在重要的位置。政府从 1960—1962 年连续颁布了《农业指导法》、《合作法》、《市场法》和《商业法》等，规定只向联合起来的农民提供设备、工具、肥料和专业人员培训等必要的服务，并给予价格补贴。国家可以高价收买“没有生命力的农户”的土地，并用终身补贴的办法鼓励老年农场主放弃农场，对购进土地扩大规模的农场给予免税、无息或低息贷款。竭力扶持大农场，消灭小农场，以有利于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

第四、依靠共同市场，扩大对外贸易。法国政府在 60 年代发动了支持出口运动，使法国对外贸易的出口额有了较大的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和英国。法国出口贸易量在世界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日渐上升，使法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四贸易大国。共同市场为法国扩大出口带来了许多便利。特别是在农产品出口方面，由于共同体实行共同的农业政策，对内按统一价格自由流通，对外实行关税壁垒，使得法国农产品能以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价格在共同体市场上大量销售。从 1958—1973 年，法国农产品对共同体的出口增加了 17 倍。同时，共同体用于津贴农产品出口和支持农产品价格的保证基金有 35.9% 落入法国手中。这就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农业的发展。

第五、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这一时期法国政府极为注重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引进，使法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从 1959—1969 年，政府拨出的科研与发展经费从 30 亿法郎增加到 138.6 亿法郎，国家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从 1958 年的 12000 人增加到 1968 年的 4 万多人。有好几位法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金。法国政府在大力发展科研

的同时大搞技术引进工作。科学研究和技术引进的加强使得有可能在工农业生产中大量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法国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反映在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而且也反映在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内部的结构也有了明显的变动。

社会阶级结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中间阶层迅速扩大。这一时期的中间阶层大致可分为两类：传统的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前者主要是指小工厂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他们拥有少许生产资料，大部分独立经营，一部分雇佣和剥削少量工人。他们在第五共和国建立前是法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集团。随着垄断和兼并速度的加快，这些传统中产阶级的人数锐减，而与此同时，由科技人员、高中级管理人员、公务员、教师和其他职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开始激增。科技的进步，教育文化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国家职能的扩大和它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加强，刺激了这一新兴阶级人数的膨胀。新中产阶级在数量和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都已超过了其他阶级。新中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脑力劳动和领取工资谋生。但是，他们生活比较富裕，职业比较稳定，文化水平较高。当然，他们中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中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在财产、收入、生活条件和思想意识等方面比较接近资产阶级，而普通职员不但在工作条件、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方面无法与中高级职员相比，而且正逐渐接近工人阶级。总之，法国新中产阶级也和传统的中产阶级一样，是一个复杂的、不稳定的社会集团。由于中间阶层的不断扩大，使它在法国社会阶级结构中的地位日益显要，并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因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成为法国左右翼政党努力争取的社会力量。

工人阶级内部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战前法国工人阶级队伍主要由传统工人组成。50年代末开始，由于新兴工业的迅速崛起，对传统工业的大规模技术改造，使生产组织和劳动力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与传统工人有所不同的新工人的人数迅速增加。新工人按技术水平和文化程度的高低分为熟练工人、专业工人和普通工人。熟练工人或控制电气开关和仪表，或观察电视屏幕和监视生产过程，或保养和维修机器。专业工人主要分配在自动流水作业线上紧张劳动，普通工人则主要从事打杂等繁重的工作。据1981年统计，熟练工人和专业工人已占法国工人的4/5。法国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多层次化和复杂化给法国政治生活和工人运动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资产阶级内部结构同样有所变化。科技革命促进了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和集中。两百家族中的一部分老牌垄断巨头和一些新近爆发的新垄断巨头成为法国的超级富豪，占有了法国一半以上的公司和企业。在公司、企业日益增多和分散，业务更加科学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这些超级富豪除了继续沿用家族世袭方式控制部分公司、企业外，更多的是聘请一些精通业务、富有经验的知识分子担任经理和技术专家，甚至请他们担任总经理和董事长。此外，法国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也采取了这种作法。这些经理、专家从表面上看也是工资领取者，但他们在经营活动中行使资本剥削社会劳动的职能，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以获得高额垄断利润为目的，同时，他们往往据有相当比例的股票和经济特权，因此从经济地位上也已挤入垄断资产阶级的行列，成为他们的

重要成员。

第三节 五月风暴的冲击与 70 年代的法国

一、五月风暴与戴高乐的引退

[危机的先兆]第五共和国新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暂时缓和了某些矛盾，一度使政局相对稳定，出现经济的迅速发展。但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

1964—1965 年，法国经历了战后第三次经济危机，1967 年又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失业问题在危机的影响下也日趋严重。1965 年 2 月，法国失业人数为 15.9 万人，1967 年猛增到 45 万人。失业队伍中不仅有一般的熟练工人，而且也有大批技术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还有大量从高等学校毕业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法国政府力图通过增加政府投资和放宽信贷等措施来刺激生产，结果却进一步造成了通货膨胀。1968 年的物价上涨幅度比 1967 年增长 66% 以上。与此同时政府的财政预算也出现巨额赤字。1967 年的则政赤字达 70 亿法郎。为弥补财政赤字法国政府于 1968 年初实行了“增值税”制，结果使广大群众的经济负担更为沉重。

经济危机加深了社会阶级矛盾。工人阶级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失业的威胁，物价上涨，加上政府限制工人增加工资，使工人生活水平下降，引起广大工人的不满，要求增加工资、保障就业的呼声日益高涨，罢工事件时有发生。

经济危机也损害了中间阶层的利益。虽然中间阶层的经济收入明显高于工人，但他们也深受失业、通货膨胀之害。其中不少人因此对现状不满，提出了改革税制和政治制度的要求。这种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直接影响到青年学生，大批大学生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威胁，对于法国僵硬陈旧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日趋不满。在马尔库塞、卡斯特罗思想的影响下，尤其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都渴望着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向现存制度挑战。

与此同时，戴高乐体制的反对派力量也逐渐加强，特别是左翼党派在一致反对戴高乐的基础上，开始相互靠拢，法国政治社会又出现向左转的趋向。左翼政党已逐步联合起来，成为戴派势力强有力的挑战者。这一切预示着一场强烈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68 年 5 月风暴]斗争之火首先在大学里点燃。从 1967 年秋天起，农泰尔文学院一些系科的学生为反对僵死的教育制度以及不合理的管理制度，掀起了持续不断的罢课浪潮。1968 年 3 月 22 日，警方在巴黎逮捕了 6 名被怀疑因反对美越战争而向美国在法产业投掷炸弹的学生，引起农泰尔文学院学生的广泛抗议。在社会学系三年级德籍学生科恩—邦迪的鼓动下，学生们占领了学院的行政大楼。“3·22 运动”揭开了 5 月风暴的序幕。

5 月 2 日，农泰尔文学院院长决定关闭学校。次日，巴黎大学学生开会，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许多其它大学的学生（包括农泰尔文学院的学生）涌向巴黎大学参加集会。巴黎大学校长害怕发生骚动，请来警察驱散校园里的学生。双方展开激烈的搏斗，许多学生被捕，巴黎大学宣布关闭。然而，学生们并没有屈服，他们走上街头举行抗议示威。运动由大学扩展到公立中学。5 月 10 日，学生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要求巴黎大学复课，释放

被捕学生，警察撤出拉丁区。夜间，学生们筑起街垒，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不少学生被捕入狱。5·10夜被称为“第一个街垒之夜”。

5月中旬，冲突从大学生转向社会，斗争出现高潮。5月13日，即1958年5·13事件发生10周年日，法国工人举行全国总罢工，声援巴黎大学生。这一天工人、学生、教师共80万人在巴黎举行了法国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群众性游行。示威群众高举着一条10米半长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学生、教师和工人团结起来！”浩浩荡荡涌向市中心。在短短的4、5天中，全国总计有一千万人参加斗争。整个法国处于瘫痪：工厂停工、商店罢市、银行、邮局关门、电话中断、交通停顿、剧院停演，甚至连“法新社”、“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职工也加入了罢工行列。

戴高乐虽然按原计划于5月14日对罗马尼亚进行国事访问，但被迫在5月18日提前回国，并连夜和内阁商量对策，鼓吹：“改革可以，乱来不行。”5月24日，戴高乐发表广播讲话，承认法国社会必须进行改革，但认为出现危机是不正常的。这次讲话使人们大失所望，约一小时后，数千名学生又走上街头和防暴警察发生激烈冲突，遭到警察镇压，出现了第二次流血的“街垒之夜”。

政府当局在实行高压政策的同时，还采用另一种策略，组织资方与工会在格勒内尔大街劳工部所在地进行谈判，并在5月27日达成“格勒内尔协议”：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提高到每小时3法郎；立即增加工资7%，10月份再增加3%；减少工时；组成混合委员会负责就业和职业培训问题；承认工会在企业中的权利。总工会领导人对此协议极为满意，但工会的基层组织普遍拒绝这一协议，社会危机从此公开发展为政治危机。

5月27—29日，以统一社会党和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一些教育工会为主要代表的新左派，在夏尔莱蒂体育场组织了一次有孟戴斯·弗朗斯出席的群众大会。“左翼联盟”通过密特朗之口宣称现在“政权空缺”，建议成立以孟戴斯·弗朗斯为首的临时管理政府，密特朗为自己安排了总统职位。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则提出建立人民政府。与此同时，戴派阵营内部乱作一团。5月29日上午9点1刻，在预定10时举行的内阁会议之前，蓬皮杜得到通知说戴高乐要到科龙贝去呆24小时，内阁会议推迟到明天下午3时举行。下午2时，部长们获悉戴高乐失踪，大为震惊。直到下午4时，才由武装部队来的电话中得知戴高乐已去西德。戴高乐在得到法国驻德武装力量总司令马絮的支持保证后，于5月30日回到爱丽舍宫，并在下午4时半发表了极为强硬的讲话，声明在当前情况下他不能离职，也不打算更换总理，并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推迟公民投票。此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30日晚上，举行了50万人的游行示威，表示对戴高乐的坚决支持。在戴派的高压之下，5月风暴逐渐平息。

5月风暴是第五共和国潜在危机的总爆发，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发展之快，斗争之激烈，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联合之紧密，为法国历史上所罕见。由于在斗争中多种政治力量交织在一起，很难判定这场运动的性质。但这场风暴毕竟是反对垄断资本的一场政治大发动，它猛烈地冲击了戴高乐的统治，震撼了法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行政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其历史的功绩。

[戴高乐的引退]5月风暴平息之后，戴派在6月的大选中获胜。为实现刷新政治的愿望，戴高乐改组了政府班子。7月11日，他任命顾夫·德姆维

尔接替蓬皮杜担任总理职务。为应付学生的要求和避免危机的重演，议会在10月10日通过了关于建立大学自治和让大学生参与制订学校管理的法律。但改革的重点还是放在加强地方政权的权力、在经济计划上把权力下放到各省和实行参议院改革等方面。1969年2月19日，戴高乐决定就上述问题于4月27日举行公民投票。戴高乐之所以提出公民投票，其主要目的是想让别人承认他个人权威的合法性。4月11日，戴高乐公开宣布，如果多数反对的话，他将引退。4月24日，《费加罗报》发表的最后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53%的选民打算投反对票。4月27日公民投票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民意专家的预言，反对票占有效选票的53.2%，4月28日清晨，戴高乐发表了一份公报，宣布：我将停止行使共和国总统的职务，这个决定自今天中午起生效。戴高乐引退后回到科龙贝，断绝了和政界的一切联系，专心撰写他的《希望回忆录》。1970年11月9日，戴高乐由于心脏病发作猝然去世。

二、蓬皮杜总统执政

[蓬皮杜当选总统]戴高乐引退后，由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根据宪法代理总统。不久，法国进行总统竞选。戴派的第二号人物、曾在戴高乐手下连续六年担任总理的蓬皮杜在竞选运动未正式开始之前就率先宣布参加总统竞选。当时左翼政党没能统一行动，分别推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推出加斯东·德费尔，统一社会党推出米歇尔·罗卡尔，共产党推出雅克·杜克洛参加竞选。代总统波埃也以中间派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左派的分裂，使蓬皮杜坐收渔利。在6月1日第一轮选举中，蓬皮杜获得43.9%的选票，遥遥领先。在6月15日举行的第二轮选举中，蓬皮杜又以57.5%的选票击败对手而当选总统。

蓬皮杜是在戴高乐派统治出现危机时上台的，为了扩大统治基础，他只得向中间派靠拢，推行“开放”政策。但他属于戴派。因此又必须保证戴高乐政策的延续性。所以蓬皮杜当选总统后，就任命戴派重要成员、多次担任过国民议会议长的沙邦·戴尔马担任总理。6月22日，新内阁成立。39名内阁成员中半数由前一届内阁成员连任，同时又向中间派开放，如独立共和党人德斯坦担任财政部长，右翼中间派的普列文担任司法部长，杜阿梅尔任农业部长，人民共和党的丰塔内任劳动、就业和居民部长。

[蓬皮杜总统的内政]蓬皮杜上台后，为缓和社会矛盾，采取了一些改善工人及其他人民群众生活的措施。1969年12月颁布根据物价上涨幅度确定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额的规定。次年政府又促成许多行业工资的月薪化。并继续维持国家对经济进行直接而强有力的干预，国家坚持实行经济计划化，1971年7月15日由国民议会通过了以调整工业结构为重点的第6个计划（1970—1975年）。国家为创立和巩固加强具有国际规模的法国工业集团提供方便，并设法刺激鼓励革新和对外输出。同时，针对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在经济领域实行地方分权。并注意调整国家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一批国有企业，诸如法国全国铁路公司、公私合营巴黎运输公司、法兰西电力公司——法兰西煤气公司等通过国家和企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实行了企业自治。在社会治安问题上，政府采取高压政策。1970年镇压多起学生风潮，解散极左派组织“无产阶级左派”，逮捕该组织的领导人阿兰·热斯马尔。同年6月4日，国民议会通过“反捣乱分子法”，规定如参加禁止举行的游行就构成犯罪行为，予以惩办。但是，蓬皮杜并未因此而使法国摆脱经济和政治困境。他就任总统期间，经济虽有一定发展，失业和通货膨胀却始终未能解决。对政府的不满，使左派力量重新趋向联合。1970年2月4日，法共在第19次代表大会上号召党员为建立广泛的左翼反垄断阵线而斗争。次年6月，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共和制度大会、社会主义教育和研究中心以及一些俱乐部召开了社会主义者统一代表大会，建立了新的社会党，由密特朗担任第一书记。激进党的左翼也在党内占据了优势，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在1969年10月担任了党的总书记，次年2月发表了由他和阿尔贝署名的一份激进宣言——《天堂和地狱》。

1973年3月，法国举行议会选举，左派实行了从共产党到激进党的联合，提出了《共同纲领》，并在选举中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在新选出的议会中，多数派由原来的385席减少到276席，而《共同纲领》候选人共获得175席。多数派虽然仍获得相对多数，但已表现出明显的倒退。这对蓬皮杜的统治来

说无疑是一次冲击。不久，蓬皮杜因患癌症，身体每况愈下，终于在 1974 年 4 月 2 日因医治无效逝世。

[蓬皮杜总统的外交]蓬皮杜的外交政策也体现了延续性和开放性相结合的特点。延续性表现在蓬皮杜仍然沿袭了戴高乐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对美苏两超级大国保持独立，以巴黎—波恩为轴心基础联合西欧，扩大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蓬皮杜为了加强同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从 1971 年到 1973 年数度出访非洲，遍访法语非洲国家。开放性则表现在蓬皮杜倾向于同世界上各个阵营保持同样良好的关系，注重维持东西方的平衡，以此确保法国的独立性。为此，蓬皮杜在 1970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3 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同年 10 月 6 日至 13 日又访问了苏联。此外蓬皮杜还利用各种机会多次和美苏两国首脑会晤。1973 年 9 月 13—17 日，蓬皮杜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欧洲政策上其开放性更为突出，蓬皮杜一反戴高乐拒绝英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的立场。于 1971 年 5 月与英国首相希思在巴黎就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达成了协议。

三、德斯坦总统执政

[德斯坦就任总统]蓬皮杜的猝然去世使总统宝座在 5 年时间内第二次突然空缺，参议院议长阿兰·波埃第二次出任代理总统，法国再次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与 1969 年总统选举不同，左翼推出密特朗为统一候选人。密特朗在选举中的呼声极高。这是因为法国自蓬皮杜执政以来，其经济形势令人失望，特别是 1973 年中东战争爆发、石油大幅度提价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显著下降，外贸出现逆差，黄金外汇储备剧减。由于政府加紧向人民转嫁经济危机，致使失业人数增加通货膨胀加剧，物价飞涨，人民购买力下降。法国人民对 16 年的戴派统治感到厌倦，人心思变。而密特朗在不久前与共产党签署的《共同施政纲领》正好迎合了这种思变心理，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因此使密特朗具有相当高的威信，一些报刊把他视为这次总统竞选中“无可匹敌”的强者。

与此同时，执政者多数派中内部矛盾日益加剧。首先是戴派本身在蓬皮杜执政时就分为蓬皮杜派、梅斯梅尔派、沙邦—戴尔马派以及德勃雷派。蓬皮杜死后，派别之争更为激化。以至戴派无法推出一个足以掌握全党的领袖人物出面竞选总统。其次是多数派内部以德斯坦为首的独立共和党人和戴派的矛盾。独立共和党本身力量虽然不大，但长期来却是戴派组成议会多数所不可缺少的因素，是戴派感到头痛而又不得不与之结盟的伙伴，德斯坦更是被视为刺人的仙人掌。随着戴派政治影响的下降，独立共和党在同戴派的关系中采取了“同意，但是”的策略，即对自己有利时就表示“同意”，对自己不利时就强调“但是”。1969 年 4 月公民投票中，独立共和党公开反对戴高乐，成为促使戴高乐辞职的主要力量之一。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早就觊觎总统宝座的德斯坦提出组织“扩大的多数派”和“要变革但不要冒险”的口号，想利用选民对戴派不满而又对左翼联盟存有戒心的有利条件登上总统宝座。

第一轮选举在 5 月 5 日举行，共有 12 人参加竞选，但真正有实力参与角逐的主要是密特朗、德斯坦和沙邦—戴尔马。结果密特朗获得了 43.36% 的选票，德斯坦获得 32.76% 选票，沙邦—戴尔马仅获得 14.76% 选票。5 月 19 日举行第二轮选举，德斯坦获得 50.63% 选票险胜密特朗，当选为共和国总统，48 岁的德斯坦成为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德斯坦的当选，表明了原来的多数派继续获胜，但戴派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这一现象意味着第五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德斯坦总统的内政]德斯坦入主爱丽舍宫时曾踌躇满志的宣布：法国政策的新纪元从今天开始，标榜要进行多种多样的改革，使法国进入“先进的自由社会”。5 月 27 日，德斯坦授命雅克·希拉克组阁。希拉克是戴派中少壮派的领袖人物，在戴派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高。德斯坦这次之所以能够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获胜，希拉克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政府的领导权通过希拉克之手，仍由戴派所掌握，所以在德斯坦总统任期的头两年里多数派内部的人事变动不甚明显，德斯坦的改革政策也很难实行。政府在社会改革方面缺乏热情，只是在 1975 年 12 月对城市建设、边境政策作了一些改革。把社会治安扩大到农民，以及在 1976 年 7 月通过了一项措词和缓的课征增值税的规定。这一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在风俗习惯和政治自由化方面，如堕胎合法，

避孕自由，离婚自由，设立妇女地位国务秘书，将享有公民权和政治权的法定年龄降至 18 岁，确定巴黎市的新地位，巴黎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等。

在经济方面，当时正值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第四次经济危机爆发并影响法国之时，希拉克政府采取了扩大公共开支费用，增加就业机会的政策，想以此减缓失业现象。结果引起工资和价格上涨，从而削弱了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外贸出现严重逆差，国家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现象更为严重。由于危机，第六计划中规定的一些指标都未能达到。在这种情况下，总统和总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以至希拉克在 1976 年 8 月 25 日愤然辞职。

希拉克的离职，使戴派在失去了爱丽舍宫的地位后又失去了在马提翁大厦的地位。德斯坦在希拉克辞职后任命曾被人称为“法国首席经济学家”的雷蒙·巴尔担任总理。巴尔政府把复兴法国经济作为施政纲领的中心。9 月 22 日，新政府提出了“巴尔计划”，规定：冻结物价 3 个月，在 1977 年 4 月以前不得提高公用事业费，“节制”收入，冻结高收入，严格控制购买力，对高收入者提高税额。

1978 年 4 月 26 日，又提出“第二个巴尔计划”，在继续优先复兴经济的同时，规定对集体设施、青年就业和改善受危机影响最大的社会阶层（家庭及老人）给予特别援助。此外，新制定的第七个计划（1976—1980）为基建、外贸、就业、减少不平等现象，提高生活质量和科研等方面规定了 25 项“优先行动纲领”。巴尔政府执政时期虽然在控制通货膨胀、减少财政赤字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失业人数却继续增多。法国经济复兴起色不大，人们的不满情绪在加深，对德斯坦的统治已经深感厌倦。

[德斯坦的外交政策]德斯坦基本上继承了戴高乐确定的法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根据国际格局的变化，制定了与戴高乐外交策略有所不同，以多极外交为特点的外交政策。

德斯坦本人把多极外交具体化为四条路线：独立的路线、欧洲的路线、缓和的路线、合作的路线。他把维护法国的独立、安全与利益作为法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谋求由法国对自己的主要问题作出最后决定，不接受“超级大国的统治”，并把建立发展独立核武装作为确保独立的基本手段。同时，德斯坦根据苏联军事威胁的加剧和扩张的升级调整了对美外交，加强了与北约的军事合作，改变了戴高乐“不以苏联为唯一假想敌”的“全面防御”战略，提出了重点在东方的“前沿战斗”和“扩大庇护所”的战略思想。他还以西欧联合为立足点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利用多数派在 1978 年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有利时机，联合西德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积极推动共同体的扩大，希望共同体以法德为轴心，由经济联合逐步发展到政治、军事联合，成为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德斯坦还努力使法国同苏联保持“特殊关系”，以缓和为手段，通过给苏贷款和技术援助，换取苏联市场和原料供应，并在一系列对苏问题持与美国有区别的独立政策，力求使法国成为苏联在西方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对话者。为了维护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利益，德斯坦主张积极发展法非、欧非之间的联系，倡导了“南北会谈”，“欧非对话”。德斯坦还主张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认为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并在 1980 年 10 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

第四节 80年代的法国

一、密特朗当选总统

[密特朗当选总统]1981年4—5月间，法国举行总统选举，参加竞选的有10名候选人。由于原执政的法国民主联盟和保卫共和联盟之间结成的多数派陷于分裂，作为反对派的社会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左翼联盟又不复存在，因此四大党在第一轮选举中都互不相让，分别推出德斯坦、希拉克、密特朗和马歇参与角逐，其中以在职总统德斯坦和社会党领袖密特朗之间的竞争最激烈。

这次总统选举是在法国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举行的。因而在在职总统德斯坦一面许诺继续奉行第五共和国以来一直奉行的政治方针，作出种种姿态争取以希拉克为首的戴派的支持。同时又针对不少选民中普遍存在的求稳怕乱的心理和密特朗获胜后要解散议会的主张，提醒选民这次选举关系到“社会制度的选择”，宣称密特朗上台就是共产党“参政”。德斯坦以“安定、团结、未来”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表示要把和平与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还发誓：如果再次当选，他要做到1988年任期届满时，世界舆论都认为世界上有三个先进国家：美国、日本和法国。密特朗则利用选民对德斯坦执政7年产生的厌倦心理和人心思变的情绪，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实行有别于德斯坦现行政策的“另一种政策”，并以“就业、和平与自由”作为社会党竞选的主题。此外还在选举策略上采取了左右逢源的作法。

4月26日，第一轮选举揭晓，没有一位候选人得到50%以上的选票，得票最多的是德斯坦和密特朗，分别获得28.31%和25.8%的选票。5月10日举行第二轮选举。为此，各派力量重新组合，德斯坦和密特朗竭尽全力争取原来同盟者的支持。选举结果，密特朗获得52.24%的选票，当选为第五共和国的第五届总统。

[社会党取得议会多数]5月21日，法国举行密特朗正式就任总统典礼。根据宪法，共和国总统有权在同总理和参众两院议长磋商之后解散议会。密特朗在上任后的第二天就解散了议会，并任命皮埃尔·莫鲁瓦组织一个为议会选举作准备的过渡政府。议会选举决定于6月14日和21日举行。这次选举对于新上任的密特朗总统和刚下野的原多数派都很关键。密特朗当选总统使社会党成了执政党，如果再在议会中居少数，不但难以取得议会的合作，推行其政纲，而且新政府还有受到弹劾的危险。同时，不管这次选举结果如何，总统在一年内已无权再解散国民议会。因而，围绕着议会选举，各党派都忙着组织力量和研究策略。在左翼方面，社会党、法共以及一些支持密特朗总统的小党派人士，乘着总统选举胜利的势头，继续结成联盟。在原多数派方面，戴派和德斯坦派也缔结了一个联合选举公约，打出“争取新多数派”联盟的旗号，力图在国民议会中保持与密特朗总统抗衡的多数派势力。

6月22日，大选揭晓。社会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取得了议会491个议席中的285席。原多数派在选举中遭到惨败，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分别降为88席和63席。社会党继赢得总统选举之后又取得国民议会选举的决定性胜利，在议会中形成了新的左翼多数派。

[社会党胜利的原因]社会党之所以能够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相继获

胜，其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经济困难，人心思变。法国经济近年来因受危机的影响，长期处于滞胀状态。在德斯坦任期 7 年内，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6%，1980 年仅为 1.3%，1981 年第一季度的工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下降 7.5%，1981 年 4 月底失业人数达 170 多万人。物价在 7 年内上涨了一倍，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外贸和国际收支逆差严重。在政治上，由于资产阶级右翼政党长期把持政坛，官僚主义日趋严重，各种丑闻时有发生，使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感到不满。他们希望革新政治，振兴经济，扩大民主，并把这些希望寄托在更换领导人上。而社会党的政策主张恰恰顺应了他们的变革要求。社会党一贯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密特朗把解决失业问题放在首位，并把“就业、和平与自由”作为社会党竞选的主题，主张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国有化、计划化和自治管理等措施，对法国经济进行渐进的“结构改革”。他还提出改革税收制度，缩小工资差别以及增加社会福利等主张，强调要缩小贫富差别，提高中下层群众生活水平。密特朗当选总统后，在议会选举前夕，社会党政府还宣布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让选民得到一些实惠。与此同时，社会党大肆渲染其政策的温和色彩，强调不搞革命，不进行突然变革，而是逐步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会上的疑惧，特别是符合中间阶层要求变革又害怕动乱的心理。

第二、社会党在选举中成功地运用了争取选票的策略，既取得左翼选民的支持，又争取了中间选民。密特朗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一方面做好在法共影响下的基层群众工作，力图造成左翼上分而下联的局面，争取在第二轮决战时尽可能多地得到法共选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又表示在总统选举时不讨论在社会党取胜的情况下是否让法共参政的问题，以争取反对共产党的左翼和一些中间选民的支持。密特朗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得到近 150 万法共选民的选票。在第二轮选举中，法共号召自己的选民投密特朗的票，并在议会选举中同社会党达成让票协议，使更多的法共选民和中间派选民转向社会党。此外，密特朗还得到了其它左翼小党和组织的支持。

第三、右翼内部矛盾加剧，使一部分右翼选民转而投票支持密特朗。希拉克愤而辞职后，原多数派内部戴派和德斯坦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戴派在竞选中不惜与左翼一起抨击德斯坦的内外政策，并公开提出要么改变政策，要么更换总统。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时，在德斯坦与密特朗决一雌雄的关键时刻，希拉克没有号召选民支持德斯坦，而只是宣布他个人在第二轮中“只能投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票”，暗示原支持戴派的选民可自己选择投票。据统计，戴派选民约有 30%（150 万人）没有投票支持德斯坦，而德斯坦正是以 100 万张选票之差败给密特朗的。

二、莫鲁瓦和法比尤斯政府

[社会党和法共联合执政及其原因]社会党通过选举取得总统职位和政府领导权，并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半数以上的席位，为社会党实施其纲领和政策提供了保证。社会党为了在今后执政过程中应付右翼政党的反对和顺利处理其它问题，仍需要取得法共的合作。法共也以自己为社会党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由要求参加执政。于是两党通过谈判，在1981年6月23日签订了“共同执政协议”，决心共同推行密特朗提出的改革政策。6月23日以莫鲁瓦为首的新政府成立。在新政府的44名内阁成员中，社会党占37名，法共中央委员会书记、政治局委员夏尔·菲泰尔芒任运输国务部长，中央委员马塞尔·里克任职业培训部长，中央委员雅克·拉利特任卫生部长，中央委员阿尼塞·勒波尔任总理府负责人事与行政改革的部长级代表。这是法共自1947年以来第一次参加政府。

法共决定参政有着政治上和策略上的考虑，希望通过左翼联合执政对社会党的改革施加影响，争取逐步推行法共的政治纲领，并企图利用执政的地位，通过直接参与密特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多做些群众福利方面的具体工作，争取民心，增强实力，为最终建立“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

而社会党吸收法共参加政府，也有自己的打算。新政府上台后将进行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其中扩大国有化范围、大幅度增加社会福利等改革措施，必将遭到大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党的反对。吸收法共参政，既可使政府避免左右“两线作战”，又可借助法共对强大的总工会等群众组织和数百万群众的影响，以调节劳资关系、维持社会安定，抗衡右翼的压力，并约束工人群众对增加福利、提高工资的要求。此外，在社会党占有议会绝对多数议席的情况下，维持“左翼联合”局面可使社会党占主动地位，并通过“共同执政协议”约束法共。

[引人注目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密特朗总统和莫鲁瓦政府上台后只用了一年左右时间就完成了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立法程序，并实施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措施：

第一、以扩大国有化为中心的经济结构改革。密特朗主张在自由经济的基础上，通过扩大国有化程度，使国家拥有充分的财政、金融和经济手段来实现改革的战略目标，为此掀起了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有化运动。根据1981年12月18日国民议会通过的国有化法案，对5家大的垄断工业集团[圣戈班—蓬阿穆松公司集团（玻璃）、通用电力公司、佩希奈—于吉纳—库尔曼公司集团（有色金属）、汤姆—勃兰特家用电器和国家电子公司、罗纳—普朗克化学公司]，两家大的金融公司（巴黎荷兰金融公司、苏伊士金融公司）和36家拥有10亿法朗以上存款的银行实行国有化。此外，还以国家参加股份等办法逐步将其它一些重要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这样，国有化企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从而使法国成为西方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第二、在“社会公正”、“分享劳动”等口号下，实行社会改革和福利措施。社会党政府上台后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优先地位，采取措施增加社会福利和对中小企业的援助，企业通过刺激需求，促进生产来增加就业机会。为此，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如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家庭补助，提高最低养老金和对残废人的补助，缩短工时，实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每年5周带

薪休假，降低退休年龄。此外，社会党政府还改革税收制度，征收资产税，增加商人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减免部分低收入者的所得税等。新税制使政府既增加了收入，又照顾了中下层群众。

第三、以权力下放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1981年8月，国民议会通过《权力下放法案》，把中央的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充分发挥地方民选机构的作用。其主要措施是，建立大区一级的权力机构，使经过选举产生的大区委员会拥有较广泛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同时，省、市民选机构，即省、市议会的权力也大为加强，省议会改为省政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省的行政事务首脑。原由中央任命的省长，改称为共和国专员，只管辖警察和中央各部派驻省里的机构，对省的行政和财政事业起监督作用。

第四、实行以“社会宽容”为口号的司法改革。1981年8月2日和9月18日，国民议会分别通过《取消国家安全法院法案》和《废除死刑法案》。社会党政府还主张废除常设军事法庭和改革最高司法会议。

[密特朗的对外政策]密特朗上台后强调法国外交的连续性，其外交政策的要点是：力争保持东西方力量的均势，特别是在欧洲的均势，维护北大西洋联盟，加强法美关系，反对苏联威胁，推行西欧一体化，加强和密切同第三世界的关系。

密特朗上台后，社会党政府对美国继续保持既结盟又独立的关系，法国在战略上与美国配合较多，同时又强调对美国要保持独立和判断自由。在联盟问题上，法国多次声明忠于整个联盟并继续履行它在北大西洋联盟内承担的义务，但决不服从军事一体化指挥。在经济方面，反对美国在东西方贸易关系中强行将西欧纳入对苏战略轨道，谴责美国的经济帝国主义政策。在中美洲、中东、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区现存的矛盾与国际纠纷问题上都采取了有别于美国的独立政策。

密特朗对苏联的立场比其前任更为强硬，极力反对苏联在欧洲确立军事优势。为此，法国主张在欧洲部署美国潘兴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同苏联的SS20导弹抗衡。法国还不断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认为苏联对波兰实行军管负有责任，积极支持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但同时又认为加强法苏关系是“欧洲平衡必不可少的因素”，需要维持法苏对话，反对对苏联进行“经济战”。

密特朗积极推动欧洲联合，提出“应努力使欧洲成为一种政治力量，一种经济、社会、文化力量”，以对付超级大国瓜分世界的阴谋，主张加速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以减少美国的依赖程度。此外还提出建立“欧洲社会区”，谋求西欧国家采取共同的社会政策。在欧洲建设中，继续重视发展法德关系，认为“法德特殊友谊是欧洲共同体的基石”。

密特朗还积极推行“第三世界主义”，努力改善南北关系。在政治上，他宣传在全世界捍卫人权，尊重人民自决权，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在经济上，提倡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富国援助穷国，主张通过“收入再分配”来消除社会不公平。密特朗仍对非洲地区特别重视，亲自出访了非洲的14个国家。此外对加强在中东、波斯湾地区、东南亚地区和拉美地区的影响也都作了特殊努力。

[社会党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密特朗和社会党政府原想通过扩大政府公共开支，增加财政赤字等手段刺激国内消费需求，以达到振兴经济、增加就业的目的。然而“膨胀”计划实施一年后，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仅未

能实现，而且导致宏观经济的严重失控。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急剧恶化，赤字额由 1980 年的 303 亿法郎猛增至 1981 年的 808 亿法郎，1982 年的 989.5 亿法郎，两年间猛增两倍半。通货膨胀加剧，消费物价扶摇直上，尤其是 1982 年前 6 个月，年上涨率高达 14%，外贸出现巨额逆差，法郎疲软不堪，在 17 个月内被迫三次贬值。总之，在社会党政府上台一年多后，法国经济处于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在这种局势下，社会党政府在 1982 年中被迫刹车，中断原来的膨胀计划，转为实行以克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紧缩政策，决定冻结工资和物价，削减社会福利和政府开支以遏制消费。在法郎第三次贬值后又推出了一揽子“严厉”计划，对 1982 年度的财政赤字额、消费物价上涨率和外贸逆差均作出严格限制，并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增加税收（包括所得税、工资附加税和财产税等），提高煤、电、交通、邮电等公用事业收费，调高烟、酒和燃料价格，限制信贷，加强外汇管制直至限制出国旅游者携带的外币额，提高利率和推行强制性储蓄等。

社会党政府大幅度调整经济后，法国的宏观经济受到一定控制，显示了一定效果。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减慢，1983 年和 1984 年仅分别增长 0.7% 和 1.2%，然而消费物价上涨趋缓，外贸逆差额在两年间缩小了 2/3，财政赤字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大致控制在政府规定的 3% 水平上，法国经济在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后，1984 年开始出现微弱复苏。但是，经济政策的这种猝然大转折也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其他困难和问题，导致工业生产投资不振，生产停滞，特别是传统工业部门更是深陷困境。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家庭实际收入下降，社会消费萎缩。这些现象引起了各阶层的不满，导致社会动荡不已。

[社会党政府改组——法比尤斯组阁]1984 年 7 月 17 日，社会党政府进行重大改组，原工业科研部长洛朗·法比尤斯在莫鲁瓦辞职后接任总理职务，时年 37 岁，是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总理。新政府由 16 名部长、6 名部长级代表和 20 名国务秘书组成，其中 34 名属上届留任，人事结构上保持了很大的连续性。法共因不同意新政府继续执行严厉的经济政策和工业改组计划而拒绝入阁，致使历时 3 年的左翼联合执政局面宣告结束。

触发这次政府改组的直接原因是私立学校改革问题。社会党主张建立统一的、世俗的国民教育，并在 1984 年 1 月提出一项改革法案，加强政府对私立学校的控制与监督。该法案一提出，立即遭到受教会控制的私立学校当局及有关学生家长的激烈反对。左翼反对派也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全国各地不断出现抗议集会，6 月 24 日，巴黎地区爆发大约 150 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持续时间长达 14 个小时。反政府的声浪甚嚣尘上。7 月 12 日，密特朗总统被迫宣布收回教改法案，教育部长萨瓦里被迫辞职，政府出现危机，内阁只好改组。社会党希望通过改组政府给选民以新的希望，继续确保社会党的多数地位。

三、希拉克政府

[共处局面的出现] 1986年3月16日，法国举行5年一度的国民议会选举，这是法国左右两派之间的又一次重大较量，双方各派都为此展开了积极活动。这次选举采取了社会党政府在1985年4月制订通过的新选举法“省级一轮比例代表制”，选举结果，在577个议席中，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组成的原反对派联盟获得291席，社会党和左翼激进党只获得215席（其中社会党202席），法共35席，国民阵线33席。原反对派以超过半数3票的微弱多数获胜，将组成新政府。已执政5年的社会党失去继续执政的机会，但仍为议会第一大党。法共的席位明显减少，极右的国民阵线以相当可观的议席数第一次进入国民议会。

3月20日，议会新多数派的代表人物、保卫共和联盟主席、巴黎市长希拉克受命组阁。法国政坛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局面：左派总统，右派总理。法国人把这种奇特的局面称为“共处”。“共处”标志着法国政局进入了一个微妙的阶段。法国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多数派脆弱，新少数派强大，多年以来的两大派四大党的局面由于国民阵线进入议会而宣告结束。5股重要政治力量之间开始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

法国政坛出现这种奇特的“共处”格局绝非偶然。第一，社会党执政以来法国经济形势一直不好，政府的社会经济政策又出现了某些失误。从而使社会党的威信大大降低，不少选民对社会党由期望发展到怀疑，进而又由失望发展到不满。第二、“左翼联盟”的破裂使社会党在政治上处于孤立的境地。尤其是法共的不合作，从而失去了法共选民的支持，使社会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第三、右翼两大政党利用社会党威望的下降，调整了内部的关系，协调了彼此的矛盾，加强联合行动，共同对付社会党。

[希拉克政府的自由化经济政策]希拉克上台后，采取自由主义的治国方针。早在3月16日议会选举前，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在联合执政纲领中就提出了自由化经济政策。希拉克出任总理后，于4月9日在议会发表纲领演说，又具体阐述了新政府在今后两年内的经济主张和措施。4月16日法郎贬值后，希拉克政府首先采取措施，大大放松汇兑限制，实行工业产品价格自由化，并废除1945年以来制定的价格控制规定。继而政府又大幅度减税，公司的营业税由50%减为45%，减轻大企业支付失业等社会保险的负担，取消社会党前政府设置的巨额财产税，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将非法流出国外的资本重新转移回国。此外，希拉克政府还规定从1987年元旦起废除解雇工人要得到政府批准的法律，并把劳资协商的权力下放到企业基层。

希拉克政府在推行自由化经济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实行企业私有化，新内阁成立后，即将经济财政部改为经济财政和私营化部，下设负责私营化的部长级代表，在组织上，保证私有化政策的实施。接着国民议会通过法案规定，在5年内（即到1991年3月1日）对65家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其中包括法国通用电气公司、汤姆森电子公司、圣戈班建筑材料和玻璃公司、佩希内制铝公司、罗纳—普朗克化学公司、布尔计算机公司和马特拉公司等9个工业集团以及从1945年起就实行国有化的巴黎国家银行、里昂信贷银行和兴业银行。此外，还有社会党政府在1982年实行国有的30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希拉克政府甚至还打算给唯一有权发行钞票的法兰西银行“一种新的地位，使它的活动免受政府影响”。

私有化的具体做法是将国有企业的股份通过交易所卖给个人或由企业职工集股，国家保留一定比例的股份。外国买主的股份则不得超过一个企业股份的 20%。

希拉克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私有化和其他自由化经济政策，一方面是以市场经济为出发点，更多地反映和代表企业主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急于刺激企业的积极性，鼓励企业主扩大投资和招工，尽快实现“经济增长”。从速扭转 230 多万人失业的严重局面。此外，也是为了在两年任期内能取得明显的经济效果，为 1988 年总统选举捞取资本。希拉克政府的这些政策和措施遭到了社会党和法共的激烈反对，社会党还在议会中多次弹劾政府。

[希拉克的对外政策]在对外关系上，希拉克主张奉行戴高乐制定的以独立防务为后盾的独立的外交政策，和密特朗观点基本一致。希拉克认为法美紧密合作是和平的要求，对苏联则要“坚定和警惕”，要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东欧各国的关系。在欧洲问题上强调继续以法德团结为核心加速欧洲建设。在同非洲国家的关系上要优先发展与法语非洲国家和马格里布地区国家之间的传统合作关系。主张法国应维护其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保证其战略核力量的不断现代化。为此，专门设立了海外省和海外领地部。

根据第五共和国宪法，国家元首在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领域享有特殊权力，但希拉克在这方面也没有放过可以发挥作用的任何机会，力图与总统分享这一领域的最高权力。最为突出的例子是，1986 年 5 月在东京召开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法国一改惯例，不只国家元首出席，而由总统和总理联袂赴会。尽管希拉克声称要用“同一种声音”说话，但双头赴会本身就反映了左翼总统与右翼总理之间的不协调。又如在里根的战略防御研究计划问题上，密特朗反对法国正式参加该计划，希拉克却宣布“我不会让法国被撇在战略防御倡议之外。”在对非政策方面，希拉克上台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法语非洲国家，表明政府的行动不局限于法国国内，总理将直接处理法国的非洲政策。

四、密特朗连任总统

1988年4、5月间，法国迎来了左翼总统和右翼总理共处两年后的第一次总统选举。争夺总统宝座的角逐主要在社会党、保卫共和联盟和法国民主联盟三大主流派提出的3名候选人之间进行，即卸任总统密特朗、现任总理希拉克和曾任总理的著名经济学家巴尔。由于这些年来主要政党皆已登台施政，但均无显著建树，过左或过右的政策已被事实表明都无法行之有效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难题，使各政党的政策主张开始趋于现实，并呈现相互靠拢之势。事实上，密特朗、希拉克、巴尔3位候选人在外交和国防的大政方针方面是一致的，社会经济政策也没有很大区别。因此，这次总统选举与1981年有很大不同。当时是一次对左右翼纲领、政策之间的抉择，也是要不要变革法国社会的抉择。而这次总统选举则主要不是纲领、政策的抉择，而是对人的抉择。候选人个人的素质、形象、政治影响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选举结果，密特朗在5月8日的第二轮选举中以54.02%的选票击败希拉克，成为第五共和国历史上继戴高乐之后的又一位连任总统。

在右翼力量略强于左翼力量的政治格局中，密特朗之所以能够蝉联总统，是同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施政纲领以及高明的竞选战略分不开的。他在《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了恢复社会公正和安宁，主张增加科学研究和教育的投资，以此来缓解长期存在的失业现象，这无疑顺应了广大选民求稳思治的心理。在经济方面，则不再拘泥于国有化、高税率等社会党的一贯主张，转为一种更重视市场经济的姿态，从而赢得了广大中间乃至中间偏右人士的好感。密特朗还注意在竞选中尽量淡化自己的党派色彩，力图塑造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全民总统的形象，在竞选战略上，采取了拉拢中间和利用极右分化右翼，坐收渔人之利的做法。

第五共和国的历史曾经是一部左右翼对立的历史，两年多的左右翼共处政府的实绩，初步冲破了左右翼“不共戴天”的传统。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欧洲一统化步伐的加快，法国日渐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要求各派政治力量尽可能联合起来，左翼和右翼的分界线越来越模糊，政治中间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左右对立的法国正在逐步向“温和的法国”演进。

第五节 社会生活和科技文化

一、社会生活

[人口状况]从 1800 年到 1946 年的一个半世纪中，法国人口只不过增加了约 1300 万人。而从 1958 年到 1985 年，法国人口从原来的 4450 万增加到 5506 万，即在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就增加了 1056 万人。显然，第五共和国时期人口增长是比较快的。但是，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也是不平衡的，大致可以 1974 年为界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出生率线持续上升的时期。由于这一时期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再加上法国政府采取种种政策措施，鼓励生育，激发了人们养儿育女的积极性，这一时期法国平均每年出生的婴儿约有 85 万人。第二阶段是出生率曲线呈下降趋势的时期。经济危机的不断冲击，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威胁的日益加剧，使人们的生活条件受到严重影响，同时人们的家庭观念在淡化，对个人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不断提高。尽管这个时期政府仍采取多种优惠政策鼓励生育，但不少人仍不愿因为生儿育女而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这一时期法国平均每年出生的婴儿少于 75 万人，比第一阶段每年要少 10 万。

外国移民的不断增加是第五共和国时期人口增产较快的一个重要因素。1978 年 1 月，外国移民已增加到 432 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的 1/14。外国移民的新生婴儿占法国新生婴儿的 1/6。但从 70 年代经济危机开始以来，外籍人口增加的趋势逐步停止。这些移民绝大多数从事重体力劳动，如建筑工、矿工和清洁工等。他们的工资收入约占法国工资收入总数的 9.6%。另据 1982 年统计，在法国境内有 123 个国家的侨民，其中约有 45 万意大利人、41 万西班牙人、96 万葡萄牙人、82 万阿尔及利亚人、45 万摩洛哥人。此外在法国申请政治避难的外国人近 15 万。为减少外国人的流入，减轻失业的压力，法国从 1981 年 9 月 1 日到 1982 年 1 月 15 日发动了一场大规模整顿外籍劳动力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到 14 万移民，有 1500 名移民在被驱逐之列。1984 年以来，法国政府特别加强了对亚洲和非洲移民的控制。

[家庭结构与婚姻关系]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的家庭结构与家庭生活也随着社会变化而出现以下变化：第一、家庭的原有职能不断分化。诸如经济、教育甚至生活服务等功能，都从家庭中分化出去，由社会其他机构所取代，家庭的职能日益趋向简单化。第二、家庭规模缩小，由传统的几代同堂的大家庭结构向一夫一妻加一个子女的核家庭演变。第三、家庭观念和家庭关系淡化，代际隔阂严重，子女不愿意与父母同居，出现了许多所谓“空巢”家庭。第四、由婚姻破裂而造成的单亲家庭日益增多。

在婚姻方面出现了所谓“开放性”婚姻倾向，男女双方婚前同居或“试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1968 年至 1969 年约占婚姻关系的 17%，1976 年至 1977 年上升为 44%。这种生活方式已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认为，没有婚前同居的自由，就没有婚后的真正幸福。婚前没有同居的法国人现在已经为数不多。至于有的婚前生孩子以及双方同居后又离婚，也就成了必然的事。法国的离婚率相当高，据统计，1978 年结婚者为 354,000 人，而离婚者竟达 74,000 人。法国在 1975 年 7 月、12 月以及 1976 年 7 月颁布的法律、法令中规定，只要双方同意，即使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离婚，

并要求简化离婚手续。这样，离婚者越来越多。

家庭结构与婚姻生活的这些变化，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的不和，孤儿的流浪，引起社会动荡不安。这种消极现象的出现，已引起法国不少社会学家的关注和老年人的反对和谴责。

[妇女解放运动]第五共和国时期，法国也和其他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广大妇女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争取自身的权利，不仅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而且展开了广泛的社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涌现大批争取妇女解放的组织。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并隶属于某个党派，如“法兰西妇女联盟”、“妇女民主运动”、“妇女情报研究中心”、“选择”、“路易丝·米歇尔俱乐部”。另一类标榜非政治性，但实际上具有某种政治倾向，如“全国妇女理事会”、“青年妇女”、“妇女联合会”、“争取女权同盟”、“国民社会妇女同盟”、“法国计划生育运动”。

法国妇女的处境从60年代中期起有了较大的改善。1965年制订的一项法律取消了拿破仑法典中某些不合理的条文。新法律缩小了夫妻财产共同支配的范围，双方分别管理各自在婚前或婚后得到的财产。此外，从1965年起还规定妇女不必经过丈夫同意便可从事任何一种职业，有权签署一切有关家务的合同和在银行开立户头。举凡买卖典押或分期付款购物等事项均需经过夫妻双方同意。1967年12月制订的一项法律使妇女正式取得了避孕的权利，尽管如此，对女子的歧视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例如在劳动就业方面，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仍非常明显，妇女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虽然不断扩大，但她们从事的多为单调重复、职务较低的劳动，所以工资也低。即使和男子干同样的工作，所获的报酬也经常低于男子。

五月风暴后，法国妇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些极为激进的人物和组织，如以奈尔西亚为首的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认为妇女还需要进行另一次革命，即反对男性的革命。其他妇女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和斗争目标，如要求社会承认生育是一种社会功能，而不是妇女的私事，妇女有权在医生配合下享有避孕保密和避孕自由，帮助独立承担家庭生活的单身母亲，谴责用妇女作色情广告，教科书不准出现妇女专管家务的形象等等。

1981年社会党政府上台后，对法国妇女解放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在政府中专门成立了妇女权利部，并采取了包括男女同工同酬的一些措施，在社会福利方面对妇女，尤其是单身母亲予以特殊照顾，并大量增加妇女咨询中心。

二、社会科学与科学技术

[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50年代后期起，结构主义取代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和其他哲学流派不同，结构主义并不是由一些专业哲学家所组成的哲学流派，而是在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文艺学及文化学等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所共同具有的某种观点和方法的总称，不同的学者以基本相同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自己的领域，从而建立了诸如“结构主义人类学”、“结构主义心理学”等学说和理论，人们把它们统称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首先把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观点和方法推广应用于社会科学，主要应用于人类学，从而建立了结构主义人类学。他在1962年出版的《野性的思维》一书最后一章“历史与辩证法”中，直接批判萨特1960年出版的《辩证理性批判》，公开向存在主义提出挑战。列维—斯特劳斯的其他主要著作还有《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1949）、《悲伤的热带》（1955）、《结构人类学》（1958）、《神话学》（4卷1964—1971）。

阿尔都塞是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60年代初，他在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影响下，把结构主义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研究上，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保卫马克思》（1965）、《阅读（资本论）》（1965）。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人们对长期流行的教条主义、个人崇拜强烈反感，迫切要求找到一条摆脱它们的出路，而阿尔都塞声称要对苏共领导在谴责个人崇拜中所未曾解决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回答，声称要按照结构主义的精神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现代化。因此他从60年代中期开始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声誉。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在结构主义发展过程中，繁衍出了在一些方面同结构主义紧密相连，在另一些方面却同结构主义的主张迥然相异，甚至截然相反的思想。这就是所谓后结构主义思想。后结构主义把结构主义拒斥形而上学、拒绝把人归结为观念的主体等等视为理所当然，但却认为在列维—斯特劳斯等人那里，存在着人道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的残余，认为结构主义无力为历史上各种文化提供政治说明，认为结构主义具有客观主义色彩，忽略了欲望着、实践着的社会主体。据此，后结构主义要在新的基础上恢复主观性、历史活动和实践的问题。人们一般把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演变，同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演变并列，称为战后法国思想界的两次大的颠倒。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有罗兰·巴特、福科、德娄泽和德里达。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的是莫里斯·阿莱，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提出了独特的市场经济理论，对80年代中期法国从国家控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1988年10月，77岁的阿莱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称为“新法国经济学派之父”，“经济分析世界中的一位巨匠”。

[科学技术的发展]戴高乐创建第五共和国后，加速发展科学技术。以后建立了许多大型公立研究机构，如原子能委员会、国家农业研究所、海外科学技术研究所等等。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国家科研中心，由该中心统管和协调全国科研活动。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法国的科研经费增加近10倍，科研人员也大幅度增加。为了发展空间科学、信息科学和海洋

科学，国家专门设立了宇宙空间研究中心、信息和自动化研究所和国家海洋开发中心。这一切初步形成了法国科学复兴的局面。

德斯坦执政时期，为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领导，法国政府决定由一名国务部长专管科学研究工作，内阁总理定期召集各有关部长讨论科研的重大问题，并主持科学技术研究的部际委员会。1978年法国有科研人员26万人，占就业人口的1.2%，科研经费38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1980年科研费用约530亿法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9%。由于政府重视，科研机构完善，科研经费充足，法国在六、七十年代在科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法国的数学研究仍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多人获得了被誉为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的费尔兹奖。法国在核物理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也令人瞩目，特别是快中子增殖反应堆的研制居世界首位。在医学和生物学方面同样成绩显赫，弗朗索瓦·雅各布等3位法国科学家在1965年因发现细菌中的调控活动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奖。此外，法国还在航空、电讯、海底油气开发、太阳能利用、宇宙学、生命科学等众多领域内具有世界先进水平。

尽管如此，与美、日等国相比，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对新技术革命还缺乏足够的重视，当70年代美日相继大规模地开发以微电子为中心的新技术时，法国没有紧紧跟上。而且，法国又在传统上偏重基础理论的研究，科研同经济、技术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不够紧密。因此，从总体水平来看，法国的尖端技术仍落后于美、日，影响了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致使法国经济回升乏力。

密特朗执政后，强调科学研究对国家的重大意义，认为“科学研究应当成为摆脱危机的手段和掌握未来命运的工具”，决定对科学研究进一步加强人力和物力的投资。1981年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5%，1984年又提高到2.2%。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密特朗在与联邦德国磋商后，于1985年4月提出尤里卡计划，要求西欧共同在电子光学、高速微电子学、新材料、大型电子计算机、大功率激光与粒子束、人工智能等方面进行联合研究。以“使欧洲能够掌握所有的高级技术，从而成为进入21世纪的一个洲”。

三、文学艺术

[新小说派]在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新的文学流派——新小说派在法国文坛迅速崛起。新小说家们认为，过去的小说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现代生活，要真实地反映现代生活，就必须打破一切传统的表现手法。因此，他们破除了传统小说的原有模式，如打破时空顺序，用梦境、幻觉、潜意识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主张不完整地描写事物和人物。他们认为作家所能解剖的事物只是个别的，这些个别的事物又只有在整体中才是有意义的，因此小说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

对“新小说”派的形成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有娜塔莉娅·萨洛特、阿兰·罗伯—葛利叶、布托尔、玛格丽特·杜拉和克罗德·西蒙。萨洛特的小小说的主要特点在于忽视情节，没有完整的人物形象，专注于人物心理的描写。主要作品有《向性》（1939）、《无名氏的肖像》（1948）、《马特洛》（1953）、《生死之间》（1968）、《“傻瓜们说”》（1977）和论文集《怀疑的时代》（1956）。

罗伯—葛利叶是“新小说派的首席代表和中流砥柱”，他在1953年发表的处女作《橡皮》中已经显示出其小说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缺乏合乎逻辑的情节线索，难以理清事件全貌，人物对事件的绝对客观的态度。其主要作品有：《窥视者》（1955）、《嫉妒》（1957）、《未来小说的道路》（1956）、《自然、人道主义、悲剧》（1958）等等。克罗德·西蒙是新小说派早期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作有《佛朗德之路》（1960）等，198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新小说派在60年代出现了自己的第二代作家和理论家——新新小说派。他们是一批围绕着《原样》杂志展开活动的文学青年，因而又称“原样派”。他们的反传统文学理论已经超过了新小说，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下，运用一切文学结构的可能性进行新的实验。著名的有菲立普·索莱尔、让—蒂波多和让·里加尔杜。

[新浪潮派电影]1959年夏纳国际电影节上出现了好几部法国新导演的作品，使人耳目一新，其中有戈达尔的《精疲力尽》、特吕弗的《四百下》、雷乃的《广岛之恋》。人们把这类新片统称为新浪潮。从1959年至1961年，是新浪潮运动的黄金时代，三年之间共拍出了100部影片，新浪潮电影运动席卷法国影坛并迅速波及整个西方电影界。

新浪潮电影运动的骨干和核心是以《电影手册》杂志为中心的一批青年影评家和导演，其中包括上述三人。戈达尔以拍《精疲力尽》一举成名。他通过影片中的主人公米歇·波瓦卡内表达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准则的极端蔑视，尽管影片中发出的是个人主义的绝望呐喊，讴歌的是无政府主义的盲目行动，然而由于影片迎合了法国及欧美各国广大“冷战一代”青年要求冲破旧的传统，推倒一切偶像的普遍心理状态，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继《精疲力尽》之后，又先后拍摄了《小兵士》（1960）、《女人总是女人》（1961）、《放纵的生活》（1962）、《狂人彼埃洛》（1965）、《男性与女性》（1966）、《周末》（1967）等，这些影片象速写画一样，勾勒出现代法国社会生活的面貌。从1968年起，戈达尔热衷于拍摄“政治影片”，在叙述方法上，彻底背离了固有的传统，其影片变得愈来愈抽象和难以理解。

《四百下》是特吕弗导演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而后相继编导了《二十岁时的爱情》（1962）、《偷吻》（1968）、《夫妻生活》（1970）、《飞逝的爱

情》（1978）。由于5部影片的主人公是同一个人，而且该主人公系由同一个演员扮演，演员随着剧中人一起增长年龄，因而在银幕上造成了一种“罕见的真实感”。在法国乃至欧美引起强烈反响。

“左岸派”是新浪潮运动的一个重要分支，由以阿仑·雷乃为首的一批有某些共同点的男女电影艺术家组成，因成员大都住在塞纳河左岸而得名。主要成员有阿仑·雷乃、罗伯—葛利叶、玛格丽特·杜拉等人。代表作有《广岛之恋》、《去年在马里昂巴》、《印度之歌》等。左岸派带有新浪潮运动的全部特点，但在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上都与“电影手册派”有明显的不同。电影手册派导演习惯于到自传和自己熟悉的社会圈子中摄取他们喜爱的题材，而左岸派导演则往往从战争的浩劫所带来的后果、原子弹的威胁和世上各种荒谬绝伦的事情中寻求灵感和素材，因而对忘却、记忆、想象、杜撰和在时间长河中往返流动的题材特别感兴趣。

第十八章 中法关系的产生、演变和发展

第一节 中法关系的开端

一、中法交往的开始

[法国对中国的发现]在古代，中法两国相隔万水千山，舟楫不便，陆路湮塞，东方巨龙中国在法国还鲜为人知。直至十三世纪以后，法国人才隐约地感到中国的存在。法国对中国的朦胧认识是从教皇和法王与蒙元的最初接触开始的。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势力向东西方扩张，西方基督教世界一方面慑于蒙古的威势，愿意与之保持良好关系，另一方面则想利用该势力加强十字军的东侵。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来到塞浦路斯准备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当时传说蒙古大汗愿意成为基督教徒，并想和十字军联合攻打埃及。于是路易九世派遣安德烈·隆如莫经亚美尼亚、马赞达兰（波斯）和希瓦，沿着里海的南岸和东岸到达当时大汗大营所在地准噶尔，但恰好大汗去世，隆如莫得到当时摄政的侮辱性答复后回国。路易九世在入侵埃及失败后，又于1252年派遣出生于法国北部圣·奥迈附近的威廉·鲁勃吕克去晋见新大汗。鲁勃吕克从阿克（今以色列境内）出发，经君士坦丁堡、克里米亚，从陆路跋涉来到蒙古，蒙哥大汗在宫里接见了。从1254年4月到8月，他在和林住了四个多月。回国时，带回了蒙哥大汗给路易九世的复信。归国后写了一部游记，记载了他的见闻。

鲁勃吕克等人虽然未曾踏上中国内地，但由于当时蒙古大汗和中国的特殊联系，他们得到了关于中国的一些知识，并把这些知识通过游记介绍给欧洲人，使当时的法国人对于中国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

他们知道，中国是一个东临大海，人口众多的国家。鲁勃吕克在游记中第一次证明，欧洲人过去所传的“丝国”就是中国。他们在蒙古还遇到许多中国手工业者，鲁勃吕克认为这些中国工匠的技术是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能超越的。他们生产出高质量的丝，用稻米酿酒等等。中国人写字用毛笔就和绘画一样，每个字就象一个图案，他记述了中国医生用手指按在脉搏上诊断病症；中国的货币是用棉纸制成的，象一只手那样大小，上面盖有大汗的印等等。

[北京第一任法籍大主教]鲁勃吕克在和林曾见到过当时被蒙古人掳去的法国俘虏。但当时是否有法国人涉足中国内地却无文献可稽，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到达汗巴利克（即今北京）的法国人是巴黎大学教授尼古拉大主教。

忽必烈入主中国建立元朝后，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态度，教皇尼克拉四世以为这是传教的良好机会，就派遣意大利人约翰·孟脱—考儿维诺来华传布天主教。考儿维诺约1328年在大都（北京）逝世。于是，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在1333年9月18日命令法国人尼古拉继任，尼古拉带了32人来华。

1368年，元朝亡，在大动乱中，尼古拉去向如何，史无可考。1370年，教廷命另一巴黎大学教授威廉·伯拉多继任北京大主教职，但起程后，下落不明，因为在明初，天主教会大多被毁。其后二百年间，在中国的土地上难

见法国人的踪迹。

[开辟海道的尝试]15世纪末，欧洲出现了探索到达印度和中国海路的热潮，君主因忙于国内统一和争夺欧洲霸权而无暇顾及对东方的远航。所以法国在东方新航路的开辟上，远远落后于葡、西、荷、英等国。然而，法国人并未袖手旁观。

1523年，吉奥凡尼·维拉查诺准备了四条船，从卢昂出发，旨在发现“在契丹之印度”。经新泽西后至路得岛，想追寻麦哲伦的航路，但不幸于1528年在里奥德拉普拉塔身亡。

1601年，圣马罗商人马丁·维特雷和彼拉尔·拉伐尔驾驶“新月”和“乌鸦”两船到达印度，后继续东行至印尼爪哇岛和万丹，后因遭海难而告终。

法国人马赖尔勃·维特雷13岁时去西班牙，1609年他从巴拿马出发，航行抵达中国广州、印度支那和马六甲，最后返回法国。

与此同时，法国当局对远东的开拓逐渐重视。在法兰西斯一世时期，法王曾于1537和1543年发布诏书，鼓励法国人作长途航行。亨利四世也曾考虑发展法国和印度贸易。在黎世留首相执政时，他开始重视对中国的贸易。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法国在航海业和对远东航路的开辟开始急起直追。

直到1698年，在法籍耶稣会士的安排下，经路易十四批准，派遣第一艘商船赴华。赴华的商船取名“昂菲德里特”，载重量为500吨。1698年2月8日，法王指示船长：要仔细识别中国海岸线，打听海岸的风讯、潮汐、水流及开船停泊的适当时间，搜集中国的埠口、碇泊处及海岸的地图，了解中国和其他各国贸易的情况，掌握中国当地的风俗习惯，以免将来在和地方当局打交道时发生不测。3月6日，“昂菲德里特”号启程，11月2日船抵广州。

二、中法交往的加深

[法籍耶稣会士的派遣]路易十四时期，中法交往掀起新的热潮。

众多的法籍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是中法交往新高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继圣芳济踏上中国领土，利玛窦进入中国内地后，西方天主教士以耶稣会士为主纷纷来华传教。第一个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是金尼阁，他曾在1610年和1620年二次来华，1628年死于杭州。较早来华的还有法籍教士亚历山大·罗得（1623年）和巴吕（1664年），但他们都是教皇派遣的。1685年3月，有两艘船从法启程，驶往暹罗，上面载有若干教士，其中有5人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他们是洪若翰、张诚、李明、刘应、白晋，这些人既是耶稣会士，又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携带数学仪器、天文模型、大望远镜、科学院院士的备忘录等。于1687年7月23日抵达宁波，1688年2月7日到达北京。

1693年白晋受康熙皇帝派遣，返法招罗教士来华服务。白晋历经艰辛于1697年抵法，1698年在白晋率领下又有7名耶稣会士搭乘“昂菲德里特”号船赴华，其中著名的有巴多明、马若瑟和雷孝思，从金尼阁起至1773年耶稣会解散止，先后来华的法国教士有近百人。

法国传教士来华后，以传教为目的，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尽管怀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但耶稣会士的最初活动却促进了中法文化的交流。

[中国最早的赴法学者和学生]十八世纪上半期，随着法国传教士的东来，一些中国学者和学生在法人的影响下，跟随他们去法国，这是中国最早赴法的学者和学生。有记载可查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人，黄某、胡约翰、高类思、杨德望。

他们在法国一方面学习法国的文化，一方面向法国人介绍中国文化，帮助他们了解中国，对中法文化的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黄某，福建兴化人，1679年皈依基督教，受洗时取名阿尔卡迪奥。1703年，他随法国传教士郎洪仁到法国。在王家图书馆工作，负责编写《汉法字典》。他和启蒙学家孟德斯鸠有过接触，进行过长谈，详细回答了孟德斯鸠所提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中国的哲学、宗教、刑罚、礼仪、语文、科举、政治、历史等方面。1716年病死巴黎。

胡约翰，1722年随傅圣泽传教士赴法。康熙在傅圣泽回国时，赠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4000册中国书籍，胡约翰在法国时，协助解释这些书籍。

高类思和杨德望是北京人，在北京时曾就学于法国传教士蒋友仁门下，1751年被送往法国留学，历时十多年，学了法文、拉丁文和神学，最后一年又专攻应用科学，学习绘画和铜版雕刻术。在法期间，曾拜访了当时的大臣、国务秘书贝尔丹。离法前，又访问了法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杜尔哥。杜尔哥向他俩提出关于中国工农业技术、物产、历史等方面52个问题，请他们回国后进行调查。他俩回国后，与法国传教士共同写成《中国兵法论》、《米谷保存法》、《中国古代论》等，作为对杜尔哥提出问题的回答。

[两国通商的开始]法国对东方的贸易在亨利四世时就有所考虑，黎世留时开始重视对华贸易，在政约中就曾提及。然而，真正付之于行动是在路易十四时代。

1660年法国鲁昂富商出巨资创设“航行中国、东京、印度支那及附近岛

屿之公司”，此事得到马扎然的鼓励。该公司在荷兰建造一艘三四百吨位的船，后来该船在德克西尔岛遇风暴沉没，公司也告破产。

1664年，法国建立了东印度公司。该公司获得印度及东方诸地，包括中国在内的航行和贸易专利，并预定于1668年5月开始对华贸易。但是计划实施进展缓慢，该公司未能率先开创对华贸易。

1698年，第一艘法国商船“昂菲德里特”号驶抵中国，对华贸易从此开始。1700年此船返法时，从中国运回大量丝绸、瓷器。1701年，“昂菲德里特”号再次赴华，返法时，运回大批漆器。

在此期间，1700年10月23日，负责“昂菲德里特”号贸易的茹尔当·德·格鲁赛与东印度公司订立合同，专门建立了“中国公司”，进行对华贸易。此后，法国对华贸易发展迅速，至18世纪前半叶，法国的对华贸易已接近英、荷等国的水平。1736年到广东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有12艘，其中美国5艘、法国3艘、荷兰2艘、丹麦1艘、瑞典1艘。1753年，到广东的外国商船有27艘，英国10艘、荷兰6艘、法国5艘、瑞典3艘、丹麦2艘。但是英法七年战争期间，英国夺取法国在海外的许多殖民地，法国对东方贸易受到打击，对华贸易也就一蹶不振。

为了维护法国对中国的贸易，法国国王曾于1776年2月3日，明令在广州设置领事，第一任领事为傅格林。但也无法挽回在中国贸易的颓势。

三、中法文化交流的初次高潮

[西学东渐]西欧传教士来华的主要活动是传教。但这些传教士本身大多是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因此，当他们在传教的同时，把西方的书籍、科学仪器带到中国，把西方的科学文化介绍到中国。这就揭开了西学东渐新的一页。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早在1620年，法籍传教士金尼阁，在第二次来华时，带来了教皇保罗五世颁赐的7000余部书籍，书运抵澳门，后陆续运往京城，是否全部运入，尚存疑问。据载，7000多部书，选择精良，“重复者不入，纤细者不入”。除了神学、哲学书籍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类书籍。以后欧洲传教士将某些书译出，第一部译著是由比利时人邓玉函和王徵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

自路易十四派遣第一批法国传教士来华以后，在华的法国传教士陆续增加。他们传播西方科技与文化，努力为朝廷服务，以取得中国政府的信任。

时值中国清代康熙皇帝在位时期，康熙对西方文化采取开明态度，自己也专心学习。为了学习西洋科学，最初请比利时人南怀仁为师。南怀仁死后，康熙又召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进内廷，供奉皇帝学习西学。传教士每天早上4时到廷，日落而归，上下午给皇帝各上2小时的课，讲授西方数学、哲学、天文学、历法以及炮术实地演习等课，历时四五年。

除了服务于宫廷外，他们还通过翻译、著述，实际工作等，把当时西方先进科学知识带到中国。

在舆地上，法国传教士的最大贡献是绘制《皇舆全览图》。1708年（康熙47年），皇帝命传教士分赴蒙古和内地，绘制一幅较为详细的全国地图。担负这项工作的主要是法国传教士，参加测量调查的有法国人张诚、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冯秉正、德玛诺等，还有一名日耳曼人和中国学者何国栋。他们采用西方先进的科学仪器和绘制技术费时近十载，于1717年完成各省地图的绘制。最后由雷孝思、白晋等人汇成总图一幅。康熙命名为《皇舆全览图》，此图绘制精细，测量准确，是当时中国最科学的一幅全国地图。

在天文学上，法国传教士蒋友仁曾向中国皇帝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1757年，罗马教廷废除了对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禁令，西方传教士才正式把这种学说介绍给中国。1760年，蒋友仁借向乾隆皇帝献《坤舆全图》的机会，在地图的四周布置了天文学内容的插图和文字说明，宣布哥白尼学说的正确性。此外，法国遣使会士罗广祥曾在钦天监任职。

在算学上，杜德美输入割圆术。杜德美将割圆术授给满人明安图，明安图于乾隆初年始编《割圆密率捷法》一书。

在建筑方面，圆明园的畅春园仿法国宫殿而建，是乾隆委任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等设计的，其中谐奇趣、蓄水楼、花园、蓄雀笼、方外观、竹亭等十二处的喷水池和白石雕刻，全部模仿路易十四时代的风格。

在语言学上，法籍教士金尼阁著有《西儒耳目资》三卷。首卷为文字学及概述；中卷是依音韵排列汉字；末卷是以字偏旁排列汉字，并以西方字母为其拼音。主要为西方人攻读汉文的工具书，但在音韵学上也是有价值的。

[中国文化在法国的介绍]法国传教士一方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又通过记叙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中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成果以及翻译中国典籍，把中国的古老文化介绍到西方和法国。

法国传教士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初出版了三部巨著，介绍中国科学与文化。

(1)《海外传教耶稣会士书简集》1702—1773年陆续出版，共34卷，其中第16—26卷是关于中国的。这部书汇集了当时传教士们从中国寄回欧洲的书信，对中国情况有详细描述。

(2)《中华帝国全志》由竺赫德主编并作序，1735年出版，共4卷。此书收集了传教士发中国的回忆录，记述中国地理、历史、年代、自然情况，附有64幅插图，其中50幅是地图和城市简图，14幅风景、服饰等等的插图。

(3)《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人的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论丛》简称《中国论丛》，1776—1814年出版，共16卷。

此外，法国传教士宋君荣、马若瑟等把中国古典经籍，如诗、书、易、礼译成法文，并加以注释。冯秉正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编译成法文，题名《中国通史》。宋君荣还把诗经、书经上的天文历算，摘译成《中国天文历史》，把《成吉思汗》、《蒙古史》也译成法文。法国人殷弘绪、赫苍壁等将朱熹的《劝学篇》、刘向的《列女传》、《诗经选篇》译成外文，还翻译了中国的《养蚕术》、《图注脉诀辨真》、《泉币志》等。

如此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文献传入法国，引起了法国思想界的极大关注和浓厚兴趣，尤其在启蒙思想家中反响非凡。

当时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已陷入深刻危机中，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正在壮大，作为革命先驱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应运而生，启蒙思想家用“理性”的武器无情地批判现存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同时他们也需要得到新的思想材料、新的治国蓝图来丰富充实自己的理论，来设计未来的新社会。而这时经过传教士的滤色镜而传入法国的中国文化正好适应了启蒙思想家的这种需要。

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介绍是经过他们主观加工的，难免有夸张和偏见。同时，启蒙思想家由于思想体系和思想方法的不同，对来自中国的文献材料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中国文化对当时法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

一部分思想家对中国文化赞扬备至，他们要奉中国文化为楷模，并用中国的事例，抨击天主教神学的迷信和黑暗，反对专制王权，宣扬信仰自由，宣传自然神论。其中著名的代表是伏尔泰、百科全书派和重农学派。

伏尔泰曾在许多著作中提到中国，赞美中国。在他的名著《各民族风俗论》中，中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哲学辞典》和为《百科全书》撰写的一些条目中，对中国的历史、哲学、政治制度、道德宗教观、教育都推崇备至。他还把元曲《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剧本。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最后一章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中，对中国也不乏赞美之词。

伏尔泰赞扬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在他写的《百科全书》“历史”条目中写道：“使中国人能立于世界各民族之上的，就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他们读书人所讲的语言约四千年未曾改变。”该民族“在我们认识它的某些个人之前就已创造了几乎所有的艺术。”在《哲学辞典》“光荣”条目中，他更是坚持了这样的观点：“世界历史自中国始。”伏尔泰还竭力推崇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在《哲学辞典》“中国”条目中，他写道“他们帝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只有它是完全建筑在人权之上的，只有在此制度下，一个省的长官如果不受人民的欢迎，就会被撤职，受到惩罚；……。”他还指出：“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

称首屈一指。”伏尔泰还根据儒学合道德和宗教为一身的特征，把它认定为自然神论，以充实自己的宗教理论，他认为儒学是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理性宗教”，他用它来反对欧洲当时盛行的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他认为“孔子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这就是唯以德教人，要求人们修身、治国，都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理性，“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他认为，在人之间存在一条基本的不朽的规律，这就是“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他公开号召欧洲向中国学习：“当欧洲的王公贵族听说这样的榜样时，该怎么办？敬仰和羞愧，但更重要的是仿效。”

“百科全书”派对中国的看法和伏尔泰相似，狄德罗夸奖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霍尔巴哈主张象中国那样以德治国，他使用了“德治”一词。在《社会体系》一书中公然宣称：“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爱尔维修在《论精神》中也有类似的溢美之词。波瓦伏尔在《哲学家游记》中，更表现出对中国的盲目崇拜。他写道：“如果中华帝国的法律成了各国的法律，那么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中国提供了这样一幅诱人的图景。到北京去！去瞻仰世上的最强者，那才是上天真正完备的形象。”

重农学派对中国的看法不仅仅停留在赞美上，而是用中国的哲学政治思想来充实自己的理论，真正从中国的文化中汲取营养。这个学派主张以“自然法则”和“自然秩序”替代上帝的神示。它的创始人魁奈，因为推崇孔子学说，有“欧洲的孔夫子”之称。他认为，“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他根据中国理想君主无为而治的思想提出，一旦君主依自然法则改革了立法，他就不须干任何事，“让法律来统治。”重农学派学说的重心在经济学说上，他们认为，所有的财富来自于土地的产品（如农业、采矿、伐木）。这种重农思想，也可以见到中国以农为本思想的痕迹。魁奈非常赞赏中国的重农主义和历代君主重视农业的政策，在他充任御医时，曾鼓动法王路易十五在1765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春耕“籍田”仪式。另外，魁奈关于实行土地单一税政策的主张，也出于中国古代税制，特别是受《周礼》均田贡赋法的启示。重农学派在教育上，提倡教育世俗化和教育普及。在这方面也受到中国科举制度的影响。在他们眼里中国人通过读书科举便可进入仕途，不受贫富和宗教的限止。魁奈认为，公共福利必须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学习，在这方面唯一在中国引起重视。中国古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对重农学派政治思想和经济学说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

当然，也有一部分思想家，例如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是从消极面来看待和总结中国文化的。

孟德斯鸠为了论证他三权分立的政治理论和实行开明君主制的理想，他把世界上的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把中国作为专制政体的典型。他通过对中国的大量研究，表示出和伏尔泰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中国的美好描写以示怀疑，而对中国君主暴戾、中国的丑陋现象的描写却深信不疑。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论述散见于许多著作中，如《论法的精神》、《思想》、《波斯人信札》、《随笔》、《地理》和《论一般专制政体》，其中《论法的精神》全书31章中，提及中国的多达21章。在孟德斯鸠笔下，中国是暴戾的专制国家。他说：“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他认为，中国的君主集宗教与世俗大权于一身，对臣民实行独裁统治。中国的刑罚残

酷，炮烙、凌迟等酷刑令人发指，而且往往株连九族。他认为，中国人口奇多，耕地不足，人民生活贫困，弃婴到处可见。因此，他认为，中国不能成为欧洲的模式。

卢梭是主张主权在民的民主主义者，所以他对一切君主政体都深恶痛绝，对中国的专制统治也不例外，他在《科学艺术论》一书中，对中国有许多非难之词。他用中国人文化进步，反丧失其民族牺牲精神，因而不能抵御蒙满的入侵一事，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他指出：“如果科学真的使道德净化了，科学教导人们为祖国而流血，科学给人以勇气，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不可战胜的……但如果中国大臣们的能力，中国法律所谓的明智，以及众多的中国居民不能保卫自己的领地，而臣属于无知的、粗暴的蛮族，所有这些聪明的人又有何用？”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在法国思想界引起不同反响，就是中法文化交流深入的明证。

[中国艺术和罗可可风格]17、18世纪的法国正是欧洲文艺、美术、戏剧、礼节、服饰、装璜仿效的中心。在路易十四时代，和专制王权加强相适应，法国和欧洲在艺术上盛行巴洛克风尚，其特征是富丽堂皇、庄严雄伟，但不免刻板 and 形式化。路易十四死后，人们普遍要求在各方面都摆脱专制王权束缚，和哲学思想的启蒙运动相呼应，在艺术上也倡导个性解放，摆脱古典的、呆板的艺术形式，于是，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罗可可风格应运而生。如果说，巴洛克风格导源于古罗马的遗风，那么，罗可可风格实借鉴了中国艺术。

罗可可艺术风格的特点是明快、轻灵、生动、自然，保留有幽雅、精致、纤巧的中国艺术对它影响的遗痕。罗可可艺术风格的形成最初得益于中国艺术品流入法国。随着中法贸易的发展，中国的丝织品、瓷器、漆器等源源不断进入法国，法国的宫廷和王公贵族争相购藏中国物品。中国物品以其质地优良、装饰新奇而风靡法国，以致供不应求。因此，当时法国一些工匠开始仿效中国艺术品，以迎合法国人的“中国趣味”，这种对中国艺术品样式和装饰的模仿，最终旁及至绘画和建筑。从而促进了罗可可风格的形成。

瓷器在15世纪的欧洲还是稀有珍品。自新航路开辟后，葡萄牙开始输入中国瓷器；17世纪以后荷英也参加了远东贸易。法国最早购买瓷器通过这些国家，“昂菲德里特”号商船首航中国后，才从中国直接输入瓷器。瓷器初入法国，法国人就用1610年巴黎流行的杜尔夫的小说《牧羊女爱丝坦莱》的情人赛拉同来称呼青瓷，因为赛拉同常穿青斗篷。法王路易十四曾命令首相马扎然创办中国公司，到广东订造标有法国甲冑纹章的瓷器，凡尔赛宫内列有专室，供法王珍藏华瓷。法王路易十五曾下令，将法国所有银器熔化，以充国用，而以瓷器取代。18世纪后期，法国开始仿制瓷器，1673年在鲁昂，1695年在圣克卢，都生产过黄色而透明的软瓷，产品是以福建白瓷为标本的。法国制造瓷器，曾得到景德镇神父殷宏绪的帮助。他在1717年将景德镇高岭土的标本寄往法国。1750年，杜尔列昂斯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瓷土。1768年在里摩日发现瓷土层后，塞夫勒瓷厂造出了硬质瓷器。

法国人在仿效中国漆器上略胜一筹。在路易十四时代，梅特纳夫曾在凡尔赛宫和特里亚纳宫中采用整套中国漆制家具。“昂菲德里特”号第二次来华带回了一批漆器，漆器才开始大量输入法国。不久，一些工匠就开始仿照中国式样制造漆器。最早是在法国圣安托万地区，以后以马丹家族的作品最为出名。马丹家族中有四兄弟都精以此业，而获得最大成功的是罗伯特·马

丹。他的作品在黑色的底子上配有优美的花鸟图案。他特别得到了蓬巴杜夫人的欣赏。1752年，为了装饰她的贝勒维宫的需要，蓬巴杜向马丹订购了一大批漆器。马丹的名声超出了国界，菲特烈大帝把他的儿子作为漆工带到了普鲁士的宫廷中。

漆器不只局限于家具，中国的轿子也传到了法国。轿子在17世纪初便传入欧洲，1644年在法国文献中已见记载，莫里哀在多部喜剧中都提到过轿子，尤其是1659年的《风流妇女》，在路易十四时代，轿子作为东方等级社会的象征也在法国流行，和当时的专制主义相适应。以后法国人把轿子改为装上轮子的轿式马车。路易十四以后，轿子在法国逐渐减少，而轿式马车开始流行。在1737年，只有老百姓还使用轿子，而富人都坐马车了。但是这种马车在材料和式样上还保留了轿子的痕迹。

17、18世纪，尽管欧洲早已能自己生产丝绸，但由于中国丝绸价廉物美而深受欧洲人的青睐，进口量大大增加。这时，中国的丝绸，欧洲的仿制品，以及中国的棉织品被广泛地用于服装、悬物、被面等。蓬巴杜夫人就曾穿用中国花鸟的绸裙。作为丝绸的附属物，中国丝绣也促使了法国刺绣的变化和多样化。皮尔蒙的花卉设计图案明显受中国样板的影响，他曾长期在里昂居住。丹尼艾尔·马罗的制绣图，大胆地把螺旋形、格状形和自然的小花结合在一起，和中国的刺绣十分相似。

此时，中国的画屏和壁纸在法国也成了时尚。欧洲在16世纪就能生产壁纸了。但是壁纸的广泛使用和中国样式壁纸的生产也是自18世纪中国壁纸大量进口时起。当时中国壁纸单张高12英尺，宽4英尺，每套有一系列关联的图案构成，可以糊满整个房间。图案起先多花鸟，后期增加了山水、人物、种茶、制陶的场景。1688年，法国仿中国壁纸制造成功。

瓷器、漆器、彩丝、画屏等最初并不是作为精美的艺术品，而是作为质量上乘的生活用品而输入法国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追求中国趣味的风尚，中国的样式和设计原则为法国人所熟悉。中国物品装饰的图案和图案表现出来的新世界影响了法国人的艺术追求，于是在艺术领域，如绘画、建筑、园林等方面，成为罗科科风格兴起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建筑上，当时法国主要的大建筑物几乎没受罗科科风格的影响，古典传统还是占支配地位，但在一些小的建筑物，尤其在乡村别墅和避暑庄园上，体现出罗科科风格的痕迹。法国罗科科的典型建筑是1722年完成的桑梯里小城堡亲王厅和巴黎苏毕士旅馆的“沙龙”，构造的轻巧，屋顶多取圆弧而避方尖，奇异的尖顶饰、屋檐下的挂钟、游廊、方格窗等是罗科科建筑的典型特征。中国园囿建筑，在英国发展最盛，后来传至法国，称为“中英式花园”，法国香德庐正是一例。

在绘画上，罗科科风格代表首推华多，他的作品常以浅色表现，黯淡的流云和纯朴的山景构成画面烟雾迷濛的韵致。有人认为华多的画极似中国宋代之风景画，他的作品《孤岛帆阴》，被公认为具有中国风格的佳作。

罗科科风格延续了几十年，1755年随着庞培城的考古发现，新古典主义兴起，约在1780年，罗科科风格被新古典主义所取代。

17、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的发展是中法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哲学，中国也逐渐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此后，中国在法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逐渐淡漠，中法间一度的亲密接触又疏远了。

第二节 近代中法关系的演变和文化交流

一、法国对中国的侵略

[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第一次中法交往高潮过后几十年，西欧各国经历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巨大变化，而闭关锁国的中国则明显落伍，日显孱弱，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鱼肉的对象。法国参加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并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开始了新的交往，在中法关系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法国通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

首先，强迫中国开港通商。法国通过《中法黄埔条约》、《中法天津条约》、《中法北京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迫使中国对法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登州、台湾、潮州、琼州、淡水、江宁、天津以及西南边境等为通商口岸，法国在这些口岸倾销本国商品，使中国成了他们的商品市场。

第二，控制中国关税。为了使法国商品倾销中国畅通无阻，法国迫使中国接受低税率的协定关税，并不得任意更改。根据协定其货物税率，大部分相当于值百抽五。虽在 1858 年《中法天津条约》规定每隔 7 年修订一次税则，实际上直到 1902 年始终没有改变。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和约中，又规定了中越间陆路贸易减税的原则。法国还参与控制中国海关的活动。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上海海关被捣毁，外国军队乘机占据上海海关，法国领事会同英、美领事于 1854 年 6 月与苏松太道吴健彰商定由三国领事各推荐一人充当司税。法国充任司税的是副领事史密斯。虽然这种制度只限于上海，未得到清政府承认，但它是中国海关为外国人控制的开端。

第三，明火执仗进行经济掠夺。法国在对华战争后，往往逼中国赔款，敲榨勒索。《中法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对法国赔款 200 万两银。《中法北京条约》又逼中国交给法国赔款 800 万两，恤金 20 万两。法国还通过《辛丑条约》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了 4.5 亿两赔款。

此外，法国还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

[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在进行经济侵略的同时，法国还在中国掠取领事裁判权、建立租界、争夺势力范围，侵犯中国的主权。

根据黄埔条约，法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胡作非为，闹事犯法，中国不能依据中国法律治罪，而由法国领事按法国法律处理。这些规定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在实际中，法国领事又往往庇护法国罪犯，因此，使得法国的罪犯在中国可以为所欲为，横行无忌。

法国在中国建立租界始于 1849 年，但 1844 年的黄埔条约已经为这一侵略行为作了辅垫。1844 年黄埔条约第 22 款使法国人获得在五口自由居住，租建房屋的权利，而且规定：“房屋间数，地段宽广，不必议立限止。”1848 年，上海法国领事敏体尼上任后，借法国传教士的永租地建立了领事馆，以后，他用法国商人要租界土地的借口，向上海道台要求一块租借地。在法国领事的胁迫下，上海道台于 1849 年 4 月发布公告，规定以上海县城（北门外的城河）与英租界（南界的洋泾浜）之间，作为法租界，总面积约 986 亩。

1862年，法国在上海成立法租界工部局，由法国领事统制。租界俨然是国中之国。除上海租界外，法国人还相继在沙面（1861年）、天津（1861年）和汉口（1896年）设立了租界。

中日甲午战争后，各西方列强视贫弱的中国为猎物，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仿效，争夺各自的势力范围。法国依仗它在印度支那的有利地位，把目光放在中国的两广和云南地区。早在中法战争时，法国已注重在中国西南诸省发展自己的势力，《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不仅打开中法边境交易的大门，还为法国在中国建造铁路提供方便。《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法国又会同德、俄对日施加压力，干涉还辽，然后乘机向清政府索取“报酬”。1895年6月，订立了《中法界约》和《中法商约》，条约增开商埠，并规定中国将来在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开采矿产，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越南铁路接至中国境内。1896年，法国又获得承筑龙州至同登铁路。法国开始获得西南诸省开矿及筑路等特权。

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法国不甘落后，1898年4月10日，法国代办吕班强迫总理衙门致书法使，并作正式宣示：清政府答应不把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割让或租借给其他国家；同意法国由越南边界建造铁路至云南府，以作为河内至劳开（保胜）铁路的延长；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现湛江地区）。同年5月27日，中法签订《中法广州湾租借条约》，划定租借地界限，确定租借年限为99年。西南诸省由此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法国对中国文化侵略集中表现在中国传教，用天主教的精神鸦片毒害中国人的灵魂，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侵略服务。

早在1724年初（雍正元年年底），清政府宣布禁止信仰天主教，不许外国人在中国各地传教。随着洋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西方列强力争天主教弛禁。《南京条约》已有保护传教者的条文，法国人通过《黄埔条约》获得在五口建造教堂的权益。此后，法国成为争取传教权的急先锋。法国使臣刺萼尼在《黄埔条约》签订后，又迫使耆英上奏道光批准弛禁。1844年，道光帝在耆英奏本上批：“依议钦此”。天主教弛禁后，教士们怂恿刺萼尼向清政府提出发还雍正年间被查封的天主教堂旧址。道光帝被迫于1846年2月20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布解除对天主教的禁止，并把康熙年间建造的天主教堂还给教徒。

根据这项上谕，法国传教士在各地纷纷要求发还旧址，这些旧址事实上并不还给教徒，而成了法国教会的财产。在上海，法国教会得到了上海县城南门外的一处天主堂；城内另一处天主堂因旧址改建帝庙，法国教会另得董家渡、洋泾浜等三处市肆房屋作为抵偿。在北京，法国主教孟振生也强行索回北京东、西、北三处教堂。此外，传教士还建造许多新教堂。

道光帝在上谕中禁止外国人到内地传教的，但法国传教士仍非法潜入内地传教。在1844年—1858年间，法国传教士在内地的活动范围遍及25个省区。由此造成了许多教案。最重要的是西林教案。1853年，法国教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名，欺压人民，奸污妇女，作恶多端，1856年，新任西林县知县将其逮捕并处死。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法国由此获得入

内地传教的权益。

法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主要是通过讲道、洗礼，发展天主教信徒，此外，还创办医院、孤儿院、留养院，开办各种学校，他们创办慈善事业主要是为传教服务的，开办学校也是为了进行文化侵略，他们自己曾说：“学校在传教区内作了很多开辟传布道路的工作，它们常常起着尖兵的作用，是布置轰炸敌人堡垒的工兵和弹药手。它们是特别用来帮助传教士的工具。”当然，在客观上，这些教会学校和慈善事业对在中国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法国教会在中国的发展，不少传教士成为干涉行政、包揽诉讼、搜集情报、霸占田产、欺压人民的恶势力。

[清代两国公使的互派]早在《黄埔条约》签订前，法国就曾派有领事在中国，1776年法国曾在广州设领事馆，第一位法国驻广州领事是旧时大班傅格林。《黄埔条约》签订前的领事是法国单方面任命的。并未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而且具有临时性质，时有时无，其职责也主要局限于管理法国在华的商务上。

1844年《黄埔条约》使法国获得在五口设领事的权利，除了办理贸易事务外，还有领事裁判权，成了维护法国在华利益的重要设置。为了加强法国在华的外交机构，1847年1月16日，基佐向法国国王建议在中国设“公使”兼代办一人，其任务在于“总理贸易事务”。并推荐法国驻里斯本使馆秘书卢昂于1847年4月24日启程搭船来华，1848年1月到广州，致书清朝钦差大臣耆英，受到耆英的接待。不久法国又在上海设立领事馆，法第一任驻沪领事敏体尼1848年10月到任。

《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获得使节长驻北京的权利。1861年3月法国首任驻北京公使布尔布隆抵京。

中国于《北京条约》签订后，在外交机构上也有若干变化。以前和外国交往事宜由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负责。1860年10月清政府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且也向国外派驻使节。中法外交关系趋向正规化。

1867年11月21日，恭亲王奕诉奏请遣派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中国派往其他各国的特命大使。蒲安臣带着华人随员30人左右于1869年1月24日以中国使臣身份会见拿破仑三世，递交了中国国书。

1878年，郭嵩焘被命为第一任中国驻法公使，于5月6日在巴黎呈递国书。此后，两国不断互派使节，进行交往。

二、近代中法科技文化交流

[中法文化交流的第二次高潮]鸦片战争后，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被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从落后挨打中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学习，出现了西学东渐的第二次高潮。

鸦片战争后不久，就有一批介绍西方的地理著作问世，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要了解西方，就要旁通他国语言，因此在清同治初年，有教习外语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的设立。继而，中国人认识到，西方的强大在于有坚船利炮，因此，开始引入西方科技和军事，兴起了洋务运动。并开始在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设立翻译馆，翻译西方著作，介绍西方文化，最初所译主要是工艺、兵法、医学之类的自然科学书籍。以后，中国人懂得，徒有坚船利炮，而无立国之本不能强盛，于是开始着眼于西方的思想文化，所译之书也注意思想、文学方面。随着西学东渐第二次高潮到来，中法文化交流也呈现出高潮。

魏源的《海国图志》已有对法国的介绍。同文馆中的一位英国教习曾著《法国史略》。而另一位法国的教习则编有《化学指南》、《各国史略》、《汉法字汇》等 20 种书籍。1866 年清廷首次派员游历西欧，被派者为内务府庆丰司郎中斌椿，他历游英、法、瑞典、俄、德诸国，在法国，他到了马赛、里昂、巴黎，归国后著有《乘槎日记》，内有在法国所见所闻的记载。以后又有志刚使团和崇厚使团的派遣。后来出使英法的郭嵩焘又著《使西记程》；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也著有《出使日记》等。中国人最初就是通过书籍介绍、游历、新闻报道以接触法国文化。但是这些了解还只是一鳞半爪。

法国文化真正对中国历史有深刻影响的首先应推洋务运动中法国人用法国科技协助洋务派创办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左宗棠在 1866 年设立的，在设立过程中，得到法国人德克碑和日意格的支持和帮助。船厂建立之后，日意格担任监督，德克碑担任副监督。

为了培养造船人才，左宗棠还附造船厂设立船政学堂。学堂设在船厂东北，分为前学堂和后学堂。前学堂习法文，学造船，也称法国学堂；后学堂习英文，学驾驶，也称英国学堂。

学校还派出留学生去欧洲留学。1875 年（光绪元年），沈葆楨派遣福建造船厂学生刘步蟾、林泰曾、魏瀚、陈兆翔、陈季同五人随日意格赴法学习船政，这是清朝开国后我国赴欧洲留学的最早学生。次年 12 月，沈葆楨、李鸿章会奏选派船政学堂学生 24 人和艺徒 7 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海军与制造。原来在法国工厂实习的魏瀚、陈兆翔入大学深造。这是我国官派留学生之始。

以后，法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也开始传入中国。在这方面的成就应首推严复和林纾两人。

严复（1853—1921）是我国系统翻译西方思想学术著作的第一人，他翻译孟德斯鸠的《法意》一书，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颇大。

林纾（1852—1924）是第一个系统翻译西洋文学的名家。他本人不懂外文，请人口译大意，然后笔录之。通过这种方法，共翻译了 159 部外国文学著作。其中法国的文学作品有《茶花女》（译名《茶花女遗事》）等 27 部。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传统对中国的影响]中国改良主义者深受法国革命思想的影响。极力推崇法国的启蒙思想并从中获得思想养料。但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政治立场上大多持否定态度。

在早期改良主义者中,王韬和马建忠是受法国影响较多的人。王韬(1828—1897)在1867年到1870年在旅欧期间,曾两次抵达法国,参观过巴黎古迹,凯旋门、博物馆等,对法国的历史、地理、风俗、社会现状均有较深了解。1870年回香港后,便着手编著法国历史。先后出版《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以中国人的眼光和史笔分析了法国的历史和国情,直接为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思想理论武器。

马建忠(1844—1900)在1877年曾由李鸿章资送法国留学,学习政治法律,兼充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80年回国后,宣传改革,并介绍了“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出现,使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达到高潮。他们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吸取了丰富的养料,尤其是梁启超,他在许多著作中极力赞扬法国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最推崇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说。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写道:“十八世纪以前,政治学基础甚薄,一任之君相之手,听其自腐败自发达。及孟德斯鸠出,始分别三种政体……立法、动政、司法三权鼎立之说,后此各国,靡然以之……。”在《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一文中,他赞扬美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及英、俄等国的改革。并用下列结束语:“造此福者谁手,孟德斯鸠也。”

梁启超还竭力赞美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曰卢梭之倡天赋人权……自此说一行欧学界,如平地起一霹雳,如暗界放一光明,风驰云卷,仅十余年,遂有法国大革命之事……十九世纪全世界之原动力也。”

梁启超一方面用启蒙思想的某些理论来武装自己,一方面从启蒙运动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中,看到了思想运动的重要作用,为维新变法大造舆论。比起康有为又略胜一筹。

但是康、梁毕竟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并不赞成法国革命,只主张从革命中吸取教训,认为如不变法就会发生象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民乱”,因此他们常常夸大法国大革命的残酷性,以反对革命,还以路易十六上断头台为例,劝光绪皇帝赶快变法图强。

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中国主张革命的呼声日高。这时以邹容和陈天华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十分重视外国革命经验的研究。他们对法国1789年革命以及其它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新的探讨和评价,吸取了法国革命的光荣传统,以充实和武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

邹容在《革命军》中对法国革命大加赞扬,称法国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他还分析了法国革命的原因,以作为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的佐证,他指出:“滥用名器、致贵贱贫富之格,大相悬殊、既失保民之道,而又赋敛无度,此法国志士仁人,所以不辞暴举逆乱之名,而出于革命之原因也。”从法国革命的经验中,他指出要革命首先要根除奴隶性:“法人革命前之奴隶,卒收革命之成功。美国独立前之奴隶,卒脱英人之制缚。此无他,能自认为国民耳。吾故曰: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陈天华则更明确地宣传了法国大革命,在《猛回头》中号召中国人民:

“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然后详细叙述了法国革命的过程，介绍了卢梭主权在民的思想。他还在《警世钟》中号召妇女革命救国，他以世界上许多女革命为例，认为妇女也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革命，他写道：“你看法兰西革命，不有那位罗兰夫人吗？”

中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几次到过法国，也很推崇法国革命。他提倡的三民主义，其思想来源也有法国革命传统的成份。

孙中山在《民报》创办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在论到民权主义时，曾提到“法兰西大革命”和“俄罗斯革命”，并指出，中国革命后，就是要建立法国那样的民主立宪政体。

十月革命爆发后，中国大地有一批知识分子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时他们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相比较，从而加深对俄国十月革命重要意义的认识。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通过法、俄革命相同点的分析，肯定了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同时，又指出了法俄革命的本质差异，从而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是更进一步的社会主义革命。

李大钊对法国革命的认识反映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革命的态度。

[巴黎公社对中国的影响]巴黎公社发生之时，中法已有官方来往，因此较之法国大革命，中国人更为直接和更为迅速地了解了公社的情况。公社存在时间虽短，但对中国影响却很大，尤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它成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光辉榜样。

巴黎公社革命爆发前后，正巧清政府为天津教案派使臣崇厚去法赔礼道歉。崇厚一行耳闻目睹了巴黎公社的一些情况，使团随员张德彝将使法见闻写成《三述奇》一书，全书共十四万言，其中有关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的记载约万余言。书中记录了3月18日起义过程，以及以后他在波尔多和凡尔赛的所见所闻，尽管他对巴黎公社持否定态度，但对公社参加者却流露同情与钦佩。

当时一般中国人对巴黎公社的了解主要通过报刊报道和史学家的某些评述。在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中国教会新报》以“布法战争”、“法国近事”、“法国民变”、“法京近事”等专题，对事件的发展进行连续性报道和评论。在这些报道中，巴黎公社被歪曲为“匪乱”和“巨劫”，诬蔑公社战士为“乱党”和“贼兵”。受这些报道的影响，史学家王韬在《法国志略》和《普法战记》两书中，对巴黎公社的历史也作了是非颠倒的描绘。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中国统治阶级对巴黎公社的态度和立场。

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兴起。一些报刊登文，表现出同情巴黎公社的倾向。1907年，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创办了《新世纪》，创刊号发表题为《新世纪之革命》一文，其中评价了巴黎公社，称之为“公民之革命”，提到“虽其事未成，然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纪念。”但该文用无政府观点歪曲了巴黎公社的性质，认为公社最重要的革命措施之一是“扫除政府”。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把巴黎公社作为他们革命的先导。1923年，李大钊写了《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一文，是中国第一篇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宣传巴黎公社的文章，它对公社的起源、发展、性质、措施、经验等方面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和分析，文中引用的史料，许多是首次在

中国发表的。说明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和正确。

此后，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进行了有组织的宣传纪念活动，并且自觉地借鉴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为中国革命服务。

1926年3月18日巴黎公社革命55周年之际，革命中心广州的一些革命团体发起纪念活动，他们发布纪念巴黎公社宣传大纲，召开纪念大会，宣传巴黎公社历史经验，并且紧密结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号召工人阶级担负起改造社会的历史责任，这是我国人民首次大规模纪念巴黎公社的革命活动。1927年1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这次纪念活动的影响的。

就在广州举行纪念巴黎公社大会的当天（1926年3月18日），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发生了段祺瑞政府枪杀爱国学生的大惨案。从此，中国人民纪念“三·一八”往往把两个“三·一八”结合起来，在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如此。

在井冈山根据地，3月18日被定为节日，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巴黎公社的崇敬心情。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苦大众眼中，巴黎公社是革命的象征，是工农当家作主的榜样，是反对民族投降的旗帜。它的精神鼓舞中国人民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辛亥革命后的中法关系

[中法外交概述]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建立了民国政府。但由于袁世凯的篡权，革命失败，中国依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民国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的几十年间，虽有武汉国民政府收归九江、汉口英租界的壮举，但其余历届政府，在外交上基本上继承了晚清的衣钵，实行媚外政策。

法国在辛亥革命后，依然保留了它在华已获得的权益，而且在对华外交上，把维护和扩大这些权益作为基本出发点。如果现政府愿意维护它在华权益，它就和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而一旦危及它的利益，它就会以武力相威胁。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更是直接实行镇压，1925年，法国参与了“五卅”运动的镇压，和英国一起制造了沙基惨案；1927年当北伐军攻克南京后，又和英美一起，出动兵舰，炮轰南京城，制造了南京惨案。因此，法国和中国的外交关系依然是不平等的。在此期间，中法政府没有出现重大争执，中法外交的相安无事是建立在这种不平等基础之上。

[法国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法国政府对辛亥革命从保住在华既得利益出发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在公开场合支持清政府镇压革命党。1909年1月4日法国曾和清廷订立中法《中越交界禁匪章程》，协议共同镇压革命党。另一方面，法国看到清朝朝不保夕的颓势，所以在革命党不损害它在华利益的前提下，又暗中支持革命党。法国武官曾秉承法国陆军部长的旨意，派遣武官七人，密助革命党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绕道欧洲游说后回国，在法国受到朝野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自己写道：“过巴黎，曾往见朝野之士，皆极表同情于我，而尤以现任首相格利门梳（即克雷孟梭——编者注）为最恳挚。”

辛亥革命后，在公开场合，法国保持中立。在外国领事团会议上，法国首先提议对中国革命不加干涉，后为其他各国所接受。但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一样对民国政府迟迟不予承认。在南北政府对峙时，它们虽然都不承认双方政府，但实际上却和袁世凯的北方政府进行外交接触，支持袁世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逊位，北京统一政府成立，北京政府于4月3日令驻法使节向法国政府请求承认，而法国则要求中国接受由日本提出的、为各国列强所赞同的条件为承认的先决条件，这项条件的内容是要求中国新政府对外债和外国人在华利益，无论是否有条约根据，均应给予保障。所以法国对中国新政府的承认一直拖到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后。

[金法郎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郎贬值，这就影响到债务问题。民国政府从来没有废除过不平等条约，因此《辛丑条约》确定的庚子赔款还要如数付给法国。法国为了使赔款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曲解条约上“金法郎”一词，要求中国按金质法郎，而不是金本位法郎支付赔款。在法国公使的一直催促下，1922年12月28日，当时的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公使，驳回了法国政府关于金法郎的要求。法国立即提出抗议，并扣住中国海关的关余不交还中国。1923年初，黄郛接任外交总长。他就任后第一个官方行动是照会法国公使，接受了法国金法郎的要求。消息传出，国会上下，群情激奋，在国会的抨击下，黄郛随即辞职。在段祺瑞任中华民国执政、李思浩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后，李思浩以段祺瑞的名义，基本上接受了法国的要求，放弃了中国的合法权利。金法郎案解决后，法国公使才将所扣留1000多万元的关余交还中国国库。

[中法新约]南京国民政府是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建立起来的，但它为了制造国家独立自主形象以欺骗人民，举起孙中山“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旗号，屡次发表宣言：对于不平等条约“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当之手续，概予除废。”但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没有采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正当手续，而只是在 1928 年 6 月间发起“改订新约运动”。改订新约局限于两项内容，一是恢复关税自主，二是取消领事裁判权。废除领事裁判权由于帝国主义的联合抵制，中国政府的软弱而没有实现。关税自主则在形式上得以确认，但由于各国都获得最惠国待遇，而对英国货物最高税率则限于 5%~30%所以实际上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依然得到保留。

中国和法国终于改订了两项新约。一是中法关税条约。在其他各国与中国关税条约相继订立后，法国也于 1928 年 12 月 22 日在北京签订了中法关税条约。条约含三项条款，主要内容是取消以前中法两国签订条约中所确定的各种税率，双方享有最惠国待遇。

二是中法关于越南条约。1928 年中法关于越南的天津条约期满，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法国废止条约。法国驻华公使和国民政府从 1929 年 1 月 20 日起开始谈判订立新约。中方提出的要求是收回滇越铁路；保存华侨历史上之既得权利；中国在西贡、海防、河内设领；废止施诸华侨之非人道待遇。以后中国不再提起滇越铁路问题。法方要求在云南府设领，法国人自由杂居。由于中国领事裁判权未撤，在云南府设领，必使中国主权受到损害，所以中方不允。双方经多次交涉谈判，磨难颇多，最后于 1930 年达成协议。但在讨论附件时，法国要求中国完全取消大米进口税和进口限额，谈判又陷僵局。该条约在 1935 年生效。

[法国对中国抗日的态度]法国对中日冲突的态度基本上唯英美马首是瞻。出于当时的绥靖主义思潮，法国唯恐得罪日本，在公开场合总是纵容、偏袒日方。但为了维护它在华的利益不因日本的侵略而受损害，同时法国的民主传统也使法国大部分人支持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所以它对中国的抗日又有一些支持的表示。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法国明显袒护日本。1932 年英法操纵的国联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事后草就了歪曲事实，偏袒日本的《国联调查报告书》，其中第 9，第 10 两章更是提出国际共管东北的荒谬主张。在国联 1932 年 12 月举行的全体大会上，法国代表保罗·彭古强调日本侵略东北行动的特殊环境和问题的复杂性，指出需要现实主义和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并力主讨论报告书的第 9 章和第 10 章，作为谈判解决的纲领。

“七·七”事变以后，当中国要求法国支持时，法国总是以主张美、英、法集体行动来搪塞。但在行动上还是给予中国一定的支持。1937 年 8 月，法国以款项不用于军事目的为条件，贷款 2 亿法郎给中国，并且同意向中国出售飞机。在 1940 年以前，法国是各国中借款给中国最多的国家之一（仅次于苏联）。法国还允许法国飞行员赴华参加抗日战争，在法国政府支持下，中国当时招募了几十名法国飞行员。当日本侵略步步深入，中国沿海港口逐一失陷时，中国向法国提出开放中越边境，允许中国从国外筹集到的物资经印度支那入境，法国在此问题上显得谨慎，一方面表示默许，但当日本提出抗议时，就干涉中国军用物资过境。1940 年希特勒德国入侵法国，第三共和国灭亡，维希政府成了德国的附庸，1943 年 8 月，中法正式断交。

四、近代中法民间交往

[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支持]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长期受奴役的处境始终表示同情，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给予支持。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英侵略者洗劫焚毁了圆明园。这种野蛮无耻的行径同样遭到法国进步人士的愤怒谴责。法国文学家雨果在圆明园罹劫第二年给联军的一位军官写了一封抗议信，信中写道：“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就大规模遭了蹂躏。

……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提出抗议（所以我感谢你给我抗议的机会），为什么要抗议呢？因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

雨果在控诉英、法统治者的强盗行径的同时，又倾吐出中法人民之间的友好感情，证明每一个正直的法国人是十分珍惜中法人民之间的友谊的。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的革命党于1907年在镇南发动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有一位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狄氏跟随孙中山到达起义现场，并负责指挥起义炮兵作战。起义发生后，在越南的法文报纸对此作了客观报道，而且据报上所载，当地法国官兵对革命党人是怀有同情感的。如12月6日法文东京独立新闻载：“该处居民曾目击驻同登法国军务官兼义勇团司令陶菲于2日率马队视察镇南关时，革命党对之行礼致敬，当革命党首领在同登休息及进食之际，各人皆与法国武官交换名刺，极为亲善……”。

在抗日战争期间，法国人民一贯支持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当时任驻法大使的顾维钧曾说：法国“普通老百姓都倾向中国一边，认为日本是侵略者。”他还举例，大使馆收到许多法国素不相识的老百姓的来信以及捐赠。有一位法国姑娘将她男朋友给她的订婚戒指送到中国大使馆，她说自己是个穷姑娘，但由于十分同情中国，想把这个戒指捐赠给中国。这些例子清楚地反映了当时法国人民支持中国抗战的普遍感情。

[华工在法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法经商做工的华人数不多。1878年2月谢大铭随曾纪泽抵法，后侨居法国。以贩卖古玩为业。1900年巴黎举办大型博览会，他回上海带10多位中国年轻人到法，在博览会开办茶馆。博览会结束后，这些充当仆役的青年大多回国，唯有一名广东人和一名浙江湖州人留法。1903年驻法公使孙宝琦抵法，随同中有张静江、李石曾等。他俩后留住法国。张静江先在马德莱娜大教堂前设古玩商店，后又意大利林荫大道开茶馆。张静江的夫人姚蕙女士还办了《世界杂志》。李石曾在法主要是求学，学农业和生物，并创办宣传革新的《新世纪》杂志，但他也从事实业，在巴黎近郊哥伦布村创设了豆腐公司，有30多名中国工人在此做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等参战国劳力匮乏，企望从中国招募劳工赴欧。1916年初，法国派遣武官陶履德来华，和北洋政府商议招工之事。几经磋商以后，北洋政府和法国于1916年5月14日正式签订招工合同，并由买办官僚梁士诒组织惠民公司，办理招工不久，英国也来华招工。法英所招华工，多数赴法国，由此形成了中国向法国移民的高潮。

法国和英国招往法国的华工总数为 146,925 人。大多来自直隶、山东、江苏。法国雇佣的华工，在法国沿海、内地和前线都能见到他们的踪迹。英国所招华工主要分布在英国远征军所驻地区，其中包括后勤地区（从勒阿弗尔到敦刻尔克的各个海口）和作战地区（从甘勃莱到易卜列之间的所有战场），他们从事的劳动都和军事有关。有一技之长的，如以前做过铁匠、木匠、油漆匠、机械匠等，被派往兵工厂、机械厂、坦克厂、飞机厂等作工。没有什么技术的，分配去做搬运军用物资、修路、挖战壕等重活。这些华工努力工作，为法国作出了积极贡献。对此，1918 年北洋政府华侨工事局在调查报告中作出了明确的肯定，认为华工在法“名誉颇佳，成绩可睹。”

然而，华工在法的境遇却并不佳。他们在法国是受军事管制的，由法国陆军部殖民地军队局和驻法英军司令部管辖，华工组成为军事性连队，为英军服务的华工甚至和部队一样，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约束。华工每天工作 10 个小时以上，住木屋和帐篷。工资、伙食费、衣服也常遭工厂主的克扣。许多人死于战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华工常常奋起抗争，用罢工、暴动、抵制等手段反对压迫。从 1916~1918 年有案可稽的华工斗争就有 31 起之多。

华工在法虽然行动极不自由，生活状况悲惨，但和当地的一般法国人却相处融洽。即使管理华工的法国人，也有同情华工的。据《时事新报》1920 年 12 月 26 日介绍，在敦刻尔克的华工“与此地法国人没有甚么恶感，名誉也还好。并且他们有一个总办（法国人），待他们极好，凡华工与法国人有甚么交涉发生，他总说公道话，还帮他们抱不平。”有人对南方小镇坎布德那克华工的调查中，也看到那里的翻译和医生对华工不错，“日与华工嘻笑，无欺虐处。”当时在法国，有许多华工和法国女子通婚，生儿育女。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合同期满的华工陆续回国，也有许多华工继续留法。要获得工作自由的华工需先交法国陆军部 1000 法郎的赎金，取消合同，再由领事交保。一些没有积蓄的华工则纷纷私自逃离工队，隐踪匿迹，流落各地。据 1928 年有人统计，留法的华工有 2100 多人。1929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失业，有一部分华工回国。一些华工在 1936 年前往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投入反法西斯战斗，二次大战期间，有些华工流散荷兰和法属马达加斯加等地谋生。

[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 1919 至 1920 年间，出现了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形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早在清朝末年，留学国外，渐成“热门”。但出国留学生活费用昂贵，只有少数官费生和富家子弟能享受留学机会。要扩大留学范围就必须提倡俭学，为推动中国学生留学，曾经留学法国的一些人士，如李石曾、吴稚晖、汪精卫、张继、张静江、褚民谊、齐竺山等人于 1912 年 2 月在北京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其时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先生对这项事业也给予积极支持。著名革命活动家吴玉章等人还在四川发起成立留法俭学会。留法学会建立后，又设立留法预备学校。留法俭学会从成立到 1913 年 6 月，先后组织两批共 80 人赴法留学，准备留学者 40 人。1913 年秋，袁世凯上台后，对革命进行镇压，革命派蔡元培、吴玉章等被迫流亡国外，留法俭学会随即停止活动。

李石曾在巴黎近郊开办豆腐作坊，一次大战前去作坊工作的华工已达 30 多人。这些华工读书不多，又不通法文，缺乏工艺知识，因此极需教育。李石曾提出在华工中实行“以工兼学”的方法，日间作工，晚上授课，或从事数年工作后，有了积蓄，再脱产学习。当时在法国地浹泊的人造丝厂，有 48

名华工，也试行了“以工兼学”的方法，此法受到华工们的欢迎，于是1915年6月华工李广安、张秀波、齐云卿等人在李石曾、蔡元培、吴玉章等人的支持下，“按实定名”，建立勤工俭学会，提出了“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宗旨，把工作和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

1916年华法教育会成立，对赴法勤工俭学起了推动作用。随着中法文化教育交流的日益密切，中法两国热衷于促进中法关系发展的人士经过酝酿，在1916年6月22日在巴黎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华法教育会的会长是法人欧乐教授（今译奥拉尔，法国革命史专家）和蔡元培。华法教育会是促进中法两国在文化教育以及经济诸方面全面交流的民间团体。根据会纲，它的宗旨在于“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华法教育会成立后最突出的作用就是组织华工教育，以及推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它于1916年4月在巴黎创办了第一所华工学校，并着手在中国国内动员青年学生来法。鉴于华工勤工俭学收到良好的效果，蔡元培等人提出借用华工“以工兼学”，代之以青年学生来法作工，工余时间，用工资收入，作留学费用。

1916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年底，蔡元培、吴玉章等由巴黎返回北京。1917年在北京正式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并在北京、保定等地设立了三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全国很快有大批青年学生申请赴法。这时毛泽东、蔡和森在湖南，吴玉章在四川进行了大量宣传组织工作，使这两个省成为赴法留学人数最多的省份。1919年3月17日，由华法教育会和勤工俭学会组织的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离沪赴法。到1920年底止，共有留法学生1600多名。这些留法勤工俭学生在法国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一些人学到了欧洲的先进科学和民主精神；更有一些人进一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和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物，其中有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陈延年、邓小平、李立三、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蔡畅、向警予、李维汉等。

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遭到波折，法国战后出现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失业增加。中国勤工俭学生就业困难，生计难于维持，而这时由李石曾、李圣章等人把持的华法教育会竟于1921年1月16日宣布脱离和勤工俭学生的经济关系。这对留法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于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奋起斗争，2月28日，他们去中国驻法使馆，请愿示威。法国政府迫于社会舆论压力，成立“少年监护委员会”，向法国和中国各界人士募集捐款，维持经济困难的留法学生的生活。1921年6月，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用于扩大内战，留法勤工俭学生在6月和8月两次召开大会，表示抗议。于是法国政府在9月停发留法学生的维持费。在困境中，留法学生在9月占领了华法教育会以勤工俭学名义而筹款建造的里昂中法大学，遭到法国政府镇压，许多学生遭监禁，随后被押送回国，其中有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人。

[法国前总理班乐卫一行访华]1920年，法国前总理班乐卫来华接受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班乐卫此次来访，属于民间学术交流，因此引起我国学术界的重视。《东方杂志》载专文指出：“吾人欢迎班氏，并非欢迎前任总理之班氏，乃欢迎大数学家之班氏。北大创授与博士之例，实足以代表吾全体学界倾向学问之热忱。”

班乐卫一行五人，他的随员有法国文学家博纳尔，巴黎大学经济教授马

丹、铁路工程师纳达尔以及班乐卫的同行、数学博士鲍瑞尔。他们在6月22日抵达北京，8月31日，北京大学举行授与班乐卫名誉科学博士的典礼，北大校长蔡元培致开幕词。班乐卫致答词，他表示“希望中法两国学术界建立和扩大联系”。还答应回国后寄三篇科学论文给中国，一篇关于科学和哲学的一般原理，一篇关于天文学，一篇关于航空学。

班乐卫一行还受到当时中国总统府、交通部、议会的接待，并访问了天津、上海。在上海他参观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厂，参观后表示，希望法国能对该厂的事业有所贡献，并提议商务印书馆今后也可多编辑一些法文书籍。班乐卫一行9月11日由上海返法。班乐卫的访华对促进中法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三节 中法关系的新阶段

一、中法关系一度冷漠

[新中国初期法国的反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法国政府拒不承认新中国的建立，中法关系一度恶化。当时，影响中法关系改善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屈服于美国的压力。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伤元气，它的胜利曾经依靠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后，法国在经济上又依赖美国的支援，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得法国只听从美国的指挥。在外交上，也唯美国马首是瞻，追随美国实行反共反华政策。

第二，侵越反华。法国正在加紧侵略印度支那，直接威胁我国南部边陲。自1949年底起，法国侵越陆空部队不断侵扰我国边境，扫射轰炸中国军民，造成我国人员伤亡。

第三，实行亲蒋介石政策。用物资支援中越边境的国民党武装，收容逃入越南境内的残匪部队，并把他们送交蒋介石。在朝鲜战场，派出一营兵力帮助美国进行侵略战争。在联合国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中法人民的友情]与法国政府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相反，法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却怀着深厚的感情同情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新中国建立不久，1950年1月12日，法国总工会机关报《工人生活》就在巴黎举办了中法联谊晚会，赞扬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胜利地获得了民主和民族独立。会后还放映了中国纪录片《民主东北》。

1951年11月，法国国民议会议员皮佑、邦特、加香、戈特、德香布兰代表法国共产党和进步共和联盟的议会党团向国民议会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法国政府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外，他们还提出另一项议案，要求法国政府由法国驻联合国代表提出接纳人民中国加入联合国组织的要求。

1952年5月15日，法国友好人士发起成立了民间团体法中友好协会。成立大会由法兰西银行名誉董事拉贝里耶主持，参加大会的有法国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各工会代表100多人。法中友好协会的宗旨是：加强并且发展法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间的友好关系。成立大会选举德莱希教授为主席，并且打电报向毛主席致敬。1954年9月，法中友好协会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我国。

1952年4月，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一些代表到中国参观访问，其中有法国总工会书记勒布朗。紧接着，为了参加中国纪念世界四大名人（阿维森纳、达·芬奇、雨果、果戈里）活动，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和作家、诗人鲁瓦夫妇经布拉格于4月28日抵达北京。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来华访问的法国知名人士。法奇等在华访问期间，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法奇兴奋地说：“我对中国人民怀有一种深深信任的感情。中国人民已实现了全国的大团结……我深深体会到你们新民主主义政治的优越性。”

1952年9月29日，法国青年代表团来访，这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法国团体。青年代表团由法国共和青年联盟、法国女青年联盟、英勇少年联盟、运动与体育劳动联合会、巴黎区建筑工会联合会等组织的代表组成，团长是

法国共和青年联盟全国委员会书记芬贝·谢尔培。

1952年3月2日，巴黎文艺复兴图书馆举办了为期两周的“新中国展览会”，展出了中国的珍贵文献、艺术品、儿童图书、书籍、标语画、邮票、照片以及两年来访问过人民中国的法国进步记者和作家的著作。

上面这些活动都充分表明了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曾经担任过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的法国人让·莫里斯·埃尔曼，在1957年的文章中，高度赞扬了中法人民的友好情谊，他说：“在我国，没有人对中国有仇恨心。中国人到了法国，同不同职业、地位的法国人，甚至同与进步思想毫不相干的人相遇，都可以发现这一点。”“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是个事实。……这朵友谊的花是任何地方吹来的狂风也阻止不了它向着和平的阳光开得更绚烂的。”

[向中国靠近]在法国人民的推动下，再加上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使法国政府不能再无视新中国的客观存在。所以，从5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政府逐渐向新中国靠近。

最初的接触从贸易始。1952年8月9日，经两国政府批准，中国进出口公司代表和法国代表杜孟在柏林签订了第一个中法易货合同。中国将向法国输出丝、茶、肠衣、蛋品和桐油等，法国则向中国输出铁、钢、金属、化学品、医药品等，总贸易额为100万英镑。1953年5月，法国工商业贸易代表团到北京和中国商谈扩大贸易事宜，并在同年6月5日和中国进出口公司签订了《关于易货贸易的协定》，协定为期近一年，根据协定，在协定有效期内，双方努力争取达到各出口金额1000万英镑。贸易额大大增加了。

从1954年下半年起，中法各方面交往日趋频繁，民间交往也更为密切。出现这种明显的变化，是与当时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分不开的。因为1954年法国在越南奠边府战役中失败后，被迫停止了侵越战争，使中法关系少了一个障碍；同年，英国在西方大国中率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对法国不无触动。

1954年12月3日至12日，我国妇女代表团应以布吕纳·德拉马尔夫人为首的法国接待委员会的邀请，对法国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这是新中国第一个访法的代表团。在法期间，她们受到法国各阶层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法国从1955年起，和中国有了最初的政治接触。1955年7月26日，法国外长比内在参议院谈及和中国建交问题，这是政府官员首次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一问题。比内说：法国政府“研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已有很长时间，事实上已有好几年了。”但同时比内又表示：“在目前的现实情况下，法国政府不打算匆忙改变政治现状”。

1955年9月21日，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法国4名参议员埃德蒙·密歇勒、利奥·阿蒙、雷纳·昂雅贝尔、贝尔纳·萧雪瓦到中国访问，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陈叔通先后会见法国参议员，这是我国领导人首次会见法国政界人士。

在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中法双方也得到进一步发展。1955年4月，中国首次参加由法国举办的里昂国际博览会，中国馆展出10天中吸引观众达87万多人。1956年5月，我国又首次参加巴黎博览会，法国科蒂总统参观了中国馆。观众也达80万之多。展览会期间，一些法国工商业界和银行界的头面人物和中国展览团进行接触，或从事贸易商谈。巴黎各大报纸对中国馆

都给予好评。

文化上，1955年10月，应中国对外协会的邀请法国著名作家萨特等到中国访问，受到陈毅副总理的接见。萨特先后访问了抚顺和北京，在45天里，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惊人变化，写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赞扬了中国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建设景象。1956年10月，中国首次举办法国电影周，这也是我国举办的第一次西方国家的电影周，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放映了法国故事片《勇士的奇遇》（原名《马兰花·方方》）、《没有留下地址》和《禁止的游戏》。1957年8月，中法还合作拍摄了儿童故事片《风筝》。

中法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加强为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二、中法两国正式建交

[中法建交的前奏]当中法在经济和文化的关系上逐渐取得进展时，一些有远见的法国国务活动家开始致力于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他们的活动构成了中法建交的前奏曲。

1957年5月，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邀请，访问中国。富尔对发展中法关系一直持开放态度，他在1955年任总理期间，就批准了法新社和新华社向中国和法国互派记者的协议，并在1956年1月接见来访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富尔是中国接待的第一位法国国务活动家。这次他虽以私人身份出访，但引起世人瞩目。

1957年5月22日，富尔途经香港到达北京，在香港，他就对记者表示，他主张法国承认中国，到达北京后，他又在各种场合表明自己希望中法建立外交关系的主张。在华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这是毛主席首次接见法国客人。毛主席在谈到中法关系时，还引用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典故，阐明了中法关系的利害。

正是在这次访问中，富尔读了毛主席诗词的俄语译文。回国后，他写了一本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借用毛主席诗词中“龟蛇锁大江”、“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等诗句的含义，书名取为《蛇山与龟山》，他希望在中法之间就象在蛇山与龟山之间一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1958年戴高乐将军再次上台执政，他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逐渐摆脱美国的控制，在外交上奉行独立自主政策，为中法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1961年，戴高乐总统召见富尔，对他说，法国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这种情况是“不正常的”，他建议先发展经济与文化关系。当时，法国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尚未结束，而中国坚定地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所以当时建交还不具备客观基础。

1963年，法国十分关心印度支那中立化的问题，而且认识到离开中国不能解决亚洲问题，这时，戴高乐再次召见富尔，告诉他：“法中建交由你去谈。”当时双方没有外交关系，戴高乐不能把富尔的“委托书”直接送给中国政府，于是想了个办法，由他本人给富尔发一公函，委任富尔为他的“个人代表”前往中国密谈。对外，则称富尔以私人身份访华。

1963年10月18日富尔离法，途经柬埔寨、香港，21日到达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富尔主要和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进行了会谈，至于会谈的前景，富尔事后回忆说，存在两种抉择：“第一是全面恢复关系；第二，考虑到台湾问题的障碍，两国之间先发展实质性的经济文化关系。”当时富尔十分了解戴高乐愿意和中国建交的迫切心情，关于台湾问题，可以采取回避态度，而一旦法国向北京派驻大使，那么根据国际法，就意味着中断了和台湾的正式关系。因此富尔选择了第一种前途，当他把报告发回巴黎后，得到了戴高乐的批准，有关原则问题的协议很快达成，从而迈出了中法建交的第一步。富尔回国之前，刘少奇主席和毛泽东主席还先后会见了。

[中法外交关系的建立]1963年12月和1964年1月，中法互派代表在伯尔尼举行了四轮会谈，拟定公告文件。中方代表是当时距伯尔尼最近的一位大使李晴川，法方代表是由法国外长古夫·德姆维尔委派的雅克·德·博马舍。会谈决定在巴黎和北京同时发表同一内容的建交公报。

上述会谈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当时世人尽管感到中法建交势

在必行，但普遍认为不会很快实现。

然而，在1月8日，富尔却放出了第一个试探性的气球。晚上，他会见了法新社记者和《费加罗报》记者，发表了主张中法建交的谈话，他说，应该“立即”恢复外交关系。这次谈话的文字是事先精心拟定，并经戴高乐亲自审定，目的是为中法建交作舆论准备。

1月27日，中国和法国同时发表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决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国家。

1月31日，戴高乐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谈到中法建交问题时，他解释了法国采取这一重大步骤的动机和原因，这主要是面对现实，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共产党政府已在中国执政了15年，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要解决世界上的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中国；此外，建交也是中法贸易、科技文化交流合作的需要。戴高乐说：“法国同这个国度，同这个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只是如实地承认世界而已。然而在世界上的实际的巨大演变之下，一国人民同另一国人民增进直接接触也有助于人类的事业，即明智、进步与和平的事业。”

为圆满解决台湾问题，在中法建交后的第二天，根据事先商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单方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 and 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法国方面自然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它希望台湾按国际法惯例，自动脱离和法国的关系。2月10日，台湾宣布和法国断交，从而使此一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5、6月，中法双方互派大使，法国第一任大使是佩耶，中国第一任大使是黄镇。

中法建交是中法关系史上的大事，它标志中法关系发展到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新阶段。它有利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有利于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

[中法关系的发展]中法建交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得到顺利而稳步的发展，即使在“十年浩劫”中也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

中法建交后不久，法国就出现了一股“中国热”。1964年2月，我国一个艺术团在法国访问演出京剧，受到观众和报纸的热烈欢迎。在巴黎首次演出时，观众的掌声持续了5分钟之久。《法兰西晚报》称赞京剧溶舞蹈、杂技、话剧、诗、歌、音乐、艺术于一炉，真是“奇妙无比”。法国电视台专门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情况，店铺里的荔枝和竹笋销售一空，有些旅行社着手组织法国旅客去中国渡假，多维尔地方还宣布要度一次中国式的周末。

接着，中法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方面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65年7、8月间，法国国务部长马尔罗访华，他是中法建交后第一位正式来访的法国政府部长。受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

在经济联系和技术合作方面，两国频频举办工业展览会。1964年9月，首届法国技术展览会在北京开幕。1965年3月和5月，中国先后参加法国里昂博览会和巴黎博览会，1965年11月法国又在华举办法国工业展览会。

1966年6月，中法航空协定在巴黎签字。根据协定开通了中法之间的航

线。

此后，两国间的友好往来逐渐增多，关系日益发展。随着中法关系的发展，中法官访问规格越来越高。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应董必武代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邀请，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在中国受到热烈欢迎。这次访问是法国国家元首对中国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标志中法关系发展到新的阶段。蓬皮杜在华期间，和毛泽东主席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谈话，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就主要国际问题和中法关系交换了意见。这次访问取得了积极成果，9月17日，蓬皮杜离华回国之际，发表了《中法公报》，《中法公报》表明双方在许多主要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一致看法，也表达了两国政府加强两国人民之间友谊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共同愿望。《中法公报》反映了这次访问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的成果，《公报》写道：“双方商定，将进一步研究发展经济关系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在技术、工业方面特别是在发达的石油化工、航空、机械和电气工业方面加强交流的问题。”“双方还决定签订海运协定和加强在航空运输方面的合作。”

1975年5月，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对法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也受到法国方面的热情接待。这是我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问西方国家。

在这个阶段，科技文化交流也在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科技代表团、艺术团体、科技界文化界名人互访。1974年11月5日，北京到巴黎的空中航线正式开航。

然而，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中法关系还没有进入黄金时期，正如蓬皮杜在访华的答谢宴会上所说：“我们的贸易关系虽然已很活跃，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业已富有成果，但只不过是处于开始阶段；……”中法关系新阶段的到来，取决于中国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

三、中法友好的新篇章

[政治交往频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被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中国重视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对话和经济文化交流，因此中法关系也发展到新的阶段。

新阶段的表现之一，就是以政治领导人互访为标志的政治对话加强了。这个时期两国部长级的互访更为频繁，两国军队高级领导人也进行了互访。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家领导人的频繁接触，所有法国新任总统都访问过中国，中国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到过法国。

1979年10月，中国总理访问法国，作为西欧之行的第一站，这是中国总理第一次访问法国和西欧。中国总理在访问期间参加了法国政府举行的周恩来旧居挂牌仪式，并为纪念牌揭幕。中法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两国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关于中法经济关系的发展》、《关于互设领事机构》和《关于1980年至1981年文化交流计划》。

1980年10月15—21日，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来华访问。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邓颖超等和德斯坦总统进行了交谈和会谈，会谈商定今后就重大的国际问题随时进行部长级磋商，定期交换意见。中法政府还签订了关于设立领事机构的协议，双方同意在上海和马赛互设总领事馆，德斯坦总统还访问了拉萨和上海，并在上海复旦大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

1983年5月3日至7日，法国总统密特朗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密特朗曾于1961年以私人身份来中国，1981年又代表法国社会党访华，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次访问时间虽短，但是效率高。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等会见了密特朗，并与他举行会谈，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观点是一致的和近似的。双方还表示了加强中法间合作的强烈愿望。密特朗此行还访问了西安、南京和上海，并在南京大学作了演讲。

1984年5月30日—6月3日，中国总理访法，和密特朗总统举行了会谈，并在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取得了广泛的一致意见，并共同探讨了在经济贸易方面加强双方合作的途径，两国政府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1986年6月16—19日，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访问法国，胡耀邦和密特朗总统、希拉克总理举行了会谈。双方表明了进一步推行友好政策的共同愿望，为中法关系展现了广阔发展的前景。

1987年11月，李先念主席、乔石副总理出访法国，这是我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法国。访问期间，李主席同密特朗总统和希拉克总理先后举行了亲切会谈，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看法，增进了友谊。

[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协作]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后，中法关系最显著的发展表现在经济交流和技术合作上。

1978年10月，当时负责全国科技工作的方毅副总理访问法国，中法政府签订了关于科学技术交流补充项目议定书，中国科学院和法国全国科研中心也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1978年12月，中法签署发展经济关系和合作长期协定。这是中国和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长期经济交流协定。根据协定，7年内，双方贸易总额累计将达600亿法郎。协定指出，两国政府将采取一切有益的措施，为加强两国经济关系和合作创造最好的条件，以促进双方交流迅速增长。协定规定，

两国将在农业、畜牧业、能源、采矿、钢铁，航空、空间技术、机械制造等领域进行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此后，双方贸易代表团互访以及经济界人士的接触日益频繁，仅 1982 年，我国赴法访问的经济贸易团组就有 400 多个，达 2000 多人次，其中部长级代表团 6 个。而且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接触也都涉及经济关系问题，这种交往为活跃两国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创造了良好气氛。

在此时期，双方的贸易总额大幅度增加。60 年代，中法贸易总额平均每年为 1.1 亿美元，70 年代增长到平均 3.7 亿多美元，进入 80 年代后急剧增长，1981 年达 6.8 亿美元，是建交初期的 7 倍。1984 年到 1985 年间，贸易额又增长了 40%。我国从法国进口的商品，有机械、钢材、铝、镍、化肥、农药、精密机床、仪器、电机、汽车、机车、船舶、直升飞机、化纤纺织原料、奶油、小麦、手表、成套设备以及技术专利等。另外，有时还通过法商从美国、巴西进口一定数量的小麦、玉米、大豆、豆油、食糖等。我国对法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农副土畜产品、工艺品、轻工产品、纺织品等。

在科技合作上，双方科学家经常举行中法双边的科技讨论会，或进行联合考察活动。如 1984 年，中法科学家共同考察喜马拉雅山；1986 年，中法举行了卫星遥感及斯波特卫星数据应用讨论会、中法能源合理利用研讨会等。中法技术合作形式还包括：引进技术设备、合作生产、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合作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到 1986 年，中法两国已在或正着手在机械制造、化工、电力、石油开采、煤炭开采、飞机制造、交通运输、水泥、电讯、核电站、空间技术、农副产品加工以及烹调技术等方面开展合作，如法国和中国合作建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法国在中国制造海豚式直升飞机，中法合作在北部湾和渤海近海勘探石油等。另外，在劳务合作上，中法也在中东一些国家和地区合作承包了一些工程建筑项目。中法经济技术关系硕果累累。

[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中国对外开放也促进了中法文化关系和民间交往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交流更为频繁，领域更为广阔，规模更为扩大。

1980 年，中法两国政府成立了文化混合委员会，协商两国文化交流事宜，1983 年 9 月，签订了中法文化交流计划。几年来，在文化艺术上，交流涉及文学、戏剧、音乐、影视、绘画、摄影等方面，我国新译和重版了许多法国古典和现代的文学名著，中国的一些当代小说也翻译成法文；在戏剧上，除了互派剧团访问外，中法双方还合作演出一些剧目，由法国专家指导，中国剧团演出的剧目有歌剧《卡门》、古典芭蕾舞剧《希尔维亚》、话剧《三剑客》等，中法演员同台演出的还有《堂·吉珂德》。在影视方面，双方也互相举办电影周，法国还专门举办了谢晋电影回顾展。1984 年适逢中法建交二十周年，法国举行了许多庆祝活动，其中举办了“中国电视周”，电视周活动期间，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的大、小放映厅同时播放总共约 40 小时的中国电视节目，其中有电视片《鲁迅》、《新岸》、《武松打虎》等。同年 10 月，北京也举办了法国电视周。

在绘画上，双方互相举办画展，最注目的一次是 1982 年在北京举办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和凡尔赛博物馆珍藏的 250 年间原画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举办的最大的外国美术展览，使中国观众大开眼界。

在教育方面，交流和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如互派留学生，建立校际联系和合作，协助举办电视语言教育等形式。我国派往法国的留学生增长幅度极

大。1984年，24所中国高等院校同法国37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校际联系。法国还和武汉大学合作建立了法国语言文学系和中法教学班，这是中法合作教育的新形式。1984年10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举办法语教育节目《法语入门》，推广法语的教育。

除此之外，中法两国在学术领域、医疗卫生、体育等方面也有良好的合作和交流。

中法两国的民间交往日益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鲜事。1985年7月，法国430多名青少年，乘坐“巴黎—北京”的专列，穿越欧亚大陆，来中国访问。在北京，他们受到了热烈欢迎，中国青年举行了欢迎招待会，法国青年和中国青年举行了十天联欢活动，增进了中法青年的友谊。

1984年12月，天津大邱庄农民马德良夫妇访问法国，他们是第一个中国农民赴法的“友好使者”。马德良在法国期间，参观了诺曼底农村，接受了法国农业部长罗卡尔授予他的“法国农业勋章。”法国电视台在圣诞节前夕的黄金时间，还连续播送了关于马德良夫妇的新闻短片，使法国人民了解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着的历史变化。

1988年11月28日，在巴黎里昂车站附近，由法国退伍军人协会和旅法“华裔融入法国促进会”提议，法国政府为一次大战期间赴法华工树立了一块纪念铜牌，法国邮电和航天部长保罗·吉莱斯代表密特朗总统向两位健在的老华工授予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并为纪念铜牌揭幕。纪念牌上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盟军抗战工作，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其中3000人从此定居法国，并在巴黎里昂车站附近形成了第一个华人社团。”

这种民间交流的加强证明中法友好关系已经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之中。

